最后的地主

廖亦武

目　录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
——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胡 平

一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祇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 200 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 20 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 30 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祇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 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 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备尝艰辛，25 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份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

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祇有 12 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祇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祇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 2005 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50 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着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 4、5 或 5、6 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 年 10 月因肺癌逝世，享年 80 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

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 57 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衹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衹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衹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 1994 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

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崩坍，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祇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雕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像，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祇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祇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

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墙，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望外的动机

《最后的地主》写了两年，终于水到渠成。

为了摸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的群体真相（胡平语）"，从 2005 年冬季开始，我先后奔走过以下乡镇、山村和城市：

云南省昆明市及禄劝县境内的撒营盘镇——则黑乡——向金沙江倾斜的打车村——夏天穿棉袄的马鹿塘乡——环形山脚底的撒戈铲村——世外桃源般的大住基村——正在进行圣餐仪式的德嘎村——作为西南神学院遗址的撒老乌村——禄劝县城——大理古城附近沦为废墟的凤阳邑——丽江郊区——作为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极其闭塞肮脏的剑川县——西双版纳境内的普文农场——景洪市郊的曼喃村——武定县境内的高桥乡下长冲村——黑灯瞎火的田心乡发块村——元谋县城——能禹镇——苴林乡。

《霸王别姬》电影编剧芦苇曾建议，开篇即展示一张错综复杂的寻访路线图，给读者以直观印象。可待我找出云南省地图，眼巴巴地瞪半晌，不少地名竟然没标！唉，手边条件受限，请专业绘图又得耗费不少时间，这一缺憾只得留待将来弥补。

在这项记忆抢救工程进行当中，我的朋友康正果、胡平、一平、陈迈平、苏晓康、

廖天琪等人均来信鞭策，遥寄厚望。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今年中秋，我最初的访谈对象、因信仰上帝而被划为地主的张应荣长老，就已在家中溘然而逝，享年85 岁。

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 年 10 月因肺癌逝世，享年 80 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 1 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我坐在这儿，坐在父亲生前曾坐过的桌子旁，写着字，像身为中学教员的他在批改作业。我绞尽脑汁回忆，这 5 年来干了些什么。成百上千的生活细节早已含糊，剩下的大致线索是：送父亲进火葬场，与家人一道四处寻找公墓，最终却鬼使神差，按盐亭县境内风水权威罗天王的掐算，将老人家的骨灰回归故里，和地主爷爷住一块。随后——我应邀参加作家王力雄发起的“为阿安扎西活佛冤案寻求司法公正”的呼吁签名，被传讯抄家。再随后——患难与共的妻子宋玉因无法排解的不安全感，提出离婚。再随后——事物发展就捎带了戏剧性，某一天，逃离精神病院的-信徒陈氏上小区 7楼来敲门塞传单，我一时手痒，让进屋做个采访，稀里糊涂就种下祸根。

凑巧的是，便衣警察如大片乌鸦降临敝舍的那个黄昏，刘晓波、余杰、张祖桦也在北京家中落网，知识界顿时风声鹤唳，连叫痛风害得下不了楼的王胖子怡，也丢开刚写完战斗檄文《冷兵器时代的政治》的笔，拔腿就避风头去。我的身板比他结实，自然在擂门的咚咚响中，从 7 楼翻窗上平台，因过分做贼心虚，险些失脚摔成肉饼。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白白奔逃上千公里，却在某某火车站被以逸待劳的我党逮个正着——还和逮刘晓波等人的我党不属一个部门！再随后——凄凉四顾，荒唐荒诞，持续数年的“与无赖政权拼热血沸腾”的人生观被彻底解构，无家可归又一把年纪的我，干脆破罐子破摔，自甘放逐到黑白混淆、朝廷与江湖混淆的云南边陲，同形形色色背景不明的家伙为伍,还协助湖北奇女子金琴，造出在江湖上以地下即兴音乐闻名的“丽江 38 号”。由于要糊口，还要满足一个文字证人重现历史的本能，我的《冤案录》采写一直没断，因此有缘结识堪称“冤案线人”的基督徒孙医生。再随后——就堕入寻访土改受害者的不归路。

现在，《最后的地主》马上收尾，再随后——是下一本《冤案录》，这在我目前的能力掌控范围内。可这当中还要发生何种变数呢？不知道。我父亲，乃至我爷爷活着时，我还比较青春，精力充沛，具有远大的文学抱负，我清清楚楚知道他们是地主父子，经历过解放、土改，以及毛时代的所有政治运动；我还知道他们的同辈人也跟他们一样，如果那时我要写和《最后的地主》类似的书，想必是容易的，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口述，至少地主及贫农多如牛毛。可我，的确没有了解他们的冲动；即使根根底底都了解，恐怕也没有写出来的冲动；即使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公诸于世的冲动。那时我同现今走红的作家们一样，热衷于纯文学，暗恋着诺贝尔文学奖，觉得诗歌和小说都贵在提炼，贵在升华，贵在把民族、人类、宇宙的内核，用悲剧抑或荒诞剧之箭，三点一线地射穿过去。最土也是最洋，最民族也是最世界，号称 20 世纪现代派文学三大巨头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就是现成的榜样！那么最惨最不开窍的卖文者（连作家都谈不上），就属于我目前这种，不提炼不升华，不人类不宇宙，上不了高雅或

主流殿堂的台面。几年前，曾有一位相当著名的作家对我说：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极好的素材，想不想让我将它们写成小说？

我咧嘴笑笑，不置可否。因为在将近 20 年前，我也许会说同样的话，而不觉得脑子进水。谁料到后来有“六四”，我会坐牢？谁料到出狱至今的日子这么没头没脑，没白没黑，没羞没耻，让人无法提炼也无法升华。孔子曰：危邦不居，乱邦不入。既然已经生在乱邦，居在危邦，就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居一处是一处。八九年胡耀邦死，学潮初起，有谁想到要开枪？后来就开枪了，咋样？还有你做梦都没想到的军中传言，“杀 20 万人，换 20 年的稳定”，老百姓的血不如水，不如尿，咋样？

土改时杀地主，也是抱着稳定江山的理想，所以杀戒一开，果真有至少两百多万颗人头落地。暴力革命之树植根于人心，借助一次次运动的狂风骤雨朝上疯长，直至六四。一代代杀人者，统治技巧千变万化，为江山稳定而杀人的传承却不允许变——这是中国文化吗？这是中国传统吗？中国人已经忘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话吗？

的确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甚至绝大多数文化人，只要能暂时忘忧地活着，有奶便是娘就包括全部内容。所以《最后的地主》肯定不合时宜。刚才我已经简述了 5 年来的遭遇：父死，妻离，抄家，归葬，逃跑，凄惶，流浪，厮混，吹箫，卖艺，寻访，写作。其中只有吹箫和写作是我愿意干的，而其它都是命运强加在头上的。我心存畏惧，不敢妄论如此的安排公不公平，因为事实证明，过去、现在和未来，种种疑惑和折腾均无济于事，过后还不是丑角一般乖乖接受？

但是《最后的地主》圆满完成，不是由正统行业殿堂内的权威学者、记者抑或作家，而是由我这么一个不懂行规、不知深浅的野家伙来完成，多少有点错位，甚至滑稽。也许，这又属于上苍开的一个苦涩的玩笑。

不可能成为可能，没动机成为望外的动机，我的指尖蓦然起了一阵暖意。我固执录下生锈的苦难，久久游荡的万千冤魂就有了归属，这难道不是上苍付给的酬劳？老母聒噪地健在，并存有主宰儿子私生活的不老心；我反抗无效，身心却徒然茁壮，越发迷人起来，这难道不是上苍格外的恩宠？那么，此前我骤然遭遇接二连三的变故是？

谜底似乎有了，可说不出。那么，就把我和《最后的地主》捆绑一体，交给上苍，交给冥冥中永远年轻的读者吧。从今后我不去琢磨人的死和不死，尽管天天都有人在死去活来；书的朽和不朽，尽管文化垃圾已泛滥成灾。

200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成都白果林

“麻风病人”张志恩

采访缘起

2005 年 12 月初，我于云南某小城与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孙某某相遇，当时，孙医生正

在巡回医疗的途中，其状态颇似中国古代的游方郎中。交谈之下，我才晓得孙医生是江浙人，1974 年下放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改革开放后考上北京医学院，接着在体制内从医多年，原本前途无量，却因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信了上帝，至此屡受牵制，步入了人生的坎坷历程，终于被抛出正式单位，流落于民间，靠医术讨起生活来。
由于我也曾以吹箫卖艺为生，所以双方沟通很畅。出乎我的意料，孙医生关注民生疾苦，有一颗赤子之心，当知道我正在进行《冤案录》的追寻和写作时，孙医生不禁心潮起伏，站起来把住我的胳膊大声说："我听说过老威这个名字，你就是我要找的作家！"我说："你要给我提供线索？"

孙医生摇头："什么线索？仁慈的主，要我给你充当冤案向导。"我也心潮起伏了一阵，接着就是彼此约定，互道珍重。

12 月 15 日，我照老习惯在家整理行装，然后出发去北京采访；28 日折回昆明，紧跟着与孙医生重逢。由于一位蒋姓朋友自愿驾车送我们一段路，所以 29 日大早的行程很顺利。小车披着金色霞光，沿着大道，没一会儿就进入禄劝县城。我们穿城而过，11 点多在极为破烂肮脏的小镇团街吃饭。我在一家简陋的超市买了几斤糖果，准备用于沟通情感。再走就是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还夹杂着基边不稳的土路。甲壳虫外表的小车颤抖着，喘息着，冒着青烟向上爬行，大约盘桓了一两个小时才上了顶。虽然关了车窗，仍能感觉到风大，云如大片的风筝，在阳光的丝线里穿插着飘飞，深深的红土沟壑，已叫岁月的血染透了。拐了几个弯，碎石路还是平的。快拢山嘴了，孙医生说，这地方叫大平地，属团街石门坎村。把车停到路边吧，此行的头一个访谈对象就住在我们脑壳上面。

孙医生的讲述：

大约一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当时有个曾经害肺结核的人送我，步行了大半个小时，在这土路边上等车。由于地势较高，山风自 1000 多米深的谷底呼啦啦地朝上刮，我们的衣摆和头发都翻起来,于是就退到拐弯的山凹处避风。无意中抬眼，却见对面峰峦在云海之间连绵起伏，真是太美了！再移动目光，又见山凹上头草木葱郁，斜斜的荒坡旁，竟有一间枝头掩蔽的草房。受好奇心驱使，我就要绕上去看看。不料却被两只手牢牢地扯住："去不得！去不得！那儿有麻风病！"我说："我是医生，有啥去不得？"那人说："好多年了，没人敢接近那地方。"我说不怕，就抹下那人的手，绕了几十米，从路边一个缺口登上坎。穿过我们刚才爬的那片杂树丛，就来到这儿。当时这房顶还是发黑的烂草，土墙也塌了几处，所谓的麻风病人张志恩和他的老伴唐开凤就坐在门下晒太阳。我近前打招呼，与他们谈了一会儿，透过仔细的观察，发觉这位老人没有任何麻风症状。我埋下腰，钻进门去看了看，房里像个山洞，甚至比山洞更糟糕。老人说，因为没力气，顶上的草已好几年没换，到处是大洞小孔，撞上刮风下雨，里头也翻江倒海。我叹息道，这日子怎么过啊？老人说，怎么过？整夜像推磨似的，满屋子转嘛，雨浇到脑壳上，就挪一个窝；再浇到颈窝里，就再挪一个窝……最后地上成秧田了，用来接雨的锅碗瓢盆都沉底，我们也挪不动了……我呆不下去，就直接找这儿村里的人了解情况，他们都说："医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说："他们不是麻风啊。"他们很惊讶："怎么不是？张老头以前的老婆就因为麻风被烧死

的……”我深感震惊。这以后，我和教会出钱出力为这对孤老人重建了房子，把草房改成瓦房，好歹能遮风避雨了。我还向这周围的群众反覆解释，可直到如今，还是有不少人害怕。

老威：你叫什么名字？

张志恩：张志恩，属羊的，今年 75 岁；她叫唐开凤，77 岁，属马。

老威：你们是彝族吗？

张志恩：汉族。

老威：两位孤老人，就一直住在这儿？

张志恩：从前住山沟下，团街的石门坎村，后来就不跟村里人住了，搬上来单独住。不过从前的从前，我们的老人也住这儿，有两代的坟在坡上，我们离他们很近。

老威：两代的坟？他们都是得麻风病死的？

张志恩：没么。

老威：那村里人在传言，你家谁得了麻风病？

张志恩：嘿嘿，已经死掉了。

老威：请你讲讲怎么死掉的？

张志恩：死掉了就死掉了。

老威：请你讲讲来龙去脉。

张志恩：我么，原来不是这儿的人，我在老家打了一捆麻蛇，就倒了霉……

老威：是哪一年？

张志恩：不记得了。

老威：再想想。

张志恩：还在生产队上，土地还没分到户么。

老威：那就是 70 年代。

张志恩：对么。那天一早太阳还没起，我就上坡，想寻些药材来卖。不料埋头爬着爬

着，就撞上一座坟。坟周围的乱草齐腰深，我辨不出路，只好试探着下脚，却感觉到许多夹脚的石头。我左一滑右一拐，无意间踩着了一颗野杜鹃的根。我薅开杂草细看，见这杜鹃根特别肥，就挥起锄头掏，心想赶街时能卖个好价钱。可突然间，一捆麻蛇钻了出来，还缠着杜鹃根往上爬。我浑身一哆嗦，锄头就下去，把麻蛇的尾巴斩断了。麻蛇痛得扬起脑壳，丝丝地吐舌，我又狠挖了几锄，把它打死，就背着杜鹃根回家了。后来我就落下了心病，好长一段时间，皮肤着痒，骨头阵阵发寒，夏天都穿棉袄。我自己找了许多药吃，都不见好。有一次我去赶街，在买盐巴时碰上生产队长，他见我在太阳底下打哆嗦，感到奇怪，就喊："你咋么了？"我回答病了；他又问咋病？我说是叫麻蛇缠住了。队长一听，吓了一跳："麻蛇打不得哟！看来你的病好不了！"我没想到，队长过后竟添盐加醋，报告给了麻风病院的医生王 x 安，于是王医生脚跟脚地赶来，在一米之外盯了我一会儿，就确诊为"麻风"。我不服，王医生就说："看你的脸灰得跟土一样，肯定是了。"我被民兵拉到麻风病院，隔离起来仔细检查，又说没得病。可既然进去了，出来就不太容易，这样，我被强留在里头给麻风病人煮了几年的饭。因为实在没病，继续强留不符合党的政策，我终于叫"清理出院"了。

老威：你在医院里，与麻风病人接触过？

张志恩：天天在一处，没啥嘛。

老威：这是什么时候？

张志恩：不记得。大概毛主席都死了，大会也开过了。我出院后回到老家，风向已变，生产队再也不是集体劳动，记工分；土地全部分给了各家各户。因为分田地时我不在，大家就把我忘了。

老威：你也可以按政策要求补分。

张志恩：连土疙瘩也没剩下，分个啥？况且，我如果不出院，就背着麻风的皮，也没资格承包土地。

老威：你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了？

张志恩：所以我就找队上闹，我是几代贫农，还受你妈的窝囊气？这时，有个同村人出面调解，说你一个光棍汉，好几十岁了，闹下去也捞不着便宜。干脆我在别的地方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冷静一盘算：在老家呆不下去，就到外乡上门，媳妇和土地不都有了？于是答应下来。双方在赶街时见了面，都还不挑剔，接着谢媒请客，我打起铺盖就到石门坎村来做上门女婿了。

老威：女方知道你在麻风病院呆过吗？她没嫌弃你？

张志恩：听同村的人说，她也在康乐村的麻风病院住过，后来没事了，就出来了。

老威：什么叫"没事就出来了"？

（孙医生插话：直到现在，乡下对麻风也很恐惧，只要大家认定谁有这种嫌疑，就马上送去隔离，关一段时间，没事再释放。而真正的麻风永远也出不了院，这其中包括一些被误诊为麻风的无辜者。我在这一片巡回出诊，经常听人们传言，某某村某某人得麻风了，就赶去看，结果根本不是。我当场给大家解释，也是文化稍高一点的信，多数人依然“闻麻变色”。

老威：麻风有些什么症状呢？

孙医生：开头的反应为一种皮疹，一般得皮疹又痒又痛，可麻风皮疹不痒不痛。往后，人的神经末稍就会坏掉，脚趾、手指、耳朵、鼻孔都会溃烂，眉毛也脱落。深度接触会传染，但一般交往也没问题。我曾经在红河的麻风院替里面的病人动手术，割疝气和阑尾，稍加防护就没事嘛。唉，乡下的庸医不少，害了多少人！

张志恩：她在我之前还处过 5 个男人，都不务正业，又偷鸡又牵猪，在当地名声很不好，只有我是个正经种地过日子的。

老威：也就是说，你们俩谁也不嫌弃谁。

张志恩：徐美英长得好么。

老威：你们做了多少年的夫妻？

张志恩：不记得。

老威：不记得？我能看看她的相片吗？

张志恩：没有照过相片。

老威：结婚登记照呢？

张志恩：没么。上门就睡一起么。

老威：当时她多大？

张志恩：小我两三岁。我们开始睡，屋前的这条路才开始修。

老威：你们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张志恩：挖土么，找吃么。

老威：有娃娃？

张志恩：没么。

老威：她被烧死是哪一年？

张志恩：不记得。

老威：不记得？那她走了多少年？

张志恩：她么，已走了 10 来年。

老威：那就是 95 年前后的事。你们应该在一起生活了近 20 年。

张志恩：是么。

老威：为什么要烧死她？

张志恩：她得了病，好不了么。

老威：好不了就该送医院。

张志恩：你不晓得，她遇上了大蛊龙。那年春天，我锄地的时候，石缝里又钻出一捆麻蛇，我不想打，它偏要来缠，我一害怕，就下狠手把它灭了。随后清明节到了，徐美英去给她妈上坟，回来不久，她在富民县者北乡的一个朋友来我们家走人户，住了 3 个月。这个亲戚送了一大匹花布，徐美英用这匹花布缝了一床新被子……

老威：我不太明白。

张志恩：那夜下了很大的雨，天快亮的时候，哇刺打了一个雷，房子都震抖了。蛊龙突然现身，如锅盖罩下来，龙头在云缝里，尾巴却在荒坟坡上扫来扫去。徐美英起身往窗外瞅了一眼，就啊地一声倒回床，我问你咋么？她不吭气，可没一会儿，她就扯开喉咙喊半边脑壳痛。紧接着，她的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我急得四处求医，把家当都败光了，可根本找不到病根。啥药啥草都熬了灌了，病却一天天加重。我快疯了，徐美英的事却传开了，并且越传越神，大家都说这是我打麻蛇的报应，蛊龙作法了。我请端公来家摆道场，可蛊龙太强，端公也斗不过；这期间还有人牵来一个算命的老瞎子，皱着鼻子绕屋转了一圈，啥话也不说就摇头溜了。眼看徐美英不得活，我就先找舅老公（她的大哥），再去找村长商量办法。他们都一口咬定是麻风病复发，还有老人出面证实，徐美英的妈妈就是害麻风死的。

老威：麻风有遗传？

张志恩：我晓不得，也没主张。这样熬了几天，舅老公来喊我出屋，说是为我好。

老威：什么为你好？

张志恩：村长也来，同村的其他人也来，鱼苗一样，一串接一串，都说为我好。

老威：到底好什么？

张志恩：亲戚、村长这么说，同村人都这么说，我一个上门女婿，又没啥势力，能说么？即使能说，也叫群众的口水淹死了。

老威：你在麻风院呆过，应该知道麻风发病的症状。

张志恩：大蛊龙要吃她。

老威：她的手指、脚趾溃烂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眉毛掉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身上起疙瘩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你们这时候还住一块？

张志恩：对么，还住一屋。

老威：没传染你？

张志恩：没么，我好着呢。

老威：你好着呢？！

张志恩：那天早上，舅老公带了 6 个人先到，接着是村长和他的侄儿，再接着全村人都到了。我被喊出屋，按在一边不能动，舅老公等几人就进门了。徐美英睡在一张门板上，叫抬了出来……

老威：他们怎么给她本人说的？

张志恩：去看病么。

老威：看病？！

张志恩：对么。

老威：她有什么反应？

张志恩：没反应，她进出只一口气了。

老威：她挣扎吗？

张志恩：嘿嘿。

老威：她听天由命？

张志恩：嘿嘿。

老威：你无动于衷？

张志恩：我被遮住了，啥也看不见。舅老公领着人，一路吆喝“让开让开”，就把她抬下山了。照规矩，村里每家每户都出一捆柴，架起一个很高的柴堆，徐美英被他们连门板捆在柴堆顶上，然后浇了几遍柴油，直到从上到下都透了，才点火。大家隔着我，不能靠拢去。我只能望见黑烟冲天而起，一下子把太阳都给盖住了，然后是火苗子呼呼地窜。我不敢看，但还是偷偷垫起脚后根，火像一堵亮闪闪的墙，只能感觉到徐美英如一张皮子，一点点打卷，颜色也越来越深……

老威：活人被烧，真的就没任何动静？

张志恩：她又聋又瞎，又几天没吃啥东西，早迷糊了。

老威：即使是蚂蚁，遇火也要奔命啊。

张志恩：我没看见，大家也不想让我看见。徐美英已迷糊了，她就是醒来，也就几秒分把钟，又得死过去。那火太猛了，隔着十几米都灼得人肉疼，起先大家还逼得近，随着火圈越来越开，大家就一步步后退；烧了一会儿，柴堆塌了，在烟雾中，徐美英陷了下去，跟一捆柴也差不多。这时，一些人就将手里的棍子投进火里……

老威：拨火棍吗？

张志恩：拨人棍。村上的青壮年都拿着棍子，守在火堆边防着许美英，万一她突然跑出来，就用棍子敲。

老威：真是无法无天了。

张志恩：你说谁无法无天？

老威：那些害死你媳妇的人。

张志恩：大家都怕麻风啊。

老威：你就这么麻木？

张志恩：没有办法么。

老威：烧了一个小时？

张志恩：两个小时。徐美英再瘦，也要烧这么久。

老威：你哭了没有？

张志恩：没么。

老威：不心痛？

张志恩：烧她的时候，有人看见大蛊龙拖着长长的尾巴，一圈圈盘着下来了。

老威：你信？

张志恩：我信。徐美英死后，她缝的新被子我舍不得扔，继续盖，不料在有一天晚上，梦见碗口粗的麻蛇将我缠得死死的。我透不过气，就举起弯刀砍，可胳膊都整酸了，就是砍不断。我浑身是血，好不容易挣扎醒来，差点翻到床下。我再不敢睡了，就点灯熬到天亮，拖着那条被子出门。奔到地头，燃了把火，你猜咋了？那被子居然烧出油来！还一股肉焦了的味儿！我眼鼓鼓地干完这事，家里才清静了。

老威：你烧死了大蛊龙？

张志恩：烧死了它下蛊的棉被嘛。

老威：我看，你们这一村人都中了大蛊龙的邪。

张志恩：徐美英娘家人挑头，他们晓得么。

老威：你出面收尸了吗？

张志恩：我舅老公收的尸，把没燃尽的骨头捡成一堆包了，埋在白沙坡那边。

老威：麻风都集中埋在那儿？

张志恩：没么。

老威：这事就完了？

张志恩：没么，还要办饭。

老威：烧死你家的人，还要你办饭？

张志恩：我出东西，他们办饭。村长领人进屋，把我家的猪牵去杀了，梁上腊肉也取了。那头烧人的烟子还没散，这头就在几十米远挖了两眼露天的地灶，架上锅，一边煮肉一边蒸大米干饭。天没落黑，全村人就点起火把，捧着海碗，集中到锅边来等着开席。

老威：全村有多少人？

张志恩：30 多户，每户出一个强劳动力来吃。我花了 250 多元钱，耗穿了家底，还欠了帐。家里没有那么多米，所以大锅饭吃掉的细粮，先由村里垫着，秋后收苞谷，卖了钱再折算还帐。

老威：有点像吃丧宴。那你收没收祭幛之类？

张志恩：没么，都是为我家出力嘛，所以办饭我没怨言，不能亏了大家。直到每个人都揉着肚皮说，圆了，再也胀不下了，我心里才踏实。

老威：烧活人犯法，你想没想过报案？

张志恩：没么，大家是为我好么。

老威：你直到今天，还认为都是为你好？

张志恩：村里人都这么说。

老威：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儿似乎没啥变化。

张志恩：有变化，团街过这儿的路越修越好么，人也晓得做生意了。我也养了猪，养了狗和鸡，岁数大了，坡上的地种不动，就包给别人去种，每年补给我们 120 元钱。我们两个老人吃不多，能凑合着过。

老威：你现在的老伴进门多久了？

张志恩：有五、六年。她是大麦地那边的人，儿女不管她，有人就介绍她到这儿来。

老威：她可知道徐美英的事？

张志恩：她没提，我也没说，估计她不想听。

老威： 你们也没办《结婚证》，就住在一起了？

张志恩：没么。这门前一年不见几根人毛，她来了就有个说话的人。

老威：也没请客？

张志恩：请不起，也没人来。

老威：总该照张像吧？

张志恩：你刚才已照了嘛。

老威：你还想徐美英吗？

张志恩：嘿嘿，这只能怪大蛊龙么。她去了不久，我舅老公的媳妇也被大蛊龙缠住，不得活，听捉龙的端公讲，要喂人脑髓，所以我舅老公在半夜摸到荒坟地，挖死人掏脑髓喂自己的媳妇。舅老公还躲在桥下，听蛊龙呜呜地叫过。

老威：死人脑髓病毒更多，没病也叫搞出病来。

张志恩：嘿嘿，你晓不得。

老威：我晓不得？那你可晓得毛主席死是哪一年？

张志恩：毛主席死开过大会嘛。

老威：邓小平死呢？

张志恩：邓小平死了？我晓不得。

老威：唉，在这山梁子，时间好像停顿了，每天只有风声呼——，呼呼——。

张志恩：路上还要过汽车么。

老威：你们今后怎么办？

张志恩：信靠主么。

老威：为什么？

张志恩：感谢主，让我们有了瓦房；感谢主，还有了医生。教会的人也没嫌弃我们，有时还能下山做礼拜。我们天天向上帝祷告，大蛊龙就不会再跑出来害人。

孙医生哦，你终于来了，我已憋了他妈的三个月，大便不通，小便不通，我已喊了好多回，教会的人一个不来，咋办么？

孙医生：我教你一个法子，把黄连洗干净，切成片，熬了之后再加蜂蜜；每天喝几次，一直喝到通了为止。

土改受害者阿泽

采访缘起：2005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3 点 32 分，我们一行 3 人，在完成了对“麻风病人”张志恩的拜访后，继续驱车在碎石路上绕行。不久抵达一个岔路口，右边的下坡是狭仄的机耕道，孙医生说，顺着这路下到底，就是团街乡治安村，以前叫养龙村，我们的下一个寻访对象就在那儿。

我有些迟疑，因为司机朋友是个与我同岁的女同志，而且所驾的小车底盘矮，跑碎石路已十分勉强了。我们都下车仔细察看路况，孙医生不禁劝道，蒋老师你还是打道回府吧，下面这十几公里我们自己走，估计天黑前就到了。

我也说，万一抛锚咋办，弄不好走路还比开车快些呢。

蒋老师微笑着回到车里，招呼道，两个大男人让一个女人拉着跑，还这么多的废话。

车摇摇晃晃地下了机耕道，一望无际的红泥巴翻滚着，犹如大片大片的伤口，有的已凝固成痂，有的还脓血流淌，车轮一碾上去，就四溅开来，没一会儿，小车就像刚打了败仗的大笨熊，显得一塌糊涂。右边是千丈沟壑，梯田沿着令人绝望的裸体山峦蔓延，我不禁叹了口气，这彝族地面的土真瘦啊，也不知他们一年到头怎么种怎么吃的。

蒋老师说，这儿还不算最穷，我在楚雄州下面做过几年县长，那儿才称得上穷山恶水，几十年来，每年都吃政府救济。孙医生也附和道，对对，在与四川接壤的金沙江边，坡更陡，从山谷来的风更大，我经常下乡，也在上面站不稳，可彝族人祖祖辈辈在上面刀耕火种。

路面越来越软，巨蟒一般蜿蜒的泥梗吱吱磨擦着汽车底盘，蒋老师不再吭声，似乎眼睛和双手都在用力，我在副驾座上起落着，觉得前方的坡道像一把弓，我们沿着弓背，如一颗弹丸向下滑，速度却与骑自行车差不多。

先后有男女两个村民招手，请求搭便车，我们接纳了。接着撞上了修路，在两个拐弯处，两堆村民在往漏洞一般的坑里填石头,见了我们，就闪到一边，惊奇地议论着。小车先喘息，后咳嗽，终于陷入了泥潭；右轮扎进泥梗里，挣扎了半天也出不来。我们下来，动员若干村民一起推车，并在退出的空档下垫入石块和木棒。发动机一阵接一阵冒青烟，从轮下喷涌的泥浆射了我一裤裆。孙医生问一村民，路怎么烂成这样？村民答，被采石料的卡车压的，这些家伙同政府有一腿，所以光他妈的搞钱，不修路。

斜阳将山水映得更红，闪闪烁烁中，有一群亮眼睛孩子围拢过来，唧唧匝匝地叫着彝语。我给他们照了好几张像，特别天真无邪，令人想起战争废墟边的伊拉克或伊朗的孩子。

幸而车后又来了一辆底盘极高的越野车，司机技高人豪放，主动在前开路。如此，历经近两个小时的折腾，我们方下到山脚的一片谷地。孙医生探出头去，同来来往往的人打招呼，似乎回家了。

受村民指点，我们将车停靠在一个有桥有树的岔路口，旁边的土屋据说是个村中小卖部，却不见人影。领路的村民说，没关系，一会儿人就来了，我们先去办事吧。

我们在村落里穿插，与中国所有的偏远农村一样，狗们惊喜得阵阵狂吠，男女老少都出来了，领路人也就越来越多。我们还与不少驴子、马、猪擦肩而过。盘桓而上的仄道潮湿而肮脏，露天石碾，歪脖子树，除了偶然传过耳的拖拉机声，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和百年前没啥两样。

上了一个陡坎，再沿着两三层菜地绕回来，我们脚下露出一片瓦顶。我们一步步下，瓦顶右边有一扇柴门，狗叫了，领路人也大叫“老爹”。一个挽着裤腿的蓝衣老汉应声钻出骂狗，并拉开柴门迎客。一行人继续下到土墙边，视野开阔了，我们站在半个院坝里，又应邀上了三、四级台阶，向老板凳坐了下去。

屋里屋外都很简陋，很零乱，夕阳迈过门坎透过去，使我模模糊糊望见了落满灰尘的圣母玛丽亚和毛泽东的像。75 岁的瘦老汉阿泽在黑漆漆的供桌上摸了一会儿，端出半土碗蜂蜜和一双筷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矮凳上，连说，吃吧，野生的。

天光还很充足，我照像若干张，再拿出录音机开始交谈。渐渐，夜色以猫的步态，一伸一缩地跃上台阶，接着跃上我们的膝盖；透骨的凉风擦过下巴，我们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一对时间，已快 8 点了。老人抱歉地说，我家太寒酸，没办法招待，只好带你们到另一家去吃。

我们连称不好意思，老汉又说，我刚替他们杀的年猪，走嘛，村里有吃杀猪饭的习惯。

的确，人家已派人来催了 3 次，最后竟来了 3 个人，打着手电筒为我们引路。几分钟后，进了那人声鼎沸的院落，坝子里已摆过好几桌，妇女们正在收拾残羹。作为上宾，我们被热情迎入正屋——角落里，一堆妇女儿童在看老掉牙的黑白电视，其中有一个包着头帕的老祖母，至少 80 多岁，哮喘的声响很大，几乎压过了扎扎的电视音量。

矮桌上铺开 8 个菜，除了炸虾片，全是白花花的肉。我吞了 3 碗饭，还喝了两杯酒。其间，对吃得心满意足的老汉进行了补充了解——他的跟前有一碗生剁猪肝，他一筷接一筷地整去大半。我刚要去尝一筷，就被孙医生以眼色制止——里面有太多的寄生虫，他事后解释道。

老威：你也坐嘛。

阿泽：我蹲就是了，彝族人都习惯蹲着。

老威：“阿泽”是你的姓氏还是名字？

阿泽：晓不得，我从小就叫阿泽。长大以后，父母才替我取了一个“李天旭”的汉族学名，不过平时用不着。我的祖先姓禄，在曲靖、会泽、昭通一带，至今还有许多禄姓的彝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与我们都属于同一血脉。不知何年何月，我们这一支从会泽迁到了这片彝汉杂居地。照彝族的习惯，这“养龙村”分两头，这边叫卡念，那边叫卡布。

老威：为什么你没用祖先的姓？

阿泽：这只有父母才清楚。不过我的一个堂妹，在昆明水电工程设计院工作，她要寻根，所以就改姓禄了。我还有个堂兄叫李天禄，名字中也有不忘祖先的含义。

老威：听口气，你还有些文化。

阿泽：只读过几年小学，家境就衰落了。我的老家是团街上头的高家乡白石岩，老爹（祖父）过世得早，我没见着；父亲还有个亲弟弟，可我这个叔叔过世得更早，刚刚结婚，连个后代也没留下。父亲好歹有我这点骨血，他 38 岁过世时，我才十五、六岁……

老威：这是哪一年？

阿泽：记不得了。有一次，父亲上山砍柴，不小心从岩子上滚下来，把腿骨摔断了。那年月，大山沟里医疗落后，家里只能找个草药郎中，遍山寻些草药来捣碎包扎。父亲整夜挣扎，吆喝连天，为了止痛，就狂抽鸦片烟，很快上瘾了。这可不得了，以后为了抽，就卖祖上留下的田产。他又不会做生意，光出不进，家就这样败了，临近解放，只剩下 20 多亩田和一户院子。

老威：你父亲死后，家里还留下几口人？

阿泽：母亲、我、媳妇和不满周岁的娃娃。

老威：自己种田吗？

阿泽：养了一头牛，全家都下田。当然，也佃给别人一部分，收些租。

老威：你家院子有多大？

阿泽：正房有 3 间，左右厢房各两间，下头关牲口的碾房有 4 间。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地主做得有些勉强，如果放在较富庶的平坝地区，可能你只能算个富农，甚至富裕中农。

阿泽：父亲再晚死两年，田和房子都抽光啰。

老威：那按当时的土改政策，你就是贫农，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了。我爷爷是地主，据说他的弟弟就是靠一杆鸦片烟枪，败完了几十亩家产，而成为贫农的——撞上解放，他又翻身做主人，去分他哥哥辛苦挣来的田地了。

阿泽：这是命啰，1950 年，村子里 20 来户人家，就我和我的堂兄家被划为地主。这彝族地盘太穷了，相比之下，我家的日子稍微好过点；其他还划了 3 户富农，也不见得有多富。

老威：听孙医生讲，你的堂兄是老革命，还当过中共云南宣威县长？

阿泽：他就是李天禄，读过许多书，在家族中文化最高。1947 年他师范学校毕业，就走出家乡投奔革命，从此几十年没回来。不过，这不影响他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查抄财产，瓜分田地，他的继母还叫抓去判了刑呢——亲不亲，路线分，他是革命干部，哪怕在外面晓得家里出事，也不能吭声嘛。

老威：听说在四川大凉山，黑彝被称为贵族，白彝和红彝被叫做娃子（奴隶），你们这儿呢？

阿泽：我们这个方圆两里的村，除了汉族，住的都是黑彝。所以划阶级与这个没关系。

老威：20 来户人家就划了 5 户剥削阶级， 敌人的面也太宽了。

阿泽：是啰。

老威：接下来的遭遇呢？

阿泽：解放了，上头派来工作组，下村子一摸情况，明摆着。于是提出要“合理负担”，即所有地主与富农都要照政府的要求纳公粮，每个月按人头交两百多斤。动员会开过好多次，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了，在大形势下，我们最先得雇人，走 5 天 5 夜，将 1000 多斤粮食背到昆明去入库；后来团街建立粮站，送粮就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

老威：有人押运吗？

阿泽：农民协会来个口头通知，你就是饿饭也得送。新政府的意图就是要把你的汁水挤干，然后才抽筋剥皮。到了 1951 年 3 月，家里无粮可交了，就捕人了。

老威：工作组来捕人？

阿泽：我这种死老鼠，来几个民兵就吓得没魂儿了。我从来没见过工作组，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见工作组。3 月抓了我母亲，4 月又抓我，都关进团街区上的监狱。

老威：你母亲被捕后，你没逃跑？

阿泽：周围都有眼睛，连地缝也没得钻。

老威：你和你母亲是被绑走的？

阿泽：他们带了麻绳，见我们太老实，就没绑。一伙人端着枪，指着我们出门。嘿嘿，也不晓得那种老枪能不能打响。

老威：他们有没有逮捕手续？

阿泽：啥子手续？就说了一句“区上要捕你”。

老威：“区上”是什么机关？

阿泽：晓不得。总之一到团街，就塞进一户老院子，那也是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每间屋都塞满人，有两三百号啰。

老威：全是你这类的？

阿泽：有一半是各乡各村的地富，其他就是小偷小摸、奸淫、土匪之流。昼夜都在审讯，搞得一片鬼哭狼嚎。

老威：你没挨打？

阿泽：关了几个月，审讯我 3 次，没挨打。

老威：审你的是工作组？

阿泽：本地人，也算政府干部吧。

老威：地主也是罪名？

阿泽：我有 3 条罪名：第一，抗交公粮。冤枉死了，锅都吊起来当锣打了，哪还有粮？第二，窝藏反革命。我老岳父因反对解放军被划为反革命，在没解放之前，我曾把老人家接到家里来玩了几天，村上人人都晓得，却没想到后来成了我的罪。第三，造谣惑众。有人揭发——阿泽说的——捉到一个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国民党要奖赏多少多少钱。我是跳河也洗不清嘛。

老威：嘿嘿，新社会算旧社会的帐。

阿泽：临近解放时，地方上很乱，今天听到这种风声，明天听到那种风声，这个也闹革命，那个也闹革命。把人都搞糊涂了。特别是我这种死脑筋，啥子叫革命？晓不得。

老威：命已革到你头上，还晓不得？

阿泽：晓不得。做过的事认帐；没偷没抢没通匪，你再逼我，也认不出帐。

老威：接下来呢？

阿泽：接下来就在龙海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公判，团街区下面几个乡的群众都参加。我们六、七个反革命地主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下接受批斗。两三个小时后，有判六、七年的，有判七、八年的，我判了 5 年。

老威：由哪一级的法院宣判的？

阿泽：区上的法庭，好像是工作组。

老威：没有查抄财产吗？

阿泽：这是清匪反霸阶段，没收财产是后来土改中的事。我已经劳改去了，在楚雄州的罗茨劳改农场，一呆就是 20 好几年。直到 1978 年，在邓小平手里落实了地富政策，我才彻底自由了。

老威：你不是只有 5 年刑期吗？

阿泽：罗茨是个极偏远的乡，我去时，农场有七、八百犯人，全部在开垦荒地，每天挥十几个小时的锄头，非常苦；后来又种水稻、玉米。我天天扳指头熬到 1956 年刑满，心想要回家和老婆团圆了，政府又来开会骗人，农场干部在会上说，现在你们已获得新生，有公民权，在人格上与我们平起平坐了。如果愿意留下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就太好了。政府将无微不至地关心你们，给你们修工人宿舍，让你们结婚生孩子，安家落户，这总比你们回到社会上无依无靠，还受歧视强。

犯人头脑简单，许多人相信政府的甜言蜜语，就留场当了工人；也有人表示不愿意，政府就来硬的，不留也得留。到了 1957 年，反右运动一来，我们的工人资格又被取消，重新成为专政对象。以后运动来运动去，七专政八专政，我们就没清静过了。强迫劳动，强迫学习，外出要请假，违规要遭罚——政府的许愿全成了泡影。

老威：这么多年来，你的家庭还在吧？

阿泽：早散了。母亲也被判了刑，牢还没坐出来，就在土地改革那年死了。

老威：怎么死的？

阿泽：晓不得。

老威：也就是说，自你们母子分别被捕，即成永诀？

阿泽：以后还见过一面，那是在判完刑押送去劳改的途中。当时武定还是楚雄州的一个比较大的专区，管禄劝等十几个县，我们 100 多犯人由禄劝转武定，在专署门口暂时集中，再等着分派到各个劳改队。我们下了囚车，被绳子串着，周围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记得那天还下着雨，在飘飘的雨丝中，每个人的脸都是青的，下巴还滴着水。我们在泥浆子里站了几个小时，为了转移浑身的难受，眼珠子就东溜西溜。就在我歪颈子的瞬间，我突然看见了母亲她老人家！竟在我身后的两三米外！唉，才分开三、四个月，她的头发就已花白了，而眼睛遮在头发里，猛一撞见，还以为是个瞎子。

那时她才 50 岁左右，却已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我心里如开水煮，却紧咬舌头，不敢出半点声。母亲也发现我了，她猛然抬起绕着绳头的右手，堵住嘴。我感觉她流泪了，幸好在下雨，要不就叫解放军给看出来。

老威：怎么会这么巧？

阿泽：我母亲也判完刑，在武定看守所搞劳动，等着转到其它地方去。

老威：她判了几年？

阿泽：晓不得，也没敢问。

老威：母子就那么彼此望着？

阿泽：还同走了一段路。当时已捱到下午五、六点，政府才来点名分配，由于从武定到罗茨劳改农场的公路正在铺，所以许多人被弄去修路；而我和其他 5 名犯人被挑选出来，派到山上一座寺庙旁边去烧石灰。

老威：你母亲呢？

阿泽：也没剩下，可具体去哪儿晓不得。几十个犯人互相牵扯着，排着队从武定出发，在真枪实弹的逼迫下走了大约 10 公里烂泥路。我和母亲肩擦着肩，在犯人队列中埋头赶路，路况较平展时，领队的干部为了提神，就 121，121，123——4！地喊口令，大家立马挺胸抬头，脸红筋涨地跟着喊；我和母亲也喊，她的声音只有一尺多远，却只能感觉到细细的尾音，像一根铜丝在刮耳朵。

老威：那么远的路，至少要走两三个小时，你们就没有谈话？

阿泽：周围都是解放军盯着，所以一想说话就很紧张，不敢转头，眼角也不敢乱瞟。遇上烂泥潭或土坎，母亲的步子就不太稳，好几次滑倒，连累了一串人；我本能地伸手去扶，觉得她浑身都在打哆嗦。有一回，我的手慢了一拍，母亲的膝盖就咚的跪到地上，绳子把前排走的人都差点拖倒。

如今回想，路那么长，从天还亮走到天黑尽，再有大手电筒和火把照着，也不可

能不说话。母子感情，十指连心，牵着疼啊，况且彼此不知消息已好几个月，家里的媳妇、娃娃也晓不得咋样了……

我已想不起来到底说了些啥子，要不就是我说了她没听见，或者她问了我没反应。解放军也没咋管犯人说小话，可我们母子晓不得咋搞的，就是对不上号。唉，有啥说头！一样都没有了，人都快熬成灰了，顾不上顾不上了。

我留在了烧石灰的地方，就像做梦一样，母亲他们不知消失在哪儿了。几十年后才晓得，她第二年就死了，娃娃也死了，媳妇也死了。

老威：绝户了？只剩你 1 人？

阿泽：是啰。

老威：在土地改革那年？

阿泽：一土改，我家就叫瓜分掉了，媳妇她才十八九岁，却抱着 1 岁多的女娃娃，被赶出自己的院子。后来恳求农民协会，给了她一个猪圈大的破屋。

老威：孤儿寡母怎么过呢？

阿泽：地主婆嘛，在村里讨饭，要得到就吃，要不到就捱着。有时也帮贫下中农干活，人家就赏几斤粮。我娃娃营养不良，没多久就病死了，至于啥子时候、咋个死的我也晓不得。

老威：你老婆没跟你离婚？

阿泽：没有。

老威：不错嘛。

阿泽：农村女人文化低，所以认命。她是 1958 年大跃进死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她被弄去背柴、敲矿石，粮食定量又低，她又累又饿，终于垮了。

老威：你在她身边吗？

阿泽：不准假，就回去不了。我后来才晓得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成骷髅了。平时没知没觉地躺着，只要听到那儿有吃的，眼睛方哗啦一下睁开，手也乱抓，把布条、泥巴、草，啥子都往嘴里塞。

老威：1956 年你刑满，就该是有公民权的工人了，为啥还不能探亲？

阿泽：转眼就变了。再说 1958 年的革命形势很厉害，不仅我们不准上街，农民也不准上街，都被圈在劳动现场。店铺关门了，赶街都取消了，为了节省时间，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两年内超英赶美，大伙买盐巴也是委托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去供销社跑个来回。区乡的街上、马路上，全部空荡荡的，偶尔有外乡人路过本地，如果叫眼尖的发现，立马就会被腿快的群众围住，拉你到田里地里或者山上的炼铁场去做贡献。城里人也好，干部也好，你解释没用，中央的大政策摆在那儿呢，你不放下架子，群众就用拳头和口水帮你放下架子。

所以一个小小的地主婆，累病累死算个啥？

老威：人都快死了，还不通知亲属？

阿泽：一年多以后，我才晓得媳妇不在了。

老威：大跃进时代的效率也太低了。

阿泽：我没钱，她更没钱，所以没法寄信；不寄信，双方就晓不得情况。1959年夏天都过了，我已好久好久没她的下落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啥子亲人都没有啰，除了她，我也没啥想头。刚好，队上额外开恩，给每个犯人发了一张明信片，我就迫不及待在这上面写了几行字，当家书给媳妇寄出去。

老威：这公开的家书怎么写的？

阿泽：太简单了："好长时间没写着信，我也没钱带信，也不晓得家里的生活怎么样？"

老威：没收到回音吧？

阿泽：媳妇没回音，那边村里一个好心人却回了信："你老婆已经不在了。"其它就没说啥了。唉，又过了许多年，我才真正弄清媳妇她是怎么不在的。

又能咋个样嘛，人还得活下去。接下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种的粮食不够吃，就以瓜菜填肚子，油荤见不着，人也浮肿，数我命大能熬，好不容易起死回阳。

老威：看样子，你在劳改队已呆习惯了。

阿泽：人长了两条腿，做梦都想到外面的世界走动嘛，所以一有探亲假，我还是要回家。

老威：你的家在哪儿呢？

阿泽：村上的熟人家还是可以去一下。阶级斗争搞了几十年，也疲了，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人看穿了，无所谓。

老威：里面也搞文革吗？

阿泽：反右、文革都在干部中展开，和犯人无关，因为我们比右派和走资派还要坏些。不过运动一来，监狱就会严管，一律不准探亲假，稍有言论，将以破坏罪论处。

我还以为要在监狱混一辈子了，灰心得整日眼皮都懒得抬。不料毛主席一伸腿，邓小平上台，地主阶级摘了帽子，出头了。50 几岁的我被清理出狱时，真比贫农还贫——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生产队干部看着我都头痛。幸好筋骨还结实，干活是把好手，就在热心人的介绍下，到这家上门。当时她是个 50 来岁的老寡妇，带着两个娃娃，正需要个帮手。

一晃又 20 多年，我已 75 岁，老伴带来的娃娃也都成家，连孙子辈也有几个了，虽然不是亲生，我也可以满足了——所以我极少对人提起过去，忘了就忘了吧，搞得心情不好有啥意思。

老威：你落难时，你那个当官的堂兄没拉你一把？

阿泽：他在路线斗争中多次受冲击，文革中更是自身难保，只有在邓小平手上，兄弟俩都老了，才敢见面相认。他晚年比我凄惨，去年 1 月，他忧虑过度，患癌症去世了，太可惜。

补记：

吃罢杀猪饭，再与村民们闲聊了一会儿，不过 9 点钟，夜就显得很深了。在伸手不见五指中，几个领路人前后照应着，用手电筒带我们走了大约两里曲折小道。有个 8 岁女童尤其热情，拉着我的衣角，像个毛乎乎的刺猬，感动之下，我塞给她 50 元钱和一包糖果。

我和蒋老师被安排在乡村医生张彩香家住宿。张家有前后两套院子，丈夫和儿子又在外打工，所以在村里算富户。可是院内潮湿而肮脏，我们敲门进入时，先是一条狗，后是一群鹅，再后才是两头猪，连奏了好一阵畜生交响乐。跟着，炸起一串吆喝，畜生指挥家张医生扯亮了大门、中门、侧门、圈门、里屋门的乱七八糟的灯，我们在灯影中垫起脚后跟，但还是连踩了两三次畜粪。终于登堂入室了，张医生端出一盆碳火，就坐下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天，这个 50 来岁的脸蛋红扑扑的妇女，回忆起当年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医的情景，依然充满憧憬。

我却对着墙上并排张贴的东西发呆，那左边是基督教年历，外圈大红大艳，对联为“辞旧岁数算神恩，传扬圣经救世真道”，横批是“神爱世人”；而在右边大红大绿的背景前，屹立着油头粉面的毛泽东，对联为“巍巍青山历史丰碑，彤彤红日民族正气”，横批是“伟大领袖”。

“妖魔和上帝怎么能够混在一起？”孙医生不禁对张医生的信仰提出质疑，后者回答说没有多想。孙医生立即起身告辞，到村里另一个小学教师家去歇脚。

张医生送客毕，有点尴尬地望着我们，问信主吗？我们沉默。这个赤脚医生出身的信主的妇女打了个哈欠，把蒋老师带入四面透风的 2 楼；我在底层打滚多年，眼光

四下一溜，就坚持就地睡沙发。事后蒋老师说，她一夜被子蒙头，也冻得无法入眠，看来老威不愧江湖油子。

院内无茅坑，夜里我在野地拉了屎。大清早起来又肚疼，只好在张医生的指点下，钻进土路旁一个半人高的洞。我下准脚，闭目咬牙蹲坑，感觉置身于一个密封的大粪罐筒。突然吱呀一声，我受惊睁眼，却是一个狗嘴伸进了门缝。慌乱之中，我也变成一条狗，汪地窜了出去。就在这眨眼间，大小四条狗已挤入，愤怒地抢吃新鲜大便。

7 点多钟重新上路，蒋老师觉得她的车技高超了不少。在山顶绕行时，路过“麻风病人”张志恩所在的大平地，我虽是个泛神论者，却在内心为他们做了专一的祷告。9 点过钟回到团街，我们与蒋老师告别，目送着她风尘仆仆地驾车返回。

本想吃碗热面，可从禄劝县城发来的长途中巴已吱地刹到脚边。我和孙医生立即登车而行，并相视一笑，庆幸此行的运气不坏。

土改受害者张应荣

采访缘起

2005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8 点过钟，我和已习惯走村串乡的孙医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镇团街登上了从禄劝县至则黑乡的长途中巴。薄雾渐渐散尽，窗外葱葱郁郁，令人的精神为之一爽。车内还有一小半的座位空着，我和孙医生由于坐得宽敞，所以都袖着手，笑嘻嘻地聊了一会天。腹内饥焰熊熊，我们就分享了好几块准备捐献给山区的软糖，觉得味道很美。我不禁联想到昨天饭桌上的生剁猪肝，感到还是该尝尝鲜，理由是既然曾生吃过鱼和牛羊，那猪也不在话下，况且那猪肝里还拌了杀菌的姜蒜与酒。孙医生闻言，笑脸顿时沉下来。说你们这些作家啊，如此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搞不好那天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死掉都不知道。我说路倒路埋很惬意嘛。他说人不能这么对自己不负责任。我在彝族地区跑了几年，发现寄生虫引起的发病率极高，并且很难治。乡下猪圈臭烘烘的，猪们吃喝拉撒都全在里面，这样长出来的所谓生态肉肯定也含有多种寄生虫，人一旦生吃，寄生虫就找到了扩大繁殖的温床。有的彝族，经常头疼，明明是脑子里已爬满寄生虫了，还自以为是喝酒喝的。

我理屈词穷，只得点头称是。孙医生又说，在乡下最好吃素，荤以牛羊鱼肉为佳；可遗憾的是，彝汉民族都以养猪为主，所以他不得已用餐沾肉后，都要啃个生萝卜化解。我立即检讨道，我就是吃猪肉长大的，一天不吃就无精打采，这都是小时候饿饭，或一个月只配给半斤肉的毛时代造成的后遗症，今后一定痛改前非，从少吃不吃到改吃其它肉。

孙医生笑了，连说没这么严重。如此说说笑笑，路和风景就被抛在后面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这儿分布很密，大约都是乡下人自筹自办，所以外观看上去比较简陋，只是把土墙刷了一层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红十字却不断耸立在所有的屋顶之上，清山绿水之中，给人一种已改朝换代的错觉。

9 点 41 分车抵撒营盘镇，便减速拐弯入客运站内停靠。司机宣布休息半小时，于是多数旅客下车上站内的收费厕所，然后站在院坝里东张西望。我和孙医生小便罢，逃跑似的窜到大街边透气，不料又迎头撞上一辆客车；避闪之间，但见三架马拉砖车狂奔而至，车夫敞胸露怀，挺立车头啪啪舞鞭，激起阵阵烟尘——回想一下，我可能十几年没见过如此蔑视交通法规的马戏表演了。

在昏日头下，小镇像个浑身打满补丁的邋遢婆娘，街道短而阔，两旁的房屋矮而挤，污泥浊水四处明目张胆，纸片及塑料袋随风起落。孙医生说，撒营盘是老区了，旧社会就管撒老乌、则黑等好多个乡。

我们在车站大门旁的小吃店要了两碗猪肉臊子米线，孙医生先头拒绝，后来经不住诱惑，还是连汤带水都下肚了。因为前后左右都没啥看头，我们 10 点过就回到车里，公厕的臭味时浓时淡，我一看到时间了，就叫为啥还不开车？售票员置若罔闻。拖至 10 点 20 分，车里又涌进一拨彝族农民，满了，又有人吼道。司机趾高气扬地从靠背上回头望一望，才不紧不慢地缩回去，发动机卡卡响了。

出了撒营盘没多远，就碰上修路，车速顿减。我原本在打盹，却突然被抛起，脑袋撞顶，又咚的反弹回来。我哎哟一下张目，见满车旅客都在前倾后仰，犹如置身激流之上的气垫船。孙医生在旁边摇摆着下巴说，老威你好福气啊，这种路上也睡得着。

我嗯了一声，探头出窗——一边峭壁一边悬崖，之间才是肚肠一般的曲折山路。一堆筑路民工正各持器械，把横七竖八的条石撬到边儿上，给我们腾出前面的道。我吐了吐舌头，满腹疑惑地对孙医生说，怎么这路修得跟水渠似的？后者回答，避免翻车嘛。这条路出过不少车祸，前不久才有一辆中巴，拐急弯没刹住，就直接冲下悬崖，连岩石也没挡得住。那车打了几十个滚儿，落到两千米以下的河沟里，完全扁成一只烂饺子了。我问死人数量，孙医生说有近 20 人。

我联想起饺子馅儿一般糊涂的人肉酱，肚内一阵翻江倒海，可有什么办法，人类还是要继续前进。这不，刚过去这一段，又连续三四个急弯，我们像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风中芦苇，大起大落，大摇大摆。兀地从山嘴又冒出一辆货车，我方只得在三四米外站住，而后轰轰撤退约 20 米，方擦着靠崖的堡坎停下来，让对方鸣笛而过。

地势越来越高，峰峦犹如一伙患了牛皮癣的秃头巨人，在忽明忽暗的云层中沉浮着；太阳偶尔露一面，但很矮，几乎就与人的眉毛平行。此时，我看见了顶端平展的轿子雪山，它在深不可测的天幕的拂动下，微微起伏；随着车的绕行，它也像一块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人脖子之外远远地绕行。

隐隐约约，我还在轿子山脉的某一处皱褶里，发现了一颗米粒大的红点。孙医生说，那红点是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我叹息道，连那么高那么缺氧的地方也信主了。孙医生却说，那不是轿子雪山，而是旁边的凳子山，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两座山就重叠了。当然，那里的彝族村都信主。也都经历过土改。

下坡了，由于条石长堤在两边无限延伸，所以我觉得中间的狭路似水流淌，似光阴流逝。下午 2 点 21 分，车抵达则黑，这是一个与撒营盘类似的山区小镇，区别只是比

前者更小更旧，街两旁低矮房屋的颜色更暗淡。旅客们瞬间就作鸟兽散，我也跟随提着两包行李的孙医生走在空荡荡的街中心。

除了停息在街边的几辆货车与拖拉机，再没什么现代化气息。马和骡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粪，居民们从屋檐下打量着两个外来人。空气寂静，一旦驻脚，恐怕能听到苍蝇的嗡嗡或骡子尾巴的煽动。

从正街拐往一个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则黑乡最高的建筑物——5 层楼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蓝天下的大红十字架比稍远一些的政府部门的五星红旗醒目许多。

基督教堂底层有两三间铺面，孙医生拾阶而上，进了其中一家“康民药店”。接待者是个中年汉子，他为我们泡茶，并说昨天就接到孙医生的电话，教会的张长老已做了安排。客随主便，我们先去街上寻了两碗羊肉米线吃了，再回来等候。孙医生在背阴的药店里喝茶，我却提一只小凳，蹲坐在“三春饲料经营处”的短墙外晒太阳。脚底是一溜斜坡，两边的污水沟蜿蜒着，顺坡而下，将房屋的石头基脚侵蚀得墨黑。我极目望远，见山丘朦胧，成片的瓦顶光斑闪烁，可塑料垃圾仍然颤动着，飘飞着，成为中国所有乡村风景中不可缺少的点缀。

孙医生又进饲料经营处打了电话，转瞬间，一个黑脸汉子骑着摩托，威风凛凛而至。我们由他带路，贴着土墙，从斜刺里穿过去，在拐弯后又上了一个坡，就来到上村。

依着地势，如飘带蔓延的则黑乡由上中下 3 个村组成，中村为机关与店铺集中的商业活动区，上下村则镶嵌在田野之中。我们在红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几分钟，路过若干农家院落和一堵年代久远的斑驳红墙，上面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标语，据说还是红军时代的。

过完红墙，我们进了一个敞开的院落，然后上了又高又陡的石阶，一对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门里露面，他们就是我此行的拜访对象之一，则黑乡基督教会最德高望重的长老张应荣牧师及老伴李桂芝。

我随孙医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并应邀进屋在冷却的火塘旁坐下。爪子一般毛绒绒的阳光探入门槛，我环视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间，掏出录音机，谈话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3 点 30 分正式开始了。

老威：随着时光的流逝，老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比如 90 多岁的袁相忱牧师，前年我在北京拜访他时，其身体和头脑的反应都很敏捷，可今年我听说，他就已经不在了。

张应荣：我也 84 岁了。

老威：所以我想听听你无所顾忌地讲讲自己的经历，同时留下一个见证。

张应荣：嘿嘿。我嘛，1922 年生，具体的生日晓不得。因为我 5 岁死了妈妈，爸爸作为中国内地会的长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儿子是哪一天生。我读过 3

年小学，从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 16 岁那年，有两个外国牧师来到禄劝县撒老乌传道，我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圣经会，又和许多人一起参加了三个礼拜的圣经班，才受了感动，在圣灵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决定将此生奉献。接着，由撒老乌教会推荐，我去武定县滔谷乡入六族灵会（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汉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级圣经班），苦学了 3 个年头。

老威：来则黑的途中，我们曾路过撒老乌。隔着一大片沟壑，我们望见山脚下的两块白色屋顶，在周围土屋构成的村落中显得格外醒目。孙医生指着窗外说，那就是由两个西方人创办的西南神学院，大半个世纪前，他们病死并埋骨于此，至今还留有残碑。

张应荣：他们是夫妇，一个是澳大利亚人，那时 50 多岁，中文名字叫张尔昌；师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记不住名字了。西南神学院的创办人还有英国的郑开元牧师，他原来在四川那边办学，抗日战争开始，就来到云南这边的禄丰，联合筹办了西南神学院。半学期后，校址由禄丰迁到撒老乌。自六族灵会毕业不久，我又成为神学院的首期学生，在此修完了 3 年正规学业，假期中还跟传道人四处跑，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出校门后就任专职传道人打下了基础。

老威：当时坐汽车吗？

张应荣：这儿是各个民族杂居之地，在全中国范围内都算偏远落后，修公路搞开发也就近些年的事。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骡子，还有人腿，驮着东西，从昆明走拢则黑要一二十天，再往里去，过一条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凉山了。

本来经过祷告，我已决定自己的奉献方向就在云南境内，可在我即将毕业之际，神学院接到一位传教士从四川昭觉县发来的求援信。对方是医生，来自英国伦敦，正在当地筹办医院。由于大凉山是彝族腹地，语言和风俗又不同于汉族，因此仅仅懂一点汉话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于是神学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毕业生去昭觉，在医院服务 10 个月，当翻译，还教英国医生彝语。完成任务回到云南这边时，已经是 1950 年圣诞节了。

老威：此时全国已解放，你还能继续传福音？

张应荣：1949 年圣诞节前后，云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凉山直到 1950 年春天还在国民党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谁统治，福音肯定要传的。 1951 年开头，共产党忙着更换基层政权，还没功夫操心宗教的事；接着是清匪反霸，再接着是土地改革，我也满 30 岁了。

老威：还没成家？

张应荣：我 30 岁才定亲、结婚，跟着，家里就被划为地主。

老威：你家在当地算大户？

张应荣：我家 5 哥弟，两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当过乡长，但家里的财产和土地却很少。我本人更穷了，在土地改革以前，都一直在神学院住着。

老威：那么划你地主的依据是什么？

张应荣：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们又是子承父业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 年云南都解放了，我还被神学院派到国民党统治的四川彝区，除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到底还干了什么？历史不清；第三，我大哥当过伪乡长，株连了整个家庭。

老威：请讲一下你所经历的土改。

张应荣：清匪反霸期间我还住在西南神学院，阶级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则黑，和几十个乡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关押在则黑小学内。群众大会开了若干回，重点是没收土地财产，以及罚款。在没有对地主和富农动武之前，一些人还在夜半三更偷偷埋点吃的穿的，打算避过风头再挖出来。可没想到运动越来越激烈，群众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会被搜到，哪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讲究个诚实，罚款，没钱；财产，没有。他们搜来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几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丢在神学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钱吧？

张应荣：就一床铺盖，连被面也没有。他们气坏了，连骂我不老实，天下哪有这么穷的地主？开过斗争会，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着大棍子在旁边盯着，瞌睡了要挨打，伸懒腰要挨打，就是动一动膝盖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里吗？

张应荣：在露天。膝下铺着敲碎的砖头、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里还一个接一个的闷雷，震得房梁与瓦片嘎嘎的抖。雨浇在身上，开始还冷，过后就麻木了，因为水已经淹没了我的大腿根。膝盖和头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凼凼都染透了。我嘴里反复念叨着：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过来，也算神迹了。

张应荣：当时，雨里跪了一大片，几十个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贫下中农逼着，各交代各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是 1949 年至 1950 年在四川境内，受神学院指派，与外国人接触过，与解放军接触过，与国民党军队也接触过，到底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这些国民党军官，有的被捕了，劳改了；有的从昭觉县去了西昌，去了台湾——自土改到 1979 年邓小平出山，政府来人宣布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写了几百份《坦白书》，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历史问题”。

李桂芝插话：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乌的家里，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带信来，说你家那个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则黑赶。天不见亮，一路稀泥巴，

我披一件蓑衣，怀里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紧赶慢赶，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时到了则黑。看见他跪在雨里面，样子像个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认不出，不是认不出，是魂还没回到肉壳内。我喊了他几声，他总算嗯了一声，我摸出洋芋喂他，民兵就吆喝着，一棒敲过来。洋芋掉进水里。可怜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东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乌离则黑有多远？

李桂芝：90 里，我连夜打来回，要走 180 里。

老威：我们从撒营盘坐车过来，好像走了三、四个小时。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当时我们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狱里探了一趟，啥忙也帮不上，只好边哭边往回赶。拢家时，脚都走瘸了。房子周围有贫下中农监视着，我一天到晚躲在屋里，再不敢出门。

老威：后来呢？

李桂芝：运动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来的？

李桂芝：一点一点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没睡着，鸡叫最后一遍了，天也蒙蒙亮了，我恍惚感觉到房外有哎哟哎哟的呻唤，就起身去看。一打开门，却见脚下有个浑身磨得稀烂的东西在伸手扯我的裤腿。我赶紧弯腰相认，可怜啊，蒙神的照看，一个快被整散架的仆人才能爬 90 里山路回家。他已经动弹不了，最后连呻唤的劲儿也没有了。我把他抱进屋，在他身子下垫了一张羊皮，羊皮下又垫了一堆草。就这样缓了一会儿，民兵又来押他去开则黑全乡的土改大会。他动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骂装死狗也没用，他就躺在台子下面挨斗，还不准闭眼睛。

张应荣：四周有三四千人，围得跟铁桶似的；我的身体却如一块生铁，哪个部位都不能动，扭脖子也要出一头虚汗。那天被公审的有十几个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绑，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边，弯腰 90 度，还有两个民兵将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这叫“坐喷气式飞机”。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了，耳边还能隐约感觉到小河的水淌。太阳从渐渐散开的乌云中露出脸，天太蓝了，怎么会有这么蓝的天呢？而在太阳和蓝天之下，人们彼此仇恨，被划为贫下中农的大多数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脚底。难道这就是“解放”？难道在“解放”以前，人们没有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村子里，蒙上帝的恩宠，和谐地生存了许多年？

“阶级敌人”已经被打变形，每张人脸都是肿的，脑袋被石块、棍棒揍得坑坑洼洼，口水和粪便在上面干了，起壳了。但是还不够，还要判刑，枪毙人。就在这次会上，撒营盘和则黑的区长、乡长、大住基（彝语，意为大地主）都叫枪毙了；他们的儿子

也判了十几二十年的刑，有的疯了，有的出狱没几天就死了。

我与政治没啥关系，也说不上“剥削”了谁，因此苟活了下来。可从此落下了风湿病根，终身残疾。

老威：你没判刑吧？

张应荣：当时没判刑，只是作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更不准传福音。但是到了 1958 年，形势一紧张，我就去劳改了。

老威：是正式投入劳改吗？

张应荣：1958 年秋天，公社在撒老乌修水坝，我们 3 个地富分子被押去挖泥巴，跟着又编入四类分子学习队，在禄劝县的角家营和胶山一带烧了 10 个月的碳。

老威：学习队有多少人？

张应荣：二百五、六十人，才劳动了 1 个多月，就有 50 多人病倒。

老威：劳动强度太大了？

张应荣：主要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开始紧张，吃不饱。一天才三两米的定量，熬成稀米汤大家喝，如此，肚子虽然鼓鼓，可一干重活人就全瘪。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脚上还长了个大疮，开头还硬撑着，可有一天出公差，从早晨走到下午，实在挪不动了，就停下来想歇脚，却被押解的民兵抽了一棍子。脚上的浓疮哗地绽开了，我痛得虚脱，就倒在地上，无论怎样挣扎都起不来。我感觉要死在这路上了，就在心里祷告：主啊，我不行了，只能这样去见您了。不料过了一会儿，他们居然扶我起来，还命令其他人替我背行李。晚上，也破例没开我的斗争会。第二天休息，第三天递给我一把斧头，仍叫我上山砍柴去。

那是 1959 年的夏天，已开始大面积地饿死人了。在胶山真金万的时候，同我住一起的四类分子就饿死了 3 个。啥都吃光了，树皮、树叶、草，畜生能咽的东西人也咽，畜生不咽的东西人也咽，所以不少人中毒而死。我看见的 3 具尸体都是光溜溜的，衣裳和裤子扒掉了，嘴皮萎缩，牙齿如锄头伸出来，好像随时准备着去阴间挖吃食。他们都吆喝了半夜，后来就不吭气了，大家还以为睡过去了，第二天吹哨子也不起，一揭铺盖，人已是硬的。

民兵监督我们把坑挖深些，免得饿疯了的人再去掏。光溜溜地去吧，反正那年头，大家都看惯了。

李桂芝插话：他被弄走不久，我们 3 个月大的女儿腰就塌掉了，整日啼哭，拖到 1 岁零 17 天就死了。还没缓过气，我的堂兄又悄悄带信回来，你家里那人也快饿死了。这怎么得了，他万一死掉，我也活不成。哭了一晚上，天不见亮就去守在队长家门口，等到人家起床了，才进门跪在地上。恳求半饷，队长终于答

应借给我 10 斤燕麦、5 斤粮票和 3 元车钱。因为听说学习队不准单独开伙，我就将燕麦炒熟，磨成面，然后搭车去撒营盘，再转车。

拢了学习队，见那儿已饿死不少人，遍山遍野都是新坟包包。那些坟包起得很浅，可能是人们已没力气往上压石头。树也砍得差不多了，但是碳窑还开着，几个活着的刚才还站在窑门口，可一眨眼，他们就坐下了，再一眨眼，就横着竖着躺倒了。

房子里找不着他，我就抓一小把燕麦面给一个人，让他带我去寻。沿着山沟绕了一会儿，看见他蜷在一堆烂草里，进出只有半口气了。我蹲下去喊了几声，他才抬一下眼皮，那眼神又聚了半天，才认出我，两颗泪珠子啪地掉出来。

他吞完 2 两燕麦面，人就有力气站直了。跟着，趁没人时，他把救命粮和粮票都藏了，答应我一定度过难关，平安回家来。感谢主，59 年秋天学习队解散了，他到底还是回家了，虽然已是个瘫子。

老威：他瘫到什么程度了？

李桂芝：他的风湿病一阵阵发作，两三个月之后就躺着动不了。既然动不了，不出工，粮食定量就要减半，别人一天 1 斤 2 两，他就只有 6 两。

老威：这时公共食堂还在办吗？

李桂芝：大跃进之后，公共食堂办了两三年，不过，我们地富分子不能进去，打饭在外面，通过贫下中农的手，6 两就变成 5 两了。他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重，身上的疮烂得也快，最后打来的饭都吃不下了。我很着急，又去恳求队长，再借一点大麦面救救人命吧？队长犹豫了一会儿，因为大麦是细粮，他做不了主，就去与队上其他干部商量。结果还是从仓库里称了 10 斤大麦面给我。

我每天熬一小碗加了野菜的大麦糊糊，一口一口喂他；接着，我又找队长借了 8 斤荞麦面。这时，四川那边来了个草医，仔细察看了他的病情，就开出一幅药方，让我抓齐草药后，用药炖鸡给他吃。我发了两夜的呆，在队里想不到办法，只好走几十里路回娘家，费尽力气弄了一只小鸡娃。回来马上炖了，连汤带药带渣都叫他咽了，第二天就有了些起色。

草医说的，人没有一点油荤，药也起不了作用。可那个年月，公共食堂都好久不冒烟了，我的身上也有些浮肿，因为要在每天的口粮中扣一半，还从队上借的细粮，我几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可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死活绑在一块了，抹下脸皮，我到处去讨。有一个人在食品公司工作，心肠比较好，听了我的哭诉，就给了我 5 斤粮票。当时凭着这食品公司的粮票，能买到每碗带两小片猪肉的饭。这太贵重了，如果现在碰见这个恩人，我把房子给他都愿意。

我把这肉片让他吃了，他又有点起色。这时，村里有个懂医的汉族老大爹出了个主意，叫我在屋后挖一个半人深一人长的坑，第一天，在坑里填满桑叶，然后用树干将他架在上面，点燃了，以暗火冲出的桑烟熏烤身体，从太阳露头直到太阳落山，湿毒才透出表皮；第二天，又换松针填坑，再依法炮制。这个土办法还真见效，不久，他的手脚就能慢慢活动，也能下床了。不过还是体虚，最多站分把钟，汗水就牵着线从鼻尖往下淌。

感谢主，又有好心人送了一瓶那年头十分稀罕的云南白药，他服了头一次，

汗就止住了；全部服完后，虽然还是干不了重活，可命总算保住了。

张应荣：这次从鬼门关回来，我看开了许多事。反正都是政治运动员，就随喊随到，斗争会上也不用你来按脑袋，我先就埋下去了。四清、社教，一般的政治运动还以文斗为主，风头一过就罢了，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你看看我的嘴，只有一颗牙齿，这不是自然脱落，而是被造反派打掉的。一次斗争会打去两三颗，开四五次会，嘴里就空荡荡了。

老威：文革结束后呢？

张应荣：四人帮粉碎时，依然不准信宗教；稍后，民间经历了基督教的自然复苏时期，但在 1982 年以前，谁也不敢公开信主。私下聚会被群众检举，队上就要开大会批斗我们，拳打脚踢。前两年，这儿又经历了十字架发光运动，一个村一个乡，成片地信主；而几十年前那么多人信的共产党，现在已没人信了；甚至那些党里的人，也来教堂做礼拜，忏悔自己的罪，还捐款修教堂。

老威：请从头至尾，讲更详细一些。

张应荣：被关被打被吊的次数多了，记忆就有点模糊了。总之，1952 年土地改革，我才 30 岁，就因为信主，被划成地主，跟着受了几十年难以想象的逼迫。每一次陷入绝境，我都以为不行了，却在暗中得到神的保守，居然多活了 50 几年。这好比《圣经》上写的：“神因西西加的苦难而增添他 15 年的寿数。”

老威：感谢主给了你一个好妻子。

张应荣：她嫁给我时，才 17 岁，人漂亮，又出生贫农，按条件，很多好的男人可以任她挑拣。当时我和哥哥去她们乡里传福音，有人来说媒，我就曾推托过。但她主意已定，并且说得到了神的允许。果然，主经过她的手，将大爱赐于我，她却因我受了几十年的拖累。而现在，我的身子骨还算硬朗，她却生了 7 年的病，风湿加上妇科，手臂一抬就疼，好像已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她的思想很苦闷。我就说，不必苦闷，这是神的旨意，对于我们，神是知肉知灵的神，在我们没有抵达人生的终点，得见他的真面之前，他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熬炼清楚。否则，我们如何能赎清原罪，做到纯洁坦然呢？

老威：讲得很好啊。

张应荣：虽然我太渺小，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却从神的大爱中得到了安慰。

我的一生翻过 4 次生死的大坎。第一次是 8 岁，我在半山腰放羊，不知不觉睡着了。那是秋天，阳光非常温暖，可一觉醒来，却起了风，一大团乌云将太阳吃了，羊也走散了。我害怕父亲责怪我，就呜呜哭起来，还用手背横着擦眼泪。我不晓得两头狼就蹲在背后，等着猎物回头，好咬断我的脖子。太险了，后来有人发现，那狼嘴几乎抵着我的颈子了，可我还在越哭越伤心，弄得狼们也一头雾

水，迟迟疑疑，不敢轻易来扑。

老威：这有点神话色彩了。

张应荣：狼很凶残，疑心也很重。我哭了那么长时间，显然超出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父亲终于赶来了，老远望见他儿子的背上耸着两头狼，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懂得狼的习性，就停步，把双手圈成喇叭筒，拖着长声吆喝，跟着，牧羊狗也狂叫起来。狼立马起身，还不甘心地与父亲对视了半分钟，才转身逃跑。父亲气喘吁吁地冲上坡，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连说好险好险。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羊也一只不拉地跑回家了。大家都说，没有神的照看，这娃娃不可能毫毛无伤地坐在这儿。所以这事儿传开后，不少人信了主。

第二次是我 17 岁的当口，一家人都出痧子（天花），那年头，这弄不好要死人。我不晓得厉害，仍跑到外乡去。直到在返回的路上，突然觉得浑身发闷，好像许多豆芽从毛孔往外窜，刹那间，天旋地转，脸憋得通红，刚巧不远处有条沟，我就挣扎着爬过去，把嘴直接戳进水里喝，后来，又在兜里翻了些砂糖，一捧一捧兑着喝。麻痘痘就像虫虫这一堆那一堆，我一会儿昏一会儿醒，从太阳当空折腾到太阳快落山，才被一条狗发现，一叫，才唤来几个人，把我抬到附近村子一个草医家。又过一晚上，好歹捡了一条命。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狗就不会来，我也就呛死在沟里了。第二天，我父亲赶来，将我接回家去。后来他说，我儿子大难不死，是神挑拣他，将以使命赋予他。

第三次就是土改，我跪在水凼凼里三天三夜，风湿都侵进心肺了，还被抬去开大会，陪杀场；第四次则是 1958 年被抓进学习队，又饿又累，风湿大发作。

没有她我早就死了，而目前，她的病越来越严重，我也风烛残年，不能分担她的痛——这可能是翻人生最后一道坎了。

补记

残阳如血，3 个多小时的访问结束了。由于被张长老的经历和气节所感召，还没有信主的我，也在出门前与这个四世同堂的基督教家庭一道，虔心作了祷告。接着，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赶来，接张长老和客人去下面吃晚饭。我们伴着老人慢慢地走，沿途赶牛和赶骡马的村民都语气崇敬地招呼老人，并纷纷让路；在斑驳红墙边，老人说，这就是则黑首户杨心林的院子，从旧社会一直留到现在，可他的后代却早不住在里面了。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 3 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上）

采访缘起

告别则黑乡基督教会的张长老之际，我习惯性地瞟了一眼壁上的挂钟，已经 2005 年 12 月 30 日傍晚 7 点 40 分了。我顺便问起本地曾经最显赫的家族如今怎样？张长老说，杨区长的遗孀还在，我指一条路，你自己去找她了解吧。
天黑尽了，我们由一位当地妇女领路，在土墙组成的村子里摸索前行。地下沟渠蜿蜒，散发着阵阵人畜粪便混合的臭味，好几次，我们都犹如山羊，在沟与沟之间连续跳跃；接着又绕过大小三道生活垃圾屏障，扁着身体穿过两道墙中间的仄道，终于豁然开朗。我弯腰摘除粘在运动鞋底的塑料袋，再抬头，就感到清风扑面了。远处，重重叠叠的乌云下面，黑黝黝的山丘动荡着，好似大群被栅栏圈定的巨兽，随时都可能咆哮着越栅而逃；稍近一些，则是开阔地和肠子一般盘桓其上的小河；冥空里的树影发出若有若无的低啸，如迷失在阴阳界找不到归宿的冤魂的歌谣。领路妇女转头说，那块向阳的坡地过去是操场，解放军初次进则黑，就在那儿训练民兵，教他们打枪、拼刺刀；后来又在那儿开土改大会，枪毙地主。

我刚要问什么，狗就叫了，跟着，全村的狗都此起彼伏地叫成一片。领路妇女推开一扇矮栅栏，用当地土话骂狗和唤人，然后进了短墙围绕的大院。

我还没看清院内的情景，就被好客的主人们迎上石阶，让进堂屋。领路妇女给我们作了简单介绍，正中坐沙发的老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她驼着背，年轮密布的脸上透出笑来。我和孙医生急忙扶住——她就是本文的主角，84 岁的地主遗孀张美芝。隔着火盆与其相对的，是她的四女儿杨思仙，今年 59 岁；五儿子杨思义，今年 57 岁。

气氛融洽之后，我顺势掏出老录音机。这是 8 点零 8 分，门外的风突然停了，月白如洗；而在门内的昏黄灯光下，在一家几口不间断的抽泣中，尘封已久的回忆裂开一条缝……

老威：今天下午我拜访基督教会的张长老，路过你家的院子上头，觉得一长溜青瓦之下，那面桔黄色的斑驳旧墙很特别，比周围所有的农家大院都气派。我在墙前照了像，还问过张长老，是否可以见一见这户主人？张长老说，这是当地最大家族的宅子，可目前只剩一个外壳，住不了人，就弄成牛圈了。我追问人呢？张长老说，几十年前就搬出去了……

张美芝：土改那年，我们就叫撵出来，挤在旁边的牛圈里；而贫下中农翻身了，成了我们院里的新主人。

老威：请讲讲当时的情景，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张美芝：记录？

老威：是啊，目前距离 1952 年的土地改革已相当久远，50 岁上下的人，有所耳闻，但记忆早模糊了；而 40 岁上下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恐怕只能从小说、电影、官方教科书里去了解；再往后的人，连了解的兴趣也没有。

张美芝：是啰，陈年老帐了，谁也不耐烦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

老威：我是个写书的，不愿意你们这代人如此被淡忘掉。

张美芝：说不清啰，我 26 岁就撞上土改，今年已经 84 岁啰。又哮喘，胃又疼了好久。

老威：奶奶你莫着急。

张美芝：着急也没用啰，感谢主，我还活着。我不会埋怨谁，更不敢埋怨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形势，我们普通人是无法阻挡的。在这地方上，我们家世代为官，为老百姓断案时，虽然尽了力，也不能说就没犯过错。除了全能的上帝，连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也不敢打保票说，自己没错误。所以，我们家被划成地主是应该的，贫下中农开大会斗争我们也不过分，过去几十年了，不给地主平反也算了，全能的上帝心里有数。我们家现在还过得去，又有读大学的，又有做官的，胜过好多贫下中农家庭。

老威：奶奶你满足了？

张美芝：我总有一口气咽不下去，我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浑身抽筋。我们家作了什么孽，要被杀掉那么多人？我的丈夫杨心林，原来是这儿的区长，我的哥哥张应心，是乡长，在土改大会上一起被枪毙，两具死尸抬回来，连舌头也叫人割掉了，凭啥就这么惨？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们家原来有多少口人？

张美芝：算不清啰。往上说吧，我家外祖生有两个儿子，由于两兄弟非常要好，没有分家，就把彼此的儿女都视为己出。老大育有 3 个儿子，老二育有两个儿子，照统一排行，这一辈的老大就是杨县长，他可是多少年以来，则黑这偏远地方出的大人物。他早年外出求学，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共产党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是校友。25 岁即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举荐，去云南德钦县任县长。

老威：藏族地区的彝族县长？

张美芝：是啰。那时的德钦还叫安东，吏治不清，盗匪横行，龙云就特别举荐志向高远的大哥去解决难题。果然大半年后，那地方就清净了——杨县长因此名声大振，还受过政府的嘉奖。大哥是解放前夕病死的，他幸好病死了，否则也难逃劫难。

老威：为什么？

张美芝：大哥做人的宗旨就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讲武堂读书时，曾经因为被洋教官谩骂成“东亚病夫”而拍案而起，并公开与洋教官比武获胜，结果却让龙云绑了。但是，他的民族气节在同学中影响很大。

老威：共产党也打“民族气节”的牌。

张美芝：可大哥他既然信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不会再改换门庭，去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我二哥是撒营盘（解放前叫永山区）保安大队长；脾气也和大哥一样。老三就是我的丈夫杨心林，当时是永山区区长；四弟和五弟没啥作为，就是个不愁吃喝的普通人罢了。

另外，我娘家也不算差，哥哥张应心，做过则黑（解放前叫永安）乡乡长。

张美芝的四女儿杨思仙插话：

我看过小说《苦菜花》，我们家真是比苦菜花还苦！土改那年我才 5 岁，本来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娃，但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爸爸和舅舅，呜呜……

老威：怎么失去的？

杨思仙：呜呜，1952 年头上，爸爸和舅舅就叫民兵五花大绑带走，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起，关在则黑小学内，以后又升级，关进了乡公所。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当时妈妈也叫抓走了，19 岁的大哥因为害怕，就跑进山里躲起来，家里就剩两三个娃娃，连自己都顾不过来，那敢探监？直到开大会那天……

老威：你们也去了？

杨思仙：我们躲在牛圈里，门窗紧闭着，饿了两三天。大白天根本不敢出门，因为一碰上贫下中农的娃娃，不仅讨不到吃，还要遭围攻。只有夜里才从门缝钻出去，像老鼠一般在野地里窜来窜去，见啥捞啥，能进嘴就行。那一整夜，我们都不敢出去，因为民兵轮换着巡逻，一见影子就开枪打。我们抱在一块，滚在烂草里，迷迷糊糊觉得天透亮了，墙外响起许多脚步声，并且一直不停。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脚步声过完。估计一两个钟头吧，墙外才清净了，好像那些人都到河边的操场开会了。从门缝朝外瞅，还有民兵端着枪来来回回走动，一个人嘴里还叼了根烟，我听见他们在议论：“今天要敲七八个脑壳。”

有个人不信，说敲不了那么多；另一个人反驳：“只有多，没有少。”两人就开始争起来，面红耳赤。直到民兵排长过来制止，并且说：“过一阵响枪就见分晓，你们两个猪脑壳打个赌啰。”于是两人就打赌，输家割 2 斤肉来办招待。

老威：杀人还打赌吃肉？真跟过节差不多。

杨思仙：旧社会，除了过年，乡下难得有啥大事，解放了，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就月月有大事。特别是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分地分财产，就天天有热闹。那天上午，我们在两里之外都听见喊口号，排山倒海似的，一阵接一阵。快散会了，妈妈被放了回来，披头散发，浑身都在流血。我们扑上去叫妈妈妈妈，她才慢慢坐下，魂不守舍地抚摸孩子们的头，问饿不饿。又说要去村里给我们讨吃的。过了大约十几分钟，门口嘈杂起来，我们还来不及紧张，有人就轰轰擂门。妈妈刚挣扎起身，门就一下子倒下来，我们看见刺目的光亮中横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爸爸和舅舅就这样被人抬回家了。

张美芝：我被关起来很多天，受尽了折磨，那天开公审大会，枪毙了七八个人，其中有我的丈夫和哥哥。我一早就与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被民兵五花大绑了，押去批斗，并且陪杀场。在离会场不远的河边，被宣判死刑的阶级敌人后颈窝插了黑牌，五花大绑后，大腿也叫麻绳给缠了，嘴里塞了一团烂布。我在两米外，眼睁睁地看见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民兵们按跪下去，拔掉黑牌，用步枪嘴抵着胸口，砰砰两响。我哥个头大，晃了几下还没倒，后面的预备枪手接着上来，抵着那已被打烂的胸口补枪。血砰的又窜起很高，有一支血箭叭的喷向枪手的肩头,吓得他一闪,就顺势一脚,把我哥踹翻。他一边擦血一边骂娘，还迈步上前，踩着在地下挣扎的我哥再补枪。咽气时，我哥就横躺在我丈夫身上，他的手向天空抓了一把，就鞭子一样软了，脑袋也滚到左边，刚好与我丈夫的脑袋碰到一处。血骨碌碌地冒着，在阳光下显得很亮，两个亲人像在说悄悄话。我被两个民兵架着，头发也被揪着，这样就没法低头，可他们是我的亲人呀，再没法低头，我也不忍心看下去，好多次，我闭上眼睛，但人家骂我，把我的眼皮撕开，我的眼珠子都叫弄出血了。泪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满脑袋全是包块，伤口淌出的浓血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一直想自己站起来，因为被人家架着太难受，而且形象不好，挺丢脸，我好歹也算个贵妇人呀。在大难之际，也应该保持起码的气节。可是，我无论如何站不了，脚尖一试再试，腿肚子就是抽筋。唉，丢脸也是没办法呀！

最后，我突然看见，两个民兵举起枪，用枪嘴捣我两个亲人的门牙，还拿刺刀使劲撬。我毕竟经历过一些事儿，我晓得他们要干什么，顿时天旋地转。我猛然狠咬自己的舌头，我想喊："把我的舌头拿去！别再折磨死人了！"可是，脑袋轰隆一声，就啥也不晓得了。

老威：他们是当众割死者的舌头吗？

张美芝：是啰。

老威：群众有什么反应？

张美芝：大概有几千人从会场那边跟过来，乌压压一片，把周围的庄稼地都踩平了。我恍恍惚惚，只听见大家都在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某某某死有余辜！""土地改革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许多小孩向阶级敌人扔

石头、泥巴，挤在路两边用树条条抽坏人。我挨了数不清的打，已不晓得痛了。

唉，这是大形势啊，莫说舌头，就是当众将所有地主千刀万剐，群众也只会鼓掌欢呼。

老威：那主持大会的干部呢？

张美芝：我在台下，只听见宣判死刑的声音，没看见人。

老威：我能看看《判决书》吗？

张美芝：没有《判决书》，那次毙了七八个，劳改了十几个，都没发《判决书》。好像那个时代，不兴发《判决书》。

老威：我曾见过50年代的《判决书》，是用手写的，很潦草。

张美芝：我不晓得。

老威：哪一级法院判的，档案里应该能查到。

张美芝：都是本地工作组判的，我也不晓得是哪一级。

老威：是吗？那割掉的舌头能做什么用呢？

张美芝：当药。

老威：内服还是外用？

张美芝：当跌打损伤药外用。后来听说，我两个亲人的舌头被他们割去，交给了当地的民兵连长。因为那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而这个模范连长在执行抓捕任务时，被狗咬伤了大腿。不晓得是不是报应，那腿伤感染化脓，一两个月都不结疤。人家采了很多草药，捣碎包扎；乡里区里的卫生所、还有民间的郎中都看了治了，就是不见起色。人家急了，就照高人指点，把我亲人的两根舌头阴干，切成片，捻成粉，撒在伤口上。

老威：果真有效吗？

张美芝：按理说应该有特效，可人家用舌粉天天敷，不仅无效，而且还溃烂成了碗口大的一个洞。人家起不来床，呻唤了 20 几天，被十几个民兵护送着，又是担架又是车，辗转一个多星期，抬到武定县城。结果还是抢救无效。死了以后，丧事办得很隆重，乡里开了追悼大会，区政府派人来念悼词，人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思仙插话：

我和弟弟看见死了的爸爸、舅舅，感到非常害怕，因为那已不是平时所熟悉的长辈了。他们血肉模糊，胸口翻开比汤碗还大的洞，特别是那张脸，犹如一块被砸碎的玻璃，

到处都裂着缝。妈妈面无表情，像在梦游一般走过去，抬起破衣袖擦爸爸的脸，又转过头，叫我拿木桶打水。5 岁的我和 3 岁的弟弟用棍子抬了半桶水回来，妈妈一点一点给爸爸和舅舅擦洗，她咳着嗽，一会儿又发呆，还一下一下拉扯他们的嘴皮，好像要让豁开的嘴闭拢，但是已不可能了。因为里面既没舌头也没牙，就一个叫彻底捣碎的圆洞，下巴都快脱下来了。

妈妈给他们洗了大半天，我和弟弟抬了很多次水，饿极了，但不敢出一点声。天慢慢黑了，我们却没有力气把我们的亲人抬进家门。太阳落坡了，风开始大了，鬼哭狼嚎，像些冥空中的爪子，将房上的瓦片翻得夸夸地响。妈妈说，你们进屋吧。她却又在外面站了几分钟，才进来关了门，把我们紧紧搂在怀中。我们挤在烂草堆里，已哭不出，或者已没力气哭了。我在心中叫了无数遍爸爸和舅舅，在我的脑子里，他们永远是慈祥的，总是讲道理，没骂过谁，没动过谁一指头，见着家里的长工也总是笑脸。我不懂啥阶级斗争，也不懂他们为啥非死不可，并且死得这样凄惨。

张美芝：第二天，我悄悄联络娘家的人，用木板板把两个亲人抬上山，草草埋葬了，连个坟包也没敢留。由于慌张，也由于饿得缺力气，坑挖浅了，两个亲人的尸骨当晚就叫野兽刨了，肉全啃光，剩下的白骨拖得东一块西一块。真是造孽啊。我只好收拾残骨，重新埋了一次。

老威：唉，人死如灯灭，惨剧总算结束了吧。

张美芝：远远没有结束，远远没有尽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家族到底死了多少人？我算算——大哥杨县长家，大女婿被枪毙，大女儿在极度绝望之中，先用麻绳勒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服毒自尽；二哥杨大队长家，二哥和两个儿子同时遭镇压；老三杨区长，也就是我们家，死了父亲、舅舅、三儿子、外婆、外公……

老威：都是公开镇压的？

张美芝：孩子他外婆是叫民兵活活打死的，他外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乘值班民兵松懈，用裤带吊死在监狱里。我的三儿子死于 1954 年，民兵在坡上发现了他，就开枪了。我四弟当时才 20 多岁，结婚没几天，由于生性老实，日子也过得平凡。可他也受到家族株连，叫弄去枪毙了，冤啊。

老威：真是人命贱如草啊。

张美芝：应该是人命不如草吧？都长在野外，草和草之间至少平等吧？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下）

插记：

谈话至此，屋里已抽泣成一团，我不得不暂时关掉录音机，悔罪似的低下头。户外狂风大作，似有无数无形的脚，踹得房梁嘎吱嘎吱地摇晃。我曾寻访过无数冤案，自以

为已心如铁石了，不料此刻却心乱如麻——这样追下去的意义何在？大家都是人，都有权利忘掉噩梦，选择轻松一点的活法。

我的耳边再一次响起日本新民谣歌手冈林信康的声音："你就是你，你不能变成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地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能够"注视"已经不错了，又不能一直停在原地。注视以后呢，就走开？或者象我这样，写下来公开出去，给你我他的生活添一点点徒劳的不快，短暂的郁闷？

再以后呢，地球依旧转动，专制依旧进行，人类如虫蚁般生生灭灭，能否改变一丝一毫？上帝在哪儿，当我空想这些问题时，他觉得好笑吗？

最体面的解答是，这个民族需要历史。可国家、民族、政府等东西除了给每个中国人带来数不清的麻烦和灾难，就是虚妄和疯癫。

打住吧，别费这多余的脑筋了。

老威：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话题还得进行下去。其实我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当我爷爷的田地和院落被瓜分掉，人叫抓起来斗争时，我爸爸正在外县教书，他不敢回去，怕人指责阶级立场不稳。后来我在老家了解到，我爷爷婆婆被划成四类分子，几乎天天挨斗，还挂黑牌游乡。有时候，民兵将砖头竖起来，命令我爷爷站上去，这种体罚最多持续几分钟，人的腿肚子就哆嗦，接着就摔倒。一两个钟头，我爷爷要挨几十次摔，直到爬不起来……

张美芝：这不算啥啰，在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杀害之后，他们也把我抓去，连斗 40 个昼夜，天天五花大绑，只有吃饭和解手才松绳子。由于不准回家，我两岁的小女儿吃不上奶水，就活活饿死了。

老威：你有多少儿女？

张美芝：除了没活成的，当时我家共有五儿两女。我小杨区长 19 岁，是续弦，所以我嫁过来那阵儿，前房留下的孩子已成人了。大儿子叫杨思源，19 岁，旧社会就在读武定县初中，一解放，受家庭株连，上不了学，还被人诬陷，说他有歹心，要杀解放军多人。天哪，老大是文弱书生，连枪都不敢摸，还提杀人？但是大形势下，有口难辨，他也只有逃命，躲在山上做了两年野人，1954 年才被捉住，判了 20 年徒刑；我二儿子叫杨思蒲，不满 16 岁，在本地上小学，被贫下中农检举，罪名是"书写反动标语"……

老威：什么反动标语？

张美芝：晓不得啰，检举人是文盲，可也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一说工作组就信。就这样，老二被抓起来判了 7 年刑，服刑期满继续留场，也和老大一样，相当于坐了近 30 年牢。我的三儿子 12 岁就死了，很惨。

剩下的儿女都在本地，就一言难尽了。

（此时，老人抬脸望了望房梁，两滴浊泪粘在眼角，接着又垂下脑袋，连说“不中用了不中用了”，还以那老树根一般的手指狠戳腰眼）

老威：老人家累了，你们可以接着讲吗？

杨思仙：可以。

老威：你当时才 5 岁，记得清楚吗？

杨思仙：我虽然小，但记忆已经烙在心灵深处了！只可惜从小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文化浅，不能像你们作家一样，把这苦大仇深的家史写出来。

老威：讲出来也一样。

杨思仙：爸爸和舅舅都是当年抓当年毙，乡里杀了十几个地主，都齐齐倒在河滩那边，据说水都变色了，河底的鱼由于喝了太多的血，眼睛也变红了，大白天嗖嗖地往上窜。我大哥如果不跑，下场绝对与爸爸他们一样。那时没正式的法院，也不讲究调查，说你杀解放军，你就莫辩解了，乖乖地把脑袋交出去吧。

我大哥是中学生，在乡里算很大的知识分子，改朝换代的事情，在书上也看过的。杀旧朝廷的人，株连九族，都在意料之中。所以在 1952 年头上，他就逃了。他跟妈妈说要学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去，我还不懂是啥意思，因为则黑周围没有叫首阳的山嘛。

我记得他逃的那晚，也跟今晚差不多吧，风把瓦片刨得夸夸响，月亮偶尔露脸，像个吊死鬼。

老威：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会觉得月亮是吊死鬼？

杨思仙：我最怕看月亮，因为在漆黑一团中，反而要安全些，还能去野地弄些吃的。我大哥睡觉从来不脱衣裳，还把一个裹着几本书的小包袱当枕头，这样，墙外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弹簧一般蹦起来，挽着包袱，顺着屋角的杆子朝房顶爬，那儿有早就掏好的一个洞，平时用泥巴糊成的盖子塞着，不容易看出来。

家里的大人都抓走了，白天抓妈妈的时候，我们几个小的都抱住她的腿，但民兵用枪托子打，用脚踢。小孩子只顾着哭，却没有像大哥二哥，始终站一边，听天由命地看着这一幕，表面上麻木，其实心里已在打主意了。大哥后来说，那个民兵连长盯了他好几眼，那瞬间他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和弟弟却仍不明白，还喊饿，没有了大人，长兄就当父啰。

大哥煮了些红苕分给我们，他自己却没吃；他叫我们睡下，又从门缝看了几回动静。我不久就开始做梦，眼睁睁的看着大哥从门缝跨出一条腿。我想喊，可发不了声；我还要翻起来拉他，也动不了。我在梦里晓得是在做梦，我还说，大哥，你为啥不去爬

杆子钻洞呢，人不可能长翅膀飞嘛。大哥摇头说，贫下中农都长着翅膀，乌鸦一样歇在瓦顶，所以我不敢朝上钻。我说，那就变小，藏进灶台里。大哥说，我又不是耗子，钻不进地心啰。我说，你先变小嘛。大哥说，小娃娃懂个屁，我们这种阶级的人，只有脱胎换骨才行啰。

我晓不得这梦做了多久，可大哥却边和我说话，便扁着身子出门了。他本来就瘦，这时更像一张纸，被啥子东西吱啦吱啦拖出去。最后是手，包袱吊在上面，还向我摇了摇，一本厚书露出角角。我本想说，哥啊，逃跑还带书干啥，不如带两包老玉米在路上啃，可那手却消失了。我迷迷糊糊地挣起来，可门却栓着；我正纳闷大哥他是怎么出去的，却听见大哥在我背后吃吃笑，我吓得叫出声来……

老威：几十年前的梦你也记得吗？

杨思仙：非常清楚，因为醒过来大哥就不见了。天大亮时，果然来了 20 多个民兵，把房子铁桶般地围起来，然后猛一下把门踹开，大吼一声："举起手来！"我们一窝娃娃只得投降，到门外靠墙站着。民兵连长喝问："杨思源呢？"我们都没吱声。接着枪托子就下来了，我们像几个足球，被捣得满地滚，屋里又被抄了个底朝天，15 岁多的二哥和 10 岁多的三哥都叫麻绳扎了，揪住头发往墙上撞了很多下。

老威：你们全被带走了？

杨思仙：二哥和三哥弄去拷打，几天后三哥放回来了，二哥却在爸爸被枪毙不久，判了 7 年刑，送蒙自的草坝农场劳改，稍后又转富源县煤矿。在那儿一呆 20 几年。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原以为 7 年刑满，他好歹也会回家，没想到他与家里人重逢已是 30 年之后。按当时的劳改政策，反革命分子刑满将被强迫留场。如果不是邓小平上台搞改革开放，我们和大哥二哥就永远见不了面。

老威：你们家 15 岁以上的人都抓走了，剩下的？

杨思仙：我 5 岁，弟弟 3 岁，姐姐不足 10 岁，妹妹更小，妈妈被抓后，她缺奶，饿死了。三哥说，民兵把他们兄弟俩用麻绳串起来，押着去搜山。全乡的青壮年都出动了，像赶野猪，几百人朝山上拉网，又是鸣枪，又是在洋铁桶里放鞭炮；遇上林子或者山洞，还点茅草、湿柴，哇刺哇刺向里面扇浓烟。当年的山里，啥子野物都有，所以人没逮着，野猪、野兔、野鸡倒猎了不少，据说还放翻了狼和熊。

老威：真是一场集体狩猎。

杨思仙：是啰，大伙在山上折腾了一天一夜，最后扛着各种野物，欢天喜地回来。他们在乡公所外头挖了一眼灶，架上海锅，就剐皮煮肉了。而我的两个哥哥被吊在旁边的树上，如等待着宰割的野物。有人吃饱喝足了，就拿骨头去逗他们，命令他们伸出舌头舔，可又不让舔着。二哥不愿受辱，就紧闭嘴，将脑袋偏向一边，却把人家惹毛

了。二哥挨了无数骨头，嘴还叫刺刀撬开，灌了一碗粪便。

张美芝：我被斗了 40 个昼夜才放回家。在则黑小学里，先是逼着我检举丈夫和哥哥，后又要我交代大儿子的下落，是不是受我的指使上山为匪了？我一个妇道人家，自从嫁过来，无非相夫教子而已，那晓得场面上的事情？大儿子是个读书人，与土匪更联系不上了。我还晓得，如今斗我打我的贫下中农里，做过土匪的不少，当然那是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匪，天一变，就成了“苦大仇深，逼上梁山”。

那是雨季，我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跪在一滩污水里。膝下铺着碎砖和炭渣，天上下着倾盆大雨，我都痛麻木了，可身子一歪，民兵就过来把脑袋踩在水中，让你醒脑。风湿的病根就这样留下的，直到 80 多岁了，腿和腰还直不起来。

还有打，吊，一把接一把揪头发，用皮鞋、布鞋、草鞋的鞋底扇嘴巴，用杠子压腿……人想得出来的刑全搬出来了。从那年开始，我的牙就没剩下几颗。我没想到能活出来，感谢主，我真没想到我的寿命比好多贫下中农还长。

回到家，两个儿子又没了。老三悄悄告诉我，他晓得大哥藏的地方，我都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大儿子没跑远，就躲在后山垭口的一眼废窖里。

老威：虽然逃过了这一劫，往后的日子怎么捱呢？

张美芝：在我丈夫和哥哥遭枪毙的会上，他也被缺席判处死刑。乡里村里都张榜抓他，所以他绝对不能回来，更不能在有人烟的地方出现。

老威：只有做野人了。

张美芝：大白天在窖里埋着，下半夜拱出来，去坡地里掏些生东西充饥。大儿子读过书，加上一个人在坡上坎上晃荡久了，听觉也跟野兽差不多。这样，时间一长，土改高潮一过，人们就淡了，好像不再为一个反革命野人多费工夫。

老威：后来呢？

张美芝：后来家里人也上山种地。大儿子的双手经常刨东西，指甲又长又厚，于是他就在家里的荞子地底下，掏了一眼窖，顶上盖石板，石板上盖土，土上再种荞子。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也想不到。

老威：如此复杂的埋人工程，得要你们的合作才行吧？

张美芝：一家人只能抱成团，要不一个也活不出来。我被盯得紧，哪就把吃的（有时是粑粑、炒面，有时是煮熟的洋芋、包谷）绑在几个没成年的儿女腿上，带上去。我们还在地窖边上种满竹子和向日葵，竹子里面的节疤是可以打通的，而向日葵的秆内有天然的气眼，这样，既可以透气透光，又可以将葫芦里的水灌进去，给窖底的大儿子喝。

老威：这算地球上最绝妙的地牢了。

张美芝：没人发觉，渐渐也没人过问，张在村里的逮人榜也褪色了。我呢，还是开会，还是挨斗，但罪状就那些，也挖不出啥新鲜货色。秋去春又来，生土种成了熟地，我还以为大儿子会永远与世隔绝地生存下去，又在地边的一棵老树干里慢慢钻了两个气眼，以防意外。

老威：可人不是蚯蚓啊。

张美芝：赖一天算一天，顾不上多想。我大儿子活埋了两年余，已忘了太阳怎么升怎么落。地窖里寒湿重，憋得他浑身长疮，衣裳也烂成刷刷，最后在身上挂不住，就赤条条的了。有一次，我磨蹭到天黑，终于等到脚边慢慢挪开一个洞，我儿子的脑壳像木头桩子一般拱了上来。我一阵心酸，就趴下去，母子俩搂抱着，唉，这哪是我一表人才的读书郎啊，除了裆里缠了一团乱草，真一丝不挂，并且瘦成了一副骨头架架。

老威：这算是阴阳两个世界的接触。

张美芝：作了什么孽，我儿子变成了鬼？那么大个子，却轻得如一段泡桐木，我都能把他给抱起来。这副没有一块好肉的糙皮壳子，汗毛一寸多长，像霉豆腐，又细又白。特别是头发，齐腰深，破麻袋一般，我岔开手指替他梳理，才几分钟，虱子就一把芝麻似地朝下撒。做妈妈的肉疼啊，忍不住，就哭出声，儿子他急忙堵住我的嘴，眼睛一闪一闪地四处张望。幸好快秋天了，荞麦长出半人高，母子俩坐在黑地里，外面瞅不见。

我还没来得及把吃的拿出来，儿子他就急不可待地在我身上捏，把到手的红苕和炒面往嘴里塞，噎住了，就响尾蛇一般丝丝仰脖子。奇怪的是，他吞了那么些干的，喉咙都顶出一串包了，也不喝一滴水。直到肚子填得差不多了，才野物一样四肢着地，嗖嗖跃至十几米外的水沟边，趴下去埋脑壳饮水。

目睹此情此景，我晓不得该说啥，又不敢久留，因为那年月搞阶级斗争，民兵随时可能上门。我凑在儿子耳边说："思源，妈妈走了。"他点点头，啊啊了两声；我又说："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还是啊啊了两声，我明白，他一个人呆得太久，已不习惯讲人话了。

老威：这样下去十几年，他也许就忘掉人话了。

张美芝：我站起来走出荞子地，下山回家。我感觉儿子始终在看我，就回头，还举了举手，不料他转身就逃，眨眼就不见了。唉，他还以为我在发出"人来了"的信号！

老威：小时候，我看过反映解放区土改的革命歌剧《白毛女》，剧情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贫农杨白劳，强奸杨喜儿，搞得人家走投无路，只能上山当野人。天长日久，仇恨与营养不良使喜儿成了白毛女。

张美芝：那我儿子是啥呢？

老威：算地下版的《白毛女》？也不对。总之，《白毛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黄世仁成了天下地主最著名的代表，它的作者贺敬之因此晋升为共产党的中宣部副部长——历史就这样永远颠倒下去，谁也想不到地主在土改中被逼成了《白毛男》。

张美芝：《白毛女》我看过，她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翻身得解放了。可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却永世不得翻身！1954 年秋天，他已经在山上躲了两年半，头发都齐大腿深了。我的三儿子杨思洪，当时只有 12 岁，与他的大哥感情特别厚，就经常上山见面。开始，兄弟俩在一起呆一会儿就分手，也没啥事儿；渐渐，就有些难舍难分。我被阶级斗争搞怕了，就阻止他，让他莫去得太勤，暴露了秘密将不可收拾。可这娃娃表面上点头，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那一段，农村正在搞初级合作化，生产占了上风，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好像要松懈些，集中学习开会时，体罚也减轻了许多。我心里的弦也没绷得那么紧了，甚至想，杨思源“失踪”了这么久，对村上乡上来说，也许根本不存在了。

杨思洪人小鬼大，最后一次，他居然在山上呆了两个多月！白天与他大哥挤在地窖里，晚上出来活动。我又担心又着急，就叫其他几个娃娃去劝他回家，不听，我就亲自去，把利害关系讲了，口水也说干了，他们却只顾点头，就是不动脚。我一时心软，想到都是没父爱的娃娃，既然他们要患难与共，我也不能太不通情理。

杨思源还说：“妈妈，您就让三弟再陪我几天。我反正已是活死人，过去学的文化对这个社会也莫用，但三弟聪明，教给他，将来或许有用。”

我只能叹气。

杨思源又说：“如果不是三弟上来和我说话，我恐怕已变成舌头打结的哑巴了，更莫提思考问题。”

我说：“你三弟人小，你可不能连累他。”

杨思源一下子哭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连累家里的任何人！”

我也哭了，接下来的许多天，我都让几个娃娃轮番给他们送吃的。但那几天，我老做恶梦，血淋淋的场景，一会儿是我的丈夫和哥哥，一会儿却是那藏在地窖里的兄弟俩，一个压着另一个，身上布满了枪眼，醒来时冷汗直淌，手脚全抽筋。这是咋回事，果然村里的民兵又来了，他们对着本子，挨个清点人数：“还差一个！”

我敷衍说：“一大早走亲戚，晚黑就回来。”

民兵排长瞪眼道：“狗地主，为啥不报告？”

我说：“正要报告啰。”

民兵排长说：“狡猾的地主婆，敢给老子耍花枪！你娃娃走的是那家亲戚？从实招来，

是不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去了？”

我一时答不上，民兵们就一拥而上，用细麻绳将我五花大绑，严刑拷打。我家缺一个人的敌情被迅速上报乡里，上级指示：无论老幼，一律严加控制，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并且要彻底查清地主三儿子杨思洪的下落。

事已至此，我心急如焚又毫无办法。家里人上不了山，那兄弟俩饿急了，肯定在地窖里呆不住。而一露面，哪怕半夜三更露面，也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猎物。那时我还没信上帝，只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祈求列祖列宗和天上的神保佑我的儿子逃过这一劫。

老威：我晓得那个人民战争如汪洋大海的年代，你的一举一动，也躲不开群众的耳目。

张美芝：除了劳动，吃喝拉撒都有专人看管；晚上睡觉，民兵就用两根长绳子，从老到幼，一手一脚地拴一长串，绳头还固定在门斗上，娃娃翻一个身，门也嘎嘎响。

老威：看管你们的人也不舒服吧？

张美芝：那时的人阶级觉悟很高的。况且烦闷的时候，还可以打骂我们，想方设法用我们取乐，比如一边打锣一边领着我们游乡啦，让我们学狗爬啦，往我们身上淋尿啦。听说民兵们还争着看押我们，仿佛是一桩肥差。

老威：肥差？集体变态。

张美芝：莫办法，谁也顾不了谁。我那两个儿子在地窖里憋了四五天，又渴又饿，都在喝自己的尿了，才忍不住从土里拱上来。民兵刚烧过山，四处焦土，树子和荆棘都赤条条，没个遮没个挡的，偏偏那晚又是大月亮。兄弟俩的脑袋冒出地面，还如一对地老鼠，东张西望了一阵儿，才一前一后向水沟爬去。解了渴，肚子更咕咕叫，于是他们又四肢着地，跳跃到几十米开外的另一块地里，埋伏在地坎下掏红苕。他们掏了两个大红苕，搓了搓泥巴就开啃，然后继续掏。他们在地里耽搁了十几分钟，将一包红苕运入洞里，还把战场打扫干净。

他们又憋了三四天，因为第一次没出事，第二次出土胆子就要大些。哥哥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最好跑远些。于是兄弟俩野物一般翻着蹄子，跃过了几块地。那晚月亮实在太大了，白白的光都刺眼睛，他们已习惯不穿衣裳，所以在掏了红苕之后，就滚下一个地坎，脑袋抵脑袋，在那儿吭哧吭哧。他们啃得太香了，没想到夜太静，更没想到前次出洞就留下了痕迹，人家已发现红苕被动过。

轮番埋伏了几夜的民兵已把枪口指定了他们，有人突然大吼一声：“有鬼啰!”兄弟俩一惊，扭头刚要跑，枪就响了。吓得崖石顶的一群歇鸟扑索索地飞起来。

第一下擦着哥哥的耳朵过去，激起一团泥烟；弟弟大叫“完了”，转身扑倒哥哥，第二下就响了，他的肩膀叫射出个大窟窿。跟着是稀里哗啦的乱枪，他的头叫射爆了，脑浆子四溅，盖了他哥哥满脖子满脸。隔了好久，枪声歇下来，民兵们提着冒烟的猎枪围拢去，借手电光埋腰查看，才发现那个失踪已久的 12 岁的地主娃娃已被射成一

张肉饼，裹在他的野人哥哥身上。

他们把一死一活的兄弟俩绑在一块，用麻绳子牵着下山。回村后将死弟弟卸下来，换根铁链子将哥哥吊在牢房里。整个村子轰动了，老老少少都半夜起床，打着火把要去看野人。

因为山上一响枪，脚底的群众全都惊醒了，有些人早就穿了衣裳，钻出房门打望。而我们却浑身哆嗦，魂都飞了。

第二天，乡里又是出告示又是打锣，方圆百里都开了锅。第三天，全乡开大会，反革命野人被押上戏台，在上万群众面前亮相，我们全家也被揪去陪斗。由于两年多不见天日，我大儿子在台上睁不开眼睛，他大约瞎了一个星期左右，才能辨清模糊的人影子。

张美芝的五儿子杨思义插话：

我 1949 年生，当时才 5 岁，可也是在大庭广众下第一次看见我大哥这个样子。皮肤和拖地的长发都是灰白灰白的，嘴很尖，牙槽都突出到嘴皮外了。以前在晚上见过面，不觉得像鬼，而现在，他真是个可怜的活鬼了。许多人还向他扔石块吐口水，还扯他的头发，忍心哦，他的命可是我三哥的命换来的。

老威：他不是被缺席判了死刑吗？

杨思义：土改过了，政策宽松些，乡里区里也不能随便毙人了。所以大哥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昆明的云南省第一监狱劳改了近 30 年。家里人，包括我大嫂，都直到 80 年代才与他重新联系上，晓得他刑满后就在监狱隔壁的机器厂就业。

四女儿杨思仙插话：兄妹分离时我才 7 岁，可重逢时我已 35 岁，是 3 个娃娃的妈妈了。最小的女儿还在吃奶，我就抱着她，坐了一两天长途汽车才拢昆明。打听了几个钟头，快天黑了，才在一个好心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已 50 多岁的大哥——当时他正在洗脚，一听别人说妹妹来了，一下子傻了；接着就跳了起来，洗脚水翻了一地。

老威你看，这张照片就是第二天上午照的，大哥还穿着劳改就业服装，手里抱着他的小侄女，脸上有微笑了，这很难得。

我大嫂一直没有另外嫁人，大哥出狱后，他们又生活了 20 多年，却没有后代。大哥两三年前害肾衰竭，死得很不甘心；大嫂现在还与我们住，她熬不住夜，已经睡了。

老威：我明天能见她吗？

杨思仙：见到她也问不出啥，这个现代的孟姜女，一辈子就活在泪水里。

张美芝：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苦太多痛，逆来顺受，却活了 80 多岁——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啊。生离死别了十几回，人都麻木了，所以能无知无觉地熬到头。几十次政

治运动，几百次批斗，稀奇古怪的刑罚……我一个妇道人家都见识了。又能咋样，感谢主，我还活着。我曾经恨自己为啥不早早地死，因为儿女都受阶级的牵连，只读了小学，就不能再升初中，也没有钱升初中。任何朝代，没有文化就完了，我以为这个辉煌了好几代的家族完了，被共产党毛主席整来整去，恐怕连耗子也不下崽崽了。家谱族谱也烧得干干净净，贫下中农没搜尽的地方，我自己再搜一遍，免得再惹祸。恶梦啊，恶梦啊。

老威：你记恨那些整过你的人吗？

张美芝：大形势摆在那儿，我能恨谁？全能的主在头上，他安慰我们，教导我们要用宽恕去惩罚敌人。我的儿子辈没受到正常的教育，可孙子辈翻身了，出了几个大学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昆明工作，有的自愿回到家乡，又像他们的祖上一样，成为这方圆百里最有文化最有出息人，村里乡里要办啥大事，都缺不了他们。我的一个孙儿还做了官，于是，几十年前把我们朝死里整的那些贫下中农的后代，又上门来巴结了，口口声声叫我这命大的地主婆为“老祖母”。我耳朵背，听不太清，人家就贴上来连叫好几遍。我不好意思，就答应了，还笑呵呵地问：“你的亲祖母呢？”人家回答：“没您老福气高，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不知咋的，我一阵心酸，就点头说：“晓得晓得，她还小我 5 岁啰。”

老威：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讲过土改的事儿吗？

张美芝：估计不会讲，你想一个杀人犯会给自己儿孙提“当年勇”么？党和政府也一直鼓励人民群众要“一切向前看”。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还蛮高的。

张美芝：我孙儿每天把单位里的报纸拿回家，我就认认字，受受启发。去年，我那当官的孙儿出钱在我们杨家大院的旧址上，摆了十几桌酒席，筵请在土改当中与我家同命运的地富分子——一大半都死了，就让那些冤魂的儿女们来代替他们吃酒吧。我们还请了一部分贫下中农，都是从土改到镇反到四清到文革等几十次政治运动中，对杨家比较好的，暗中关照也算，整人时没下狠手也算。我特别叫孙儿把杨家过去的长工某某请到上席，坐在我身边。他小我两三岁，是个老实人，在土改中，工作组反复动员，要他起来斗争我们，他死也不吭声。因为划不清阶级路线，他还挨了打。如今，我当着众人替他夹菜，还大声将孙儿唤过来敬酒，我说：“这是我的老兄弟，按辈份你该喊老爹，他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比如现在，他孙女读书缺钱，你每月能不能补贴一点？还有给他家老幺在街上找个铺面，做个小生意好不好？”孙儿当然满口答应，ｘｘ连说当不起。

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酒席在当地影响很大，相当多的人都没请，只能远远地观望。50 岁以下的人或许不太明白，但老一辈心里肯定有数。我的重孙儿女们还放了鞭炮，那个高兴劲儿啰，相当于杨家自己给自己平反。我将几个大学生孙儿叫到一边说：“是不是太招摇了？”他们都回答：“奶奶您还担心个啥？过去已过去了，杨家彻底翻身作主了。”

后记：

午夜读旧报

结束了对土改受害者张美芝家的拜访，已是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凌晨。我和孙医生步行回教堂的中途，风嘎然而止，月亮拖着一根长长的丝带从云里闪了出来。我不禁刹步，请孙医生先行。面朝浩浩旷野，茫茫群峰，我解裤下蹲拉起了野屎。快活之间，吹了一段口哨，不料惊动村庄里此起彼伏的狗吠，还有些昏黄的狗眼在四周飘飘落落，与天上的狗眼混杂。我想，那稍远处横贯着小河的旷野过去就是召开土改大会的操场吧？如今时过境迁，枯骨之上已长满了庄稼。

没带手纸，我就像个真正的农夫，拔了些衰草擦屁股。草根很肥，浸透了血似的——也许张美芝家的死者已融化为植物生生不息的胎记了，法国诗人瓦雷里早就在长诗《海滨墓园》里吟叹过："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

我慢悠悠地继续走，还与一头水牛擦肩而过。终于接近街面了，桔黄色的路灯令肮脏的小镇显得浪漫。我埋头上斜坡，又在十字架的笼罩下进了半掩的窄门，拐了一个弯，就准备入室休息。

两张床并排，一张床横着。孙医生已入梦，鼾声隐约。由于经常出门，他把随身带的床单、被套都用上了。我打开供基督教徒歇脚的被子，在令人不适的异味中躺下。由于养成了睡前看书的不良习惯，我又爬起来东找西翻，想不到在一个尘封已久的旮旯里，搜出一卷边角焦黄的报纸。我蹲在床尾细细查看，多数是文革时期的文字垃圾，不堪一读。唯有 41 年前的大半张旧报，竟与地主的命运密切相关，现公布于后，可作为这次系列追访的官方佐证。

《人民日报》1964 年 12 月 14 日版，作者：景文灿

这是"人情"，还是毒药？

（编者按）山西文水县马村十一队贫下中农社员阶级警惕性高，他们从地主分子送几个粽子给队长的"小事"中，识破地主的阴谋，帮助队长划清阶级界限。

山西文水县孝义公社马村大队十一生产队的贫农张松富向我讲了他们队里一件事，很开脑筋。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端午节前一天的傍晚，平素很不老实的地主分子王淑珍，鬼鬼祟祟地溜进队长孟耀吉的家里，从围裙里拿出几个粽子，对孟的妻子景秀如说："您嫂子，我知道您家没有做下粽子，特意给孩儿们送来几个。"从这以后，接连几天，王淑珍不是提出要白给景秀如看孩子，就是要把磨面的家具借给队长家使用。

在王淑珍给孟耀吉家粽子的第二天上午，一伙在地里锄玉米的贫农下中农就纷纷议论起这件事来。有人说："听说王淑珍昨晚上偷偷给耀吉家送粽子。咱们可不能眼看着地主把队长拉下沟底不管啊！"也有人说，怕管了到头来要吃亏。他的话刚落音，便

引起好多人的反对："咱们给队长提意见，是为了大家好，也为他自己好。不该不吭气。"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好好帮助队长孟耀吉认识这个问题。

在贫农下中农的提议下，在送粽子事件发生后十来天，十一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贫农下中农一方面揭露了地主分子王淑珍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又热诚地批评和帮助了队长孟耀吉。贫农张松富说："可不能小看这几个粽子，你想想，为什么地主分子不给别人送粽子专给你家送？为什么从来不送偏在你当队长以后送？为什么他们过去一毛不拔，现在愿白给你家看孩子？"贫农张秀峰说："我们一眼就看透了王淑珍的鬼胎，可是你还在鼓里蒙着，原因就是大家脑子里有了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贫农刘占奎说："现在不法的地主分子换了新办法跟我们软斗，当干部的可要时时刻刻操他们的心啊！"

孟耀吉在贫农下中农的帮助下，恍然大悟，当众检讨了自己的思想。他说："要不是阶级兄弟早点拉我一把，非要犯错误不可。今后一定要划清阶级界限，照着党的阶级路线办事。"从这以后，孟耀吉大有进步，遇事主动找贫农下中农商量。他说："只要多和贫农下中农商量，常请贫农下中农指点，就走不错路；万一走错了，也能早点改正过来。"

马村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主动地监督和帮助干部，把错误纠正在刚刚露头的时候。这是值得表扬的。

这篇报道的时代背景是 1964 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因此旁边还配有草垛下斗地主的图片。不过贫农下中农都戴着工作帽，显得衣冠楚楚，而地主却一身补丁棉袄，像是大家共同的长工。我想，土地改革已过去十几年头，再顽固不化的敌人也气息奄奄了，更别提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地主婆。可假想的阶级斗争仍然没有弱化，送几个粽子也成了"阴谋"，还上了官方最高级别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这就意味着地主的铁案永世不得翻了。

共产党就是做土匪起家的，我采访过自称"职业革命家"的何家栋先生，据他回忆，30 年代初期，红 25 军曾把他家征用为临时监狱，将做小买卖的，农忙时雇工的，总之，家境稍富一点的都当作"土豪劣绅"关起来，倒吊，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天搞得鬼哭狼嚎，其目的是"榨些油水"。这跟山匪绑票是一种性质，因为红军当时没有自己发行钞票的能力，所以"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扩充军费的主要手段之一——直到夺取政权以后，煽动仇富的惯性就蔓延为大规模的国家迫害，并且一直持续了 30 年。理论家胡平在《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一文中披露，在土改期间死于非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 200 多万，而被划为地富成分的总人数超过 2000 万。

我虽然是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可也受过株连，因为爷爷是地主，所以我在文革中跟父亲下放到某地农村，就近上一所小学时，就被老师强迫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地主"，还因此被剥夺参加红小兵的权利。当我解释说，我爸爸是人民教师，我也该出身于"教师家庭"……额头上竟被戳了一食指："地主的儿子当了教师，就不是地主了？你就不是地主的孙子了？"

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孩子强忍泪水，张口结舌的情景。但又能怎样？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死了，包括这个不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了阶级斗争活靶子的地主婆，恐怕也没等到揭帽，就已作古了——我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今夜碰巧读到了有关她的旧报，徒劳地辛酸着，而她的后人呢，又在何方？是否保存了这张旧报，以及一段荒唐的历史？

教堂外的鸡叫了，旁边的孙医生喃喃嘀咕了一句梦话。我记起还要起个大早，翻山越岭去另一个彝族山寨寻访，就叠起旧报，熄灯宽衣。刚躺下，腰间一阵猛烈的刺痒。估计是跳蚤，狠挠了几把，也懒得顾它了。倦意袭来，人就如瘫痪一般，感觉中只打了一个盹，身体就剧烈摇摆起来，原来是孙医生在催起床了。

我瞪着一双眼，却仍在做梦。“洗个冷水脸就清醒了，”孙医生说。

与地主女儿同行

2005 年的最后一日，我和孙医生赶早起床，出了教堂，高楼遮蔽的街面一片昏暗。我们在冷水管前匆匆洗漱，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早已候在一边，今天由她充当我们的向导。

6 点 40 分，我们用罢简单的早餐，从小吃店钻出来，向郊野走去。夹杂着卡卡电流声的劣质高音喇叭一直弥漫着，《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三朝皇帝赞颂完毕，《新闻联播》才粉墨登场。孙医生叹息道：“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形式上反了一百多年的封建，可眼下，独裁者的阴魂依然不散。”李世珍却灿然一笑：“这儿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听免费广播，耳朵都起老茧了。” 我说：“毛邓江都全了，尚缺当朝皇帝胡的马屁歌，估计过两年会添上吧。不过，这氛围令人回到了童年，我随爸爸下放在一个叫柏梓的乡场，那儿的高音喇叭也是每早 6 点，必播《东方红》。”孙医生说：“这不是扰民吗？依照法律，大家有权要求精神损失赔偿。”我摇头道：“这些陈年老帐和土地改革一样，没法算。孙医生你看过电影《告别列宁》吗？或许某一天中国的柏林墙突然倒了，我们这些在专制之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觉得不适应呢——没有敌人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因此被激发出来的悲壮和荣耀。我们将在平庸中虚度光阴，最多只能杵着拐杖，在旧政权留下的遗址周围回忆、感叹，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将令你流泪——原来专制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自己体内扎根了，每一种过去叫人受不了的东西眼下都牵扯着你的神经。”

闲扯之间，头脑清醒了许多。紧贴小镇的是圆馒头一般向高处起伏的红土坡，我们爬了十几分钟，《新闻联播》就销声蹑迹了。回头眺望，我这个著名的懒觉大王终于欣赏到天色初开。对面的群峰如一些牙齿，在开口咀嚼之际，将一团青色的泡沫吐了出来；接着，泡沫在蔓延中变淡了，化作薄雾，沉入弯弯曲曲的山脚。组成则黑的 3 个村落在薄雾的笼罩下，宛如世外桃源；再接着，一丝腥红在微微摇荡的天幕中央浮现，像是两瓣肉红色的山体留下的唇印。我不禁掏出相机，可只拍了两张，电量不足的红点就出来了，该死，我昨晚竟忘了充电！

继续赶路，穿过一片矮树林与灌木相间的地带，坡度突然陡了起来。此刻再回头

一瞥，我们就如三只蚂蚁，跨在巨大的沙发椅的靠背顶端，下面的一切都深不可测。只能向上，汗水出来了，我和孙医生开始宽衣；而我们的向导却连帽子也没揭——这是一位比我小 10 岁的妇女，浓密的黑发都压在旧军帽的舌头下，她的双颊充盈着山地人特有的赧红，而笑容很美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高贵。当我们横七竖八地爬过一道又一道坳口，气喘吁吁之际，我顾不上与她搭话；直到 1 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越过两排城墙般的天然巨石，眼前豁然开朗。

挥袖抹把汗，步履在广大的山顶平川上从容起来。田野和稀稀落落的房顶铺满一层白，而红色的土路，如镶了两道曲曲弯弯的雪花边儿，将人的心情勾得美滋滋的。于是我凑拢向导找话，先问这山顶村庄叫啥？她回答："鲁嘎，是个彝族村。"我顺势又问："那你也是彝族人？"她回答："是啰，可不是则黑这边的人。""嫁过来的？""嫁过来十几年，女儿都读小学了。"接着，她反问我是否去过轿子雪山？我记起在来的路上，远远看见一座顶端平展的积雪的山峰，当时我把它想象成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我的脖子之外绕行着。我还记得雪峰之畔的小红点，孙医生说那是十字架。

大约是我的脸部表情鼓励了她，这个比较年轻的母亲开始讲述她家族的故事：

"我于 1968 年出生在轿子雪山背面的凳子山乡，海拔比这儿高得多。听父母讲，西方的两位传教士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把福音带去了，还建立了教堂。他们在村子里一住好多年，风闻日本鬼子要从缅甸打过来，他们也没跑；可共产党来了，要解放，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他们就不得不撤离。"

"这是一对夫妻吗？"我问。

"是。"

"他们有孩子吗？"

"晓不得。哦，我忘了，那男的没住不久，就得了重感冒，死了。那个时候，那么高的地方，一感冒就得死。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太习惯凳子山的气候，大半年见雪，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女的脂肪厚些，活了下来，还在丈夫的墓前建了两三层楼高的教堂。由于她的坚持，整个村子都信了主，山脚村里的人也赶来听福音，我们家族也不例外。"

"观察你的言谈举止，你的家庭教育应该不错的。"

"我的祖上靠贩牛起家，我的老爹（祖父）继承家业，由于精明强干，又大大地发展了一番，成为方圆几十里的养牛大户。但是在解放前夕，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国民党、共产党、彝汉地方势力的纠缠不清，土匪就猖獗起来。不仅拦路抢，甚至也结伙来村子里杀人越货。有一次，20 几个悍匪骑着高头大马进村，先一阵乱枪，把大伙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然后几声唿哨，直奔我们家，团团围住了大院，架上了柴草，再喊话威胁，要一家老小都举着手出来，或者先将金银财宝扔出来，否则就斩草除根。老爹的脾气倔强，指挥家人用鸟枪抵抗，但几分钟就叫土匪的洋枪压了下去。土匪被惹毛了，在墙外放火，再以原木桩子撞门，一下子就涌了进来。那时，我们家

院子很大，关了上百头牛，所以土匪虽然破了门，可还是叫密密匝匝的牛给拦住了。牛群叫烟火一薰，炸了营，牛角将土匪骑的马挑伤了两匹。土匪更毛了，一边开枪，一边指名点姓，要老爹出头，换全家 20 几口的命。老爹不怕死，先暗中安排家人从地道逃跑，然后站上 2 楼平台出头。红了眼的土匪根本不讲信用，隔着牛群，枪炮齐发，据说老爹中了几十弹，像个马蜂窝，从头到脚都打烂了。土匪把我们家洗劫一空，老爹那血肉模糊的尸体还被吊在全村最高的柱子上，示众几个小时。待土匪走后，才叫同村人放下来。

“我爸爸说，他没来得及从地道逃跑，就急中生智，埋腰钻入牛肚子。他在比森林还密的牛腿里爬来爬去，那些懂人性的畜生竟没踩过他一蹄。土匪有的马上，有的马下，提着冒烟的枪管四处瞅，也没找到他。当天擦黑，他鬼一般从牛肚子里爬出来，大喊救命时，路过的人几乎认不出他是谁了。”

“后来呢？”

“后来就解放了，我家虽然伤了元气，但与同村大多数相比，还算大户，因此被划为地主。被土匪烧一遍抢一遍的家，又在土地改革时被抄了许多遍。最后全家人还扫地出门。他们将我爸爸抓到乡里，关起来严刑拷打，几十天后，公审公判，我爸爸判了 13 年有期徒刑。”

“什么罪名？”

“恶霸地主。”

“哪个法院判的？有《判决书》吗？”

“没有法院，也没有《判决书》。那个时候判刑，甚至枪毙人，都由工作组说了算。”

“工作组算哪一级？”

“晓不得。农民协会向工作组检举谁，谁就倒霉了。在那种大形势下，也不敢申辩。”

“你出生得较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能去凳子山拜访你爸爸吗？”

“他已经去世了。”

“哪一年？”

“1979 年。”

“就是共产党为全国 400 多万地富分子揭帽的时候？”

“爸爸他没熬到揭帽就去世了，当时我还不满 11 岁。临终前，他几乎成了一把枯柴，出气进气，浑身皮肤都如扯风箱一般大鼓大瘪。我们三兄妹被妈妈叫到床边，让他一个一个地摸索手和脸。那个凉那个抖啊，特别是那对眼珠子，定定地落在我们身上，像要从眼眶里爆出来……”

“他给你们留下什么遗言？”

“没有遗言。他啥也说不出，就那么瞪着眼珠子，让人心里发毛。我只好低下头，可妈妈说，好好看着你们爸爸，他也算个读书人啊，在旧社会，你们老爹就送他读完了初中。他一直想当个教师，为家乡做一点贡献，但阶级成分把他给限制死了，还连累你们不能升学，你们可不能怪他，都是时代的原因啰。

“爸爸他听妈妈这么讲，两颗胡豆大的泪珠坠了下来。妈妈忙替他擦了，又说，老汉啊，你放心啰，你的后代不会是文盲嘛。毛主席死了，邓小平上台，形势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这也相当于改朝换代，说不定以后地主子女不仅能读中学，还能读大学啰。”

“你们家有大学生？”

“我读完了中学，三兄妹里数我文化最高。但家族的香火不能断，我会培养我的下一代，让他们上大学。我爸爸 50 多岁就死了，差那么一点点，他就能亲身经历地富分子揭帽了，虽然这不是平反，也没有一文钱的补偿，但对我们这种要求不高的家庭，这就相当于解放了。”

“真是终身遗憾。”

“爸爸他劳改了 13 年，在煤矿，每天要挖十几个小时的煤，真是暗无天日啊。我太小，不可能晓得那种日子怎么熬，连妈妈也不是太清楚，因为爸爸不愿意提。劳改期满他只多留了两三年场，就回家了。因为劳累过度，得了矽肺病，丧失劳动力了。

“一个废人叫送了回来，放在生产队也干不了农活。幸好爸爸他还有文化，到了文革后期，阶级斗争也搞疲了，队里干部就瞒着公社，把他弄去教村小。教书虽不是干农活，可比农活更费心思。爸爸说，黄土都埋到下巴了，才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得争分夺秒，为家乡多培养几株文化的苗子……

“就这样拼了几年老命，人就差不多油尽灯枯了……”

“按目前的标准，这样的地主可以评教育战线的劳动模范。”

“许多当年斗争过他的贫农下中农的子女都做过他的学生，有些还升到县里读中学，听说还有去昆明读书的。”

“听口气，你还是有遗憾。”

“我们家没出过你这样的文人，这就是最大的遗憾。我是教会的卫生员，按主的旨意，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服务，也不错；可我这辈人没有能力，将家族的血泪史写出来。”

“你们可以写啊，不用担心写不好。就按编年的方法，1949，1950，1951，1952，一直记下去，到你父亲去世，地主揭帽，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尽可能地详细。不用添枝加叶，也不用像个多愁善感的文人，加入那么多文采、观点、议论。只要有心，只要懂得记叙文体，小学生都能做这种事。”

“许多事说说可以，下笔就不太容易。”

“试试吧，你们有家谱吗？先整理一番。”

“小时候听爸爸说，祖上曾传下来一厚本牛皮家谱，土改时，把它埋在地下，后来又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最终在文革期间掘出来烧了。因为一旦被查出来，就会成为企图复辟的变天帐，弄得全家遭殃。”

“太可惜！如果中国每家都有变天帐该多好，那将构成一部丰富的民间史，令官方的所谓正史化作废纸一堆。”

山顶平地如人类的记忆继续延伸着，但有关地主女儿李世珍的家史却在下坡之际中止了。因为她抠了几次脑门，也寻思不出更多的细节。我记住了她爸爸的名字——李光裕，并且暗祷上苍，让多一些土改受害者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孙医生说，其实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都有保存家谱或家史的传统，可经过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政治洗礼，这个传统叫彻底毁坏了。

心情莫名的沉重，我不禁回头望了望那高处的十字架，还有正好闪耀其中的露出云端的太阳。向导说，这山顶村庄鲁嘎全都信主，连党支部书记也信，所以治安秩序也最好。

下坡的路又滑又陡，并且在密林中盘桓了一长段。我们踩着泥泞，与叮叮当当的骡子队伍擦肩而过了几次，精瘦的赶骡人一再冲我们微笑。大约 9 点钟，我们挟带着若干泥星子从山顶落到一条红泥盘山公路旁，再穿过公路，往更深的渊底俯冲。由于脚掌在小道上刹不住车，我和孙医生的屁股都亲吻了几次地面。而在另两条与这边平行的坡道间，彝族农夫们吆着骡子，悠闲地上下穿梭。

“这坡至少有 60 度，”我一前一后蹬着腿喘息道，“累死人了。”

“过了这打车村，再往里走，就是金沙江。”向导说，“那坡还要陡，江风刮过来，人都站不住。但是彝族人还要在上面开荒种洋芋呢。”

我打了一个寒战，忙问：“我们要拜访的人在那儿吗？”

向导摇摇头，笑了起来。远处，日头将裸露的万丈峭岩烤得通红，大团大团的蒸

气向上弥漫，而金沙江在锅底咆哮着，一边一半划开了云南和四川。

贫农李正才

采访缘起：现在是 2005 年最后一日的上午 9 点 30 分，我们一行三人，进入了这个名叫“打车”的彝族村寨。羊肠坡道迂回在陡峭的山势之间，在每一个岔路口，都聚着一些村民、骡子和狗。彝族人无论在哪儿，都习惯蹲在地上，所以远远看去，像歇在坡坎上的黑糊糊的鹰鹫。我们的向导用彝语沿途打招呼，还不时刹步，笑嘻嘻地与衔着烟杆的“鹰鹫”们聊几句。不知不觉，孩子和狗就在我们屁股后牵了一长串，我不禁叹息道：“环境如此恶劣，人居然过得如此悠闲。”向导摇头道：“土地太贫瘠，下种再勤，不一定能收获好庄稼嘛。”“哪咋办？”“吃不饱穿不暖，就偷就抢就杀啰。”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孙医生又解释道：“这儿从古至今，民风都无比强悍，动不动就拔刀子。前两年，还有抢亲的陋习，不仅到别的村子抢，自己村里也互相抢，也不管女人愿不愿意。这两年基督教传得开了，信主的多起来，人心才慢慢变得善良，小偷小摸还是有的，但杀人案件几乎绝迹了。”

向导也附和道：“对啰，没有教会，我可没这个胆子带外乡人来！这一带彝人的眼光特别凶，莫说抢，就是不转眼地死盯着，也够你心里发毛的。”

太阳沿着峭壁继续上升，可蜷伏的金沙江还在脚底，那种波涛的深呼吸不时窜过耳，令人的神经隐隐颤动。我信口一问：“那儿是？”向导也信口答道：“与打车村接壤的，是黄草坪村，它在金沙江和普渡河的交叉处；而过了金沙江，则是四川大凉山的会东县。当年红军长征，被国民党围追堵截，就从这不毛之地过江，窜去四川，皎平渡口现在成为革命遗址，很著名，离这儿不过十几里路。”

“那两省人民来往挺容易。”

“是啰，金沙江两边的场口数不清，土匪也数不清啰。刚解放那阵，毙了好几百，局面才平稳下来。”

由于交谈分神，我又屁股着地了。孙医生拉我起来，安慰说快到了。的确，绕过了一块弯曲的庄稼地，眼前出现了一堵依坡坎而建的赭红石墙。我们从墙根边爬到墙头，自旁门进入院落，一个戴军用棉帽的焉巴老头倚柱而立，用无比愁苦的眼神打量着不速之客。向导为彼此作了介绍，老头就热情地邀我们进屋。

我口头答应着，但双脚却迟疑，目光习惯性地乱溜。此时我站在赭红石墙之上，望着天边的群岩与云雾纠缠，犹如锁在时间深处的变形的古兽，时而露头，时而露爪，时而将尾巴凌空扬起，于是明镜般的天顶被破开一道裂纹……

孙医生与我并肩而立，目光却朝下，死盯着石墙根的猪和鸡，它们都被圈定在脚下两人深的露天囚笼底。浊臭一阵阵升腾，不仅薰退了我们，还提醒此行的目标——他还是一脸愁苦，在门后袖手等待。我连忙道歉，跟着跨入门槛，在一派昏暗里坐了

下去。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乘老头埋腰地坑，呼呼吹木炭余烬之际，掏出录音机放在膝上。

老威：你是地主吗？

李正才：不，我是贫农。

老威：贫农？

李正才：是啰，1952 年土地改革，是根据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划的阶级成分。

老威：你们家一直是穷人吗？孙医生经常来这一带，据他了解，你的身世非常悲惨。

李正才：都过去好多年啰。

老威：我是写书的，你不想留个记录下来？

李正才：莫提了。

老威：你信主吧？

李正才：信，如果没信，我只有去死。

老威：为什么？

李正才：你看见了，解放几十年了，我们家还是破破烂烂，没一个女人。父母去得太早，剩我一个孤儿，好不容易托人介绍，当了上门女婿，可老婆又饿死了；把儿子丢给我，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拉扯大；为了娶儿媳妇，我耗光全部的积蓄，原以为可以勤劳致富，打翻身仗了……可三个月前，媳妇又得病死了，活鲜鲜一个人，突然得病，几个钟头就不行了，连得了啥病都晓不得！丢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娃儿，一门三根光棍，哪个来疼哪个来怜……日子还长啰，我又得了寒湿，浑身不自在，不信主咋得了……

老威：唉，老人家你别难过了。

李正才：呜呜呜。

老威：人活的就是精神，你现在信主了，有精神支撑了。

李正才：我天天都祷告，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孙子。也为我自己早日解脱，去天国见主。我晓得，我没有，也拿不出啥去荣耀主。我只是在赎罪，我恳求主将所有的罪加在我的身上，包括我爸爸和妈妈，包括我老爹和奶奶。我 1937 年生，同志你看，这

是我的《身份证》，我们家出事的那年，我才 11 岁……

老威：1949 年？

李正才：记不太清了。那年的冬天，也像这样的天气，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爸爸天不见亮就起床，在院坝里抬头望了望，然后对妈妈说，有星星啰，是个晴天。妈妈就说，那就早点出门去赶街嘛。当时在金沙江两边，有一二十个场口，父母心情好，就商量着要去赶河木口。

老威：河木口？

李正才：是金沙江与普渡河交叉的一个场口，属于云南东川，江对面是四川会东。那天爸爸妈妈带上我们三弟兄，高高兴兴上路。开始还点着火把引道，爸爸在前，妈妈背着 5 个月大的小弟在后，我和比我小 1 岁的二弟在中间，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在羊肠小道上旋来旋去，后来天麻麻亮了，爸爸才熄了火把。

我爸爸个子很高大，比现在的我还高半个脑壳，膀子很粗。据村里人说，在我还没出世的时候，爸爸曾乘着酒兴，与一头大牯牛扳角，大牯牛红了眼，拼命要将他挑起，他就用那两条粗膀子，死死地压。太惊险了，如果压不住，让牛头翻起来，他的胸脯肯定叫牛角戳穿，牛蹄也要跟着上，那人不成肉饼也成肉酱。但是爸爸他压了十几分钟，硬是把大牯牛给压跪了，最后猛一扳，大牯牛就四蹄朝天仰在那儿。这次比赛，我们家赢了一座院子。

老威：你们的家境在那时还算不错吧？

李正才：日子过得去。可爸爸他酒量大，脾气坏，喜欢赌博，所以在金沙江两边的场口来来去去，暗中结了一些冤家。妈妈挺担心的，但爸爸说自己人正影子正，不太在乎。所以出事的那天早上，爸爸嫌娃娃们步子慢，还扛着我和二弟走了几里路，直到望得见场口，才放下地。

老威：看来你爸爸心情很好。

李正才：他沿途都在吼山歌，说山歌能将蛇和野兽吓跑。坡下完了，金沙江水的味道都能嗅到了，平地突然起了一阵怪风，从脚底下往上翻着吹，我和哥哥站不住，急忙抱住爸爸的腰。眨眼间，刚刚露面的日头被裹进云里，雨点噼噼啪啪打下来。这就是大江边的气候，比娃娃脸还变得快。妈妈说，这不是好兆头，当家的你可得当心点啰，国民党共产党打来打去，云南四川的土匪也两边抢。日子不太平，我们最好是早去早回。爸爸说，没事，拢了场口，自然要找老相识，摇几把骰子，碰一下运气。妈妈问爸爸到底带了多少钱？爸爸嘿嘿笑了两声，妈妈就不吭气了。我却感觉到爸爸的腰里鼓出一大包，估计都是银元。

老威：你爸爸是老赌徒了。

李正才：那年他才 36 岁，一点不老。况且世世代代，只要是彝族男人，就没有不赌

的。软赌硬赌，穷也赌富也赌，天晴赌天阴也赌。如果手气不顺，或叫人做了手脚，赌毛了，就你一刀我一刀，在手臂上肚皮上划；甚至你一头我一头撞桌子撞墙。女人家根本不敢发杂音，因为男人一旦输了，面子下不来，就打老婆，打孩子，气再不顺，就把老婆孩子当宝给押了。

老威：你爸爸不至于这么疯吧？

李正才：爸爸他不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他在中间是顶梁柱。他脾气虽然坏，却有老爹和奶奶管着，出门之前，都让他将裤档、衣服抖了又抖，把多的钱留下来。

老威：他还算个孝子。

李正才：那次出门却是个例外，他乘老人家还没起床，比平时多带了一两倍的钱。他对妈妈说，局势不太稳当，谁晓得明天会咋样，所以要多赚一些银元在手上。那时，河木口的黑赌场很有名，明的暗的，稍微有点背景的人家都设局。爸爸他拢了河木口，领着我们，马马虎虎赶了一个来回的街，然后将一把零票塞给妈妈，吩咐说，买几斤盐巴，扯几尺布，再给娃娃们买点糖果果。妈妈还想说啥子，爸爸就摆摆手，像根粗泥鳅，在人流中钻不见了。“才 9 点多钟，慌啥子啰。”妈妈嘀咕着，只好把我和二弟拽到阶沿边，放下背兜，给小弟喂奶。

那时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场口旁边的金沙江也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妈妈买了盐巴，扯了布，又带我们在鸡肠子一样的街上挤了好多个来回。饿了，糖果果填不饱肚子，妈妈又在街边大灶给我们买了两碗热腾腾的烧肥肠，我和二弟吃得满头大汗。

过了正午，赶街的人就少了一大半，从前的话，要到偏下午人才会少。妈妈连连叹气，不太平啊，不太平啊。就带着我们挨家挨户地找爸爸，却越急越不见人影。终于，百多米长的街面空了，店铺也接二连三地关门，稀稀拉拉的人，稀稀拉拉的雨。妈妈抬头瞅了瞅天色说，快 4 点钟了，你们先到渡口去等着。我问，妈妈你呢？

妈妈不回答，接着又不耐烦地催促，娃娃家莫管大人的事，快去快去！

我和二弟几步一回头，妈妈留在场口，继续打听爸爸的下落。去渡口还有一段路，我们走了 20 几分钟，还眼巴巴地望着渡船来回了好几趟。太阳依旧时隐时现，金沙江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虽然我们是娃娃，心也提在喉咙里，那滚滚的江水更叫人发愁。船老大吼了几次，两个娃儿，过不过？再不过，就过不去啰。这年头，兵多匪也多，当心遭抢哦。我说，谢谢船老大，我们不去四川那边。

我们盼呀盼呀，父母到底赶来了，可神色很慌张。拢了跟前也没二话，爸爸一手拽起一个娃儿就跑起来。就这样，一家四口沿着普渡河边跑了两三里路，才刹步歇气。妈妈边给小弟喂奶边说，当家的你咋去那种地方啊？爸爸说，我钻了十几个窝子，都赌纸票，唉，纸票天天贬值，弄不好明天解放军打来，就成废纸了。我总得找一个赌银元的去处。妈妈说，那些人太凶神恶煞，我一探脑壳进去，刀子就拢下巴了。爸爸说，一个妇道人家，乱钻个啥？不懂门道不懂规矩。妈妈说，你是顶梁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爸爸说，有个三长两短你又能咋样？妈妈就哭了起来。爸爸说，好啰，

嚎啥子丧嘛。不是我不想走，是人家不让走，我赢了钱啰。甲乙丙丁方下的赌注都大，我的骰子一甩，连着两个清一色，外加一个最大点，不到半个钟头，包包就鼓得不行了。接下来，庄家搞联合，要让我吐渣，熬得昏天黑地，俗话说，输家不开口，赢家不准走嘛。我故意吐了些小钱，还打躬作揖，口称得罪，因为终归是要走的。放心啰，我的胆子肥，气力大，狗日的再有背景，还虚火我几分。你都看见了，我说声告辞，哪个敢拦我？

扯着闲话，父母又领我们赶了一截路，天就黑尽了。我们在河边的岩洞里歇了一晚，又冷又饿，却不敢生火。天亮时吃了点干粮，准备继续走。爸爸口渴了，就钻出岩洞，趴到河边饮水。他的整张脸都埋入水里，一家人站在后面等他。爸爸食量大，喝水也多，我还看见他的后脑勺腾腾冒热气。这一刻，我真是终身难忘！因为嗖的一响，一颗子弹从我们头顶射下来，击中了爸爸的背心。血如箭一般喷出，爸爸浑身猛抽了两下，一只手臂抬起来，划了个半圆，又哗的落到水面。

血随着河水淌了好远，我们都惊呆了。好像变魔术，转眼从大树顶，从石头后，甚至从河中的礁石缝里，钻出了 10 来个包黑头帕的土匪，有的端枪有的举刀，哇哇叫着包抄过来。爸爸又挨了十几枪，腰里的银元包裹被搜去。有个土匪开枪打断了妈妈的腿，当他还要补枪时，脸上有条刀疤的土匪头吼了声“莫浪费弹药”，就上来卡住妈妈的脖子，在她的前胸后背戳了一二十刀。二弟也被戳了一二十刀。鲜血把菜刀地面全染透了。

老威：什么？

李正才：菜刀是一个地名，遍地乱石头，连根草也不长。估计河木口设赌局的本来就是土匪，或者勾结土匪，经常干赌得赢就赌，赌不赢就抢的勾当。他们撂翻我爸爸，剩下的就好解决了。

老威：那你是如何逃脱的？

李正才：我才十一二岁，都骇得尿裤子了，哪敢跑？全家人都躺在地上，血淋淋的。妈妈太惨了，身上那么多洞，还没断气，手还去抓背兜里的小弟。我的小弟啥也不懂哦，哇哇哇，一抽一抽的哭。土匪头过来，嫌我妈妈的手碍事，挥刀一砍，妈妈的手就飞到河里，一浪一浪飘远了。

老威：他们连吃奶的娃娃也不放过？

李正才：他们没杀小弟，只是掀翻背兜，像倒一麻袋洋芋似的，将他倒在妈妈身上。小弟在妈妈周围又爬又哭又抓，一会儿也染成血娃娃了，他啥也晓不得，还在找奶吃啰。听人说，小弟熬到第二天才死的，晓不得是饿还是冷，到死嘴都张着，脸上的泪都冻住了。

土匪嫌背兜底有奶娃儿的稀屎，就放河里漂洗。土匪头还叫我过去，当着我的面，从屁股后抽出一把小刀，在鹅卵石上磨了磨，就一点一点，很仔细地割我爸爸的脑袋。他割了十几分钟，终于自脖子根，整整齐齐地割了下来。这时候，爸爸脑袋里的血已

流尽了，看上去白惨惨的。土匪头捞出背兜，将手中提着的脑袋丢进去，然后命令我“背起来走”!

我眼前一片空白，屎尿拉了一裤裆，却啥也晓不得。土匪头吐了口唾沫，将爸爸的无头尸体蹬入水中，顺势踹了我一脚，小杂种，等死么，背起来走！

我打了个寒战，只好背起爸爸的脑袋。土匪们牵出骡子和马，都骑上去，只剩我一个小娃娃在地上走。天还是时阴时阳，爬坡的时候，我的鞋子脱了一只，要埋腰去捡，土匪从马背上一绳子抽过来。莫办法，我就光着脚板，一拐一拐在林子里窜……

老威：你走了多久？

李正才：两天两夜啰。头天晚上歇韭菜地（地名），住的还是岩洞。土匪们栓了马，在洞里生了一堆火，就围着喝酒吃干肉；我却被捆在一边，守着我爸爸的脑袋过夜。

老威：你睡得着吗？

李正才；一个娃娃跟着骑马的土匪，拖了一整天，还有不累的？土匪丢给我一块粑粑，我几口就下肚，然后往背兜里一栽，与爸爸头抵头，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土匪们在笑我没心肝，真是一报还一报。

老威：什么“一报还一报”？

李正才：当时我也不懂啰。后来听说，在一年前赶街时，算命先生就给我家拿过脉，料定有血光之灾。我爸爸问咋个消解？算命先生提醒说，少赌博，少得罪大户啰。不要怕穷，熬到江山改了，你家就转运了。

老威：后来呢？

李正才：后来天蒙蒙亮了，土匪又揪我起来，背着爸爸的脑袋走了一整天。

老威：你这一路上害怕吗？

李正才：我害怕走不动，土匪要打我。但是人再咋个卖力，也撵不赢骡子和马，所以差点就被累死了。当然，我恨土匪，做梦都想报仇，可当时没啥子办法，为了活命，是泡屎也要吃。终于走到撒营盘和则黑交界的一个地方，天晚了，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土匪们就在林子里燃起一堆篝火，准备安营扎寨。这回他们没把爸爸的脑袋与我弄一块，而是高挂在一棵大树上。在篝火的映照中，爸爸的脸很白，两颗眼珠子挺出来了。

我虽然是小娃娃，可也感觉到快到尽头了。我的寒毛都竖了起来，因为那一个个土匪面露凶光，搞不清楚他们如何对待我。放回家，还是杀掉？腿发软，跑不动，也不敢跑，所以最后只有打哆嗦的份——饿也忘了，土匪给的粑粑也咽不下。

老威：像圈在笼子里的待宰的动物。

李正才：差不多，像猴子、猪、狗一类，看见周围的同类被杀掉，连气都不敢出粗了。土匪们还拿我开玩笑，说娃儿啰，你爸爸的脑壳挂在树杈头，看得清哦？想不想给他喂口饭？还说，你咋个不哭啰？都绝户了，还不哭，是不是骇成傻子了？

那两天，我莫说哭，连屁也不敢放啰。直到翻过这个坎，我才哭了很多场。后来，回想一辈子这么苦，我有流不完的泪啰。

老威：可你还是活下来了。

李正才：多亏杨区长和张乡长赶来了。当时，土匪用绳子的一头绑住我，将另一头甩上树叉，然后一拉，我就腾空起来，与爸爸的脑袋一般齐了。土匪们在下面手舞足蹈，还边看边指挥拉绳的家伙，再高些，太高了。你这蠢驴，往右拉，让娃娃往左靠，死活两颗脑壳就挨着啰。

我与爸爸脸贴脸，如贴着一块冰。土匪们仰着脖子爆笑，看这个双头怪物嘛！那片大林子里的乌鸦被惊得噗啦啦地飞。土匪头还掏出匣子枪，哗啦啦地弄扳机，吓得我双腿猛蹬，却落不了实。正晓不得土匪到底要干啥子，那边，区和乡的保安队都出动了，几十个人在林中悄悄围拢，把土匪包抄住。突然，有个声音喊道——山贼们听着！马上放下武器，原地不动！谁动谁死！

眨眼间，天地都不出气了。静了几秒钟，土匪头回了一句，你是啥子人？那个声音又响了——我是永山区（撒营盘）区长杨心林，这位是永安乡（则黑）乡长张应心。你们吃了老虎胆，敢抗拒官府啰？

土匪们立刻魂飞魄散，稀里哗啦地缴械。杨区长从黑影子里现身了，个子很高大，他叫人放我下地，一松绑，我就软在火堆边。杨区长又让人拍醒我，喂我喝的吃的。跟着，派人连夜送我回家。

老威：那时的官府怎样处理土匪的？

李正才：他们当场没收了土匪的武器、骡子、马，还有抢来的金银财宝，接着就绑起来押回则黑了。我那时太小，加上遇这种顶破天的事，都蒙了，所以晓不得土匪们的下落。

回到家中，才晓得老爹和奶奶都卧床不起，没几天，他们全气死了。奶奶落气时，把死在她前面的亲人都挨个喊了一遍，最后说“我也来了”。

如果我懂事，说不定也不想活了，可我只有十一二岁，只能傻子一般往下活。如今我 69 岁了，爸爸那被割掉的脑袋还经常出现在梦里，我拜祭他，给他烧了数不清的纸钱，也不管用。那脑袋毛毛的，白白的，在我身上滚来滚去，永远也甩不掉。

老威：你感激解救你的杨区长和张乡长吗？

李正才：在旧社会，他们是官府，应该保一方平安；到了新社会，他们成了恶霸大地主，成了罪人，叫人民政府枪毙掉——我是贫农，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即使心里同情，表面上也要做出苦大仇深的样子。

老威：我昨天刚拜访了杨区长的遗孀，已 84 岁的张美芝老人。她说她也永远甩不掉被割掉舌头的丈夫与哥哥。

李正才：她的确吃过太多苦头，与我一样，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啰。愿主降福予她。

老威：也愿主降福予你。

补记

李正才在交谈中多次哭诉自己解放后的不幸遭遇，比如孤苦伶仃，做上门女婿，饥饿，老婆死后拉扯儿子，几个月前儿媳妇突然夭折，等等。其间，他瘦小的儿子回家了，还抱着更加瘦小的孙子。三根光棍靠一块，李正才最高，他儿子要矮半个头，他孙子的生长期就长了。冥冥中，我仿佛看见李正才的爸爸，膀阔腰圆，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高——这种倒退着的遗传似乎暗合了拉丁美洲魔幻小说《百年孤独》里的结尾，庞大的布恩地亚家族经过上百年演变，最后只剩下一个耗尽了繁殖能力的长猪尾巴的婴儿。

那是在遥远的亚马逊河边兴衰的家族，而我眼前则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边的一个彝族家庭，但两边的故事可以互相置换——割头、砍手、赌博、绑架、改朝换代、因果报应、祷告——某种注定的灾难的力量涵盖或扭曲了那时那刻或此时此刻。

我问，不是已经解放了吗？经历过 1952 年的土地改革，你成了贫农，新政权的依靠对象了。李正才立即反驳，啥子解放啰，比没解放还穷还坏。我是贫农，好些在旧社会当过土匪的也是贫农；在江两岸场口赌博，输得倾家荡产的也成了贫农。地主斗久了，没啥子可斗的了，就贫下中农之间互相争互相斗啰。人懒土地也懒，没得吃，一样地偷抢杀。

我们的向导见李正才情绪激动，就接过话题道，这儿不比汉族地方，地主的财产是靠几辈人积攒，有时也存在剥削。彝族地主特别惨，因为他们曾经是金沙江两岸的赌博高手，过去赌博致富，一解放，从前的输家翻了身，就将他们往死里整。比如刚才提到的永安乡（则黑）乡长张应心，就是闻名一时的赌王，听老一辈讲，他曾与四川昭觉境内最大的财主赌骰子，搞了一天一夜，都红眼了。那个财主把自己全部的金银财宝押上，驮了 20 多匹马；张应心呢，不仅押了全部的财产，而且还押上一条命。他说，这一把输了他就不活了。结果对方眨眼间变成穷光蛋，大冷天单衣单裤，走路回家；张应心却变成则黑首富，乐善好施了多年，可叹不得善终。

闲聊间，不觉日已当午。李正才热情留饭，并称已杀了一只鸡。我们只好又共进了一顿基督教徒的午餐，圣歌和祷告都免不了的，但在用餐时，出于职业习惯，我还是问了不愿下山的土匪在解放后的命运。李正才说，骗啰，政府派人去谈判，保证下山后，啥事没有，该分地就分地，该讨老婆就讨老婆。等到上套了，就突然翻脸，统

统枪毙。工作组长教育我们，这叫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大家都笑了，孙医生道，这叫以土匪的办法对付土匪吧。

饭菜很香，我不好意思，就付了 100 元人民币，李正才的眼睛再一次湿润。在告别之际，他将我们送出相当远，然后按彝族人的习惯，一个人蹲在正在铺修的土路边，一再向渐行渐远的客人招手。我们爬了 10 分钟的坡，一回头，他还蹲在那儿；爬了 20 分钟，再回头，他还在那儿，只一颗黄豆大小。我掏出相机，将他往自己胸前拉，我后悔只与他握了手，没有使劲地抱一抱。

我对我的访谈对象太克制了，长此以往，人是否就会炼成钢铁？

地主后代刘金琴

采访缘起： 2006 年元旦，我在则黑乡逗留。再次拜访了地主遗孀张美芝一家，在玻璃般透明的阳光下拍了些照片。我对孙医生说，应该采访几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从所谓的正面了解一下土改。孙医生点点头，答应等下次继续，因为这次他还要在春节期间跑好几个乡，时间比较紧张。

2 号一早，我又在晨曲《东方红》的聒噪中起床，孙医生也醒了，执意要送我赶早班车。我们在鬼火般的路灯里穿出教堂，一溜小跑，然后拥抱作别。

汽车启动了，接着又连续颠簸了两天，我回到在云南的暂居地。整个骨头架子在嘎嘎作响，而女友却有些怨声，因为我每次外出，都不能如约归来。“在花花世界呆着很爽吧？” 她挖苦道。我自然以傻笑应之。

接着，为了弥合代沟，我对她讲述了一路的见闻。我知道她有 10 年乡村生活的记忆，不会如绝大多数 80 代的年轻人，只活在当下或潮流里面，不仅对土地改革，甚至对反右、文革、六四屠杀的反应都很淡漠——目前风靡一种叫“斗地主”的扑克游戏，所以一提“地主”，人们想到的肯定是娱乐。

没料到女友的脸部竟浮现起一种与她的时代背景不太协调的沉思。她开了瓶啤酒，吹了一口，又开始数手指头。我知道她的精神强迫症犯了，其实，每一个在孤独中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有程度不同的精神强迫症，我在童年也酷爱数数，指头、蚂蚁、树枝，还有自己的汗毛。直到现在，我也与公众社会有些格格不入。

这是 2006 年 1 月 4 日夜，我的女友开始讲述不幸的童年及更不幸的地主的故事。由于录音机故障，我又极不人道地在 5 月 8 日和 7 月 9 日的昼夜，让她重复了两次。

她控制不住，发火了。拿鲁迅的话说，我感觉自己活在非人间。

老威：你是哪一年出生？

刘金琴：1980 年 1 月 31 日。我的原籍是湖北省枝江的安福寺，属宜昌、枝江、当阳三县交界的丘陵地带，物产还是比较丰富，不像你寻访过的那些狗吃屎的大山沟，穷得令人恐怖。

老威：这个种族是非常健忘的，对地主、贫农及土改的记忆，如今连 40 岁左右的人都已淡漠了，可你一个如此新潮的 80 代人，居然还……

刘金琴：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亲生父母都是城里人，至今还住在枝江。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安福寺上面的刘家冲当知青，并因此与我养父成为朋友。后来，文革结束，知青返城，我父母结合，就有了我和我弟弟。但是，80 年代初，政府抓“计划生育”，挨家挨户查超生子女。宋丹丹演过一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内容就是农民为了逃避罚款和强制坠胎，背井离乡，四处流窜，连几千里外的新疆都去了。

老威：我也看了这个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的小品，同全国人民一样，被宋丹丹演的农村妇女逗得哈哈大笑。过后还模仿她那土得掉渣的腔调——老三叫“吐鲁番”，老四叫“海南岛”——却没意识到那种暴力笼罩下的惨叫已被几亿人的嘲笑所淹没。

刘金琴：总之，按政策，一户人家只能生一个孩子，违者重罚。所以我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在风声鹤唳中，把我送到乡下，过继给人家做养女。生父和养父有交情，可深浅如何我不知道。

老威：你养父家有孩子吗？

刘金琴：没有。他是条老光棍，头上只有个母亲，日子本来就非常苦，又添了我这么一张小嘴巴，就苦得没法说。我在养父家呆了 10 年，不懂得什么叫温暖，更别提宠爱了。住的是土坯房子，经常漏雨；吃就更马虎了，油炒饭，加一点鸡蛋就算锦上添花。很少有菜，乡下人都图省事，因为要忙农活。我在农村十余年，可能将一辈子的油炒饭都吃尽了，就如你在监狱中天天吃土豆和南瓜，过后一见那种熟悉东西，就反胃。

我走路还摇摇晃晃，就要干活儿了。婆婆煮饭，我站在灶前烧火。那老人家已六、七十岁，弓着腰，一张树疙瘩脸都栽进锅里了。我这边柴草火没架好，一冒浓烟，就熏得她眼泪、鼻涕直淌，最后都坠入饭里菜里。还有半瞎的红眼睛，糊满眼屎，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恶心，可当时，一个单纯小姑娘，还是觉得婆婆的饭蛮香的。

与农村孩子一样，捡柴、打猪草、捡花生、捡野菌，我什么都干，也不敢说不干。就这样，我就泥一把灰一把成长起来了，脸从来没干净过，头发虱子成堆。由于地处山坳，又是单家独户，所以性格就一天天自闭。

老威：你的精神强迫症就是这样炼成的？

刘金琴：也许吧。可能是童年的环境太脏了，所以我现在有洁癖，一见到脏东西，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有自言自语，还有自己强迫自己数数，1、2、3、4、5、、

6、7，不数就过不去，压得心脏直抽。

老威：接下来呢？

刘金琴：孩子嘛，还是怕孤独的。我要花好几分钟，才能从单家独户的哑巴环境里走出来，到村落里去。可其他孩子老是欺负我，不和我玩。

老威：你好歹是从城里落难的灰姑娘，农村孩子还嫌弃你吗？

刘金琴：所谓“刘家冲”，就是一条河冲积而成的这个村庄都姓刘，他们世世代代繁衍，有共同的家谱和宗祠，所以从骨子里很排外。我上小学是在邻村的赵家冲，两个村的同学都经常在路上伏击我，把我推倒，往我身上糊稀泥巴。加之养父是地主家庭……

老威：我记得早在 1979 年，中共中央就宣布给地主和富农揭帽了，怎么到了 80 年代，还在搞阶级歧视？

刘金琴：不明白。我 7 岁上小学，语文老师还在课堂上讲，地主如何剥削，如何惨无人道，大年三十如何带着狗腿子，上贫下中农家讨债，掀房顶，抢女人，逼得人上吊等等。听得孩子们非常气愤，恨不得早生几十年，跟着共产党、解放军，亲手将地主消灭干净。直到放学回家，我还心潮澎湃，拉住婆婆的衣角问：“你见过地主吗？地主为啥那么坏？”不料婆婆翻了我一眼：“有啥稀奇？我们家就是地主。”当时，我犹如挨了一闷棍。婆婆又说：“如果不是成分高，你大爹也不至于这么大岁数还娶不上媳妇。”我心虚地嘀咕：“不可能吧？”婆婆说：“有啥不可能？刘家冲有十几户地主呢。教你认字的驼背爷爷就是地主，对你最好的大妈家更是大地主。”

我真叫弄糊涂了。驼背爷爷的老伴是聋子婆婆，都是好人啊。由于路太远，中午不方便回家，养父就把我安排在学校附近的老两口家吃饭。驼背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他给我讲故事，还教了我不少成语，什么“登高望远”“冬虫夏草”“月白风清”，可以说，我最早的文学基础就是他替我打下的。当我背着手，大人一般清清喉咙，在一群邋遢娃娃中间“出口成章”时，连老师都在一旁吃惊。

老威：直到现在，你说话也爱用书面语。

刘金琴：对呀。多年后，我还梦见自己坐在驼背爷爷和聋子婆婆中间吃饭，他们的对话在头顶上，跟打雷似的。驼背爷爷做过国民党军队的书记官，解放前夕回到家乡，本来没什么田产，可因为“历史反动”，就打成了地主。他们本来有一个儿子，可不知在哪一次政治运动中，不堪折磨，跳江自杀了。儿媳妇也改嫁了，带走了两岁的孙儿。听说这个孙儿长大后还回家看过他们两次，但那种血缘感情已相当淡漠。终于有一天，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被送进地狱般的乡敬老院，没多久就死在里面。

由于太孤独，老两口把猫和鸡都当成孩子养。咯咯一唤，小鸡就会跳到他们手上来啄饭粒；那只猫已养了十几年，毛色还比较鲜亮，可见老人对它的无微不至的关爱。猫儿太通灵了，人一叫，它就喵喵答应；老人每天与它说话，喂了饭还替它擦嘴，唉。

老威：为什么叹气？

刘金琴：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觉得这些事犹如发生在几百年前，可又像发生在几个钟头前。

老威：这是你印象最深的地主吗？

刘金琴：影响我一生的地主是大妈——这是按当地的辈分叫的，她其实已经很老了。

老威：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深入接触一个很老的地主婆呢？

刘金琴：她的学名叫张世秀，旧时代的女子都喜欢取这样的名字。我与她特别投缘。

老威：她家里有几口人？

刘金琴：她还有一个儿子和儿媳妇。她的儿媳妇被搞计划生育的人结扎了，不能生孩子，这成了她最大的心病。所以，她第一次见我这么个小不点，就感到亲，把我当作自家的孙女。

老威：她当时的家境如何？

刘金琴：住的是瓦房，比我养父家好。由于在单家独户呆不住，我从小就经常溜出来，沿着田梗去邻居大妈家。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妈还是很慷慨，时不时抓花生、豌豆、瓜子给我吃。有时怕儿子发现了要骂，就把东西揣满我的衣兜，让我赶快从后门逃走。大妈用一种植物的根搅的凉宵最好吃，长大后，我还时常想起那酸酸甜甜的味儿。

大妈的白发用油或者水，梳得光光的，衣服尽管旧，可总是十分整洁。因为屋里屋外一把手，农村妇女无论老少，在平常都有点蓬头垢面，大妈往里一站，就显得鹤立鸡群。可能是没人说话，她也不管我年幼无知，三天两头拉着我唠叨。我边吃东西，边把她的唠叨当故事听，一年两年三年，她在我耳边重复了几十遍，我不想记也牢牢地记住了。

大妈早年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美女，身世却跟林黛玉差不多，幼年丧母，家道中落，不得已，她外婆就把她接到舅舅家来住。她舅舅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她跟着院里的孩子，入私塾，天天念《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温习唐诗宋词，操练琴棋书画，甚至涉猎算术和天文。待长大出阁，由于没母亲，父亲也长年在外，舅舅就拿着她的八字，替她作主，与刘家冲的首户结下姻缘，算是门当户对。

当时刘家冲一大半田地都是属于她婆家的。可她本可以做富家公子的丈夫却不稀罕，偏偏信奉胡适的教育救国，去做了新派的教书先生，拿着家里的钱，到更偏僻的山沟办平民学校。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夫家 4 弟兄，都跑到外面去，读书，经商，参加各种思潮和运动。这有点像巴金的《家》中描述的，老爷子艰难支撑家业，差点

就找不到一个中规中举的继承人。

大妈一讲起过去，昏花老眼就放光。做姑娘时，虽然足不出户，可也受进步思想的冲击。比如裹脚缠到一半，舅舅从武汉回来，跟外婆嚷嚷，不让缠了。所以直到晚年，她的脚还是半大不小。她说，幸好没成三寸金莲，否则日后跟随夫君东跑西颠，就会很惨。

中国太穷太大，所以她先生虽然有理想，肯花心血，甚至饥一顿饱一顿，但对于偏僻山区的若干孩子，无异于杯水车薪。在解放前夕，她先生终于积劳成疾，撒手尘寰，丢下难于割舍的老婆和 4 个年幼的儿女。

大妈又回到刘家冲，打算守寡终生，学孟母教子，将儿女培养成夫君那样的人才。不料眨眼之间，天下就姓共；穷人翻身闹革命，大妈婆家和娘家都被划为大地主。公公婆婆死于非命，田产、宅院全叫瓜分了，连倾向于共产思想的叔伯弟兄也未能幸免于难，自革命队伍清洗回原籍，沦为天天挨斗的四类分子。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妈被赶出传了几辈人的刘家大院，带着孩子挤在以前叫化子住的破房子里。1952 年，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大妈被关押起来，大会小会挨斗；与其他地富分子一道，戴着高帽子游街，还陪过恶霸地主的杀场。

那时，一个小小的贫农组长都掌握着大妈他们的生杀权。我这个年纪的孩子，真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竟有那么刻骨的仇恨——组长将大妈吊在大树上。你知道怎么个吊法？是将大妈右手的拇指用麻绳缠紧，然后单臂高吊——大妈当时是个 20 多岁的妇女，由于历经折磨，已皮包骨头。可再瘦，她也有几十斤啊！一根指头悬几十斤的重量，下面的人一松手，大妈就吼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一种怎样刺耳的叫声啊，像挨宰的母狼被扼住喉管的一瞬，嗷——！刀子一样尖利，又突然折断，跟着，整个身子都在晃荡中噗噗冒泡，白沫和舌头都从嘴里直喷出来，吓得围观的人们缩头闪避。据一位当事者说，大妈的舌头挂在外面两三分钟，才一颤一颤朝里缩。有个人将一根树枝戳进去，以免她咬掉舌尖，只听得喀嚓一响，树枝真断了。血滴、汗水、鼻涕不断线地淌，屎尿也嘀嘀嗒嗒地淌……

老威：如此惨状，人们看得下去吗？

刘金琴：人们看得可高兴了，还鼓掌呢。接着，组长指挥大家，拉成长队，用木桶从河沟里打水去泼大妈。连泼了十几桶都没醒，又接着泼，直到醒了，呻唤了半声，脑袋又耷拉下去。

老威：吊了多久？

刘金琴：不知道。

老威：这样搞下去会出人命的。

刘金琴：大妈的生命力够顽强，不会轻易死。

老威：我的朋友芦苇是电影《活着》《霸王别姬》的编剧，他为了搜集电影素材，曾到陕北老革命根据地采风，据他了解，当时的土改也很可怕。当过中宣部高官的著名作家陈ＸＸ也当过工作队长，只要姓陈的一下乡，土豪劣绅的屎尿都得吓出来——因为此著名文人之著名一招，就是先把人捆起来，使其动弹不了；再将油煎得透熟；最后才挽起袖口，柔声细语地审问金银细软的去处。不招，他就笑着拿起一只调羹，从烟熏火燎的锅里舀起熟油，往人肉上浇。

刘金琴：你一说，我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老威：大妈后来怎样了？

刘金琴：她成了终身残废，右手抬不起来，拇指变为一截麻花。可组长还不放过她，连耕田也用一根绳子把她牵着。

老威：押着她劳动吗？

刘金琴：消遣。组长说，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逼着我们做长工，还到田头地尾监视我们。今天，穷人翻身作主，我也不让地主婆做我的长工，我要让她继续做地主婆，监视我吆牛犁田。

老威：什么意思？

刘金琴：就是在田埂上铺一层碎瓦渣子，叫大妈头戴纸高帽跪在上面，脖子挂一尿罐。不准抬头，不准耸肩，连眼皮也不准抬。

老威：这样折磨人很有乐趣吗？

刘金琴：受过种种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大妈却忍着，事隔多年，也没好意思对外人讲。
老威：那你怎么知道的？

刘金琴：大妈的邻居，我的婆婆，总之，与她差不多年龄的长辈都知道。他们经常当饭

后茶余的龙门阵，讲得眉飞色舞。那时的农村又没什么娱乐，老爷爷老婆婆就聚一块，东加长西家短的。我和大妈感情好，所以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威：后来呢？

刘金琴：日日都有民兵看管，大妈回不了家，孩子没人管，全完蛋了。

老威：什么叫全完蛋了？

刘金琴：4 个孩子，老大才 5 岁。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刘克润，饿得实在受不了，就离家出走。这孩子算机灵，沿途只要有人户，就跪下去磕头乞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的乱叫一气。人心都是肉长的，隔了山隔了村，没人知道他是地主的崽子，就给些吃的。他饥一顿饱一顿，夜里歇庄稼地或岩缝，白天就凭着动物本能，顺着路或路的印子向前走……

老威：5 岁的孩子，不想家吗？

刘金琴：他的 3 个弟弟妹妹，有个还没断奶，都饿死了。他离开的时候，3 岁半的二弟还没落气，还伸出那枯柴棒子一样的手，拽住他的裤腿说："哥，带我走。"他刚答应一声，二弟的脑袋就歪到一边，有出气没进气了。

他扳开二弟的手指，哭着跑出家门，才十几分钟就眼冒金花。路边寻了些野菜，胡乱朝嘴里塞，眨眼间肚里就翻江倒海。他吐得一塌糊涂，可只有一滩绿水，他就倒在自己吐的绿水里，爬不起来了。幸好一个过路的人丢给他一个糠馍馍，他看也没看就吞了下去。等他坐起来，那个人已无影无踪。黄天厚土，万籁俱寂，连一丝风都没有。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这是蚂蚁和蝗虫都会产生的念头，就是尽可能逃得越远越好。

老威：我两岁的时候，正遇上大饥荒，也差点饿得没命了——从那一刻起，一颗不爱故乡不爱祖国的种子，就在我的骨头里发芽。

刘金琴：5 岁的刘克润，皮包骨头，眼珠子都快顶出来了，可他几天几夜，走了 100 多公里，没回一下头。他终于倒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天蒙蒙亮，主人家开门，吓了一跳，蹲下去摸鼻孔，感觉还有气，就抱进屋里灌米汤——命大的刘克润终于苏醒了——他成了救命恩人，一个贫农家庭的养子，至此十几年没回过老家。

老威：大妈怎样了？

刘金琴：她被斗了 100 多天，直到村里都知道她家出事了，民兵才放她回去。还没进门，尸体的腐败味儿就扑面而来，苍蝇跟炸了营似的。她不管不顾地抱住孩子，张嘴干嚎了老半天，却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泪水；她像个 80 岁的老太婆，头发掉得掩不住头皮，喉咙撕裂得哑了。

这个母亲和她的死孩子们共渡了一宿，除了一盏灯，除了苍蝇的嗡嗡，再没任何别的。村里的人都悄悄拢一块，在不远处议论、猜测，这地主婆到底躲在屋里干啥？有人说，她的娃娃都生蛆了，难道她也等着生蛆不成？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大妈一晚上都在收拾尸体，用竹签将腐肉深处的蛆虫一下下挑出来，像在做极仔细的针线活儿。天快亮时，大妈直了直腰，从家里搜了些旧布，勉强将孩子们裹了，然后，先将老二装进背兜。费了半天劲儿，她才背着老二开门出来，在朦胧曙光下上山去。

她来回搬运了三趟，太阳就升起两根竿子高了。在一面荒坡上，她选了松软的土坎，起落着左臂刨坑。她的右臂已经残废了，她拖着它，十分累赘，可还要以单手举一把小锄头，不断地喘气、刨坑。她在烈日下刨了一上午，三个簸箕大的浅坑浮现了。她将孩子们并排放入坑里，自己坐在坑边歇气；她喃喃说着什么，然后站起来，四处寻

了些树叶和青草，她用一只手将草和叶洒在孩子们的身上。

蓝色的晴空一望无际，一阵呱呱的叫声突然自远方传来。开始大妈还以为是耳鸣，就起劲地钻耳朵，可呱呱的聒噪越来越响，终于如轰炸机一般。大妈猛一抬头，才发现周围的三棵大树上全歇满了乌鸦。她头皮发麻，立即填土，她的左手像上了发条，越动越快。乌鸦们越逼越近，有几只呼地扑到地上，那只最大胆的，甚至凌空划了个半圆，从她的肩头擦了过去。她惊得一弹而起，挥舞着锄头去赶乌鸦，鸦群一炸而起，在刹那遮没了太阳，然后如大把的灰烬，纷纷扬扬地洒下来。她继续挥舞着锄头，直到累跪下，只剩喘气的份。乌鸦也不动了，也不起劲的聒噪了，人和鸦对峙着，大妈丢了锄头，一把一把往坑里推土；还将整个身子扑下去，以肩膀和下巴推土。这个母亲，甚至想将单薄的千疮百孔的身体盖上去，永远笼罩住自己的死孩子，不让他们再受到一丝一毫的糟蹋。

她不知在坑上趴了多久，似乎还最后贴着孩子们睡了一觉。总之，天色已晚，她终于完成了掩埋，连坟包也没力气垒。她下山时，月芽已经上树梢了。

老威：鸦群还没撤退，她能放心吗？

刘金琴：她是不可能睡踏实，据说在午夜的朦胧之间，她还听见了嗷嗷的狼叫。第二天大早，她就赶上山，却惊呆了。昨天的浅坟已一片狼藉，坑里坑外布满狼或野狗凌乱的爪印，可孩子们呢？除了与泥土混杂的碎布，孩子们在哪儿呢？

她下意识地在坑里翻找，又捞起几撮头发，在离坑几米远的树下，又寻着了一地鸟血、鸟毛和一颗牙齿。显然，狼或野狗为了享受尸体，曾与乌鸦有过一场血腥大战，最后大约以狼的胜利告终。

老威：目睹过如此惨状，母亲能活下去算个奇迹了。

刘金琴：她活下来了，并且活了 80 多岁。

老威：是么？

刘金琴：她右手残废，孤苦一人，活着的理由也就是还不死心啊，她的大儿子刘克润还没找到啊。接下来的日子，她跑遍了方圆数百里，逢人便打听，直到十几年以后，才终于知道儿子的下落。

老威：那母子见面，悲喜交集吧？

刘金琴：没有喜没有悲，形同陌路。那已经是 60 年代，快长大成人的刘克润东躲西藏，死活不跟生母回家。可大妈也死活不愿放手。这种拉锯战持续了大半年，终于由公家出面，将孩子断给了生母。刘克润的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他已换了血，成为贫农的儿子，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可转眼间，他还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那时不像现在，还能背井离乡——户口已把人限制死了，去趟县城，住个旅馆，还得由大队党支部开证明呢。可怜的刘克润只好与养父养母抱头痛哭一晚，再跟候在旁边垂

泪一晚的生母走。这一段，我听大妈亲口讲了若干遍，刘克润可谓三步一回头，回头肝肠断。大妈不忍心，就远远坐在一个山坳等。还连着唠叨，造孽啊造孽啊，我也是没办法，除了这个儿我还有啥呀。

老威：亲生母子相守，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过。

刘金琴：可那年头，地主受歧视，刘克润在生产队里抬不起头，就将一腔怒火转移到母亲身上。母子俩要么不说话，要么就吵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成了小伙子后，就因为家庭成分，连找了好多个对象都告吹。

老威：我也是地主的后代，文革当中，我姐姐 20 多岁，出落得如花似玉，本来她按自己的心意，接受了一位解放军连长的求爱，可男方组织上一开展政审调查，发现女方出身地主家庭，马上就对那连长进行严厉批评，“亲不亲，阶级分”。个人那一丁点感情在时代的大环境里算什么？一粒芝麻。

刘金琴：所以刘克润很惨，拖到 30 多岁还是光棍一条，只好一咬牙，去几十里外的另一个生产队当上门女婿。女方是寡妇，拖了两个小孩，并因为计划生育原因，被政府动员去做了结扎手术。

老威：也是个十分不幸的人。

刘金琴：双方刚见面就“相中”了，一说真实情况，“门当户对”嘛。刘可润也不在乎老婆不能生崽，只要互相不嫌弃，就朝老时过啰。当了几年的上门女婿，文革结束，地主也揭帽了，刘可润就带着老婆和白捡的两个儿女，认祖归宗，与母亲同居一个屋檐下。

老威：总算是个大团圆结局。

刘金琴：刘克润倒希望大团圆，但媳妇和婆婆却势同水火。大妈是旧社会过来的大家闺秀，受传统的束缚，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可媳妇却叫结扎了……

老威：她不是有两个子女吗？

刘金琴：但不是亲生的，这让大妈日夜受煎熬，觉得一辈子的苦白吃了，刘家的香火眼看要绝了。婆媳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而儿子总是偏袒媳妇。大妈的脾气越来越古怪，斜吊着右手，似乎与任何人都合不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她的生活的，我生得乖巧，嘴也甜，一老一小相当投缘。大妈一见我，就笑，就叫乖乖过来，于是我就过去靠着她的膝盖坐下。

我抱给养父 10 来年，几乎天天与大妈见面。后来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还时常打听她的消息，因为大妈已经成为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老威：就这样完结了吗？

刘金琴：我常常回刘家冲，名义上看养父和婆婆，其实最挂心的还是她。冥冥中，我和她才有真正的精神血缘。2002 年，她大概有 80 岁了，我从北京回宜昌探亲，一听说她病危，就马上赶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老威：她得了什么病？

刘金琴：人老了，骨头脆了，可有一次，婆媳之间爆发家庭战争，她再次戳到媳妇不生崽的痛处，于是，被激怒的媳妇推了她一掌。她跌倒在地，却再也没有如过去许多次那样，从灾难中爬起来。

她的腰椎和盆骨都摔断了，一下子痛得晕了过去。正高声尖叫的媳妇猛然呆住，直到儿子进门，弯腰将母亲抱到床上，她才回过神，跟过去照顾。

就这样拖了一二十天，大妈根本动弹不了。在一生中，她是个要强的女人，再苦再难，跌得再深，哪怕跌入地狱，都不要人扶持。她是刘家冲少有的两三个知书识礼的女人，虽然穷，却总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干干净净。可是落到这一步，就只能任人摆布。

婆媳间的宿怨永难化解，但是媳妇当着人面，还得摆出无微不至的模样，为婆婆喂水喂饭，接屎接尿。当我出现在门口，那媳妇正从大妈的身子底下抽出秽迹斑斑的尿布，动作很粗野，把大妈的腿都划破皮了。我看不过去，大妈却对我笑，遮羞布扒拉开了，她依旧无所谓地笑。我眼泪快出来了，连忙俯下身去问她需要什么。

我喂她水，她的舌头在满是燎泡的嘴里卷动了两下，然后问我好不好？接着是沉默，接着她又回到从前，时断时续地唠唠叨叨。她说做闺女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矩太多太严，好不容易放回风，与弟兄姐妹上街，竟觉得样样都新鲜。遇上卖洋布的货郎挑子，就一齐围住，比比划划。满意就买下，不满意，也不能妄加评论，直言不好。我只说了声“不对”，也叫外婆听见，立即唤到一边教训道：“大户人家的闺女怎么能说不对？先生没教过你吗？该说不然。”

老威：这算对美好旧事物的回光返照吧。

刘金琴：是啊，我们分别大约三、四天，她就去世了。我不知道她信不信神，或许她已经通过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长长的走廊，回到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旧社会。

民兵主任余学康

采访缘起：自 2006 年初从云南省禄劝县境内采访归来，我一直刻意追寻有关土地改革的人与事。我试图另外找一个点，再度深入，以图在著述里形成地域上的对称。可非常遗憾，知道 1950 至 1952 年土改的中年以上的人比较多，能够提供具体线索的有心者就稀少了。大半年下来，我先后跑了北京、成都、重庆、湖南省长沙市和我的老家四川省盐亭县的乡下，收获甚微。原因大约是幸存的老地主们虽然快走到了生命终点，可还心有余悸，担心自己在一个陌生人跟前说共产党的坏话，会祸及子孙。

感谢上苍，赐予我孙医生这样的基督徒。经过三番几次的电话联系，2006 年 8 月 3 日，我们又在昆明重逢了。用罢晚餐，我们在阴风惨惨的街头徘徊了一会儿，接着又去了孙医生简陋的住处。因为极其忙，此次孙医生不能陪同我下乡，却对我的行程作了细致的安排。

睡前与孙医生聊了一会儿，都是光棍汉，就对彼此的经历怀着浓厚兴趣。但当我提到某一位朋友想用摄像机跟拍他几个月，成就一部当代游方郎中的纪录片时，孙医生的反应却比较淡漠。“没人看。”他说。

“不在乎，”我说，“应该有个新世纪上山下乡的记录嘛。”

他不置可否，并很快进入了梦乡。

2006 年 8 月 4 日 6 点 50 分，我们起床洗漱，出门时阳光灿烂。我们在一个路边鸡毛店匆匆用罢早点，孙医生又将我送到黄土坡汽车站。分手在即，老孙又以极快的语速，把沿途注意事项冲我复述一遍，我只得如一个幼稚晚辈，挺感动地点头。稍后，我在肮脏的车站内登上去禄劝县的更加肮脏的中巴。屁股朝异味刺鼻的坐垫下去，膝盖就抵到了胸前。一个哑巴姑娘上车卖非法印刷品，她先递过来一块写着“自强不息，自谋生路”的纸牌。想起自己也曾干过地下出版这一行，就捐了 10 元钱。哑巴姑娘不依，涨红着脸，非要我选她怀里抱着的劣质书刊，我随手抽了一张《生肖运程》的单子，“属狗的。”我不由自主地解释，姑娘似乎听懂了，甜笑着，还翘了大拇指。

车摇摇晃晃地出站了，烟尘弥漫；跟着出城了，天高云淡。在金光飞窜的风中正好养精神。于是我仰头便睡。不料一睁眼，两个多小时就溜过去了。灰不溜湫的禄劝县城映入眼帘，哪怕周围粘满补丁般的垃圾，一种亲切感还是油然而生。

行人和建筑都老一套，就不费口舌了。总之我下了车，沿土坡爬到马路边，一个公用电话就招来了接头的面包车。司机是个彝族瘦子，姓张，我递上孙医生的路条，上面写着：“此人是我的好友老威，请按电话里说好的条件，尽力帮助。”

沿着上次的路线，我们继续前行，没多久上了土路。尘土飞扬中，人头与骡马源源不断在车窗外沉浮，有时，车已抵着马车了，才一个急刹。司机老张探出脑袋，以喉咙代替喇叭，恳求让路，可在马车上摇晃着的衣着花哨的彝族女人们都回头报以微笑。老张也只能微笑，并解释说，今天团街逢场，大家都出来赶街了。

堆积着人的柴油货车与骡马拉车越来越密集，终于遮天蔽日起来。前方会车，我们停下来等，见若干农民如起义一般，从四面八方往车上爬，其中一个还在两车相交的缝隙中扒拉车门，惊得我连吐舌头。老张却说，他以前赶街也爬车，图个方便。

我小时候也爬过车，那是受父亲之命，从盐亭县城回 20 多公里外的李家坪探望老地主爷爷。遇着货车上长坡，就撵着车屁股，一顿猛跑，使出吃奶的力气翻上货厢，就洋洋得意。可如今，我的父亲、爷爷、姐姐都长眠在李家坪的祖坟里了。

经过乡场时，我胡乱拍了些照片。接着几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又到了破烂肮脏如昨的撒营盘。在路边一个清真馆子要了牛肉和两斗碗干饭，狼吞虎咽罢，才发现碗底尚存苍蝇一只。而更多的苍蝇在我们头上嗡嗡欢呼着。

胃口相当争气，就如这破面包车，再怎么历尽颠簸，它也不熄火。又跑了 1 个来小时，到一剪刀似的岔路口，往下走去则黑，我们上行，沿着盘山道直奔此行的目的地，海拔 3600 多米的山顶小镇马鹿塘。

下午两点左右，进了空荡荡的马鹿塘场口，太阳依旧明晃晃，却如悬在空中的白铁皮，没有热度。我们在场上唯一的“美发厅”前刹车，打开车门，立即加衣服，并向一女孩打听本站联络人小孙。不料一回头，瘸着一只腿的小孙已站在我们身后了。

小孙也是大地主家族的后代，头脑在乡村青年中算灵活的，也曾在深圳打过工，却因病险些瘫痪，只好回乡。前不久，孙医生巡回至此，为他治过腿，还认了本家。

我们被请进乱七八糟的美发厅稍歇片刻，就穿过街面，跟小孙下一斜坡，绕入人畜混杂的农家院子去拜访马鹿塘乡的高龄老人余学康。在狗儿们的狂吠中，一个系围裙的粗壮妇女自猪圈钻出，摊着两手与小孙搭话毕，就仰脸冲着木楼叫“老爹”。余学康从楼影里探头，眼睛与皱褶几乎难以区分，我们立马趋前打招呼。小孙贴住他的耳门叫道：“成都来的同志，想找你款款古。”

老人嗯嗯答应着，弓着腰，带我们上了二楼。由于屋里太阴暗，四个人就搭矮凳蜷在楼道中。谈话还没开始，楼下院坝里已立满大人小孩，以及猪、狗和牛。老人脸朝外，皱褶中挤出两道得意的目光：“现在还有人听款古？”

我急忙点头道：“我想请你讲讲土地改革，也就是斗地主的事。”

老人一脸迷惘。小孙就替我做传声筒，并且补充道：“你随便款，解放前、解放后，想咋款就咋款，人家要写你啰。”

老　威：老人家高寿？

余学康：蒋介石手头就出生了。

老　威：到底是哪一年？

余学康：记不得啰，只晓得今年 81 岁了。

老　威：你算这马鹿塘乡里的长者，我今天特意来找你款款古。

余学康：款古么？我的脑壳已经糊涂啰。小时候，听老祖讲，我们的祖脉在金沙江对岸的四川东川县境内，由于与彝族打冤家，输了，就千里迢迢迁过来。当时迁过来的

还有李、田、孙、张、杨、冯等汉姓，都是叫彝族赶过来的。

老　威：这是哪个朝代的事？

余学康：早啰。我已经是迁过马鹿塘来的第 10 辈余姓人了。祖宗他们刚到的时候，这儿还是万山老林，人钻进去就眼睛发黑，深处还听得见野猪和熊叫。祖宗他们扎下来，经过刀砍火种，开出向阳坡地，种下荞子和洋芋，也种下大烟。

老　威：这些都是彝族的主食吧？

余学康：入乡随俗啰。云南的黑彝性子温和，不像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一冲撞就要动刀动枪，所以这儿的汉彝历来都和平相处。满目荒山，愁的是没有劳力去开啰。不晓得背太阳过山了多少年，这与外界隔绝的马鹿塘突然热闹了，先是朱德领头的红军过，去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与毛主席汇合；后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追过来，三天三夜的马蹄和脚步声。红军进到我们大村，找人带路，翻山越岭跑拢江边，许多战士饿得不行了，就采地里的蓖麻子充饥。蓖麻子可以榨油，闻着比花生油香，却是闹人的。听说不少人口吐白沫，叫毒死了。红军是在韭菜地、黄草坪扎耙子过的江，险得很。

村里带路的人，有的没回来，参加红军了；有的穿密林子回来，衣裳都烂成刷刷了。他们说，红军过雪山草地，又没有吃的，所以经常是进几步退几步，看着看着，人就往下倒。他们不愿送命，就当了逃兵。马鹿塘的人从老祖开始，就种烟抽烟，红军中也流行吹大烟，还问他们吹不吹两口提神？那时候红军的政策还是好的，逃跑不远的，追着你转去，不追究，还有大烟吹。

老　威：红军在马鹿塘驻扎过吗？

余学康：歇过嘛。村乡里的大户叫绑了十几口，通知家属拿银元去赎人。在下面的大松树干仗，活捉了国民党军家眷，男的女的一串，也弄到马鹿塘上头来，召集乡民大会，统统砍头。我那时小，也跟老爹们去看，血滴了一路，尸体就埋在坡沟下。红军还在土墙上贴告示，我听长辈念道："杀官安民，打富济贫……"许多年过去，我还记得这两句。解放军、工作组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搞土改，也就是"杀官安民，打富济贫"啰。

红军如风一般刮过去，他们从大户那儿弄来分给大家的东西，没人敢要；当时接了，事后都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这儿的人乡情重，只要不挨饿，就不管脑壳顶的哪一方天。我记得那时的保长也换得勤，今年是李保长，明年就是杨保长了。

老　威：保长的权力大吧？

余学康：通知开会，派款派壮丁，保长就上门了。壮丁的政策是每家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轮到那个是那个。我 12 岁死了母亲，家里两兄弟一妹子，加父亲，共四口人，所以没人当兵。但村里有好几个人去当兵。我的一个老表，一走就没音信，几十年后才晓得，他随国民党军过海，在台湾安家落户了。八几年天子换了，他坐飞机到昆明，包了几辆车回马鹿塘寻祖，还有政府官员陪着。一下村里，没人认得出。还

比我大好几岁，可西装一套，像我的儿子辈。村里人都围着这个命好的人，昏款了一晚上。有人问他那边出不出荞子和洋芋？他点头说，啥子都出，就是花椒不出，因为怕麻死人。把大家逗笑了。我问他台湾有多远，咋过来？他说从南边绕大半个中国，再从香港进来。我问有没有我们的老祖来得远？他连说概念不一样，老祖们是走路，翻山越岭，从金沙江对岸过来，一两个月都说不准；我是坐飞机，如果拉直线，台北到昆明，大半天就到了。一大屋人全傻了，搭不上话，因为我们最远才去过昆明啰，到一趟禄劝县城也算大事情啰。

我这个老表心慈，连着抹眼泪，说几十年了，没料到家乡还是这么穷。他打算以后在昆明安家，可以引一些海外资金来家乡扶贫。现在，他的女儿倒是住在昆明，他没有回来，听说是台湾那边不让。

老　威：老人家，你在旧社会有多少土地呢？

余学康；3 亩多。

老　威：一家 4 口人才 3 亩多？

余学康：眼下我家有 10 几口啰。

老　威：我说的是旧社会。

余学康：旧社会么？我的耳朵也老了。坡上的地种不完，一家一户，少说也有几十亩。

老　威：那家家都够地主了？

余学康：我们家有几十亩地，可是自耕自种，没余粮，没请长短工，没有租子可收，更没有丫环、奴仆，所以是贫农啰。

老　威：这些都是划阶级的标准吗？

余学康：土改中，我们把这个叫做“称大秤”。是猪还是骡子，有多重，自己先称一称。第一等是地主，分恶霸地主、一般地主和破落地主；第二等是富农；然后是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是依靠对象。在马鹿塘，老林子多，野猪、熊瞎子、游击队都在里头出没，

四几年，国民党军从撒营盘过来，清剿了很多次，把游击队打急了，就轰的一声散开。有的就钻进村里躲。不少人家都窝藏过游击队，因为他们的纪律好，哪怕饿瘫了，也不偷不抢，要口吃的，也征求住户的同意。还有，他们个个能说会道，啥子为国家为民族为人人平等，到了动情处，眼泪就哗哗的掉。不料真让他们猜准了，眨眼间解放，游击队果然又回来了，不过，这回可不是钻老林子，搞偷袭，而是在青天白日下进马鹿塘……

老　威：游击队成了解放军？

余学康：解放军 1949 年就来了，先是一小股，过后才是大队人马。我还为解放军的侦察兵带过路啰。我是说工作组，有县里的、区里的人，跟在解放军后面进马鹿塘，村里的人一认，原来就是游击队。大家都是熟人啰，那家肥那家瘦，在旧社会就摸底啰。

老　威：这么说，土改起来很容易？

余学康：马鹿塘的所有村子都驻了工作组，我们大村也驻了 4 个工作组的人，先是分散到穷苦人家，同此同住同劳动，讲新旧社会的变化，启发阶级觉悟。因为过去无论穷和富，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乡亲，我雇你到我地头干活，你在青黄不接时，来我家借点粮食，都太平常了。10 根指头还不一样长啰，那个能辨清楚，是细的幺指头好，还是粗的大指头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新社会，旧道理就讲不通了。发动群众，划阶级，上面的政策就是铁板钉钉。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贫雇农的主席团也有了，民兵也有了，我当上了民兵主任……

老　威：当时你有多大年龄？

余学康：20 多岁，还没结婚，一根脑壳简单的光棍啰。

老　威：你恨地主吗？

余学康：应该恨，政策叫我恨我就恨。要不咋个当民兵主任？

老　威：你手下管多少民兵？

余学康：十几个。其实也不是那个管那个，大家互相监督，看政策执行得好不好。秤完大秤，工作组就叫我们民兵将伪政府成员、恶霸地主从家里一个不漏地清出来，押到马鹿塘乡公所集中看管，勒令交代隐瞒的浮财。

老　威：你是文盲吧？

余学康：我没有文化，记性也不好，可工作组都表扬我政策执行得不错。

老　威：是么。

余学康：村里的民兵都是大肚皮，饿痨饿虾的，好像从妈肚子一出来就没吃饱过。所以，他们总是扣地主家属送来的饭菜，几个家伙分吃光。还命令必须送肉，送白米饭，否则就打人，小孩、女人都不放过。这就不符合政策啰。我审问时，发现一个孙家的地主，已瘫在墙角，有出气没进气了。连问几声浮财埋哪儿，那人却伸一伸颈子，直翻白眼。我瞅着不对头，忙叫舀一碗水来灌，没想到进去半碗就出来半碗，还从胃里带出黑糊糊的泥巴和铺草节节。原来他 5 天没上吃一口饭，只好在地下胡乱抓东西填肚子。

我一下子就冒火了，地主都饿死了，找那个去追浮财嘛？即使该枪毙他们，还要给一顿砍头饭啰。于是就批评那些扣饭吃的民兵。他们不服气，与我吵，说地主饿死活该，如果全世界的剥削阶级都饿死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我没文化，只好反映上去。工作组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认为我觉悟高，有全局观念。我可没想到全局，但贫农要有志气，不能给共产党丢脸啰。

老　威：老人家还是蛮实在的。

余学康；我做过民兵主任，做过保管员，在村里是有口碑的。所以你们这些后生，不要认为我在昏侃。

老　威：哪里，哪里。

余学康：其实地主很不好对付，他们要么读过书，要么比较聪明，否则发不了财。称了大秤，开了会，人人都盯死你了，可他们还以为能蒙混过关。于是工作组与贫雇农主席团一合计，集中起来审。我先挨个劝他们，也叫声老表、叔叔、姨爹啥子的，都是乡里乡亲，你还是吃软吧，都吐了吧，大政策大形势摆在眼前，你不说实话不行啰，就是对抗政府，对抗共产党啰。

老　威：你还挺会攻心的。

余学康：但是行不通。这些狗老财，放租放债都不交代，或者只交代一点点，想大化小，小化无。你说他有丫环，他说那是亲戚家的丫头，暂时住几天；你说他有奴仆，他说吃住一窝，干活一块，哪能叫奴仆？至于雇长工，他更是满腹委屈，说吃穿、工钱都没亏待过人，有人快饿死了，找上门来磕头作揖，求你雇他，给他一口活命饭吃，你能不答应啰？这位同志你听听，这哪像罪行交代？不来硬的行么？于是我扇过去一耳光，说："你欺负我没文化是不是？你把剥削浑侃成做慈善，那我就要看你有多慈善！"

攻心不成，我们就要伤他们的心了。把他们全拉出来，跪碎瓦渣，跪刺耙笼，膝盖烂了，还往上头抹盐；还挂黑牌，戴高帽子游乡、游地坎。你可晓得火塘里架柴烧的铁十字？我们就是把烧得半红的铁十字罩在他们头上，带焦糊肉味儿的青烟一冒，脸都变形了，他们就会大吼："吐，吐，全吐，肠肠肚肚都吐！"

老　威：真有点恐怖。

余学康：还有扎烟火、推阴阳头、往头上倒红墨水……

老　威：什么"扎烟火"？

余学康：就是把燃着的烟头往人身上扎，一扎一个眼，看你能顽抗多久？

老　威：还有什么刑罚？

余学康：打陪衬。就是镇压一个恶霸地主，将所有的地主押到公审会场，陪斗几个钟头。在枪毙的那一刻，让十几个跪成一排，前面都挖了坑。这样，都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屎尿一裤裆的，喊爹叫妈的，昏过去的，嘴巴啃土的，太热闹了。民兵用枪托子捣，手膀子都酸麻了，还制止不住。轮到真开枪，那个恶霸地主天灵盖一飞，作陪衬的地主多半也死了一回。这时候，再架回去趁热打铁，就啥子都招了。金银埋在哪个窖；首饰藏在哪一家；还有细粮灌在哪个树洞；咋个样教唆自己的媳妇、闺女勾引主席团的人下水，梦想用美人计改变阶级，逃避斗争等等，甚至上一辈子的丑事都往外抖。

可这个关头就太晚了，工作组指示，不仅要将已经交代的浮财，包括田地、房子、余粮、骡马牛羊全部没收充公，而且要视其态度恶劣的程度，给予轻重不同的赔罚。罚款数目是 50 元起价，100、200 到 300，最高 500 元。那时一匹骡子才卖 50 元，所以地主们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老　威：给不起罚款怎么办？

余学康：土改时，工作组就是金口玉牙，说一就只能是一。罚款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剥削阶级的嚣张气焰。出不起罚款，人头就落地，马鹿塘有两个大地主，都因为交不起 300 元钱的罚款，而被镇压了。

老　威：这算是保命钱了。

余学康：差不多啰。交够数的，当场就叫家属写张《保证书》，领回家去听候处理。想逃是没门的，村与村都设了岗哨，除了工作组和主席团，任何人，哪怕走亲戚，都要查《通行证》。

老　威：这有点像抗日革命根据地了。

余学康：皎西、马鹿塘、大松树都轮流开过群众大会，镇压伪政府、反革命和地主。我那时年轻，热血沸腾，都去执行过任务。我还被派到皎平，帮助那儿的群众土改。

老　威：你枪毙过人吗？

余学康：我扛过枪，打过靶，可胆子小，没打过人。那是要受专门训练啰。

老　威：斗地主的名堂还比较多吧？

余学康：案头上的肉，想咋个切就咋个切啰。那时候，贫雇农家里死了人，也叫地主来当坐街先生。

老　威：什么？

余学康：就是临到出殡，让几个地主披麻戴孝，在大棺材前头鸣锣开路。解放前，马鹿塘一带就有雇叫化子当坐街先生的习俗，解放了，天地一翻个，剥削阶级就免费充

当劳苦大众的孝子。从阳间到阴间的路，由他们先趟出来；埋死人的活儿，也是他们干；那年头太好呵，连祭年祭月，给老祖上坟，都由地主代劳。

老　威：新社会不是讲究移风易俗吗？

余学康：土改阶段，新风尚还没提上来嘛。

老　威：你们这一带到底镇压了多少地主？

余学康：记不清了。总之，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几个大姓中的大户，都镇压了。从 1951 年下半年到 1952 年，公审大会开了无数次，每次都是上千人；集中到撒营盘开，起码就上万人了。我们民兵的革命担子可重啰，从看管到押送，到维持会场秩序，有时一整天都轮着啃干粮，神经高度紧张。

老　威：就是站个岗放个哨嘛。

余学康：同志你太小看我们民兵了，地主的公愤那么大，如果不是我们隔在他们和群众中间，地主一个也活不出来。许多乡都发生过没经过公审，地主就叫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的事，受到上面的批评。有时候，群众就如海里的浪子，一波一波涌过来，一波比一波更猛，我们就把枪横在胸前，拼命阻挡。我们经常叫掀翻在地，又立马蹦起来，甚至学解放军，手挽手，汗水把衣裳、裤子都湿透了。有的人蹦跶着也够不着地主，就隔着我们这道人墙，喷口水、扔石块，还把棍子、竹竿老远打过去。我们挨了多少误伤啰！一次，棍子头没碰着地主，而扫到我的耳门上，只听得砰的一响，我差点就昏过去了。右半边脸肿了 10 多天，牙都松了。

老　威：当时的法庭是怎样组成的？

余学康：以工作组为中心，周围是贫雇农的主席团。那个该杀那个该留，大伙碰个头，工作组点个头，就铁板钉钉了。唯一一次例外，就是镇压李保长。已经押到会场，挂了黑牌，插了亡命标。群众和领导都一致认为，他该死，死定了。当时也是人山人海，口号早就喊了几轮，“拥护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枪毙反革命恶霸地主、伪保长李ＸＸ！”

李保长在台下打抖，吓得站不稳。两个民兵将他往上架，可他的双腿拖在地上。屎尿没吓出来，清口水却挂了一尺多长。我还吼了一声：“狗日保长的威风到哪儿去了？”

执行民兵排出 4 颗步枪子弹，在鞋帮子挨个摩擦一遍，就喀嚓上膛了。李保长被五花大绑，按在土坑边跪下。十几米外，埋人的井早就挖好。台上的工作组长把手轻轻一挥，烂泥巴一样的李保长立马就要报销。可这时——枪口都抵着那后背了——有个声音吼道：“留人！！”

我们睁大眼睛一看，原来是禄劝县杨县长的通讯员。那十几岁的小兵满头满脸全是灰，正骑着高头大马冲向会场。群众纷纷两边闪，大会顿时乱成了开锅稀饭。那马还扬了扬蹄子，啾啾叫了两声，就一直撞到主席台下才刹住。小兵跳下马，一个箭步射上去，

隔着前排十几个贫雇农主席团成员，全身猛扑，向台子中央的工作组组长递上一封急信。

组长匆匆看了，吓出一头冷汗，也吼了一声："留人!!"紧接着又吼了一声："散会!!"

老　威：怎么回事？难道这李保长是杨县长家的亲戚？

余学康：比亲戚还亲。解放前，杨县长在马鹿塘的万山老林里打游击，曾袭击了好几个乡公所。国民党为了报复，就悬赏抓他。有一回，都将他们十几个游击队员包围了，是李保长出于江湖义气，亲自护送杨县长等人钻密林小道，走了几天几夜，才拢金沙江边。李保长与杨县长拱手作别，还叫手下人送了一麻袋荞子粑粑。李保长一直看着杨县长他们过了江，估计安全了，才回头走自己的路。

老　威：李保长明为国民党干公差，却暗通共产党，真是吃里扒外。

余学康：江湖中人只顾义气，不顾党派，更不管那个坐江山。解放后，李保长倒血霉，眼看老命不保，就在监狱里把自己与杨县长的"救命"关系坦白出来，却没人信。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可到底捡了一条命。

老　威：杨县长也算有情有义。后来如何？他们"后会有期"了吗？

余学康：救命是一回事，阶级界限又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的县长当然不能轻易见一个恶霸地主啰。

老　威：过了生死关，李保长这辈子也算平安了。

余学康：一两年后，上面有政策，进行土改复查。李保长活罪难逃，他是"历史反革命"，被判了几年刑，劳改出来，没两年就死了。

老　威：他可是共产党的功臣啊。

余学康：我没啥文化，不太懂这个。

放羊娃彭绍宗

采访前奏：现在是 2006 年 8 月 4 日下午 4 点 45 分，我与 81 岁的老人余学康道完别，从嘎吱作响的木楼过道下来，尾随热心的跛腿小伙子孙如策，从大村的烂泥坡爬回马鹿塘街面。斜阳如一颗被压扁的橘子，浆汁四溅，把山川染得斑斑驳驳。又起了一阵风，我们不由瑟缩起来。

在浸入肺腑的冷太阳中，孙如策突然转头问我，是否跟湖南卫视的某某栏目有联系？我愣了一下，小孙又继续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材料寄去，并探问可不可以上荧屏，当众表露心声？对方回信认可，却声明旅费自理。我关切道，值得花这大

笔钱吗？小孙道，只要能找回老婆，花多少钱都值。接着，就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张彩色照片，上面是他和一摩登女郎的亲密合影。

回到灰尘扑扑的美发厅，小孙又从抽屉拿出一厚本影集，全是小两口的昔日记忆。原来，他们同成千上万的山村青年一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好不容易凭日以继夜的勤劳在深圳站稳脚跟，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小孙得了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不久竟瘫痪在床，连生活也不能自理。而他年轻的老婆守候了几十天，苦无良策，就在绝望中带着幼子偷跑了。

幸好有同乡人的鼎力协助，小孙才回到马鹿塘，凭借着土方与针灸，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当然，这也包含孙医生在内的许多土郎中的努力。小孙说，他一点也不责怪“临阵脱逃”的老婆，哪怕她跟了另外的人。他只是渴望通过电视，把自己健康的形象展示给大众，希望她能看见，让全家破镜重圆一次。她还是自由的，去和留都可以。

我正在赞赏小孙的豁达，挂着破毛巾的窗口闪过一位戴蓝帽子的老头。我直觉到这当中有名堂，就叫小孙追出门去招呼。老头弓着虾米腰，摆着手推辞了两回，就随小孙进屋了。眼下，他与我并坐在长椅子上，两手搓来搓去，像个惹祸的小学生。我一开口，他受惊鸵鸟一般耸起了肩膀，脸色泛起潮红。我笑了，连称“没关系”，接着在东拉西扯中开始了新一轮访谈。

兴致正高的小孙这么快就被晾在一边，我瞟了他一眼，感到十分歉意。

老威：我已经看见你在这街面上晃了几个来回了……

彭绍宗：人老了，没事干，就这么瞎兜圈儿啰，

老威：马鹿塘有多长？

彭绍宗：就一条直肠子街，你抬眼就看得穿。现在，街两边都修了水泥房子，显得光鲜了，宽阔了，哪怕赶街日，货摊一家接一家，人如稀牛屎，一堆连一堆，汽车也能从中间挤过去。翻回去一二十年，你眼前就是土路土房子了，一下雨就是泥巴凼凼，货郎赶着骡马车卖东西，汽车是稀罕货，可能要几天才看得到一辆。

老威：这么说，你老人家在马鹿塘瞎晃了几十年了？

彭绍宗：土生土长，从来没有离开过。马鹿塘的地势太高，七八十岁的老人比较少啰。夏天好过，冬天不好过啰。原先我没事兜几圈儿，门槛前坐着吹烟的同辈人不少，一眨眼，就一个接一个走了。

老威：你的身子骨还不错嘛。

彭绍宗：马鹿塘出了许多能人，乡里乡外，呼风唤雨了好一阵子，结果都走得早，我是个只晓得种庄稼的蠢汉，所以就落后了。

老威：老人家生于哪一年？

彭绍宗：1937 年，如今 70 岁了。

老威：解放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

彭绍宗：1946 年，我才 9 岁，就替李保长家放羊。

老威：就是那个共产党游击队的救命恩人吗？

彭绍宗：是啰。公审过了，埋人的井也挖了，枪筒都抵着他脑壳了，禄劝县杨县长一声“留人”。这事儿把马鹿塘，把方圆几十里都震住了。

老威：我已听民兵主任余学康讲过。

彭绍宗：是么？他与我三哥一路，土改的积极分子，当然比我一个小孩清楚啰。

老威：你三哥还在？

彭绍宗：我三哥彭绍周十几年前就走了。他曾经是贫雇农主席团的成员，参加了马鹿塘所有地主的审判，却没有比他跳得还凶的余学康命长。

老威：你觉得李保长该死吗？

彭绍宗：清匪反霸的时候我不敢说，因为他是国民党的保长，贫雇农都骂他该死。我一个放羊娃哪敢放屁？眼下不搞阶级斗争了，我才敢实事求是地说，李保长是个大善人！我家里穷得叮当响，没办法，李保长看不过，就主动对我爸爸说，让宗娃子到我家混口饭吧。真是饿狗进了肉铺，第一天，我就连肉带饭胀了 5 碗，气都喘不过来了。李保长摸着我的脑壳叹气：“可怜的娃呀。”接着还问我，愿不愿意跟他的孩子一道念私塾？我怕挣不到工钱，要挨父母骂，就摇头。而今想起来，很后悔，没文化吃了不少亏啰。

我替李保长放了几年羊，吃得饱穿得暖，冬有棉夏有单，人虽然在坡上跑，辛苦些，但身板炼得结实，脸盘子也黑里透红。那几年是打身体底子的关键时期，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咳不喘不畏寒，估计，我至少能活过 80 几的余学康。

老威：老人家有底气。

彭绍宗：我三哥帮的不是李保长，身体吃亏就比较大，所以他对地主阶级充满仇恨，判死刑判劳改，他统统举手。马鹿塘解放要慢些，1950 年吧，我十二三岁，工作组就下来，先还有解放军陪着，清匪，反霸，向剥削阶级征收公粮。李保长为旧政权干事，当然是恶霸地主啰，被抓起来关进乡公所，严刑拷打，据说还朝嘴里灌辣椒水，灌粪便。李保长叫冤枉，说自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恩人，没人信，两瓣嘴被鞋底给扇豁了，牙齿一颗接一颗掉。更具体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太小，没有参加斗地

主的会。

老威：你是孩子，不爱凑热闹吗？

彭绍宗：我是李保长家的放羊娃，土改运动一来，工作组组长李国柱就亲自来动员我，要我起来诉阶级苦，我憋得脸红筋涨，捶了半天脑壳，也挤不出一滴苦水。李队长就说，这个娃娃已被剥削傻了。于是，工作组命令我坚守阵地，看住李保长家打了封条的院子，还有骡马、牛羊、猪。这可是个苦差事，我一个老实娃娃，叫困在那块阴森的地盘，连门也不敢出。

老威：你要管住多少牲口？

彭绍宗：八、九十只羊，五、六头牛，六、七匹马。本来猪还有十几条，可没人喂，就饿死了。

老威：一个儿童要养这么多牲口！

彭绍宗：他妈个X，长八双手也忙不过来。幸好我放羊多年，够麻利。那些羊儿马儿啊，与我有感情，一见了我，立马啾啾呜呜地乱叫一气，又是亲又是啃的，它们哪晓得人间发生了啥子事？我天天累得手脚抽筋，也弄不来那么多草喂它们。我几乎站着都打瞌睡，梦里，牲口扯我头发，将我汗臭熏天的头发当草吃啰。

老威：李保长家没人了？

彭绍宗：土改才开头，就宣布没收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将他们全家十几口赶出去，挤在大村下面一个猪圈那么宽的茅草房里。顶上有簸箕大的洞，连叫化子都嫌太风凉。直到李保长拣了一条命回来，才将破屋修修补补，勉强过下去。可没几天，土改复查，他又被判刑劳改了。

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那些日子晓不得咋过来的，好多房子好多牲口，就我一个人在里头窜来窜去，你说见鬼不见鬼？夜半三更，穿堂风忽忽地响，跟着房梁也响棺材也响，吓得我铺盖蒙脑壳，还牙齿打颤。有一回，天刚蒙蒙亮，铺盖突然叫掀了，吓得我光着屁股跳起来，却不敢睁眼睛。我直喊："鬼大爷饶命！"你猜是个啥？

老威：李保长家的先人回来探亲了？

彭绍宗：述。是我养了几年的那匹灰马饿疯了，扯断缰绳，踢开房门撞进来，叼起我的铺盖就转身跑。我回过神，一直撵到马圈，那铺盖已四分五裂，一大半被几匹马嚼烂吞了。没办法啰，它们都只剩几根骨头撑一张马匹。幸好不是食肉动物，要不连我也吃了。

老威：你没向工作组反映吗？

彭绍宗：他们都忙啰，我三哥也一天到晚不落屋。直到 1952 年秋凉，土改的几个阶段弄完，要分土地、浮财了，工作组和农民协会才从我手里，将牲口、财产一件件数出去。

老威：都分给谁了？

彭绍宗：我一个孩子，晓不得啰。可惜的是那些大肥猪，都饿死了，死前把食槽都啃脱大半。长蛆了，只能挖井埋掉。接着，四、五家贫雇农搬进李保长的院子，床、柜子、农具都是现成的，屋子也大，把一伙泥巴脚杆乐颠了。我亲眼见马鹿塘出了名的滚刀皮某某某在李保长的漆皮描金雕花床上打滚，连吼了几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土地改革胜利万岁！"有人拍着他的脑壳开玩笑："狗日的，做梦也没想到有今天啰？"滚刀皮点头："老子在旧社会滚草，二十几年没沾过床边边；如今托毛主席的福，分了恶霸地主的大金床，下一步，老子要娶媳妇，天天日 X，争取下他十个八个崽。"大家就起哄："你养得起啰？"滚刀皮拍着胸脯说："怕个逑，以后是社会主义了，贫雇农千秋万代，只管下崽；让地主、富农断子绝孙。"

老威：这家伙真无赖。

彭绍宗：不管无赖不无赖，人家的确除了自己的鸡巴，别无长物，这就是土改的本钱。划阶级凭三把尺子，一是有没有丫头、娃子；二是有没有租赁、放债；三是有没有长工、短工。三条占全就是地主，够两条划为富农。

老威：当时马鹿塘划了多少地主、富农？

彭绍宗：多啰。我太小，因为守院子，没机会参加斗争会，所以记不着。余学康是民兵主任，他记得着。

土改受害者董存英一家

直到从 70 岁的的放羊娃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我才贪婪地吞下两口唾沫，中止了录音。我将老头送出门，太阳更红了，犹如一颗橘子，被挤得更烂，山影笼罩下的马鹿塘街面，有一半浸透了太阳的汁水。司机老张在车里打瞌睡，此时探出头发零乱的脑袋问："下一步？"

我也问："下一步？"跟在身后的孙如策抬起腕表应道："快 6 点了，可下一步还远。不如在马鹿塘先歇，明天一早走。"我脑子里打了个转，就追问到底有多远？小孙吞吞吐吐道："车下不去，走路要花一个多钟头，我的腿……"

我正拍着他的肩膀表示安慰，司机老张却插话道："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多钟头，抓紧点，我们还能赶到。"

小孙反问道："你能找到么？"

老张满不在乎道："这方圆几百里，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你就放心地给你家亲戚打个电话，让他们腾出床铺，准备晚饭，我和威老师要在那儿过夜了。"

小孙还在犹豫，一个 10 来岁的孩子却从斜刺里蹦了出来："我愿带路！"

我和老张立马欢迎，于是两大一小在寒风习习中上车。小孙扒住车窗，挺遗憾地与我握手，连说“还没有办招待，还没有好好聊”。我晓得他的心思，就拍着他的手背许愿：“我会把你的悲情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车开动时，小孙还跛着腿往前跑了几步，我不忍心，就冲他大叫“明天见”。其实明天见了又咋样呢？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我这种自身难保的异类文人除了要耍嘴皮子，能起到什么作用！

沿着盘山公路，车开得风驰电闪。这是盛夏，可在路两旁，不时飘过裹棉大衣的农民。斜阳在云里忽隐忽现，穿行得极快，令我蓦然回到早年在川藏高原驾驶卡车的时光：几十里不见人烟，除了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啥也没有。地球空寂得要命，雪坡平缓向上，似乎打一个盹，车就开进天幕了。有时风一起，太阳就变得脸色煞白，断线风筝一般哗哗晃动，眨眼就坠下雪峰。接着，星星或银鱼浮现在深蓝里，令人的心脏也为之窜动。

当年我 20 几岁，曾感叹“宇宙是个巨大的鱼缸”，可余音未散，我就 40 几岁了。而司机老张 30 几岁，已有两个孩子。眼下，跑了 20 来分钟的“好路”终结了，他一打方向盘，车就拐上了一条机耕土路。一边岩壁一边深沟，可车鼻子前的空间还越来越窄。我的身体和脑袋不由自主地晃悠开来，有那么两分钟，我死盯着老张，因为三条命都捏在他的手板心里。小孙的弟弟，那个自告奋勇带路的孩子，本来横躺在后座睡大觉，此时也被颠醒，把住车门东张西望。老张笑骂道：“小狗日的，眼睛放亮点。”

一直是下坡，老张的刹车踩得嘎嘎响，有两次，车轮忽地定死在悬崖上，老张伸长脖子，边看边退，而后继续往下放车。我抹了一把冷汗道：“早知这么险，今晚就歇在马鹿塘了。”

老张吐了口气：“险的还在后头啰。但愿上帝保佑夜里别下雨，要不明天车就上不来了。”

小孩在耳朵后插话道：“上不来就多玩几天啰，反正学校放暑假。”

我有点冒火了，可转念一想，风云变幻，谁能左右呢？只好闭眼 3 分钟，向我姐姐的在天之灵祷告，愿归途顺利。

高度降了几百米，机耕泥路换成了碎石路，车在眨眼间变为淘气的小鬼，蹦着高下行。拐过一个直角山嘴，我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望见一个红彤彤的十字架，精神不由一振。尽管时间非常紧迫，我还是在车过教堂顶时，让老张停住，下去拍照。真是天随人意，一抹阳光刚好从乌云缝隙中透出来，我手指微颤，以陡峭如天门的绝壁为背景，拍下了那交叉着的永远的火炬；还拉拢镜头，拍下距离教堂十几米远的一位安详的驼背老太太。她戴着紫红圆帽，将手作遮阳帽沿，正转眼凝视我。

后来这两张照片成为我这个摄影盲的“经典之作”，被一些朋友吹捧，认为那背景令人忆起劳动党统治时期的阿尔巴尼亚，那个几乎被当代社会遗忘了的“山鹰之国”。可惜还没听说上帝的荣光笼罩过它。

老张还以为我是基督徒，就说这教堂里的人他熟悉，可以进去参观的。甚至住下也行。我却断然说：“上车吧。”

面包车又跳了一刻钟的舞，把个老张搞得咬牙切齿，犹如在驾驶坦克。小孩觉得好玩，故意上下颠屁股，我急忙制止。突然，车不跳了，老张换了个挡，却更加小心翼翼，眼珠子死瞪着右前轮。原来路在眨眼间收拢了三分之一，只够骡马车通行。老张没有退路，就照着绵软的旧辙印，一尺一尺向前挪动。为了配合驾驶，我将脑袋伸出窗外，千仞绝壁自车门齐刷刷地切下去，令人一阵眩晕。我急忙摘下眼镜，狠掐鼻

梁。幸好我在现实里没有恐高症，可在梦中，我却一再经历目前的场景，车轮滚动在悬崖上，滚动在塌陷的路面上，我连人带车坠下云端，沉入河床，可还落不到实处；河床也是漏洞，车都嘣嘣摔散架了，还从漏洞里往下掉。我拼命大叫，脑袋挂在一边，看着身子在几十米的低处翻筋斗……

当年我在川藏线开卡车，我们车队里就有一个翻车冠军，5 年中翻了 13 次，每次都从解放牌的车头奇迹般地露出血肉模糊的脑壳来。不知为什么，20 多年后，我又在采访途中望见他躺在脚底，躺在夕光笼罩的山谷中。

还有我的保护神姐姐，也于 1988 年逝于车祸。

但是，现实、记忆、梦魇的界限还是在 20 分钟后清晰了，车安全抵达了位于山腰的列朵涅村，贴着岩壁，停靠在一户农家的院墙外。不及喘气，老张就跃上陡峭的台阶敲门。指着车与门内妇女交涉了两分钟后，才甩了甩有些麻木的膀子说：“妥当了。”

我们急行军一般穿越这岩石上的村庄。经过一牛马充盈的破落院子，我举起相机拍照。步履稍慢，老张就转过身，不由分说地从我肩上抓过背包，赶在前头。向导小孩此时方显出山地人本色，羚羊般跳跃的同时，还不忘与狭道旁的其他孩子打招呼。我们屁股后照旧跟了一长溜黑黝黝的人和狗，直到将我们送出村尾才刹步。

有一股山泉哗哗淌过村子，在拦腰部位，人们建了一公共水池。一个老人蹲在水池边刮洗洋芋，我拍了照，习惯性地要与他交谈几句。不料刚听清“我今年 80 啰”，老张和小孩竟齐声冲我吆喝。骇得我也模仿羚羊连蹦几个高。

出了村尾，箭一般射过一片梯级包谷地，夕阳就已稳稳嵌在对面山头了。裸露的山体，犹如几个互相撕扯的疯子，在苍穹的病院里痉挛起伏。我们在疯子连绵的肩头上暴走，鞋底嗤嗤摩擦着尖利的石块，溅起一阵阵粉尘和火星星。又过 20 多分钟，山体的颜色由黄褐转为铁青，山道也越来越龇牙咧嘴。我挥了若干把汗，又跌了两跤，险些就栽下深渊；可前面那一大一小两混蛋，竟头也不回，反而还连走带跳。我蓦然记起老张说过，他那彝族老家，陡得洋芋也没法种，如果遇上天降暴雨，山头的土就哗哗往山脚倒。

“难怪狗日的越奔越欢，”我想，“刮风的速度，衬衣不脱，连汗也不抹。”

就这样吭哧吭哧了近一小时，我们进入一个长长的斜坡。沿坡一排树林，细细的枝干相互缠绕，密得像铁丝网，而网的里面，是粉白的碎石床。我刚拍了一张照片，那两个又窜出数丈之远，逼得我不得不大叫。他们才如梦方醒，自顶端回首，二目已中蛊一般恍惚。

我们在山腰缓行了几分钟，老张有点抱歉地与我搭话，将刚才出发的地点指给我看。脚下是探不到底的天井，原来我们围着井口，绕了大半个圆。暮霭自底部渐渐升腾，随风在两边拉起一座莫须有的虹桥，令人觉得转眼就可以飘回蚂蚁般蠕动着的彼岸村庄。

下坡的道太陡，犹如一条顺着井壁弯曲滑行的蟒蛇。我跟在两个“羚羊人”的后面，连滚带爬，出尽了洋相。最惊险的一次，我忽地溜出五、六米远，骑在了一棵树桩上。终于，在海拔又降了千把米之际，我们也降入又一个汉彝杂居的村落。接着的村间小道要平缓些，我举相机拍下一面肉红色的土坡，还有背着小山似的柴草归来的村民，他被压得满面愁容，却努力对我挤出纯良的微笑。

天色已混沌了，但能见度不算最差。我抓紧时间，又将一个准备进门的老富农摄入了相框。他已 81 岁，还目光如炬。他说，几乎全村子都晓得我们要来。

“真的？”我感到惊讶。

“山沟沟，外面来个人就算个大事啰。”

几乎随着最后一线天光的飞逝，我们钻入位于一面缓坡的撒戈铲村之陈家。院墙内，猪狗鸡已归圈，可一见生人，就汪汪嗯嗯咯咯地表示立场和态度。我们上了台阶，一个十分整洁的蓝衣婆婆连胳膊逮住我的手，然后才转过头，听老张和小孩介绍情况。

蓝衣婆婆叫董存英，今年 85 岁，裹着很精致的三寸金莲；跟在她旁边的反应迟钝的爷爷叫陈义尧，今年 84 岁。老两口正是我此行的主要采访对象。

我们被请进堂屋，饭菜已经摆上矮桌，有腊肉、鲜肉以及两三样菜蔬，这在山区已十分丰盛了。共进晚餐的有老两口的大儿子陈国良，1945 年生；二儿子陈国聪，1947 年生；三女儿陈国芬，1950 年生。还有五、六口，属媳妇及孙子辈，因与土改相去甚远，暂不记载。

访谈开始时，已是夜里 9 点过，按中国乡村的作息规律，这一家老小早该上床休息了。但却一个不少地聚在我的周围。我注意到陈义尧爷爷始终蹲在门边，不吃不喝，只抱着头呻吟。婆婆说，这个查不出的病根，自他劳改回来就落下了。

老威：我是四川过来的作家，想了解一些土地改革的情况。

陈义尧：我晓得，可是说不成了。

老威：讲一点算一点嘛。

陈义尧：真的说不成了。

老威：几句也行。

陈义尧：我一说，脑壳就疼得厉害……哎呀！说不成！

老威：老人家得的什么病？

陈义尧：说不成……

（难堪的沉默。蚊虫像微型轰炸机群，嗡嗡袭进门来。老人以双拳挤脑袋，痉挛的脸颊淌下两行热泪）

董存英：他是说不成了。他今年 84，脑壳就疼了二十几年。他心头是清楚的，说不成着急啰。

老威：清楚的？不能说？

董存英：一件事情，他颠来倒去想好多遍，同睡一张床，我不睁眼睛，也晓得他的嘴皮子在咕哝咕哝地动，可就是说不成！脑壳一炸，啥也没有了。

老威：我不太明白。

董存英：他 28 岁判刑劳改，56 岁才释放回家，虽然岁数大了些，可头脑、心眼都还好使。有一回，他上山砍刺笆，鬼推磨一般，刀口翻转，差点砸了自己的脑门。回来就不对头了，眼眶内白多黑少，一有响动就举胳膊，甚至吹风也举胳膊，好像上面有看不见的人，很凶的人，要敲他。晓不得是疼还是吓，他动不动就鬼叫、鬼叫。可怜啰。

老威：跟劳改有关系吗？

董存英：他劳改期间倒是规规矩矩，没犯病。

老威：他是哪年判的刑？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老威：什么罪？

董存英：晓不得。

老威：地主？

董存英：我们家田地很多，一解放就成了地主。他三天两头叫押去开斗争会，每次都鼻青脸肿，走着去，爬着回来。他说，农民协会堆了几大箩筐的罪，他都晓不得该认那一条。

老威：总有具体的名目吧？

董存英：他在旧社会当村长的时候，曾领着一伙男男女女去乡上开会。其中有个年轻人作风不正，沿途调笑妇女，他实在看不过，就骂了几句，言语比较重。后来这人想不通，竟吊脖子死了。这事过去就调查了，明明白白结了案，可土改时却被翻出来。人家硬说是他害的。

老威：这叫旧帐新算。

董存英：晓不得。那年头，只要有两三个贫农说你有罪，工作组立马拍板。

老威：就这一条？

董存英：我们的老家不在这下面，是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旧社会，他家里比较富裕，送他到禄劝县读了中学，然后，他自愿到马鹿塘附近的普福村教了两年书。因为有文化，他跟着又回草海子，被选为村长。

老威：按土改的标准，这也是一条。

董存英：四几年，共产党的游击队藏在万山老林里，经常溜出来偷袭乡公所。国民党派部队剿匪，强征当地农民"协办"，他也被弄去。枪不敢放，替"剿匪部队"煮了几个月饭。

老威：按阶级斗争的标准，爷爷他没掉脑袋算幸运了。

董存英：他读过古书，经常背着人念叨：上下几千年，每次改朝换代，都有人头要落地啰。所以我们一心想的就是逆来顺受。

（大儿子陈国良插话：我那时六、七岁，已经能记事。房子、田地、牲畜、财产，该交的都交了，大爹、爹爹两弟兄合计，共产党泰山压顶，既然保不住家业，还不如争取个主动态度，少受些罪。可减租退押还没结束呢，罚款又开始了。金银铜铁，锅碗瓢盆，只要值点钱的，都他妈的拿去啰。稍微像样点的衣裳都脱下，甚至带金边的包包、绣花鞋也没剩。

可结果呢，大爹和我爹都关起来，吊、打、跪刺笆、跪瓦碴子、顶石板、顶火塘里烧红的铁三角。还用枪筒子剁嘴，搞得大爹和我爹一会儿冒烟一会儿出水，牙齿一颗一颗掉光了。铁打的人也遭不住哦。可家里已叫挤干净了，一跤跌进门槛，连挡脚的砖头也没多余的。

唉，聪明点的富户，都晓得先偷偷挖地窖，藏些东西。因为共产党的运动，都是一环扣一环，步步升级的。清匪、反霸、逼交公粮、减租退押加罚款……你挤一点我交一点，最后搞急了，要拿命去了，再把肠肠肚肚全翻出来。这样，没伤筋动骨，人家也好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向工作组汇报成绩。我爹把古书倒背如流，却没想到老框框套不了新政策。你要争取主动，一下子全交，但下一回就没得交）

陈义尧：比李自成进北京还狠！

老威：老人家清醒了？可以讲了？

陈义尧：民国的时候，我家的银子用铜盆装。几辈人的辛苦……

老威：是嘛。

陈义尧：说不成了，说不成了。

老威：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陈义尧（猛敲天灵盖）：这里头，好多虫虫在爬在咬！我要说，说不成。

老威：你喝水吗？

陈义尧（啜泣）：我、我……

老威：你能写吗？我给你笔。

陈义尧：哎哟。

董存英：老头子，你咋个啰？我晓得你心头明白，你就坐在一边听嘛，不同意就摆手嘛。实在恼火就先睡啰。

老威：爷爷你莫难过，爷爷你四世同堂了，重孙子都这么有出息，还有啥子看不开？莫激动啊。

董存英：他现在好多了。同志你晓不得当年那个惨！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就拿女人开刀！娃儿他公公、奶奶也抓了……

（陈国良插话：民兵将奶奶五花大绑，吊在走廊的门柱上一天一夜，膀子都扯脱了。他们一直拷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朝死里弄。奶奶下身是光的，有些整法我说不出口哦。记得民兵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才敢从床底钻出来，搬一个小马扎垫在奶奶的脚下，让她稍微歇口气。我舀了碗水，要递给她喝，可人太矮，够不着。我哇的哭了，奶奶这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叫声"良娃子，奶奶活不了"。她那个样子比鬼还吓人，头发被拽掉了大半，天灵盖像个坑坑洼洼的核桃，脖子细得撑不起脑壳，抬一下，马上就耷下去，于是她鼓了几分钟的劲，再抬一下。我说："奶奶，你不要死，我找妈妈来给你松绳子。"奶奶呻唤着说："你妈给我松绳子，她也不得活，这是铁板钉钉的政策啰。还是叫你妈从她后家想想办法。"

老威：什么办法？

陈国良：妈妈和大妈的娘家都是大地主。我太小，晓不得大人们咋个设的法，在3天内端了一铜盆银子来，民兵才把奶奶放下地。家里人给她穿裤子，但是两腿已肿得套不进去。由于膀子从后面扎在一块好几天，一松绳，就瘫了，直到死，也是个残废）

老威：老人家，你娘家的情况怎样？

董存英：我后家在大松树村，19 岁做了陈家的媳妇，带了许多陪嫁，来到草海子。我不愿回头，免得伤心。在土改中，舅老公、舅老太都死掉，只剩一个侄儿子，养了一个侄孙子。他妈的，说不成了，都"改"光了。

他和大哥一直关着没放，余下这一窝人接到工作组和贫雇农协会的通知，滚出草海子！七、八辈人变牛变马，才有了这点根基，那个料得准，共产党一来，就要连根拔。他这个呆子，又把古书读翻山了，株连九族，戴枷戍边，这是朝廷重犯才有的下场啊。马鹿塘离朝廷几万里远，出了这万山老林，我们连只小虾虾也算不上。

老威：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

董存英：本来堂屋中央，还供有"天地君亲师"，列祖列宗的牌位，过去是允许带走的，而新社会，都当成封建迷信，先就叫穷棒子砸了。临走的那天半夜，娃娃们都睡着了，我放下还在吃奶的三女儿，与他们的公公、奶奶、大妈、还有小大妈一块，跪在草窝棚里，悄悄对着那世代相传的陈家大院作了揖。我们都哗哗地掉泪，可捂住嘴巴，不敢出一点声——如果民兵发觉了，要罪加一等啰。

第二天大早，出动了 30 几个民兵，还有十几条枪，先将我们押到乡公所登记。除了穿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否则以"对抗土地改革"论处。被撵出草海子，我们歪歪倒倒，走了一天一夜，只能以随身揣的 12 个荞麦粑粑充饥。

老威：草海子海拔高，这撒戈铲已快到山谷底了，气候还是要好些吧。

董存英：我们在高处住习惯了。那儿有去撒营盘和禄劝的大路，民国的时候，就与外界通商。相比之下，这边是个坛子，叫四面山封住了，出一趟门很不方便。

老威：我们从马鹿塘绕下来，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

董存英：你们是坐车一半走路一半啰。从撒戈铲去赶街，最近的场口是马鹿塘，

爬坡下河，腿快的年轻人也要走小半天。所以，要去就得满天星出门。如我这种小脚老太婆，几十年上去不了几回。

老威：万一病了咋办？

董存英：村里的卫生员发几颗药。严重了用骡马驮，颠簸不得就抬滑竿啰。

老威：太危险了。

董存英：习惯了就不危险。不过时间久，从山路上马路，再等过路汽车到撒营盘或禄劝，七弄八弄，说不定半路就报销了。所以，还是草海子好，哪怕是几十年前，也比撒戈铲的现在好。

我们刚下来，这儿穷得叮当响，连地主、富农都住土坯房子。我们没住的，民兵把我们丢在露天坝就不管了，还说，看月亮吧，这儿的月亮比草海子的好看。我们只得忍着饿，在避风的岩边边搭了一个草棚子，从坡上兜了些乱草铺地下。一家人就垫着草挤一窝，没被子，就脱了衣裳当被子；没吃的，就在荒坡间四处寻，兔子似的掏洞，能入口的根块、树皮、野菜全找回来煮。

熬到土改过后，他劳改去，大哥却意外地回来了，一家人又有了顶梁柱。他领着我们，几天修了一座小土坯房子，就算正式安居了。共产党的天下，天地翻了个滚，该轮到我们为贫雇农做牛马了，砍柴、喂猪、背粪、耕田，啥子都抢着干，才勉强糊口。接着，我们家也分了边边角角的一点薄田，凑和着种吧，人总得活下去啰。

（陈国良插话：后来又是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还有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和文革，我家是四类分子，公社、大队、生产队，每一级开批斗会也少不了。我家三子妹，因为受阶级成分限制，都没有念啥子书。老威同志你看，这是我二弟陈国聪，小我两岁，性格最像爹爹。认不了几个字，还喜欢翻报纸。如果环境正常，弄不好是个秀才。可在 1958 年，他才 11 岁，替集体放牛。天突然降暴雨，他急忙把牛往回牵。坡上太滑了，风又大，那牛有点老，眼睛昏花，一脚踩虚，就向岩子下栽。我二弟挽着牛鼻绳，抱住牛腿拼命顶。一个娃娃哪能顶住老牛啊，一个狗吃屎，牛就从他脑壳上压过去，翻了几个滚，落下岩子死了。

本来二弟也受了重伤，直到现在，他的脑壳都一下雨就痛。跟爹爹一个毛病，说不得话，记不得事。但地主子女摔死了集体的牛！这不反了天啰？这不是借牛进行阶级报复啰？生产队马上开全体社员大会，批斗我们全家。最后还决定，要二弟为牛披麻戴孝。

虽然是个娃娃，虽然二弟为了救牛，脑壳落下病根。可还是披麻衣，拖几丈长的孝帕跪在死牛旁边大半天，每隔半小时要磕三个响头）

老威：真够荒唐。

董存英：大山沟的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没个乐趣。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把阶级斗争当成乐趣。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就没药医啰。哪怕我儿子是个懵懂娃娃，大伙让他给牛当孝子，也觉得好耍。

我是个小脚老太婆，他们在土改时，硬逼着我在田埂上来来回回跑，一大伙人跟前跟后参观。跑不动，就用赶牛的竹竿抽。我栽进田里，满身泥水地爬起来，他们就拍着巴掌，跳着脚笑。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押着斗争了几百次的四类分子，都是些吊着半口气的焉巴老头老太，到毛主席像前请罪，跳忠字舞。嘴巴都不关风了，还要唱“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脚小，一转圈就跌跤，可偏要叫我转圈，他们好找理由打人，好捂着嘴巴笑。我还偏着耳朵听他们发议论：“幸好有了毛主席，弄些地主、富农来斗，要不贫下中农的日子也不好打发。”

老威：你能熬到如今，不容易啊。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去劳改，我以为永远回不来。民兵又把我抓去，打得

太凶，我受不得罪啰，就趁他们不注意，跳草海子自杀。可没两分钟，来了十几个人打捞。我喝了一肚皮水，还是叫人家从几米深的海子底，揪住头发提上岸。擀面杖在身上滚来滚去，我痛醒了，盯着上头明晃晃的太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死过了？却听见一个声音说：“狗日地主婆，还敢跳水，抗拒土地改革！”“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就是跑到阎王殿，也要把你弄回来！有种的又去跳。”接着就是打雷似地要打倒我的口号。

我被关押了一个星期，逼着交代自杀动机；我说没动机，就是不想活。他们就打，就说还没到死的时候。如果人民政府要你死，你想活也得死。而自杀是不允许的，你自杀，给整个草海子村的土改形象抹了黑。

我在大会上一次次认罪，死也死不起啰，要连累后代啰。所以只能活着，为共产党、毛主席活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着。嘿，想不到贱命这么长，85 岁了。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蛮高嘛。

董存英：1979 年，地富分子揭帽，他又从监狱回来了。

老威：平反了吗？

董存英：听他说，早两年刑就服满了，又留场。后来中国跟越南打自卫反击战，边境不稳定，就把所有留场人员清理一遍，该放的就放。

老威：没有一个说法吗，爷爷？

陈义尧：哪儿来哪儿去……我我我……

董存英：你就说两句啰。

陈义尧：哎哟，说不成，说不成！

补记

访谈勉强结束，已近午夜 12 点。装了十几个人的堂屋闷如火药桶。这个历尽劫难的家庭，年龄最大的 85，最小的已衔着妈妈的奶头睡着了。

我和老张被安排进孙儿媳妇房间，同床抵脚而眠。随着神经的松驰，便意袭来，于是我起身出门寻臭。不料那个曾为牛尽孝的迟钝的陈家老三竟闻风而动，举着电筒，顺院墙跟引路。山风呼啸，树影摇曳，我的衣裳下摆被刮翻起来。而脚下的石板嘎嘎响，如果不小心踏空，就会降落四、五米，躺在另一农户的房顶。

拐一直角，又上了 10 多梯土坎，陈三哥把我直送到屋后的茅坑前。一掀草帘就如厕了，可他还要手握电筒，电线杆一般立在外头充当警卫。这实在让人难堪，我强笑着，一再谦让，可对方更加有礼，臊得我不禁怒吼一声，夺过电筒，对方才醒悟似地撤退。

粪坑之上，横着碗口粗的木棒二根，我探入左脚，被惊扰的蝇群爆炸一般升腾开来。我赶紧缩回，变成憋急的兔子，不问深浅地往上直窜了几丈。方下蹲撒野。

畅快了没几秒，从对面山谷嘘嘘来了一阵旋头风，如一把无形的铲子，将我整个端了起来。无奈，我挪了个窝，要继续畅快，可外露的肉馒头却触电般哆嗦，我蹦了个高，转身拿电筒当机枪扫射过去——一条蛇！天哪，矛头形状的脑壳已直竖起半尺高！我差点就坐在蛇窝里！

我后迈两大步，一转身来个勇士跳崖，刚巧在茅坑外跌了个狗吃屎。动静巨大，惹得一柱强光自下方刺来，由于裤子已在膝盖，我的私处暴露无遗。

无奈，只能从头收拾旧山河，让站岗多时的陈三哥接应回屋。掀帐上床，倒头贴着鼾声轰隆的老张侧卧一小会儿，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朦胧起来。其间，因奇痒，梦游似的直坐三回，狂抓头颈、肩背、肚脐周边、大腿两侧，致使伤痕累累。

而后便无梦。

鸡叫数遍，接着是狗叫，牛叫，及猪叫。天蒙蒙亮，老张先起床，出外洗了把冷水脸，折回叫我“威老师”。

风起如昨，我觉得不必擦脸了，就抓起背包，登上新的旅途。

贫农酒鬼余金元（上）

采访前奏

2006 年 8 月 5 日早晨 9 点多，经过约 3 个小时的爬山涉水，我们又从撒戈铲村原途返回马鹿塘。冷太阳下的街面空寂依旧，双肩瑟缩的我敲开联络人孙如策的“美发厅”，里头睡的却不是他。可我们上斜对面的汤面馆刚落座，他竟出人意料地浮现了。

四张嘴围住圆桌，有声有色地吞掉四斗碗汤面，然后呼着滚滚热流出门，紧跟一身迷彩服的孙如策，一瘸一瘸奔向下一个工作对象。小孙虽然两眼辣红，也许心潮澎湃了一夜，却再也未提自己的私事。我猜是孙医生与他通了电话。

从昨日寻访民兵主任的坡口上行十来米，就插入一片直上直下的房檐，抬头仰望，恍若顺岩壁搭建的老积木玩具，于风中吱吱摇曳。小孙在蛇形石梯口与一喂猪的农妇打招呼，后者对我们微笑点头，斜指着苍天道：“老爹在上头等着呢。”

岩壁间，一个院落似一个玩具平台，我们曲曲折折拐上第三平台，那醉眼朦胧的大鼻子老头刚好自堂屋出来，冲我们嘻开了一览无余的瘪嘴：“欢迎啰。欢迎啰。”

由于地势高，从四周万山老林煽起来的风荡平了马鹿塘，自脚底往脑壳钻。我们赶紧跟老头躲入门槛，蹲坐在一窝余烬的火塘边。眼睛适应了两分钟，才混沌初开，我到底认清了最里面熏得黑红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还有“观音菩萨，秉令尊神，福禄财神，进宝郎君，地脉龙神，五谷之神”的字样。

老头扁着脑袋，嘟着鸭嘴吹火，角落里顿时尘埃弥漫。我不禁迷眼躲闪，连道“不客气”。好不容易有了火星子，老头得意地抬头，对我喷了口酒气说：“快烤火，一会儿又没了。”

因为疲倦，老张靠住蜕皮的老墙闭目养神。小孙用本地话为我作开场白，老头却打断道：“晓得啰，你昨天就介绍过啰。”而后转向我：“同志你喝酒不？”

我笑道：“酒不喝，倒是想喝口水。”

老头不以为然：“大清早，没有准备水。况且农村没有烧开水的习惯。”

我依旧笑道：“那就不麻烦了。”

老头将茶缸当酒盅举起，直抵我的下巴：“酒比水解渴，喝嘛。”

我只得啜一口，接着翻出录音机和照相机。带子扎扎开转时，我又啜了一口，果然不渴了。烈酒及烈酒浸泡的往事，竟如此激荡着那颗 83 岁的心脏，嘭嘭嘭，我已感觉到一种即将喷血的剧跳，但无力，也不想平息。

两三个小时，我们喝光了两大茶缸，约 1 斤半高度白酒，彼此犹如恋人，勾肩搭背，如胶似漆。可职业本能还让我一再按相机，拍下若干特写，包括嵌在那张老脸上的童稚目光。记得告别时，老头扶着门框，唱了一首土改时期的革命歌赠给忘年知己；我则鼓掌赞叹，如风中杨柳，晃晃然，飘飘然，拾阶而去。

可事后酒醒，我不禁出一头冷汗，这真是平生最凶险的一次拜访啊。

老威：老人家好酒量！

余金元：没酒量，只是喜欢喝啰。
老威：这酒如何？
余金元：马鹿塘本地的酒，比外头的纯。你尝尝就就明白。如果你不会喝，就使舌头舔一添嘛，先感觉到烧，有些冲鼻子，接着就是苦和麻，再接着，才是回甘。如女人的手，从嘴皮、舌头的两边，顺喉管一路按摩下去，直落到胃里头，还在继续拔火罐，一热一紧，很舒服。过了量也不会出多大的问题，死猪一般睡啰。第二天，脑壳照旧在肩膀上，不晕不沉。
老威：真是几十年的经验之谈。
余金元：贵州的茅台，你们四川的好多名酒，我在旧社会就喝过了，还是不如云南的土酒。马鹿塘的地势高，没酒不行，没大烟也不行。过去，这一带的人，无论穷富，都吹大烟。共产党、新中国来了，破除迷信，破除陋习，提倡新风尚。不准吹大烟，不准祭祖宗，不准供菩萨。就只剩下酒……
老威：你吹过大烟吗？
余金元：大烟是越穷越吹，越吹越穷。所以我只喝酒，再贵也要弄来尝。你莫小看这茶缸子里的东西，8 元钱 1 斤啰，一般从村上的作坊打酒，最多一两元 1 斤，我是要亲自守在现场，眼睛不眨地盯着出酒，头尾不要，只拿把壶接中间的。他说 8 元就 8 元，值得。
老威：这辈子，你对酒的感情胜过人吧？
余金元：不好说啰。酒不害人，人会害人。如果我滴酒不沾，挣钱干啥？就学孙如策他老祖，去买田买地，发家致富？那到了土地改革，就划大地主，连脑壳都保不住。
老威：你们家过去有多少田地？
余金元：没有田地。所以划成贫农了。
老威：那以前靠什么生活？
余金元：跑生意，就是低价收购本地的奶猪，再运到昆明高价卖出去。
老威：老人家算长途贩运、发展经济的先驱了。
余金元：我是做一笔生意就停下来，喝完了再做。父母骂我多少次，没出息!，可到了土改，划阶级，称大秤，我家自然是贫农。
老威：共产党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余金元：四几年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了。1950 年马鹿塘解放，好多游击队就变成了工作组，跟部队来剿匪、征公粮。我还记得住在大村的工作组里有个河南人，叫张志；还有个年轻女娃娃，姓周。他们四、五个人，在这儿开展了 1 年多的工作。
国民党的官进来是坐轿子，住乡公所；共产党是骑马，这让穷人觉得亲切些。他们一下马，就往最脏最烂的地方钻，不管三七二十一，替人干活，替人出头。访贫问苦搞串联，一心要把没房子没地的、没人管没人理的、穷得要饭的、混一天算一天的，总之，把天下最遭孽的撮合到一块，组织起农民协会；再从最遭孽的人里面，挑选最最遭孽的，进贫雇农主席团。这就是工作组要依靠的核心力量啰。
老威：你算不算核心力量呢？
余金元：安排我做过卫生组长。我的记性好，嗓门大，所以也叫我带大家唱歌。
老威：你会唱土改时期的歌曲吗？
余金元：整个马鹿塘，就数我会的歌最多。每场政治运动，都要学几十首，现在我记得的起码有几百首。
老威：你就唱首土改歌吧。
余金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土改工作组教的。我再唱一首：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
朝朝代代，皇帝坐江山。
现在呀，老百姓一定把身翻。
农民弟兄们快起来，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该我们人民坐江山，
幸福生活万万年。
毛主席呀坐江山，
人民的幸福万万年！万万年！

老威：这是哪年的歌？
余金元：1951 年，减租退押的歌。
老威：还有呢？
余金元：1950 年刚解放，工作组在村头教我们唱的是：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
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
共产党领导民族才能得解放。

还有歌颂毛主席的，调子也跟如今的不大一样：

南京到北京，
哪一个不闻名？
人民领袖呀，
就是毛泽东……

老威：嘿嘿嘿，笑死人了。
余金元：当年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唱，几里外都听得见。那个工作组的女娃子还站在磨盘上指挥，一遍又一遍，要叫剥削阶级听得发抖。还有迎接解放的歌：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朝阳升起来，
山花遍地开。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月亮升起来，
银光照大海。
欢迎海风吹过来，
风吹浪花开。

老威：还挺抒情的。
余金元：迎了解放，就要闹翻身，脚跟脚地来：

金凤子，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呀齐翻身，
大家喜洋洋……

老威：翻了身就搞土改，也是脚跟脚地上吧？
余金元：是啰，走一坡唱一歌：

土改的锣鼓到了每个村呃，
贫农和雇农一家人……

老威：有斗地主的歌吗？
余金元：好多年不唱，就忘了。我想想看……哦，还记得一首：

坡上的豌豆刚成熟，
狼心的蒋狗吃了它；
地里的包谷才长大，
背时的保长又来啰……
呀嗬嗨。

老威："蒋狗"是谁？
余金元：蒋介石及走狗。
老威：嘿嘿嘿，让我喝口酒。
余金元：你笑我？老了嘛，牙齿缺了，嘴皮又不关风，所以就跑调了。土改时我才20 多岁，喉咙亮得很，工作组经常表扬嘛。你还在笑？嘿嘿，牙齿没有你多，可命长，见的事就多啰。抗日战争，云南是大后方，全国各地来昆明的流亡学生可密了。我跟他们学会了《松花江上》，回到马鹿塘也哼哼。洋盘啰，泥腿杆，哪个会这种歌？晓不晓得"九一八，九一八"是啥子意思？
到了 1952 年，划阶级，分土地，我们家 16 口人，分得不少……
老威：到底多少？
余金元：记不得了。过去我是贩猪的，不习惯种庄稼。共产党硬要分土地，就只好种了。还买牛买羊自己养。
老威：由生意人变农民了。
余金元：原来也是农民，祖宗多少代都是农民，要不，咋个不住城里面？扯远了。总之，贫雇农都得了共产党的好处，《地契》，还有《租地合约》，从地主家搜出来，开完大会就统统烧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连成片，重新丈量，再按你们家、他们家多少人口，平均划多少亩，肥瘦搭配。政府发给《土地证》，地多少，房屋几间，宅基地出来多宽，都明明确确写在上面，盖政府方方的大红印。
我家白白地分地，先还不敢要，觉得不踏实。后来工作组和贫雇农主席团来做工作，一定要要！我一高兴，就想唱《松花江上》，可又感到它与工作组教的革命歌不一样。就找到女娃子小周说，我在抗战时学了一首歌，不敢唱，害怕它反动。小周说，你先悄悄唱给我听听，不好今后就别提了。于是我麻着胆子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想不到，小周一听就跟上来了，并且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歌，为东三省沦陷作的歌，为啥不唱？
老威：白得了地，唱点人家喜欢的歌，也划算嘛。

余金元：嘿嘿，大形势啰。
老威：除了哼哼唱唱，你还晓得啥？
余金元：我晓得红军从马鹿塘过，那个时候的地主叫土豪，红军抓土豪，叫“绑肥猪”。家属如果不在期限内多端几铜盆银元出来，就要张贴告示，召集乡民，当众杀猪啰。这村上，我们的老人，有跟着红军跑的；有带路去皎平渡口会师，吃不得苦，又开小差回来的。后来打抗战，红军成了八路军，脑壳上戴青天白日帽徽，服从老蒋；再后来，又换回五角星，叫打倒老蒋的解放军了。云南解放那会儿，昆明驻扎的是卢汉的国军，与解放军在郊外对阵，双方都朝天打枪。跟着搞到一堆，卢汉的兵就统统换五角星了。
老威：再后来呢？
余金元：国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和平解放。游击队变工作组，下乡来搞征收。50 年清匪反霸，51 年减租退押，52 年土改，53 年复查——成份划过火了，不符合实际的，就降下来；因掌握政策过于保守而漏划掉的地主、富农，该升就升上去……
老威：马鹿塘这边土改复查过几次？
余金元：就 53 年一次。政策有变化，工作组又下来了。以前都是用贫雇农主席团，那些最最遭孽的。几个要饭的公报私仇，乱划了成份，乱杀了人，我们这些主席团外边的，都说不起话。这次好了，不要主席团，工作组找上门，与我一头睡觉，拿书本本念给我听，问我们肚子头有没有气？尽管发。
我们村有富农升地主，也有一两户贫农升成地主；降下来的有三、四户。村头老袁家的三公公愿赌服输，解放的前几年，把房子、牲口、田地全部抵押给了孙乡长，剩个光屁股，土改复查就由贫农升为破落地主。后来政府发《土地证》，他跪在田坝里笑：“呵呵呵，这个地主才值得哦，分了两间房，还赶条牛给我。”
老威：凭刚才激情澎湃的歌声，老人家你是名符其实的土改积极分子。
余金元：我虽然没参加贫雇农主席团，可唱歌、跳舞、开大会，还有办墙报，为刷标语的提浆糊桶，样样有份。
老威：墙报的内容是什么？
余金元：农民多数不识字，工作组就画些表格在墙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大家来评议。比如某某人是大户，或者在乡公所，或者作威作福，或者有奴仆、丫环，或者有通匪嫌疑，总之是坏蛋，上头一念名字，下面就抢着在他的名字旁边，一颗接一颗，画一堆耗子屎。如果你是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或者上顿吃了无下顿的遭孽人，就画大白米；赌钱、做小生意、吹烟，有其它恶习，可没剥削人，还向共产党靠拢的，就画小红米……
还画了好多种粮食啰，我都不太记得了。男女老幼，每人都上，给自己，也给别人画。这是动员阶段开的会，又热闹又好耍。
老威：你给自己画的什么？
余金元：当然是大白米啰。
老威：你做过奶猪贩子嘛。
余金元：我心里有数。政府让农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一定不要手软。当时大家全盯着，你会觉得脸皮火辣辣，可过后就特别踏实。
老威：你这 80 几年的酒真没白喝。
余金元：你又笑我？
老威：我天生爱笑。好好，罚一口酒。
余金元：我大你几十岁，你要加紧喝，才能赶上我的进度。
老威：还没赶上你，我就醉死逑了。

余金元：我天天鸡叫三遍就起床，一个人坐在这火塘边喝，也没见醉死。你摸摸我的手杆，没有抖嘛？你再摸摸我的腮帮子，如果我瞎鸡巴款，你就扇它两巴掌。好多比我清醒的、聪明的、不沾一口酒的，都跑到我前面去死了。我劝他们慢点，莫整人害人，莫操心过度，莫削尖脑壳往官帽子里钻，都等不得，非要早早死给我看。
老威：老人家扯远了，也罚酒一口。
余金元：开会，白天黑夜都开。我那时没满 30，在家里对婆娘说，把国民党手头全部的会加起来，也没共产党 1 年的会多。
老威：划阶级的会是咋个开的？
余金元：几百上千人参加，工作组简单动员几句，就坐上面，稳起不吭声了。只由村里的主席团说话。在国民党手头做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替他们跑腿的、吹喇叭的、在村里乡里耀武扬威的；还有神通广大的、富得流油的，统统是恶霸地主。矮一等的，虽然达不到以上级别，可在减租和退押中，拖拖拉拉，消极对抗，甚至隐藏财产，想方设法逃交罚款，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划为不悔改地主。又矮一等的，按田地、奴仆、长短工、收租子等称大秤的标准，评为普通地主。再就是现在衰败了，可查家庭历史，或曾经称得起大秤，或与旧政权有牵扯，就评为破落地主。再矮一等的就是富农，分恶霸富农、普通富农与劳动富农。接着是中农，富农达不到，做中农又冒出去，就是富裕中农，跟着是一般中农。
再底下，就是贫农了。再再底下，就是雇农，除了人一根，啥子都没得，在旧社会最最遭孽，最最叫人看不起的。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
余金元：打工仔算个逑。那个时候，雇农被共产党请来坐上把位，是最最吃香的。主席团里头，如果有两三个雇农要你死，肯定就不得活，因为工作组只听他们的。
老威：为什么？
余金元：亲不亲，阶级分啰。毛主席说过，他们革命最彻底。
老威：应该是“绑肥猪”最彻底。这也算从红军时期一路继承下来的盗匪传统。只不过人家打下江山，成了正果，绑肥猪的自己倒吃成了超级大肥猪。如今，有人再要学习前辈绑猪，恐怕已没哪么大的力气了。
余金元：搞逑不懂啰。来，喝酒喝酒。

贫农酒鬼余金元（下）

插记

谈话才开展了不到两个小时，酒已经喝了 1 斤多。我的脑袋不由自主耷下来，老头却越战越勇，二目神光四射。我先后起立几次，到屋外借冷风与冷水醒酒，还好，体内动静不大，起作用的大概是此前的那碗汤面。

为了召唤或者戏弄我，老头又把“背时的保长回来啰”唱了一遍，还跺脚转圈旋到门旁。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我就从他手中夺过茶缸，灌酒一口。待两人复位，我撑起眼皮，也竭力让自己射出神光，以产生逼视的现场效果，使访谈及有关酒量的口水战能够进行到底。

其实我天生没酒量，稍微一沾，注定从脑顶盖红透至脚底板。上个世纪 80 年代做诗

人，只咂几口葡萄酒就胡话满篇，与历朝历代及同时代之嗜酒如命的众多诗人相比较，可谓狗熊气短。不料发生六四，更不料我写诗写进了监狱。出来后，物是人非，我诗兴没有了，却时常喝两口闷酒，无所谓好坏吧，也发不出“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高级感慨。搞《底层访谈》那会儿，我在成都殡仪馆隔壁的烂茶馆里，偶与遗体整容师老张结识，为了套近乎，进而套出他秘而不宣的身世，我竟舍命陪他喝了七、八回酒，每回都翻倒在硬板凳下，人事不醒。拿老张的话说：“除了一口气，跟尸体也差不多。”

我从未觉得酒好喝，感谢抱过无数死尸又来抱我的老张，栽培起了这点酒量，自此厮混江湖，倒无大碍。在云贵高原，我最喜欢的是 50 度以上的青稞酒，纯如水，却烈如火，喝它犹如猛士跨门槛，一道又一道，往深处走去。先还跨得顺，渐渐的，就会感到趺趺撞撞，体力不支了。在这个时候吹几口箫，再吟啸一阵，就觉得眼前的世界那么远，那么远，似乎在无数道门槛之外。门槛外面的人（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缥缈得只有米粒大，你往上升或往下沉，想在哪儿就能够在哪儿。先秦？魏晋？唐朝？都行。至少你可以用那种语气与人说话，而不会被人怪罪。晋朝的阮籍为了躲避做官，竟赶在司马昭的使者到来之前狂饮，死尸一般趴在案桌上，三天三夜不起。你看，酒是多好的保护伞，它至少让老阮在暴政之下，即张扬了个性，又得了善终。哪像圣人稽康，脑袋都快掉了，还那么清醒地弹琴，将一腔热血寄托于丝弦，寄托于时过境迁的春秋刺客聂政，真是可怜可叹的精神自摸啊。

由此我联想，在警察登门之际，我等反动文人能否也学习先辈，狂饮一番，醉他个三天三夜？万一警察也晓得阮籍的老掌故，有雅兴重演呢？太可笑了，该不该扇自己的嘴巴？因为在实际生活里被警察堵住，只会有两种清醒的结果：越窗而逃或束手就擒。酒是没用的，哪怕烂醉如泥，也将被弄上警车，丢进局子去受审。

该如何就如何，就像眼前这个老酒鬼说的：“该你死就不得活。”
哪怕不胜酒力，我的录音机还是开着。可灵魂深处的空虚、恐惧是录不下来的。现在好多了，老头儿，我再喝一口，你满意了？

老威：继续讲嘛。
余金元：讲啥子？
老威：土改，划地主。
余金元：马鹿塘的大地主，孙家多啰，6 个老祖（曾祖父以上的通称---老威注）都是地主。他们这个家族根基深，清朝开明老祖的时候，就从曲靖的小衡山往这边迁了。不仅开垦万山老林，还办铜厂、办纸厂，出了许多做生意的好手。后代也很密，主脉在马鹿塘，禄劝和则黑的大住基村也有，其它地方串没串种，我就晓不得了。到了二三十年代，还出了个孙万昌，号称“孙百万”，据说在昆明和禄劝都办有铜厂和纸厂，摊子极大，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

老威：算个受国家扶持的农民企业家，类似如今靠“希望牌饲料”发家的刘永好吧。
余金元：可到了解放那会儿，孙家已经衰败成空架架了，只是名声还算大，于是统统划为恶霸地主。加上其他姓，马鹿塘一共有十几户地主。除了人以外，对地主的所有财产实行没收，对富农则实行征收。
老威：什么叫征收？

余金元：房子留着，外面的财产，包括田地、租石、别人的欠帐，全部要征收。牲畜要征收，梁上的腊肉、过年猪也征收。此外，每户富农，一律罚款 300 元。当时的骡马价才 50 元 1 匹，所以搞得富农也喊爹叫妈啰。
老威：交不起咋办？
余金元：交不起就抓，就关，就翻来覆去开斗争会。饿你，打你，让你跪瓦碴，跪烂泥坑，吊你个几天几夜。还有烟屁股、辣椒水、大杠子，不把屎尿给你整出来！再不交，就要喊“开牌”。
老威：麻将牌还是长牌？
余金元：拿炮火敲你的茶壶。

老威：啥子鬼茶壶这么值钱嘛。
余金元：茶壶就是脑壳，一炮火崩掉脑壳，当然一了百了，不值钱了。可富农的日子肯定比地主好过，至少还有房子，罚款数额也明确。对地主的罚款是一路往上涨的，你给得起 300，就再添 100；400 给了，还要增加到 500，甚至 600，就是不封顶。上面的政策，理解得通俗点，就是又挤又捏，直到榨干剥削阶级的最后一滴油。工作组的同志说，如果将地球上所有地主、资本家的骨油统统榨干，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老威：有没有交不起罚款被崩掉“茶壶”的？
余金元：孙姓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啥子都没收了，大半年，罚款挤了 550 元出来，还差 50，任你咋个整，把脚杆手杆弄断，也交不起。有天早晨，太阳刚刚露脸，民兵就将他架到坡上，当面挖了一口井，然后端枪指定他说：“最后问一句，交不交？”大公公吓得哆嗦，手脚绑住了，还一个劲儿磕头，脑门子都栽烂了。人家又扳起他的肩膀说：“等你一句话啰。”大公公磕不下头，眼泪如垮堤一般淌下来，他干嚎了一声：“找不着交啰!!”
人家可没手软，说：“找不着？开牌!”一炮火冲后脑勺去，轰隆！人就趴起了。

老威：50 元一条人命？
余金元：村里人都说，大公公家大业大，到头来还抵不着一匹骡马钱。
老威：还杀了哪些地主？
余金元：光交罚款这一场，就镇压了三、四个。孙姓六老祖家的大公公，一辈子节约，不但穿补疤衣裳，连拉在路上的屎都不肯浪费，要包回来肥地。所以没有人晓得他到底积攒了好多钱。经过减租退押，赔罚不封顶，弄他跪了十几天瓦碴，膝盖烂成两个窟窿，鸡巴已经尿血了，还口口咬定“没钱”。于是全家老小都被圈拢来，陪他跪。没一会儿，女人们就遭不住，又哭又喊：“老背时的！老挨刀的哟！为了几个钱，全家人的命都搭上啰!”这一闹，老吝啬鬼就垮了，两个拳头又捶胸又捶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带你们去挖！带你们去挖!”周围的民兵一听，高兴得拍掌，立马架起他跑了 1 里多路，才在一个荒园子边边刨出 6 个大白锭，每锭银子足足有 10 两。
四老祖家的孙光诚是个烟鬼，他把鸦片膏埋在盐巴坛子底下。枪抵着他，把一坛坛盐巴搬开，挖几锄，烟坛子就露出来。开了封，乌亮亮、黄澄澄，一坨又一坨，全是上等货。
老威：割肉哦。
余金元：存了几十年的鸦片膏，跟金条子的价钱差不多啰。

老威：交干净保命嘛。

余金元：没有一个地主心甘情愿交钱。不斗争，银子不会自己长腿跑出来。开头，尽管大形势和政策都明摆着，地主们还你比我，我比他，甚至学“狡兔三窟”，将浮财藏好几处。拿工作组的话说，敌人总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可结果呢，人吃了亏，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可罚款不能不交齐，否则“茶壶”难保。
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说话算数，多数地主还是释放了。养完伤，熬到重新落户、重新分地，无论好歹，还是有一份啰。只要没判刑劳改，都给出路。地主中也有老好人，干活比贫雇农更卖力，大家都看在眼里。1958 年，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也一概入社，成为和大家一道评工分的社员。
你问杀了多少地主？我得扳指头算一算。清匪反霸到减租退押，光孙姓家族，大老祖家就死了大公公、二公公、三公公。还有二老祖家的二大爹和孙乡长孙大恩。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四老祖家的孙光诚，孙百万家的孙维汉。六老祖家的大公公。其它家族，死了赵家强、方少先、朱洪葛、陈仕统、陈仕章、高本伦、李荣胜。还有哪些啰？记不起来了。
总之，在伪政权手头做过事的，与解放军对着干的，有血债的，拉贫雇农主席团下水的，窝藏财产抗拒土地改革的，贩过烟摸过枪的，大家觉得不太顺眼的，一个都没有逃脱。我亲眼看见，就镇压了好几十。马鹿塘、撒营盘、则黑、皎西、皎平，公审大会转着圈儿开，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人。

老威：马鹿塘乡毙人在哪儿？
余金元：张家坟场。就在我的房子背后。那是张家的祖坟场，清朝、民国一直到解放，坟包密密匝匝。土改时候，在里面镇压了五、六次恶霸地主。
老威：每次崩多少“茶壶”？
余金元：5 颗以上。镇压方少先是在 1950 年。当时从他家里搬来两张八仙桌，叠在一起，足有 3 米高。这姓方的 30 多岁，长得牛高马大，旧社会当过地方民团的团长，连土匪见着都怕。几个解放军把他弄上桌子，虽然五花大绑，可叫他跪，他就是不跪。下面的人吼了几回，他还是要站起来，说要盯着太阳走。死到临头，就由了他。黑压压一大堆人在下面，仰起脑壳，却只能望见他的下巴。有人问他：“方少先，你打过共产党游击队没有？”他回答：“我晓不得。”又问：“你做过什么？”他回答：“我做过团长。”大声武气的，没有一点虚火。
下面安静得很。一般农民哪见过这阵仗，埋起眼睛不敢看。只听得姓方的又吼一声：“有没有酒？”下面应一声：“有。”
“赏一口嘛。”
“给他酒。”
腿快的人舀来一满碗酒，当兵的一手挎枪，一手从一片人头中接过去，说：“方少先，脑壳埋下来。”
姓方的蹲了下来，伸脖子来就酒碗。
当兵的手短，够不着。就说：“坐下来，慢慢喝完再走。”
姓方的就坐在两张桌子上，当兵的还是够不着。于是和另一个当兵的商量，两个人叠起来，终于将酒喂上去。
姓方的叫了声：“够意思。”就呲出牙齿，轻轻衔住碗边儿，猛一仰血糊糊的脸，哗的泼进嘴巴。
跟着一声破碗响。再跟着一阵排枪。姓方的脑壳烂完了，连胸脯也全是蜂窝眼。他坐不稳，就从两张八仙桌上倒栽下地，半截颈桩插在一个坑里。两秒钟，他弯了一下腿，又啪地蹬直，翻了两转，才不动了。把大家骇得天昏地暗，人群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拢

来，婆娘娃娃都惊乍乍地叫。

老威：我都听得受不了。来来，喝口酒。
余金元：酒鬼啰，要死得干脆些。
老威：有死得不干脆的？
余金元：烟鬼孙光诚就怕死。镇压他时，民兵拖着到了井边，喊“跪起”，他却瘫起了。眼睛里全是一片白，拽来扯去都弄不正，就要将就着打了。可枪筒子指着脑壳轰一炮，他却一偏，转身就抱住毙他的那个张天佑。吓得人家哇哇地鬼叫，甩了枪，爬起就跑。但是又跑不动，因为被孙光诚圈住了腰杆。一堆人扑上来，打、踢、枪托子捣，牙齿都整飞出来了，孙光诚也没放手。这个倒霉的张天佑哦，裤子扯脱人才扯脱。原先还以为毙人是好差使，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最能体现对剥削阶级的恨，结果被骇得光溜溜地满山跑，全村人都去追。

老威：孙光诚呢？
余金元：换人换枪啰。黑着一张脸上前，大吼：“死都死了，你还要哪样？！”轰隆一炮，人倒地了，咕咕地冒血，却还在叫唤：“呃，咋个打的嘛？！”于是再轰一炮。孙光诚的身板猛一下绷得直直的，接着翻半个滚儿，咽气。
老威：他妈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余金元：遇到困难喝口酒，阎王不得勾你走。
老威：喝一口就喝一口。
余金元：转个眼，这些人就死了几十年，记不得提不得！遭孽哦。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死吗？
余金元：该死也死了，不该死也死了。管逑他，喝。
老威：你还晓得哪些？
余金元：这地方属于撒营盘区，彝汉杂居。彝族那边有龙家、禄家土司。土改时候也毙掉了不少。龙家娶鲁坝的一个姑娘做土司婆，花 60 两银子打了顶凤冠，因为太沉了，只在大婚仪式上戴过一回。解放军清匪反霸，一家家围剿大户，解除武装，没收财产，鸡犬不留。轮到龙家，当家的镇压了，土司婆也逃不脱。毙她的那天大早，我们赶到撒营盘，正碰上解放军拿枪逼她穿上拖地的彝族带裙，戴起 10 来斤的凤冠。

老威：演戏吗？
余金元：凤冠上的银链子叮叮当当的，还真像戏台子中的皇帝娘娘。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连树上房上都挂满了人。可当她穿戴齐了，解放军却递过去一把笤帚，命令她当众扫地。土司婆以前都有丫环服侍，哪干过活儿？只见她像个木头人，一扭一扭，带裙与笤帚都在扫地。没一会儿，凤冠就压得她受不了，汗珠子淌成了两条槽。她向解放军打躬作揖：“报告大军，请允许拿掉凤冠。”解放军回答：“不允许。土司官爱这个漂亮，你就顶着它劳动嘛。”
土司婆没办法，继续扫地 1 个多钟头，一直到早饭时间过，人快晕了，才剥掉那身遭罪的行头，换了平常的穿着。和方少先一样，她也是在两张叠起的八仙桌上被毙掉的，像个女鬼从戏台子栽下来，骇人啰。

老威：唉，人生如戏，老人家喝酒。
余金元：这马鹿塘太穷了，太穷了就恶。现在好些，可同外面相比，还是差劲。年轻人，男的女的，都往外跑，不跑不行啰，跟我年轻时一样。刚解放那阵子，穷是穷，

可热情高涨，跟着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起来斗地主、富农，分地分财产，有奔头。有一阵子，天天有会开，没衣裳穿没饭吃也天天有会开。枪毙恶霸地主，大家欢喜得跟过年似的，天不见亮就起床，守在火塘边，也不生火，就那么干冷干熬。为啥子，为开公审大会啊。为早早撵到那儿啊。看富人被押上刑场，都拉家带口涌过去。轰隆、轰隆，连着几炮十几跑，那边人还在抽气，这边多少双眼睛已鼓鼓地盯着，又是为啥子？为冲过去、扑过去、蹦过去抢衣裳啊。都想着第一个到死人跟前，将他们的衣裳、裤子、袜子、鞋都剥下来！还有帽子和头帕，叫子弹射烂了也要，浸透了血，甚至粘着皮肉也要，怕啥子，洗一洗、缝一缝、补一补还可以穿。这是白捡的，是村里乡里的大户穿过的，总比自家的破衣烂衫强。

老威：每次毙人，大家都要去剥衣裳吗？
余金元：非要把阶级敌人剥得精光。有的人贪心，一家子跑两三趟，往家里抱衣裳。惹得腿慢的穷棒棒火冒三丈，就在死人旁边打起来，搞得又是泥又是血，很丢人。如果死人的皮能穿，估计也扒下来了。因为有的人，明明眼前已经一丝不挂，还在翻来翻去琢磨。连屁眼也用树枝搅几遍。遭孽啰。

老威：哪个遭孽嘛？
余金元：都遭孽。穷得要饭也遭孽，富到后来被镇压也遭孽。想想嘛，大家有吃有穿，何苦去折腾死人？村里有两三个光棍，冷慌了，抢来衣裳，洗都不洗就往身上笼，结果没裹几天就烂成油渣子，棉花里子起坨坨。狗日的，也不怕叫血腥气冲着。
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子孙维汉，旧社会算比较威风，可在土改中崩了“茶壶”，光溜溜的，没得人收尸，就被一脚踢进沟里了。哎呀，那个时候，万山老林的野物都吃肥了。眼一闭啥都晓不得啰。光也罢不光也罢，都填了大坑。衣裳随他抱，行头随他抱，骡马随他牵。婆娘娃娃呢，想送没人要。嘿嘿，身外之物。小同志，喝酒。
老威：喝。
余金元：我们中国有 100 个省吧？
老威：没那么多。
余金元：那就 13 个省。
老威：好像少了点。老人家你醉了。
余金元：该吃晌午饭了。我们吃了款，脑壳要好用些。
老威：要赶路。就不打搅了。
余金元：不急啰。
老威：酒在肚子里还没消化呢。

土改受害者孙如勋

采访前奏

我对老酒鬼余金元的最后印象，是他横着烟竿，鼻子尖直抵相机镜头，似乎要钻进去琢磨个透彻。我本能地一仰身板，还他一口酒气，并拍下那满脸的迷惑。

这高海拔的山窝，四周的峰峦显得矮。我与所有的醉汉一样抱紧双肩，感觉太阳是块冰，不间断地冲人类喷射凉气。我不甘示弱地仰起头，可一出气，眼镜就蒙雾了。

老张将面包车从几十米外挪过来，拽我上副座，然后急匆匆地出马鹿塘，奔向下一站。

由于是旋来旋去的下坡，老张的手脚忙得跟打拳似的，我则乘着酒兴，随他腾云驾雾。这是盛夏八月，山道旁居然走着穿棉袄、扛锄头的乡民，我贴着车窗，挤扁着鼻头嘀咕“奇怪”，老张却答非所问道：“他们去坡上找药呢。”

“什么药？”

“人参、天麻，还有虫草啥的，拿到禄劝去卖给中药材贩子。”

酒劲如波涛一般涌动。身体骤然燥热起来。我心不在焉地哦哦，就开窗去喝口冷风。虽然连打了两个喷嚏，却明显感到太阳有了热度。车又驶出 10 多里路，我们像蛇一样，逐渐蜕皮。筋骨也随着衣裳的减少而舒展了。

一辆挖掘机横在路中，正以它的巨臂猛啃鼓胀的地面，老张骂了句粗话，紧咬着一串大型载重货车的屁股刹车。我已清醒如常，就下去打听情况。原来是豆腐渣工程，这段公路整修才几个月，又出现与上次同样的塌陷。一个卡车司机说：“我刚好尿胀了，就靠边停车，不料竟眼睁睁地盯着路中央凸一个包起来，而且一眨眼就由篮球变成簸箕，再一眨眼，嘿，一个簸箕就变成两个特大奶子，还卜卜冒气。我的尿筋都叫吓缩了，万一像平常那样碾过去，肯定连人带车垮进沟里……”

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将修公路的，以及卖水泥、碎石和沥青的爹妈与祖宗都日了数遍。有个络腮胡子说：“这有啥稀奇？连长江的防洪坝都是豆腐渣工程，98 年发大水，拿了好多解放军去堵漏洞。朱镕基都哭啰。”

另一个小伙子也凑热闹：“我们中国人连导弹都敢造假，外面是钢的，内瓤子是木头削的。最近中央领导去河南视察，才曝的光……”

老张在一旁捂着嘴笑，我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轰轰吼叫的机器，但见铁臂左旋右旋，将抓起来的豆渣浮土扔到坡下。如此恭候了大半个小时，方得到“小车通行”的恩准。

过了这一关，车开得更猛了，转瞬就直逼山脚。在昨天经过的岔路口拐了个 180 度的急弯，又驶向我在去年底来过的通往则黑的老路。在随惯性摇摆之际，我瞟见写着“大松树”的箭头路碑，蓦然感觉亲切。因为此即嫁到大山另一面的地主婆婆董存英的娘家，也不晓得这一片有多少人在土改中死于非命？

下行了一小段，又是爬坡。记得大半年前，才修成这种两边砌条石的“水渠路”，可如今看上去，又显得饱历沧桑，一有会车或超车，就尘头大起。老张在门窗紧闭的车内，脖子前挺，眯缝着眼，仿佛在硝烟弥漫的年代驾驶战车。

渐至山腰，视野豁然开阔。但见对面的群峰之间，也有一条路跟我们平行，车辆犹如三五只瓢虫，在大片裸露的肉红色中间闪烁移动。急弯的标志很多，在拐过一山嘴后，老张的情绪却陡然高涨，居然哼了半截子山歌。我诧异地转眼，老张信手往窗外一指：“我的家乡。”

“在哪儿？”

“那边。”

那边有圆盖子一般的蓝天和阳光，峰峦在几抹云彩的掩蔽下，像一些缥缈的拳头；还有深不见底的沟壑，仿佛造物主用无形的巨斧自极高处劈下，震裂而成千回百转的地槽。

老张见我一脸茫然，又说：“眼前这扇门板一样直上直下的山峰背后，是升发乡，车过不去，走路得两个多小时。我的家在北增谷，从升发再往里走 1 个小时就到了。”

“那你欢喜个啥？”我沉下脸，头皮一阵发麻。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是撒营盘教

区的张蒙恩牧师，老家刚好在升发乡。

“这里的山山水水养人啰。”老张还在发感慨。“可惜我现在很少有时间回北增谷，家搬出来了，爹妈不愿出来，他们是地道的地主思维，生下来就没想过挪窝。”

“怎样才能快一点到升发乡？”我打断他的话头。

“再跑 10 来公里，就是德嘎村，那儿正在建一座基督教堂。我们把车停在村头我婶子家。就绕山路进去。”老张神色轻松，“赶紧一点，天黑之前能到。”

“路好走吗？”我终于露了怯。

“跟昨天的差不多。彝族人的地方都是老山沟，这坡与那坡差不多。”老张还在盘算，“你就住在张牧师家采访，我呢，抽空赶夜路回北增谷看一趟爹妈，明天大早又回来。”

腿肚子不由自主哆嗦，“听天由命吧，”我嘀咕道。

“你算城里人中的这个。”老张翘着大拇指安慰道。“张牧师还给我施过洗呢。你一个作家，这么大老远去找他，肯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可一记起昨天连滚带爬的狼狈，就觉得没底气。

下午 2 点多，我们在一个 V 字山坳停车。天阴了几分钟，荡妇一样的风就从地槽里呼啦啦地张狂上来。老张死按着衣裳下摆，立着头发去教堂建筑工地打探张牧师的具体行踪，我则在车里整理背包，兼耸肩捶腿，作上路准备。不料没一会儿，老张就笑嘻嘻地回来了：“算你运气好，张牧师正从升发村过来，今晚住德嘎。”

我这个懒虫顿时可耻地大笑。

下面的计划就比较轻松了。我们先沿上次的老路进军则黑，在比邻的住基村采访后，再折回来。“今晚住则黑，找家干净旅馆，把精神养足。”我也打起了如意算盘，“如果能抽空，还能再访张应荣长老和地主婆婆张美芝，追问出张家的长工是否健在。”

车往前，我又在某一高度眺望了更高的轿子雪山。它离太阳很近，彼此的呼吸已在互相触摸。我想起若干年前的诗句：“地说，我要接近天，于是山峦耸起。/人说，我要生活，于是洪水退去。/河流优美地延伸。”

浪漫的情绪刹那间被鼓动起来，可创作上述原始诗句的朦胧派江河却早已迁徙美国。听说是个西方古典音乐迷，采购了许多交响曲光碟在纽约的某一间屋子里放。

我这个曾经的诗人在怀旧当中，感觉下坡路也“优美地流着”，打个盹就在山脚了。外面蓦然人烟滚滚，“又是一个赶街天。”老张道，就抵着几架骡马车减速。车窗前晃动着花花绿绿的彝族妇女，老张悠闲地点燃纸烟，扶着方向盘与她们调笑。偶尔鸣一声喇叭，也显得不太正经。“你的熟人真多啊。”我讽刺道。老张点点头，又摇摇头：“都是村里的乡亲，或者一个教会的。”

突然，有一只手自斜刺里扯住老张的耳朵，要求搭车。门一开，男女老少就汹涌澎湃地进来，把空间塞满了。初步估计，这辆 7 人座的小面包，至少填了 16 个活物。我天生好奇，就回首两次。不料未及细看，那一张张重叠的脸就笑开了花。也不晓得有啥好笑的，我问老张，我是不是花脸？老张说，你不是花脸，你是长眉毛和尚。

满车的彝族话泛滥开去，犹如喳喳鸟叫。我恍如置身异国他乡。就这样拖拖沓沓，与骡马车同步抵达场口，老张众多乡亲的手与我拍肩告别。在皮笑肉不笑中，我看上了一个彝族女子的刺绣围腰，就花 50 元给她解下来，准备送给刘晓波的老婆。省得她挖苦我在穷山沟里钻，却连一根兽毛也没带出来。

慢腾腾穿过这百米短街。想起孙医生讲过，新加坡的一个国际慈善机构曾经到一

个类似的乡场送医送药。他们花钱雇人搭戏台，在台上码了价值几万人民币的西药，在西药的上面扯了鲜艳醒目的大横幅。几位衣冠楚楚、细皮嫩肉的绅士犹如救世主，给川流不息的褴褛乡民发药。“不管有病没病，有效没效都发，”孙医生说，“然后将这些一拥而上抢药的感人场面拍成片子，写成长篇报道，拿到海外去赚人眼泪。他们才不管中国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听说独裁者李光耀还表彰这些医盲为新加坡争了光呢。”

愤世嫉俗之余，我拍下一面土墙上的政策标语，作为以上“行为艺术”的国内佐证：

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利国利民利己！

午后 3 点左右，我再次到达山区小镇则黑。老张把车停在我倍感亲切的教堂脚下，就忙着去打探大住基村的孙家。我却在太阳里狂伸懒腰，并东张西望，希望能碰上一熟悉面孔。从向阳的“三春饲料经营处”门前，一个 20 来岁的母亲转头招呼我。她依旧灿烂如女孩，可已习惯摇晃背上 1 岁多的娃娃了。我顺便问教堂的人在哪儿？她答在乡下，就只笑不吭声了。

没有功夫吃午饭。老张摸准了情况，就立即折回车头。我们又一阵风似的甩开一排排门脸，在野地里继续前行。顺平路跑了几公里，就左拐，翻越一座矮山。桃花源般的田园风光浮现了。

在庄稼地之间的机耕道上走走停停，沿途向村民打听大住基 2 队的孙选超。孙医生在纸条上写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没料到，当车颠入苞谷林深处的一个院落，并嘎的刹住时，应声而出的却是一个 20 出头的小伙子。

“你就是孙选超？”我使劲擦亮眼睛。

孙选超含笑点头。他的眼睛不用擦也清澈明亮。

“我是孙医生介绍来的。专门了解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孙选超的眼睛蒙上一层雾。

“就是斗地主。你们家不是地主么？”老张补充道。

“哦。”孙选超恍然醒悟，“那要我爹才晓得。”

“你爹多大？”

“50 好几了。”

“不行，土改的时候你爹还没断奶呢。”

“但是他听我公公讲过啰。”

“你公公呢？”

“早死了。”

“你公公的同辈人呢？”

“差不多死光了。即使活着也差不多糊涂了。”

“你的意思是，我这一趟白跑了？”

“孙医生的朋友，不会让你白跑。”孙选超立即站起来，“走吧。”

“去哪儿？”

“找年岁大的人。”

久经沙场的“老面包”又在苞谷林里穿梭开了。在弹簧垫一般的起落中，我从前座转身与孙选超交谈。了解到他接受过孙医生的“火线培训”，已成为这一带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可与我们孙家以前的影响比起来，差远了。”他感叹道。

我这属狗的鼻子耸了耸，似乎嗅出点什么，就从兜里偷偷掏出录音机：“我听孙医生讲，这边的孙姓是从马鹿塘上面迁下来的？”

“对。我们的老家是马鹿塘，在方圆千里也算赫赫有名的家族。自最上面的老祖起，我们这一脉迁到大住基村已有七、八十年。”

“你是多少代？”

“大概十几代。”

“你公公哪年死的？”

“1950 年。”

“就是土改前期了。”

“对。他是被镇压的。你往左看，一直看上去，那面坡坎正中有座坟，我公公就埋在里头。我爹说过，老辈子中，除了孙百万老祖，就数公公有本事，可共产党一来，鼓动穷人闹土改，孙姓统统划为地主。公公是与则黑的几个地主一道被枪毙的，不在的时候才 42 岁。”

车很快就深入绝境。我们下地，沿弯弯曲曲的土坎上行几分钟，就进了孙选超的伯伯家。满目狼藉的农家大院内，一农妇丢下晾晒中的烟叶，抬腰招呼我们。孙选超代替主人，将我们安排在堂屋门前坐下，以树上的鲜果招待。不一会儿，真正的主人进院门，放下锄头。一个很害羞的中年人。稍后，我费了相当的口舌，让他明白我的来意。而他始终垂头，搓揉着裤腿边的泥斑，一脸温开水似的苦笑。

录音机记载着彼此机械的问答。整理的大概结果如下：

我和孙选超的爹是亲弟兄，我 1949 年生，他 1948 年生，土改的时候太小了，所以不很清楚。我才 6 个月大，爹爹就被解放军镇压了，如今，不仅他的相貌记不得，连他的大名也险些忘掉，因为妈妈从来不提。几十年来，挨关挨斗挨打是家常便饭，她自身都难保。所以没熬到地主揭帽，她就走了。

一生下来就是贱民，我们受了几十年欺负。没有爹，怕贫下中农的娃娃提起我们的爹。相貌与名字都记不得，却受他的株连，不准上中学。反革命地主子女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哟。运动一来，家族里面任何人挨斗挨打，都押我们去陪。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的大爹、大妈双双叫抓到炼钢炉前跪起，膝盖下是碎矿石，血已经止不住了，民兵还拿一根大柴棒抵住压腿。嗷地一声人就死过去，又端水泼。哎呀，上一辈的事，说不得说不得啰。总之，躲过了枪毙，也没被打死打残的，就送去劳改了。我大爹孙如龙，从来威风不倒，可在 58 年被整得要死不活，再判刑劳改。直到改革开放回家，已变成木木的焉老头子了。

唉，孙家也没从政也没从军，就是在经商方面出过人才。比如我们的公公孙万昌，在 30 年代就办铜厂，发了大财，人称“金铜官”，又称“孙百万”，受过国民政府的表彰。还买下了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的田地。虽然到孙选超的公公手里，有些破败了，可凭他的能力，肯定能翻梢的。不料折腾没几下，就栽在共产党手里，永远翻不了本。

作为后世，孙姓的来龙去脉，我们也是最近几年才摸出一点点。威老师你看，这是海外的孙家子孙回云南寻根的集体合影，浩浩荡荡几十人，开了会，修了家谱，还要捐钱为孙百万立碑。据说国父孙中山也跟我们家族有血缘关系啰。

在访谈当中，热情的孙选超两次出去，打探他幺公公的下落。“这是大住基唯一健在的孙家老辈子。年岁小，辈分大。”他喘吁吁地解释。

时间不早了，第三次，孙家两代人就领着我们，急匆匆地出门，3 分钟就穿过土坎，抵达一更加破烂的院子。依旧铁锁把门。失望之余，我们全都站直身子，透过苞谷林向开阔的坝子眺望。

我是近视眼，望了也白望。可大小两孙都眼尖，手搭凉棚才几秒，就锁定了目标。

连跑带跳，下了几级梯形菜地，又嗖嗖连钻四、五片苞谷林，终于闯入一块阳光灿烂的菜园子。我寻觅已久的访谈对象如满目的莲花白，缓缓从黄土埂里长出来，定型为一个扣着蓝衣蓝帽的白发庄稼汉。

老中小三孙以当地话交流了几分钟，就齐刷刷地转向我。老孙习惯性地拍拍泥尘，背着手，从菜地来到苞谷林边蹲下。我捏住录音机开始提问。已近 5 点，牛铃的叮当自远处隐约传来，其中还夹杂着模糊的人声。斜阳热辣辣地射击着我们的脸。

而老孙裹着花头巾的老伴，仍然牵着长蛇一般的水管，埋着头，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着庄稼。

孙如勋：同志你，来找我干啥子？

老威：找你款款土地改革。

孙如勋：过去就算了，不敢款啰。

老威：我跑了一两千里路，特地从四川过来了解你们孙家的情况。过去一提到地主，中国的绝大多数群众马上就会想起诗人贺敬之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里头的黄世仁就是恶霸地主，年关领着狗腿子逼债，逼死了贫农杨白劳，还强奸喜儿，把黑发女变成荒山野岭上的白发鬼，真是无恶不作。其他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有南霸天、刘文彩……

孙如勋：我晓得，电影都演过好多遍。

老威：你觉得如何？

孙如勋：我们是地主家庭，一辈子受气，不敢放屁啰。

老威：土改已过去几十年，你可以说一说实话，这也是对你们孙家的祖先及后世负责。

孙如勋：从来没对外人款过。也晓不得咋个说。

老威：想到哪儿款到哪儿。现在连刘文彩的后人都不服气，张罗着翻案，你就别太多顾虑了。

孙如勋：你从马鹿塘过来，应该晓得孙姓是个大家族。我们的公公孙百万，在世很风光，又办铜厂又办纸厂，在云南境内都出了名。他赚钱买下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田地。

老威：你们的公公为什么不往昆明方向发展，反而要在这里面投资买地呢？

孙如勋：当时的大住基田地便宜嘛。气候相对马鹿塘，较温和宜人，水土也适合耕种。你看一眼这周围的绿色就明白了。

老威：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孙如勋：孙百万是个商人，也许他想在这么一个远离政治动荡的桃花源，给子孙留下百代基业。可他那样的大能人能有几个啰。以后的孙家后代，都是自己种自己吃的庄稼汉，从没走出去见过啥大世面。所以在他过世一二十年，也就是解放前两年，孙家已经衰败了。

老威：怎么败的？

孙如勋：要么是抽鸦片烟，要么是赌。我小，不很清楚。

老威：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吧。

孙如勋：差远了。则黑这一带，数杨区长家势力大，场面上拉得开。风水轮流转

啰，昨天是孙家，今天就该杨家了。当时在大住基坝子内，孙姓有 5 户，长长短短，5 个指头都不一般齐。

老威：什么意思？

孙如勋：有穷的有富的。富的数孙选超的公公家，虽然田地折腾得只剩十几亩，可脑子灵活，能做买卖，为人处世真有点孙百万的味道。可惜生不逢时，连命都丢了。我家算中等，四、五口人种七、八亩地，粮食勉强够吃。

老威：你爹能干吗？

孙如勋：晓不得。他 1942 年就去世了。我 1937 年生，我弟弟 1940 年生，当时都小，没留下啥记忆。我们靠妈妈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拉扯大，三、四岁就田间地头干活，跟最普通的农民家庭没有区别。

老威：你妈妈不容易啊。

孙如勋：20 出头守寡，土改时才 31 岁，50 多就不在了。唉，她哪有苦不苦的概念？只要有一口气，能活下去就满足了。

老威：这也算地主吗？

孙如勋：算。比我家更差，一年在两三亩地里忙到头，粮食都不够吃的都划成了地主。只要是孙百万的后人，统统是地主。谁叫我们的祖宗家产万贯，有那么大的名气。

老威：这没啥道理嘛。世事难料，皇帝的后裔也可能沿街要饭。总不能把血统高贵的乞丐划为剥削阶级吧？

孙如勋：土改"称大秤"，一般来说有政策，有条条框框。啥也没有是雇农，种粮不够吃的是贫农，够吃的就升为中农。定地主有 3 条杠子，土地财产、奴仆、租石，够两条就划富农。可方圆多少里，哪个晓不得孙百万？他的后人哪怕种田累断了腰，饿断了气，也必须定地主。否则群众不依。于是孙选超的公公是恶霸地主，他大爹是不悔改地主，我家是地主，比我们差的孙家定为破落地主。在大住基坝子，只有我们孙姓 5 户全部地主。

老威：过场也没走就直接划阶级？

孙如勋：工作组下村来，发动贫雇农，开诉苦会、斗争会。只要喊不服，就打，就用刑。遭不住啰。比如我家，土地财产和租石都不够秤，就说有奴仆。啥子奴仆？就是爹爹在的时候，雇的两个外姓人。爹爹走了，他们没家没室，没地方可去，就留在我家了。十几年，他们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分彼此，早就是一家人了。土改一划成份，农民协会带着工作组上门来搞启发，硬把一家人拆散为两个阶级。三番五次让他们诉苦，诉不出来，还批评他们觉悟低。

孙选超的公公，按 3 条杠子也不够秤。可他心高脾气大，在旧社会得罪过村里混着吃百家饭的。解放了，过去拿他没奈何的一个人成了雇农，就到工作组那儿去检举，诬赖他加入过则黑杨区长组织的"西南反共革命军"。

老威：地方武装？

孙如勋：我那时才十三、四岁，糊里糊涂的。只晓得是民团换了个招牌，好像有百把人，都叫解放军给剿灭了。孙选超的公公粘上这个，自然成了反革命恶霸地主，比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还不得了。

老威：他承认了吗？

孙如勋：他叫抓去，关着整了几个月，啥子刑都用遍了。提出来枪毙的时候，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人站不起来，就被五花大绑吊在一根柱头上。在则黑的河边草坝开的群众大会，来了好几千人。十多个恶霸地主，被斗了整整一天，然后拉到坡上枪毙了。

老威：你当时也在场？

孙如勋：一大早，就叫民兵押去了。

老威：你还是个娃娃嘛。

孙如勋：孙姓 5 户人，除了几岁的留下，其他都必须到场。比我和弟弟更小的还有啰，男女老少，十几二十个，在草坝上跪了两三排。记得那天是半阴半晴的，从早晨拖到下午两点多毙人，我们都跪起的。周围喊了好几轮口号："打倒反革命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地主完蛋之时！"

老威：孙选超的公公欠了血债？

孙如勋：没有。同他一块被镇压的地主沾没沾血，就晓不得了。毙他那瞬间我不敢看，连响了几枪，等我抬起头，周围全是热腾腾的血点点，脑壳打烂成一包糟了。

老威：当着亲属的面枪杀犯人吗？

孙如勋：是。跪了大半天，腿都快断了。不料刚站起来，又被弄去陪杀场。孙姓 5 户拉家带口，围着还在卜卜冒泡的尸体跪成两圈。心里在哭，却不敢出声，不敢流泪。这是我们家族又钢气又聪明的人呀，才 42 岁，竟落得这个下场！

老威：你们当时恨共产党吗？

孙如勋：借 100 个胆子也不敢。毛主席不在了这么多年，我们这种身份的人，都不敢公开议论他老人家的错啰。我们孙家只是诅咒那个公报私仇的人，你成了雇农，翻身了，咋个变疯狗乱咬人呢。这个人果然遭了报应，活到 70 多岁，都儿孙满堂了，还从县城里的四楼莫名其妙地摔下去，不得好死。

老威：如此的童年记忆，太可怕了。

孙如勋：人一死就解脱，没记忆了。剩下来的却活罪难逃。我妈妈是四类分子，到死那一天止，挨了几百次斗争。我和弟弟是地主崽子，也见不得人。可又不能一天到晚躲在家中。土地改革结束那年，也是这样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苞谷林长得密匝匝的。可我们这些猪狗不如的地主子女，干完活刚要歇口气，就被贫雇农和他们的娃娃撵得连滚带爬。大住基是块平坝，只要有人像你们刚才那样，站在高坎朝下仔细望，任何地方的动静都逃不过。何况一个村的群众要逮你？

老威：你犯了什么事？

孙如勋：猫天生要逮老鼠，并不因为老鼠犯了事。这个路口也有人，那条地坎也有人，你在苞谷林里穿来穿去，嗖嗖嗖，气都跑脱了，可一露面抬头，人家就叉着腰，或者横着棍子、红缨枪在那儿候着。你转身再逃，另一头也一样。直到你浑身抽筋，累瘫了，就举手投降。

老威：农民还玩这种游戏？

孙如勋：不是游戏，是严肃认真的阶级斗争。无论田间地头，还是村里村外，甚至在家门口，只要你被他们追上或堵住，就要立马跪下去喊："新中国的主人！"

老威：什么？！

孙如勋：喊"新中国的主人，饶我狗命"啰。

老威：真他妈的翻身了！与希特勒的党卫军对待犹太人的手段一样。

孙如勋：连续不断地喊"主人"，直到人家打你一顿，满意了，放你走。大住基的地主子女都受过这种待遇。有一次，我被鞋底扇了几十个耳巴子，连脸带脖子肿了好多天，喝水都困难。

老威：后来呢？

孙如勋：时间久了，人就麻痹了。

老威：谁麻痹了？

孙如勋：自己麻痹了。整我们的人却回回都有新花样。到了 1958 年，他大爹孙

如龙对孙家的处境气不过，私下抱怨了几句，又被揭发出来。在大炼钢铁的采矿现场，全生产队召开他的斗争会。队长命令他跪下向“三面红旗”请罪，他犟嘴。人家就说：“敌人威风不倒，就要把他打倒。”于是两口子都叫弄来跪滚烫的碎矿石，还拿大柴棒抵住压腿。他大妈惨叫一声昏过去，泼了几桶水都没醒转；他大爹却鼓着牛眼睛，嘴皮咬得血淌，也忍住不求饶。可到最后，还是松口喷出一条血龙，脑壳嘭的栽下地……

孙如龙被树成“反攻倒算”的典型，判刑劳改，直到 1979 年邓小平为地富分子揭帽以后，才放回来。

老威：孙如龙还在村里吗？

孙如勋：早走了。大住基这边，70 岁以上的孙姓老辈子就剩我啰。这个地主，当得太窝囊，几十年提心吊胆地过。连穿一件伸展衣服，也要被人家揪住批斗。理由是：“贫下中农都没得灯芯绒衣服，你一个狗日的地主又从哪儿剥削来的？”我辩解说：“是劳动所得，不是剥削来的。”他们就打我，要脱我的新衣服，把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年，才凑够钱买了一件灯芯绒呀！我也有小学文化，读得通报纸，上面明明说地主阶级已经被瓦解了。既然“瓦解了”，凭啥还死盯着我不放？

老威：他们想穿你的衣服？

孙如勋：没有。就是不让地主在任何方面超过贫下中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上学，甚至笑。不信你就在人多的场合，比如开会，比如评工分，比如集体劳动的时候，笑一场试试看。只要你的嘴张得和别人一样大，声音发得和别人一样响，所有的脑壳都将转过来冲着你。下一步就是咬牙切齿；就是命令你站起来，腰杆弓 90 度；就是念《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老威：小时候我跟父亲下放农村，也经常见到类似的场景。

孙如勋：是啰是啰。

老威：这时你妈妈还在吗？

孙如勋：文革开始她还在，后来就走了。

老威：没熬到地主揭帽？

孙如勋：早得很。我妹妹嫁在伐木克村，从大住基坝子翻山过去，七、八里路。1969 年夏天，妈妈想念女儿，就向生产队请探亲假。当时正文革，阶级斗争抓得紧，一般群众外出，都要大队一级开《证明》，否则住不了旅馆。而四类分子请假，比一般群众又要麻烦多了，生产队干部先开会研究，再报大队革命委员会审批。好不容易才准假一天。

你想想，从这儿到伐木克，打来回至少有 16 里路，妈妈她就是跑，也要耗半天多。人家的意思很明确，你一个小脚地主婆探亲，必须当天打来回！

老威：也就是说，不准在自己女儿家过夜。

孙如勋：对。我妈妈捏着假条，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依然早早就出门了。记得那时各生产队已经连线安装了广播，好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头遍《东方红》响的时候是 6 点钟。妈妈走了好久，《东方红》才响，可太阳落山还没回来。天黑尽播《新闻》，接倒又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停止广播是 10 点半，之前 5 分钟，生产队长在村头喇叭里喊：“孙如勋！ｘｘｘ回家没有？记住明天早晨汇报。”

当天妈妈没回，第二天也没回。直到第三天下午，妈妈才肿着两只眼泡回家。她说妹妹病了，生离死别一样好劝歹劝，非要拖住多留两天。我晓得惹下了大祸，可不敢给妈妈讲。生产队长已通过喇叭吼了两三次“后果自负”。

天一黑，妈妈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去找生产队长赔罪。没一会儿，广播就通知开

全体社员大会，18 岁以上的成人必须参加。我扒拉两口饭，就赶到保管室外的晒谷坝，一盏汽灯挂在屋檐下，刺亮刺亮的。妈妈已叫麻绳捆起了。

那天的斗争会开到深夜 12 点多钟。我立在一边，埋起脑壳。反正都是那些上纲上线的政治套话，一个个口水横飞，指指戳戳。还一轮一轮地喊口号："打倒ｘｘｘ！踏上一只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地主婆ｘｘｘ难受之时！"

老威：你的现场感觉怎样？

孙如勋：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因为同见刀见血的土改相比，这只能算毛毛雨。我万万没料到，妈妈却糊涂了。她熬过那么多斗争会，都想得通，这次就不通。

老威：土改时她还年轻，这时她已老了，经不住折腾，也盼不见希望。所以就出了毛病。

孙如勋：她没毛病。她清清醒醒地上吊自杀了。

老威：是么？！

孙如勋：当天夜里，家里人全睡了。她还在洗脸，然后又擦了身子，洗了脚。模模糊糊中，我透过蚊帐，分明看见她躺下了。我还听她叹了一口气，就劝："妈，过都过去了，就莫想那么多。"她还答应了一声："儿啰，以后你可得好好过。"

我觉得蹊跷，可太累，一闭眼就死过去。第二天起床，妈妈已悬在房梁上，眼珠子鼓着。那年她才 50 多岁。

老威：事先没一点预兆吗？

孙如勋；我睡得跟石头似的。以往我老是睡不踏实，做逃跑、挨打、躲躲闪闪、又一次次叫逮着的梦。我老是在梦中惊醒，出一身冷汗。老婆也受我拖累，一惊一炸，还闹着跟我分床。可妈妈要死，我却如一头猪，一动不动就到天亮。

看来，活受罪，真不如死了好。嘿嘿嘿，死了好。干净。

老威：嗯，干净。

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

采访前奏

2006 年 8 月 5 日傍晚 7 点，我完成了对大住基村孙氏家族的走访，急匆匆赶回则黑乡。夕照浸润着山川，令赭红色的岩壁显得油腻腻的，我刚开玩笑说，连泥巴都如一块块鲜肉，肠胃就一阵阵抽。老张也感到肚子里在喷火，就一顿狂奔。翻山时遇土坎也不减速，只听得嘣嗵一声巨响，车弹跳着就下坡了。

在则黑街上最大的一家饭馆外刹车，我穿过正厅，直入极其昏暗的厨房。菜架是空的，肉案也是空的。老板和小工都下班了，只剩一个膀大腰圆的老板娘留守。她拦截道："全卖光了，找也没用。"却低估了一只属狗的鼻子对荤腥的天然敏感。我这个近视眼居然在隐蔽的石缸内侦察出鱼！就扯过老板娘点了两条。一称 3 斤 6 两。老板娘道："没任何菜叶子，就弄糖醋鱼吧。"我道："从你的泡菜坛子里捞两把，剁几刀，煮成酸菜鱼。"

十几分钟后，一洗脸盆酸菜鱼气势汹汹地端了出来。乡镇上果然民风泼辣，干海椒大捧，酸菜比手掌宽。我尝了一口汤，脑顶的毛毛汗就激出来了。于是叫上饭。砰砰两

声，又冷又硬的两海碗到了跟前。

1959 至 1962 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我刚巧撞上，一出生就浑身浮肿，差点没活头。所以我的吃相比较狰狞，胃他妈的像只章鱼，伸着触须，什么都往里面搂。老张长得精瘦，却与我棋逢对手，两边的脑袋及肩膀如乌云笼罩了鱼盆。没几分钟，盆和碗里的东西就稀里哗啦，消失了大半。夕照红得更透了，将肮脏的屋顶、街道、墙面染得很浪漫，几辆马拉车嘀嘀嗒嗒地经过，在破塑料袋飘飞的污水沟边拉了一滩也很有情调的屎。我到底抬头了，摸起一旁的眼镜戴上。真巧啊，一个圆脸老头背着手，在门口停顿了两三秒，他与我对了一下光，我习惯性地笑，他却没笑。

“你好啊。”我招呼道。接着，鬼使神差地起身。
背包里有一本朋友赠送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作者罗平汉。这是一本以中国官方的观点“正面评介”土改的著作。我摸出来，递给老头。

“哦？你写的？”
我始终暧昧地微笑。待老头放松了警惕，才江湖骗子一般严肃地说：“我是四川的一个作家，专程到这一带调查、研究土地改革。老先生你愿意和我交谈几句吗？”

“你要搜集素材？”
“也不是遍地都是素材。”我的脸板得更凶了，“我在马鹿塘、撒营盘、则黑访谈过许多老人，正面、负面都有。准备将来有选择地写进书里。”

就这样两三板斧，就砍翻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乡镇人物。他的面皮逐渐松弛：“请跟我来。”

上个世纪 80 年代，台湾歌星苏芮有首歌，也叫《请跟我来》。

上行不过 10 米，一老一少相跟着进了另一饭馆。门脸与上一家相当，可里头的堂子却高多了，四周贴满亮晃晃的瓷砖，还有大红大绿的明星照。更扎眼的是，正中财神爷的左边，还供着毛泽东的乡间风俗画，面皮红彤彤，除了头发，没一丝皱纹，没一丝毛。真是个万寿无疆的慈祥公公。

在一圈能坐 10 人以上的大圆桌前，老头和我做出促膝谈心的架势。他的儿孙一大堆，此刻都在堂子的尽头。待他将军似地一声召唤：“泡茶!”就一溜烟地全过来了。老大老二等等等等，只需打量一下那些油光水滑的装束，就晓得是乡镇一级的干部或成功人士。递烟的同时，他们企图查验我的身份，我再次以那本《土地改革运动史》来搪塞，并称“更详细的证明材料”在车上。大约是我的态度比政府官员还生硬，他们摸不清是何方神圣，于是留了一包暗示身份的云烟在桌上，便哦哦撤退了。

厨房的油烟阵阵弥漫，我恍若置身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而老头的三角眼眯缝着，面对门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发愣。

老威：老人家姓孙，然后是祖宗的宗，文化的文？
孙宗文：对。

老威：好名字。
孙宗文：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啰。
老威：我刚刚拜访了大住基村的孙姓家族，你跟他们是同一血脉？
孙宗文：都从马鹿塘迁来的，算一个祖先吧。后来就晓不得咋回事了。
老威：你与孙百万是什么关系？
孙宗文：没有关系。
老威：你住在哪儿？
孙宗文：则黑乡的上村。
老威：我指解放前。
孙宗文：在老虎堆村，离则黑三四里路。
老威：有多少土地？
孙宗文：没有。除了一间烂草房，啥也没有。我家是佃地种，有时也去外村打打短工。所以一土改，我家就划为贫农。
老威：孙姓差不多是地主，你家为啥是贫农呢？
孙宗文：我家与他们扯不上。
老威：请讲讲你们村土改，也就是斗地主的情况。
孙宗文：老虎堆太穷了，每年青黄不接，多数人都出来要饭。所以按上面的政策，以几把尺子“称大秤”，没评出地主，只推选了一户富农。
老威：你们村去过工作组吗？
孙宗文：刚解放，解放军、工作组都去过，也照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男女老少全被组织起来。我 1930 年生，那时 20 出头，就叫发展成了民兵。各村的贫雇农，年龄在十六、七到二、三十的，都当民兵。
老威：民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孙宗文：党叫干啥就干啥。运动一环扣一环，这一阶段重点是这个，下一阶段重点是那个。
老威：举个例子。
孙宗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加赔罚，还有土改、土改复查。那几年，我们一直风风火火，瞌睡都不够。先是各村的地主各村斗，后来就交叉斗，集中起来斗。
老威：则黑周围的地主集中在那儿？
孙宗文：先是乡公所，后来人多了，就把小学的教室腾出来关。
老威：民兵打人吗？
孙宗文：我们都是按政策办事。
老威：到底打不打人？
孙宗文：一般不打人。态度老实的，主动交财产交罚款的，一开头就把解放前的罪行一条一条抖出来，向人民缴械投降，没有任何隐瞒的。我们按工作组的指示，绝不动他一根寒毛。
老威：态度老实的有多少？
孙宗文：还是比较多啰。集中反省，一天天不准回家，他们就紧张得屎也拉不出来。审问时，要反复政策攻心，使他们明白蒙混过不了关。再不行就用厉害的话骇两句。
老威：再不行呢？
孙宗文：一般来说就交代了。
老威：如果不交代呢？
孙宗文：那就动点手。
老威：我在这一带走访了一些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不仅打人，还普遍使用肉刑。

比如大柴棒压腿、跪瓦碴、扎烟头、扎绳子、倒吊、陪杀场等等。你……
孙宗文：我还小。上面的政策压下来，一定要打垮地主。
老威："打垮"的意思就是用刑吗？
孙宗文：有些人是很顽固的，不动点手，根本不会坦白。运动是有期限的，比如一两个月，三五个月，或者大半年，再硬的骨头也必须敲碎，否则就没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
老威：你恨地主？
孙宗文：我岁数小，政治觉悟不高。政策让恨就恨，必须恨。抵赖的时候就更遭人恨了。
老威：剥去那层阶级斗争的外壳，他们也是一辈子种庄稼的人嘛。
孙宗文：他们剥削啰。
老威：剥削？好嘛，那你儿子开这个饭馆，请了小工和厨师，算不算剥削？
孙宗文：时代不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毛主席和胡主席就不同。
老威：我们不争论。老人家的虚岁 77 吧？脑子蛮好使的。
孙宗文：去年生了场大病。好不容易爬起来，身体就差多了。现在你要我摆几十年前的事，就只能是个大概。
老威：土改至今已 54 年，真难为你了。
孙宗文：哪年开哪些会还记得住，小细节就记不住了。
老威：镇压地主的公审大会记得住吗？
孙宗文：从 1950 年起，镇压了好几批，我们当时负责押解犯人，维持秩序。则黑乡毙了伪政府的区长杨心林，乡长张应心，还有十几个恶霸地主。
老威：据说他们死前受过极其残酷的虐待。
孙宗文：他们罪有应得。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镇压？
孙宗文：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照当时的政策条款……
老威：照现在的法律呢？
孙宗文：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

（一辆手扶式拖拉机自门外经过，震耳欲聋的轰鸣掩盖了彼此的谈话。我不禁转移视线，但见街对面的瓦顶上，最后一抹夕光正一点点逝去。电视里的中央与云南地方新闻都结束了，老头的儿媳妇故意将音量放得很大，我却置若罔闻。于是她又努嘴，暗示男人过来，请我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老头似笑非笑地瞟我，可他绝对没料到我的脸皮有多厚。
我站起来，抓起桌上 60 元 1 包的云烟敬了老头儿子一支。他一愣，接过去了。我又用火机给他点着，然后道："实在对不起，我挺喜欢你爹的，能不能再耽搁几分钟？"
"不能吃了饭再说？"
"眼下的气氛正好。我怕过了这阵子，你爹的谈兴就没这么浓了。"见对方的强笑在慢慢凝固，我急忙嘿嘿干笑，补充道："没想到老人家以前如此风光。"
"那当然，那当然。"儿子只得打退堂鼓。我灌了一口冷茶水，又回头继续伺候他老子）

老威：通过土地改革，你家得了啥子好处？
孙宗文：我家从老虎堆搬了下来，在则黑上村分了两间瓦房，1 亩多地。
老威：你家几口人？

孙宗文：母亲和我。
老威：分谁的地？
孙宗文：张应喜家的。
老威：和则黑伪乡长张应心有关系吗？
孙宗文：他们是家门。不过来往很少。解放前张应喜是老师。
老威：这个教书先生有钱吧？所以划地主。
孙宗文：没啥钱。但有奴仆，有一点土地，一称大秤就够地主。
老威：奴仆？是书童？
孙宗文：他一个人要教很多农村娃娃，太忙了，没时间种家里的地，就雇了长工帮着种。
老威：这也算剥削？
孙宗文：算。
老威：哪教书是不是劳动？
孙宗文：工作组不会问那么多。只要上了硬杠杠，就是地主。
老威：他被斗争过吗？
孙宗文：是地主就要挨斗。不过他是老师，文化高，人缘好，没受啥子罪。
老威：他的学生家长私下关照他？
孙宗文：他太聪明了，晓得这是共产党的江山，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形势大政策都明摆着，于是一开头，他就赶紧坦白，非常彻底，把几十年的肠肠肚肚，包括大家族、小家庭的根底全挖出来。《交代书》也写得深刻，不喊屈，不喊冤，只要是共产党、工作组，随便咋样都对头。肯定就能过关啰。
老威：真不愧是文人，看得穿。
孙宗文：只能顺着去，不能反着来。过了运动，大家的关系又恢复正常。
老威：也不恨地主了？
孙宗文：只要他们莫犯法、莫造谣、莫破坏，就不恨。
老威：现在恨吗？
孙宗文：现在大家都一样，没有地主。
老威：看你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地主了。
孙宗文：翻身啰。
老威：翻身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孙宗文：想法很多，过后都忘了。过去了就过去了，老记着也没意思。至于政治运动，搞对了就对了，搞不对，下一任中央领导自然会出面纠正。老百姓闹得再凶，都不用负啥子具体责任。我这一辈子嘛，歪门邪道不会，见风使舵也差，可认定跟共产党闹革命，始终不变。
老威：老革命的认识的确高我等一筹。
孙宗文：50 年到 53 年，我当了 3 年多土改民兵。由于听话，表现积极，年纪轻轻就入了党。1954 年开始，我担任了 4 年多的则黑乡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当过生产队长。
老威：历次政治运动都没受冲击？
孙宗文：上面叫咋整就咋整。官这么小，冲击我干啥？
老威：1979 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宣布给地富分子摘帽。你对政策的变化有啥感想？
孙宗文：土改没错，摘帽也没错。跟我不相干。
老威：什么与你相干呢？
孙宗文：农民嘛，只有庄稼地啰。

老威：你好像没出过远门。
孙宗文：50 年代，上级派到昆明修了几年铁路。接着又回则黑上村。转眼人老得走不动了，才想起这辈子几乎没挪窝。
老威：嘿嘿，党没叫挪窝就别挪窝吧。

补记
2006 年 10 月中旬，我躲在一个小县城整理写作。迄今为止，我大约访谈过 150 多人，只有上面的谈话令我觉得别扭。听着听着录音，生理性的厌恶竟油然而生。先还以为，是我“一贯的反动立场”作祟，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踪、记录、还原中，这与“一贯的革命立场”同样，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否则就注定落入老毛“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陷阱中。

可不管怎样，我不会关掉机器。所以，在磁带反复过两次以后，我突然对曾经的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同情起来。尽管他目前还认为地主们“罪有应得”，“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但是他已风烛残年，口气颤巍巍的。越到后来，头句话与下句话之间的停顿就越长，可此种空白蕴含着的不是自信或深思熟虑，而是气短、心虚、思维短路，甚至哀叹。

我的气焰却越发嚣张。话锋咄咄逼人，活脱脱一个真理在握的红色警察出演审讯把戏。伪装、逼问、诱供、激将、设陷阱等等，《孙子兵法》36 计用了多少不晓得，但对付一位没见过多大世面的老人还是绰绰有余——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难道我这个曾经的政治犯，动脉里却涌动着警察的血？

太烦了。我想出去走走，暂时离开机器里的那个嘿嘿假笑着的冷血的自己。

刚刚下了雨，马上就出太阳。
我站在马路边东张西望，没一个熟人，没地方可去。
几十米外有个旧书摊，我正好可以消磨一点无聊时光。
我花了 10 元人民币买了 3 本太旧的书，其中 1 本是《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翻身运动素描》。1949 年 7 月在上海出版，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我大致翻阅，竟篇篇与土地改革有关。
为了让我和我的读者不那么沉闷，我选录其中共产党官方表彰解放区土改积极分子的一篇报道在这儿，供对照参考。

人民的好闺女

华东新华社

胶东滨北分区藏马县（新设县）农会委员徐茂红，出身贫苦，从小讨饭，当丫头，做童养媳，直到十八岁那年，家乡解放后，才翻了身。因为她积极帮助穷苦兄弟姐妹翻身，被选为区妇会委员，去秋土改复查中，她是全县发动雇贫农团结中农走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子。
瞿家屯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庄，据村干的报告说：“土改已完成了。”但后来发现有讨饭的，区里派她去了解和解决这庄的问题。她到村后，深入贫雇农中，先找到

讨饭的刘大娘家里，刘大娘讨饭刚回来，正在温剩饭吃，徐就和她一块吃起来，刘大娘当时惊奇的说：“同志，讨饭人吃的都是猪狗不吃的东西，你们工作人员，怎么能吃下去？”徐一边吃，一边叙述她自己当初讨饭的困难情形，晚上和刘大娘一起睡，刘大娘难为情的指着炕上的破席说：“叫同志笑话，要铺无铺的，要盖无盖的，同志怎么能睡呢！”徐茂红便向她诉说自己十三岁那年到诸城讨饭时，铺着雪，盖着天睡，以及给地主当丫头时，在地上盖着簸箕睡觉的苦楚。就在这大黑夜刘大娘也把她一辈子受的委曲哭诉了出来，又把她在翻身中的委曲诉了出来，她原来只分到一斤猪肉，二升粮食，后来地主又骇唬她说：“吃一斤猪肉还十斤人肉。”从此谁也不敢提翻身了，刘大娘抱着徐茂红哽咽的说：“我的好闺女，想不到天下还有和俺穷苦人作伴的。”第二天刘大娘碰见人便说：“咱们有洪福啦！好人来咱村领导翻身了，大家都到俺家听她开导开导吧。”全村十八家贫雇农都来找徐茂红，把这庄的实情说了个明明白白，工作也就从此真正开展了。徐茂红从来不把自己和群众分开看，而群众也从未外看她，大家都亲热的叫她“闺女”或“大姐”，她帮助群众去干活，一起吃睡，不是单纯为了调查或为了“深入”，她觉得凡是受苦的人都和她母亲以及她当丫头时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翻身和她自己的翻身一样迫切。她在工作中经常帮助群众做针线、做饭，一直到刨地捣粪，……

有时她能一天访问三十家贫雇农。很多干部学习她的工作方法，都觉得受不住。但是徐茂红却说：“我们一天工作顶多比上群众一天的劳动，群众天天如此，已经多少辈子了，我们工作嫌累，而老百姓又该怎样办呢？”这种真正的阶级自觉和群众观点，以及朴实细心的工作作风，使她得到群众普遍的爱戴，也使她能在别人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方打开局面。

一九四八年三月

夜祷

完成对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的意外拜访，已晚上 8 点多。夕阳沦落，几抹烂桔子似的晚霞也随之淡化。我在鬼火一般的路灯下，仰头伸了个懒腰，无意中望见早已爬上天际的月亮，竟红透了。出于做过几天诗人的本性，我凝视了半分钟，却从高处的风里嗅着一股甜腻腻的腐败味儿，且越来越浓。我正要将这味儿想象成月亮的烂桔子味儿，就瞟到了斜对面两人高的水泥坎上，露天管道正肆无忌惮地排放生活污水。

我咒骂了一声。胃突然隐隐作痛，我马上意识到是晚餐吃得太急，鱼太辣，饭也太冷硬。老张把车挪过来，问我在哪儿歇脚？我答这年头不愁住，还是先去探望一下大半年不见的张应荣老人吧。

老张说他也好久没拜访张长老了。于是驾车上行，七拐八拐，就直抵那熟悉而亲切的村间红泥路。靠土墙停好车，我们在红月亮的笼罩中，走向张家大院。还没进门，一个单纯的童音就迎面而来，我不禁站在敞开的门口仔细聆听。老张拍肩示意，我也装哑吧，以食指点一点虚空，再点一点自己的耳朵。老张会意地低语：“张长老的重孙子在朗读《圣经》呢。”

我不熟悉《圣经》，不晓得入耳的是哪一章哪一段哪一节，但在一瞬间，被狠狠地震

荡了一下。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句子蓦地涌上脑海："从一滴水里，孩子寻找他的声音。"

波纹顿时吹拂我的睫毛，并一圈圈泛滥，淹没了房顶、树枝，水渍眨眼就浸透了云、星星和月亮，似乎整个宇宙都包含在一粒浩大的水珠中。蟋蟀吱吱叫了，洛尔加接着问："声音里又找到了什么？可是一只蟋蟀王？"

我刚要继续洛尔加的追问："张长老在找什么？上帝可是一只蟋蟀王？"阵阵翻腾的肠胃就将出窍的魂魄硬拽回来。我龇牙咧嘴了十几秒，方正色跨入门槛，穿过院坝，踏上两人多高的石阶。朦胧夜色里，阶顶的房屋犹如高高在上的远古戏台，屋檐下灯光昏暗，那还穿着开裆裤的三尺幼童肃然而立，端着厚书，一板一眼地宣读着与他的年纪极不对称的词句："雅各"、"彼得"、"保守"、"神的大爱"、"以苦难，甚至生命去荣耀主"等等。而我这个观众所尊敬的张长老靠坐于戏台正中的躺椅，不时以苍老的"阿门"应和。幼童的阴影犹如上帝的无形被单，轻轻覆盖着他干瘪的躯体；在他的下方，在更矮一点的阴影中，则卧着他长期受风湿病折磨的老伴。

我和老张悄无声息地上完石阶，张长老方从《圣经》里翱游归来。他颤巍巍地起立，双手划动着腥红色的月光问："哪个？"我赶紧双手接住并回答："我是老威，大半年前与孙医生一起拜访过你的老威。"

"老威？"张长老的神思还在恍惚。而他的老伴却自阴影里冒出头，边呻吟，边笑，边招呼我"老师"。地下铺着草垫与羊皮，她刚才在那儿蜷缩成一团，已疼得老泪纵横，还跟在丈夫的后面低唤"阿门"。

其实我早就晓得这老两口正日以继夜地靠近天国的阶梯，自去年底采访他们不久，以调查、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著称的作家班忠义受我的情绪感染，也扛着机器，进来实地拍摄过。我和老班曾碰头，本想就文字与影像记录的差异交换看法，可没几分钟，话题就转到张长老的身体上。老班说，你的运气真好啊，张长老和你一块的时候，精气神都还不错，话说了 3 个多小时，把一生大概讲完整了。可等到我上门，他们老两口正巧得了场大病，没走，却相当于扒了层皮。张长老的眼睛完全瞎了，他老伴瘫在床上，连说话也没力气。

我吃了一惊，才两三个月，变化这么快？

老班说对。还说尽管如此，张长老还是支撑着，在镜头面前作了见证。虽然同你的文字比较，有不少残缺，但这有可能是最后的见证了。

老班的语调非常阴沉。我立即开玩笑，将后颈窝渐起的寒意缓解下来。老班也默契地笑了。他说幸好有上帝，要不人间的苦难真没法熬。张长老恐怕是不行了，但他的灵魂极其快乐，我看这种不可思议的狂喜将一致持续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因此他拒绝吃药，拒绝任何医疗，"什么时候接我去，主会安排的。"他对家人说。

老班离开又几个月了，我能够重逢张长老，大约也是主的安排吧？我不禁叹了口气。就紧紧把住老人枯柴棒子一样的手臂，一道坐下。相对无语了好一会儿，老人转头叫

重孙子端出两碗杂糖，一碗麻饼，并亲手抓了两大把，塞给我和老张。因肠胃胀痛，我再三谢绝，老人却不依，以两只盲目冲着我说："你是远客，吃啰吃啰。"不得已，我将一颗杂糖含在口中，老人却侧着耳门，非要听那咔嘭一声碎响，才满意地笑一笑。就这样我连吃半把杂糖，肠胃反而逐渐通泰了。

又有客人来访，老两口再次起立。由于急了些，张长老被躺椅绊了一下，差点栽倒。我不假思索地相劝："眼睛不方便，就别动吧。"立即感觉失言。不料张长老闻之抚掌大乐："瞎掉好！瞎掉好！人的国看了 80 几年，足够了，瞎掉好一心一意看神的国。"接着，又唤来重孙子，一老一幼手牵手唱起了赞美诗，后来我打听，它的歌名叫做《礼拜散歌》，共有三段，其中有以下歌词：

将来听见主爱呼唤，
命我长离人间时，
生死关头坦然无惧，
欣然应招不犹疑。
愿能永远！愿能永远！
跟随主爱！跟随主爱无尽期……

我呆在一旁，再也说不出任何话。稍后，我想起逝去的亲人们，姐姐、爸爸、舅舅和爷爷。他们都没有得到临终的祝福。姐姐死于车祸，猝不及防，我在千里之外，连遗体告别都没赶上；舅舅死于脑溢血，送医院途中邻居打来电话，我也仅仅赶上了整理遗体；爸爸死于肺癌，拖了将近 1 年，终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地主爷爷倒是能讲话，可他作为土财主的身世，我从来没弄明白。

我还想起自己持续了多年的冤案访谈，我暗暗扳着指头数，已有几位被访者永远出走？杨继年，1946 年生，11 岁时因盗窃罪名被捕，在狱中加刑 3 次，总共坐牢 34 年。出狱前后，一直坚持申诉，写了几百万字的喊冤材料，却不幸死于 2002 年 1 月 13 日深夜的一场火灾，终年 56 岁。于东山，与我父亲同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楼"的病友，曾做过国共两党 3 次俘虏，因此以"派遣特务"的罪名获刑 15 年，实际坐牢 35 年。1999 年出狱，2002 年 10 月 14 日因肺癌去世，终年 75 岁。灯宽法师，俗名陈锦荣，1900 年生，6 岁在成都郊区崇庆县街子镇的上古寺出家，40 年代升任主持。1950 年，在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寺庙大地主"，遭受多种酷刑与多年管制。曾在文革的"破四旧"中被迫还俗，经历九死一生，熬到 1978 年落实宗教政策，方以 84 岁的高龄重返已化为废墟的上古寺。2002 年先后接受我 4 次采访，2005 年圆寂，终年 105 岁。刘世昌，1914 年生，道路工程师，曾在国共两代政府手中，参与云南境内多处公路、铁路、桥梁、军用飞机场的设计和建设。自 1949 年到文革结束，却因"历史不清及老婆是彝族土司女儿"等问题，一直倍受迫害。文革中遭数次抄家、关押与批斗，毒打致残。妻子也被侮辱毒打致死。坚持申冤 20 余年无果。2005 年去世，终年 91 岁。袁相忱，1914 年生，自小受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信仰耶稣，青年时期曾在北方农村传教，成长为一个极有影响的牧师。改朝换代时坚持留在中国，因拒绝以"三自爱国"改造教会，强调"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头"而被捕，1955 年定罪"反革命"，获无期徒刑。1979 年假释回家，成为中国地下基督教会最早的领袖之一，曾在 1989 年六四惨案之夜，聚会谴责刽子手，为死难者祷告。2005 年去世，终年 91 岁。张紫葛，1921 年生，著名盲人作家，作品有《心香泪酒祭

吴宓》《我给宋美龄当秘书》等。在国共新旧社会里，都做过大学教授。1957 年，以莫须有的“极右反革命”罪名获 15 年徒刑，受尽折磨。1973 年刑满，继续管制 4 年，稍后恢复公职。2006 年 9 月去世，终年 85 岁。何家栋，1924 年生，著名老革命、出版家和传记作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刘志丹》等革命文学的执笔人。建国之初始，就因澄不清的历史问题和多次误入政治白虎堂，倍受打击迫害。“挨整 30 年，下放 14 年”，晚年与共产信仰分道扬镳，成为众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2006 年 10 月去世，终年 82 岁。

众多死者从我的手指尖淌过，我的文字里尚有他们的余温。不管是不是我的血亲，不管在临终前受没受到祝福，此刻我都愿意跟随张长老，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祷告。如果在藏传或汉传的佛庙，我也愿意跟随另一个法师，为他们，也为我自己超度。我也愿意在清真寺，以及任何山川大地，任何与至高的造物主接近的地方，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大声呼喊。我活在他们当中，天哪，因为这么多人含着冤屈死了，所以我暂时还活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上。

我年轻时就热爱的短命诗人狄兰. 托马斯此刻进入到心里：

那里他们得到了安息，在慈爱的土地上
最黑暗的死亡判决，盲目的，没有得到祝福
却被人们找到，让他们不能安息

我在低矮寂静的屋子里祈祷，靠着这褪了色的床
中午，黑夜，早晨到来之前的每一分钟
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一个不幸的世界像雪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我触摸着张长老正日益衰落的躯壳，我明白他在盼着上帝替自己脱下这躯壳，犹如脱下一件涂满了苦难符号的外衣。纯灵魂的上升多么轻盈多么喜乐啊，浊世的煎熬到底快结出甜美的果子。

过分专注于精神，我却忽略了现实中的老张一直躲在旁边打电话。约 9 点钟，他突然站起来对我说：“不早了，我们告辞吧。”

我醒悟似的点头道：“还要接着拜访地主婆婆张美芝呢。”

老张却说：“恐怕来不及了，我们得马上回头，赶到德嘎村。”

“明日一早去不行吗？”我迟疑道。

“不行。刚才我已经联系了。”老张断然道。“张茂恩牧师正在德嘎准备圣餐，他太忙了，你要采访他，就得先候着，随时准备见缝插针。”

张长老也在旁边催促：“去吧去吧，赶紧去为主做工。”

与两个老人匆匆道别，恐怕是最后的道别，我们又上路了。夜色寂静，红月亮正在变白，车灯开出的路如河流嗖嗖退却，转瞬间，灯火稀落的则黑乡就沉入残梦之中。

我忍不住打起盹来，轰轰隆隆中，我梦见车子冲至公路的尽头，就突然腾空了。轮胎还在滚动，在拳头般的星星之间，在星星般的火把之间。我回到了少年，回到为乡村百岁老人送葬的行列中。那是文革后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丧葬仪式在偏远的山区老家死灰复燃，所以尽管入葬者是地主，全生产队两三百号人仍倾巢出动。鸡叫三遍放上路鞭炮，灵幡引路，12 个壮汉抬起棺木上山，后面弯弯曲曲一长串人马。我和妹妹牵着地主爷爷的腰帕，在晃动的火把下，吭哧吭哧地爬坡，浑身累出了汗水，让山谷里的风一吹，又冰凉冰凉的。在天明前，百岁老人葬在叫做“龙脊”的梁子中央，在场的每个人都往墓坑内丢一把土……

那夜的繁星与顺着山势盘旋的火把长蛇阵贴得很近，犹如一张青铜镜的内外。而此刻，光阴在梦里回荡了几遍，就哐当一声落到实处。我醒过来，车已颠簸在盘山道了。窗外的流星一颗接一颗坠入深壑，老张说，再拐一个弯就是德嘎。

土改受害者张茂恩

采访前奏

2006 年 8 月 5 日深夜 10 点半，我们的车灯射亮了德嘎村不起眼的指示牌，随即刹车减速。掉头驶离正道，顺着陡峭的碎石小路下山。每隔 10 来秒，车窗外就要划过一颗流星，估计车抵山脚，至少有 30 多颗流星殒落。所以在一农家院墙前停车小便时，我不禁感叹道：“真他妈的有眼福，可惜不是天文学家。”
一同小便的现实主义老张却不明白我的眼福指的什么。他提起裤子，在此起彼伏的狗叫中猛敲院门。一个包着彝族头帕的筒状妇女自门缝露面了，老张唤一句“婶婶”，一条黑狗却挤出来，亲热无比地钻他的裤裆。在狗的上方，人类以彝汉两种语言快速交际罢，就暂时分手。
在黑黝黝的山影中，老张和我连跳几级陡坎，穿过一片梯田和荆棘，才下至碎石路的最底部。照灰白的路影子往上走，流水的潺潺，蟋蟀的吱吱，时隐时现的拖长了的狗吠，以及风声，草声，树叶摇晃和夜鸟的飞翔声，甚至还有乌云擦拭星月的某种回声，组成了一支从旷古传承至今的乐队，环绕左右。许久没有走过乡村夜路了，我再次感叹自己有耳福，却没法说出来。
不断与稀稀落落的坟头擦身而过，设想在人生的道上稍有偏差，就提前走进去了。可还没来得及悲观，就听见风中飘起孩子的歌声。老张说快到了，并把头上两块顶天立地的巨石指给我看，孩子们就在那石头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我说真奇怪啊，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老张说村里有活动啰，娃娃也跟着过节。
登上村口，浓厚的马粪味儿扑面而来。一棵枝丫苍劲的大树下，许多人秃鹫般蹲在凹凸不平的石头间抽烟与交谈，由于是彝语，我半句也不懂，只得紧随老张，小心翼翼地过场。眼睛乜斜四周，感觉错落的白牙齿自夜色中隐现，并牵动一阵阵嘿嘿的笑声，我与老张也不由自主地嘿嘿。
我们上坡下坎，时而房顶时而墙根时而在庄稼地与土墙中间。寨子中央遇一坡道，仅

1 尺多宽，还右边高左边低，潺潺水流自上而下。我们只好提着裤腿，垫着蹄子作羚羊状的跳跃。我眼力不济，一脚踩入水中，如果不是被老张一把叼住肩头，真就“顺流直下”了。

如此狼狈地抵达寨后一座黄泥院落，门大敞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迎门是厨房，深处灶火熊熊，令在黯夜里摸索了许久的我们倍感亲切。老张更如游子归来，约几秒钟，就有七、八个人与他神秘拉扯，彼此的耳语透出压抑着的兴奋。我立在露天院坝里犹豫，刚望了一眼由暗转明的天，一个提着暖水瓶的彝家妇女就来扯我袖口，示意跟她上台阶。

正屋门槛骑放着矮桌，一盏起码 30 余年没见的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汽灯在桌面嗤嗤放光。灯影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蛋，中央的蛋核亮到极致，刀子般扎眼，四周却一派朦胧，若有若无的波纹循环、扩散，罩住了台阶上下的密集人影。

我霎时回到挑灯夜战的年月，为了不误农时，生产队一级的社员会议都在晚上开。包括政策会、动员会、传达中央文件会、评工分会、派工会、斗争四类分子会、分粮会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到了文革后期，会把大家弄得疲惫不堪，不少人就忍不住在会场打瞌睡。

眼下的聚会却与过去貌合神离。老张在路上讲过了，它不是一个村子的集体祷告，而是方圆几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圣餐会，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个村庄举行。散布在其它地方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执事和长老）全部要提前赶来，从教区牧师手里领受圣餐及教务，回去给普通教徒们分发与传达。

我不禁低下现代文人的傲慢头颅，冒着光束，冒着光束背面的那个声音上阶。在屋檐右面找个背光的旮旯落座，茶水和两三只土碗立即递到跟前，定睛一认，碗里堆着软糖、杂糖、黑瓜子和大麻籽。此刻我挤在彝族群众当中，彼此膝盖靠膝盖，烟草及口腔的辛辣热气交流着。老张游魂一般不期而至，在阶下赞许地拍拍我的腿，又离开了。我目送他的影子至对面墙根，蓦然发现乌云四散，弯月的一边钩住树稍，另一边还钩住几丝乌云的裙带。

这天，这云，这变幻多端又亘古未变的星月，还有这底下的老旧屋檐，屋檐遮蔽的互相依偎的老旧人类，以及火盆、茶水和食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知道，也无从说起。我不懂彝语，这个族群的一切都不懂，我一个汉族人挤在这儿，跟挤在非洲丛林或印第安部落没啥两样。据说哑语世界通用，那表示“孤寂”的手势该如何打呢？

汽灯背后的彝语还在持续。

它在描述神的旨意吗？

没人插话，没人应和，那唯一的男低音还在持续。一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起身下院坝转悠。我举相机按了好几下，连续的闪光惊起不少低垂的头。我赶紧退避，躲出院门查看冒昧的杰作，却含混如旧梦，真和若干年前生产队开会斗地主的情景相似。

转过身，刚巧与老张碰个满怀，于是相约出院门小便。正贴住墙根掏家伙呢，一位满头飞雪的老者出现了——他就是我此行的寻访对象张茂恩牧师，撒营盘教区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

趁 3 人一齐撒尿，我迫不及待地作了简短自述，老张也跟着敲边鼓。接下来，我们在墙外快速交谈。张牧师直截了当地询问采访动机，本来“土改”二字已涌上喉头，又临时拐了弯儿，变成“记录基督教在这儿的苦难历史，你，还有你家族所作的见证”。哪怕忙得喘不过气，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也无法回绝这种请求。张牧师露出谦和的笑容，“晚了一点。”他说。

“再晚也等。”我说。

“不必太辛苦。”他说。“你的伙伴晓得我歇脚的人家，我们改在明天早晨 6 点正见面，如何？”

聚会还没散我们就离开了，回到老张婶婶家已是凌晨 1 点 50 分。灶台的大铁锅烧了热水，我们匆匆烫了个脚，就掌着煤油灯上楼睡觉。床铺虽简陋，却是一人一个坑。绷紧的弦突然松了，倦意就如洪水滔滔，我蹬掉鞋子，竟和衣而卧。隐隐有牛铃叮当入梦，可当我再度睁眼时，额前的窗户纸已透白了。

我与老张同时起床，下楼向他家婶婶致罢谢意。拢桶边舀一瓢冷水，劈头盖脑浇下，人就异常清醒了。昨晚的钻裆黑狗替主人送客半里远，至坟地边折回。对面山峰的两端，残月将坠，朝霞初升。我们沿昨晚老路，疾步穿插，终于正点抵达一篱笆围绕的农家。

上了十来级石阶，我们在岩洞似的厨房里与张牧师正式会见了。此刻为 2006 年 8 月 6 日早晨 6 点零 2 分，几乎一宿未眠的张牧师及其助手张长老刚做完最后一盆圣餐，即指甲盖大的未发酵面饼，象征着耶稣供众人分享的肉。

我们围着一地坑余烬落座。40 多岁的张长老算新生力量，所以很谦卑地退到烟火浸染了多年的幽暗墙角。访谈开始了，清新的舞台晨光自门外打进来，作为主角的张牧师闭目沉思了片刻，银发非常夺目。

老威：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

张茂恩：在娘肚里吧。

老威：哦？

张茂恩：至今为止，我们家族三四代人，信主已有 92 年。

老威：有确切的记载吗？

张茂恩：我大哥张润恩如果活着，应该 92 岁。我父亲就是在我大哥出生的 1915 年，领着全家接受了福音。

老威：我从相关资料了解到，自 19 世纪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到 20 世纪初逐渐形成第一个信教高峰，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第一代本土传道人方应运而生……

张茂恩：在整个云南乃至西南，我们家信主都算早，但是普渡河那边的干彝族信主还要早。当时河两岸的马帮经常往来通商，福音就是从河外的九龙、转龙、兴苕等场口的干彝那儿带到德嘎，再由德嘎传往山里的升发、则黑、马鹿塘和靠外面的撒老乌。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就是在撒老乌念的西南神学院。

张茂恩：张应荣家跟我家一样，是三代长老。而传教士张尔昌建西南神学院已在抗战年间了。此前的二三十年代，莫提撒营盘，就是禄劝境内，世俗社会连初中也办不起，可教会不仅有能力办初中，办各种读经班，还成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很多批人材，为神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我出生的 1939 年，周围早已普遍信主了。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父母的父母，近亲和远房的老祖老公公，本村外村，本族外族，无论贫富，全信主。还没学会说话，我就熟悉《赞美诗》，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山沟沟里的彝族村子，文盲太多了，可提起《圣经》的某一节某一段，都能背。从小就会的东西，忘不了啰。

老威：福音如此普及，教会的钱从哪儿来呢？西方传教士手里？

张茂恩：信主的人讲奉献，有能力就多出，没能力就少出。比如我们家，在旧社会还算富裕，那么父亲作为与传教士张尔昌一道坐过堂的长老，就是一个榜样。每年在撒老乌举行的短期和长期的福音培训班，人头不少，伙食都由我们家奉献。

老威：这笔开支可不小。

张茂恩：当时我才 3、4 岁，就习惯了家里人天不见亮就起床祷告，然后吆喝着驮满粮食、猪肉的大队骡马，从德嘎运往撒老乌方向。那年月只有山间小道，一去一回要耗三四天。有时候，我还牵住大人的衣角，跟好远，才被哄回来。
老威：你有一个虔诚的好父亲。
张茂恩：我们家世世代代务农，没有哪一辈人不辛苦。到父亲手里，粮食不太值钱了，吃不完，也不兴买卖。于是就转向搞畜牧，养牛养马养肥猪，特别是养鸭和养蜂，比较赚钱。撒营盘这一带，抽鸦片的风气很盛，街子的规模小，除了大烟，其它都不赚钱。所以家里人时常吆着大群鸭子，走一路放一路，十天半月看能不能到达普渡河外的大街子，像九龙、转龙那样热闹的街子，才可以买个好价。肥猪也同样朝河外运，而一年两次收割的上等蜂蜜，得雇专门的脚夫背到昆明卖。
老威：这么多？你们家办养蜂场吗？
张茂恩：大约有 50 窝蜂子，很难伺候，可挣钱不少。
老威：按现在的说法，你们家算养殖专业户。
张茂恩：又要传福音，又要多种经营，所以父亲很累。在我 4 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的兄弟，我们的爷爷继任德嘎的长老……
老威：你们把父亲的兄弟叫爷爷？
张茂恩：对。你们汉族的爷爷，彝族就叫老爹。曾祖父以上统喊老祖。40 年代那一段，是基督教在撒营盘一带的黄金时期，分好几个堂，有 6 对专业传道人。总堂设在撒老乌，德嘎是第二支堂，在升发、普福、则黑、马鹿塘、大松树、皎西、皎平都有支堂。我的爷爷 1943 年任第二支堂长老，一直到解放了，教会活动被中止。
我大哥和我，都属兔，但他长我两轮，24 岁。我还没有出世，他就到马鹿塘上面的普福做上门女婿。他是教会初中毕业，聪明，又有文化，加之岳父也是普福那边的长老，所以在神和人的世界都兢兢业业，做得出色。
老威：出色到哪种程度？
张茂恩：他做过普福的乡长、征兵干部。手中的权利为福音传播提供了很多便利，所以高等学院在撒老乌一建立，他就出任教务长，亲自物色教员，培养和选拔人材，并为专业传道人发薪水。自家还每年出 3 石粮食供养传道人。
老威：你大哥具有现代思维。
张茂恩：传教士都夸他是上帝一流的仆人。撒营盘，包括禄劝甚至整个云南，都有种大烟抽大烟的历史，富人穷人都好那一口，再加上彝族人喜欢赌博，这两大致命恶习造成盗匪猖獗，社会动荡，历届政权都十分头痛。大哥认为，只有福音能使人自觉到原罪，从而戒除烟和赌，彻底净化社会风气。
老威：你大哥这种充满普世情怀的基督徒，在任何政府里都应该大有前途。
张茂恩：可他 36 岁就去世了。
老威：得病？
张茂恩：被镇压了。
老威：哪一年？
张茂恩：1951 年，我 12 岁。
老威：那就是土地改革当中。你们家族肯定都是地主。
张茂恩：是啰。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仅仅因为信主就叫划成地主,他是我所晓得的世界上最穷的地主。土地财产没有，罚款没钱，民兵没奈何，将他放在西南神学院的一床没有被面的铺盖也没收了。
张茂恩：我们家土地不多，经济收入还是多的。一划阶级、称大秤，大哥全家地主；

我和母亲、二哥是一家，地主。1953 年土改复查降为富农，才把抢去的房子还回来两间，分了一点点地种。嫁到皎西的姐姐，全家地主；爷爷是基督教长老，更是反革命地主。捕的捕，关的关，没捕没关的也从自己家里被赶出来，随便找个猪圈让你住进去。所有的一切都收缴去了，见你身上穿的衣裳厚了点，也要硬剥一两层下来。那叫啥日子，畜生不如啊。畜生还有圈，下了力还要给粮给草，可我们没住没吃，还天天挨斗。躲贫雇农就如耗子躲猫，在田间地头被逮着了，轻点的罚你替人家干活，完了让滚蛋，哪怕你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你一口吃的。重的就一顿暴打，或者倒吊起来，还押着去陪斗。我爷爷叫斗争了几百次，打得太狠，捱到 1958 年，又加上饿，就得痨病死了。

我二哥比我又长一轮，他的耳朵不灵，可对主的信心很足。土改中弄得家破人亡，几乎都活不下去了，他还天天跪着祷告。贫雇农见了，就告到工作组那儿。打他，要他承认信主就是罪恶，就是反革命，他不吭声，反而继续祷告。于是手脚绑起来，吊个几天几夜，可只要放下地，他立即祷告，求神宽恕人的罪。他的痨病，还有各种杂病，都终身未愈，可还跑遍这儿的山山水水，为贫苦的、长期病痛的人做祷告。

从 13 岁遭遇土改到宗教信仰放开之前，我挨打挨关挨饿的次数也不少，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秘密传福音蹲监狱多次，被扒了几层皮，没死掉，得感谢神的保守。1979 到 2003，我当了 24 年长老，随后又成为撒营盘教区的牧师，虽然是我们家族唯一的牧师，可与二哥同样，都得痨病，药不知吃了多少，均不见起色。二哥 72 岁走的，有十几年了，我今年 68，神肯定有他的安排吧。

老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你也算延续了你大哥的血脉。

张茂恩：这是我们家族永远的疼痛。感谢神，他走得很有尊严。

老威：请讲讲他是怎么走的，给后世留下一个见证。

张茂恩：一解放，他和他的老岳父就关起来了，受尽酷刑。他在旧政府手里当过官，但口碑非常好，尽管工作组深入到村子里，反复动员，开头也没人出面控诉。1950 年清匪反霸，周围这些村子都毙了好多批地主，风声紧得很，都没轮到他。1951 年升级，关进撒营盘，稍后又进了禄劝县的监狱。普福这边的贫雇农干部才跳脚，要求人民政府清算他。

老威：什么罪名？

张茂恩：晓不得。有人透风出来，家里全懵了。但当时见不着人，也没申辩的地方。

老威：总有个“犯罪细节”吧。

张茂恩：胡编啰。漏洞百出不要紧。甚至没啥细节也不要紧。人关了那么久，肯定要治罪。后来才听人说，上面派的工作组还提出了疑问，贫雇农主席团答不出，面子下不来，就犟着脖子吼。人家还好意劝告：“如果证据不足，构不成血债，就不用镇压了。”可地方上说，这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老威：杀人的积极性吗？

张茂恩：积极性又不需要文化，只要喊得最凶，打人最狠，闭起眼睛乱咬就能当干部。

老威：这就是所谓阶级立场？我不太懂。

张茂恩：嗯，你太年轻，不晓得人不如牲口是啥子滋味！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运动一搞起来，再煽几把，平常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鼓眼睛、舞拳头。说到底，杀人不需要理由，给你找个理由算抬举你。开会前没打算枪毙你，会开到中途要拉你出去，砰的一声，也没有人吃惊。工作组是外乡人，再调查也摸不透底细，毛主席说走群众路线，工作组最后敢不听地方群众的呼声？

老威：开头不是没人出面吗？

张茂恩：阶级觉悟一提高，人心人性混乱，工作组要控制局面都难。这地面，几乎人

人都有过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除了信主，很难戒。我几岁时，就晓得撒营盘好多村子不种粮食，全种鸦片，孩子们在罂粟丛中钻来钻去逮猫猫。所以解放前夕，穷富的位子经常颠来倒去，有可能下午你还是地主，晚上就变成雇农，因为土地房屋加老婆都输掉了。共产党禁止抽烟、赌博，禁止信主，哪农民除了种地，干啥去？搞运动啰。把多余的精力放到斗争上，放到打人杀人分财产上。只要划成贫雇农，你就不是烟鬼，不是一屁股赌债的无赖了，你就顺着工作组递过来的杆子向上爬，把受穷受气、借债要饭、典妻当子，甚至路死路埋的根源统统归罪于剥削，归罪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混蛋，也许转眼就成共产党的依靠，根正苗红，高高在上，子子孙孙吃穿不愁，连开会打死地主也不用负责。这不比鸦片和赌博更来劲？

老威：真是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张茂恩：土改政策是死的，运用政策的人是活的，随便杀人也是解放啊。所以大哥晓得自己活不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代，也像这样，乱得不成体统。

老威：你大哥遭杀害时，你在现场吗？

张茂恩：大哥被关起来后，莫说家里人，连他的老婆、孩子也晓不得下落。直到已判定死，家里人才提前两天得到通知。要把大哥从禄劝监狱提出来，先弄到撒营盘，再弄到升发乡，轮转着开斗争大会，最后才押回普福当地去公审镇压。家里人要见最后一面，就只能半夜起身，走二三十里山路，赶到撒营盘到升发中间的一个小街子，先候着。那晚上我们都没睡，围在一块哭，又不敢大声。母亲杀了一只鸡，煮了一小点米饭，还不到三更天，就和二哥、姐姐一道出门了。我还小，留着看家。

老威：你能够记事了吧。

张茂恩：我 12 岁了，记忆很深。母亲他们第二天擦黑才归家，我还问："大哥吃了鸡？"母亲点点头，两眼通红。后来，母亲和二哥经常讲到这次生离死别。他们在必经的垭口候了两三个钟头，大哥才押到。抱着哭了一阵，他们就哀求民兵松开麻绳，让大哥吃顿好饭。大哥啃了鸡肉，喝了汤，对母亲说："儿子要走了，母亲你不能动摇，要好好地信。耶稣上了十字架，已为我们赎了在尘世的罪。儿子今天是个罪人，这是该的。儿子在监牢的这些天，兜里一直揣着《圣经》，一直在心里祷告，一直劝那里面的人信，可心里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本地方的那些人，与我无仇无怨，却指控我欠了两笔血债。这是冤案，儿子晓不得，也不认。但是我不申辩了，因为是无用的。他们一再要求我回去，其实我也想回普福，揣着《圣经》，永远留在我传过福音的普福。母亲，人都有生死，你不要因为儿子灰心，无论如何要信啊！"

大哥就那样揣着《圣经》上路了。在升发斗争完，才回普福开公审大会。要镇压的那天大早，民兵还通知我大嫂："喂，今天我们要打掉你男人，家里有啥子好吃的东西，给他送一点。"

我大嫂也跟母亲一样，杀一只鸡，煮一小点米饭，大哥也吃了。夫妻最后告别。大嫂哭，大哥还劝她。意思是我走了，你要听"领导"的话，顺着来。随便哪个议论啥子，都不要往心里去。因为"领导"是一清二楚的。"领导"就是上帝，大哥怕连累大嫂，没把话挑明，可大嫂懂得，就不哭了。

接下来他就不在了。

老威：没有亲人在现场？

张茂恩：没有。

老威：什么时候料理的后事？

张茂恩：这是阶级斗争，我们不敢，人家也不准认领尸体。开完会，几个民兵就把大哥拖到大路上打掉，尸体就随便丢进一条小溪沟，在坎坎两边撬两撬，土就塌下去草草掩埋了。家里人被看管得紧，根本不敢靠近那儿。直到 10 个月以后，上面来了批

准收尸的正式通知，两边家里人才聚拢，找几块木板，拼了只匣匣赶去。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溪水从山上下来，已经把皮面的土冲刷得差不多了，大哥像块大树疙瘩卡在当中，脑袋、脚、还有身上的好几处衣角都暴露着。这儿离村边的路很近，大概已惊吓了不少人。难怪他们要允许重新掩埋阶级敌人！
二哥、母亲、大嫂一齐下水清理尸骨，多半泡烂了，有的肉看起还好，手一碰就粉了。没办法，只能把骨头一块一块淘干净，装入木匣匣，待一会儿葬入看好的坟地。
正当大家悲伤至极点，神迹居然出现了，母亲在大哥的衣兜里翻出一本《圣经》！两公分厚，比巴掌小，就是大哥走前反复提到的那本。你想想，沟底泡 10 个月，肉和衣服都烂了，《圣经》还完好无缺！大家立即在坎上、水里祷告。不是那种很正式的祷告，而是在心中默默感谢神恩始终陪伴大哥。他的肉身虽腐，灵魂却已入天国安息，这给偷生的我们增添了无限信心。
老威：那本《圣经》是什么样子呢？
张茂恩：竖排的手抄本，用牛筋绳绑紧。当然纸页已粘成一沓，分不开。字迹也模糊了，还浸透了血。
老威：尽管如此，这本《圣经》的价值还是无法估量。它将作为一个蒙难的物证，进入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史。
张茂恩：可惜几十年来政治运动多如牛毛，我们保命都有难度，更无法保存这种“罪证”了。直到文革，母亲终于下狠心烧了它。
老威：阿门，愿它在天国继续伴随你不朽的大哥。
张茂恩：阿门。分发圣餐的时间已到了，我们出去吧。

日祷

现在是 2006 年 8 月 6 日早上 8 点半，朝阳怒放，令晦暗如洞穴的厨房亮堂起来。一阵阵圣歌飘入，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鸟叫，霎时就冲淡了笼罩住我们的悲剧氛围。一位大嫂泡上了方便面，我们匆匆吃罢，就跟着双拳捶腰的张牧师出门，融入到瓦顶重叠的山村。牛铃噹噹，马蹄哒哒，人畜在同一条践踏如泥的鸡肠道上遭遇多次，即使是德高望重的张牧师，也只能侧身紧靠庄稼地边的篱笆，两掌朝外，让圆滚滚的可爱牲口先行。我反手从背包挖相机，要抓拍点东西，不料一条马尾巴凌空而起，呼的甩了个圈儿，我急忙扭头，正好挨了火辣辣的一嘴巴，只好掩面扶眼镜，放弃非份之想。而脚底也险象丛生，人蹄得一下接一下垫起，避开重心不太稳的畜蹄。最可恶的是粪便，前头拉后面踩，搞得热火朝天，我的裤腿以下都一塌糊涂。

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十几分钟。赶马或赶牛的汉子们，在扬鞭的同时，还不忘向张牧师点头致敬。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岔道口，我刹步整理鞋面，刚擦两三下，让鞋鼻子从稀屎里绽露，老张就回头催促。还以农民特有的方式安慰道：“一会儿就晒干了，干的好整，跺两脚就干干净净。”

我闻之一愣，舌尖突然涌起一股甜滋滋的回味。眼前的场景像过期彩色胶片一样缓缓褪色，我中年人的躯体也缩小成儿童，而我去世的父亲在胶片里刚巧是我这把年纪。全家人跟他下放到一个叫“柏梓”的农村中学，校园与四周的村庄混淆一体，篮球场在农忙季节就变为打谷或晒麦场，教室在寒暑假也可以是猪圈或牛圈。大人们正经历文化大革命，学校的走资派、保皇狗、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我父亲）隔三差五挨斗，

有时也将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浩浩荡荡十几二十个“土洋结合”的牛鬼蛇神，游校、游田坎、开大会，都显得极有声势。学校几百人，贫下中农上千人，夹杂着搞运动，时间眨眼就过去好多天。所以那阵儿最流行的口号是：“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

父亲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天天认罪，已喘不过气了，还在晚上给我补课。我对牛屎，还有其它牲口的屎印象深刻，不仅源于儿时的社会环境，而且源于一篇课文。其大意是面对一泡刚出炉的鲜牛屎，下乡知识青年四处寻铲子，可没料到一位贫下中农女孩二话不说，弓下腰，双手捧起稀屎就往集体粪坑里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知识青年通过狠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见着地上的粪便也用手了。”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篇范文，还点评道，“到底是粪便臭，还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臭？到底谁的内心美，谁的内心丑？相信同志们从一堆牛粪中，能得出答案。”

记忆深处的破喇叭回荡了几秒钟，还是被当下的圣歌一点点屏蔽了。白得耀眼的教堂就在我们头顶，嘎嘎电流贯穿在歌声里。我想，仅从喇叭的质量看，这几十年似乎没进步多少。但肩负着社会改造重任的牛屎却归朴返真，与多种粪便一道，成为这个彝族村庄人人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的日常风景。

眨眼间，太阳又上窜一大截。水汽在蒸发，蝉子叫也刚猛起来。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进了昨晚有些魔幻的黄泥大院，浪漫的外壳一下子剥掉了，眼前一派熙熙攘攘的世俗图景。我拿出相机，镜头内全是人，男女老少，每个角落都是衣衫褴褛的人，都是被信仰点燃的笑。我有意将镜头抬高，使之越过短墙或屋檐，可天空透白，已经布满了太阳的钢刺。

张牧师的白发闪烁了几下，就消失在正屋里。我晓得他作为方圆数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唯一牧师，要把圣餐分发给来自几十个村子的支堂长老和执事，可得忙一阵子。老张陪我留在露天院坝里，我问他为啥不跟张牧师进屋？他压低声音回答：“我还不够格。”我不以为然道：“不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话尚未落音，老张就将指头横在嘴唇间。

真像演戏，松弛的肌肉一下子又绷紧了。台阶上下的人们停止了走动和交谈，全都支起耳朵，聆听房子内部的声音。又是彝语，与我年轻的时候听诗人艾略特的英语朗诵差不多，一句不懂，只能凭鼻子去嗅那语义之外的气味，那被肢解的血肉浸润舌根的气味，还有一波接一波的弹音。

持续时间不太长，房子里外的人就一道“阿门”了。生活又恢复了它熙熙攘攘的原貌。老张大声笑道：“等我们的事情一完，我也可以回村子领圣餐。”

我疑惑道：“你不能在这儿领吗？”
老张解释道：“长老和执事在总堂牧师手里领，再回去发给支堂的一般基督徒。月月如此，不会乱的。”

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我只能拎着相机在人堆里晃悠，遇感兴趣的人脸，就咯嚓一下。

靠院门的两面墙根，垃圾与杂物混合堆放，猪圈和鸡圈也没有分界，而人类挤在中间，臭味虽不相投，色彩上倒还和谐。我拍了 4 个老太太冲着阳光排排坐，其中一个，刚才下台阶颤巍巍的，我抓拍了她紧张的脸部。密布的沟壑里，两只眼球浑浊如泥，却相当锐利。

接近正午了，苍蝇越来越密。记忆中，我是第一次遭遇如此多如此勇猛的苍蝇，人稍微一站，就没头没脸地扑上来。我周围都是基督徒，修养好，根本不把这种下贱的军团当回事，他们或立或坐，每人身体上起码有几十只，甚至一个加强连队。他们谈话、笑、拉手、拍肩，苍蝇们也随之起落、盘旋，似乎也属于他们情绪的一部分。除非某几只苍蝇高度近视，在谈兴正浓之际向口鼻眼俯冲，他们才漫不经心地抬手，抹一把面孔，或者在脸前扇两下。我亲眼见有人在两三分钟内，从鼻孔、嘴角，还有舌头上，抠出些活物来，然后遗憾地捻两捻，扔地下。

我是一个外来人，是整个村子唯一赶苍蝇的傻子。我老是站不住，到后来，拍照也有困难了。因为稍微停顿，手背和秃瓢就成了苍蝇的停机坪，这些裸露的地方咋会这么敏感，那么细的蝇腿、蝇须一碰，就痒得不行。没办法，我揣了相机，在人堆里穿插着兜圈子，将苍蝇逗得恼怒又兴奋，嗡嗡地跟着撵，我往上瞅了一眼，在波纹般眨动的光线里，至少有一个飞行大队。

张牧师从正屋门槛冲我招手，我进门，室内气温要低些，苍蝇相对就少些。张牧师给我挨个介绍各村的长老和执事们，他们的汉话不利落，却一直点头微笑，并将昨晚就塞过的糖果与瓜子再塞我一遍，仿佛我是个天生嘴馋的顽童。我一一认清他们被至高的火种所点燃的面容，跟云贵高原遍布的红泥真没区别，除此之外，我能了解他们多少？

转眼间，院坝里摆开 4 张红饭桌，这让我又一次重温了旧梦。自小到大，我在四川乡下吃过不少各种名目（以婚丧为主）的筵席，可在圣餐会期间，与如此众多的乡村基督徒一道共进午宴，却是初次。除了云南人习惯矮桌矮凳，四川人习惯高桌高凳，一开始，我的确没觉得两省乡间的风俗有何不同，从古至今，中国各省都保留了逢年过节杀猪宰羊、大盘大碗的老传统。

厨师和房东大嫂进屋多次，点头哈腰，请张牧师及众贵宾入席。大伙起立又落座，落座又起立，反复谦让，“请啰，请啰”不绝于耳。我这个既要混饭又疏于礼仪的文人，跟着谦谦君子们起落了两次，就极不自然地僵在原地，无所适从。幸而张牧师及时牵住我的手腕，主角亮相一般出门槛，下台阶，于是大家才依次坐下。我扫了一眼，4 张大红桌都满了，按每桌 8 至 10 人算，也该有 38 位吃客。另外还有数量相当的两轮吃客在院墙周围候着。

上菜了，猪羊鸡鸭、豆腐花生，照炒炖烧凉拌等样式登场，至少有 10 来种，一下子就把桌面布满了。日已登顶，饥焰如焚，不料苍蝇比人类更没耐性，亡命徒一般成群降落，争夺起我们的口中食。若在往日，我早就赶在苍蝇发起轮番冲锋之前，运力执箸，冲最厚实的那块去了。可今天当着张牧师和满桌长老，我暗暗发誓，绝不先动筷子。眼瞅着那只翘出汤面的鸡腿刹那间粘上了 10 余只苍蝇，我心潮难平地垂下头。

区别于所有世俗筵席的时刻终于来临，全场突然之间静默了。本来应该是碗碟交错、你请我请的大热闹，却反而很深地静默了。只剩下苍蝇军团的嗡嗡，由含混到清晰，终于连成了一大片。我情不自禁地仰头，屋檐之上是山峰，山峰之上是日神，遥不可及。而在日神和我们中间，是苍蝇的活动屏障，它们还在飞过来，降落；飞过来，降落。

张牧师从矮桌边起立，眺望远方，开始祈祷。由于我们坐得低，他就显得特别高。此时的日神，笔直笔直的，用它那光线的细脚，踩住他那银白如雪的头发。所以我相信，他的祈祷能够震颤阳光，直达天庭。

老实说，我依然一句不懂，可又觉得每一句都那样美丽。我听过不少彝族的民谣，前不久，我在云南大理的酒吧里碰见一个法国人，他刚从四川大凉山过来，用他那非常精良的录音设备，采集了两三个光碟的彝族古歌。其中有闹的，类似火把节的集体狂欢；也有静的，游魂一般，极其孤寂。后来这种孤寂进入我当夜的梦里，周围都是黑黝黝、光秃秃的环形山，那单线条的歌声就在里面回荡，每个音符都滴着蚯蚓般滑腻腻的泪。

醒来时我的双脚冰凉。这就是我对彝族下意识的了解，他们都是从阴暗、潮湿的山里来，从站不稳人的陡坡上来，半神半鬼半人。可在此时此刻，一个彝族牧师的投影罩住我的头顶，他的声音浑厚，在天地间都引起了共鸣。这种祷告的音节，令我想到的不是传统，也不是现在的信主的彝族，而是黑人、印第安人或大西洋岛国的土著人敬神的旋律。

连苍蝇都感动了，神圣了。张牧师的祈祷分三段，上一段与下一段中间，约有十来秒的间隙。而令人厌恶之极的蝇群，此时如个头最小的唱诗班的孩子，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遍布苍穹的孩子，紧追在张牧师波澜壮阔的赞颂后面。当主祷的声音一停，蝇群的嗡嗡立即起来，波涛般越涌越高，形成天籁的混声合唱，填满了世间的每一个空隙。

张牧师还在祈祷。
苍蝇还在嗡嗡。
我抬眼直视日神，苍蝇笼罩下来。不知有多少只歇在我的眼皮、鼻翼和嘴唇上，透过睫毛，我触及到它们的腿与翅膀。天空是一个反扣着的蚁穴，刺满了嗡嗡的针孔，赞美造物主的针孔。我不禁吟道：

你们这群天堂的蚂蚁，
从粪便里脱胎换骨，
一波又一波，嗡嗡嗡，
引导我们向至高的地方迁徙……

当张牧师道完“阿门”坐下，集体的圣歌就唱响了。这次是人类与苍蝇，与鸟，与其它益虫及害虫的合唱，我也跟着哼哼。然后悄无声息地用餐。为了向上帝祷告，汤里牺牲了几十只苍蝇，大伙动筷子将它们打捞上岸，便吃起来。

不断有热菜添上桌，但我没吃多少就饱了。旁边的张牧师和邻桌的老张都边吃边张大嘴巴，笑得挺开心。我想，他们与周围的彝族兄弟一样，已习惯了信主的长久快乐，而我呢，是否只配享有怀疑论者转瞬即逝的快乐？

下午 1 点多钟，我们离开这个乡村伊甸园，去另外一个更老的伊甸园——位于撒老乌的西南神学院旧址。

沿途很顺，两点过就拢撒营盘镇，然后从一条岔道上规模比德嘎稍大的撒老乌村。车子在村中的水泥路穿插了一截，遭遇了好几辆黑烟弥漫的手扶式拖拉机，最终停靠在一畜粪遍地的空坝里。

接下来是贴着红土墙根七拐八拐，被我赞美过的猪、狗、苍蝇无处不在，其一如既往的超常热情令我们不断跳跃，不断小跑，终于一溜烟扎入郁郁葱葱的苞谷地。于地坎边刹步，孤岛般的西南神学院在对面浮现了。在两座深绿色浅丘的正中缺口，散落了两三幢寻常房屋，灰瓦白墙，跟川西平原的朴素农舍并无二致，却与云南乡村普遍的红泥石墙对比鲜明。

回顾第一次路过撒营盘，曾沿着孙医生的食指恋恋不舍地眺望，几十年前就埋骨于此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夫妻，还有张长老、张牧师等系列脸谱就走马灯一般转动在眼前。心跳加快，本来可以绕个半圆，从同一水平面的正规小路散步过去，我却率先直下直上，自此端达彼端，经历一巨大锅底。老张连连呐喊无效，只得与我一样气喘吁吁地撵路。

我到底走进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早期发祥地，不仅外观，它的内部也没任何堂皇的结构与装饰。学院正门和一般民居的门差不多，作为主要建筑的“撒老乌福音圣堂”连个牌匾也没有，那几个字嵌入半个黄太阳图案，一并涂画在二楼眼睛般分布的窗户正中。不断有信徒自小小的门洞进去，我们也加入了。圣堂内倒十分宽敞，砖木结构，有特别大的窗户、黑板、红十字架，还有讲坛与一排排漆成草绿色的长板凳。如果不是头顶的楼板太灰暗老旧，这儿就是能容纳几百人的大课教室了。

稀稀拉拉的村民，犹如提前进教室的勤奋学生，安静地等候着。我却张大眼睛寻找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南神学院的痕迹。我拎着相机屋前屋后、满院子转，甚至还爬上了依山而建的红泥后墙，也没寻出它的创始人张尔昌夫妻的墓或碑。有几块砖也好啊，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每一个房间都进入或窥视过了，灰尘、蜘蛛、苍蝇、粪便，还有一只用铁链子拴住的凶猛黑狗。二楼的木板早就朽了，我小心翼翼地往前探了五六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老张吼了声：“快回头！”下面院坝已出现一滩看热闹的信徒。

在另一间较小的空教室，我为在黑板和十字架旁剃头的一对信徒拍了照。可怜的老张尾巴一般紧随，担心还闯出什么祸来。直到我惘然若失地蹲在石阶边，盯着一串串从四周村子赶来的乡民发愣。

在过去的西南神学院，如今的撒老乌村福音堂周围，我拦住好几个人问：“你知道张

尔昌吗？你知道西南神学院吗？”

这些虔诚的基督徒，有的点头，并指指脚底：“这就是啰。”有的却摇头，听不懂一个外乡人在嘀咕什么。

土改受害者孙大川、陈秀英

采访前奏

2006 年 8 月 6 日下午 4 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地从撒老乌赶回禄劝县城。老张不愧为模范基督徒，他兜了几圈，七探八问，才将我送到指定的一家旅馆。我当即付了几天的包车钱，共计 400 元人民币，并连连道谢。本来已相当便宜，老张却特别不好意思，就陪我进门，扯开喉咙喊了好一阵，直到惊动了一位衣着相当正统的妇女同志，她边打毛线边打量我们：“找哪个？”

“马鹿塘孙家的老辈子啰。”老张陪着笑，“这位作家专门来找他。”

“有单位证明吗？”妇女同志一脸警惕。

“我出过许多书，这张脸就是证明。”没办法，我只能自吹一把，以气势压人了。

妇女同志果然一捏就软。“孙如策在电话里也没讲清楚啰。”她干笑着解释罢，就领我们进了开着小窗的“旅客登记处”。里面乱糟糟的，桌椅、床铺和破沙发上都堆满棉絮、床单，我一时不知道该在哪儿落屁股。正左顾右盼，一个戴着鸭嘴帽和白框眼镜的老头出现了，小城退休干部的装束，一笑，满口假牙。我的开场白带着调侃：“你们可真是一个有地位的家庭。”

谁知老头的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从云南境内的孙姓祖宗哪儿来哪儿去哪儿落户起头，一直讲到如何垫家底，如何发达，如何名扬四海，乃至祭祖宗修家谱，将春秋时代的孙武孙膑、三国的孙权、民国的孙中山统统纳入了家门，颇有天下孙者一家亲的气象。我洗耳恭听了 20 来分钟，终于截断他的话头，问及土地改革。老头愕然，并抬手搭住长长的寿耳，冲向我的嘴：“啥子？”

“孙家在土改中的遭遇。”我提高声量道，“我已采访过好几位，你的辈分高，有文化，肯定比他们更讲得透。”

“都过去啰。”老头沉吟道，“现在提起来不合适啰。”

我抹了一把口鼻的尘土，清清喉咙，也打开话匣子。从为黄世仁、刘文彩翻案一直往下说，口沫四溅，还从包里掏出《土地改革运动史》作为佐证。老头眉间紧锁的愁云方才散去，他最后还疑虑地问一句：“真的可以说？”

我这个反革命如革命者一样坚定不移地逼视着企图隐瞒历史的老地主。访谈正式开始。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边少了点东西，转眼一瞅，老张不知何时消失了。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很乱。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真的很乱。

老威：老人家莫着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不催你。

孙大川：整个禄劝县境，孙姓的影响很大，光马鹿塘一个乡，就有 300 多户。其中又数我们这一支最著名。

老威：我这一路下来，听了不少有关你们孙家的故事。

孙大川：我们的祖籍是南京罗安，大约在明朝朱元璋手里，我们的祖先作为军人，被皇帝派来攻打云南。然后驻扎下来，镇守边陲，就再也回不了家乡。以后，又经历了许多变迁和繁衍，我们这一支孙姓在曲靖的秦寨沟小衡山落户，至今，小衡山还有我们的祖坟。大约过了 6 年，虫灾严重起来，搞得颗粒无收，加之兵荒马乱，所以老祖们只好再次拉家带口背井离乡。到底走了多少时间、多少个县市已无证可考。最后听一个姓杨的客商报信，称马鹿塘条件好，又山高皇帝远，开荒没人管。于是就全部过来了。

当时，马鹿塘还叫新火山，地势虽然高，可万山老林，土地肥得出油，开春刀耕火种，随便撒下一毡帽（相当于一升）荞子，秋天就能收获一石。我们孙姓，还有其他姓，就在这儿扎下根来，安身立命，繁衍后代。据家谱记载，率领孙姓在马鹿塘落脚的老祖叫孙准和孙浩，顺着下来的辈分，是兴、开、万、济、大，然后才是如。孙姓以农业为基础，以畜牧业求发展，经几辈人的辛劳，从彝族土司手里买了不少土地。在马鹿塘之外许多地方，也遍布孙家子弟了。开明老祖时期辉煌了一段，办了 4 个铜厂 4 个纸厂；接着是孙万昌老祖，抵达了顶峰。那时的交通不发达，马鹿塘产的铜，经常要用 100 匹以上的骡马驮到昆明，交割给国民政府。

老威：这么说，刀耕火种起家的孙姓，这时已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

孙大川：只限于孙万昌老祖这一脉。因为他脑子灵活，懂得就地取材，多种经营。比如造纸的竹子，就是山上砍下来的。国民政府还送了一个匾，派人来悬挂在堂屋正中，表彰他对社会的贡献。一解放，家里人就赶快取下来烧了。

老威：孙百万的名声在禄劝县境很大。

孙大川：他又叫“金铜官”，在云南省志上都有记载。

老威：据我了解，到了解放前夕，你们孙家已经衰败了。

孙大川：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土改时划阶级，在整个撒营盘区内的孙姓，成分高低各占一半吧。

老威：请讲讲你自己在土改中的经历。

孙大川：我家是孙百万的直系后裔，所以共产党一来，大部分被镇压了。我父亲有 6 弟兄，都不在了。我三大爹是减租退押阶段被杀的，罚款交不出，命就保不住。三大爹的大儿子也叫杀了。我是四弟兄里的老小，当时还在昆明做生意，没料到一回马鹿塘探亲，就没走得脱。

老威；为什么？

孙大川：家里已相当紧张了。大哥曾做过保长，一解放就不在了；二哥孙大尧，才 26 岁，也被当成反革命镇压掉；二大妈家的五哥孙大恩，是马鹿塘的乡长，大概 40 多岁吧，自然该杀；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孙维汉，在国民党部队里任过排长，也叫杀了。

老威：人命关天，总该公布罪状吧。

孙大川：先把人集中关押，当时赊角、新槽、马鹿塘为一个乡，就把这几个地方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有四五十人。天天审天天打天天用刑，你熬不过去，一认罪，就符合枪毙条件了。唉，那年头，其实认罪不认罪都是走过场，如果有 3 个以上的贫雇农站出来揭发，你就死定了。

老威：不通过法律吗？

孙大川：有临时法庭。工作组在上面，有时候是南下干部，有时候是本地干部，最高的级别就是区长了。下面坐一排贫雇农主席团，胳膊上还绑着红布条，满脸杀气腾腾的。成百上千的人一呼口号，打倒、枪毙、铲除之类，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口水、

石块、棍棒都朝阶级敌人飞过去。这时才由贫雇农主席团举拳头，往往都是一致同意杀，再将脸转向工作组。只要上面点点头或挥挥手，一个五花大绑的倒霉鬼就报销了。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孙大川：我都在场，不过没有挨斗。我 1947 年在皎西上中学时，就接触到地下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孙营长的部队。孙营长后来起义，倒向郑伯克的游击队，我也就跟着成了共产党的人。马鹿塘闹土改，本来我赖在昆明的单位，也许就没啥子事啰。可母亲带信来，责备我没回家尽孝，受旧教育的人，这罪名可大了，于是回家，亲身经历了家破人亡。

老威：你也算革命干部吧？对你的家属没有优待吗？

孙大川：连我都自身难保啰。

老威：能不能讲具体点？

孙大川：过去了就过去了，共产党提倡向前看嘛。

老威：可是，

孙大川：没得啥子可是，一辈子命运就这样了。

（我被呛住了，谈话陷入僵局。幸好这时陈秀英老婆婆进门，点着虾米腰接上了话茬）

陈秀英：小同志你不了解，老头子胆小，他 1930 生，今年 76 岁，还天天读报学文件，生怕一不留神犯错误，又挨整。我 1933 年生，嫁到马鹿塘孙家才 14 岁，没过几天好日子就撞上土改啰。夫家遭殃，娘家也遭殃，连个退路也绝了。

老威：你娘家在哪儿？

陈秀英：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跟孙家也算门当户对，土改划为地主。我妈妈在旧社会就去世了，家里剩我爹爹，还有我们子妹两个。一解放，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动员穷得没底的人站出来，在大会上揭发富人。草海子所有富庶一点的人家，都没跑得脱。我哥哥是在减租退押阶段判刑劳改的，那时 22 岁，结果 54 岁才放回来。

老威：什么罪名？

陈秀英：有两个贫雇农检举他杀人。

老威：杀了谁？

陈秀英：我大嫂的堂舅老公，姓田。我妈去世后，我哥 18 岁，正在乡里的小学教书。姓田的成天在外游手好闲，我哥看在亲戚的份上，就把他弄到学校来打杂工。没想到这家伙作风不太正，利用背柴的机会，动一个家门的姐姐的心思。我哥发现了，就批评他，因为身为教书先生，要给学生和家长一个严于律己的榜样。可能是言语重了点，姓田的想不通，就吊脖子自杀了。这事远乡近邻都晓得，解放前就结案了，可万万没料到解放后又被翻出来，作为地主阶级谋杀贫雇农的一个例子。我哥被公审公判，先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改成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满后强迫留在昆明市第一监狱，转为工人，54 岁回家时已成光棍一条了。

老威：你大嫂死了吗？

陈秀英：改嫁了。她守了几年，有一回去探监，大哥就对她说，我可能这辈子回不来啰，你这么年轻，还是另找个人家好好过日子。

老威：你大哥是个好人啊。

陈秀英：死掉的好人多啰。

老威：判他这么重的罪，不经过调查取证吗？

陈秀英：小同志你今年 30 多岁吧？

老威：40 好几了。

陈秀英：所以你不明白那是个啥子世道！划成地主富农了，就是案板上的肉，任砍任切。根红苗正的贫雇农检举你个臭地主，还敢狡辩？当场打死你！

我哥送劳改，民兵又来折磨我大嫂。吊几天几夜，还跪瓦碴，顶烧红的铁十字。田地、房子、财产全拿走，还不甘心，要挖浮财。交不出来了还要罚款。真是生不如死啰。我爹风闻我大嫂被整成那样，估计自己一把老骨头，熬不过去，就在半夜自杀了。

老威：什么？

陈秀英：也吊脖子了。当时，地主吊脖子很普遍，不值得大惊小怪。光草海子一个村，就有七、八个地主吊脖子。

老威：熬不到头了？

陈秀英：打、吊、用大杠子压腿，你嗷的一声昏死过去，又水泼，醒过来又整。还想方设法消遣人，逼你围着海子跑，或者从这面山跑到那面山，跑不动就用竹杆追着打，像赶牲口一样。旧时代的妇女，都缠裹脚，三寸金莲，平常出院子门都少，这时候却一跑几里十几里。大群年轻力壮的汉子一路跟着，摔了筋头，大家就哈哈笑，再抽你几杆子，爬起来跑几步，又摔了，大家又笑。你越鼻青脸肿，人家越高兴。我三婶就是被活活累死在半路的。

大形势摆着，你没处躲，有工作组撑腰，日子也看不到头。动不动就枪毙人，地主的胆子早骇破了。与其最后受尽折磨而死，不如吊脖子来得痛快。我六公公家，大妈和大哥吊在同一棵树上，大妈 70 多岁了，弓腰驼背的，大哥也有 50 多岁，母子俩就那样脸对脸、头抵头地去了阴间。草海子的晚上很冷，大清早人们发现他们，眼还睁着，脸上的泪冻成了冰槽槽。于是去拿锄头，嘿唑嘿唑地刨坑，十几个人忙了一上午，估摸着够躺两个死人了，才挥一刀，割断绳子，让母子俩扑通一声落下去。有人说他们在坑里竟然直挺挺地站住了，一个民兵用锄头一勾，才倒下，可脑袋还双双卡在坑沿，又一勾，才在坑底摆平了。

还有三对地主夫妻吊了脖子，有陈姓，也有外姓。都脸对脸、头抵头，吊在同一棵树上。

老威：这情景够震撼！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啊。

陈秀英：不是故事，是真的！男人熬不下去了，想死，又觉得自己死了，把婆娘丢在人间咋办啰？孤苦伶仃，挨了斗挨了整回来，连个擦身子的人也没有；痛得叫唤，连个递水的也没有。就哭，就把脑壳去撞墙，就喊："婆娘啰婆娘！"女人一听就清楚了，男人你好自私，没活头就要先死！我成了地主婆，又改不了嫁，为啥不一块死了干净啰？于是抱着哭啊哭啊，又不敢大声，怕民兵听见，就你咬我的肩膀，我咬你的手杆，将牙齿印往肉里压。找一根长绳子，在树叉顶绕几圈，绳子这头挽一个套，那头挽一个套，再搬一条长板凳，一起站上面，一起把脑壳伸进套中。你盯我，我盯你，身子冻僵了，泪流干了，还看不够啰。再一起踢板凳，一起……埋人倒省事啰，脚底下刨个坑，人成双成对掉下来，也不用棺材也不用寿衣，甚至坟包都不用起，土弄平了就完事。

（话至此，陈秀英婆婆已泣不成声。孙大川老汉忙插断话头，连道"提不得"，并声明马鹿塘与草海子不属于一个乡，马鹿塘的土改就要温柔得多。我指出，马鹿塘已去过了，而且采访了谁谁谁，连贫雇农剥死人衣服的细节都了如指掌。老头神色愕然，随即也点头证明，这一切不是虚构）

孙大川：我二哥被镇压，不仅衣服，连鞋子、帽子都叫人脱了。光溜溜、血糊糊就入土了，家里不敢出面管啊。老母亲 63 岁，在减租退押时也关押了，因为她吃斋念佛，是乡里出了名的善人，所以工作组指示要专政，下面的群众明里打几下，暗地都不忍心出狠手。

老威：那时候还讲人情吗？

孙大川：山沟沟里的农民，没见世面，本来都淳良，可搞土改，把阶级斗争意识一灌输，就凶起来了。可老母亲，连叫化子饿死了，棺材板她都出，哪个能冲她凶啰？即使做个凶的样子给工作组看，转眼也就放她一马了。由于没吃大的苦头，她 92 岁才去世。我们也算尽了孝道。

你这辈人，已想象不出当时有多黑暗。城里许多像我这样参加过革命的人，一听说家里划地主，统统吓得不敢回去，就是在单位上，也得夹着尾巴做人。我回去了，心想总可以为家庭承担一点，但土改一划成分，我过去的革命经历都不认了。

老威：以后认了吗？

孙大川：也没认。因为孙旭原来是国民党的营长，虽然投奔了共产党郑伯克的游击队，但历史问题始终没交代清楚。在 50 年代的三反五反中，他就受到冲击；57 年反右，他又成了反革命右派，直到邓小平上台才平了反。我参加的是由孙旭部队改编的游击中队，所以也跟着倒霉。后来他们上头有个说法了，我才把要求平反的申请递上去，云南省信访处批示："应予平反。"从县上发回到乡里，被党委书记丁绍文给扣押了，所以我离休干部的待遇一直没享受到。

用脑袋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

2006 年 8 月 24 日黄昏，流沙河先生结束了和我的交谈，并慈祥留饭。站起身来，我牵拉几下汗渍贴肉的衣裤，顺势瞟了一眼已摆上餐桌的饭菜，都是极其小的锅，极其小的碗和碟。自忖是灾荒年过来的饿死鬼投胎，一口能装下这一屋三口的量，就借故推辞了。临出门，吴梦华师母还追着解释："晓得你能吃，我特地多煮了大半锅饭，菜也多炒了，还有你沙河老师亲自打回来的水豆豉！"

我笑道："吃像不雅，就下回嘛。"跟着就下楼出街。夕阳已经下去了，可火烧云缠绕着高高低低的楼群，燃得正旺。我奔走在地面，感到火苗子忽闪忽闪，一股股从脚板心窜起来，终于通过躯干直攻脑门。豆粒般的汗珠滚滚而坠，我恍惚记得电视新闻说过，这是四川盆地最热的夏天，地狱山城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并已持续了几十日。

登上公共汽车，刚好有座，我在摇摇晃晃中打了个盹，路灯就亮了。人生就如此转瞬即逝，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也在公共汽车里摇晃，可那些窄条条街道、灰蒙蒙房顶，都不见了踪影。还在无边际地怀旧呢，一个摩登女郎就立在了我的面前，高跟鞋、超短裙、与奶兜混淆一体的低领背心。我忍不住自下往上看了个饱，没办法，在穷山沟跑多了，那受得这种诱惑。

据说人一旦产生不良念头，体内会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味，摩登女郎耸了耸鼻翼，大约是嗅到了。可不仅没避开，反而垂头对我似笑非笑，进而埋下腰，完全没必要地提了两次鞋跟，奶子几乎喂拢我的嘴壳。勾得人一路浑身赤红，想入非非，如喝醉了酒。

虽然她用足了肢体语言，但我最终没有跟着下车。我晓得她是个发廊小姐，当路灯大亮，就该上班了。“遍地都是发廊，她也不容易呵。”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话说回来，我也不容易。”

骚劲一下去，浑身却更加燥热，偏偏诗人蒋骥又在一条尿巷子里请吃烧烤。我下车快走几十米，习惯性抹了把额头，就见在一片烟熏火燎的街沿上，深陷于人肉围墙的不起眼的蒋氏夫妇正狂挥四手。肥头肥脑的李亚东和瘦头瘦脑的张心武都到了，他们是流亡在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的硕士，满腹经纶，却与我等社会闲杂厮混了多年。

蒋骥点了若干品种的肉和菜，特别是 3 毛钱 1 串的五花肉，像一捆吱吱作响的柴火摆上桌。我们整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可身患寒湿瘸疾的张心武还嫌不够，又要了 56 度的大瓶二锅头，几个人匀着喝。没一会儿，我就有点头重脚轻，为了不至于翻倒，我开始唠唠叨叨。

我说：张心武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冬天？张心武说：不对，应该是深秋，你和宋玉办完离婚手续不久。我说：管他妈的冬还是秋，反正很冷了，我们几个还经常约起喝街边茶。有一回，你在半夜 2 点给我打了一卦，是“剥”。你就叫了声不用翻《易经》，你的床快塌了。张心武说：剥卦是下面 5 个阴爻，上面 1 个阳爻，相当于一张床板的两头各垫了 5 匹砖，活摇活甩的，人一睡就塌。我说：果然不到一个星期，警察就上门了。之前半小时，我刚接到老哥子黄河清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途，称独立笔会出大事了，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抓，可能所有的国内理事都跑不脱，你快溜吧。蒋骥插话说：你形容警察抓人比打雷还猛。我说：对对。所以我又一次从猫眼看见外头围了大堆人，脑壳就麻了。老子不仅不开门，而且还反锁了一把。我拿了银行卡、u 盘与《身份证》，冲到厨房翻窗子。我先探个头，然后身体扁着出去，再立起来。我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筒，抓住捆在上面的一根铁丝，收了几下腹，好不容易才把住水泥檐口。在最后翻上顶楼平台的那一瞬，我的右手差点滑脱，右脚也差点没勾得住，也就是说，我差点从 7 楼栽下去……李亚东插话说：是啊，差点就脑浆迸流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一趟，让我通知王胖子（王怡）溜。我说：那夜的雾特别大，隔两三米就看不清东西。是我哥和妹，还有妹夫开的车，拉着我往绵阳逃。高速公路关闭了，我们走的老公路，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夜走了五六个小时。快天亮了，我躲在一个阴暗角落迷糊了一会儿，又继续逃。我上了火车，差不多一天一夜，却不晓得自己仓皇流窜之际，刘晓波等人已经释放回家了……大伙哈哈大笑，骂我是个傻屄，我点头承认。李亚东举杯说：来来，为两年前的傻屄老廖压压惊。我说：这一惊，把老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万一被摔死，真划不来。我跟一个无赖政权较了那么多年的劲，牢也坐了，两个好老婆也弄没了，结果连自由的臭屁也没嗅着，做梦都在逃跑。

蒋骥说：还没跑得脱，又在昆明火车站被抓了。我说：是啊，原来是为采访法轮功的事，我都忘了，就抵赖到底。没想到这次与独立笔会无关，也没想到盘问两个多小时就放了。可放了又咋样？我他妈打死不回成都，不回那曾经越窗而逃的家了。张心武，你狗日的打的好卦，那床已经永远塌了，我这次回来，只想着卖房。李亚东说：哪你以后咋办？我说：继续流窜，这就是命。张心武说：当然是命，你不流窜，怎么会在云南碰见孙医生？不碰见孙医生，怎么会卷入土地改革，一趟趟去老山沟寻找地主？我愣住了，不禁在心里喊：上帝啊，孙医生是谁？地主跟我有何相干？这一系列来势

汹汹的变化难道就是神迹？我拒绝接受你的安排，我爱阿霞，我爱宋玉，我爱金琴，我爱所有因缺乏安全或归宿感而离开我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呆在家里，年复一年；我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莫名的骚动，但是自由！自由！自由！我怎么在生而不自由的地方服下了自由的毒药？我的屈辱感怎么会如此之深？我怎么会翻来覆去地唱“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是的，地主们，地主后代的我们，真不如狗。

蒋骥见我表情有些异样，忙举杯说：喝酒喝酒。李亚东说：蒋骥，你不是刚买了两万多的摄像机吗？怎么不把老廖的这一段拍成电影？弄不好还挺卖座。蒋骥说：好多事情不能重复，不能表演，要不就成戏子了。李亚东说：老廖难道不是地道的戏子吗？我说：就形象而言，张心武倒适合演电影，脑袋黑得像驴蛋，身板瘦得像木乃伊，大热天，还穿一件绿军装。张心武说：这不是一般的中国军装，这是缅甸的保安制服，我花 30 元钱从旧货市场买的。蒋骥说：你最好动员你的老婆儿子都穿上这一套制服，我们的电影就能开拍了。

正说笑间，陈墨来了，大家都拱手相迎。陈墨致歉说：今天刚好是探监日，所以来晚了。李亚东说：好久不见，老兄瘦了，却还精神。陈墨说：每个月都要去龙泉驿探监，跑瘦了。我说：你老婆的情况如何？陈墨说：李明达的精神还过得去，都 60 几岁的人，又有心脏病，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干重活。夫妻见面，她还安慰我，说犯到公安一处手上，就算撞鬼了。我说：对对，千万想开些，特别是身体不能透支。接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刚收到不久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翻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给他看。我说：本来是上下两篇，结果弄成一篇了，只有等再版时改过来。陈墨叹息一声：这个文字记录就算留给后人，谢谢。就将书收藏妥当了。我说：我是去年初采访你的，转眼又是一年半。陈墨说：李明达已关了两年，还有 5 年，我只有稳稳当当地等她出来。着急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后悔。我说：你办《野草》，我们这些文人都在上面登过文章，可东窗事发，你的家连连被抄，你老婆更是受累入狱，而我们最多说说写写一番，帮不上实际的忙，惭愧惭愧。陈墨说：你当年坐牢不也一样吗？就莫客气。况且我也是你的《冤案录》中的一位，不被忘掉就不错了。

接着我们讨论了记录在当下的意义。我建议陈墨坚持写《探监日记》，认为这比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虚构作品有意思。蒋骥表示同意，并引申说：纪实和运用镜头一样，都是行业性的基本功。李亚东说：老廖，不是有人在拍你的纪录片吗？我说：先是一个台湾姑娘，拥护民进党的，断断续续跟了我大半年，拍的带子有一大堆，结果在采访 90 岁的家庭教会牧师袁相忱时遭遇警察，被吓回去了；后来遇上班忠义，调查与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人物，几个月里拍了我几次，又打住了，因为他觉得我成天嬉皮笑脸，“赖狗扶不上墙”。蒋骥说：的确，你与你的书对不上号，你的书似乎是用镜头在写，可你又不习惯别人把镜头对准你。

这个时代真变了，连蒋骥这样的抒情诗人都操起了摄像机，而我这样比他大一轮的诗人，却蜕变成访谈者。我力图在文字里复原场景与对话，我的脑袋里至始至终架着一台摄像机。特别是寻访土改受害者，我希望在文字里不要遗漏什么，当我面对一张沟壑纵横的脸，面对一段由口齿不清的嘴巴吐露的惨绝人寰的往事，我经常想，如果眼下有一台摄像机就好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怂恿班忠义带着摄像机进山沟去重访，老班回来说：他妈的老威，什么都是第一遍好，第二遍，特别是让老头老太冲着机器，就差远了，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我说：记起来又咋样？还不是镜头里一张老

脸从头讲到尾，观众能看得下去吗？老班说：除非镜头穿过那张脸，让时间退回到1950年。没有补充的材料，只能让人演，那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的，我有些自鸣得意，因为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二战以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威塞尔就是这么干的，他搜集了许多遗物、遗言，做了许多寻访，就是为了将若干单个的碎片拼接拢来，用“脑子里的摄像机”重现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殉难。他甚至搜集到不少死孩子的诗歌，其中一位只活了4岁的女孩这样写道：“墙角的小花，明天我还能看见你的微笑吗？”

还有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堪称在没有摄像机的时代，运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种族苦难的高手。而今天，录音录像手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证人证言也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包括若干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著称的作家诗人们，还在虚构，还在魔幻，还在比赛编故事的手艺，可就是不会运用镜头的基本功，准确、清楚、实在地描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

李亚东说：我也对现在的小说没多大兴趣，可还在四川师大教当代文学，最近又接了一个修文学史的很痛苦的活儿，怎么办？张心武说：如果将来老廖当了校长，你肯定失业。李亚东说：他连考了四次大学都淘汰了，还当校长？所以，我也对他的“大脑摄像机”的高论深表怀疑。张心武说：老廖的理论，小学老师都教过，记叙文嘛。陈墨说：就是嘛，狗日现在的作家连记叙文都忘了咋个写。蒋骥说：老廖当校长，底层人民就有希望了，数学系全是民工，中文系全是三陪小姐，你不会把铁人王进喜弄去当音乐系主任吧？我反唇相讥：我让你当摄影系主任，如果民工和三陪小姐约会上床，你就躲在床底下拍。

夜已深，可暑热依然不退。烧烤早吃得差不多了，可我们还是霸着位子吹牛。在成都呆久了，受吊儿郎当之市井风气的熏染，再严肃的话题，一进行长了，就没个正经。我想，朋友要处得久，只能这样吧。李亚东说的话令我有点点感伤：老廖在的时候，我们至少个把星期要集体吃喝一次；老廖走了，我们恐怕几个月半年碰不着一回。

蒋骥那龟儿子说：老廖有他的地主，我们不用牵挂他。

我只好说：对头，李亚东是有信仰的人，只要每天与上帝碰面就足够了。

在自己家里坐牢

在我的土地改革系列文字中，一直缺少“工作组”这一环，所以，当沙河老师无意间提起洪钟的名字，并称此人当过自己家乡某个地方的土改工作队付队长时，我不禁一阵暗喜。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就偶尔在布后街2号（原为大军阀熊克武的老宅，后挂牌为四川省文联）连环套一般的院落里，看见一个戴着厚镜片的瘦老头，碰谁都点头微笑。“我们办公室的洪伯伯，”当时在四川

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做临时工的妹妹小飞悄悄对我说，“才高八斗的老革命哦。”

那会儿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敢和沙河老师当众争论，就更不把坐冷板凳的老古董们放在眼里，所以时过境迁，对洪钟的印象早就含混了。回家一问小飞，才晓得他是文联系统大名鼎鼎的左派，“《星星诗刊》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右派窝子，所以白航、曾婆婆、沙河老师他们从来不跟他交往，碰面都不打招呼。”小飞说，“嘉嘉和他隔着桌子办公，也很少说话。”

“他还记得你么？”我问，心头却打着算盘。

“他的记忆力惊人，当然记得我。”小飞说，“并且也记得廖亦武这个名字。”

“是么？”我有点莫名惊诧。

“文化界都晓得你那个《大屠杀》案子，洪钟天天看报看文件，漏不脱的。”

“我的案子没上报纸嘛。”。

“还有 84 年清除精神污染，你发表在《星星诗刊》的一组诗算个重点，上了省委宣传部的内部通报，当时的下发文件就是洪钟让我打字并复印的，还再三叮嘱不可外泄。你忘了嗦？我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在那种东西里突然发现自己哥哥的名字，都吓哭了。我可是冒着丢工作的危险替你偷了一份。”

“过了 20 几年，谁还清楚。”我怀着一丝侥幸。

“洪钟就是吃这碗饭的，”小飞说。“不信你去文联打听。”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四川省文联有不少熟人，因此很快就将洪钟的底牌摸了个大概。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青年时代，并且在旧社会即涉足左翼文坛，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理事，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狂热诗文。全国刚刚解放，他即以老地下党的资格和文人的身份参加了土地改革，先后在流沙河故里金堂县辖内之土桥沟乡、成都郊县华阳之大面铺乡担任工作队付队长。并数次充当镇压“恶霸地主”之临时法庭的审判长。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树为典型，多次凸现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下集宣传大片——《伟大的土地改革》中。洪钟虽然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也受到过冲击，但左倾的初衷不改，乃至在四川文化界树敌不少。他也暗里明里受到若干排挤，最后被安插在清水衙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坐冷板凳，离休了，还因为过于坚持组织原则而搞不好邻里关系。

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他高度近视，敌我界限可清楚了。”

一位朋友干脆说：“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老廖。你一没有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二没在正式的新闻文化单位，三嘛，反革命采访老革命，弄不妥叫识破了，会惹大麻烦。”

“可不可以拐个弯儿，找找熟人？”

“那就试一把？”朋友坏笑着说，“你干妈曾婆婆的千金嘉嘉过去是他的下属，幸许可以引见一回。不过屁放在前头，洪钟可从来不接受私人采访。”

“即使不接受，”我咬牙发狠，“这过程我都得写出来。”

2006 年 8 月 26 日午后，烈日如一匹疯狗，在高处冲着人类狂吠，我从公共汽车一下地面，就觉得耳门汪汪汪直响。在已扩建多次的《四川日报》社街对面，昔日的小街小巷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众多百年庭院的旧址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如重重叠叠的废气集装箱，搞得人整日神思恍惚，辨不清来龙去脉。我就这样在旧貌换新颜的布后街 2 号周围梦游了两三个来回，才挥汗如雨地找准省作协宿舍。问嘉嘉在否？门卫答：在誓死保卫她的妈。

我一时不解这种幽默，就继续在街面寻另一栋作协宿舍楼。转眼五六年没来了，不料那楼的前后左右都叫更为气派的暴发户楼群包抄，如一匹癞狗，只将窄窄的肛门朝外留着。我钻入肛门洞，沿晦暗不明的肠道拐上 2 楼，敲门，应声探头的正是嘉嘉。

我被让进这个已相识 20 多年的大家庭，如今里面又包含了嘉嘉和玲玲两姐妹的两个三口小家庭，所以有点人满为患。“哦哟，大热天，全家人在这儿团圆嗦!”我开了句玩笑。

嘉嘉递过一把摺扇，苦笑说：“没得办法，只有在这儿团圆。”

我正要问为啥，我干妈曾婆婆那久违的尖嗓子突然响了起来：“小廖！幺娃子！到老娘这儿来!”

我立马凑拢过去，外表嬉皮笑脸，内里却有些酸楚。自 1982 年进《星星诗刊》，我就与老人家最为投缘，一老一少整日形影不离，混吃混喝。甚至在电影院也大呼小叫，屡屡激起公愤。我与流沙河辩论诗歌，也只有她像个老儿童，始终点着虾米腰站我一边：“我觉得小廖还是有一定道理哦。”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文学岁月，相当部分与《星星诗刊》和曾婆婆的家有关。老两口都是品质纯正的右派，历次运动中均属挨整对象，却从来不识时务。当年我在她家出入时，沙河老师几乎日日散步过来找游伯伯，两人要么喝茶聊天，要么相对无言，或者各自捧一本书在看。我曾悄悄问曾婆婆：“咋个看书都要在一堆？”婆婆露了个鬼脸，回答：“这叫氛围，懂不懂？”

后来发生六四，世道和人心一夜间就变了。我经历了家破人亡，再也没有了诗意；而《星星诗刊》的右派老人们也逐渐退场，白航、陈犀、流沙河、游伯伯，还有这个曾婆婆，都定格在因过期而褪色的电影胶片里。再后来，陈犀死了，游伯伯死了，有一天我偶尔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主编白航的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养鸟，养猫，还养狗，就是不想与一种叫人的东西在一起。”

游伯伯去世没几天，我捧着大把梅花去看病中的曾婆婆，她还望着墙上的遗像笑，她

说："昨晚上你游伯伯托个梦给我，说总算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要我去看。"

好像没过多久，她就练上了法轮功，虾米腰弓得更厉害，可精神头却重新足起来。那时法轮功还没成邪教，成都市街头巷尾，到处有老头老婆婆在打堆。有一次我登门，她也拿出一本《转法轮》叫"必须读"；还叫明天凌晨 5 点多钟，到新南门大桥和她碰头——我没去是因为睡眠习惯。这辈子，除了小时候及坐牢期间，我几乎没在上午 11 点前起过床。

"我练功快 10 年了，没吃一颗药，没得病，连咳嗽气喘都没得。"曾婆婆笑着说，算是开场白。"幺儿你呢？身体如何？你妈妈身体如何？"

"小廖的身体你都看到了嘛。"嘉嘉抢过话头，直截了当冲我说："我妈走火入魔了，小廖，千万不能给她电话！你妈的电话也不要给！任何人的联系方式都不要给！如果你给了，她就会一天到晚地打，还会有人找上门去宣传。法轮功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这将给对方带来无边无际的麻烦。她自己已经够麻烦了，差 1 岁就 80 的人，风都吹得倒，警察还隔三差五地登门。她倒是硬得起，你要抓就抓，老娘在监狱里也要练。可我们做子女的咋个办？"

"各有各的活法嘛，"我说，"何必要扯在一起？"

"对头，按道理是父母有父母的活法，子女有子女的活法，况且我们也成家立业了。可政府不这样看嘛。警察找她无效，就要来找我们嘛。有点点风吹草动，就把我弄进派出所，态度还恶劣，一口一个你妈如何如何了，如果如何如何了，政府就要把你们如何如何。"

"中国也算进入法制轨道了，平白无故，他们能把人如何如何？"我说。

"是不能随便如何如何，可搞得你不舒服，搞得你没法正常生活。"嘉嘉叹了口气。"你看，这个家里片刻不能缺人，我和玲玲一不在，法轮功就阴一个阳一个溜进来。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回来打开门，突然惊呆了。沙发上、床上、地上全坐满了人，而我妈在中间打着盘腿，正入定呢。我气惨了，让所有人马上出去，我妈还那样盯住我，还在微微的笑。法轮功的文化层次普遍低，街坊上的、郊县农村的老头儿老婆婆，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相比较，我妈是高级编辑，文化和阅历都不浅，所以自然成了重要骨干。警察压不服，我们也说不服她。为了少跟官方打交道，也为了警察不住进家里来，我们只能轮流值班，看住她。"

嘉嘉是 80 年代诗人出身，情感丰富。我注意到，那双困在皱纹里的大眼睛布满了血丝。而在她说话时，充耳不闻的曾婆婆靠在沙发上，安详的目光满含怜悯。

"不管咋样，"我委婉地说，"她总算有信仰，活得也算充实。人老了嘛，都会出问题，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

"是啊，如果爸爸还活着，她也不至于去信法轮功。"在一旁做家务的玲玲突然插话。"管她的，警察找就找嘛，我没有嘉嘉那么着急。"

“我劝了她好多次，”嘉嘉递给我一瓣西瓜，又继续说，“一个人阴悄悄在家练就行了，作协院子里都晓得，也没得哪个去告密。可她不理，非要串联，好像过去的政治亏还没吃够。太自私了！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儿女、孙儿孙女的处境嘛。”

“除了练功，她干了啥子出格的事？”我问。

“她一听楼道有脚步声，就开门给人塞传单。都是熟面孔，人家转过脑壳又来找我，嘉嘉，把你妈管好，不要到处惹事了。搞得我连忙道歉，唉。”

现在我明白这家人的尴尬处境了，原来曾婆婆在自己家里坐牢，而无辜的下一代也被拖入漩涡里，一时半会儿，谁都解不了套。我将嘴巴凑拢婆婆的耳门，喊着和她闲聊，我使劲浑身解数，想让时光倒流。那 20 多年前的诗歌时期，虽然短暂，却有一种不知险恶为何物的傻乎乎的浪漫。

周围没一点笑声，而婆婆却笑得很响，还是那不管不顾的老儿童劲儿。她问我是不是又把媳妇耍脱了，还骂我没良心。我连忙解释有良心，是媳妇把我一脚蹬了。婆婆又问：没乱来嘛？我说：哪个王八蛋乱来了！婆婆说：你的诗好文章好，顶个屁用，做人重要的是品行端正。我说：是是，老毛讲过了，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一件好事。婆婆笑得揩眼泪说：狗日大魔头毛泽东，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还有江泽民，也没做过好事。嘉嘉说：那你就做件好事，让大家省省心。婆婆耳背，却边笑边对我夸嘉嘉和玲玲孝顺，并且还趾高气扬地将两条光腿杆举起来，放在茶几上弹一弹的。

接着，婆婆又问了我妈、我妹、我哥的情况，叮嘱要互相爱护；还问到我的中学同学，诗人杨然的情况。每当此时，嘉嘉就冲我狂使眼色，其他人的表情也非常紧张。我会意，只好敷衍作答，或顾左右而言他。

本来该给老人家留个电话的，但没有机会，只好放弃了。我犹如一个小心翼翼的探监者，尽挑些无关痛痒的话头，东拉西扯。这家人对我很有耐心，无论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们遗传的善良心性不会变。

我到底记得该干啥，我提起了洪钟。嘉嘉摇头说：我不能给你作这个引见。我问为啥子。嘉嘉说：老头左倾，以前我们虽在同一个单位，却连话都很少说。我说：想想办法嘛，比如通过他的儿女？嘉嘉说：儿女们也跟他谈不拢。我沉吟说：你是怕担责任吧。嘉嘉承认：都是熟人，我不可能帮你隐瞒身份。我被噎住了，半晌才说：难道采访个洪钟比进皇宫还不易？嘉嘉说：对于官方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来说，采访 100 个洪钟也不是问题。你在底层呆久了，不了解类似的老革命，他们特别看重你的来路正不正。

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下，有办法了！却忍住没说。为了不拂逆她的善意，我点头说：过气的老顽固，又没啥子娱乐性，来路正的媒体也不会去找他。嘉嘉说：对对，这年头也没人看革命套话。我说：曾婆婆倒是从来没得套话，可惜你不答应我采访她。嘉嘉说：好了好了，大热天的，莫提这一壶。我们几年不见面，你突然撞进来，又不是

专门来看我妈的。唉，时代的步伐加快，连我们小廖都讲究效率了。还有事吧？现在就与我妈告个别？

我羞得满脸通红，却乘势站了起来。曾婆婆一直弹着光脚趾头，嘴里还哼着什么歌，见我起身，以为要上厕所，就连忙缩腿，指引方位。玲玲凑拢来大声说：小廖要走了！曾婆婆愣然了一两秒钟，理解地点了点头，旋即抓住我的胳膊说：好嘛，老娘送你。嘉嘉急忙阻拦：小廖独来独往惯了，不需要人送。我也说：莫送了，老人家自己保重吧。曾婆婆这才松开我，笑着说：她们怕我下楼梯摔跤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数。

门终于在身后关闭了，转瞬之间，世界归于死寂。我缓缓下楼梯，在拐角处，又驻脚回头了分把钟。这样，就这样，门里边的一切从此与我无关了。

楼道尽头是热浪席卷的大街，车辆交错穿流，疯狗般的烈日依然冲着人类狂吠。我挥了一把浊汗，耳畔蓦然响起据说是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唱过的俄罗斯民歌——

太阳上山又下山
俄罗斯永远受熬煎
狱卒不分昼与夜
晃动在铁栅的后与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人逃不过狼犬
我虽然天生热爱光明
却挣不破这无边的黑暗……

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采访前奏

从曾婆婆家出来，我再次路过十几米开外的布后街 2 号，就钻进去故地重游。昔日雕梁画栋之深宅大院，如今已变成十来层的水泥楼，朝外的楼面遮着巨幅广告。在底楼大厅的吧台内，管收发的焉巴老头摇着蒲扇，乜了我一眼，问找哪个单位？我顺口说：《戏剧与人生》。他说：莫得了，几年前就垮逑了。我又说：《当代文坛》。他说：差不多垮逑了。我说：啥子叫“差不多垮逑了”？他说：每期才印几百本，不等于垮逑了？你该不是跑来买版面哦？我吃了一惊：啥子意思嘛？他说：《当代文坛》办了 20 几年，在文学评论界还是有影响嘛，现在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面向大学卖版面，刊登博士和硕士论文。我连忙点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要上楼梯。老头撵上来喝问：到底找哪个？我答：《星星诗刊》。老头嘀咕说：没有垮。可编辑部没得人。

我不理睬，就一层层上。可每一层楼道都黑古隆冬，我走马观花了一遍，发觉省作家协会下属各部门、各协会、各杂志编辑部的招牌几乎还在，可都关门闭户。我试着敲了几下门，毫无反应。爬至 6 楼，我找到占据了几间办公室的《星星诗刊》，只有资料室的门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7 楼是《四川文学》和巴金文学院，楼的那一

端，有影影绰绰的生命迹象，但我已失去探索的兴趣。

上世纪 80 年代人声鼎沸的文艺衙门，如今咋个沦为一座空楼？感叹之余，我记起流沙河曾讲过，在 90 年代以前，文艺被捧得高，省市两级宣传部的官员，一个星期至少要来文联和作协一次，或视察，或指导工作，或开座谈会，弄得左派文人情绪持续高涨，小报告也打得勤；可转眼信息时代来临，我党的意识形态重心扭向报纸、电视，其次是出版，昔日卖弄风骚的文联和作协，地位一落千丈，犹如人老珠黄的二奶，半年一年盼不见一个官员来，大家披肝沥胆的小报告没处递，积极性受挫折，就只领工资，懒得上班了。

洪钟离休得早，还算保持了晚节，我想。就抓紧给在一家著名报纸工作的铁哥们打电话，一拍即合后，约定次日一起去寻洪钟。

2006 年 8 月 27 日上午 10 点，我和朋友在布后街 2 号门口碰头，然后颇有底气地找到附近的省作协宿舍，敲响了洪家在底楼的门。迎住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我的朋友问：

洪老在吗？我们是某某报社的，要采访他。

中年人满含笑意地给我们沏茶。我说：不用了，时间比较紧。

中年人说：我是洪老的女婿，临时在这儿看家。爸爸已经住院几个月了。

我急忙问：啥子病？要紧么？

中年人说：前列腺。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病，前一段开了刀，就一直住院疗养。

我的朋友故意说：我们会不会打搅洪老？如果不方便……

中年人爽快地说：你们去吧，这两天他的精神还可以。接着推开洪钟的书房，从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抽出一支圆珠笔，写道：华西医院第三住院大楼 12 楼（高干病房）40 床。
我们连声道谢。中年人却摇头说：本来我该带你们去，可家里走不开。

自从父亲 2002 年患癌症去世，我已有几年没来过医院。在我被数次污损的记忆词典里，眼前这块声名远播的地方跟屠宰场也差不多，区别只是见血和不见血。可不知为什么，这地方却比 10 年前扩张了好几倍，老远望去，新的住院部大楼直耸云霄，像逼近天堂的飞碟工厂。
我们是打的过去的。由于塞车，十几分钟的路绕了半个钟头，并且越接近医院越堵，最后我们干脆下车步行。忘了进的是哪道门，即将消失的狭窄老街显得兵荒马乱，到处是残垣断壁；而医院的围墙内也在大兴土木，吊车和打桩机此起彼落，整得热火朝天。沿途都是水果摊、小卖部和廉价礼品店，叫卖声震耳欲聋，直到快抵拢大楼，才逐渐减弱、消逝。

我们进入了中国最大的疾病超市之一，人流滔滔，形色惶惶。好在标志显眼，我们就在熙熙攘攘中顺藤摸瓜，乘电梯直上 12 楼，不料竟一脚踏入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超现实空间。出奇不意的静穆！被过滤的天光从甬道两端透进来，拉长与缩短着影影绰绰的梭巡的白衣天使。在如此和煦如春的特权罐头里，我们两条害人虫，鬼鬼祟祟地比照门牌，很容易就逮着了已 87 岁高龄的革命前辈洪钟。

电影里常见的宽敞病房，整块的落地玻璃，悬在轨车下的输液瓶，还有真假鲜花、真假果篮，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肮脏的癌病房有天壤之别。50 多岁的白发陪护将老爷子从卫生间搀出来，上床半卧着，我们一脸恭敬地趋前问安。由于没戴假牙，洪老满腔空洞地询问我们的来历，我的朋友一板一眼作答，并掏出《工作证》及《采访证》供其查验。洪老的表情越渐放松，笑起来，两条长寿眉直打颤。

我乘机以报纸要做土地改革专题为由，掏出了录音机和笔记本。洪老让陪护将床头摇高一些，仪态轻松地应答我的提问，该切入的切入，该回避的回避，该强调的强调，该简略的简略，政策、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真不愧经历了那么多年革命风雨的洗礼。

老威：洪老你好，能够接受采访么？
洪钟：问题不大。
老威：你对土地改革应该了如指掌吧，比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洪钟：对对，亲身经历过。
老威：听说你在金堂县蹲过点？
洪钟：在金堂县土桥沟，那是最偏远的一个乡，与乐至和中江县接近。我是 1952 年去的。
老威：那么成都周围的土改要晚一些。
洪钟：要晚些。此前，我先在华阳的大面铺参加第一期土改，大概搞了半年，1951 年的九、十月间到 1952 年的一、二月。当时土改第一工作团的团长是川西区党委秘书长郝德青，他好像 56 年还做过匈牙利大使，去了不久，就碰上匈牙利事变。这个人，老报社的人恐怕都知道。
老威：你当时的职务？
洪钟：先在大面铺做副队长，正队长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年代太久远，他的名字已记不得了。随后就到金堂县土桥沟做了正队长。派驻金堂的是第四工作团，团长是安法孝（音译），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长，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人？
老威：我们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嘿嘿。
洪钟：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下去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地主、富农有哪些，地方上的恶霸势力分几坨，弄清楚了，下一阶段才是清匪反霸……
老威：访贫问苦的时间有多长？
洪钟：就 1 个多月。因为总的时间才大半年。土改之前我在川西文联，党组织为了锻炼锻炼我，就抽调去了。
老威：从各个机关抽文化人去参加土改，当时也算普遍现象吧。我曾在《万象》上读到一篇写作家废名的文章，他也被调到安徽农村蹲点了。
洪钟：主要还是抽调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四川文学》有个作家叫茜子，也参加土改了。
老威：我听说过茜子，好像是个右派。

洪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歪曲现实，可我在《四川文学》的时候，还是用他的长处。写过《吕梁英雄传》的西戎同志从《四川日报》调到省文联来做领导，也赞同我用他的长处，指明他“要跟群众好好结合”。可到了 1957 年，风向一下子过左，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接着弄去劳改了。直至文革结束，才回到文联。文联和作协分家，又留在作协。西戎同志去世，我们，还有李缨同志，联名发了唁电。茜子还下过海，不习惯，又回来了，找个农村旮旯住，就不晓得下文了。最近，听说他死了。
老威：哦。
洪钟：哦。
老威：回过头来说土改？
洪钟：好，说土改。摸清了底，就清匪反霸。川西平原土匪不少，他们既抢人，又勾结恶霸，盘根错节，欺压百姓。所以一清匪，自然就牵出地方恶势力，牵出大地主。过去他们总的靠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靠山叫打倒了，底下的脚脚爪爪都露了出来。人民政府要主持公道，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老威：在你蹲点的地方清了多少土匪？
洪钟：华阳县不多，只有几个，恶霸也只有几个，都枪毙了。我临时出任法庭庭长，在本地开的公审大会。
老威：你当时多大年纪？
洪钟：我 1919 年生，当时才 20 多岁（老威注——口误，应该是 30 出头）。
老威：真是年轻有为的庭长啊。
洪钟：刚解放嘛，都年轻，又没有专门学法律的，我也不学法律……
老威：临时法庭是咋个组成的？
洪钟：土改工作队队长，还有两个队员，其他就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陪审团。
洪钟：对对，农民就是陪审团。你不把掌握地方命脉的土匪、恶霸、哥老会头子清了，农民就站不起来。但是枪毙人要报土改总团批准。
老威：总团是县级？
洪钟：不，哦，是县上。主要负责是郝德青，川西区党委秘书长，又做过匈牙利大使。这是清匪反霸的大致情况，接着减租退押……嗯，地主收的地租太高，不合理，弄得农民粮食不够吃，我们就要把压在贫农、下中农头上的过分的租子给减掉。
老威：你经手过的比较著名的案件有哪些？
洪钟：著名案件？唉，记不得了，都记不得了。
老威：再想想看。
洪钟：哦，华阳大面铺有地方一霸，叫林凤章，开糖果铺的。虽然他的职业是开铺子，却一贯欺负贫苦农民。大家都反感他，所以土改就弄来枪毙了。金堂土桥沟的土匪比较多，也枪毙了一些，时间久了，名字就记不得了。都是土匪、恶霸互相勾结，必须杀。
老威：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因为有活生生的事件、案件穿插在其中，现在的读者才容易看得懂。否则，莫提我们这些人，就是年龄还大点的，也摸不着火门。那时候都没有生出来嘛。
洪钟：在大面铺阶段，我是副队长，正队长是老区来的，我突然想起了，叫崔玉杰，80 年代在成都市当过啥子部长，已故去了。土改划成分还是有标准的，根据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定的一些条条。哎呀，都记不得了，你可以去翻一下嘛，对，翻一下土地改革的基本法。
老威：啥子时候出的？

洪钟：1950 年就出了。工作队每人手头都有个本本。记不清楚了。少奇同志的大致意思为消灭封建剥削阶级，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地主。但不是把地主扫地出门，还是要给适当的土地、房屋，给适当的补助，让人活下去。只是原来的土地、房子分给贫农下中农了，他们种的、住的就没那么好了。
老威：一些资料显示，在土改中还是采取了某些过激行为。
洪钟：也有可能。这要看下面的队长如何掌握。
老威：你所在的地方过不过激？
洪钟：想不起了，好像没啥过激。比如将贫农下中农，甚至上中农的利益伤害了，当然就过激了，可我们连富农的利益都在适当保护。只是打击恶霸地主没有手软。
老威：没有手软？是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他们肯定不甘心，那你们采取了啥子办法？
洪钟：大的形势摆在那儿，他们也莫法。
老威：你们有些啥子斗争方式？
洪钟：恶霸地主枪毙在前头，他们遭吓倒了。
老威：威慑力量？
洪钟：是嘛，威胁力量。
老威：恶霸是咋个定义的？
洪钟：横行乡里，欺负老百姓嘛。
老威：包不包括旧政府官员？
洪钟：也有乡长、保长，更大的官好像没得。
老威：有点像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的……
洪钟：陈戈演的王保长，压制贫农下中农嘛。
老威：保长一级的都镇压么？
洪钟：也不一定。看他如何悔过，也要给出路。
老威：除掉镇压的，余下的地主咋个处理？
洪钟：原来的好地、好房子、大院子收了，就把贫农下中农差一点的，比如茅草房换给他，根据人口多少，也适量分地，给出路嘛。叫人活不下去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老威：据相关资料，1947 年，土地改革就在解放区开始了，那时是为了广泛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大量招募兵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解放全中国。可到了 50 年代初，国民党跑了，中国已经解放了，还有啥子必要搞土改呢？
洪钟：嘿，封建主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嘛。农民吃不饱肚子，政权就不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把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土地、财产没收了。
老威：可从地主的角度看，土地、财产都是几辈人辛苦挣来的。
洪钟：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共产党不允许不劳而获。
老威：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可采取的是由政府出钱向地主赎买，然后再分给农民。
洪钟：孙中山搞的就是土地赎买，好像法国大革命也差不多，资产阶级革命嘛。我们的性质不一样，可要留基本的生产资料，让地主能活下去。
老威：台湾与大陆，两套土改，你觉得哪种合理些？
洪钟：当然我们要彻底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剥削，铲除恶势力，重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让人民翻身作主。我们不允许恶霸地主，包括伪乡镇长、保长来破坏，一旦发现，就抓起来镇压。
老威：据我了解，当时川西平原有若干股袍哥势力，那些人见识浅，没文化，根本不晓得外界的事。也许你指控他破坏了啥子，他却不晓得你在说啥子。

洪钟：对嘛。
老威：洪老举一个搞破坏的例子嘛。
洪钟：就是背着工作队威胁农民，不准起来闹。按郝德青的定义，恶霸就是地主阶级当权派。
老威：你说谁定的义？
洪钟：郝德青。说不准还是少奇同志在《土地改革法》里定的，属于国民党的地方统治者。乡长、保长，甚至甲长开始都威胁过农民。
老威：1979 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主、富农揭帽，此后我也陆续读到一些土改亲历者对土改本身的反思文章。洪老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洪钟：我反思了，觉得没啥子嘛。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当时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十分必要。即使工作上有失误，打击面扩大了，也是难免的。哪能完全公平合理呢？
老威：有没有左的倾向？
洪钟：极少数。个别。

老威：举一个例子。
洪钟：1953 年我从乡下回到文联，曾有一个自称活不下去的人来找我，哭诉受了冤枉，还跪下给我磕头。我说不要这样，我给华阳县委书记写封信，你去找他解决。
老威：他受了啥子冤枉？
洪钟：也是个袍哥大爷，号称“拦门大爷”，有点恶霸性质。我为他写了信，可县里咋个解决的，就不晓得了。
老威：我听说洪老作为土改的突出典型，还上了一部纪录片？
洪钟：对嘛，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王德成，还有助手，带着录像机，先到大面铺来找我，商量哪些要拍，在哪儿拍，咋个拍。
老威：细节咋个的？
洪钟：我们当时开镇压恶霸地主的公审大会，虽然我不懂法律，可准备要杀的人，都是上面（郝德青）批准了的，由我这个审判长来宣布。电影里就有这个场面，还有我加夜班的场面。
老威：你够辛苦的。
洪钟：是比较辛苦。
老威：为啥要将你树为典型？
洪钟：郝得青看上我了。老地下党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我解放前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写了不少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吹革命和改革。那时剧作家陈白尘还在编《华西晚报》，我也在当《华西日报》的编辑，又写又编，很有影响。我的党内关系在川北地下党书记王绪武手头，他是我的蓬溪老乡，做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曾专门为我写过 1939 年入党的证明材料。
老威：哦。那个土改片子拍了你多长时间？
洪钟：华阳和金堂的土改现场都拍了，还采访了。
老威：怎么采访的？
洪钟：王德成问开啥子会，政策怎样执行，等等。
老威：你如何回答的？
洪钟：我说我们完全遵照少奇同志的《土地改革法》来进行，有人的有些怀疑，就用不着了，因为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老威：还问啥子？
洪钟：也问了是不是过左之类。

老威：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在接着问。
洪钟：嘿嘿，我今天也没觉得过左。没错杀过、多杀过人嘛。
老威：我查阅过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对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人数作了个粗略统计，大概是200至400万。你认为这符合实际吗？
洪钟：费正清我晓得，抗战期间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他的这个统计我没看过。
老威：你认为土改中杀了多少地主？
洪钟：不清楚。一个乡才三两个，不多嘛。
老威：经你的手，有送去劳改的么？
洪钟：有。
老威：何种情况？
洪钟：恶霸嘛，送劳改农场。数目也不太多，充其量一个乡三两个。

（陪护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的故事。
老威：好嘛，你是哪儿的人？啥子成分？
陪护：我是乐至县的，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我的老家是个土匪窝子，许多户人都藏有枪。大概在 1950 年，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派工作组下来征粮，大家都抵到不交，可工作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也不会让步，召集群众开了几次会，都不见效果。
老威：群众的觉悟这么低？
陪护：才解放，都对共产党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也复杂，民中有匪，匪中有民，哪个都说不清楚。连乡公所也是既接待共产党，又暗通袍哥、土匪。有一回，土匪从山上下来一百多，要把工作组征粮队一锅端，可当时，征粮队分散下村，只剩一个人在乡上留守。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相当凶，竟靠着地势，与土匪周旋对打了两个多钟头，撂倒了十来个，直到随身的 100 多发子弹拼光了，才转身就跑。土匪听见脚步声，就乌呀呀的一大片，跟着追，还辟哩啪啦地放枪。幸好天黑，侦察排长好歹穿过树林子，跑了两百多米，躲进了乡公所。土匪立刻把乡公所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吆喝着搜。可是把旮旮旯旯全翻遍了，就是不见影子。土匪气疯了，吼着要点房子，乡公所的一个人吓住了，就暗中点水。土匪根据他歪嘴巴的方位，撞入一间屋，里头就一张桌子、两条板凳、一张床。土匪拿枪筒子和刺刀，将天上地下都戳了个透，还是没人。土匪又吼，那个点水的就指了指床。农村的床又大又沉，床档非常厚，十几个土匪，费尽吃奶的劲儿，翻了个底朝天，终于逮住壁虎一般死死扒在床背的侦察排长。
老威：真了不起。
陪护：侦察排长被土匪杀害了，尸体叫扔在树林子里。惹得解放军来剿匪报仇，一百多土匪全报销了，还继续追查点水的人。乡公所的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解放军说，全部不是好东西，就把所里十几个人统统枪毙。
老威：乡长也枪毙了？
陪护：嘿，还想两头吃糖，结果从乡长到烧饭的，一个都没滑脱。
老威：那个侦察排长叫啥名字？
陪护：沈福山，牺牲时才 20 多岁。乐至县城一个坡坡上，还立了烈士纪念牌，他的事迹，老一辈人都晓得。那阵我才七、八岁，可沈福山的故事已听了好多年。
老威：唉，竟然有那么多坏蛋为他垫背！沈排长的命也太值钱了!）

洪钟：他讲的是土改以前的征粮阶段，那阵我在军管会文艺处，晓得有一些老区来的干部被派下去催粮。

老威：小时候，我就学习过丁佑君烈士的光辉事迹。
洪钟：对对。丁佑君也是到西昌邛海边上征粮，遭遇土匪恶霸，惨遭杀害的。她原来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好像还是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征粮工作队，结果没满 20 岁就牺牲了。西昌邛海至今还立着她的碑。还有乐山五通桥，她的老家，也立着她的碑。
老威：洪老参加过征粮么？
洪钟：没有。1950 年初征的粮，我是 1951 年九、十月间调去搞土改的。
老威：为啥要征粮呢？
洪钟：刚解放，一下子那么多解放大军入川，军粮十分短缺，可川西平原的多数地方，恶霸地主与土匪勾结，囤积粮食。他们不拿出来，就要派工作组下去征粮，以供军需。我还记得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原四川大学校长黄济儒逃去台湾后，还造谣说：四川老乡啊，共产党抢粮，要把你们饿死啊。嘿嘿嘿。
老威：哦，原来在正式的清匪反霸之前，还剿了一次匪。
洪钟：有匪就要剿，有霸就要反，不限于一次两次。只有地主阶级当权派彻底倒了，障碍扫清了，才有条件搞土地改革。
老威：那土改中的赔罚又是咋回事？
洪钟：这是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有的地主虽然有罪，但是不够杀的条件，那工作队就要支持农民找他们算帐，你过去占了大家的便宜，得了大家的好处，今天不仅要全部吐出来，而且要罚你好多钱，好多谷子。
老威：赔罚和一般意义的罚款不同么？
洪钟：不同。解放前，你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欠了农民的债，统统要喊你赔，赔够了，才是罚。
老威：有没有个大致的比例？
洪钟：看具体情况而定。看你地主拥有多少封建土地、封建财产而定。
老威：是不是赔和罚都没有规定的比例？
洪钟：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土地、房屋、财产，你有多少我就罚多少。记得著名作家沙汀同志曾问我：在土改中打垮地主阶级最凶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子？我一时回答不出，就随口猜：恐怕是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地主。沙汀同志摇头说：真正打垮地主阶级经济的，就是赔罚。
老威：一点点把他们挤干，让他们生不如死。
洪钟：没那么严重。只是逼你把好地、好房子、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老实交出来。
老威：我看过一本写土改的书，里面说有的地主交不出赔罚的钱，就上吊自杀了。
洪钟：可能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现象。
老威：你认为一般都能交够赔罚？
洪钟：能嘛。
老威：要叫一个人把财产白白交出来，还是很艰难哦。
洪钟：是很艰难嘛，很痛嘛，等于割他的肉。嘿嘿。
老威：那他不交咋办呢？
洪钟：有别的办法嘛。抓住他另外的破坏活动，狠狠地惩罚。关一下啊，或者一个村子的贫农下中农，开大会斗啊。开展说理，主要还是说理，说理不得行，再动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老威：如果对这个地主交钱的能力估计过高呢？
洪钟：恐怕要作适当的纠正，可一般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沙汀同志说，要靠赔罚来打垮地主阶级经济。

老威：洪老的觉悟这么高，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洪钟：我是四川蓬溪县城的，从小很贫苦。父亲是个中医，也在当时的征收局做过小职员。我初中毕业时，父亲死了，断了经济来源，只好辍学，当了县上的小学教师。红军时代，我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共青团组织。可在 1933 年国民党清共时，还让人告了密。我被捕了，当地的士绅很不满，觉得我品学兼优，不可能是“少共”，就一起保我出来。不久，遇上梁漱溟的学生祝超然下来搞乡村教育，我又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回省城，晓得我在家乡没啥出息，就来信叫我去成都的教育科学馆，在他手下做干事，整日抄抄写写。因为投稿，又到了《华西日报》，认识了剧作家陈白尘等著名文化人。1939 年，地下党组织马识途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我，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当时我在进步人士中比较有名，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的注意，准备抓我，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到西康省。刘文辉的儿子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长，他介绍我与他父亲认识。后来我晓得，地下党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就设刘家背后的山洞里，刘文辉掩护了许多地下党。我一直在雅安呆到 1950 年初，党组织才电报叫我返成都，去军管会文艺处。稍后文艺处改成文联，我的关系就一直在文联了，其间调过重庆，在作协重庆分会当编辑。
我是搞文学理论的，为人厚道，不乱整人，而且反对乱来，所以 1958 年的成都会议以后，我还被搞成“反党分子”。
老威：你也会成反党分子？
洪钟：我当时在重庆，毛带着李井泉、还有上海的左派市委书记一道来，把重庆市委书记划为右派，我受株连，也就成了反党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长江边上的长寿湖农场改造。1961 年，沙汀同志当省文联领导，才把我调了回来，还是当编辑。文革中我是保皇派，受过冲击，家里被抄走了许多东西，包括珍贵文稿。邓小平复出，我的所谓问题才澄清、纠正了。反正这辈子就这么过来，没得二话，就是组织上咋个叫我就咋个干吧。
老威：洪老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啊。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2006 年 8 月 30 日大早，妹妹、妹夫和我，匆匆购得香蜡、纸钱、鞭炮等物，向北驱车几十分钟，就抵达了位于盐亭县黑坪镇冯河乡的李家坪老家。盐亭属于贫瘠的丘陵地带，小时候爬坡下坎，经常往返这段路，一个单边就要耗大半天，所以觉得人生长得没有道理；而眼下，小车转瞬就偏离公路，进入田间地头的土路，再过一座小石桥，提早加档，冲上短而陡的烂泥坡，就直抵每个人迟早都得躺进去的坟墓旁。

妹夫连按喇叭，没人应，于是都下车。左边是新修的祖坟，占地面积宽，显得很有气势；右边却是老宅，一座上百年的四合院，已拆掉了大半，剩下的因年久失修，满目颓败。妹妹从缺口进到浅草凄凄的院坝，发觉堂屋短阶旁的石狮子还干净，就冲狮头落下屁股，高叫：桂英！桂英！桂英是我们的堂姐，在右耳房内陪我的老地主爷爷几十年，直到爷爷死了，房子也千疮百孔了，还住在里面。

一个白发婆婆从右厢房钻出来，我定睛一认，是德成家二妈。妹妹很亲切地打招呼。二妈说：桂英去绵阳了，她幺女生娃儿，要耽搁一段时间。我说：就你一个人守院子么？二妈说：还有鸡嘛，还有猪和狗嘛，还有你们家祖坟嘛。妹妹急忙道谢，并掏了

100 元人民币递上去。

我却不管不顾地掰开右耳房的铁门扣，一脚迈了进去。灶台、案板、水缸，还有通往猪圈的后门，跟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没挪地方。粮柜和楼梯也没挪地方，我顺梯子爬上阁楼，从前爷爷就住在上面。1967 年，我 9 岁，在家破人亡中，随已当知青的哥哥大毛流窜至此。

晚上没睡处，爷爷就安排我跟他挤。老人家一身枯骨就不提了，可怕的是臭虫和跳蚤，整得我彻夜未眠。三更天还起床下楼，对着皎洁的月光，脱了汗衫举起来，竟全是密密麻麻的血点子。正在懊恼呢，爷爷像个鬼，荡过来将我拽回阁楼，点亮煤油灯，在焦黄的老蚊帐内捉拿臭虫。四只蚊帐角都埋伏着小指头粗的臭虫王，爷爷逮住他们，犹豫片刻，又放了回去，还亲切地叫唤它们的名字，说啥子“臭老三，你咬我就可以了，莫咬我孙娃儿啰，他的肉嫩”……

瓦顶缝隙漏下来的光柱子很密，我埋着腰，像丛林深处的野兽，在嗅着多年前在这儿留下的气味。我能听到自己寒毛炸开的噼啪响。我说：爷爷，老地主，孙儿我故地重游了。听说你在旧社会挺有能耐的，一年三百多天，大多数时候都光着脚板，种庄稼是一把远近闻名的好手。耕冬水田时，牛都累了，吐着白沫不走了，你还不累，还奔到前头去替牛拉犁。就这样，你前半生赌命，好不容易挣够了几十亩田地，还包括一个祖上留下的四合院、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却上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线，被乡亲们一致推举为地主。而在几年前，同样的乡亲们，也一致推举你为保长。幸好没作啥子孽，好歹保住了脑壳。

你的教师儿子生前有过非常残缺的讲述，你孙儿曾据此记载：

……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 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近 30 年前死于大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从床上滚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爷爷奶奶育有 4 儿 4 女，3 个儿子死于非命，4 个女儿均为文盲，一生都耗在大山沟里。只有我父亲远走他乡求学，成为李家坪唯一的旧时代大学生，却是新时代被改造来改造去的“臭老九”。

我和母亲都不喜欢爷爷。母亲说，爷爷的土和脏让她受不了，一年四季，眼屎、眼泪、清鼻涕从未断过。母亲还说，大饥荒的时候，爷爷就像只黄鼠狼，在山上窜来窜去地打洞，十天半月不归屋，见啥都往嘴巴里捞，从不管奶奶有没有吃食。所以把奶奶饿死了。

而爷爷这个老地主留给我最令人发指的印象就是吝啬。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写道：

老鼠和菜花蛇将房梁上的陈年腊肉啃得伤痕累累，却从不取下来喂人；核桃、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洗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快 80 岁了，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县城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竟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

爷爷死于 1988 年初，临走前我们全家都赶回这老宅，扶他起来，在祖坟前合影。老人家嗓门还挺大，冲我父亲吼着要吃糖。姐姐飞飞急忙把白糖口袋献上，他竟一把接一把抓起朝嘴里填。两斤多白糖吞完没一会儿，我们 84 岁的爷爷，窝囊一生的老地主就咽气，并躺进了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就打造完工的布满虫眼的棺材。

紧接着，我姐姐飞飞也因车祸逝于同年 5 月，仅 37 岁。

惋叹数声，我缩手缩脚地下楼，从岁月丛林返回院坝，见妹妹小飞正给妹夫王鲁介绍四合院的来历。她说：堂屋的左边，曾住着王三婆，爷爷的嫂嫂，苦大仇深的五保户，养了十几只猫，一到冬天，这些猫儿猫女就钻进被窝为她供暖。王三婆是爷爷的死对头，两个老人像两个门神，经常一边坐一个骂架，偶尔还发生抓扯，可三婆对我们却相当好，总把好吃的留着，等我们回来。王三婆的背后，是德泰一家，德泰是爸爸的堂弟兄，独眼龙，土改积极分子，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凶得很，负责监管爷爷那种四类分子。左厢房是李义大爸和开玉大妈，人很和善，爱卫生，爸爸每次回来，都住他们家。右厢房德成是我们二爸，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可现在呢，除了你刚才看见的二妈，这院里的上两辈人都死光了，桂英这辈人也死了大半，剩下的都搬走了。

我笑问：他们都是土改那年搬进来的贫雇农啊，如今在哪儿呢？小飞指着瓦顶高处笑答：都在坡坡上埋着嘛。王鲁催促说：莫耽搁时间了，快去上坟吧。

10 米之外就是刚竣工的新墓，条石围了齐人高的一圈，犹如阴阳之间的隔墙，墙里

安息着我们的曾祖父李春城、祖父李树凡、祖母李刘氏、父亲李德奎和姐姐廖飞飞。与众不同的是，墓前立了新旧两块碑，旧碑是父亲生前重修祖坟时造的；新碑却为父亲单立，上面刻着盐亭县中学致一位普通教师的悼文。

按古老的礼仪，我上香、作揖、烧纸钱。小飞比我虔诚，还跪下磕了头。可不知为啥，我暗自感到忐忑不安。这墓修得太阔气了，包括石梯、堡坎、墓前空地及墓体墓碑，占地十来平方米，比父亲他老人家生前任何时期的卧室都大；而在文革结束前，我们全家 6 口，也就十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况且，与旁边老宅的新旧对照也过于强烈了。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大毛和小飞都是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办的，三兄妹比起来，我大约对死后的事最淡漠。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在盐亭县境的教育界很有影响，可我这个儿子，几乎没听他讲过课，更丢脸的是，作为鼎鼎大名的教书匠的后代，我连考 4 次大学都落榜，第 5 次免试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还被开除。所以，父亲自小就缺乏对我的信任感，与二毛的交流远远不及与飞飞、大毛多，哪怕我成了所谓的诗人，他还是担心、失望超过信任。直到有一天，我坐牢去了，父亲彻夜未眠，据说第二天就买了收音机，从此养成偷听敌台的习惯；直到有一天，他在敌台里，突然听到他这辈子最尊敬的作家刘宾雁正专题评论他儿子的作品，并称他儿子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才一下子愣住了。我记得那天回家，瞅见父亲居然捧着《中国底层访谈录》，边读边拿笔在划杠杠，跟批改作业差不多。

由于政治运动，我的家庭多次四分五裂，我几岁就因文革失学，当上流浪儿。我的文化基础是高小毕业就上山下乡的大毛打下的，所以读初中了，还不会打标点符号。我习作文，省略号要点两三排，老师质问，我回答还有很多话很多话没写。而父亲呢，那个老资格的语文教师呢，好像从没审阅过我无边无际的省略号，他的注意力永远是学生，哪怕下放到穷山沟底的柏梓中学，在我家打转的学生也永远最多。四面墙壁，一面靠窗，半面摞书，其它就顶天立地叠放着箱子和口袋。都是农村孩子，从几十上百里过来住校上学，粮食搁在集体宿舍不放心，就存放在我家了。早中晚 3 餐，几十个学生要进出 6 次，因为是各自将包谷碴、红苕等粗粮（也有少数学生掺入少许白米）放进各自的钵里，再拿到学生食堂去掺水蒸，所以我家就成了大伙的储藏室兼饭厅，除了钻入蚊帐，缩进被窝，不存在丝毫的私人空间。由于一切都透明化，我曾一度不明白我们四子妹是咋个生下来的。唉，如此舍己为人的臭老九，却应验了杂种毛泽东的一句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盐亭为中国培养了好些中高级官僚、商人和技术人员，其中肯定有我父亲的汗马功劳。事隔多年我才体会到，父亲的教育基点还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孔夫子也没有私生活，稍微有点出轨的想法，马上就受到弟子的非议和质问。难怪，有文艺天赋的母亲经常大叫“日子没法过”。母亲说：我跟你爸爸，就像电影和川戏，资本家和土地主，搞不拢。

退休之后，父亲来成都，替大毛守了十几年的牙科诊所。刚好我出狱离婚，光棍一条返乡，白吃老人家好几年的饭，还穷凶极恶，嫌饭菜不好吃，惹得老人家时常拍案而起，全忘记了当年对学生的那份耐烦。直到 2001 年底，沉疴不起，换了五、六家医

院，终于确诊为晚期肺癌。

劳改犯的身板硬扎，我自然充当起贴身护理，背、扶、洗澡，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到底切身体会到无用儿子的有用之处，我则首次目睹并搓揉父亲的裸体，他本能地遮遮掩掩，后来次数多了，就麻木了。父亲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 11 楼，也就是癌症楼。出了电梯是走廊，在那一头，是梅花形状的病区，每朵花瓣都是病室，躺着两到三个等死的人。父亲拖了大半年，算久了。

开头还有大把时间留给我们父子俩，父亲说了几次：二毛，我给你讲讲老家，讲讲我和你妈的经历吧。我却说：不急，等几天嘛。或者说：刚打完吊针，休息一会儿。或者又说：再休息一会儿。父亲深深地叹口气，说：这一生快划句号了，我除了教书，别无所能，因此我的墓碑就刻“盐亭中学教师李德奎”几个字足够。

我急忙说：爸，你想那儿去了。目光却有些躲闪。不料才过 20 几天，癌细胞就扩散到呼吸道，父亲的喘息一阵紧似一阵，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眼睁睁地瞪我，还抓住我的手，可当我会意地埋头，将耳朵凑拢他的嘴边，却只有含混的卜卜声。

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全面了解自己父亲及家族的机会！而我竟是一个靠文字，靠倾听，靠挖掘他人经历讨生活的家伙！父亲活了 80 岁，去世这年我 44 岁，可父子俩私下交谈的时间加起来有没有两天，一天，或者大半天？特别是目前，我正在拚力还原土地改革的真相，而父亲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啊。

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天的苟延残喘。每时每刻，那些价格奇贵却毫无用处的化疗药物都伴随着父亲，吊针要打十几个钟头，手背肿了，插不进针了，就改手臂；手臂不行，就改大腿；大腿再不行，就改脚背。父亲终于减肥了，硬梆梆的大肚子瘪了下去，可查房的女主任说：要输脂肪乳加强营养，支持化疗。还没等家属反应过来，一日两大瓶黏液又挂上床尾了。

穿白大褂的屠夫呀，哪怕是大象也会让你们折腾完蛋！没过几天，脂肪乳也输不进去了，护士连扎七、八下，针头都弹了回来，她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女主任。两人又在病房里瞎搞了半天，针头终于进去。可吊瓶里的液体却进不去，不但进不去，还倒灌，胶皮管刹那就变红了。

我实在怒不可遏，一把扯掉管子，屋里屋外地叫骂开了。可连喊痛都没力气的父亲还冲我摇头，还在为人师表。门外，死者一个接一个，每当太平车从电梯出头，吱吱的穿过走廊，深入到梅花病区的某一瓣时，我都立即关门。特别是夜半，家属猝然爆发的哭泣像无数钢针，不，像比钢针更尖更细的看不见的指甲，深深抠入每个人的皮肤、内脏和记忆。

我真想将父亲的耳朵堵上。

我真想将父亲所有的感觉器官堵上。

如果手里有中止世间痛苦的毒酒，我愿意亲自给父亲灌下。

但是，喘息、呻吟、哭叫、歇斯底里与麻木还得继续，地球的转动还得继续。

楼外的大街，车辆川流不息，路灯犹如波涛汹涌的江河，由近而远地涌往夜幕后的天国。天国中央的神啊，你可知晓，我们隔壁病房的中年人已于昨日黄昏到你那儿去了。他不堪癌细胞和高价无效治疗的双重折磨，就腾空而起，走了捷径——他从 11 楼俯冲到底，嘭的摔成一块浆汁四溅的肉饼。不同楼层的脑袋三三两两地探出去，还以为是楼顶的花盆掉下去了呢。

2002 年 10 月 7 日凌晨，父亲停止呼吸。一个年轻医生装模作样地做了几下胸搏击，算是抢救过了。此前约 1 个小时，主治医生查房，用小电筒射了病人的瞳孔，还指着我问：他是谁？父亲似乎微笑了一下，伸出两根指头。见医生不解其意，我就说：我是二毛，爸爸还没糊涂。

他一生中极少糊涂。约 5 个小时前，门外有人哭，刚打完杜冷丁的他还示意我去看个究竟。原来是 3 个下岗的兄妹，因缺钱而抱头痛哭。他们为了延缓绝症父亲的死期，花光了全部 10 来万的积蓄，再也交不出后续费用了。可毙命在即的父亲还以点头、摇头来表示想活——即使一天半天，即使不成人样，也想活。可多活一天半天，需要大把钞票啊。

父亲，你操心太多，管闲事太多了，世道却没有因为你而好一点或坏一点。安息吧，永远退休吧，让良心经常被狗吃掉的儿子我，为你抹下眼皮，为你顶上假牙——你在阳间继承了老地主的香火，艰苦朴素，老吃剩饭剩菜，散发着馊味的东西也舍不得倒，但愿你在阴间提高生活质量，多尝点好东西。

转眼快 4 年了，小飞埋怨说，二毛你还发啥子呆？赶快烧纸嘛。爸和姐跟前多烧点，爷爷、奶奶、祖祖全要烧到，莫偏心眼，弄得他们在阴间呕气哈。

我点头称是，将纸钱烧得热火朝天。大个子王鲁牵着十几米长的鞭炮，在墓前空地摆了个蟒蛇阵。坡上田间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往这儿赶来。我却在继续想，姐姐那么善良，为什么死在父亲的前头？老天或上帝真是公平的吗？

寻思不出答案。只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姐姐与他最亲，命运却跟他最像。

还记得姐姐十几岁参加工作，去深山老林的平武县伐木厂，因出众的美丽，数次出演样板戏的主角。她曾与一位解放军连长倾心相爱，却由于出生地主家庭，政审不合格而告终。后来的丈夫与她各方面都不般配，可时代弄人，只好听天由命地过下去。

她的两个女儿没受过完整的教育，父亲总觉得欠了姐姐的。特别是她死后，骨灰一直无法入土。父亲说：父女俩一道走更合适。

鞭炮炸响了，小飞捂着耳朵跳到一旁。父亲、姐姐，你们此刻还在遗憾吗？

蓦然，《梵高传》里的结尾句子蹦出我的脑海，那也是梵高和他的知音弟弟泰奥合葬

时的碑文——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1)

采访前奏

客居的窗前，风呜呜地吹，雪也下了好几天。据当地人说，古城大理好多年没这么冷过，屏障般的苍山全白了。

寒流正一点点浸入心中，我咳嗽两声，神色麻木地写着、写着。突然之间一切变小了，已在天国的父亲从眼前的照片上走下来，代替我坐在椅子上，一篇篇地批改学生作业；而我却缩回旁边的地毯，抹着鼻涕，拿一支铅笔在纸上戳来戳去。我不禁躬下腰去问那个小我：你几岁呀？小我懵懂地摇摇头。是啊，摇几回头就 20 几岁，小我成了现代派诗人，长头发大胡子，坐在桌边写雄心勃勃的长篇史诗——父母远在长江中上游的成都，我却迁居长江中下游的涪陵，新婚老婆阿霞已入梦了。接着 30 出头，我坐牢去，在号子里还捏着自制的竹签笔写《犯人的祖国》，死刑犯的铁镣在四周叮当响。然后出狱了，在姐姐夭折的那条路上认识 18 岁的宋玉，买房娶妻罢，我光头光脚，坐在桌边写访谈录。这一来，十几年又过去了，访谈录还在写，宋玉却离开了。宋玉之后的金琴来了又去了，我卖掉成都那个 7 楼的家，在云南漂了两三年，惶惶然不知天命为何物。除了写着、写着我还能做什么呢？

继续咳嗽两声，记起后天就是 2007 年除夕，而这篇 80 岁老人的采访是去年 9 月份做的，转眼又搁了 5 个多月。那几天阴雨绵绵，老人不断追问：何时能让他看到纸上的东西？我却语气迟疑。在没动笔之前，我不能不迟疑，可一迟疑，老人竟汗水满头，又是留饭，又是掏腰包要给代笔费。在那个破落小院的屋檐下，我们拉拉扯扯了好久，我才松口说：尽快。

眨眼年过完了，大年十五也过完了，我还在咳嗽。高烧几次，都死抗过来，迷迷糊糊中看《西藏渡亡经》的碟片，灵魂果真逃离肉体，从窗子缝嘘地钻出去，再回头贴着玻璃瞅屋里。我的寒毛都倒竖起来，可真要死还得等一些年呢。体力恢复了，我先得爬起来，还这个叫张进谦的急性子老头的文债。他家住长江第一湾边上的石鼓镇，80 出头，每天还坚持赌博和长跑。

最先牵线的是一位摄影家，30 多岁，始终戴着礼帽。他看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就说要给我介绍人物。隔了几天，他果然拿来一个电话号码，我照着打过去，未及寒暄，对方就先声夺人，猛掏我的底牌。可惜我没有底牌，也不急着出牌，就将这事儿拖了两个月。直到秋天降临，阵阵寒意中，人的心态趋向平和、冷淡，我才约了一位热衷地理的朋友，从丽江古城乘小面包车，去几十里开外探访。

穿过新城区平庸的街道，面包车开始爬坡，之字形的盘山道旁，不断有山民和随身的鸡鸭上下。约一个多钟头才翻过山顶，气温陡降，风铲着地皮卷上来，云和树枝如疯婆娘的头发，被揪扯着，若干个瞬间，我们感觉车喘息着，挣扎不动了，而且还大有撤退之势。司机在我旁边，卡卡换档，獠牙都呲了出来。

我把脑袋缩进衣领，脚底的气流却将裤裆鼓成了圆球。背后的朋友从三个农妇的头帕间挤上前来开玩笑：还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暖和。

我点头称是。司机乘机介绍说：过了这最高的风口，就是某某寺庙，在那儿可以俯视群峰脚底的长江第一湾。我问：不要门票吧？我们可不是游客。司机摇头微笑：随进随出，不要门票。我们当地人路过，都要进去烧香，求菩萨保佑平安。我可以负

责地保证，这是丽江地面最灵验的佛寺。我说：这次就不去了，等下回吧。司机说：你们不信宗教？那就照张像嘛。这么高这么有气势的风景，太难得了。我说：我又不是摄影家，天色灰暗如此，拍不出好玩意儿。司机沉下脸说：随便你们，算我白费口水。

没一会儿，车子就不由分说地停靠在寺庙大门前。一探头，我发现周围已有大小数辆车。我的朋友在正规的报社当过记者，这方面反应快些，就招呼我说：大家都下，我们呆在车上也没意思，进去看看嘛。

显然这是新增的一处旅游景点，水泥垒起来的庙门如古装电影中的山洞，不伦不类。庙外风大，且一览无余，游客们就只能缩着脖子往洞内涌。我们也随大流，在里面逛了两圈，晃眼睛的雕梁画栋，油漆未干呢，实在没什么观赏价值。我咕哝说：这块地势凌云而起，像一只悬空的秃鹫脑袋，可这庙偏偏修在秃鹫脖子上，活活将鬼斧神工的自然杰作给破坏了。朋友说：你我都不是风水先生，就别妄加评论了。

由于带着情绪，浏览中的碑和匾都过目即忘，不留一丝痕迹。遇观音殿，朋友进去磕头，不料刚埋下身子，就闻当的一声锣响，两位黄衣和尚齐刷刷念“阿弥陀佛”，请施主入布帘隔出的里间说话。朋友面软，先鬼使神差地随他去了；我自忖有点主见，连忙抽身，却叫扯住了袖口。翻脸显然不吉利，罢罢。

掀帘入内，仅见一桌两凳。我与和尚分主客落座，彼此对视，竟都是秃瓢，都戴眼镜，感觉滑稽，我不禁失笑，和尚也跟着笑，满口“善哉”“佛缘”“阿弥陀佛”，接着询问了我的年纪，猜测我至少是某公司的老总。我谦虚说：写字的，写字的。和尚就说：原来是个鹏程万里的大记者！我要每天早晚为你念经，保佑你名利双收。我受宠若惊，推辞说：已经混到头，就不用了。和尚说：还早呢，观你的面相，在政坛上还大有作为，你我既然有缘，我就辛苦一点，为你多多念经加持。佛法无边哦。接着，《随喜功德簿》就从抽屉底捧上了台面，和尚左手执册，右手执笔，眉头微皱，目光任重道远地逼视过来：施主捐功德几何？转折太快了，我愕然以对。和尚凝然重复说：为重塑观音菩萨的金身，施主捐多少功德？几万？几千？还是几百？我的脑袋嗡然一响，可面皮还是挤出了笑纹，和尚见状，又欲擒故纵地加了一句：随你的心。

我的心是一文钱都不想出，正沉吟间，和尚又说：出 1000 元，你的名字就可以上《万世功德碑》，流芳百代了。我急忙点头，感激涕零地从腰包里掏出 50 元人民币奉上，做贼似的站起来说：名字就不用写了，阿弥陀佛！

我憋着不看和尚那悲悯的眼神，逃出百把米，才回头，与我的朋友相视贼笑，并不约而同地鸟儿问答：捐款几何？50。就算门票了？对对。

继续上路，弯曲如弓的长江第一湾尽收眼底，站在那弓背边照张像，差不多是一般游客此行的最终目的。20 几分钟后，车抵石鼓镇，我顺便问起张进谦老人的府第，没料到司机居然晓得，于是车子偏离正街，在粪便四溢的陋巷三拐四拐，就直抵一半新半旧的土墙院落。

付罢车钱，扣浅蓝鸭舌帽的张老夫人就将我们迎入门槛，并告之，老张已恭候多时，不耐烦，就去街面打听了。老夫人瘪着嘴，笑得羞涩而慈祥，令我等晚辈不好意思，就穿过杂乱的院坝，朝正屋檐下的小凳，规规矩矩地落下屁股。树枝间有鸟叫，脚边晾着几簸箕核桃，我从背包里翻出录音机和笔记本，突然感到特别静，石鼓镇背后是山，很远的风从缺口过来，到达院墙内就凝固了。

直至张进谦老人进来，黑呢帽，大耳垂，声若洪钟。我惊醒一般笑了。

时为 9 月 12 日午时，秋雨飘飘。

正 文

老威：对不起，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

张进谦：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从 8 月份我们接上头开始，到现在，人都快等断气了。刚才我还到长江第一湾的停车场，转了好几圈，逮住司机就问：看没看见一个外省的光头？都说不晓得，当然不晓得，世上的光头多了。

老威：老人家真是个急性子。

张进谦：我 1926 年生，整 80，没几天活头了。我等得，阎王爷可等不得，所以要尽快找个人，把这一肚皮的经历写出来，给钱都可以。听说现在出书要贴钱……

老威：嘿嘿，把我当成枪手了。

张进谦：以前叫作家，如今就是枪手嘛，你出个价。

老威；老人家有点英雄气短了。我是听说你受了很多磨难，豪爽的性子依旧不改，才自愿找上门的。我不为任何人当树碑立传的枪手。

张进谦：你说，我为什么 17 岁就参加抗日？

老威：还是按时间顺序，从头说吧。

张进谦：哪儿是头？

老威：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张进谦：我父亲是老地下党员，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身份暴露，就翻你刚才来的那座山，到丽江县政府去自首。当时国民党的县长叫周果。

老威：他没被杀头？

张进谦：没有。我很小的时候，他还做过一任区长；抗战胜利到 1949 年解放，他一直都是石鼓的乡长，所以在土地改革中，就被当作恶霸镇压了。

老威：那你家是大地主了。

张进谦：我家早先是佃农，自己没地，佃地种，还得给人家交租子。到了父亲这辈，家境就逐渐变得富裕，接近小康了。我生于国民革命军北伐那年，4 岁就在我外公家念私塾，儒学的基础扎实，到老都受用。眼下我还天天在二楼的书房里温习《四书》《五经》，练书法。

老威：难怪，你说话的口吻像知识分子。

张进谦：我母亲有文化，她两个弟弟，其中一个还是燕京大学博士。那时，外公常在我耳边念叨，读书要“三更灯火五更鸡”，可我一个几岁孩子，哪儿懂？老打磕睡。我脑壳上至今还有一个疤，就是读书打瞌睡，被外公的烟锅子敲的。头敲破了没得药，就刮烟油糊起。我忘不了《大学》里有这么一句：诗曰，诗曰……

老威：诗曰个啥子？

张进谦：还跟小时候一样，着急就卡壳。稍大一点，就诗曰着进了学堂。10 岁，高小没毕业，我就考初中。当时云南省内只有 3 所中学，我考入了丽江城头的省第三中学，也算所谓的天之骄子了。

1943 年，我刚满 17 岁，就进了中央军校，即中央军事委员会住滇干训团大理分团，是专门速成抗日干部的机构。1 年后毕业，分配到远征军第二军，开拔到芒市前线。由于怕家人担忧，我只告诉多病的母亲去下关了。

老威：你们当时的长官是谁？

张进谦：战区总司令是宋希濂，也就是我们干训团的教育长；第二军军长是王凌云，通讯营营长叫马奎。我在营部见了马营长，他说：你学的无线电？那就去无线电连 7 班报到吧。就这样，我就成了前沿部队里的 1 名小小报务员。

老威：你随军去过缅甸吗？

张进谦：中日军队在中缅边境多次拉锯战，可无线电连跟着军部，在芒市留守。芒市出去 30 多公里，有座三台山，是日本鬼子重兵把守的据点，我军久攻不克，上去了几个师，都差不多拼光了。于是 11 集团军开会，调整部署。第二军军长王凌云

是土匪出身，此时红着两眼站了起来，立下军令状。他说：给我 1 个月时间，还有多少多少吨炸药，拿不下三台山，我和弟兄们都死在阵地上！

老威：这个土匪军长真厉害！

张进谦：许多土匪比共产党还爱国，况且王凌云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他从前在河南，杀富济贫，与日本人打了很多硬仗，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后来被蒋介石招安，委任他军长，他却只当师长，条件是不整编他的手下。这是支特殊的双枪部队，几乎人人都带步枪和烟枪，可战斗力却第一强。

凭借战功当了军长的王凌云领了任务，立马来到第 9 师。这是他的本钱，跟黑社会一样，9 师的官兵都不叫他军座，而喊“大哥”。下面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也统统喊“哥”。于是一声令下，全体兄弟伙集合，听大哥训话：弟兄们，我已领下解放三台山的军令状，时间是 1 个月；我却只给你们 24 天，拿不下来，大哥我带头去死！所以，给我将日本鬼子在三台山的 6 个碉堡围起来，硬拼不行，咱就在他机枪射不着的地方，学老鼠刨地洞！四面八方往里挖，弄到底了就填炸药，给他娘连锅端了！

下面齐声叫好，跟响雷似的。大哥又问：还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宽限两天？9 师师长代表大家回答：不需要宽限，只需要每人每天加发 2 两上等鸦片烟！下面哈哈大笑，大哥说：行，就这么办！他娘的，你们有了大烟还吃饭吗？

当天夜里，这支大烟军就进入了阵地，人人都光着身子，你抽烟我打洞，我抽烟你打洞，轮番上，裤衩顾不着穿，饭顾不着吃。拢了 22 天头上，大清早，9 师前沿就发来一个急电，营长亲自命令我翻译出来，两个字：就绪。通讯员立马呈军部，军长王凌云也立马回电，交我发送，他说：小鬼，有没有把握 3 分钟打出去？那时发报还是用手摇发电机，有人在旁边摇得呜呜响，我却翻开密电码，照着拼凑“点火”两个字，然后打出去。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刚过 1 分零 4 秒，对方的信号就响了，是“嘀嘀嘀，嘀嘀嗒嘀”，照电码拼拢来就是“sl”，表示收到。我叫声通了，军长就拍着我的头说：好，小鬼，我这个中将亲自为你请功！为什么敢放心呢？因为集团军总部还有电台在监听我们之间的通讯。

老威：后来呢？

张进谦：好几吨炸药埋在地洞里，一点火，山摇地动，鬼子的 6 个碉堡一家伙冲上了天。哦呀，山包包都平了……

老威：炸死了多少日本兵？

张进谦：11 个。

老威：什么？6 个碉堡才 11 个？

张进谦：旧尸体成堆，新鲜带血的尸体只有 11 个。原来守三台山的有两个师团，经过几个月的消耗，鬼子死了几千人，已经山穷水尽，我军却死掉了几万。

老威：早知如此，就不必费这么大的劲儿。

张进谦：你这个年纪的人，不晓得日本鬼子有多可恶！受伤被俘，我方人员出于人道主义，将他背起来，准备送医院抢救，可他一苏醒，就拔出匕首，捅死背他的人，然后自杀，以此效忠天皇。另外，芒市的好多傣族姑娘也惨遭他们蹂躏，所以大家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部队抓了俘虏，也懒得送战俘营，当场交给傣族寨子，男女老幼都围上来砸石头，打个半死，再用刀砍成几截。

老威：可叹可叹。

张进谦：没啥可叹的，其它地方我不晓得，入侵芒市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活口。哎呀，现在才敢说国民党抗日，以前哪敢说哟，反革命的帽子就给你戴起。抗战结束，

我们从弹痕累累的惠通桥过去，只见那些山尖尖上，插满了松毛片片，望不到头，一根片片下面就埋着一个烈士。可至今也不见谁为他们写上一笔。

老威：早就听说过惠通桥，有空我一定去看看。

张进谦：日本投降了，部队里见官升一级，我因为立了功，提拔成少尉。本来前途无量的，可我觉得抗日的心愿已了，该回家了。

老威：老人家算得上性情中人。

张进谦：回想 1943 年，腾冲和龙陵先后失守，我们几个同乡的热血青年，嚷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竟步行了好几天，从丽江走到大理的三塔寺。军校临时设在里面，大门两边，醒目的黑字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杀敌救国。

老威：可谓报国有门了。

张进谦：对，我们二话没说就进去报名考试。我有一小点英文基础，就进了通讯班，学习有线电和无线电，还有各种战时通讯课程。可如今呢，外敌已除，母亲病重，我就应该回乡尽孝。旧时代的人嘛，脑子挺简单的，没收了汉奸的金子，让我们拿，也坚决不要。问要什么？我答要回家读旧学。当时带着两把枪、400 发子弹、罗斯福呢的西服汗肩、英国产的毛呢大衣，还有美国产的靴子，才从芒市出来 30 华里，就撞上检查哨。四处都架着机枪，不由分辨，我就被脱得一丝不挂，枪弹、衣服、靴子全部没收。我犟了两句嘴，他们又把所有的证件及路费也扣下，真跟抢人差不多。嘿，幸好我不贪财，没拿黄金，否则编一个罪名，当场就毙掉灭口了。

1946 年的腊月 13，我母亲病逝，令人心灰意冷。1947 年，国民政府抽壮丁，我家 4 弟兄，只好由我重操旧业，去丽江团管区当门户兵。1948 年初，闹金圆券风波，政局不稳，本地兵全部叫撵出部队。我正不知何去何从，地下党组织找上门来，由中学同学引荐，我加入了滇西工委领导下的民青，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于是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人才，1949 年 12 月份，我又被地下党“边纵”（即滇桂黔边游击纵队）接纳，成为第 7 支队司令部的电台台长。

老威：你从国军变共军了？

张进谦：时局动荡，人人都变来变去，人生谁说得准？1950 年，第 7 支队到大理迎接解放大军，可没想到，在一阵锣鼓喧天之后，整风开始了。第 7 支队被谢富治等人诬陷为“土匪武装”，许多人都受牵连，蒙受了长达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老威：你也是冤主之一？

张进谦：说来话长了。因为没过多久，老家就闹土改，我家成了恶霸地主家庭。风声传来，我想赖在革命队伍里也不行了。

右派才子沈沉

——纪念反右 50 周年 邓焕武 （四川）

沈沉是无辜的大难不死者，他不仅应有后福，他亦还要变着法门抗争。

早在 1956 年，我就知道沈沉。那时，沈沉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被分派在温州市文化馆，搞民间曲艺(戏曲、鼓词、说书、唱道情等)方面的工作。他大概是单身汉一个，才住宿在文化馆的阁楼上。不知是平常晚上熬夜时间太多呢，还是习惯于睡懒觉，当我多次去文化馆时(上午)，常见馆里有人站在楼梯下，抬头喊着:“沈沉……沈沉……，都 11 点钟了，还不起床呀？”或者

喊：“沈沉呀，快起床嘛，有人找你呐！……”。因而，使我注意到这个叫沈沉的“懒汉”——中等身材，阔额、疏发，凤尾眼、高鼻梁，发音有点“短舌头”(舔口腔)。一看，便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知识人。

由于我搞美术工作，到文化馆都是找奚立进等人，故同沈沉没有交往。那时，我

们这些“小知”都很自负，即便是面对面碰见，亦互相不打招呼的。但是，沈沉这人之所以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由于他的乒乓球艺超群。虽然说，我也是乒乓球运动的爱好者，可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潮落潮诵，风云突变……。谁也没想到，我们竟然都被 1957 年的政治风暴，席卷而去！并且，一晃就是 20 余年；当再见之时，沈沉已是耳鬓添霜之人！其实，沈沉此时只有 40 多岁，不知是他多愁善感所致呢，还是生理遗传基因之故，他的头发已经是黑白掺半——远看去，一团暗灰色，像老头一个。重见之际，我都不敢认他了！……

沈沉所在的劳改中队——缸窑场院队，距离我所在的梨园，大约有 10 多华里，由于乡间道路弯弯曲曲，步行须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他被编在中队的杂务组，搞值班室里的统计、调度之类的事务，故无须参与体力劳动。这说明，此时的沈沉，能得到中队干部的“信任”与“重用”。但尽管如此，他却迟迟摘不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身处外地的温州人，似乎特别注重乡情，即使是刑满留场人员，亦不例外。所以，一般在休息天，他们常有来往走动。同时，也讲究吃吃喝喝——我们去，他们请客；他们来，我们请客。席间，免不了要喝点酒，于是谈兴更浓。但由于，当时极左政治气氛太严重与留场“就业”的环境太恶劣，故而大家在闲聊话语上，因长期养成留有余地的“习惯”，都不会直言无忌，一吐为快的，尤其在 3 人以上的场合，说话更为谨慎。而沈沉，因星期天要留守在中队值班室，平常很少外出，所以我们往来不是很多。再说他与我，均经历了太相似的严酷磨难——“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 ”，遭受钉脚镣、带手铐、关禁闭……。所以，我们即便谈及政治问题，亦都像打擦边球那样，一点而过。随之，相对微笑着心照不宣地点头……。这种通常无言的沟通，却很能增加相互了解与信赖，也增进了一定程度的友谊。

就凭着这种有限的友谊与信任，沈沉一次伴同一位依着考究的中年女子，前来看望我。经沈沉介绍才知道，这位名叫曼丽的女士，是沈沉母亲的干女儿。他们俩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曾两情相悦，若不是沈沉后来被判刑劳改，他俩早应成为夫妻。……40 来岁仍旧漂亮的曼丽，却不幸中年丧夫。但她的这种不幸，反而促使他们俩重萌旧情。现在，两人已是情人关系；这一次，就是为了争取落实沈沉的户籍，她才特地专程前来交涉——请求(暗中送了不少礼品)缸窑队部，同意在他们婚后，让沈沉落实回家。然而队部最终发话说：先让沈沉争取摘帽，然后让其回家。这即是说，收了礼品却不答应。无可奈何，曼丽只能背地里以咒骂出气！……

为了劝慰他们，我亦诉说道：我年迈多病(咯血)的母亲，为了恳求允许让她儿子落实回家侍养她，先后多次于晚间，给派出所户籍警员送了不少的鸡蛋与高档牡丹牌香烟。因此，当地的落实证明是开具出来了，可是农场这里，却一直压着不予批准……。我母亲哪里知道她的儿子，是被浙江省公安厅内定为“终生留场改造”的对象……。曼丽听了，愁眉不展地瞅着沈沉，深深叹息道：“看来像你们这种人，……开后门是没用的！本来，我还打算回去再想办法……，可是，哪能把钱都打水漂了！”对此，沈沉只是苦笑不语……。

那天午饭之后，我陪着沈沉一起，把曼丽女士送到蒋堂车站……。此后不久，我被调到安吉县南湖林场，这里，人称“浙江北大荒”。于是，我同沈沉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沈沉的户口落实情况，我就一直不得知晓了。但当时的情况，已足够说明，在中共 11 届 3 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些被内定为戴帽终生留场的“反革命分子”，想要落实回家，几乎比登天更艰难！

1979 年的春节过后，我终于等来了摘帽落实回家的一天。我骑着刚买来不久的杂牌自行车，经宜兴、无锡、苏州、湖州，游山玩水地绕着太湖兜了个大半圈，抵达杭

州之后才搭乘运货便车回温州。回家后，我很快打听到了沈沉的信息——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又获改正，接着又获彻底平反。于是，重新回到温州市文化局的群众艺术馆(即原先的文化馆)，并重操他的老本行，即负责民间曲艺方面的管理工作。此时的曼丽女士，亦早已成为沈沉夫人；而沈沉回温之后，就落户在她家里。如此，沈沉可谓是“官复原职”与“衣锦还乡”啦。

我们归来自见面之后，他夫妻俩多次来我家做客；而我去他们家看望的次数更多。因为，当时我只要拿到民刊，几乎都要转给沈沉看，而他对于各地民刊，亦颇感兴趣。有时，他看过之后还急着想看更多的，就抽空送回来，再要去未曾看过的以先读为快。我们碰面时，自然免不了要谈论西单民主墙与各地民刊等活动情况。我们此时的交谈，再无原先那种顾忌，可谓是畅所欲言，但争论亦不少……。

由于我的学历太低，又加上长期坐牢而荒废日久，故在与他交谈中，常常是“错别字”连连！这时，沈沉他就会笑着替我纠正。比如，“擅自”，可我会脱口唸成“坛自”；“蜕化”会唸为“脱化”，如此等等。所以，对我语文水准的恢复与提高，当数沈沉的帮助最多。…… 记得 1981 年 4 月初，我从广州、重庆等地带回来的一些民刊，如阵尔晋的《叉路口社会主义》、《争鸣》、《童音》等，都及时转给沈沉先看。当然，亦向他畅谈了 2 个月来在各地的见闻，谈了对王希哲等各地友人的印象，也谈及中共中央 9 号文件下达之后危急情势，并托付他，出现万一情况下，定要保存好手头的刊物……。

不想，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的 4 月 14 日，我于上班时间被诱捕，一去 4 个半月。……于当年 8 月 31 日，我在杭州米市巷省公安厅看守所那里，被宣布免于处理，并立即被接返温州。过后不久，我急着去了沈沉家里，想看望他并彼此叙一叙数月来的情况。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夫妻俩居然闹得分手了！曼丽向我哭诉说：“沈沉……这人现在全变了，不再是落难时候的他了！他嫌我子女多，犯不着替我……”。之后她又告知说，他们现在，还只是分居，但不知他现在住在何处？所以，她想请我去沈沉母亲那里打听一下……。我答应了，可是我却找不到沈沉——他工作单位里的人说，老沈经常下乡蹲点，行踪不定……。而沈母那边，还不知他俩分居的事……。于是，我转着想：事已至此，反正现在没急事，待以后，总有机会见到他的。

大约是，过了半年之后的一天，我终于在基围山上(公园)偶然见到了沈沉。我高兴地向他打招呼，可他却拉下脸不大理睬的样子，这令我感到诧异不已！起先，还以为他是因同曼丽分居而怄气，接着才知道，原来他在责怪我“出卖了他”。面对沈沉的责备，让我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已了！于是忙着问他：“那些刊物还在吗？……”不想，他更生气地说：“我早已……交给市委宣传部了！……”这话，令我愕然：“这！……”

原来，在我被捕之后，文化局与公安局人员联手，多次上门找沈沉“谈话”，致使他敏感地知道，是因为同我交往的事情，因而断定是我出卖了他，否则怎么会找他呢？而其实，我却根本没有涉及沈沉一个字，因而还以为，一直把他保卫得好好的。于是我争辩道：“……在审讯中，根本没有提到你……这是怎么搞的？”当然，沈沉是绝顶聪明之人，况且他的经历、经验，都不比我少。故一听，再一看，就知道是错怪我了。可我在心里，却责怪他经不住吓唬，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损失(丢失民刊)……。

后来我知道也不应该责怪沈沉。因为，在那种隔离状况下，他难免会认为，是我被逮之后“交代”了，不然，怎会……。这是彼此其实交往不深，又在未见到我之前的一时顺理成章的推断。其实，温州民运圈内早有“线人”，而我和此人就曾一起去过沈沉家……。 现在这个线人，不仅早已穿上“官服”，而且步步高升……。

说沈沉是温州才子，是名副其实的。他对于南昆、(据他说，昆曲有南北之分，江、浙两地是南方昆剧的发源地)永嘉瓯剧等颇有研究，以及关于乱弹、婺剧等地方剧种，均有较为深厚的学识，且懂古典诗词、牌曲。所以在温州，老前辈唐堤(王策岳父)、王锦新(王策父亲)等作古之后，大概未见出沈沉之右者？并且，沈沉在退休之前，经常下乡发掘民间传统曲艺，亦曾作出过可贵的努力。

沈沉未有高等学历，他是靠自身的才智与勤奋，自学成才的。他自从被改正、平反之后，常受聘上业余讲座授课；并为《温州日报》等报刊撰写杂文、时评与文艺评论，文字颇显个性。虽然在我看来，他被后极权时期现实政治状况所局限，不敢尽述己见，但几乎每篇论作的开篇，总会强劲如同程千岁之“三劈斧”，锐光闪闪，其言词透辟入里，颇有一仗可夺之势。但可惜的是，这种气势不能贯穿全文，往往是“老虎头，老鼠尾”，故令我读毕，不免丧气不已！这，亦不能太苛责他，不然的话，他的大作，岂能见之于党报乎？！

让我颇感滑稽的是，这沈沉老夫子为了表明心志，显示自己不甘心就此沉沦，后来他取了一个颇为醒目的笔名——沈不沉。这个于他像座右铭式的独特笔名，在外人觉得，颇为志气昂扬，够个性化的了。然而，它却着实令我笑弯了腰，连声曰：“理解，理解！”有一次，我还很含蓄地讥讽过他：“你可漂浮在浪尖上……，怎会沉到底呢？…… ”。他拱手道：“老弟，请多关照！别……”。 想来毫不奇怪，后极权时期的中国，遍地都是生长知识分子犬儒化的肥沃土壤。因此， 这时候在这里，盛产品种繁多的犬儒人物，是时代的必然所致。所以这个责任，主要应 由这个太不理想的时代来承担！请试想，比如若三面挂着机枪……，那么，求活命的人们，除了只能擁挤在一条通道上，还能怎样？……。

但是，沈沉是无辜的大难不死者，他不仅应有后福，他亦还要变着法门抗争。从前，他被打成右派，又被打成反革命，投入劳改营 20 余年。这期间，他在杭州的武林机械厂， 带镣铐，关禁闭，受够了磨难，可谓“九死一生”……。后来由于时势的变化，他终于熬出了头，终于是否极泰来。就这样一个苦难人，人们难道还有理由苛求他吗？难道还 应该予以理解吗？！做为朋友，我讥讽他，是出于善意的调侃逗乐，而不是为了苛求于他……

至于言及个人的家庭私生活，沈沉在留场期间，他和曼丽结为夫妻，这既是两人旧情复萌之甘果，亦是患难与共一场的前定姻缘。后来日久，因性格终不相投，经过几度“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最后协议离婚，理性地各奔前程——曼丽经商有方，终成富婆；沈沉专职文艺，事功有成。所以，这对于他们俩来说，都非憾事。甚为幸运的是，一位在温工作的上海大龄姑娘，芳名——咏梅。她于文艺工作交往中，被沈沉的知识与才气所倾倒，于是两人忘年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由于他俩深谙电脑知识，故而自老沈退休之后，开办了电脑培训班，且越办越红火；从而使家庭在经济上亦“更上一层楼”。

如今早已满头银发的沈沉——老沈、沈不沉，自从他再迁新居之后，屈指已数年未曾相见，故在此祝愿他康健、幸福！与此同时，却不知他老沈，对于今年的反右运动 50 周年纪念，以及全国性右派索赔签名活动——讨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正确说法，有何感想？抱何态度？念甚！

2007.3.9-10. 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家中

峨边沙坪劳教农场 铁流 （北京）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

一、峨边沙坪

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 300 公里，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有 800 里莽莽的原始森林，一座天造地设的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纵有双翅也逃不出这险恶的鬼门关。150 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险，闹过全军覆没，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在毛泽东亲信李井泉的领导下，共揪出右派 64724 人（見《当代回川省简史》，实际全省不少余 12 万右派仅“草木篇”一事就高达万人），其中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至少有六七万人之多。怎么解决这些“阶级敌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重修监狱吧，耗时，耗工，且时间不允许；放在城里工厂吧，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不花钱，又省事省力，那就是扩充原有的劳改农场。据后来得知的消息，在 1957 年 8 月末四川省公安厅召开的一次议事日程会议，省劳改局一位主事的头头说：“ 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坪一样的农场，没说四、五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会议后不几天，省劳改局立即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赵功两位干员，去到四川偏远地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这个不足五百多名犯人生养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这里地广人稀，到处是荒山野坡，前有天堑大渡河，后有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风雪迷漫，道路崎岖，与世隔绝，不通魏晋，四周住户多是彝胞，风俗各异，情感难容。自 1957 年 10 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教授.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从四川各地（主要是成渝两市）在枪杆子的押解下，送来这里“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想不到半年后那两位勘察定点广的李、赵先生，也成为右派来到自己精心选定的“宝地”、与众多流放囚徒一起，共同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应了中国民间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我是钦点“右派”，自然享此“殊荣”。

二、苞谷汤汤

记得 1956 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写的 1942 年孟加拉大荒的小说《饥饿》。结尾时有这么一段震憾心灵的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 年孟加拉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孝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它把孟加拉人变成了没有良知的野兽……”当时，我以为作家夸大其辞，故弄玄虚，现在面临饥饿才深深明白它的真实所在。全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的 1959 年至 1961 年，而我们所面临的饥饿却早在此一年的 1958 年。多少年来我都在思考，到底为什么共产党不给我们饱饭吃，要活活拆腾我们？最后的答案是：毛泽东天生的性格就是仇恨有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仇恨有才华而又敢于说真话的右派，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政策有歧义和说三道四，如有，非得想尽一切办法来杀灭。怎样来杀灭？推上刑场抛尸旷野太扎眼，最好的办法是杀人不见血归罪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就是饥饿！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看不见血的消灭，故不愧为一代“伟人”，不然何以称为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才出现的“天才”。

沙坪农场的饥饿来得太突然。一天，事务长“赵边花”（据说他的左眼是玩枪走火迸瞎的）突然向我们宣布说：“粮食吃超了标准，从明天起要按国家定量执行。”其实这之前的“超标”也不过是维持生命的半饱，现在按“定量”吃又是吃多少呢？大家没有闹明白，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才发现摆在坝子里的四个盛包谷糊糊的大黄桶全变成了包谷汤汤。它清澈见底，映树照天，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真是名符其实的“快餐”啊！

有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陈某，原是重庆空压厂的一个技术工人，因对工资不满，常去纠缠厂长书记，“反右”中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现过上

这种非人生活更为不满，由不得叫喊出："这哪是改造人，是活活折腾人，喝這样的水水汤汤怎么去干活？"当场埃了事务长一耳光，晚上全中队立即召开批判斗争大会，说他诬蔑攻击国家粮食政策，继续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严重的重新犯罪行为。好在那时批判斗争会还讲点文明礼貌，不轻易动手打人捆人，陈也就没吃什么大亏，只要认个错便草草收兵。

批判了批判，斗争了斗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每天到开饭（应该叫"开水"）时间，盛满苞谷汤的四个大木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黄桶，同学们拿着臉盆（惟怕包谷汤外泄，都将饭碗换成脸盆）依次排成长龙，走到掌勺的大组长面前像乞丐似的举起脸盆，接上一瓢便仓惶离去。但你若要接第二瓢，必须清空碗里的残汤剩水，否则白瞪眼。生命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大家很快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应叫喝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怕烫，三是边走边吹冷气边喝。由此一来，饭场变成战场，四处一遍"呼哧呼哧"吹气声，喝饭声，应了"伟人"千古绝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当大组長手上鉄勺再舀不上苞谷汤汤时，人们蜂涌而上围着黄桶争抢，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头醮，有的用舌根舔，你挤我我推你，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围脖齐飞，嘴唇共包谷一色，胸襟上汤汤一遍，两只眼不停搜索残粒。谁还有尊严？谁有斯文？餐毕省了洗碗工序，那灵巧的舌头比擦布好用，莫说不会溜掉一颗粮食，就连尘灰般的星点粮沫也逃不过舌尖的搜查席卷。此时，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粮食是宝中之宝。"吃这样一点点吊命的粮食，每天却要去完成 75 平方米的开荒任务，75 平方米是多大一遍啊！挖不上几锄头就是一把尿，几把尿一冲肚皮就空空了。这两瓢包谷汤汤怎能支撑热能的付出，填饱肚皮成了每天首要问题。

三、大作家刘盛亚

我们天天盼，夜夜想，何时何日能吃上一顿饱饭？距到了 1958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有五六天了，以为到了节日能吃上两碗稠稠的包谷羹羹，以解难熬的肚饿。但没有盼到包谷羹羹，却盼来大批和我们一样饥饿的名人，他们是重庆著名作家刘盛亚、西南美协副主席汪子美、中共重庆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西南师范大学讲师、归国学子董时光。其中刘盛亚、董时光竟编入我们一大组。他们是从三根桥中队调来的，据说那里比我们白夹林中队冷，气候更恶劣。

其中刘盛亚先生早在 1953 年就知其大名，因重庆作协主办的刊物《西南文艺》常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作为作者每期有惠赠刊物。他写的小说《再生记》正猛遭棍子们的狂打，说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说，全书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界限，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主席的《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针。相关历史资料对他有如下介绍：19 岁时留学德国，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欧洲，中国人还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时，他就以一部《在万字旗下》的记实散文向国人叙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极权专制下的悲惨命运。刚 20 出头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刘盛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有别于那些吟风咏月的文人。他也是当年的海归派人物了，与今日归来的留学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变后，放弃欧洲的优裕生活，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起共赴国难。当时欧战尚未开始，抗日烽火刚刚燃遍华北华东。他回国后即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年不足二十六岁。迫于战争形势，川大迁往峨眉山，武汉大学迁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国教育史中年轻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执教西南联大也是 27 岁，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 27 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相比之

下刘盛亚更属少年俊彦，他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以专长的戏剧授教于省立四川剧校。华北平原失守后，京沪与欧美的精英汇集于四川，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今日还健在的电影名导演谢晋即出自此校。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话剧运动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在此校教授戏剧，与肖锡荃、侯枫这些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导演共事。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也很年轻，与刘盛亚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称北方神童，刘盛亚赞为南方神童。

八年抗战，在重庆也留下刘盛亚的文学与文化活动历史。他的家就在重庆，那时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虽然郭的夫人于立群已在社里工作，郭沫若却聘刘盛亚任总编辑。后来，中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迁重庆，主编此报副刊均是大手笔，如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便是吴祖光从手抄稿寻来发表的，刘盛亚也有一段时间主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1950 年以后刘盛亚进了单位，从西南文联再到重庆文联，他的教授、作家、总编辑、主编等职务都没有了，成了专业创作员。凭他不凡的资历、学识修养、业绩与声望，应是重庆文联的招牌作家了，却受到一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歧视与排挤，虽然这类人不过是中学生，他们认为你刘盛亚只不过就是仅仅出国留了一下学，喝了一点海水而已，这岂能和我喝过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资产阶级的，喝的延水才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刘盛亚被这类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饰）。

刘盛亚先生和我曾有一面之交，那是 1957 年 5 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来成都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他身着呢料制服，脚蹬发亮皮鞋，满脸红光，风度翩翩，行事矜持，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十个月后相聚沙坪白夹林中队时，竟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显得有点呆滞。他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汤汤的残迹。他大约年长我十多岁，是个大块头人，易于激动和坦露感情，但没有什么力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有点良心，专门安排他去守看播种在地里的包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嘴里总是不停地吆吼着“呜呜——呜呜……”远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反法西斯名震华夏的大作家？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上长长的清鼻涕，极其悲观绝望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难过啊!”我道：“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他摇着头，无可明状地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又在攻击党和政府吗!”我听后几乎叫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但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每天就样抱着肚子承受饥饿的煞煎。

我出于同类相怜，一次偷偷将家里寄来的丁点猪油分了一些给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送下他才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在哭地说：“晓枫，你送我的不是猪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脸迷茫，没一点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颗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一点情况，寄来的两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 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肿得发亮，快死前急送到农场医院急救，半路上就“脱胎换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没棺材敛收遗体，也没有属于自已单个儿的坟场，几十个几百个合葬在一起。1979 年获得“改

正”，生者为他举办追悼会时，多次去沙坪觅寻遗骸，面对大片白骨，难辩谁是亲人？为此，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写文章所用的那只派克钢笔，伴着他灵魂的安息。

四、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董时光是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有弟兄三个，大哥董时恒、二哥董时进，他居三，1948 年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西海岸深造。新中国在北京宣布成立，他受到极大鼓舞热泪盈眶，对共产党顶礼谟拜，经常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视为共产主义狂热分子，1955 年被驱除出境。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那天，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一一与他们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您！我们共产党欢迎您！欢迎您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后来他被分配到西师教育系任教。由于所接受不同的教育和理念的不一致，在工作上常和院长党委书记等领导人发生矛盾。1957 年“整风鸣放”中，院党委多次邀请他向党提意见，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希望他建言。他怀着热爱共产党的激情，把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毫无保留地提了出来。接着，《重庆日报》又邀请他将发言写成文章，他毫无顾地写了一大版，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理，党委不要干预太多”。为此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上批，但他坚不承认自已有错有罪，甚至说：“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他正义直言，铿锵有力的辩解并未逃脱“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理，1958 年 1 月和我一来到了沙坪农场。在严酷的饥饿面前，他和许多老右一样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可耻！可痛！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在这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运。由于饥餓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有一天他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三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均是右派，仅比他庆幸一点的是没有死在劳改队而已。我没有饿死在这里，是因为调到“415”劳教筑路支队修铁路去了。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2)

插记

现在是 2006 年 9 月 12 日午后 3 点钟，老人突然打住滔滔不绝而又混沌不堪的话头，要用午餐了。我们被盛情邀请，尾随他进厨房，两老两少围住矮桌，谦让一番，就狼吞虎咽起来。两份热菜都是肥猪肉，一份凉菜是素的，老人却嚼得油腥子乱溅，还将菜碗敲得当当响，连冲我们说：整，整，莫客气。我的朋友属都市白领胃口，从来不沾肥肉，可稍微反应迟钝，一大夹肥肉就颤巍巍地降落至碗中，搞得他变脸变色，如丧考妣。他这这这了好一阵，企图将负担转嫁给我，可我的碗里早已硕果累累，只能坚决推辞。老人生气了：嫌我老倌弄的菜不好吃？我陪笑道：那里那里，香得很哦。就连肉带饭，扒了一大口，也嚼得油腥子乱溅。我的朋友无奈，只得学我的江湖嘴脸，埋头就扒，眉眼挤在了一处，可吞咽时，浑身哆嗦，打摆子一般。老人哈哈笑：这是我自己喂的猪！在劳改队时，我连生猪肉都敢吃！我捏着筷子抱拳道：老英雄，佩服佩服。

是的，我不能不佩服，按现在流行的健康吃法，这扎扎油响的东西哪能进嘴（我的朋友终于吃吐了）？可老人却 3 碗饭 1 碗肉，从容下肚，几乎不碰素菜。妈的，我也劳改过，晓得肉的金贵，可为啥就整不了这么多？况且前辈他比我大 30 好几呐。

用罢大肉餐，我的朋友扭头就出门，声称去考察“长江第一湾”，我却明白他已整出毛病，急需找药店解决问题。我与老人回到屋檐下，欲继续交谈，老人却道：慢着，我还要敲 8 个核桃吃。我猛吃一惊，下意识地捂住撑得鼓鼓的肚皮。

老人慢悠悠地解释：核桃补脑，多吃，不得老年痴呆症。现在，我浑身上下，老皮子一张，不值钱了，只剩这脑壳头的记忆，还值一点点钱。来来，你也吃点，虽然年轻，预防痴呆嘛。

的确，这院子里摊着满满 8 簸箕核桃，够老两口吃一年的。

正文

张进谦：由于谢富治随便一句“边纵是土匪党、地主党”，我们就叫整编掉，稍后，许多人被劳改，还有不少人死在劳改队。你要记住 1950 年 3 月 18 号，第 7 支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去昆明迎接解放大军归来，拉回两车整风学习材料，进门劈头就说：同志们，我们过去白苦了。到晚上召集会议，才把边纵被打成土匪的过程简单说了，大家都哭成一片。我是出了名的张大炮，当场就放炮弹：我们是土匪，那周恩来就是土匪头子，是他在负责华南局的时候，派庄前（音译）、朱家壁等人到滇桂黔来组织的边纵嘛。如今发展成 8 个支队，十几万人，周恩来就是大土匪头子啰。

司令员制止了我的“出格话”，接着就布置司令部的移交，连灯泡也不能少一个。支队领导统统交兵权、下地方。黄平（司令）去保山当专员，区根（副司令）到丽江当专员，杨永兴（政委）在大理当专员。本来我该“识时务者为俊杰”，乘机在滇西 48 个县内选一个去处，可一来我留恋这身军装，二来边纵并入 14 军后，急需通讯人才。

老威：急需到什么程度呢？

张进谦：解放前，云南境内有不少传教士，他们都是帝国主义派来兜售精神鸦片的特务，随身带着与国外联系的电台。一解放，各地传教士一个不剩地被撵回去，电台没收。这样，以前军师一级才有的电台，如今每个团都分得了。报务员不够，培养又来不及，不小心我也成了老师，栽培了不少土报务员，在稍后的剿匪中发挥了厉害的作用。

老威：你也算对党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同志。

张进谦：当然啰，我不管国共两党谁坐江山，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我已上书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强烈要求本人的军龄应从 1943 年算起。

老威：有结果吗？

张进谦：没结果。

老威：边纵之后，你的具体单位是？

张进谦：1950 年 3 月 22 号，大军进大理县城，边纵的电台移交 14 军，就成了 14 军的电台。我被留下来，受通讯科长何凯的领导，稍后进了通讯营电讯队。1951 年 1 月 13 号调入驻丽江的 42 师，耽搁两天，就去了维西电台。

老威：此时你还没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张进谦：何凯是个老红军，人很和善，他曾对我说：小鬼，还是抽空回家看看，找个老婆嘛。我回答：按家乡风俗，我 18 岁就该结婚了，可毛主席教导，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我要继续干革命呢。

老威：你真这么想？

张进谦：土地改革眼看就要全面铺开，我哪敢回去！只能打定主意，死赖在部队，才有一线生机。我甚至要求进藏，条件越艰苦，离家乡越远，越安全。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混了 1 年多，拢维西时才松了一口气。

老威：维西在现在的迪庆州吧。

张进谦：从丽江出去 200 多公里，虽然也没跑多远，但总算不在家门口打转了。况且我的对象也在维西，当时她混入了革命队伍，任保和镇的妇女主任。

老威：那她的家庭出身一定很好。

张进谦：大地主。

老威：不可能吧？

张进谦：云南的土改要晚些，1951 年前后在大理试点，1952 年才扩大到全省。

老威：所以维西地区还没划阶级？

张进谦：对。暂时还没动静。

老威：你就趁机搞对象了。

张进谦：那是我 3 岁的时候，父亲给订的娃娃亲，是我舅舅家的姑娘。

老威：算近亲联姻？

张进谦：旧社会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是乡长，在石鼓找不着合适的亲家嘛。本来 18 岁就该成亲，可撞上抗战从军，就耽搁下来；退伍回乡后呢，母亲又去世，按旧制守孝 3 年，还没缓过劲，就解放了。

老威：你和女方经常见面吗？

张进谦：一个在石鼓，一个在维西，见不着面。不过双方家长一直有走动，过年和中秋节，父亲要送礼，舅舅要还礼。

老威：所谓“礼尚往来”了。

张进谦：自 3 岁始，我家每次都赶 4 只牲口，还打一些银首饰带去。那时不通公路，都是翻山越岭，即使顺利，也要走好几天。

老威：不得了哦。

张进谦：到解放为止，双方往还的礼银得用箩筐抬。特别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石鼓至维西，途中要经过两三处土匪窝子，都是人多势大，杀人不眨眼，官府拿着没奈何，比《水浒》里的强盗更厉害。古代都是大刀片片，跳出来呐喊几声，你还可以扭头就逃，跑不脱再拿钱保命；而现代全部操着炮火，几百米外，蒙头懵脑就射来，要想过路，临头才掏买路钱就晚了。

老威：咋办？

张进谦：派人通关，或者双方出动人马保哨嘛。我父亲是乡长，舅舅在当地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提前好多天，找黑白通吃的那种人，去一处一处，与土匪接洽打点，长此以往，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至今记得，舅舅带着一二十匹快马，在我家一住两三天，院子小了，父亲就安排内外都摆上酒席，几十号人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场面极壮观。

老威：真能折腾。

张进谦：1950 年以后，就折腾不动了，两边都成了地主。刚刚改朝换代，还没咋样，我和我的二兄弟在革命队伍里，二弟还是战斗英雄……

老威：你们家算革命军属。

张进谦：可我总做恶梦，逃跑、毙人、被斩尽杀绝之类，吓醒后，满脑壳汗水，腿肚子直抽筋。大理的土改试点我也经历过了，那可是家破人亡啊。所以一拢维西，见我的未婚妻居然还当着保和镇的妇女主任，就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我进门管不顾地将她扯到墙角，板起脸说：你马上去把这个官给我辞掉！请长假，回一趟石鼓。现在我的父母都不在了，你去见……

老威：你父亲已经被杀了？

张进谦：是，我隔一会儿再讲。我要我未婚妻去拜过家里剩下的唯一长辈，祖父的妾，也就是二祖母。照旧制，得到她的最后首肯，我们就可以在维西成婚，惶惶不可终日之际，繁琐的礼数也没必要讲究了。但我未婚妻不仅不理解，还以为我疯了。她说虽然自己是个乡巴佬官，也是大家选出来的，要负责任，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她还说你们革命队伍里，也有组织纪律，也不能这么随便吧？况且结婚是终身大事，哪能草率……

我截断她的话，气得直哆嗦：眼看就要土改了，你可莫后悔！她说：啥子后悔？难道你要悔婚？我说：不是我要悔婚，而是共产党让你我结不成婚！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这么严重？我都快哭了：在大理乡下，我们就住地主家！财产全部没收，还游街示众，开斗争会，农民一拥而上，把地主打得满地爬，脑壳肿得比西瓜大。她说：行得端，走得正，没作孽，凭啥子遭罪呢？我说：就凭你家是地主，是剥削阶级。她问啥子叫剥削阶级？哎呀，跟一个妇道人家没法讲！我的牛劲上来，就吼了句：你到底去不去石鼓？！把舅舅他们都惊动了，跑出屋来劝：快成两口子了，啥子不可以好好商量？好好商量？眼看火烧眉毛了，咋个商量！没有 100 张嘴啊，有 100 张嘴也扯不清啊。我不禁万念俱灰：罢了罢了，我今天就与你解除婚约，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你人长得漂亮，就赶快寻个穷点的心眼好点的过，图个平安吧。她叫了声：你把我当成啥子人了？！就大哭起来。我捶胸跺脚：嚎啥子嘛，你我地主配地主，到头来死无葬身之地哟！舅舅一听这个话，轰的炸了：莫以为你是部队上的人，就可以昧良心！转身就提了根棍子。我未婚妻急忙栏住，将我推出门去。

哎呀，那个时候，风也大雨也大，我像喝醉了，偏偏倒倒在保和镇走了几个来回，才摸回单位驻地。可没有料到，身边的同事里竟然有特务，随时将我的形迹向组织告密。过了几个月，组织上找谈话，指责我没站稳阶级立场，我还蒙在鼓里。可接着，我的问题被反映到丽江 42 师师部，矛盾一下子就转化了。

老威：隔离审查？

张进谦：先通知我“上调学习”，然后荷枪实弹，将我一家伙送拢大理，关进“随校”当学员。

老威：啥子叫随校？

张进谦：即随军学校。编制是 5 个大队，辖 25 个中队，每个中队两三百人。我编

在 5 大队 2 中队，打眼一看，里头啥子人都有：国民党旧军官，起义的，被俘的，还要追查历史问题的；共产党这边，各种问题没交代清楚的；类似我这种，自己成分就不好，还划不清阶级路线的；犯生活作风、组织纪律问题的；贪污的、乱搞的。密密麻麻，1000 多号人。

老威：你老人家落入社会跳蚤堆里，反而不孤独了。

张进谦：哪有功夫孤独哟，一天到晚劳动改造，累得跟龟孙子似的，脑壳碰着枕头就打鼾。

老威：不写交待材料？

张进谦：连政治学习都是做样子。我们在漾濞县山里伐木头、放木头，累得吐血也要干。大家还盼着能开会学习、写交代呢。如此折腾到 1951 年的 12 月，一天，中队长找我谈话：张进谦，你在随校的表现很好，劳动改造之余，还办墙报，算个合格的青年团员。可是，你的家庭成分太高了，部队也不便留你。我说：我对部队有感情，难道将功赎罪都不行吗？他说：还是考虑回家吧。我说不。第二天，我就跑去找 14 军的参谋长，原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他说：你还不算“分子”嘛。就打了个电话，并叫他的警卫员带我去干部管理处。这样，我又继续留在随校改造，直至 1952 年 6 月 8 号，保卫科换人，一个姓王的干部唤我去，当场宣布组织决定：资遣回家，不保留军籍。也就相当于开除。

老威：没人替你说情了。

张进谦：我又去找了一趟朱家壁，他都落泪了，我还开玩笑：迟早会有这一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但是我向参谋长保证：想不通也得想通，想不通也不当反革命！

老威：这一来，你的军旅生涯就永远结束了。

张进谦：绷得紧紧的神经猛地松弛，我办了手续，脱了军装，出入随校大门也不用请假了。我在大理街头晃荡了半天，大口大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仰起脸看跑得飞快的云，突然觉得人生太悲哀了。我在大理这么久，一天到晚都琢磨着立功赎罪，改造改造，经常匆忙得脸都忘了洗，还从来没有抬起头，好好看看天，看看云和太阳。

老威：这个时刻，你想不想你的未婚妻？

张进谦：此刻她已家破人亡——这是我后来才晓得的。包括舅舅在内的长辈，几乎被杀光了；她这一辈，目前还剩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婆婆，叫李茹秀，住在维西攀天角乡，已又聋又瞎。有两个儿子，李龙李虎，你有兴趣吗？我可以介绍你去找。

老威：你的未婚妻还活着吗？

张进谦：自杀了。

老威：哦？！

张进谦：1955 年端午节死的。

老威：服毒还是上吊？

张进谦：不清楚，可能是跳水吧。

老威：怎么可能不清楚？你们一直没联系吗？

张进谦：我一回家就沉入土改的漩涡，搞得晕头转向，哪儿顾得上哟。

老威：没捎过信？

张进谦：我拢石鼓不久，她家兄弟就来了一次。从 1953 到 1955，连续 3 年，她家兄弟都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催我将她接过门，可是，可是，我没条件哦。

老威：大家条件都不好，将就着过嘛。

张进谦：又是地主，父亲又被杀；房子叫没收，几兄弟挤一块，又没个住处；我家又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随时挨斗——如果新添一个人，日子更没法过。1955 年，

我 30 岁，她也 29 岁了，难道不想睡一个床？一个老姑娘，一年年与兄弟同屋檐同灶台，也惹人耻笑。记得我还去了一趟维西，脖子伸长了几回，最终还是缩回来，躲着不敢见她。唉，那次她兄弟没来，托人捎的信，说在端午节自杀的。搞得我锥心的痛。他妈的，共产党啊共产党，欠了我家好几条人命。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3）

插记

眼下正好中午 12 点，老人疲倦了，嘴巴在动，眼睛却眯缝起来。我提议歇一会儿，老人就将帽檐拉下来打盹。我起立伸个懒腰，见张夫人自厨房露头，就跟过去，欲乘机聊几句。不料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太太竟躬着背，躲到灶台后面。我只得撤退。

百无聊赖，就背手望天，乌云很厚，三二只乌鸦落在院墙头，偏头梳理着羽毛。看样子，老两口平时也没啥天伦之乐，怎么过呢？正如此想，老人就醒了，并转头招呼我跟他上楼。

2 楼有 3 个大房间，中间堆杂物，左间紧锁，我从窗缝瞅见，里头停放着两口特大棺材。而右间最大最气派，是老人的书房，却没见几本书。可书法作品不少，且有相当功力。老人说他每天鸡叫就起床，掌灯练字，至少将《四书》《五经》抄上好几页。有时写着写着，时光就倒流了，仿佛回到儿时，老外公立在身后，叭哒着烟杆，指点这儿指点那儿。可一转头，脖子凉飕飕的，老外公却不见了。唉，我方才如梦醒悟，自己都 80 岁了，几十年前的人和事肯定不在。我连忙安慰道：记忆中的东西在与不在，全是某种感觉，说不定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还要可靠些。老人连说对对，看来我遇到知音了，等采访完了我送你一幅字。

下楼时又碰到张夫人，这个乡村婆婆的脸突然红了。她给客人上完茶水，就埋着眼睛退下去，而她丈夫却嘿嘿笑着：不管她，我们继续吧。

正文

张进谦：1957 年 7 月初，反右运动开始，我又被揪出来……

老威：农村也反右？

张进谦：石鼓街上抓了两个地主，我和我老表。我老表是个胆小鬼，做过枪支和大烟生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兵荒马乱的时候，这石鼓乡，好多人都贩过枪支和大烟。人家都不认帐，可我老表经不住诈，政府再一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就把抗战时期的陈谷子烂糠全抖落出来。嘿嘿，这一下，公安局正好逮捕，弄去劳改。我还是历史问题，辩不过，才指出“破坏生产”的现实问题，比如 54 年放水淹秧田。我反驳：当时雨水太大，大家的秧田都遭淹了，肯定是要把田里的水放掉，秧苗才得活。又比如 56 年倒卖粮食。我反驳：我家连年填不饱肚皮，去年碰上长江没涨水，江心田才大丰收。国家的粮我没少交，剩下的赶街卖点，换两斤盐巴，也叫“倒卖”？

泥巴腿杆打不赢嘴仗，就将我绑到小学门口跪起，曝晒几个钟头，才请来一伙小学教师。尽管口干舌燥，我依然先发制人：各位老师，看热闹还是讲道理？教书匠们回答：自然讲道理。我说：你们是外来人，了解过土生土长的石鼓张进谦的历史吗？你们能讲出啥子道理？马列主义？还是唯物辩证法？满场全哑了，我又说：既然啥子都没搞清楚，各位老师就评评理，他们凭啥子斗争我？凭啥子把我弄到大太阳底下跪起？几个民兵气狠了，转头就把我吊了三天三夜，打得我直着喉咙喊：想下手，就一买卖敲死算逑，莫零敲碎打！

就这样断断续续整拢 9 月 13 号，我被逮捕了。

老威：啥子罪名？

张进谦：莫须有。当时我完全绝望，都在盘算着偷越国境了。不料 13 号早晨，我正挑水，乡党支部书记就带人来捆。我质问犯了哪一条？书记笑嘻嘻地说：没人说你犯了哪一条，这是运动，懂不懂？过场总要走。我说：公安局没来，你们这样是非法。他说：是啊，讲理讲不赢你！如果抓错了，今晚就释放好不好？

我在乡政府关了 28 天，中间区委书记来了一次，在过道里吼：咋搞的，小刘？张进谦关了十七八天，连材料都没报上来？

老威：小刘是谁？

张进谦：乡书记嘛。当时形势摆起的，我是地主，还嘴巴劲大，群众要求杀杀我的威风。

老威：也得有个名目哦。

张进谦：破坏生产，态度恶劣，从严惩处，判刑 8 年。

老威：这么简单？

张进谦：原来准备劳教一下，扣个屎盆子，臭到底就完事。可是在法堂上，我扇了法官一耳光，劳教就立刻升为劳改 8 年了。

老威：一个耳光判 8 年刑？

张进谦：打拐了，打拐了。没任何依据，法官劈头大骂我“历史反革命”，我一时忍不住，巴掌就刮过去了，还反骂他“大汉奸汪精卫的孝子贤孙”。他捂着脸说：张进谦，你太嚣张！加入了国民党，还不承认是历史反革命？我说：我参加的是抗日的国民党，又不是打内战的国民党，何罪之有？

老威：既是法庭，法官与被告应该隔开，至少有一定距离，你咋个能打到他？

张进谦：哪有法庭？就在石鼓街子最宽的地方，找了家铺面，里头安一张条桌。法官是丽江县法院派来的，叫和玉光（音译），坐在那边，耀武扬威的模样；我是犯人，站在这边，伸手都能摸着他的鼻子。

老威：检察官和书记员呢？

张进谦：当时不兴这些。就一个人，连记录，带起诉，带判刑，包干。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看稀奇，街面都扎断了。

老威；够搞笑的。

张进谦：法官后来讲，本想吓唬吓唬就收场，是我逼着他判的。从盘古王开天地到而今，没得犯人敢打审判官！所以他当场刷刷刷，几分钟就手写了一张《判决书》。

老威：厉害厉害。

张进谦：厉害个逑！他这个水平，我当几个法官都绰绰有余。当天晚上，我就在膝盖上摊开纸，写《上诉书》，在丽江县看守所，我又在膝盖上，写了 46 页纸的《申诉书》。昏官哟昏官，不得好死！果不其然，第二年他也栽进监狱！后来死在监狱里，不晓得犯了啥子错误？嘿嘿，整过我的人如今没剩一个，都冲到老子前头见阎王去了。

老威：有这股豪气在，老人家能活 100 岁。

张进谦：还差两个月，我就结婚了，这一来，只好锁住门，将准备结婚的 485 元银子揣起，劳改去。

老威：你的未婚妻不是自杀了吗？

张进谦：我又说了一门亲事，眨眼又告吹了。现在的这个老伴，是 1973 年刑满留场时，才接过门的。

老威：当时你都 47 岁了。

张进谦：唉，互相不嫌弃，将就过嘛。

老威：接着呢？

张进谦：在看守所呆了两天，就去了大研农场。里头还关着不少地主、土匪、伪政府人员，说起土改，都认为保住脑壳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很知足，干活很积极。11月，我又调到永胜县的米里铜厂——人间地狱哟！2000来号犯人干活，120号牲口运输，那个路，又是水又是沙，犯人一天穿烂一双草鞋。不，那草鞋早晨发，中午就磨穿了，只有光脚，光身子，脸可以不要，裤子也可以不要，上头刨矿，下面的鸡巴也甩来甩去。18 个钟头，耗子一般在矿洞里外钻，浑身湿漉漉的，腰杆都累断了。可是，吃不饱，永远吃不饱！妈那个㞗，大跃进，牛皮吹得越鼓，死的人就越多。犯人主食包谷、碎米、没去皮的荞面，油饼……

老威：还有油饼吃？

张进谦：榨花生油剩下的，一个饼有小筛子大，农民拿来喂牲口，监狱拿来喂犯人，还当作美味佳肴，不是经常吃得着。再熬一大锅汤，人都可以挽起裤腿下去捞……

老威：捞啥子？

张进谦：捞菜叶叶和油星星嘛。

老威：这么惨？外头还在大跃进哦，公共食堂里，大锅饭整得欢哦。

张进谦：1958年的春节，大年三十，永生难忘。2000多犯人在山坡坡上等倒过年，大厨房烟雾腾腾，几百斤包谷煮熟了，油炸洋芋满地丢，饭团子随便你捏来吃，猪杀了，肉切了，码在砧板上，正说要下锅……上面突然来了命令：不准吃！组长监督收筷子，肉不下锅了，不准吃！全体犯人都哭啊！出的是牛马力，过年见不着亲人，还不准吃啊！狗屁共产党，狗屁人道主义！连大组长都忍不住：肉不下锅了，其它随便吃，违抗命令，杀头算我的！

老威：哪一级的命令？

张进谦：听说是中央的命令，狗屁。他们喊“大跃进”，我喊“大要命”。干活18个钟头，今天不完明天加班，还不给吃饱，说几句不满的话，还要挨斗。

老威：你这种性子，在劳改队肯定经常挨斗。

张进谦：天天在死人，还不叫“大要命”？在一次批斗会上，我就这样说。你们还乱打我，有本事就拿枪出来，朝脑门心一炮。哼，毙人要经过法院批，你们没这个胆子。

老威：你不怕加刑？

张进谦：我已经被加了5年刑。

老威：就为了把“大跃进”说成“大要命”？

张进谦：不，是中队长找我谈话，骂我“上诉就是不认罪”，我说他不懂法；他说你为什么死不认罪？我一下子气昏了，抬手就给他一耳光……

老威：嘿嘿，第一巴掌8年，第二巴掌5年。

张进谦：打拐了，打拐了。

老威：两次都打拐了？

张进谦：第一巴掌不打，我就结婚了，也许现在儿子长得比我高；第二巴掌不打……唉，莫提了，鬼晓得会咋样哦。

老威：请你讲讲加刑那天的情景。

张进谦：1958年的6月30号，不，57年的10月间，不，唉，岁数大了，记忆有些模糊了。晚上，永胜县法院派人来宣布，喊一个名字，加刑几年；再喊一个名字，又加刑几年，材料都懒得念了，就是某某加刑几年，某某加刑几年……我晓得自己要加刑，所以比较麻木，还在一边嘀咕：哟，今晚还闹热。可好多人都受不了，哭成一片。和我同时栽进来的那个坦白从宽的地主老表，脸都嚎歪了，他说：这辈子莫想回

石鼓啰！惹得我嗬嗬地笑：做梦哦？这身牛肉干巴还要带回家？

老威：牛肉干巴是云南特产，挂在横梁上，叫凉风吹得干干的，很好吃。

张进谦：犯人个个都像牛肉干巴，一条一条，饿鬼样子，在风中飘来荡去。大腿上那层皮，跟裤脚差不多，手一牵就起来半尺高。人贱不如狗，狗饿还可以吃屎，还可以满坡乱刨乱啃，人咋搞？关起来，只有等死。不想等死，逃跑？一枪崩了你，死得就更不如狗了。太多的人没活出来，我算幸运了，当过兵，身体底子打得扎实。还私藏了些现金，400 多块，用得只剩 80 多块，就从老彝族手里买腊肉，18 块钱买了 9 两。没得火，没得锅，就约了一个平时合得来的，叫郭正洪，比我大 1 岁，现在住剑川县城。约他一起，躲到背人的旮旯里，将生腊肉一人割半截，嘎吱嘎吱啃。那是在梁上挂了 1 年以上的老猪肉，粘满了灰，又咸，又杀喉咙，啃一大口，猛嚼几下，油腥味就往脑门子窜，眼皮乱眨，跟孙猴子一样。你相不相信，我们不仅把腊油咽了，连石板硬的皮，也一点一点嚼烂，咽了。那皮子上的毛哦，半寸多长，也咽了。

老威：简直是野兽。

张进谦：还像野兽一样舔爪子呢。满手的油，舔了十来分钟。老郭的胃口要弱些，舔着舔着就突然呛住，使劲憋，憋，没憋住，就一口倒灌出来。他赶紧拿双手捂，没捂住，就抵倒下巴接。几秒钟接了一大捧，那温热温热的化猪油嘀嗒嘀嗒地漏下指缝，好可惜啊，我赶忙冲到他的手底去接，也接了大半捧。好可惜啊。我说：老郭，你还是歇口气，再慢慢将这猪肉浆浆重新吞了。老郭喘着气说：福薄命贱哟。我说：肠胃太久没油腥润滑，就是脆的，当心那天一干重活，就拉断了。莫着急，慢慢来。老郭不吭气，大概歇了 20 几分钟，才像猫一样，哧哧舔掌中的宝贝，还不停地皱眉毛，打臭嗝，进去一点又出来一点。还好，进去的到底比出来的多。

老威：莫讲了，到此为止。难怪老人家对肥猪肉情有独钟。

张进谦：58 年的 6 月 30 号加刑，7 月 1 号就把我弄进监洞，在严管下背铜矿沙。中队长和指导员轮番督阵，手上掐着表，限时限量，来算定额。每趟背 50 公斤，来回小跑近 20 分钟，1 个班要折腾 52 趟，背 2600 公斤，才收工。他妈的，人又不是机器，没多久，我就累得不想活了，因为肚子饿，一跑眼前就冒火星星。有个深夜，乘管教干部没来，我夹上从家里带来的棉衣和皮衣，躲进堡荒洞睡觉。

老威：堡荒洞？

张进谦：就是矿石已挖完的废洞子，一匹山肚子里，四处都有迷宫一样的堡荒洞。我躺在里面，又冷又饿，睡不着。突然外头喊：吃宵夜啰！我马上跳起来，抓了碗冲出去，迎头就碰到犯人大组长杨向成（音译）。这个狗杂种，当贫雇农主席团的时候，因公报私仇，冤杀了两个人，被追查出来，判了 10 年刑。可进监狱后，由于出身好，还是封为犯人头，吃香喝辣，整犯人比政府干部还狠。谁要是完不成任务，就被他吊在监洞门口的铁杆上，除非死了，才放下来。

老威：活生生一个阎王爷。

张进谦：他管打饭，喊我让开点，意思是不给我吃。我毛了，反正熬下去也是死，老子今天就为民除害。我右手拖了根铁棍，左手将碗抵拢他的鼻子说：对不起，我要你的命。吓得他一抖，竟给我打了一满碗。

老威：碰上一个要吃不要命的。

张进谦：饭下肚，我又回监洞睡觉，偷听到洞外犯人议论纷纷，没一会儿，又来两个干部。我心想：今晚过不去了，看来要遭收拾。果然，跟着就听见杨股长大声叫：张进谦，出来！

我慢慢吞吞地起身，顺洞壁梭出去。妈的，人生最后一碗饭也吃了，就弄死一个

够本，弄死两个就赚！盘算妥当了，我一亮相就大喊：要剐要杀随你们！杨向成吊死犯人，你们为啥子不管？还叫这种人当大组长？监洞里的犯人一天比一天少，哪里去了？埋尸的原来一组，现在都加成两组了，20 个强劳力专门埋尸哦！与其累死饿死，我不如先把杨向成敲死，因为他不让我吃！哪怕多喝一口汤，也叫延续生命，延续不了生命，我就要抓他垫背！

杨股长听得莫名其妙：你说啥子哦，张进谦？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调丽江，大衣带起，所有的行头带起。你还吃不吃？去厨房整个饱嘛。

老威：嘿嘿，像在演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戏，我都虚惊了一场。

张进谦：干部发话，我就去厨房打了满满一盆饭，端给同组的吃，大家边扒边掉泪。犯人遭孽啊，两个人一个铺，一床被子，饿得打晃，还超强负荷，没活出来几个哟。我运气，搞过无线电，脑壳灵光，就有人推荐我去丽江的长水铜厂开机器。

老威：我搞过社会底层访谈，你算沦落到监狱的底层了。

张进谦：是嘛，犯人也有低层高层。云南省委书记的儿子，57 年大鸣大放过了头，成了右派。一关进来，就要死皮……

老威：他的官老子没保他？

张进谦：法官把他还给他老子，他老子却大义灭亲，非得判刑 3 年。嘿嘿，他在劳改队装瘫痪，屁股漏半边出来，不仅不劳动，干部还得陪笑脸服侍。看来官官相护，哪个地方都一样嘛。

老威：你到底明白了？

张进谦：明白啥？没有哪个官护着，我两个耳光就打出 13 年，不，加上留场劳动，将近 20 年。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4）

插　记

下午 4 点过，老人又疲倦了，这次没原地打盹，而是提议出门逛逛。我欣然接受。于是老人压低帽檐，倒背手，大步流星前行，我和朋友亦步亦趋随后。沿臭气弥漫的陋巷朝上，每遇比较老旧的人与物，老人必定停步，向我们简述此情此景的来历。同中国许多待开发的旅游小镇一样，依山傍水的石鼓出过不少由地方性逐渐升格为世界性的名人，囊括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古今。比如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土著学者范义田，曾在 1946 年撰写了一副春联：山连云岭几千叠，家在长江第一湾。至此这块弹丸之地就有了如雷的名份，勾得一波波游客闻声而至，像被导游牵着鼻子的狗，山水之间跑一趟，照照像，买买所谓的土特产，即了愿归去。

可我的采访对象却不这么看，他沉迷其间，自认为承接了石鼓的精神香火，所以一再强调我此行的重要。我点头称是，如小学生，不时拿出笔，在手板心里记点什么，令老人很是得意，竟在乱七八糟的石阶间，如微服私访的老干部，向上上下下的挑担农民问这问那。当然，系列地主旧居也参观了，3 米多高的旧戏台也参观了，在我看来，这才是石鼓仅存的人文景观，比山丘脚底公园中心的“石鼓”，以及那该死的“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有更深的内涵。老人说，他自小就受老滇戏的熏陶，也曾在那人人向往的旧戏台上，排演抗日救国的新戏。可而今，新和旧都成了过眼云烟。

我们还拜访了两处极为颓败的空宅，老人介绍说是张家的祖屋，并如电视片主持人，回旋于院中，对两个观众解释每间屋子的变迁。他说，父亲被枪杀前住正房，我和两个弟弟住上面的屋子。他固执地请求客人贴近观赏，我只得小心翼翼地用棍子拨开杂草和杂物，站上一堆日晒雨淋的朽木，从外登高平视 2 楼深处——褪色的窗棂窗

花，废弃的家具和蜘蛛网，的确让人平添些许感慨。

以此为背景，我替老人照像若干。还顺便问土改后的房主是谁？老人很不屑：自然都是穷光蛋，有共产党撑腰，就白捡这么大的房子住。我又问现在呢？老人仍旧不屑：几辈人了，早搬家了。他妈的，白吃白住，又不懂维修，哪怕宫殿也要塌嘛。

化了几十分钟，逛了大半个石鼓。天色还不算太晚，于是赶回原地继续工作。老人的精神头似乎更足了。

正　文

张进谦：人啊，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得意忘形，否则就要栽跟斗，瘟神毛主席说过：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老威：老人家为何发此感慨？

张进谦：我在丽江看守所吃了十几天的饱饭，人完全还阳了。站在黄皮寡瘦的犯人堆里，硬是像书上描写的恶霸地主，腰杆挺挺的，说话气也粗。当时正在大量抓人，丽江专区 13 个县的右派、反革命都朝看守所送，啥子教师、职员、基层干部、不悔改的地主、乘大鸣大放翻案的牛鬼蛇神等等，形形色色。早晨才走一大批，将监房腾空，下午巷道里又在喊：晚上煮 600 多人的饭！睡觉都要打楔子，起夜屙尿，原来的铺位就找不着了。所以，如我这般“技术人才”，不便久留。

老威：你不是还没学炼铜机器吗？

张进谦：我是远征军军部的报务员，炼铜机器算老几？拢长水铜厂后，我马上到现场，见 12 架鼓风机安装妥当了，可炉子还在加班加点地砌。师傅问：你以前开过机器没有？我说：其它机器开过，就这机器没开过。师傅说：我马上要走，你好好瞧着，我先解说，然后示范。这是 60 几马力的电动机，油箱加满，开关一动，它就转了；这是煤气炉，从上面这个大包加煤炭，一定加足，炭足，产生的煤气才足，矿石才炼得化……

老威：我听得云里雾里。

张进谦：机器在跟前，你就一目了然。师傅从头至尾示范一遍，我就会了。嘿嘿，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难道活的制服不了死的？等到正式投入生产，我就成了师傅，要管 12 台炉子，一天到晚忙得屎尿都顾不得屙。你看这手杆上的疤，就是煤气过于大，电动机皮带打滑，一颗螺丝钉飞起来打着的。万一打中脑门，人就报销了。

老威：那整个铜厂，你老人家的技术含金量最高啰？

张进谦：我是权威，要指点每台炉子的掌火师傅；那些师傅的下面，有 7 人。开炉的时候，3 人持 5 尺多长的火钳夹后火，将“和尚头”弄出来，敲碎了，再投炉重炼。所谓“和尚头”，就是铜与炭不分解，越烧越黑，严重了，铜水流不出来。曾经出过 1200 公斤的“和尚头”，把炉底都捅穿了，丽江没得法，只好运昆明冶炼。

总之，只要炉子开得顺，出铜多，啥子都好说。得了红旗，每人奖 3 斤烤烟。他妈的，要流多少吨汗水，才得 3 斤烤烟哦！我们都睡在炉子后头，两三人一个床铺，轮班倒。特别是我，责任重大，经常三天三夜，寸步不离岗。遭孽哟，我们越苦，人家越甜，长水的铜亮堂堂的，含金重，1 吨要卖 1200 元钱；不像白化（音译）的铜，看着如绿茵茵的牛屎，不含金。所以这边犯人开炉，那边干部兴奋，奖金多多嘛。

老威：真不愧为劳改模范。

张进谦：长水的大队长，原来是米厘的厂长，他见着我就说：张进谦，你这个敢打中队长的捣蛋鬼，到了新环境，汲取教训哟！再努把力，我想法提前释放你。

老威：有盼头了。

张进谦：是啰，我也抓住他的话把不放：说话得算数哦。他拍了拍我的肩：肯定算数！

老威：混得不错嘛。

张进谦：这是我劳改生涯的黄金时期，不靠混，靠出苦力。转眼到了 1959 年，监狱要特赦一批犯人，那天开大会，检察院和法院都来人，领导一个个讲话后，就宣布特赦名单。我尖起耳朵听，足足几十个名字，就是没有张进谦。如挨闷棍，我懵了几分钟，就冲去找大队长：堂堂党的干部，咋个说话不算数？他让我小声点，我偏不小声，没做啥子见不得人的事！这下可惹祸了，大队长骂我旧病复发，当场给我戴脚镣。

第二天，我想不通，就不开机器，12 台炉子只得统统停起。这还了得！领导命令我的助手顶替我，将我调到汝南化矿区。迎头碰上大队教导员段凤先，他咬牙切齿地说：张进谦，你没见过我吧？我可早就晓得你这个监狱名人。

老威：眨眼间，命运就急转直下。

张进谦：这个狗日的段凤先，叫人在监房背后的靠山半坡，专门挖一个地窖，长宽高都不足 1 米，对，高只有 43 公分。我永远记得 1959 年的 11 月 16 号，脚镣反铐的我，被两个犯人架起，往地窖里塞。正面进不了洞，就侧着肩膀，等上半身入了，再收腿。

老威：在里面怎么转身呢？

张进谦：不转身，像蚕一样蜷着。

老威：我想起练瑜珈的印度人，一点一点把自己缩进小箱子。

张进谦：相当于活埋啊。脑壳夹在裤裆里，顶上是哨房，哨兵一走动，就嗤嗤掉土。冷得钻心，痛得钻心，痒得钻心，都得忍着，因为动静稍微大，土就成块掉。没任何支架，耗子一般随便打个洞，万一塌了，人也不用朝外拖，将门一堵就万事大吉。

老威：吃喝拉撒咋办呢？

张进谦：落屁股的地方，掏了一个碗口粗的沟，风呼呼倒灌进来，有时屙多了，连屎也倒灌进来。筛糠那个抖，土铐子嵌入肉里那个痛，死又死不了，哪怕被活埋，也是慢慢憋死。人到了这地步，猪狗不如，耗子臭虫不如，还在乎屎尿？吃喝还不简单？外头将地窖拉个缝，摆个碗，你就把脑壳栽下去舔嘛，牲口都这样吃东西，还客气啥？！

老威：你熬了多少天？

张进谦：44 天。12 月 30 号出洞，腰都抬不起。

老威：这个狱吏真是疯了。

张进谦：开头我还以为，只是煞煞我的嚣张气焰；稍后一琢磨，不对啊，我以前打干部也没关专用地窖啊。果然，我一出洞，麻绳就代替了脚镣背烤，五花大绑，跟赴刑场一样。我虚起眼睛朝脚底看，整个矿区 600 多犯人全部集中，在院子里等着，周围立起几个排的解放军，阵势不小。

老威：要干啥？开批斗大会？

张进谦：制造冤案！这个段凤先，不晓得哪根筋错乱，居然构思了一个“以张进谦为首的暴动集团”！黑材料已整了一大摞，我被押着，从犯人中间穿过去，到队部认罪。材料也不看，也不读，直接就抓住我的右手大拇指，按印泥，再一页页按手印。我大吼：姓段的，我与你无怨无仇，为啥要往死里整我？！

段凤先冷笑一声，转身就出屋，当众宣读我的一条条罪状。随后，气也没让歇，就给我换上 3 扣大脚镣，由一个班的解放军押解，转往丽江专区看守所。

老威：又回老地方。

张进谦：今非昔比啰。上次是即将开机器，这次是即将判死刑。

老威：坐囚车吗？

张进谦：还是走路，拖着脚镣翻了两座山，上五台山，下五台山，整整 12 个小时，

才拢丽江坝子。收监时手脚都烂完了，像个站立的骷髅轰地垮了下来。可是，我晓得这次非同小可，匆匆吃完饭，就连声报告所长，要了 50 页纸。所长姓安，算个好人，他叫人把我的背铐改成前铐，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我写了 46 页的申冤材料。记起这些年的一场场一幕幕，我恨不得撞死啊。可是我不能死，至少不能“畏罪自杀”，让段凤先得逞。

老威：你在看守所一直是死刑犯待遇？

张进谦：一年多的脚镣手铐，他妈的。但是饭反而管饱，也算因祸得福。外头饿死好多人哦。

老威：检察院和法院来提审过？

张进谦：没有。1960 年的 6 月 30 号，刚开早饭，来了两个干部，提我出去。年轻的那位，居然摸出一把小枪，命令我坦白。我毛了，就说：老子抗日玩枪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老子已经是这个待遇了，你开枪嘛，我还得感谢你。老的那位急忙劝住，宣布说：张进谦，据我们多方面调查，你一共犯有 63 条罪，你来按个手印，认了，我们就可以根据党的政策，从宽处理。我说：把这些纸收起来，我半条罪也没有。他说再考虑一下。我说：该考虑的是你们，是段凤先。除非你们将我的大拇指砍下来，否则手印没有，命有。

老威：一个人犯 63 条罪？真是旷古奇闻。

张进谦：63 条蛇，条条都咬人，哪有自己把自己给毒死的？果然，又捱了半年，到 12 月 30 号，那两个干部再来审我，63 条就变成 3 条了。我问：还有 60 条罪呢？他们说：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 3 条，我们经过了反复核实，你不认帐绝对过不了关。我说：还是半条也没有。你们不信，我愿立字为据。于是我要了张纸，刷刷写道：我相信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一不逃跑，二不自杀，等待着调查研究，澄清事实真相，愿再次接受党的考验。

老威：命都差点没了，还给我党写《决心书》啊。

张进谦：《决心书》还是管用啰。61 年春节过后，一下子来了好几个干部，段凤先也大驾光临，又把我弄回长水汝南化矿区。

老威：终于完事了？

张进谦：完不了，完不了，段凤先这条疯狗，照旧把我塞进地窖。那晚黑，跟演电影一样，总共才 600 多号犯人，就有 120 多个拖着脚镣，大院里唏哩哗啦，像赶一队大马帮。解放军和警犬都不够，牵起线从其它地方调。有个犯人说：张进谦，你这个暴动主犯倒因祸得福，去丽江吃饱饭，我们才惨哦，只剩一口气吊起，还喊劳动。

犯人饿死多了，矿区撑不住，慌忙派一架马车，连夜去永胜拉枸杞，再连夜加枸杞炖草乌，每人连汤带水一大碗。我也得了一口缸。

老威：监狱都乱成一锅粥了，阶级斗争还搞吗？

张进谦：第二天，又弄我出去挨批斗，还是剩的 3 条罪，逼我认，反驳就喊打。众犯都不愿动，只有一个少年犯，提着木棒子劈头盖脑一顿，段凤先很解气，鼓起掌来。可我的脑门却被木棒上的铁钉扎出洞，血卜卜几下，就把脸遮了。我趁机晕倒装死，血在地上流了一滩。死人啰！死人啰！众犯炸了营，段凤先也慌了手脚，传来犯人医生杨文灿当场检查。老杨扒开我眼皮瞅瞅，连唤几声“张进谦”，就站起来：报告教导员，张进谦确实昏死了！其他干部都袖手旁观，只听得段凤先大吼：快背出去抢救！你负责！否则杀你的头！

老杨立即背我到卫生室，边包扎止血，边往窗外瞅，做抢救的样子。他问：张进谦，你没昏嘛？我晓得。我眯缝着眼答：自从劳改，我挨了上百次毒打，撑不起啰。

只有昏。老杨说：那就继续昏，脸上的血也莫洗，队上的干部全在外面，就是要让他们参观参观革命的人道主义！

我死狗一样躺了几个钟头，才听得老杨报告：是否将张进谦送监房？段凤先答：还是地窖。老杨说：那里面太冷，要死人哦。旁边的值班解放军插话：这儿有炭，给他烧个小火盆。

老威：这个解放军还不错，心慈手软的。

张进谦：人心是肉长的啊，只有那段凤先的心子是特殊材料造的。半夜的声音传得特别远，我在地窖头竟然清清楚楚听得干部在吵架，还拍桌子打板凳。有个叫杜荣春（音译）的年轻干事说：这个会不开了！要开你开，你的官大腰杆粗，我负责不起！段凤先说：上级指令我们两个主办，你不负责也不行。杜荣春说：事情还没查清楚，就镣起 120 多号人，全中国都闻所未闻。你说咋个交差？段凤先说：有意见你就提出来。杜荣春说：那好，脚镣全部解了，人放了，推倒重新调查研究。段凤先说：其他可以，张进谦不行，他的 3 条罪还是成立的。杜荣春说：莫提 3 条，就 1 条都是死！人命关天，这不是你我定得了的。

老威：你和那镣起的 120 多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张进谦：不清楚啊。我既没看过材料，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也不认识。可能是人饿慌了，集体停工要吃的吧？段凤先就全部当作暴乱分子，上脚镣、关禁闭、加刑期。我还在看守所，就被弄成“总司令”了。

老威：顶破天，你就算违反监规嘛，这个姓段的脑子肯定有问题。

张进谦：对嘛，如果我真死在一个疯子手下，就太划不来了。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5）

插　记

天黑前赶回丽江，饱饱地吃，美美地睡。第二日斗志松懈了些，11 点才拢石鼓张家。老人已在门外翘首以盼，一见我们，竟扑上来勾肩搭背，邀约一起去长江第一湾公园——他每天都在里面跑好几圈呢。

对岸山势低缓，顺势大拐弯的水面至近而远地放射，如一把慢慢打开的折扇。作为折扇柄的公园外侧江边，泊了许多机动橡皮船。这是个新开发的旅游项目，还没见外来游客，倒有不少当地人拾阶而上，与老人打招呼。后者矜持地点头，又转而低声对我们介绍：这是谁，他的父亲或爷爷是谁，土改时候是贫雇农或地主，是否枪毙、坐牢或入党、升官，几年前死了或瘫了，等等。然后很得意地埋头自我打量：没任何毛病，搞不明白，都死好多盘了，还是没整出毛病。

街面上传来喇叭声，我们举眼一望，原来抵达了一串豪华大巴。好几百中外混合游客突然涌入，四处乱窜，令这个洋不洋土不土的小镇凭空喧闹起来。假古董贩子大张双臂，满嘴哈罗哈罗，将大屁股洋人朝摊边引；接着，卖土特产和瓜果的男女村民也学假古董贩子的样，满嘴赫罗赫罗，争夺更大屁股的洋人。如此倾城的崇洋媚外，竟激怒了我这爱国情绪浓烈的采访对象，他手舞脚蹈地冲着人群叫：搞啥子鸡巴？没见过老外啰？老子跟老外打交道的时候，你们还在妈肚子里转筋呢。

扫兴之余，又参观了河岔上的铁索桥，桥边立着记述当年红军英勇渡江的石碑，与头顶山壁的渡江纪念碑，以及军民鱼水情的粗壮塑像遥相呼应。老人以一个军人的严肃，指出了石碑间一两处涂改历史的谬误，正要引申下去，铺天盖地的游客在导游的正确率领下，接踵而至。

逃回家中，抹脸擦汗，一杯粗茶下肚，空气方静穆下来。我摸出录音机和笔记本，

开场之前，老人却吐了句我不太明白的哲理：过去？现在？你说哪阵儿好？

我干笑一声，没话。

正　文

张进谦：由于“暴动罪”定不了案，转眼我又被押回丽江专区看守所，仍然脚镣背铐。虽然已经三出三进，可还仔细搜了身，裤带也上交。所里大小 8 个监房，我都蹲过了。

老威：待遇是否好些了？

张进谦：老实说，没有饿肚皮，可挨打的次数太多了。有个老家石鼓的看守，三天两头值班，都将我提出去，命令跪倒，皮带棍棒，甩得跟刮风一般，我被整得叮呤咣啷满地滚。你可能觉得奇怪，人又不是铁坨坨，如此敲打咋个不得内伤？嘿，我有绝招，就是每次遭整后，立马喝“回笼汤”……

老威：回笼汤？

张进谦：就是自己，也包括别人的小便。双手背铐着，不方便，只能鼻青脸肿地求人帮忙解裤子、掏鸡鸡，冲着口缸尿。有时鸡鸡被踢肿了，尿不出，或尿的份量不够，就再磕头作揖，讨要他人的小便。一般来说，犯人都同病相怜，一点“举鸡之劳”何足挂齿。唉，如果按上百口缸一桶尿计算，我这辈子起码喝了上百桶尿吧。

老威：太夸张了一点嘛。

张进谦：1961 年 5 月 3 进看守所，6 月前后又出来，调回长水铜厂 4 队，随后又是 7 队，泰安 9 队，我断断续续戴了近 8 年的脚镣手铐。那是土铐子，白天打开干活，晚上就背铐，睡不好觉。时间一久，铁就陷入肉里，化脓了，才叫狱医擦点消毒药水。几十年过去了，你看我，肩膀全是斜跨跨的，这手腕子，印记还在。由于被教导员段凤先树为“反改造典型”，批斗会场场有我，自然免不了拳打脚踢。本来，1970 年就熬满了刑期，可在文革期间，两劳人员不予处理，又拖延到 1972 年。

老威：这样算来，老人家的确喝了上百桶尿。

张进谦：不对，应该从 1959 年被段凤先关入地窖开算……还不对，我差点连尿也喝不成了……在汝南化矿区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几个犯人饿急了，就在山上采来些野果，放进口缸，架在火堆上煮来吃。不料让一个叫杨道康的傈僳族民兵发现了，就过来喝问：那个煮的？我回答：我煮的，肚子饿嘛。他说：你还调皮呢，当心把你捆起来。我一下子火了：你还是不是个人？晓不晓得肚皮饿起难受？你倒是吃得饱哦。他说：一个犯人脾气还大，老子要吊你！我说：道理不会讲，只晓得吊人……嘿，话还没落音，他就扑上来，按倒我，先给我戴一幅大脚镣，不解气，又加一幅，这两幅脚镣总共重 76 斤。然后将我吊在矿洞的门顶上，问我服不服？我当然不服，还不停地骂，他就从火堆里夹炭来烧嘴巴。火炭明晃晃的，人出于本能，都要扭来扭去地躲避，结果嘴没烧着，两边腮帮子却哧哧烙出潦泡，脖子也烤焦了一大片。你个狗杂种啊！我还在骂。他瞄了几回，想把火炭堵进我的嘴，都偏了；于是这个傈僳族的狗杂种，在地上寻来寻去，就跑到坎下面的茅房去挑大便。亏他做得出，要挑大便来堵我的嘴！落到这地步，是个人都不要活了！我乘他还没转头回来，开始晃悠自己的身体，我算个大个子，饿得再一把骨头，也自重百多斤，加两幅大脚镣，一共 200 多斤。我晃起来，感觉手臂也快叫拉断了，至少是腋下的筋拉扯到极限，痛得跟五马分尸一样。可管不了那么多，我还在晃，幅度越来越大，渐渐都带风声了……

老威：他没察觉你要干什么？

张进谦：傈僳族很蠢的，他要是不蠢，能为屁大一点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老威：他是民兵，你是犯人，再蠢，他也觉得比你高明。

张进谦：高明才去挑屎啊。他终于用木棍挑起一大坨稀屎，皱着眉头，左手还扇着风，自坎脚爬上来。见我晃荡得厉害，就欲从旁边偷袭，将屎整个盖住我的嘴。他咬牙切齿道：你还打秋千给我看！却不提防我突然硬侧过去，连双脚带脚镣，如 200 多斤的钟摆，实实地撞中了他的胸口！这个狗杂种，被撞飞起两尺高，后脑壳刚好弹在岩石上，出血了。最可笑的是那坨屎，盖住了他自己嘴壳，不晓得味道咋样？

老威：老人家有绝招啊，真像抗战电影里的革命英雄对付汉奸。

张进谦：是啰，所以那汉奸从地下爬起来，哇哇大叫，扭过头就拖了条枪。他起身将子弹上膛，抵着我要打。嘿，老子的命实在太大了！

老威：子弹卡壳？

张进谦：是中队长发现了，赶紧跑来，把他的枪筒子按下。狗日的红了眼，还与中队长夺了半天枪呢。中队长大吼：给我滚开些！你以为政府发枪，人就可以随便杀？懂不懂法律？

老威：不可以随便杀人，可以随便吊人。

张进谦：中队长将我放下地，解开大脚镣，还不放心，当即就送我回场部。他说：你这次与他结下梁子了，我向教导员汇报一下，你还是住进地窖保险，以防他纠集其他民兵来报复。看看刚才多险！你一个犯人被毙掉，人家民兵大不了开除回老家了事。

老威：杀人不偿命？

张进谦：社会上杀人偿命，监狱里嘛，嘿嘿。

老威：监狱里怎么会有少数民族民兵呢？

张进谦：饥荒年间，犯人情绪波动大，为防意外，正规警力不够用，就经常从附近或稍远一点的村寨抽调基干民兵，协助监狱看管犯人，汉族、傈僳族、彝族、白族都有。民兵的法律水平很差，有的连汉话也说不利索。

老威：活出来真不容易啊，眼下看来，你喝过上百桶尿也不算稀奇了。

张进谦：没得法呀，如我这般刚强的人，有时也不得不低头呀。在看守所，我还被强迫抽过血，那是一个叫托巴的藏族犯人，起码是小土司吧，得了急病。我和另一个犯人被提出去验血，结果我是 0 型。由于要到专区医院，怕走在街上影响不好，我的脚镣手铐才被暂时去掉。不管押解的兵如何催，我都故意磨蹭，东张西望。当然，好久没这么轻松地穿过街道了，特别是手脚，前后左右随便甩，飘飘然如腾云驾雾。

直到躺在病床上，带大口罩的医生和护士进屋，挽起我的衣袖准备要扎针了，医生才问道：你是自愿献血吗？我不吭声，医生又说：如果你不同意，就算了。我鼻子一酸，差点流泪。唉，你不晓得一个阶下囚的感受！叫你干啥就非干不可，谁会征求你的意见？哪怕就是一枪崩了，也没你开口的份儿，更莫提“不愿意就算了”。

老威：这在西方是最起码的人权。

张进谦：啥子人权啰，猪权狗权都没得。所以我对医生说：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我已遭了几年冤枉，现在你抽我的血，我也算配合政府完成任务。但愿能借此一线生机，摆脱段凤先的毒手！医生点点头，才将大号针管插进我的手臂，抽了 600 毫升，满满一瓶。

完了医生问：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答不。医生说：身体底子不错。就要开些补血的药给我。旁边的干部急忙摆手：不需要不需要！跟着，就拽着我打道回府。

老威：他妈的，牛马抽血还要多给些草料吃呢。

张进谦：我享受了近一年的死刑犯待遇，虽然手脚锁住，却没饿饭，还胖了。后来那个托巴土司出院，还隔着铁栅栏叫我，一直合掌作揖：感谢，感谢，你的血救了我的命。

老威：谁又来救你的命？

张进谦：一天天熬啰。经常觉得生不如死，可过了那股劲，又继续嘛。还好，我没被段凤先整成残废。1972 年，算正式脱了劳改犯的皮，可依旧留在 8 队当工人，工资 19 块 3 毛。

老威：46 岁了，才挣一个学徒工的钱。

张进谦：人生的大半截都过了。幸而我性格豁达，周围也有亲戚朋友暗中相帮，要不，哪娶得成老婆？1973 年，我结婚了，就跟眼前的这个。大山坳仁和乡人，家庭成分富农，小我 5 岁，之前就育有两儿两女，都已成家立业。

老威：你们咋个认识的？

张进谦：我们从小就是邻居。成婚是在劳改队。当时啥子都兴票证，粮票、布票，肉票更紧俏，所以只能简简单单请个客。亲戚朋友都商量好了，张进谦岁数大，穷得心慌，我们就不虚张声势送东西，只尽各人的能力，凑钱给他就行。

老威：你没落下亲生骨肉？

张进谦：同房不久，孕就怀了。我还在说：我工资少，肚皮大，养活你都困难，何况添一口？她说：不用你养活，我自己有手。我说：有手也变不出粮食。她说：我娘屋里还存着几百斤，有杂粮，有包谷，这两天我就上山去背下来。我说：来回一趟，爬坡下坎十几里，太累了。我要忙活路，你的身体不方便，不如请我们赶马帮的老表（也是地主），雇他的牲口，一次就驮回来。脚钱我开，估计他也不会多要。

我老伴不吭声，我还以为她同意。不料第二天，我前脚出门，她后脚也出门。她到底舍不得花劳改犯男人的辛苦钱，还是自己上山背粮食，太自不量力了！头一趟她就背了 80 斤，吭哧吭哧爬一个阳坡，挣得汗如雨下，一会儿就流产了。这个蛮婆娘，还一趟子跑到河里去洗，这下就成习惯性流产——后来又怀上 3 胎，都流掉了。我抓来很多副草药，亲戚们也送阿胶、人参，还捉鸽子给她吃，都无效。

老威：真是造化弄人。

张进谦：她有良心，还哭兮兮地说：张进谦，我生不得了，我们把离婚手续办掉，你另外再找，找了再生。我说：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不强求。哎呀，我的命硬，脾气大，能得到这么个好心肠女人的照顾，应该满足了。我好赌，全石鼓街上都晓得，打起麻将不要命，我老伴一再劝说，我当耳旁风。可前 3 天，她突然给我一个 6000 元钱的存折，把我感动得说不出话——她平时没啥子钱，不晓得攒了好多年，才有这些啊。唉，我张进谦对不起人啰。

老威：你现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也算翻身了。

张进谦：我在劳改队蹲了 26 年，1983 年才正式平反，法院的《判决书》、丽江军分区的《复查决定》都有。此前我专程去昆明，在云南省政协拜访了原边纵 7 支队副司令员朱家壁，得到老首长的大力关照。1986 年，我恢复了中共党籍，党龄从 1950 年 10 月算起。而目前呢，我还在坚持申诉，强烈要求补发 26 年的“冤狱费”，31 年的工资，还有军龄，应该从 1943 年我参加抗日开算。

老威：没错。

张进谦：我每天坚持长跑，在长江第一湾，我可能是岁数最大的长跑者；我还坚持吃肉、吃核桃；坚持练书法——有了这些身体和精神本钱，不管有没有结果，我都能坚持申诉。整过我的人，丽江有，石鼓街上有，昆明也有，我张进谦要和他们比比气长。看嘛，我年轻时候那股劲，那股老虎威风还在，我这个抗日军人，这个所谓的恶霸地主的儿子，要等着把你们这帮狗腿子送进坟墓。

老威：没错。

张进谦：差点整死我的那个段凤先，直到现在，我还年年告他。嘿，真是冤家路窄，我曾经 3 次碰见他。第 1 次在丽江到石鼓的那个丫口，八几年，还是荒郊野地，他见我就躲。我拦住他说：段凤先，心虚啥子？眼前没人，本来可以一锄头挖死你，但是我张进谦堂堂正正，不干这种阴损事。总有一天，我要把你送上法庭。

老威：他咋个回答？

张进谦：全身在打抖，回答个啥？第二次是在丽江新城的红太阳广场。第三次是看电影，他刚巧坐我前排。莫看我老，都随身带着匕首呢。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狗杂种段凤先，你为啥子要害我？他说：都过去了嘛，张进谦，我们都老了。你现在也是离休干部，资历还比我深嘛。我说：你伸手摸一把，这是啥子？匕首！晓不晓得？我再老，还是有这股子劲，将它稳稳当当插进你的腰杆。老天安排的机会啊，可是我不会，我比你懂法律，我死活要把你扯上公堂。

老威：你和这人的过节深如海。

张进谦：段凤先的老表，在旧社会也当过石鼓乡长，曾经欠我的赌债。这个都不提了，他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所以我从远征军干训团回家探亲时，一冲动，就打了他。

老威：这是哪一年？

张进谦：1944 年，我十七八岁。

老威：段凤先起头整你是哪一年？

张进谦：1959 年，我 33 岁。

老威：改朝换代这么久了，旧仇还在延续。

张进谦：至死不忘。

老威：如今，了解你，了解你这些旧仇旧事的还有谁？

张进谦：住在丽江的和瑞尧，76 岁，研究孔子的专家；住在剑川县城的郭正洪，大我 1 岁，就是在劳改队和我分吃生腊肉的那个。都是地主哦，你要去找，我就将电话告诉你。

疯狂的石鼓

为期 3 日的艰苦寻访终于结束，我松了口气，而张进谦老人却紧张起来。他一再追问：全是犯禁的内容，这本书在哪儿出版？我答：在海外。可总有一天会在海内。他又问：你会不会受连累？我反问：你呢？他说：我都 80 岁了，又是离休干部，劳改队恐怕不敢收。我笑了。

接着，他又重提付费，令我哭笑不得。这石鼓镇的老年协会里，就数我做生意早，他说，除了修房子，我还攒了好几万，你不要客气。

我握住他的手摇了又摇，边起身边说绝对不客气。老人陪我们出门，本来已告过别了，可又坚持送到车站。日刚过午，我在中巴车里坐了几分钟，直待老人转身离去，才跳下来，望了一会儿老人的背影，咀嚼着一丝丝莫名其妙的感伤。

心血来潮，我让朋友先去，自己却信步闲逛。随便一拐，就进了石鼓公园，屁大一点地盘，门匾还是臭名昭著的伪才子郭沫若题写。中央的架子上，搁了一面簸箕大的石鼓，浑身斑斑驳驳，看来有些年头了。果然，这是记录丽江境内两次战争的文物，为世袭的纳西族知府木高在 1561 年所造，原立于“拉八”峦下河边——据传，仗打得很惨烈，双方都死了许多人，可时过境迁，儿孙们化干戈为玉帛，大伙又混一块了——我想，牛皮战鼓眨眼变成擂不响的石鼓，是否在暗示一种徒劳的疯狂？

土地改革也是一场战争，至少毛泽东把它视为铲除剥削阶级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战争，从此，也奠定了一套运动治国的模式。开始都气势汹汹，你死我活，到头来却是一派徒劳的疯狂。不过今人没有古人凿碣刻石、打造文物的嗜好，忘就忘了。

沿昨日张进谦老人指引的路线，我又在绕坡而上的羊肠巷子里穿梭起来，不一会儿，竟有些神思恍惚。肉红色的裸土围子一座接一座，头顶的天只有两尺多宽；高高在上的蜘蛛们不断地结网，似乎要将人类的世界包裹起来；而在更上面，是亘古不变的太阳、鸟和山峰——还有群山中的大量坟墓，低处的人死了，就往高处埋，去接近那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然而共产党来了，那些如我一般的叫做“工作组”的外地人，怀揣革命火种，挨家挨户走访，以政党和政府的名义，鼓动人们起来斗争、抢劫、杀人，以改变“天意”安排的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可眼下呢，还有没有 56 年之前的蛛丝马迹？这一扇扇褪色的院落门板，有的紧闭，有的虚掩，有的敞开着，只要心生动机，我都进去，见人就打打招呼，闲扯几句；没见人也不用慌张，照样东瞅瞅西瞅瞅，参观个饱。碰巧主人家从外头回来，还露出好客的笑容。于是我就问：你家是地主吗？回答是：早就没地主了。或者是：上一辈人的事情，不太清楚。

我瞎钻了五六条背巷，进出了无数院落，几乎没遇见什么行人。正准备窜出巷口，打道回府，突然，身后响起卜卜卜的脚步声。回首一看，在 20 多米远的那一端，一团火苗直闪而来，转眼就拢跟前。原来是个红衣蓝帽蓝裙的老太太，可我从没遇过行走这么快的老太太，她埋着脑袋，步子僵硬，右手还拽着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孩子。我急忙从背包里挖出相机，乘她与我擦肩而过，不顾死活地喀嚓一张，稍后回放照片，老墙似乎也随着帽檐下的发丝，在朝后动荡。而那种疯子特有的痴笑，却清晰地凸现。

接着我又冲到她的前面，战地记者一般蹲下，拍了第 2 张和第 3 张。第 2 张脸黑了，周围的墙、天和电线杆子倒是亮的；第 3 张是大祸临头的特写，笑得像哭，极恐怖，每根神经都在抖。为了这件作品，我狗日的翻了个滚儿，否则疯老太僵尸般直来直去的脚肯定迈入我的怀中。

庆幸之余，我起身跟踪。刚才所感受到的那个亘古不变的静穆世界变了，我在一个疯子的牵引下，腾云驾雾。两边的土墙纷纷后退，如时间甬道，模糊不清。我原以为她有个目的地，家、街面或车站，可是个把小时过去了，我一直跟她在巷子里兜圈儿。难道她故意的？难道她不是疯子？可她背弓着，没回过头，走路的姿式从没变过呀。

刚才拍照的地点已路过三四次，我只得满头汗水地止步。因为不少院门已大敞开，人们成堆地站出来，观看疯子撵疯子的闹热了。我谄媚地笑着，与蹲在一门槛上抽水烟的老者打招呼：老人家，高寿哦？回答：76 啰。我口称“看不出看不出”，顺势并排蹲下。孩子们哄笑着散了，我的周围仍旧堆了十来个人。

我单刀直入：你们晓不晓得我追的是啥子人？

群众答：疯子嘛。哪家的疯子？拐角那一家。她家还有人吗？有个姐姐，八几年死了。侄儿侄女在嘛。还有侄孙嘛。她咋个疯的？不晓得。一个中年人抠着脑门道，好像我一出世她就是疯的。追着打人？不打人。就这么穿尿巷子，1 年 365 天，每天都穿，不歇空。你们不晓得，我晓得。抽水烟的老者终于开口。她六、七岁就疯了。六、七岁？哪一年？

1951 年底？1952 年初？记不清了。她爹被当作恶霸地主公审枪毙，就在那长江第一湾的滩滩上，脑壳完全打开花了。她看没看见我不晓得，总之她吓疯了。先是满街跑，后来怕人多，来抓她，就躲着人，在尿巷子里兜圈圈。

她爹叫啥子名字？她叫啥子名字？不好说，不好说，老者躲闪道。并抬起碗口粗的水烟筒顺势一指，石鼓村党支部在斜对面，你找他们了解吧。

我装模作样地过去瞅了瞅，见斑驳门墙间，除了党支部的招牌，还有并排的 3 条残缺标语——开国主席毛泽东思想万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奋勇前进！拥护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总书记！——这至少是两三年前的产物，因为本届领导人的大名还没添上去。

待我再回首，老者已溜之大吉。我一问，四周群众全嘿嘿笑，这是另外一种麻木的呆笑，在我看来，远不如那个疯女人的笑——一种从 50 多年前一直持续至今的惊恐的笑，一种见证过血案的迷狂的笑，一种死灰里的笑，一种与张进谦老人的控诉相对称的笑——令我突然记起青年时代写过的诗句：

我是一座空城沉陷于另一座空城，世界宽敞，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阴历七月十五，坟头涨潮似地侵入城市，与人类的房屋对峙……

她在巷子里逃，她从儿时逃到老时，还在逃。或许某一天，肉体倒下，消失，灵魂还要继续？在风、月光和乌云弥漫的虚无的巷子里继续？人类的记忆之旅能够抵达那么高的地方？贯穿几十年、几代人的暴力之手还能伸那么长？

2007 年 9 月 14 日下午 4 点，雨住了，但云层很厚，打瞌睡的太阳偶尔露一下头。我来到路边车场，正要登上一辆返程中巴，却被又一位红帽红衣的老太太扯住。我给了她 10 块钱，连拍 3 张“红色年代”——主人公披挂着五颜六色的佛珠、仿真象牙、旅游帽，而醒目的左胸上，有一颗比公章还大的毛主席像章。

我想起我的音乐搭档阿泰讲过，这个老太太是石鼓的一道旅游风景，收养了一大群流浪狗和一只鹅。她经常将这只训练有素的鹅顶在脑壳上，她叫一声，鹅就应一声，以此吸引游客，赚些生活费。阿泰是西藏那曲出生的画家兼鼓手，他曾受她的邀请，去她靠近长江岸的窝棚拜访，遭遇了五、六条瞎的、跛的或某个部位正溃烂的狗，感官和心灵均受到强烈刺激。阿泰说：那是个用塑料布遮风避雨的地坑，老人在里面办了个动物的临终关怀医院，好吃的，先喂狗；好住的，先让狗。我问：她的家呢？儿女呢？阿泰说：她没家没儿女，原住地离石鼓镇有十几公里。她遭受冤案，房子被人烧了，一直找村支书评理，人家不耐烦，就把她当作疯子赶出来。在外头混久了，本地人就真叫她“鹅疯子”。

客车卡卡发动了，我向老太太招手，她竟一脸困惑；我只得喊道：你的鹅和狗呢？她摇摇头，似乎没听懂；我又喊：你的鹅和狗呢？她点点头，听懂了，还抬臂指了指远处。

四周的看客都笑了，还是那种我所熟悉的麻木的呆笑——我不禁自语道——如果真像福柯讲的，中世纪以前的疯子自由自在、逛来逛去，跟哲学家一样受到尊重，那谁还愿意做正常人呢？你以为你正常吗？你以为大多数就正常吗？你以为被大多数尊重就正常吗？哪毛泽东和共产党过去、现在、未来都认为自己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只有疯子才会这么说话，可你曾经习惯这么说话，正常吗？你，你们，正常了几天？

土改受害者和瑞尧

前　奏

从石鼓返回的当日傍晚，我就拨通了和瑞尧老人的电话，那端的声音极其微弱，

在我滚滚闷雷一般的长篇自我介绍以后，就越发气若游丝了。加之屋外风雨交集，我费了相当的功夫才搞懂对方的零星意思，却是关键的意思——老人同意小子登门拜访，至于采访，就免了吧。

2006年9月15日也不是什么好天。由于昨夜在38号黑沙龙里，被音乐搭档阿泰的鼓声和酒客的喧闹催得骚兴大发，又许久缺乏女人的温柔管教，就肆意将平生吹鼓之乐器，诸如洞箫、口琴、算盘、拇指琴、铜钵，像兵器一般轮番舞上阵，配以毛毛草草之啸吟，佐以火火烈烈之青稞酒，所以醉得深沉了。一大早被渴醒来，赤条条翻身寻水，灌了两三斤，渴意缓解，脑袋却如进气的氢气球，晕乎乎的大。于是回笼又睡，午时方在狗叫中还魂。

穿戴毕，又穿插数条人烟稀少的鬼巷子，抵达位于丽江古城北边外沿之农贸市场，挤在一大堆四川民工中，享用斗碗装的大份拉面，油辣子汤喝得呲牙咧嘴。整饱了，才6块钱，这是整个丽江地区分量最足的一家面馆，外来混混们都晓得。就是卫生稍微差点，一脚盆水，大概要洗200多个碗吧？我开始来吃也拉稀，多吃几盘自然不拉了。

我记得成都还有5块钱随便加面的民工馆子，吃了拉得更凶。我怀疑面里加了什么不明物体。

既然饱了，就该干点正事。叫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北郊的玉峰小区。由于是雨季，遭遇了一段被雨水泡透的烂泥巴路，司机不想开，就声称到了。却不料碰上自称“老丽江”的坏蛋，不达目的就拒付车费，只得屈服。

在两三排高楼背后，是大片迷宫似的纳西族庭院建筑，都是整齐划一的楼底带院子，我钻来钻去，问了六七个人，迷宫里的狗起码叫了七八个轮回，我才认准了门。

虽然一身运动装，我还是如孔子的门徒一般，双手垂放大腿间，向露面的孔子研究者躬身问好。小院不过弹丸之地，但极安净极安详，花草众多，可每片叶子均一尘不染。我被让进书房，台桌上叠满书法作品，架子上都是书。

我正襟危坐，绞尽脑汁与老先生谈孔子，才疏学浅是真的，谦虚好问也是真的，总之，老先生比较高兴，终于接受了我的录音采访。

已接近下午3点了。我跟前的这位著过《长江第一湾》的纳西族学者，埋着眼睛，声音依旧微弱——这给我后来的整理造成了一定障碍。

正　文

老威：老先生是从哪一年开始研究孔子的？

和瑞尧：1974年，我在劳改队教书，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和孔子捆绑一块的挖祖坟文章铺天盖地，我却借机系统地读了好几遍“反面教

材”。如《四书》《五经》《增广贤文》《三字经》《百家姓》等等。特别是《论语》，我是逐字逐句，圈圈点点，可颇多心得只能在脑壳里积累。当然，我们这代人，稍微有些家底的，从小都读过圣贤书，但小儿启蒙和细读、体会、研究是两回事。

老威：我才疏学浅，却也记得“天不生仲尼，长夜无明灯”这句话。孔子作大学问，司马迁作大历史，所以被称为亘古至今的知识界泰山北斗。而我们这种泰山北斗笼罩下的蚂蚁，只能做点眼前的小小历史，所谓学问更谈不上了，但我尊重你这样认真做学问的老人。

和瑞尧：你太客气了。

老威：有个叫丁东的朋友，编了一本口述历史杂志，其中某一期，刊登了一篇谈著名作家老舍死因的文章。好多人都晓得老舍在文革中投湖自杀，可对临终前的种种细节弄不太明白，于是作者采访了 3 个目击证人。万没料到，3 份“口供”都不一样，甚至在投湖的具体时间、地点上也有出入。怎么办？只有将 3 份“口供”原封不动地同时公开，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这就跟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不一样，大凡圣人作史，都有雷打不动的论断。

和瑞尧：我懂你的意思了。不过，因身体关系，我作“口供”的时间是否可以短一点？

老威：好啊。

和瑞尧：恐怕也谈不了那么细。土地改革距今已相当遥远嘛。

老威：还是尽量多些细节吧。当然，分寸你把握，能说就说，不能说不勉强。

和瑞尧：我生于 1931 年，老家距石鼓街子 7 华里，老君山脚下的高民村。

老威：我拍有老君山的照片，从红军渡江纪念碑看过去，那云雾里的山头，似乎触手可及。

和瑞尧：可我父亲早年追求进步，还是从仙境中出去，投考了昆明的云南陆军教育学校，也就是朱德任过教官的云南讲武堂。稍后，二次革命爆发，父亲又参加了蔡锷的讨袁军，因作战勇敢，升任滇军连长。大约二几年，他返乡成家立业。据说他当时就建了嵌大玻璃的房间，采光很好，显得很新潮。

老威：那个时代的玻璃非常昂贵的。

和瑞尧：家底比较厚实。可到了 1937 年的某一天，村里抓住了一个小偷，于是群情激愤，几十人上去拳打脚踢。眼看要弄出命案，我父亲就挤进人堆制止。众村民不依，他又费尽口舌，讲了半天道理，大伙方勉强同意让官府来处理。然而万没想到，小偷还有个同伙，躲在远处窥视，见我父亲站在人堆中央指手划脚，就认定他是打人的主使。跟着，就在后半夜放了把火，猝不及防地将我家烧成白地。

冤啊，可有啥办法？只好举家流落至石鼓街上，暂时栖身富甲一方的舅父家。随后，江岸数村爆发了会道门性质的农民起义，几千穷人揭竿而起，攻打官衙，焚烧寺庙，直到丽江派来几百人的正规武装，才镇压下去，起义首领也统统砍了头。

经历这么短时间的家国巨变，我父母均心灰意冷，靠舅父的接济，正式搬家，接着就精打细算地做起买卖来。

老威：开铺面吗？

和瑞尧：铺面没咋个开，做过田地的二手买卖，买进卖出，或者卖出买进，吃中间的价差。这当然得罪了不少人，因为那时国家政局不稳，物价涨跌大，大家都不愿捏死钱。于是争田争地争房，比拼得厉害，虽然没到抢的程度，但是红眼睛绿眉毛的情景还是经常有的。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似乎又回到那个时候，圈田圈地圈房，有一亩还想十几亩，有十几亩还想几十亩，也是富人之间、官场上下明争暗斗。如果再来一场土改那样的群众运动，可能个个要杀头，财产、二奶也要瓜分掉。

老威：其实发财是人的本能欲望，穷富相同，没有想有，有了想更多。

和瑞尧：对啰。

老威：那你们家在竞争中发展得不错？

和瑞尧：比较差。我父母心不算狠，争不过别人。我家在高民村有十几亩地，平常自己种，龙忙时才按天付费，请个把短工；后来搬家了，路远，自己种很麻烦，就佃给别人，照契约收租，以支撑一家人在街上的生活开支——后来，这成了划地主的一条硬杠。

老威：你当时已成人了？

和瑞尧：十八九岁，在丽江国立师范读书，思想进步，经常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下读书活动，接触到不少从延安偷运来的社会主义小册子。接着又考入教育部直辖的丽江省立中学，类似的学府在全云南都只有 3 所。读了两学期，暑假时加入党的外围——民主青年同盟，跟着碰到石鼓解放，如果按政策，我也该享受离休待遇。

老威：解放石鼓是哪支部队？

和瑞尧：地下党。1949 年 6 月 13 日，乡政府房顶上的青天白日旗放下来了，自卫队的枪也交了，地下党召集开了个会，宣布起义。

老威：就这么简单？

和瑞尧：是啰，大家都说好了。脚跟脚，7 月 1 日，丽江也起义，各机构由边纵 7 支队接管。我呢，立马投入新生活，在石鼓完小教书，还是青年团的文娱委员，唱解

放歌，跳时代舞，热闹了一段时间。可好景不长，四大运动开始了。

按当时政策，在区级以上单位工作的地主子女，应回避，调其它区县；我倒霉，属区级以下的地主子女，就在当地接受运动。我父母是清匪反霸后期被抓的，大约是1951年，关起来，天天审，天天挨斗。

我是独儿，我家是7代单传，现在祖坟上都刻着，多少有些神秘。唉，能指望谁呢？1949年，我刚刚18岁，就结婚，年轻啊，打心眼想在新社会干一番事业啊。然而人没法选择父母，我就这受株连的命，先从石鼓完小下放到10多公里以外的一所村小，才教了几天书，就叫控制起来，哪儿都不准去。

老威：你担心你父母吗？

和瑞尧：我自身难保。有一天，校长觉得我有逃跑嫌疑，就带人绑架，然后翻箱倒柜搜查，看是否“转移财产”。接着我就彻底失去自由，被押回石鼓关押——至此，我被剥夺了教书育人的资格达20多年。

老威：你被关了多久？

和瑞尧：半个多月。

老威：审讯吗？

和瑞尧：也不审讯。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关押的人太多了，民兵都是几班倒，一天到晚整得喊爹叫娘。我仅仅是地主子女，又参加过革命工作，能放出来，算网开一面了。

老威：你父母呢？

和瑞尧：关了几个月？半年？记不清了。

老威：整个石鼓有多少坏蛋被抓？

和瑞尧：五一二年是抓人的高峰，石鼓街上，整整的大院子好几处，每个院子至少拿3间房关人。保守估计，每间房关20余，那乡一级至少抓了100多。而乡下面大村四五个，小村10来个，也抓也关，打死了人也不填命。如此一算，就上1000专政对象了。

老威：有多少人死去？

和瑞尧：非法弄死的不清楚，通过乡一级公审公判被毙掉的，有好几十。我父母大概是1951年清明节前后，不超过10天，被双双镇压的。

老威：那天的情况你亲眼目睹了？

和瑞尧：没有，总之人山人海，枪声很大，快到天黑，民兵就通知我们领尸体。跟着就埋了。

老威：其它呢？

和瑞尧：就不用提了。

老威：你父母犯什么罪？

和瑞尧：总之，恶霸地主，血债累累。书里都这么写。

老威：怎样取证？

和瑞尧：就是上面的工作组来了，串联发动农民，开会诉苦。把这些苦一条条整理出来，拿到公审大会上去宣读，就上纲上线了。其实解放前夕，我家正频临破产，房子都叫别人当出去了，只是赖在里面没走。

老威：此话怎讲？

和瑞尧：某某县长要买我家房子，还没谈好，就预付了几千块钱。这钱被父亲花掉，一时还不出，人家就将我家房子转当抵押。打官司，对方官官相护，自然是我们输——嘿，眼看到“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改朝换代了。

老威：晚解放几年，你家恐怕也是贫农？

和瑞尧：难说。土改快开始，我们还叫撵到老岳父家住；土改结束，我们反而分得地主范义田家的房子，虽然只几平方米。这个范义田是沈从文的学生，曾当过石鼓完小校长，有两百多万字的文化、教育专著，在云南都有很大的名气。

老威：你家被抄过吗？

和瑞尧：抄过许多次，但也没啥可抄。

老威；财产和房子几乎光了，只凭收租一条就划地主？

和瑞尧：父母死时还没正式划阶级。

老威：他们是伪政府的官？

和瑞尧：不是。

老威：袍哥、乡霸？

和瑞尧：不是。

老威：本地名流？

和瑞尧：算。父亲他参加过倒袁革命，当过连长。两块金牌奖章都在土改中没收了。现在，我们老家的大门还保存在高民村敬老院里呢。

老威：哦，那他就是被大伙推举出来的革命刀下鬼。

和瑞尧：当时没有公、检、法这一套，明明是经济纠纷，也可上升为剥削压迫，几个贫雇农检举了你，就跑不脱，况且父亲他还不止得罪几个。那时每个村都有农民代表，就是最最苦大仇深的，同时是说话最最管用的。然后分乡、区、县、专几个等级，越往上，人数越少，在土改中权力越大。专区农民代表只有 4 个，与工作组一起四处巡查，要人死就不得活，厉害。

老威：那么……

和瑞尧：没有“那么”了，关于土改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老威：可以后呢？

和瑞尧：我们就一直住土改分得的房子，一直到 1985 年，我重返教育战线，还住着呢。

老威：几平方米住了 30 几年？添人口怎么办？

和瑞尧：我陆陆续续有 5 个子女，添 1 个增加一点点，添 1 个再增加一点点。

老威：不太明白。

和瑞尧：我自己会木匠，就不断靠着住房搭建玉米杆棚子，不断地修修补补。

老威：日子过得可怜哦。

和瑞尧：我不觉得。据说山西有个县，在文革期间，地富子女被喊去，一个个杀光了，石鼓远没到这个地步嘛。土改过了，乡里乡亲又继续交往，我们那个村，暗中对我挺关照。

老威：据张进谦老人讲，你与他一块劳改过？

和瑞尧：是，在大研农场。

老威；什么原因入狱？

和瑞尧：知识青年问题。

老威：能具体一点吗？

和瑞尧：就是知识青年问题。

老威：女知青？

和瑞尧：有人栽赃陷害。

老威：奸污？

和瑞尧：当时我在石鼓完小代课，她也在，加上我的背景是黑的，就被陷害了。1974 年进去，1984 年才出来，平了反，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

老威：知道谁陷害你吗？

和瑞尧：知道。这事牵涉现任地方领导，就放过吧。其实坐牢也是人生的磨练，因为文化算高，我在里面一直做教员，也没吃什么亏。

老威：张进谦呢？

和瑞尧：性格问题，文化问题，他的确吃了大亏。如果他懂得孟子的那段话就好了。

老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和瑞尧：不错。

老威：那老先生是以天下为己任了。

和瑞尧：不敢当。但我 30 年多如一日研读孔子，著书立说 200 余万言，还是想给子孙后代留些东西。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前　奏

2006 年 9 月 17 日上午，久雨初晴，我背着沉重的行装穿过大半个丽江古城，来到破破烂烂的客运站。根据路人指点，我从售票厅退却，在周边地段寻觅去剑川县的小面包。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以 100 元人民币的价格包得一辆。

接下来，我记不太清了，笔记潦草而简单，也查不出所以然。两三年了，数次在丽江进进出出，感觉已麻木。这是否有点“错把他乡当故乡”？王力雄曾说，若照居

住时间的长短来界定故乡，他起码有 7 个以上的故乡，而出生地就勉强算着“第一故乡”。我呢？出生地在四川省盐亭县境内的海门寺，我母亲在寺旁教过乡村小学。我是在成人之后，偶然听父亲提到那“第一故乡”的，我没寻过根，所以觉得有种诗意的虚幻，如大美女金斯基主演的《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不可能有巴黎，但人家就是要东游西荡地追寻，因为那是自己的出生地，是被热恋中的父母所命名的“第一故乡”。

而现实中，我的“第一故乡”是癌症的高发区，有全国著名的肿瘤试点医院，我父亲后来就死于肺癌。我没有哥哥大毛衣锦还乡的热情，我本能地回避，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除了埋在老家的爷爷、父亲及姐姐的尸骨，那儿就是一场缠绕至今的屈辱的噩梦。接下来是成都，接下来是涪陵（包括坐牢之地重庆和大竹），接下来又是成都。如此推算，丽江就是我的“第四故乡”了。

虽然已过大半年，我还是记得小面包 11 点出发，依旧那条去石鼓的老路。翻了山，可过没过石鼓？有些恍惚了。抵剑川县城已下午两点半，匆匆找家旅馆，放下行李，就出门寻觅。这实在是一个没啥可提的地方，两三条笔直的灰蒙蒙的大街，周围拥挤着潦草搭建的楼房，地方特色为满街的乳扇招牌，这是一种奶制品，云南 18 怪之一——牛奶搞成片片卖。

人力车拉着我经过城中心，一座花坛内，耸立了全城唯一的艺术雕塑，腾双蹄的马背上，骑着腾双手的人，举起一把龙头琴，似乎在向天弹奏。可惜上下左右密布嗡嗡响的高压线，犹如蜘蛛网，将此不伦不类的风景也煞得七零八落。我想，即使有采访对象，来一次也足矣，虽然早就风闻城郊有南昭国时期的石钟山石窟。

然后进入弯弯曲曲的背巷，满目令人作呕的垃圾，路如癞狗皮一般，在车轮的碾压下摊开、卷曲、流脓。我捂着口鼻，渴望下一段路能呼吸稍微新鲜点的空气，不料车却在一座小石桥前嘎然而止。车夫擦把汗，指点斜对面说：过桥，沿着这条古河道一直走，就是环城北路，门牌号你就自己问吧。

这座叫“永安桥”的建筑的确显得老旧，于是我掏出相机，咔嚓一张；冲着桥下再咔嚓一张，胃口就翻江倒海，如牛一般哞姆反刍。那是怎样浓稠、怎样静止、怎样散发着呛人臭味的“河水”啊！如果是露天大粪池，虽臭，倒还纯粹，偏偏这是大粪与生活垃圾的混淆，与发酸的豆腐脑的混淆，还掺入了摧人泪下的农药！我顺“古河道”一阵快走，尽量调整呼吸，我不能憋，不能跑，因为路还长。天哪，这就是曾经环绕整个城镇，供人类繁衍生息的河道吗？

又钻了几条短巷，打听了几个路人，终于找准了 34 号。这是一幢自建的 3 层楼房，嵌在其它自建楼房中间，共临一条千古臭河，谈不上有任何特色。

我扯开破锣嗓子叫门，露面的是郭正洪老人的女婿，也算个头发花白的糟老头了。他将我请上台阶，问明来历后，就让稍候。等了大约一刻钟，大铁门开了，81 岁的郭正洪竟骑着三轮车进院子，还拖了满满一车蜂窝煤！未及喘息，他又一摞摞搬运入屋，方才洗手，冲我点头寒暄。

我终于握住了那双劳动人民的黑手，浸入掌纹的煤渍似乎永远洗刷不掉了。主客互相谦让着在阶沿上落座，我抬出张进谦、和瑞尧作为采访的招牌，还顺带问道：你与他们都是石鼓地方人，怎么没落叶归根呢？老人答：我命里没根，所以女儿嫁到剑川，就挂靠过来了。

是啊，对于这个历经坎坷的老人，此地可算与“第一故乡”对称的“最后故乡”？

正　文

老威：你的电话号码是张进谦老人给的，他对你念念不忘呢。

郭正洪：哼哼。

老威：怎么啦？

郭正洪：他肯定提起如何与我分吃生腊肉的故事，将我丑化了一番。你想想，那年头饿死鬼一片接一片，连粗粮都不好找，到哪儿去弄肉？况且他张进谦就是孙猴子，能折腾上天，也不过是个劳改犯，更不可能从彝胞手中弄肉。

老威：他描述得活灵活现，不亲历咋个能编得出来？

郭正洪：见他的鬼！退一万步，就算他神通广大，弄到了 9 两腊肉，依他张大炮饿了连屎都吃的个性，会把比钻石还稀罕的肉分给别人？那不成雷锋了？既然是雷锋，共产党又何必关你劳改你，搞个神龛将你供起嘛。哼，都是劳改犯，谁也不欠谁，可他张大炮偏偏到处乱吹，我分吃了他的肉，如果不是他的肉润了我的肠，我就熬不出头……气死人了！有一回，我两个吵着吵着，差点在丽江街头打起来。他说：姓郭的，狗吃屎还晓得舔老子的屁股，你连狗都不如。小同志你评评理，这叫有文化？这叫老革命？骗子啰。

老威：都 80 出头的人了，还记啥子仇嘛。

郭正洪：活人记，死人就不记，憋着，看那个死在那个前头。

老威：那我们不提张进谦了，从现在起，将他一笔勾销。就算我为了你，专程到剑川来。

郭正洪：不敢当啰。

老威：土改期间你多大？

郭正洪：我 1925 年生，土改时已 20 好几了。我们兄弟姐妹 7 人，加父母，全家共 9 人，在石鼓街上还算有名。我家有 10 间铺面出租，包括两个院子，所以按当时的土改政策，划成了地主。

老威：你家有多少土地？

郭正洪：你指自家耕地？没有。祖祖辈辈都没有。田地属于喇嘛寺，在丽江地区有 5 大寺，周围的农民世世代代都从寺僧手中租地种，然后向他们交租子。当然，直接用新粮交租也可以。拉市坝的指云寺你可晓得？当年我们就是给指云寺交租。

老威：指云寺的名气太大了，仲巴活佛经常光顾嘛。去年中共政府指定的转世班禅由仲巴活佛护驾，也来到指云寺。当日惨雾愁云，辟哩啪啦下了好大一阵冰雹，我住的院子里一片白，樱桃树叶子全打没了。

郭正洪：我家从指云寺租赁了六、七亩，另外还在我姐夫（也划为地主）手里佃了几亩，所以总共有十一、二亩自耕地。

老威：按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你家也够不上地主啊。

郭正洪：但农忙和收割时，我家请过长、短帮工，这又是划地主和富农的一条杠杠。

老威：如此推测，石鼓的剥削阶级不算少。

郭正洪：不止 20 多户吧，几乎都是世代的石鼓人，辛辛苦苦积累了一点家底的。而贫雇农都是没住两年的外来户，人人都在寻觅发财机会，一土改，果然就鸡犬升天了。其实呢，大家都是苦命，地富分子也就是一种上纲上线的说法，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为了显示自己的厉害，不是换汤不换药，就要闹翻身。我琢磨着，这翻身嘛，跟翻地差不多，原先压在下面的不太见光的土，一锄一锄翻上来，见光过多的土，一锄一锄翻下去，要长庄稼，就得年复一年折腾啰。可妇女闹翻身是咋回事？几千年受压迫？不就是几千年受压迫吗？难道还要翻到男人身上去？

老威：老人家很幽默。

郭正洪：要活下去就得想开些。1947 年，国民党的壮丁抽到我……

老威：你家是地主，不可以出钱雇人顶替吗？

郭正洪：兵役制度比较严格，不像电影《抓壮丁》里演的。当时我大哥在昆明读大学，弟弟们还不到岁数，只有我正好。当然，也可以“骡马代役”，那就要拿票子去堆，看你家出得起多少匹骡马钱。我结婚不久，虽然不愿与老婆分开，可也没办法，只能向老岳父岳母赔个不是，主动去兵役科报名，随后就拉到丽江团管区。石鼓籍有 3 人，一个是我的侄儿，另一个由于出身贫农，后来叫解放军留下，分往铁道部队，一直干到营长。

气都没歇，一大堆新兵蛋子就开拔，丽江到昆明有 18 天路程，我们走了 20 天。跟着挤闷罐火车，拉拢贵州沾谊下站，又急行军到盘县（现在叫六盘水），修整一下，再步行至贵阳，暂时驻扎在十几里外的郊区。

老威：地名叫什么？

郭正洪：亲镇县中正堂。那时的交通没如今方便，人都折腾散架了。加之天气阴冷，伙食极差，我的侄儿终于患了重病。再次开拔，我们就找架马车拖着他上路，才走几里就不行了，门牙漏出来，鼻子也冰冰的，我们就将他翻到路边，草草埋了几把土。唉，云南人啊，真不适合远离家乡。

老威：有点逃荒的凄惨劲。

郭正洪：仗没打，一天到晚东跑西颠，后来又在四川境内打转，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呆过，璧山县也呆过，随后又坐民生公司的轮船抵达万县，在那儿，我们丽江团管区 10 个排，1000 多号新兵才编入蒋介石嫡系的新 7 旅，旅长田鄂荣。我进了通讯连，因为有点文化，受到排长的赏识，被提为生活委员。

马上要去湖北打内仗了，所以新 7 旅驻扎万县，加紧练兵，我却打起了逃跑的主意。我身上有钱，家里带出的现金兑换成一根两钱重的金条子，突击搜查了十几次，连卵蛋、裤腰带、鞋底都翻了，都没暴露……

老威：你的本领通天啊。

郭正洪：不通天，将丽江出的松香肥皂掰开，插入金条子，再合拢就行了。另外，我赌技高明，在军中还赢了不少，做回乡的盘缠绰绰有余。因此 1948 年的春节刚过完，我就溜了。

老威：这么容易？

郭正洪：我当生活委员，有许多机会去码头瞎混，与做买卖的、撑船的、喝茶的、说评书的都打成一片了。我还买了地图偷偷研究，有了十足的底，才与五、六个人约好，一起开小差。当晚就雇船到了望家坡（音译），第二天抵达一个大码头，将多余的军需品典当了，又日以继夜地逃。终于进入重庆江北，却正撞上四川团管区在训练新兵！来不及躲闪，就闻打雷一声吼：站倒！哪里的？我们只得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衣服上有番号嘛！没长眼睛啰？人家又问：啥子地方来？我们答：前线。不料兵营里一下子出来十几个端枪的，将我们逼进去，转眼就扣押了两三天。

直到连长回来挑明：你们就再留一段，等上峰视察过了再走。原来这家伙吃了兵员空缺，想暂时拿我们抵名额！罢罢，又熬几天，陪他过了关。

屁滚尿流地放出来，赶大半天路，谁料刚拢白石驿机场，又叫 79 师给逮了。他们声称“专门收容散兵游勇，为国所用”，没办法，我们又耽搁下来。

老威：让你们干什么？

郭正洪：站岗、放哨、出操、下苦力，日他妈，人都折腾成皮包骨头了……

老威：还好，没被就地正法。

郭正洪：为啥？

老威：你们是逃兵嘛。

郭正洪：兵荒马乱，遍地都是逃兵，都正法了，就没人去打仗了。

老威：难怪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

郭正洪：本指望一完事就开路还乡，可突然之间，来了一道紧急命令，79 师全体开拔！除了随身穿的，啥子都不准带！

老威：你的金条子呢？

郭正洪：当逃兵的第一站就上金铺兑换了，老板是个云南人，童叟无欺，足足给了我几万块，相当于现在的 1 万多吧。我脑袋都大了，以为回家做个买卖不成问题。没想到这一开拔，等于遭了抢劫！那晚黑，兵营里轰隆轰隆进来几十辆美式大卡车，车灯、探照灯齐刷刷地亮着，连排长守在房门口，点一个出一个，出一个搜一个，然后直接上车。等总体点完数，再每人发给 11 个龙头大洋。

老威：也算对你的一点补偿吧。

郭正洪：妈的屄哟！天生的穷命，有金子也留不住。这黑灯瞎火出去，一家伙就抵拢陕西汉中！军中盛传要上陕北前线打共军，愿不愿意都得豁出去了。可才过两天，真跟演戏一样，又变了，我们转到安康县，被编入警备师，不属于前线部队了。

老威：你的运气不算太差。

郭正洪：干了几个月，我就成老兵了，还升任上士班长。前线抓得土八路，也由我们看管。整天昏昏噩噩过日子，熬不下去了，又开溜。餐风露宿近 1 个月，终于回到云南昭通，裹一身美式黄狗皮混火车，也没人敢来查票收钱。

老威：已经穷极潦倒？

郭正洪：按说我不缺钱，缺钱就不会二次开小差。但遭了同路的连部传令兵的算计。我两个逃到重庆璧山县城，正逢赶场，人头攒动。我去买包烟，才一眨眼功夫，这个杂种就和行李一道消失了！

老威：早有预谋哦。

郭正洪：掐指一算，离家到现在快一年了，身上曾捆了大把钱财，被老天牵着鼻子，转了若干个地方，到头来却分文不名地流落异乡！真跟评书里讲的差不多。

老威：可你还是混过来了。

郭正洪：在昆明见着我大哥，喊了一声，就饿昏过去。幸好穿了身黄狗皮，面子绷起，能骗吃骗喝，否则沦为乞丐，连祖宗的脸都丢尽。

大哥刚从云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分到法院做书记官。恰逢 1948 年的中秋，我们就一起过节赏月，感慨苍海桑田，捉摸不透。可没料到，这是我们弟兄俩最后的闲情逸致。

老威：最后的闲情逸致？

郭正洪：对。因为我回到石鼓，合家团聚不久，就解放了。脚跟脚就闹土改，我家划为地主。父母都被关押批斗，又吊又打，惨得很啰。

老威：这是土改的哪一阶段？

郭正洪：1951 年，清匪反霸过了，减租退押当中。当时粮食大涨价，政府命令我家交公粮，一年 9000 多斤的定额，给不起，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去变卖抵押，值钱的，不值钱的。先是首饰、细软，后是桌子、板凳、床。柜子上的铜扣忍痛撬下来交了，过一阵，实在没法，才交整个柜子。唉，门槛都交了，农民协会还不罢休，将我母亲连斗三天三夜，跪倒压杠子，昏过去也打，醒来也打，就是不准合眼。

老威：当时你母亲多大？

郭正洪：59 岁。

老威：算老人了。

郭正洪：管你老不老，挤干为止。本来按政策，我家是自耕土地，每年要向指云寺交租，顶破天也就划个富农。可工作组是外来的，不了解情况，一切就任由贫雇农主席团宰割了。地主帽子乱套，你不承认就暴打，还问你：为啥不老实？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嘛。我父亲一直关了大半年，等到地主帽子戴实了，才放出来。

老威：划阶级有硬杠啊。

郭正洪：不错，对富农实行征收，对地主实行没收。所以多划地主对大家来说，意味着多分财产。穷人咋能不积极？斗垮你，你的就变为我的。毛泽东指示可以过左，啥子叫过左？就是够不着地主，可以通过斗争，搞成地主。当时我有个堂妹在区委工作，曾摸黑回家找到我：二哥哟，人家说啥都认账啰，运动中过左，哪怕弄死人，大方向都是正确的。

老威：你没挨斗吧？

郭正洪：没有，上头有父母顶缸嘛。土改时，我已输成穷光蛋，家徒四壁了，但作为地主子女，仍要背整个大家庭的黑锅。

老威：听说你曾被劳改？

郭正洪：那是 1957 年反右期间了。

老威：农村也反右吗？

郭正洪：城里反右，农村组织学《人民日报》，没右派？就把四类分子弄来斗争，算解放前的旧帐。我和张进谦就在这个时候被揪出来……

老威：我记起来了，你就是张进谦提过的那个胆小鬼老表。你经不住恐吓，把啥子陈谷子烂芝麻都坦白了，可政府却没有从宽……

郭正洪：这老狗还说了我些啥？

老威：他还说你一直都在抖，抖，尿都抖裤裆里了。

郭正洪：哼，他狗胆包天，他抵赖到头，差点叫打死逑了，刑也没见比我少判。

老威：听说他扇了法官一耳光？

郭正洪：可转过来就多挨了几百拳头。

老威：他的罪名呢？

郭正洪：除了参加国民党和“放水淹秧田”，还有他老子张永生纵子行凶，唆使张进谦本人殴打贫农李继魁致残。

老威：张进谦了不得哦。

郭正洪：那是十几年前，张进谦十几岁的时候，他家里的花牯牛跑丢了，他就在山沟钻来钻去地寻，急得满头大汗。正巧碰上李继魁坐在路边石头上耍，他就拉住问牛的下落，不料李继魁根本不买账，还开玩笑：这阵你找牛，隔会儿牛找你。张进谦气惨了，就飞起踢他一脚。

老威：姓李的滚下沟了？

郭正洪：没有。他从小就是个瘸子。

老威：哪“致残”罪名咋个贴得上？

郭正洪：有人揭发，就贴得上。嘿嘿，张进谦这辈子，吃亏就在脾气坏，强出头，死不认输。

老威：你呢？

郭正洪：我？罪名比他还吓人：充壮丁，帮国民党打共产党算一条；倒卖枪支弹药和鸦片烟算一条；通匪算一条。

老威：如此罪大恶极，该枪毙了。

郭正洪：瞎鸡巴编嘛，不承认就吊起打。我说当壮丁连枪都没放过，逃回来几乎就变乞丐了，谁相信？枪支没贩过，匪没通过，鸦片烟嘛，从丽江到中甸，是人都贩过的，因为解放前，这方水土盛产这东西，差不多当作货币在流通。可是张进谦稀巴烂的狗头榜样在眼前，我的身子骨远没他结实，统统不认账，肯定叫乱棍打死。哎哟，熬不过就认嘛，公审会一开，丽江县法院判的，他抗拒从严，8 年；我坦白从宽，7 年。

老威：没多大区别啊。

郭正洪：皮肉少吃苦啰。我跟张进谦一起长大，一起当地主子女，一起判刑，一起劳改。日他妈的土改！我在国民党手头，受够了窝囊气，到了共产党手头，反而是剥削阶级！活到 80 几，尽在受剥削，现在都撑起一把老骨头下苦力。我日他妈的土改！

老威：你俩的命运差不多，可你们的身板都硬朗。

郭正洪：张进谦嘛，有时蠢到家，有时又精到头。我们一道蹲看守所，下劳改队，在米厘铜厂，狗日的经常装病，逃避下井；到了长水铜厂，又搞成反改造尖子，人人都不相信他活得出来。嘿嘿，他硬是有 9 条命呢，现在还摇身一变，享受离休待遇了。

老威：你似乎还不太服气。

郭正洪：我和他都当过国民党的兵，可他太能折腾，一出来就东跑西颠地告状，居然撞进边纵副司令朱家壁家里去喊冤，去要待遇。脸皮太厚了。

老威：不能这么说人哦。

郭正洪：总之，张进谦是出了名的“八张嘴”，从石鼓到劳改队，没有人能辩过他。所以朱家壁一听他是边纵 7 支队的兵，就同病相怜，亲自出头帮他恢复党籍，落实组织关系。因为边纵被打成“土匪武装”，大伙死的死、亡的亡，朱家壁虽为中将，也含冤几十年，直到 80 年代平反，已经风烛残年了。这张进谦捡了个大便宜，第一个就跑我家来报喜。本是一个槽里拱食的猪，转眼间他的级别也高了，水平也高了，硬是飞黄腾达，忘了自己爹妈是谁，也忘了眼前站着知根知底的老郭。还边喝酒边给我唾沫横飞地乱吹，说啥子我的平反也包在他身上！给地富分子摘帽是中央的政策嘛，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中央的政策嘛，毛泽东死了，邓小平出山嘛，跟你小小张进谦有鸡巴关系？你能左右国家的大形势？

老威：你没必要较真嘛。

郭正洪：穷途潦倒就来找我，还说我沾他的光。这一次，我没对他客气，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说：姓张的，我以前咋从来没听说你是地下党？他愣了一下，我又说：你因为作风问题，从维西电台被部队资遣回家，啥子都抹光了嘛。他气疯了：与自己的娃娃亲婆娘约了几次会，就是作风问题？还不是因为他妈的地主家庭牵连！政治迫害！懂不懂？

老威：你们翻脸了？

郭正洪：没有他张进谦，我也平了反，不实之词全推倒。

老威：依你的性格，劳改不会吃啥子亏。

郭正洪：1964 年我就刑满，遭强迫留场就业。

老威：劳改犯人和就业人员有啥子区别？

郭正洪：一个叫犯人一个叫职工。到了文革，又没区别了，统称“反动派”。挖煤、修铁路、搞建筑，我换的单位不比张进谦少，直到 1985 年，才算正式退休。

老威：平反补发了多少钱？

郭正洪：没有一文钱。

记忆随风而逝

好几个月了，我住在苍山的脚背上，眼前是拔地而起的古塔。塔尖刺入的天，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云密布，犹如人的记忆——裂缝般的长廊，从天边外，从浑沌的幼年哇刺延伸过来——继续延伸，雨季就到了，苍山和洱海之间的云团变脸更快，五、六分钟的晴，七、八分钟的阴，风雨交替，来得比扇耳光还猛。每当此时，数不尽的面孔，活人或死人、陌生或熟悉、过去或现在的面孔，就从窗外不期而至，比耳光还薄，比耳光晃动得厉害，逼迫我赶紧低头。

再次抬眼，窗口已万籁俱寂，墨色深重。回到文字里，竟不晓得何去何从。叹息几声，想起《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也这么声声叹息，躺倒在类似我身后的一张床上，半梦半醒地涂鸦，遂成意识流的世界名著。自 20 余岁，我就发誓要啃完它，以领略人类记忆涡流的奥秘，可如今 20 余年又过去了，我不仅没啃完它，且连啃的心劲也流逝了。

再过 20 余年，我就差不多接近自己曾采访过的那些土改老人的晚境，创作记忆之书的 36 岁的普鲁斯特却还留在原地，犹如灰尘密集的古代天空——谁统计过，在几十亿人类中，坚持啃完这个短命鬼的可有 100 人？

凤阳邑是个百年古镇，位于大理古城和下关新城之间的公路边，却极少有外来者光顾。凤阳邑头顶数十米，有座破落的千年小庙，叫法真寺。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一次次去那儿晃荡，与唯一的和尚混成熟脸。后来和尚去他乡云游，接手庙里日常事务的，竟是一个 22 岁的美貌尼姑！经常有一帮男女居士环绕左右，不作什么功课，却其乐融融，状若神仙之游。

我也邀约友人，庙前庙后，凑了不少热闹。一日在下山途中，巧遇赶牛老者，顺嘴东拉西扯，就套出其名为“金德尧”，73 岁，土改那年 18 岁，家庭成分贫农，曾参加民兵，还奉工作组之命看管过地主，“诉苦，开大会，拿枪托子逼他们交出财产”。

我大喜过望，欲顺势做个访谈，无奈坡路短暂，转眼就拢凤阳邑村口。天已擦黑，分手在即，幸而老者遥指暮色苍茫下的石板小径说：改天你来吧，一问我名字，全村都晓得。

2006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10 点，我与刚拍完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像老骥一道，依约重返凤阳邑。经了解，才晓得这是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著名村落，由于马帮往来稠密，曾经十分繁荣——可如今却落得十室九空，原因不是瘟疫，而是长期滥砍滥伐所造成的山体滑坡步步逼近，已经在两三年前酿就屋毁人亡的惨剧。

从村头至村尾，有近千米经马蹄和人脚反复打磨了百年的石板路，锃亮如铜

镜。两旁门庭倾颓，荒藤绕墙，我们像强盗一样肆意进退，双臂搂不住的石柱、石梁，以及由云南高原特有的粗砺红土嵌砌的墙面随处耸立，如伤痕累累的顽固斗士，支撑着崩塌或即将崩塌的青色瓦顶，还有笼罩着一片片瓦顶的庞大山丘。老骥屏住呼吸，持摄像机在半人高的败草中游弋，却被隐蔽的砖头绊了一下，屁股嘭的着地，虚惊出一头冷汗。为了给先入为主的蛇和其它爬虫打个招呼，我偶尔掏出美国带回来的山地口琴，呜呜吹几声，引起有一沓没一沓的鸟儿回应。

谁也没料到，如此风景还有人烟！一个身着绿军装的疯子从塌了一半的屋檐下露头，啪地行个军礼，然后向我们查验证件。我们笑了，果真摸出《身份证》。疯子呲出大黄牙，不知算不算笑，却将十几个证件在阶沿上一字排开，计有《身份证》、《士兵证》、《复员证明》、《外出打工证明》、《劳改释放证》、《离婚证》、《独生子女证》、《暂住证》、《病历证明》、《拘留证明》等等，老骥依次拍摄了。我心生慈悲，摸出 100 元人民币递去，岂知疯子不爱财，竟一把打落尘埃，直令我等俗众无地自容。

躬身退却，记起昨日与赶牛老者的约会，我们就奔村子中段人烟密集处而去。的确，每个人都晓得“老民兵金德尧”，可又指不出具体的出处。磨磨蹭蹭抵达“老年活动中心”，迈入门槛，屋里却是一窝青壮年，正闹闹嚷嚷围住一张八仙桌打扑克，又是四川人发明的“斗地主”。我不禁高声问：你们晓得啥子叫斗地主？没人回答；我又问：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呢？也就是划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中农？还是没人回答。

不过还是安静了片刻，我瞅见有人在挠头皮，似乎在思索；有人悄声嘀咕：陈谷子烂芝麻，哪个记得住哦。

接着我了解到，这些青壮年目前都住在新城下关附近，不知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相约回凤阳邑探亲，因为还有一部分长辈舍不得离开这百年故土，晚辈们隔一阵就返乡聚一下。当然，也有没钱建新房的家庭，就只能提心吊胆地暂居危邦了。

格外古朴的阳光从外面探进来，我们跨出门槛透气，却正巧与阶下闲逛的金德尧老人碰个正着。我急忙迎上前，连声寒暄，不料对方反应平淡，急得我拼出娼妓迎客般的强笑，重拾两三次昨日话题，均被置之高阁。于是我采取迂回战术，厚起脸皮要跟定去“登门拜访”，可人家仍旧笑模笑样地不接招。

幸好我穿过老民兵的肩头，认准了更老的一群——他们都蜷缩在一小块空地里晒太阳。空地中央有一颗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周围是枯草凄凄的老房顶，从相机镜框里看，那一颗颗凝固不动的陈年脑袋似乎就挂在屋檐下，犹如枯涩的果实。我拍了几张照片，来了点感觉，就放过老民兵，冲着最老那颗果实而去。

这是一个戴白框眼镜的长眉罗汉，连头带脚，活脱脱一根千年人参。果然，他叫戴作，公元 1921 年生，属鸡，大理中学毕业，为凤阳邑村年岁最大文化最高之尊者。由于耳背，我对他的初步提问近乎声声呐喊：

晓得土改吗？晓得嘛。你家啥子成分？上中农。就是富裕中农，接近富农了。没上线啰。参加过斗地主吗？贫农、雇农、下中农才有资格，我没资格。大会总参加过嘛。啥子大会？清匪反霸的大会，减租退押的大会，多了。在七里桥乡开会，凤阳邑归七里桥管。清匪反霸枪毙了几个，乡长、团长，副团长、保长……可以详细一点吗？你说啥子？可不可以详细点？详细？晓不得。凤阳邑村 4 个社，就没有叫“详细”的人。我是说……我听得懂你的四川话，云南、四川、贵州的口音差不多啰。凤阳邑有几户地主？一个社两三户，加起来有十几户吧。斗争他们吗？打他们吗？毛主席的政策，斗垮他们的威风嘛，反压迫，反剥削，劳苦大众翻身做主嘛。你觉得毛主席的政策如何？对的，永远是对的。邓小平的政策呢？对的，永远是对的。毛的政策和邓的政策打架呢？嘿嘿，永远是对的。现在这儿还有地主吗？1979 年就揭帽了，哪还有地主。我是说住在本地的。都死了，没死的也搬走了。他们的儿女还在不在？晓不得。老人家指个道，我去找找看。晓不得。晓不得？晓不得。你是不愿意说吧。老糊涂啰。糊涂好哦，糊涂可以长命百岁。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风调雨顺，儿孙满堂，我 85 岁还不哮不喘不咳，日子好过。

可以当选村中红色秀才了——我嘀咕一句，接着转向左边的老人：

你是哪年出生？1942 年。哦，土改那年你才 8 岁，有记忆吗？一点点。你的名字？杨写。是吗？这位老人家叫戴作，你叫杨写，凑拢来就是“写作”，真有学问啊。都是私塾先生取的。那你在旧社会读过书？启过蒙的。《四书》《五经》学过的。你家不算穷吧？我半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家里剩下爷爷、父亲、姐姐和我，耕种 7 亩多地，挺辛苦的。后来经常忙不赢，误农时，庄稼收成不稳定，就出租部分给别人。于是到了土改划成分，我家就是“小土地出租”，相当于上中农。你参加过斗地主吗？我太小了。不过也晓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党和政府依靠的都是贫下中农，管制四类分子。怎样管制？打他们，要他们低头认罪，向贫下中农投降。这跟母亲打孩子一样嘛，说到底还是爱护嘛。地主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毛主席在九泉之下听了可不依哦。哪我不说了。当时太小了，记不得。

日头当空了，好几个老人抬头望望，低头溜溜，作出撤退的样子。我见状有些着急，就站起来伸个懒腰，兜着圈儿搭话。斜对面那个老头也像千年人参，瞅上去与戴作一般大，一般有内容。于是我抖擞精神趋前，嗓门逐渐加大，终于类似轰炸机；可对方如特殊材料造就的桥头堡，永远巍然不动，甚至连眼皮都不抬——原来是个聋子。我只好举起相机，以树杈和蓝天为背景，记录一下他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紧接着的受访者叫杨彪，近 80 岁，不是聋子，可比聋子还不如。成分？下中农；土改？忘记了；斗地主？忘记了；分田地？忘记了。可是你说话还好？说话还好，就是说了就忘了。

说了就忘了？我颇为不满地高声反问，不料周围全都点头称是。无奈之下，我试图抓住最后的稻草——他叫杨吉，74 岁，贫农，当过民兵。我问土改，他干脆答当时不在家，没参加土改。我愕然：怎么可能？他也愕然：怎么不可能？我在下关街上打铁，连凤阳邑的会也没来。

我呆如木鸡，陷入木鸡阵中。老骥早已收妥摄像机，拉了我几次衣角，方惊醒一般还魂。

我们如败兵，沿锃亮的石板路走向村尾，残垣断壁接踵而至，阳光如密不透风的红樱矛头扎在上面，浸出了斑斑血渍。爬虫般的攀墙葛藤被大块大块的红色所笼罩，竟燃烧起来。

万籁俱寂的燃烧。幻象的燃烧。我分明瞅见普鲁斯特及其《追忆似水年华》均在虚无的火苗中灰飞烟灭。人心的坟场啊，难怪山体要滑坡。

在 2006 年底的中国，一个村庄的落后记忆就这么随风而逝。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上）

前　奏

2007 年 1 月 5 日深夜，阴雨绵绵，我从北京赶回昆明。松弛一天，与冤案线人孙医生碰面。他刚为一个农村病人动完大手术，面露倦容，可依旧答应按原定计划南下西双版纳。

我内疚不已，本要请一顿饭，弥补少许，可席终之际，人家却瞅空子付了款。罢罢，这个谦卑到家的基督徒，有时弄得人浑身不自在。就是怕你不自在，他笑道，我的餐前祷告才免了。

接着敲定，双方于次日早晨 8 点半在某处汇合。可当我准时抵达，孙医生却不见踪影；半个钟头又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我好生纳闷，因为孙医生的守信近乎刻板，难道……

坐过牢的人，遇事都习惯往最坏处琢磨，于是连拨几次电话，不通。正六神无主呢，孙医生却突然在对面街沿浮现！我大叫一声冲过去，却忽略了环绕他的五、六个泥腿子。稍后了解到，他 7 点钟就与相约登门看病的农民们打交道直至当下。

我好奇地询问诊费及药费几何？孙医生哑然失笑，指指办公桌下持续动弹的肥料口袋，定睛一认，竟装着两只土鸡。他们非要留下，最后都冲我发火了，孙医生解释道。可我没时间弄来吃，只有送人。

时光倒流啊，我感慨道，好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们就时兴给村里的赤脚医生送鸡送蛋，折抵医药费。

是啊，孙医生一本正经道，那就将这份源远流长的朴素情感，转赠威老师你吧。

我吓了一跳，旋即哈哈大笑：可惜时间不够，要不就煮熟当路上的干粮。2007 年 1 月 7 日上午 9 点 40 分，我们登上昆明至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大巴，估计途中要耗去 10 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一落座就作好打瞌睡的准备。而孙医生始终瞪着双眼。开头我还以为他在西双版纳当过知识青年，如今有故地重游的兴奋，却不知这是人家根深蒂固的毛病。

高速路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汽车飞驰，可感觉上的时间却枯燥而缓慢。我打了好几场瞌睡，惊醒时，孙医生总是及时应答：还早。不禁想起我的六四牢友李必丰和杨伟，还有吴嗣渝，都沿这条路线没命逃亡过。杨和吴成功了，却因是无名小卒，先后在泰国曼谷滞留好几年，躲躲闪闪，跟叫花子或蟊贼的处境差不多。杨曾投奔美国驻泰使馆，要求避难，被扫地出门；吴曾投奔联合国驻泰政治难民署，几度申请被挡回，差点叫警方递解回国。幸而两个家伙均得到民运权威刘青、徐文立等人的反复证明，方勉强落脚——而他们的先驱李必丰，越境 4 次均未遂，有一次，已深入缅甸边境数里之遥，却被缅共的游击队捉住送回，几乎叫边防军活活打死。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多年前就高声疾呼"无权势者的权利"，可直至如今，事实证明"无权势者只有被宰割的权利"。正如我在《证词》里所写：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颠簸了 7 个多小时，我们在一个叫普文的小镇下车。虽是冬季，高速路两边仍郁郁葱葱，微风暖洋洋的，霎时就洗尽旅途的疲惫。出了收费站，一望无际的香蕉林扑面而来，我们跟在几个傣族妇女的身后，似乎在异国风情里陶醉了几里路，方抵拢普文有些喧闹的镇口——原来有人办喜事，破破烂烂的饭馆里外，至少聚了上百群众。我是改不了凑热闹的顽童天性，可刚嘻开痞子嘴，就被孙医生拽上一辆机动三轮。时间不早了，他说。

同中国若干偏远小镇一样，这种屁股嘣嘣冒黑烟的三轮就相当于都市出租车了。我和孙医生在车棚内相对而坐，弓腰抵头如两个密谋者。街景单调乏味，清一色的两层筒子楼，旧不旧，新不新，洋不洋，土不土，而且垃圾成灾。给人的感觉如十几年没洗脸的老娼妇，还敢大模大样地当门接客。幸而街道转瞬即逝，我们又在大片浸透太阳之血的耕地之间狂奔约一刻钟，才在一岔道口嘎然而止。

继续沿左边的土路深入，就是普文农场 4 中队的地盘。原来，普文镇的过去就是一个容纳几万犯人的超级劳改农场，分 6 个大队；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才逐渐在劳改就业人员及家属的基础上，发展或蜕化成一个普通乡镇。

耕地间的几道铁丝网早已锈蚀，与之勾连、配套的兵营、岗楼早已废弃，因此我们得以长驱直入。最里的平房老化得更快，墙面起泡起壳，瓦顶在阳光的反射下，如大片嚣张的牛皮癣。可占据整面墙的标语显然是新近刷上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羚羊般跳跃着，穿越排列整齐的平房群及臭水沟，我们直趋寻访对象——胡成章、肖秀云老两口的家，正巧在“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招牌旁边。这是和“与时俱进”的大环境严重脱节的居所，隔着水泥晒坝，一边是历史遗留的老寝室，一边是自己搭建的比老寝室还破的厨房。孙医生随意招呼了一声，一家人的脑袋就全部从几道门内探出来。

在交代采访正文之前，有必要将孙医生于途中断断续续的相关叙述拼凑呈现，以便大伙搞清楚来龙去脉。

孙医生的讲述：

98 年以前我就来过，当时胡成章大爹还很健康，很健谈，成天乐哈哈的，一点不像在劳改队呆了几十年。我们一见如故，劳动之余还一起打篮球。大爹的口琴也吹得不错，把我带回在版纳做知青的年代，大爹不是知青，不晓得他跟谁学的。

自土改始，大爹全家就倒霉透顶，至于如何倒霉透顶？他没有细谈，我也不便追问。我们的话题多半是普洱茶，周围的人都说，大爹懂得完整的制茶工艺，经过他的手调配出的普洱茶，味道就是与众不同。也许有人会说，普洱茶嘛，就是年头放得越久越好，没得什么工艺不工艺，其实不然。我喝过大爹家的普洱茶，那种绵绵长长的口感难以形容，与之比较，市面上卖的那些包装精致、价格昂贵的东西简直就不叫茶。

大爹祖籍镇越县易武老街，那儿从古至今，都是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不大的城镇，几乎家家都制茶，而大爹家更是招牌传了几就代的老字号。大爹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头脑灵活，眼看能将家学家传发扬光大，不料解放了。接着世事沉浮，家族蒙冤，这一家三代不得已从祖籍易武迁徙到流放地普文扎根，转瞬数十年不思茶味矣。

大约前年吧，我向美国来的吴医生推荐大爹的茶，人家很感兴趣，想投资扶持，改善一下他们的贫困处境。可大爹却不行了，我和吴医生千里迢迢赶来，与之脸对脸，他也没认出我是谁。据他 53 岁的大儿子胡俊忠讲，莫提普洱茶，更莫提口琴、篮球，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好半天呢。

正　文

老威：这是孙医生，你不认得了？

胡成章：哦，哦，好像面熟嘛。

孙医生：大爹啊，我已经来过好几次。

胡成章：是么？我想想。

老威：老人家怎么成这样的？

胡俊忠：1998 年的一天， 我爹正在修理机器，突然之间高血压发作，倒地上了。我们急忙赶过去，抬着送医院。我爹口鼻耳都出血，很稠很稠的血，随手就能抓起来，稍后小便也失禁，红彤彤地淌，浑身还不由自主地抽搐。

医院全力抢救，我们两人一班昼夜监护，我爹深度昏迷 8 天，才好歹有了动静，逃脱鬼门关！12 天头上，我爹就如幼儿一样，咿咿呀呀，似乎在吃力地学着说话；13 天早晨，他能自己下床了，可目光闪烁，变得很生疏，居然问我——他的儿子是谁？母亲进门，也愣愣地叫不出名字。原来他的中枢神经受损，造成绝大部分记忆力丧失。

老威：能恢复吗？

胡俊忠：又过去 8 年多了，身体倒是逐步好转，能吃能睡。

老威：我看举手抬脚还是显得僵硬，走路也颤巍巍的。

胡俊忠：只有靠打针吃药控制。记忆力嘛，也恢复了一点点，比如孙医生来了，他还是觉得面熟；今天这一两个小时内，做了啥子事，见了啥子人，他暂时晓得。至于明天晓不晓得，就不敢担保了……胡成章：你们是客人，我咋个不晓得？有时候，忘了，又没忘。

老威：啥意思？

胡成章：比如我原籍易武，13 岁就到过泰国；我们家解放前，制过茶，赶过马帮；我的爹很厉害，参加过地下党，打游击，镇反时却遭枪毙了，冤枉哦。我们家好象是商人？我是咋个判刑劳改的？记不得了，混乱了，脑子里如一锅稀饭在翻滚，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我还会吹口琴，在劳改犯中算多才多艺，可现在忘了；我制的普洱茶可以吹牛啰，几辈子的家传啰，也记不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禄劝县马鹿塘山沟里一个老地主，80 多岁了，跟你一样失忆，不，一回忆就头疼。

胡成章：我不头疼。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搞不清。嘿，这个医生姓啥子？我又记不得了。

老威：孙医生。哦，老人家，你生于哪一年？

胡成章：有印象，可是想不起了。

肖秀云：他 1933 年生，我 1931 年生，我 12 岁就跟他订婚，16 岁就嫁了。

胡俊忠：这位老师远道而来，不容易，就不要东一句西一句地浪费时间了。家里的血泪账明摆着，父亲失忆，还有我啰。

老威：可你临近解放才出生。

胡俊忠：十几岁开始，父母就不厌其烦地灌输“革命家史”，即使不愿意听，逐渐也烂熟于心了。如今看来，冥冥之中有一种预兆吧？

老威：弄不清。上苍的安排谁也弄不清。

胡俊忠：我们家还保留了一本家谱，从上面看，我们家源于安徽省徽州，不晓得是由于战乱还是戍边，迁移云南。先落脚建水，后转石屏县宝秀镇，直至曾祖父上一代，才扎根易武老城，靠茶叶和马帮生意发达起来，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我们家在茶马古道都算有点名气，可到了祖父胡顺光手里，已家道中落。哦，不止中落，简直就衰败了。曾祖父死得较早，所以祖父小时候没钱念书，几岁就学制茶，并且替马帮赶马。当时的茶马古道，上至昆明，下至境外老挝的乌德、朗塔、打七岭，缅甸的鸣善、景洞、仰光，还有泰国的曼谷。由于祖父长年累月出入边境，加之头脑灵活，因此 20 来岁就会几个国家的十几种方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就更不在话下。有一年，仗着自己是“活地图”的祖父，拿出多年的积蓄，邀约石屏的表弟一道“自立门户”，不料拢橄榄坝时，马群染上血吸虫，全部害病死掉。有啥办法？茶叶不会自己长腿，只能眼睁睁地赔光老本，各自回家。

老威：你祖父算资格的劳动人民嘛。

胡俊忠：大约在抗战前夕，易武的几个小商人合资拼凑一个股份制马帮，他们拉上我一贫如洗的祖父，答应他用劳力换取一份干股。这样，驮茶叶出境，驮洋货入境，拼死拼活两三年，祖父他又起死回生，有了属于自己的七、八匹马。跟着大马帮走，不求多赚，只求稳赚。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东南亚，茶马古道叫封死掉，马帮赶不成了，祖父就转行做其它生意，波折不大。

转眼到 1948 年，四处都闹共产党。 当时在易武最有影响的人物叫王少和，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自石屏宝秀迁到易武，后家道中落。王少和与我祖父年龄相当，经历也相似：打小没念书，去制茶、跑马帮、贩烟土，懂多种方言，做越境生意。不过人家更会走上层路线，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被推举为“镇越县抗日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稍后又当区长和土司代办，最后出任县参议会参议长兼国大代表。

老威：你祖父望尘莫及啊。

胡俊忠：易武多少年才出一个王少和哟！该人家心高气傲，连云南省主席委派的县长也不放在眼里。拿现在的话说，就叫“地方对抗中央”。所有政务及诉

讼，都得经过姓王的，才行得通。县长气疯了，出动保安团，以“包庇种烟，武断乡里，任意浮摊滥派，擅理行政司法”等罪名抓捕王少和，镣铐加身，打入死牢。却不料王少和神通广大，居然在狱中与社会各界频繁往来，聚集武装，策划了一场推翻县政权的暴动，将县长和法官都砍了头。

火玩大了，王少和的暴动武装不得不改换门庭，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接受整编。成立了党领导的反蒋的“人民自卫军”，与国民党打游击，代价惨重，连自己的家眷三代 6 口也遭杀害了。一直到 1949 年 9 月，王少和任总队长、李衣人任副队长的“江越支队”才被正式并入“边纵”9 支队；10 月易武解放，王少和终成正果，任镇越县首届人民政府副县长。

老威：这跟你祖父有何直接关系呢？

胡俊忠：我祖父就是王少和手下的经济委员啊。1951 年镇压反革命时，王少和刚率团去昆明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代表大会不久，正风光呢，不料转眼就被抓了。严刑拷打跟着上，要逼他交代“历史反革命”和“组织土匪武装”问题。

老威：我曾听说整个边纵，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都被定性为“土匪武装”，直到 1984 年才平反。

胡俊忠：等不到了，王少和进普洱监狱才 3 个多月，就莫名其妙地“病死”，终年 50 岁。他的部下，还有地方上与他有牵连的，好几百，全被当作土匪镇压掉。人变鬼，当然不需要平反。你看，我祖父的《平反通知》在这儿，简单几句话，就值一条人命啰。

老威：请说说你祖父的具体遭遇。

胡俊忠：1948 年的劫狱暴动成功后，王少和亲自找到我祖父，拉他入了伙。当时的“江越支队”有 400 多人，军需是个大问题，我祖父当经济委员，说白了，就是负责筹枪、筹粮、筹款。

老威：你祖父的能耐不小嘛。

胡俊忠：他有《华侨证》，还掌握了一个马帮，经常出入法国人控制的老挝和英国人控制的缅甸，贩卖烟土、枪支，轻而易举就能逃过检查。

老威：跟现在的跨国毒枭差不多。

胡俊忠：不一样啰，如今为了干经济，过去为了干革命，个人不会私吞一分钱。我祖父出生入死，也算立下汗马功劳。直到 1949 年 9 月，经过半年改造的江越支队并入“边纵镇江整训总队”，四、五百人缩编为 120 人，四分之三被遣散回家，我祖父也随大流从江城回到易武。

接着云南全境解放，上面派来由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组织学习，大家都

还摸不着头脑。有略知共产党政策的亲戚，曾偷偷劝我祖父一起弃家逃命，可当时拉家带口，哪能说走就走。况且老人家有些底气，心想：撇开革命功劳不提，我在本地也算声望较高的开明士绅嘛，大不了再贡献点财产出来。

嘿，这一念之差，脑袋就飞了。1951 年镇反运动，我祖父，以及“江越支队”所有在岗和遣散的人员，都琅铛入狱。

老威：为什么？

胡俊忠：刚成立的镇越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并报上级核准，认定以王少和、李衣人为首的江越支队是土匪恶霸武装，正积极筹备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暴动。

老威：可有证据？

胡俊忠：镇压反革命是有任务和指标的，无处下手？哪先秘密逮捕两个江越支队的成员再说。跟着突击审讯，大刑伺候。两人熬不住，就狗咬狗，引起更多的狗被咬被抓，案子就越滚越大了。啥子“总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啥子“接头时间、地点、暗号”，啥子“纲领和组织系统”，啥子“枪支弹药从哪儿取”，等等，编得活灵活现，其实屁事没有。

老威：几十年后又来平反昭雪啰。

胡俊忠：几百号人，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我祖父是“暴动骨干”，解放前两年就埋在老挝境内的枪支被挖出来，拍了照。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接下来，我们家的财产、房屋也被没收。

老威：“土匪武装”全军覆没？

胡俊忠：凡是有点家底、有点积蓄、有点声望的，都难逃法网，人财两空，亲属还要受几十年的株连；只有穷得就剩一杆枪的，才作为“受蒙蔽群众”教育释放。还是要讲究“阶级原则”啰。

老威：唉，王少和一干人以劫狱暴动起家，最终却死于反革命暴动罪，算一种因果轮回吧。真叫冤枉的是你祖父，47 寿终，人还没活明白。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下）

插　记

天擦黑了，最后的晚云如一只断手，拖着斑斑血迹，终于隐没在倾废的岗楼上空。水一般的凉风漫上台阶，我们随即退至室内。孙医生将好几瓶国外的药放在桌上，又低声唤胡俊忠过去，一一叮嘱。而我这厢，肖秀云大妈刚刚提起忆旧

的兴致。由于音调低缓，状如喃喃自语，我只好欺上前，将录音机凑拢她的嘴角。而哲学家一般的大爹凝视着门外的夜色，不知在想什么，难道一个失忆的脑袋深处，还有另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世界吗？

灯光昏暗，六、七平米的狭窄空间堆着六、七个人，连身子都转不开。可此刻的氛围却显得鬼魅，似乎还有些我们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在往里面涌。远远有幽幽之音传来，又像歌声，又像脚夫的吆喝声，刹那将我带回童年的乡间，老地主爷爷，不太老的爸爸，与我脸贴脸，如两三堵凑在一块的墙——然而他们是那么远，比我感觉到的幽幽之音更远。

有记忆的大妈继续说着，没记忆的大爹想说，却说不出，他们在一起共了几十年患难，为什么呢？

正　文

肖秀云：自 16 岁嫁到胡家，就没过啥好日子。公公是赶马经商的，没种过地，也没地可种，住的是土坯茅草房，家具也比较简陋。稍后有点积蓄，才在易武老街开了个铺面。边疆地区啰，大多数与我们家类似，不特别穷，也不特别富。

老威：我查过西双版纳的整块地图，发现镇越县，也就是如今的勐腊县，与老挝的边界线长达 600 多公里，而且杂居着傣、汉、彝、哈尼、瑶等多种民族，尽管习俗习惯南辕北辙，可共同点是生存不依赖田地，而依赖越境边贸。真不晓得汉族人发明的土地改革在这儿怎么搞？

肖秀云：上面派的工作组一直都在啰，可是划阶级成分已经 1956 年的事。

老威：这么晚？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呢？

肖秀云：1951 年镇反，随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没咋个搞，好像政策还是学习过。少有人种地嘛，连村长、保长都住茅草房嘛。我们家是小商人，相当于中农。

老威：易武是县政府所在地，地主、富农多不多？

肖秀云：旧政权手头当过官的，有势力的，地方上说得起话的，做得起慈善事业的，枪毙剩下了，不管有没有土地，都摊派个地主给你当。你还敢不要啰？易武老街的汉族大姓，王、黄、刘，就划了十几家地主。对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先还客气，在政府里安插个职位，可某一天毛主席的指示下达，该翻脸就翻脸，打下去，照划剥削阶级。哎哟，跟我们家也没啥区别嘛！土改之前，他们的房子、牲畜、财产被没收，我们的财产、牲畜、房子也被抢得光光，每次开斗争会也挤在一块。好像反革命家属中，划贫农的也有，你说这个王少和死鬼，牵扯了多少人？

老威：你见过王少和吗？

肖秀云：一条街上的人，与我们家来往多。1948 年暴动，杀国民党县官，街坊邻居都去了嘛。脚跟脚，共产党政工队就来了，与王少和他们打得火热，大张旗鼓，同国军干了好多仗。江城县的李衣人又带齐人马，上门搞联合，成立跨县的“江越支队”。

老威：也就是后来的土匪恶霸武装。

肖秀云：公安局搞的大冤案啰！小小易武，一镇三乡，六、七个村，就杀了 100 多，连政工队（解放后编入工作队）的人都杀了好些。有的集中杀，有的分散到各村去杀，有的开会公审，有的就黑灯瞎火，一脚踢出去崩掉。血浆子将溪沟都染透了，鱼也喂肥了，白愣愣朝沟坎上跳，可谁也不敢去捡。我记得公公被

杀是三八妇女节以后，清清楚楚的，头天就在几条街反反复复敲锣通知，当当当。胆小的藏在窗后偷看，胆大的就窜上去拦住问：杀几个？更夫横起砸一锤，当！然后爆着青筋吼：6 个！问的人猛拍两巴掌，也爆着青筋跟吼一声：6 个啊？又是 6 个！

我们家大小都没睡着，熬啊熬啊，月亮起来了，星星更亮了；月亮没得了，星星没得了。起一阵风，接着就没风，蟋蟀和青蛙倒是吼得狂。公公他们天不见亮就被五花大绑，听说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就押到学校坝子里去。嘿，那口老远就能望见的大铁钟，还是公公他捐款铸造的呢。

老威：这批杀的都是江越支队的游击战士？

肖秀云：有江越支队的，有商人，也有小学校长、老师。都做了冤鬼，30 多年后又平反昭雪，没一个有罪！特别是公公，下到阴曹地府，会让国民党的冤鬼笑掉大牙：哼哼，良民不做，帮共党杀我们，结果报应眨眼就到。

老威：当时你在枪杀现场吗？

肖秀云：屋里躲着啰，大儿子刚生不久，正坐月子。小脚婆婆还在，胡成章又被抓了，家中就没个撑得起的。哎哟，那口号声啰，那排枪的嘭嘭声啰，吓得我们抱成一团，抖个不止，哭个不止。后来听人讲，是开完会，架到老街外的溪沟边杀的，齐刷刷地倒，全部射成筛子了。哎哟，都是易武街有名望的人物，可不可惜！

尸体是请亲戚帮着埋的，坟包包两三年就平了。究竟在哪儿？以前晓得，现在就不清楚了。易武街周围变化也大，盖的房子也多，估计那么多尸骨都垫了基脚。

胡成章：爹的尸体我没见着啰，我被关起啰。

老威：为啥关你？

胡成章：受连累。

老威：为啥受连累？

胡成章：记不得。

肖秀云：他被关了 1 年多才放，家里就剩婆婆、我、侄儿侄女。大儿子 1 岁出头就死了，出麻疹没过关，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大儿子是 1953 年出生的“假老大”。那时候，民兵三天两头来扫荡，屋里啥子都没得，锅碗被砸掉，东西就用树叶裹起，烧熟了吃；床叫抬走了，只好铺几把草，睡地下。多余的布片片都拿走，房顶捅出十几个大洞，漏雨，把我和婆婆都整成了医不好的风湿。哎哟，所以到了 1956 年土改，我们家已经成原始人，比贫农还贫农，还分了一点点地呢。

老威：也就走个形式啰，因为全国统一的土改已结束几年了。此前这儿搞的“杀人分赃”算是“不叫土改的土改”吧。

肖秀云：瑶族和哈尼族住山坡山脚，刀耕火种，根本就不用土改；傣族住勐仑、勐腊、勐捧三乡，从古至今都受头人、土司管辖，种不种地没多大关系；还有彝族、汉族，很多人就不会种地，有就吃，没有就想办法弄来吃，哪存在啥子阶级剥削！划完成分，我还找过工作队，我说我们家既然不是地主富农，那么财产就该受政策保护，就该把几年前拿走的 4 匹骡子 4 匹马退赔了，损失的东西就算了，哪怕归还两匹骡马也可以。可是人家撵我，还骂我反攻倒算。

胡成章：我又第二次坐牢啰。

老威：还是受株连？

胡成章：放卫星。

老威：放卫星？

胡成章：放卫星放错了。

肖秀云：1958 年的事，人家在大跃进，放卫星，《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亩产粮食好多好多万斤，仓库都堆不下。大形势摆在那儿，毛主席在吹，全国人民跟倒吹，到处敲锣打鼓，天天在过节，天天在超英赶美。嘿嘿，你就听嘛，表态附和几句也不打紧嘛，实在不愿意，就装哑巴聋子嘛。偏偏这一位，开口就说吹牛！

老威：在会上说的？

肖秀云：反革命家属，不敢在会上发言……

胡成章：几个人私下议论，还哈哈笑，我就插了两句嘴，说山药亩产 40 万斤是吹牛，反正吹牛不花本钱。谁知这话传到公安局耳朵里，没几天就遭抓了。

老威：嘿，老人家的思路清晰着呢。

胡成章：检举材料都搜集了一摞。接下来判刑，送到普文。

老威：罪名？

胡成章：破坏大跃进的反，反，反革命，判 6 年，他们打，打我。记得嘛，还拿绳子绑，说，说不成了……

肖秀云：我记得是 8 月初 4，大女儿才 1 个月零 4 天，他就进去了。先转到思茅，最后送到这儿劳改。我喊天都来不及，又搞公共食堂，民兵背起枪，闯进屋将猪也赶走，粮食也掏空，然后宣布：私人不准开伙，谁开伙谁犯法。我的身体都要虚脱了，还得领着儿女，去食堂排队打饭。半饥不饱地拖了 3 个月，食堂就开不下去了，牛皮吹嘛，吹到头来，毛主席不饿肚子，当大官的不饿肚子，就是群众饿肚子。59 年到 62 年，3 年多，人就只有一个想法：找吃。每人每个月，供应 4 斤大米，额外的要凭粮食局的条条。不敢想哦，反胃，难受，那年头啥子不能进嘴？树皮、树叶、蚂蚁、蚯蚓，带刺的藤藤，只要不是毒药，不是大粪。接受不了，身体自然起反应，大不了呕出来。饿死掉好多人啰，连走路都要小心，免得沟沟底快脱气的人突然翻上来，伸手扯你裤脚。唉，如果没得娘家的父母兄弟接济，我们家恐怕绝户啰。我爹当时在加工厂，经常弄些带壳的糙米，得舂了才能吃。我天天凌晨 5 点起床，邦、邦、邦，舂到 7 点，才下锅熬粥。吊命啰，呜呜，吊命啰。

老威：大妈莫伤心。

胡成章：劳改队也饿死人，我跟牛一样，把铺草都吃完了。

肖秀云：劳改队死人更多，二三十岁的精壮汉子，饿得倒下去，说咽气就咽气。厉害的时候，每天有四、五个人抬出去，埋都埋不赢。几个月，1000 人的中队，就少 300 多。胡成章为啥没死？一是因为在外面养猪，稍微自由些；二是他接了个犁田的美差，他使劲犁得深深的，有时就会翻出鳝鱼、泥鳅及其它活东西，他马上捉住吃掉。后来又偷偷带火柴，设法烧熟吃。

胡成章：1964 年，我，我满刑，不准走，留，留在普文农场。

肖秀云：饥荒过了，劳改犯死得太多，大片土地荒起，于是他就留场就业了。1968 年，我们也迁过来了。

老威：易武到普文多远？

肖秀云：以前赶马要走七、八天，现在坐车要大半天吧。

老威：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呢？

肖秀云：他回不来，我们在老家又缺劳动力，饥荒熬过了，仍然吃不饱。娃娃们还小，婆婆还在，我一个体弱多病的妇道人家，只算半个劳动力。那时农村是大锅饭，工分大家评，没有全劳动力，工分就低；工分低，粮食就分得少。而

且每年还要从基本口粮里，扣除三分之一作为生产队的公济粮。1000 斤就要扣300 斤。

老威：除开大锅饭就无法可想了？

肖秀云：文革当中，天天闹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连鸡鸭都不敢多养。猪肥了要上交供销社，按国家牌价统购统销，每斤肉返还几毛钱吧。私下杀猪是犯法的，易武下面村里，有家人娶媳妇，半夜偷杀肥猪，办酒席招待亲朋好友，结果还没散席，一窝人正醉醺醺地猜拳呢，公安局就提着手铐子抓人来了。

老威：中国有《杀猪法》吗？我怎么不晓得？

肖秀云：有杀猪政策，可以当作法律的，不过比较轻，违法杀猪一头，判刑一两年。

老威：70 年代末之前，全国所有副食品都凭票供应，每人每月才半斤肉 4 两油，搞得大伙饥态百出，却不明白城镇居民的肉食是这么来之不易。

胡俊忠：那时我十几岁，正长身体，顿顿喝稀，屙泡尿肚子就空了，扛不住啊。加上书也读不成，小学教室不够，贫下中农子女得优先，我们这种家庭背景嘛，踢回家。

老威：日子没法过了。

胡俊忠：所以要迁过来，普文荒地多，劳改犯填不满，正缺人手，所以敞开接纳就业人员家属。关键的是，这儿除了警察，大家的身份都差不多，用不着互相歧视。

老威：跟你们家类似的外来户有多少？

胡俊忠：如今占农场的一大半了。母亲和祖母先到，我满 16 岁才招进来当工人。父亲正式的工人待遇是 80 年代，大约在公安部长赵苍璧讲话之后拿到的。

老威：可你们家是冤案啊。

胡俊忠：我父亲 1982 年平反，来了个通知，说 1958 年是错判，破坏大跃进的现行反革命罪名不成立，应予推翻。我祖父 1985 年平反，过程非常曲折。

老威：牵扯好几百人，当然曲折了。

胡俊忠：1951 年镇反冤案是易武的公安局局长经办的，而上级审批者是当时的江城、镇越两县的中心县委书记，姓余，石屏宝秀人。没料到，这位余书记后来也成右派，入冤狱，劳改了 20 年。1979 年刚平反恢复工作，他的一位老表就脚跟脚找上门，也闹平反——原来也是我祖父案子里的苦命人，死罪逃脱，活罪受了几十年。可能是同病相怜，或者是天良发现，余书记当即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还联络当时的公安局预审科长，国务院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等老干部共同签署，要求平冤。

老威：后来呢？

胡俊忠：王少和的生平正式写入中共勐腊县党史，最先也有我祖父的名字，后来又没看见了。易武老街许多家都接到了平反昭雪通知。

老威：有赔偿吗？

胡俊忠：我祖父 700 元，我父亲 200 元。

老威：两个冤案加一条人命，才 900 元人民币？

胡俊忠：80 年代的 900 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了。

老威：你父亲受你祖父株连，还坐牢 1 年多呢？

胡俊忠：没算。

老威：为啥没算？

胡俊忠：因为没定罪名，就平不了反。
老威：这叫什么话？
胡俊忠：哎呀，以前没定罪名就坐牢的太多了！我家三妹夫是个四川人，1959 年曾在勐养县做工，由于外出手续不全，被民兵扭送公安局，关起来集训，随后又被劳动教养两年——没任何罪名，平啥子反？找哪个平反？唉，老百姓，历朝历代都是砧板上的猪肉，横切竖切都可以啰。
胡成章：横切竖切？可以嘛。无所谓嘛。
肖秀云：啥子都记不得，吃了睡，睡了吃，你当然无所谓啰。

补　　记

告别两位老人已是深夜 10 点多钟，胡俊忠拎起一把大电筒，将我们送出“沦陷的监区”。翻耕过的土地在光柱两旁延伸，弯曲的铁丝网外，窜跳出好几条野狗，眼睛贼亮，令人回想戒备森严的昨日。果然胡俊忠说，这是进出中队的主路，以前都是几架探照灯来回扫到天亮，除了岗哨，还有牵狼狗的巡逻哨——说不定这些野狗都是狼狗和土狗乱搞，窜的种呢。
我叹息道：人生而自由，你们家却甘愿背井离乡，迁徙此地！注重精神生活的孙医生却抬头望天道：别伤感了，我相信上帝会眷顾这些受苦的人。胡俊忠说：上帝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我也说：我只看见稀稀落落的星星，跟狗眼睛差不多，天空都布满铁丝网啊。人在这个世界真是插翅难飞。孙医生沉吟道：上帝比我们看见的事物还要高，可只要你相信，他就在你心中，你就会得到一种支撑自己活下去的自由的力量。

我们又默然走了一段夜路。胡俊忠方从一堆杂乱平房里唤来一辆屁股嘣嘣响的三轮，并抢先付罢车钱。彼此依依惜别，珍重珍重。十几分钟后返回普文镇，住进一家不用登记《身份证》的旅馆。
出于外科大夫本能，孙医生谢绝了我上街觅食的邀请，立即洗澡。我在路灯暗淡得比鬼火不如的几条街兜了一圈，发现歌厅和发廊依旧敞着门，里面的小姐千姿百态，像植物标本，浸泡在红药水一样的灯光中。而在每个街口，都拥挤着青烟缭绕的烧烤摊。我目光发绿，在摊前流连了三二来回，却不敢贸然点菜——因为周围的饮食男女均为清一色的妓女嫖客，我一个光头和尚，上哪儿落座就餐才不惹人笑话？或者不招蜂惹蝶？
只好在一通宵营业的小卖部购得几包小食品，带回旅馆填肚子。孙医生已入梦了——他长期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却陪我长途奔波，还忍饥耐渴，乱了生物钟。
展开被子细细搜索，查得污渍数点，阴毛两根。没办法，明知此处曾是嫖宿窝点，也只有和衣躺倒。倦意睡之袭来，不料朦胧之间，睫毛上竟浮现梁宗岱翻译的里尔克的诗：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这村里
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
荒凉得象世界的最后一家。
……

那些离开它的，飘流得远远，
说不定许多就在路上死去……

向南，再向南

2007 年 1 月 8 日上午，我和孙医生继续南行，两个多小时以后，即抵达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走在景洪市街头，我心潮难平地四下张望，视野内当然有水桶粗的遮天蔽日的芭蕉树，有傣装妇女，有傣家楼模样的建筑，可跟我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十几岁时，读过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他自己早年的流浪经历：文弱书生，身上没几钱碎银，经常半饥不饱，昏昏噩噩，连一双垫作枕头的旧布鞋也叫更穷的房客偷去。可就这样子潦倒，他还摇摇晃晃地向南，再向南，居然从昆明一直走到西双版纳，还随随便便就出了边境，饱餐异国风情，抵拢缅甸首都仰光。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书，知名度虽然没有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之作《在路上》大，但也等于我们这代的《在路上》了。我八几年的女友某某，与我分手的前夜，还在含泪钻研《南行记》，稍后果真沿着书中指引的方向，向南，再向南。第一次叫边防军给抓住，关了半年的收容所，受够暗娼和毒贩子的折腾；第二次执迷不悟，用倾家荡产的钱砸翻了景洪郊区一傣族野导，越境成功。如今是泰籍华侨，老窝在曼谷，成都也购下房产，儿女都一双了。2001 年她曾登门拜访我，相邀进高级馆子，酒酣耳热，她劈头就批判：当年叫你跟我一起走，你死活不，结果呢，栽进了监狱！我狡辩说：各是各的，我坐牢和你越境扯不拢关系。她叹息说：你 20 几岁就送我《南行记》，可活到这把年纪，还叫共产党绑死在这儿！莫提国外了，恐怕连西双版纳都没去过吧？

接下来的江湖传说是撒娇派诗人京不特，从此地越境去了缅甸仰光，正宗的艾芜南行路线，却在异国街头浪荡之际，被警察抓进监狱，整整泡了 1 年多。据说曾与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关同一号子，后来却被充着他国劳工，由政府输出到欧洲。一波三折的命运就这样改观了——如今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乡丹麦，依旧刮一光头，很平和很滋润的样子。

再接下来，又要提到我的六四牢友，四次越境未遂的李必丰和已遂的杨伟、吴嗣渝了。李必丰是个老文学青年，80 年代就组织过诗社，不幸进了班房，脸蛋已经叫揍成一边大一边小，阴囊也时常蓬勃如馒头了，诗意还没遭受丁点影响。一本《南行记》，更是当作日日必诵之功课，搞得滚瓜烂熟。可如今的下场我已久闻：二进宫合计 12 年后，皈依基督教，出任包含临终关怀之养老院之负责人——唉，一个曾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偷渡犯，越境之心真的死了？仰或认命了？叫边防军打怕了？

杨伟和吴嗣渝的文学情结没那么重，越境前经常去我家串门，与前妻宋玉打得火热。大约我那本缺了封皮的《南行记》就是被杨伟揣跑的，而吴嗣渝要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国内版及一支箫。他俩自忖身份轻贱，竟与我八几年的前女友如出一辙，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道弃暗投明。吴嗣渝甚至往返西双版纳两三趟，亲入傣家寨踩门路，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他俩在泰国当了好几年“国际叫花子”，杨伟被中国人权的刘青弄到加拿大后，断了音讯；吴嗣渝从 2003 年至今还呆在曼谷，以下是他个把月前寄来的求援信：

威哥，你好。

前次你给法国玛丽的信是否有回音？记得她只是在一月底给我来过一次信，之后就一直没音信。期间封从德也给她转述过我的境况，但如今都无结果。

最近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泰国军政府强令联合国难民署驻泰机构停止运作，几天前该机构已暂时关闭，据里面的翻译说该机构很有可能撤走。如此一来，连这一线希望都断了，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期盼威哥再辛苦辛苦，看如何来拯救我等！伫候佳音。

还有已去世的蒲勇，已入狱的许万平、佘万宝，都曾经向我谈到越境，口吻之热烈，更胜于初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名，快将我的耳朵磨起茧子——自 1997 年“香港回归”，自由港荡然无存，在陆地上的“光明暗道”，似乎就只有《南行记》里的艾芜路线了。

向南，再向南，我默念着。耳尖的孙医生诧异地瞟我一眼，说老威你在做诗吗？我笑着反问：你觉得现在的西双版纳有诗意吗？孙医生摇头：我 1974 年从南京到这儿上山下乡，那时的景洪就是一座森林城镇，猴子经常在竹楼间窜来窜去，逗引唱歌的傣族姑娘和小孩，那才叫诗意呵。可现在，这儿一天天变大、变脏，变得跟其它地方一样，满街都是灰尘和劣质旅游产品，连一家正宗的传统傣家楼都难找。

的确，我们穿了几条街几里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水泥建筑。兴味索然之际，我们钻入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傣族村寨。司机回答：傣家寨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品牌，已经集中到郊区，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度假村了。孙医生说：我们就去普通的傣家寨。司机一脸迷惘。我们只好退出，又换了四、五辆车，终于遇上个傣族妇女，愿意拉我们去景洪机场周围碰运气。孙医生高兴极了，称我的下一个访

谈对象也在同一方向。“如果能进寨子住下采访，就两全其美。”

相对其它同类城市，景洪市区的车和人还是比较稀少，所以一路顺畅，似乎没拐几个弯就上了机场大路。过了机场的路更加宽广，简直能并行五、六辆车，司机说，沿着这道一直飙下去，20 多公里就抵橄榄坝农场，离边防非常近了。

大道两旁有若干通往傣家寨子的土路，女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认准傣汉两种文字的指示牌，拐入某一条，继续了大约 3 华里，即停车收钱。我们沿着越来越窄的路深入，芭蕉树的浓荫状如深宫，孙医生说，有点当年的味道了。

接着撞上弯弯曲曲的围墙，我们沿墙根绕了两三百米，就从简陋城堡一般的牌坊进寨了。四处都是新旧相间的圆顶傣楼，砖石结构居多，也夹杂些传统的木竹结构，顶上发黑，如久不冒烟的蒸笼盖子。

我们在这个叫“曼景保”的村寨里转悠了一刻钟，到底有运气，寻了家木竹结构的傣楼住进去。底层约一人多高，犹如地宫，支撑着若干老木头柱子；二楼才是整个家庭的活动场所，蒸笼盖子下的主屋，足有半边操场大，囊括了全家的地铺、厨房、饭厅、聚会厅及细软储藏室。我和孙医生被请入右边霉味扑鼻的客房，拉开两个两尺宽的地铺垫子，孙医生落屁股试了试，叹道：时光又倒流了。

在晒台上吃了一顿地道的傣家菜，有炖鸡、薄荷、本地蔬菜，还有好几种油炸树叶。我们眉开眼笑。紧接着，孙医生挎包出门，为我落实采访对象去。而我则遵嘱原地待命。

游笔至此，正是 2007 年 6 月某日，网上沸腾着因山西“黑窑童奴”所起的众怒，相关文章铺天盖地。来龙去脉是：今年 3 月，两个父母为找回失踪的孩子，去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乡下，他们跑了 100 多家砖窑厂，甚至当众下跪哭诉，仍然一无所获，却无意间发现了黑窑奴童的内幕。于是他们邀约了 6 位失踪孩子的家长及 1 位河南记者，用摄像机偷偷拍下种种惨状。稍后在河南都市频道进行了电视曝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 1000 多位失踪孩子的家长闻讯前来求救，100 多位家长亲往山西。

紧接着，400 位被人贩子诱骗或绑架，转卖到山西临汾、永济等地黑砖窑做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论坛发出“泣血呼救”，始而惊动了中央。

我细细端详着黑砖窑的网络图片，那些孩子，最小的 8 岁，最大的也就十六七岁，在打手和狼狗的监视下，出入那些半人高的黑窟窿。长达 19 个小时的超强苦役，已经将他们的浆汁榨干，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具具被泼了沥青的木乃伊插在那里——如此的狠，如此的恶，比共产党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翻身教育”而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更甚。可刘文彩是典型，与其同级别的也就舞台上的“黄世仁”、“南霸天”；黑砖窑却很普及，光是山西就有上千家，每家均由刘文彩望尘莫及的村支书牵头垄断。

由于成本低廉（一个孩子的出手价才几百块人民币），这样的黑砖头极有市场

竞争力。山西、河北是邻居，从地图上看，离北京的距离不到两厘米，说不定北京疯涨的房地产与此关系密切，搞不好若干奥运工程也是由黑砖头垫起来的——真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泪和血。

朋友一平自美国来信问：是不是中国彻底没救了？人心这么黑，人性这么坏，是不是任何制度都救不了？宗教呢？老威你采访地主，跑过不少信基督教的穷山沟，那儿的情况如何？要好些吗？

我无力回答。本来我想说，黑砖窑令我记起 20 多年前目睹过的“黑煤窑”。那是 80 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的时候，经常随车队从雅安翻泥巴山，去荥经、汉源一线的小煤窑拉煤。半匹山被掏得如蜂窝，每口窑的出口比狗洞大不了多少，那些大人和小孩，成天四肢着地，爬进爬出，脑壳中央绑着个手电筒，外加孙猴子紧箍咒一般的头圈，屁股后的煤筐车绳子就连在头圈上。计数的监工照样有，出一车煤，领一张纸条，月底凭纸条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历经几朝天子的黑砖窑的伟大进步是：1，添了狼狗；2，添了打手；3，入夜锁死工棚；4，克扣或不给工钱；5，奴隶的年龄更小；6，劳动的时间更长；7，打死人不偿命。

置身如此国度，一个人的神经若还正常的话，都会想到逃跑。连贪官污吏都想逃跑，他们枕着钞票睡觉，却在担心某一天遭遇更厉害的强盗。“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了。要什么宗教呢？拯救谁呢？还是向南，再向南，冒着边防军的炮火，一溜烟冲出边境，冲出东南亚，漂洋过海后，再傻傻地叉腰回头，隔岸观火，裂开大嘴巴忧国忧民吧。

可眼下，我神走了，皮囊却还在原地。网上有一首叫《窑奴》的诗，作者王新旻，其中写道：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 他们并没有愤怒 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 我知道整个中国是一座黑窑 我知道这里的人们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钻进地下变成蚯蚓 一口口吞食着这有毒的土壤 临近黄昏了，孙医生才回到傣家楼，汗水淋林，看样子累得不行，可还冲我强笑。原来他追寻几年前的记忆，一下午跑完附近 3 个傣族村寨，却吃了无可救药的闭门羹。两个傣族老地主都在去年死了，他说，后人又太小，不知道土改的事。我当然沮丧，本想说，是不是这一趟白跑了？但话拢嘴边又打住。孙医生转身去洗澡，我只得叹息两三声，顺手拿本书，落坐嘎嘎响的毛竹露台，望着浸透夕阳之血的无尽的芭蕉林发呆。

就这样干等到夜色笼罩，繁星四起。我们潦草吃了点东西，孙医生的精神头似乎有所恢复。他下意识地抚摸低矮的屋檐，突然说：还有一个线索，在飞机场背后的曼喃村。

好啊，我低落的情绪一下点燃了，可又习惯性地不放心：你确定能找到人？

那就看上帝怎么安排了，孙医生说。那神色如一个有耐心的渔夫，不紧不慢

地抛下诱饵：这家地主的故事很惨，父子二人偷渡境外，结果父亲被当场击毙，儿子被抓回来判刑劳改。

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上帝会安排的，我如此默祷，倘若他还叫上帝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留下见证。

这是我所在的西双版纳的夜晚，也是 1949 年以来，无数中国偷渡者曾经魂牵梦绕的夜晚。从这儿向南，再向南，可以走陆路，穿越原始丛林，追至茶马古道的尽头；也可以走水路，顺澜沧江直下，即漂往划开缅甸、老挝、泰国边界的湄公河。人和飞禽走兽一样，生而自由，可边防军的子弹却专门射人，不射飞禽走兽。几天前，接到一位坐过 21 年大牢的老反革命的海外来信，居然邀请我去美国喝酒。他说自己两三年没喝酒，两三月没说中文，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他说你来吧，带着你的箫，带着你的喉咙，我们像在中国那样，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往死里喝一次，就一次。我回信说去不了，没护照。他顿时生气了，说你这种在牢里自杀过两次的家伙，命已经算白捡，难道你就不会跑到西双版纳，重金收买一个傣族向导，向南，再向南吗？大不了横着躺下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偷渡者横着躺下去了，想想他们在阴间做你的人肉床垫，很软和不是？

可是孙医生，一个朴素的基督徒领我来到这儿，不是让我向南，再向南的。他在这一片乡村巡回行医多年，经常走在界河这边——伸腿就能到那边，可我为什么要到那边呢？

他轻轻地捶着腰眼，他已经很累很累，但依然立在星空下，谈起他永远的偶像——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平凡神迹”。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他说，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我问：对专制社会也不评判吗？

他答：不用评判，因为上帝已经替我们作出了评判。你早就明白上帝的评判，所以你不像其他作家，成天关起门胡编乱造。你一直采访受难的人，没人写的你写，做得好。不管受没受洗，上帝对你这个孩子还是照顾的，满意的。

土改受害者康朗罕

前　奏

2007 年 1 月 9 日，我和孙医生起个大早，结算完食宿费用，便匆匆离开傣家楼，去曼景保村毗邻的几个寨子走马观花一回，然后直奔景洪机场背后的曼喃村。我和孙医生的脚力算旗鼓相当，可此番赶路，却总觉得有无形的东西扯我后腿，才走一个多小时，就嘘嘘小喘了。孙医生奇怪道：精神不好？昨晚失眠吗？我回答：做梦算不算失眠？睡觉前水喝多了，就一直做尿急的梦，就像现在，挪步都很别扭，一掏鸡鸡，跟前就站一堆女的。孙医生笑得杨柳似的，随风弯腰；我却

无意间发现自己的裤子穿反了，开口跑屁股上去，难怪走不动呢。急忙捡植物茂密处狂窜，迅疾拨乱反正。不料在暴露过程中，耳边突然炸起一连串可怖的尖叫，原来咫尺间有个傣族大嫂正撩起筒裙出恭！哎呀，这种大洋相，平生真出过不少！路上想问题走神，误入女厕所两三回，进去了还在嘀咕：咋个没得尿槽？在劳改监狱里早起跑步，大冷天哗哗淋罢冷水，马猴般蹦个高，卜地朝监区院坝冲，兜了两三圈，猛低头才发觉一丝不挂——此“政治犯绯闻”顷刻就轰动全监。

幸而孙医生不闻不问。君子风度能到这个程度，是要经过长期修炼的——他只是瞅瞅我，再瞅瞅手机上的时间，步子迈得更大。我们接着穿过一段垃圾成堆的土路，才进了曼喃村的寨门。一架客机正巧从我们头顶起飞，动静相当于三四个往远处延伸的闷雷，机尾的强烈气流刮得寨子内外的芭蕉叶子乱晃，连垃圾堆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也被旋起老高，飘飘洒洒的。孙医生叹道：曼喃村的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

继续深入，遭遇了不少牛马及其粪便，然后才是三五成群的傣族村民，妇女居多。孙医生趋前打听，我不懂傣话，就白痴一般跟着陪笑。曼喃村比曼景保至少要大一倍多，更像现代的傣族小区，在风格考究的傣家传统楼群之间，夹杂着大量潦草搭建的红砖房子；浓荫蔽日的大树下，年岁稍大的妇女在做针线活，而年轻人热衷于汉地流传过来的扑克和麻将。孙医生假装有兴趣地观摩了三五分钟，方绕着矮桌打招呼，竟没人愿意搭理；只好转而去几十米开外的佛寺，企图寻个肯帮忙的出家人，不料金碧辉煌的尖顶庙宇内，虽一尘不染，却空无一物。孙医生站门外喊了两声：有人吗？我则注意到旁边的汉文标志牌，上面用红字写着：免费参观－进入寺庙请脱鞋－女子经期请勿入内。

经期女子就不能拜佛吗？我正嘀咕着，孙医生已经与一个灰衣老者搭上话了。看来有重大收获，因为十来分钟后，我们迎面遭遇了我的追访对象康朗罕——他身着军便服，扛一把锄头，面貌清瘦，显得比较年轻。

他与孙医生十多年前见过两次面，可彼此还清晰地记得。孙医生连连叹息：这寨子变化太大，差点迷路，我还担心和你重逢不了。

于是三人行。绕几个弯进一短墙，再启门入室。两排红砖平房，中间水泥院坝，几间四壁徒然的屋，周围杂草丛生。

没任何声音，连蟋蟀叫也没有，因此他放下锄头的碰撞显得很脆。我注意到他头上有几块俗称“鬼剃头”的斑秃——这是因极度的紧张、焦虑所致。

掏出录音机的同时，我瞅了一眼时间：9 点 58 分。天色较阴沉、闷热。可能是许久没和人谈话了，康朗罕刚开口就呼吸紧迫，语速极快，经我反复提醒，才稍微放慢一点。但尽管如此，我和孙医生的耳朵都得兔子一样竖着，因为必要时，两人要互相翻译、核对。

正　文

老威：我听你的话比较吃力，能说慢一点吗？

康朗罕：吃力？人一辈子，干啥不吃力？种地吃力，走路吃力，今天晚上还出气，说不定明天早上就没气可出了。

老威：理解理解，看来老人家活得不顺啊。

康朗罕：就剩孤人一个了，哥哥去年才死，妹妹死了好几年。整个村子，你一路过来都看见了，东一堆西一堆的大人小孩，就数我家清静，空荡荡，啥子都没得，进出都不用锁门。

老威：没养个狗儿猫儿？

康朗罕：养不起。

老威：养不起？这么丧气？你好歹也是地主的后裔啊。听孙医生说，你们家在旧社会也骡马成群，经常赶着越境去缅甸。

康朗罕：我们家是富农，不是地主。这个曼喃村有十来户地主、富农，但是都没活过 60 岁。

老威：后代呢？

康朗罕：后代是些毛崽崽，比我小得多，不记事。今年我 69 岁，土改时候我也是毛崽崽。

老威：土改之前，你们寨子与汉地一样吗？有保长、甲长、族长？

康朗罕：不懂你说什么。每个寨子都有村长，有寺庙嘛。解放前就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家事村事，只要有纠纷，只要化解不了，就找村长；再不行，就去寺庙里听僧人念念经，火气就渐渐没了。傣族都是很平和的，其他民族多少造过反，与朝廷打打杀杀过一阵，只有傣族，能让能忍，就让一点忍一点，因为大家都信佛教嘛。几岁的孩子就进庙念经，既学习信仰，又学习文化。

老威：昨天傍晚我们在曼景保村闲逛，无意中上了佛庙二楼，也见一个和尚再领着两个孩子念经，一遍一遍，很认真。

康朗罕：我不认识汉文，一点点傣文，都是几岁进庙学的。我们家田地不多，自己种点吃点，骡马倒不少，过去父亲经常伙同寨里其他人，运各种东西到缅甸，再倒腾些东西过来。

老威：边境自由贸易。

康朗罕：对对，多少辈边民都这样，该务农的时候务农，该经商的时候经商。缅甸人也过境，来往多了，就熟了，傣话和缅话混杂着讲，跟亲戚一样，彼此可以随便在家里吃住，家眷也不避讳，寺庙也不避讳，因为都信佛。

老威：哪边界线就成多余了。

康朗罕：过去是这样。国民党不太管，也管不了，可到共产党手里就不行。所以刚解放时，跑了不少人。我们家骡马多，也没搞清楚形势，就留下来。眼鼓鼓盯着解放军来，然后工作组也来。先是傣话不懂，要靠翻译，渐渐能够懂一些，就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情况，将寨子里的穷人组织起来，还劝大家不要去寺庙，新社会了，要搞社会主义，不搞封建主义，要推翻三座大山。村长啦，寺庙的主持啦，在旧政权手头当过差啦，都是三座大山的代表，帝国主义跑了，蒋介石跑了，他们的狗腿子还来不及跑，所以就要打断。要开会斗争他们，要消灭他们。佛教是封建糟粕，是麻醉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烟，念念经就能消除剥削？光忍让就能翻身做主？不行，要靠共产党、毛主席指方向。

老威：嘿嘿，老人家的政策水平不错。

康朗罕：都是十多岁那阵，开会听来的。

老威：哪一年？

康朗罕：52 年？53、54 年？记逑不清了。寨子里天天开会，学政策杠杠，够几条算地主，够几条算富农。越穷越好，进农民协会的都最穷。以前最穷的有寺庙管，有村长召集家家户户，分摊点钱出来管；而今有共产党撑腰，最穷的在会上闹得最凶，这家也地主，那家也富农，哼，地富分子越多，他们分得财产就越多嘛。主持会议的工作组，有两个是南下干部，还有一个才十八、九岁，奶毛还没褪干净，屋里吵翻天，他们都一声不吭，只是最后才作总结报告。

我们家先叫搞成地主，后来讨论一阵，又评为富农。父母都哭了，还争辩说：就几亩田地，还自己种，顶天划个上中农嘛。可农民协会当场就拿枪出来，拿绳

子出来，要捆要杀。说你们家有牲畜，有银子，还瞒得过关？你划上中农，我们该划啥？比贫雇农更低的成分没有。

老威：还算比地主强点。

康朗罕：只是房子没没收，其它都一样。按当时的说法，地富分子一条裤子，贫雇农、下中农一条裤子。骡马、猪牛全部赶走，还遭检举揭发。民兵上门抓了我父母，逼他们交浮财，坝子上跪起晒太阳，水不让喝，饭不让吃，还用荨麻条条抽，父母身上被咬得起红杠杠，火燎火烧。还有扇耳光、压杠子、顶石头，去林子里捉蛇来绕你脖子，咬你的乳头。

老威：傣族人也这么狠？

康朗罕：寺庙被关了嘛，观世音菩萨吃不开了嘛，毛主席的像在村子里到处挂，终于家家都挂，寺庙改成开会的地点，也挂，只有地富家里不准挂。满寨子都是民兵，耀武扬威的，见着地主、富农家的毛崽崽，都要撵得鸡飞狗跳。我母亲被吊在门框上，几天几夜不放下来，一只胳膊都残了。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要她交银子。父亲熬不过打，就说她亲手埋的。结果她领着民兵，将以前存的骡马银子，还有金银首饰都挖起来上交。哎呀，那年头，天亮一睁眼，或者还没睁眼，就在想今天咋个过？会发生啥子事？找不找个旮旯藏起来？遇着民兵该咋个说话？

老威：然后呢？

康朗罕：好几个深夜，父母都头抵头，嘁嘁喳喳说悄悄话。母亲还哭，我们懵懵懂懂的，好奇怪啰，天天挨整，人的眼泪早就整干了，还哭个啥子？我们哪晓得，父亲转眼就失踪了。当时我们三兄妹抱住母亲的腿，要父亲，可她死活不吭气；民兵又上门来抓走她，又吊了几天几夜，人都脱形了，快咽气了，她就是不吭气。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一两年后，她才悄悄告诉我们，父亲越境去了缅甸。正当风头，她怎么敢交代呢？越境就是叛逃，就是反革命，还要连累家属。如果她坐牢，我们三兄妹咋办？

老威：你父亲算有本事。

康朗罕：他在缅甸躲了好几年，那边没搞阶级斗争，他朋友多，还混得走。现在这边也不搞阶级斗争了，边境两边也开始自发做买卖，只要不贩毒，不走私枪支弹药，做啥也可以。

老威：偷渡呢？

康朗罕：有时候卡得紧，不行；多数时候可以，塞点钱，弄个《边境证》嘛。人民币比缅币好用，如果钱多，不想办《边境证》也行，带着穿原始森林，让缅甸那边来人接。靠得住，傣族人靠得住，不会在境外被抢。可惜我父母都死了，没看到社会发展几十年，运动来运动去，七搞八搞，结果又倒转回去，跟解放前差不多了。只是以前私人有马帮，现在没听说，可能是公路修得好，汽车代替了马帮吧。

老威：是啊，倘若你父母活着，该有九十几岁了。

插　记

交谈刚顺畅一些，门突然笃笃响了。康朗罕闻声迎客，尾随进来的却是两个

身挎各种布袋的焦炭色的缅甸男女，操着生硬的中国话，不由分说地往地上摊开一大块花布，然后再自布袋内倾倒出更多更花的布。便宜的，他们比划道。

康朗罕苦笑着，也冲他们比划：我，一个人，不买。缅甸女人随身兜个圈，指点着每扇关闭的门：有女人吗？叫她们出来。我插话道：没有。对方不相信：真的没有？我点头。对方露出狡猾的笑容：老婆也没有？他的，不是你的。康朗罕激动了，将几扇门嘭嘭全推开：看嘛，没老婆，没女儿，我，老光棍，不做筒裙，不做花衣服，买花布，没用。缅甸人还不死心：老婆，女儿，在外面？可不可以，叫她们，回来？康朗罕生气道：她们在阴间，在阎王爷那里，回来不了。缅甸人眨巴着眼睛：阎王爷是谁？你，去叫，我们在这里，等一等。

我和孙医生不禁哈哈笑。缅甸人感觉受到戏弄，就粗暴地推了康朗罕一掌，唧唧咕咕一阵，将大堆花布塞回布袋里，走了。

孙医生道：没想到缅甸人也这么走村串寨做生意。康朗罕道：很普遍嘛，中国人过去，他们过来，认识钱就行，世道变逑啰。孙医生乘机恭维道：可你还是老样子。康朗罕道：人老啰，搞不到钱啰。种点菜，锄头刨两个吃两个。

我赞同道：锄头刨吃是辛苦一点，可总比动不动就要你小命的毛时代强。

康朗罕默然。跟着访谈继续。

正　文

康朗罕：三年自然灾害，西双版纳出产这么丰富，只要肯下力气，水稻都两三熟，可还饿肚子。搞个逑的大跃进哦，公共食堂哦，白天黑夜在稻田里，唏哩哗啦打谷子，几班倒，睡觉都在田坎上，稀泥巴几个月都没洗干净。累了还不准吃饱，人家说，狗日的地富子女，凭啥子要和贫下中农吃一样多一样好？大伙每人每顿吃 3 碗，我们就只准吃一碗半。大概到了 1960 年，贫下中农都只能每顿吃一碗，我们就半碗，或者小半碗了。地主、富农饿死好几个啰，我们不晓得国外是咋个宣传的，也不晓得饥荒的消息是咋个传出去的，总之，父亲在那边，啥子都一清二楚！

老威：看报嘛，人家有新闻自由嘛。哪像中国，三年大饥荒，人饿死好几千万，报纸还在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康朗罕：父亲急了，担心我们全部饿死，就不顾那边人的劝阻，非要回来一趟。

老威：给你们带吃的？

康朗罕：他想把全家人都带出去。

老威：好啊，有远见！如果那时出去，现在回来就是归侨了。

康朗罕：1960 年的有个晚上，天黑漆漆的，全家人喝了半锅稀米汤就睡了。一会儿我被尿胀醒，但是夹着不敢起床屙；因为一屙了，肚子憋下去，就更难受。那年我 20 出头，胃口大，消化力强，跟牛跟马有得一比，但是吃不下草。肚子饿起来呀，不仅脚软，脑袋冒虚汗，而且肉里面，筋里面，都一抽一抽痛。所以哪敢轻易屙尿！正在折腾呢，竹楼就嘎吱嘎吱响，接着就是敲门，很轻，比老鼠打架的声音大不了多少。母亲起身凑拢门边，问谁呀？外面闷了几秒钟，才回答是你男人。

不敢点灯，全家都不约而同起来了，坐拢一处。父亲喘了好久好久的气，才说：都还在？母亲憋了半天哭声，才回答：今天还在，明天在不在就难说了。父

亲叹气说：一晃好多年，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可是眼下也不能呆得太久，否则被人发现就坏事了。母亲生气说：哪你回家干啥？送钱呢？送米呢？父亲摇头说：我走了几天几夜，就想回来接你们出去，虽然缅甸不是我们的家乡，但是只要能劳动，就不会挨饿，更不会受人欺负，比家乡强多了。

跟着，全家人都不吭声，只听得楼外的蟋蟀吱吱叫了好久。母亲终于说：这样来去太危险！况且家里还没收拾呢。父亲说：都是些不值钱的破烂，收拾个啥？还是趁着天没亮，马上走。母亲还是犹豫，父亲急了，就伸手拉她，两人当着孩子们的面，亲了个嘴，母亲即闪到一边说：不行，我不能由着你！这是将全家的命拿去赌博。父亲见拗不过她，气呼呼地站起来说：你不去就算了，崽崽们呢？他们愿意陪你挨饿陪你等死？陪你做永无出头之日的地富子女？

那时我们没见过世面，只晓得偷越国境就是反革命，所以心脏跳得崩崩响，紧张得饥饿都忘了。天色开始朦胧，屋里不冷，父亲却浑身哆嗦，他其实很害怕！像一只挨过打的老鼠，见不得外人，也不敢躲家里。他不由分说地一把拽起我，命令说：老二，跟我走！母亲还要阻拦，父亲粗暴地推开她：我千难万险摸回来，总不能空手而归。我本想说：我又不是畜生，想牵跑就牵跑。可转念一想：人比畜生高些嘛？与其做个命贱的剥削阶级饿死鬼，还不如跟父亲闯荡一回。

老威：唉，你父亲在异乡多年，也很孤独啊。

康朗罕：所以他要拽上我这个儿子。我们这两只鬼鬼祟祟的老鼠，刚刚溜出村口，斜刺里就窜来四个人，一把抱住我父亲，将他老人家吓了个半死。可定眼一认，原来是本村乡亲，地主老少 3 口，富农 1 口。其中某人昨晚无意间瞅着我父亲进寨子，就约齐人马，在这儿候了几个时辰。哎呀，都是活不下去的苦命人，既然撞上了，就一起跑嘛。

老威：3 家 6 口地富分子？称得上是“阶级敌人的胜利大逃亡”了。

康朗罕：胜利个屁，一个都没逃得脱。唉，如果只是我们父子，目标小，或许神不知鬼不觉就跑了；可大小 6 口，还有个 50 几的地主婆，还背了些包袱，就太费事。从曼喃村到橄榄坝，现在是一条大路，20 多公里，坐车眨几下眼就到了。可那时候，还没开垦，四处密密的原始森林，藤子碗口粗，大芭蕉树冲起十几丈。树啊藤啊，根本砍不赢，这几天砍了，过几天来场暴雨，又长起来了，一道道天然活篱笆，动不动就封路。所以在林子里穿，虽然能避开人，但到橄榄坝就耗了将近一天，还累得人不人鬼不鬼。

歇罢脚，啃罢几个冷饭团子，天就黑了。摸夜路往景哈乡赶，到了景哈就快半夜 12 点了。我们这时还不晓得，曼喃村那边早已炸开了锅——上午吹哨子出工，民兵挨家挨户催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出来集合，结果少了一堆人。这还了得！马上将 3 家剩下的男女老少都绑了，一拷问，就真相大白。立即作为“重大敌情”上报，这边派追兵，那边一连串的专线电话，各乡各寨各单位的党支部、基干民兵，各边防哨卡都通知到了，高音喇叭也反复广播了。

老威：真是天网恢恢。

康朗罕：我们还在瞎窜啰。地主老两口脚起泡，走不动，父亲还转回头帮他们背东西。景哈过去一点点，景播老寨还没到，我们大概就在这之间的某个林子落入包围圈的。那一刻非常静，路只有巴掌宽，还叫树叶子盖住，所以父亲得边用哨棍将白路印子扫出来，边试探着走，下脚既不能重，也不能偏。正当父亲咳嗽一声，说再走两三个时辰，就拢边境时，天就突然亮了。哎呀，不是天亮了，而是几十根大手电齐刷刷射过来，鱼网一般上下左右交叉。我们顿时眼花缭乱，感觉地震一般摇晃起来。不准动！不准动！到处都在喊，天地、树子、藤子都裂

着大嘴在喊：不准动！投降！投降！投降！我的腿肚子抽筋，一下就栽了。可父亲他没栽，而是直杠杠愣在原地，几秒钟，突然，他蹦了一个高，拔腿就跑，树枝随着咔嚓嚓一阵响。站住！有一个枪栓，不，几十个枪栓在嘎嘎地拉，站住!!嘭！嘭嘭！枪响了，接着是哒哒哒，哒哒哒，妈呀，冲锋枪！蝗虫样的子弹在我们身边炸，吓得那个富农直喊饶命，而地主家 3 口早就变成乌龟，抱住头趴地下，估计尿都出来了。

老威：你父亲跑掉了？

康朗罕：倒拖回来了，两个橄榄坝的民兵，一边拖一条腿，从十几米深的林子过来。他浑身稀烂，不晓得被射了多少个窟窿，总之，用肉饼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接着，他们将这张“肉饼”捆在我背上，拿枪指定我，命令背起走。其他坏蛋就用绳子连成一串，前后绳头都由民兵拽着。没办法呀，没办法呀，我只好背着自己的亲人，也不悲伤，也不流泪，脑袋完全空白。那破罐子一样的头就歪在我的脖子旁，血啊脑浆啊往颈窝里淌，一会儿，我的脊梁就与父亲粘一块了，再一会儿，混着血和脑浆的汗水就从裤裆淌到脚背了。唉，如今我快 70 岁了，想起背父亲尸体那几里路，还觉得挖心一样难受，几分钟前还活生生的，几分钟后就，人生说不得啊！坎没翻过去，只能怪命太软太轻。当时父亲才 40 几岁，真是遭了鬼怂恿，回来干啥嘛。

老威：后来呢？怎样料理你父亲的后事？

康朗罕：不晓得。我们被押回来，橄榄坝的民兵审了，曼喃村的民兵又审，要我交代父亲他说了啥子反动话。啥子都没说嘛，非要交代嘛，不合他们的意就吊起打。眼看活不成了，老子就顺着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越境暴动等等，都认。对对，你妈那个屄，该千刀万剐，父亲反正死了，再大的罪也不可能再死一次。

后来就关进景洪看守所，熬了几个月，每天喝两碗稀饭，把命吊得奄奄一息了，5 个人才判刑。我 8 年，其他都 6 至 8 年，跟着就送思茅劳改农场，分在 6 队。

老威：《判决书》上是什么罪名？

康朗罕：《判决书》？不晓得，我没看到。

老威：没《判决书》？怎么判的刑？

康朗罕：法官说几年就几年嘛。反革命叛逃嘛，对，越境都叫反革命叛逃。

老威：听起来挺吓人的。

康朗罕：啥子吓人？傣族外逃的多嘛。在劳改农场，管教干部问我案情，我一讲，他们就说：这法官咋这么乱整？瞎逃一气，连国境线都没碰着嘛，这种情况最多教育教育，放回家接受监督劳动嘛。

老威：既然如此，他们就出头为你伸冤啰。

康朗罕：已经成定局了，咋个可能？不过嘛，寨子内是劳动，监狱内也是劳动，管教干部比寨子上的民兵还讲理些，不会动不动把人朝死里打。况且在外面看来，劳改队都坏蛋成堆，我一个富农后代，在成堆的坏蛋里，就是一颗不那么坏的蛋。

老威：老人家真是在哪儿都能生根、开花、结果。

康朗罕：60 年劳改到 68 年，刑满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就强迫留场。稍后普文农场缺人，又从思茅调过去，这一下就种了十几年的蔬菜。混到 80 年代，领导还不愿意放我走。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我种菜手艺好，又肯下功夫，受过多次表扬，所以他们就舍不得。

老威：我们刚从普文农场过来。

康朗罕：哎呀，那儿原来有 14 个队，几万犯人；后来改制了，只剩 3 个劳改队，其他都是我这样的留场人员和家属。

老威：家属？你在普文结婚了？

康朗罕：没有。八几年回家结的婚。当时母亲还在，还有哥哥、嫂嫂、3 个侄儿侄女，就在勐养给我找了个本族的。

老威：你那时怕有 40 几岁？

康朗罕：是啰，人家比我小个十来岁，搞不拢，在曼喃村呆了 1 年就跑了。第二个老婆是个寡妇，带了两个崽崽过来，吃饭的嘴太多，我不喜欢，她又气跑了。

老威：你的条件也不好嘛，还挑三拣四。

康朗罕：她一去十来年，找不回来了。如今我父母不在，哥嫂不在，妹妹不在，我没有亲生子女，只有自己活。幸好手脚还能动。今天大早，我就去菜地干活，现在和你们聊完天，还得继续——天天这样，除开星期天在寺庙念经拜佛。

老威：往事如烟啊，如果眼下再转回土地改革，依你的状况，恐怕就划不成富农了。

康朗罕：一直穷，一直倒霉，前一阵子还遭了盘“鬼剃头”。他妈个屄，我们家啥子时候富农过啰？

答案随风而逝

2007 年 1 月 9 日晚 10 点，我和孙医生自西双版纳返回昆明，乏极而卧，感觉才几分钟就天亮了。恍惚中瞅见孙医生起身洗漱，影子一般飘出门去。接着，市井之声逐渐嘈杂，刺耳的军号也从楼群的另一端阵阵吹响，搅得我这条懒虫不停蠕动，直至下床，将脑袋埋入水池约几分钟，方恢复日常状态。

再度出发已是早晨 8 点 40 分，孙医生斜挎一包，精神抖擞地领我下楼，来到一辆咖啡色面包车前。探头一看，车内已堵满各类旧衣物，我们奋力将旧物塞得更紧扎些，以便新人能够坐得比较宽敞。我笑道：教会也做这种访贫问苦送温暖的政府工作？孙医生一丝不苟地纠正：都是教友和病员个人捐赠的，跟教会和政府都没有关系。

接着我们磕磕绊绊穿越了大半个昆明市区，又在通往禄劝县的北郊堵上了。记得 2005 年底首次去禄劝，就在这地名“王家桥”的烂泥滩堵了 1 个多小时，数百车辆屁股抵屁股，一尺一尺绕着“施工现场，车辆慢行”的招牌挪移，那种令人疯掉的乌烟瘴气！我从前座回头道：这路大概要修拢世界末日才算完。孙医生解释道：前几天的新闻报道，云南省的交通厅长落马，受贿贪污几千万，据说跟这条路有直接关系。我愧疚道：屡屡出师不利，你受累了。孙医生道：我一年要进出禄劝好多次，已经对烂路产生感情，如果哪天突然换成好路，顺畅了，我会生气的。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对嘛，再烂也是自己的国家！

可是一合拢嘴巴，我就想起了宋玉。我们离婚之后，她就从成都来到昆明，在市郊的某个停车场开了个添加黄油的铺子，据说有好几个雇员，生意还不错。没有电话，没有确切的方位，虽然时常有找找她的冲动，也无从下脚。若干朋友建议我，就一家一家，将停车场都寻遍，去争取一个戏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甚至有朋友愿意提着摄像机，脚跟脚地记录这一“亲情行动”——然而观众需要看到的场面，我和宋玉不一定需要。那种无能为力的痛是永远的——以其出众的美貌和善解人意，她为什么至今没有再接纳一个能让自己过上安逸日子的男人？反而一意孤行，在弥漫着货车尾气的恶劣环境里谋生？她在电子邮件里，没透露任何现实信息，却一再说，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处，她会首先告诉我——她果真这么做了，今年初她奶奶患晚期肺癌，我依约回成都探望，却没见着她人。

既然世界上有路，既然人长有腿，就得往前走。这是 20 几岁的时候，鲍勃•迪伦教会我的，他唱道：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炮弹要纷飞多少次，和平才会降临？答案随风而逝。同居、结婚、坐牢、离婚、亲情都不是借口，你要往前走，不管遭遇什么，不管伤口多么深，不管你多么想回头，不管你曾经倒下去，没有力气、没有信念再爬起来，你都要记着往前走——“答案随风而逝”又怎么样呢？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成长呀！一个生在家里死在家里的德高望重的榜样，哪怕活 200 岁，也跟没活差不多。你看你看，虽然如今我又成资深光棍，虽然我的胆气和血气都大不如前，可老天毕竟眷顾于蒙昧的我，幼年时通过母亲，少年时通过姐姐，青年时通过阿霞，成年时通过宋玉，持续不断地教育和引导，令我在人心人性如此扭曲的铁血共产社会里，还一步步地学会感动、感伤、怜悯、坚持、忍耐、单纯且源源不断的爱。

无赖政权赋予我的无赖天性也一步步被抑制，这一天我吃惊地发现，嬉皮笑脸的面具裂开了，我在哭，假面具却在笑；我在哀悼，我在祈求六四亡灵的饶恕，我的假面具却在自嘲；我在酗酒，在江湖上瞎混，在虚无的舞台上表演，而另一个我却拒绝着，冷静着，追忆着，跟随着孙医生转穷山沟寻觅陈年冤案。我表里如一吗？我从一而终吗？答案随风而逝。

苍山是一排横亘古今的巨大屏障，自南向北，连绵几十公里；几十条沟壑由天及地，如阴道，孕育繁衍了此地不同凡响的人类历史和文明。我阵发性地栖身苍山脚背，爬山方便。最近有一个月朗之夜，我在斑驳的树影里穿行，遭遇回族人的公墓，遂乘着酒兴撞入，终于靠住一残缺墓碑坐下来。冷风刺骨，簌簌叶动间似有人语；我打了个寒战，转身端详碑文，纳声雷，36 岁。原来是位夭者。

复坐，为了壮胆，我扯出洞箫吹将开来，曲未终，竟闻鬼哭。摇摇晃晃下山之际，月色如一缕缕纱衣，来回拂面。眼前跳动着诸多死人活人、女人男人。母亲父亲、姐姐妹妹、宋玉刘晓波、刘霞周忠陵、蒲勇李必丰、金琴余杰王胖子、还有康正果与他的农村婆娘——为了对这人鬼神混淆的场景有个交代，我随口编了 3 段歌词：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天边传来了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后来我把这命名为《八九悲歌》。由于箫音过于凄切，我改用拇指琴伴奏。反复的演练中我突然明白，第 2 段写的是刘晓波诸君的下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一呼万应的天马行空的人物，如今动不动就叫共产党堵在家里，数日出不来门，为了什么呢？信念吗？和无赖较劲吗？做软禁中的“自由人”吗？与现实和未来都要发生关系的公共知识分子吗？

面包车颠簸着，临近中午才拢禄劝县城。刚说熄火吃饭，车却自动熄火，像一堆破铜烂铁摊在路边。小伙子司机反复折腾，无效，只得哭丧着脸说，生意做不成了。孙医生叹口气，就临时打电话给我们都熟悉的基督徒小张，上帝保佑，一下子就通了。10 分钟不到，那辆白色面包车及灿烂的笑脸都浮现过来。

于是大家忙活一阵，在两车之间转移旧衣物，孙医生差点就闪了腰，小张急忙让他靠边，并开玩笑道：医生不能出问题哟。孙医生道：我又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为啥不能出问题？

用罢午餐，我们即脱离禄劝县城，朝武定方向行驶。两县相距不过 10 公里，起先属于同一专区，可而今却分属昆明市与楚雄州。沿途灰蒙蒙，过往车辆密集，但小张车技高超，谈笑间，再狭仄的缝隙也马不停蹄地钻，惹得孙医生直叫慢、慢，安全、安全。武定县城一晃而过，留下的印象仅仅是大大小小的“板扎壮鸡馆”招牌。小张连刹车都懒得点，就杂耍一般旋动方向盘，下坡上坡，往一派苍翠间的山道落荒而去。

车至山腰，遇一鸡毛店，我们便下来买矿泉水。孙医生乘机向路边的苗族群众打听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本地，也是云南境内最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家族。中心人物王志明牧师，生于 1907 年，成年后继承了其父王撒世牧师的衣钵；1969 年因坚持信主而被捕，1973 年以反革命罪名遭公开枪决。然而，此以身殉教的事迹没被湮没，还传扬海外，令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替他塑像，作为上个世纪 10 位伟大的殉道者之一， 永远并排屹立在大教堂的正门上方。

王志明牧师的儿子至今还是这一片教会的传道人。孙医生一挑起话头，大伙即踊跃作答，还自告奋勇带路。阳光普照，白云悠悠，山梁子犹如天路一般蜿蜒着，层层叠叠通往无尽之处。我们趁着格外好的心情，从车里拖下一口袋旧衣物，分发给在场的群众。眼看着那一张张红土捏成的脸逐渐绽放，并越发灿烂，我们体内的暖意也越发浓郁。几个参差不齐的苗家孩子都冲我嗷嗷叫，那最小的女孩，大约才 3 岁，竟激动得放声大哭。没办法，我只好不客气地从小张手中拽过口袋，使劲抠底，终于翻出两三样玩具。我把最大的那只彩色绒布猪塞给最小的女孩，惹起周围一派气势汹汹的谴责，幸而是苗语，我不懂。

其实那绒布猪已经发黑，并多处绽线，显然是城里孩子玩厌了的垃圾。可我能说什么呢？剩在手中的两样东西都不够大。还是孙医生细致，他又从车里翻出两只双背书包，亲自挂上两个稍大孩子的肩，好好学习啊，他鼓励道，那爬满皱纹的笑容圆满极了。

这一插曲延续了十几分钟，我们接着上路。挤在车里带路的苗族男女七嘴八舌地介绍，上完这山梁子，再一路长坡下到底，就拢了。

我盯住窗外，心不在焉地点头；而孙医生已取下眼镜，比目鱼一般扁着身体，神态疲惫。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

前奏

2007 年 1 月 9 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在造物主的关照中顺坡直下，一溜烟就抵达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路左是基督教的“明恩堂”，洁白的墙，粉红的顶，犹如群山环绕中的儿童乐园；路右则是一条条通向苗族村寨的土坎。我们在村民的指点下步步登高，不过几分钟，公路就在十几米深的藤蔓掩映的脚底了。与我们探访过的所有偏远村庄一样，大人、小孩和狗源源不断地自泥土里冒出来，茫然而友好地笑着。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远远就仰望到本文的主角王子胜屹立在岔路口，在他之上是变幻多端的裸土，以及亘古不变的群峰。

我们如异姓弟兄一般，握手并彼此拍肩。王子胜生于 1940 年，67 岁，身材矮而壮，像扣着大棉帽的土墩子。寒暄之后，他就引领我们再登十几米蛇形土坎，直达西北角的农家大杂院。

眼下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猪狗鸡人错落混居，异味扑鼻。王子胜率先推开正门，躬身让客；可客还未入，一只爆鸡婆就咯咯招呼着数十鸡娃喳喳抢入。我于昏暗中挖出相机，习惯性地拍了好几张废照片，直待主角在谦让声中落座，其目光坚定的面部特写才清晰地定格在镜头里。

阳光投进来半截影子，孙医生开始介绍我们的来意，跟着，访谈开始。

王子胜：你是教内弟兄吗？

老威：不是。孙医生是教内弟兄，我听他讲述了你父亲的事迹，深受感动，所以特地赶过来采访。

王子胜：听口音，你不是云南人。

老威：我是四川人，在成都长大。不过云贵川三省的口音应该很接近。我目前是职业作家，也就是说靠卖文为生。

王子胜：不容易啊。

老威：你们更不容易。在眼下人心惶惶的乱世，始终坚持一种信仰真的很难。

王子胜：我们家从老爹（爷爷）那代就信主了，顺着这条血脉一直下来，信主就成自然而然的事。

老威：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啰？

王子胜：记忆中，基督教最早传入本地是 1906 年，教堂设在离这儿不远的洒普山。当时有两个牧师，一个澳大利亚人，叫郭秀峰，一个英国人，叫师明庆，骑着骡子，颠簸了几天几夜，从昆明过来。进入苗寨时很轰动，因为自所谓开天辟地，好几千年，莫提苗人，就是汉人，也没见过长成这样子的。黄头发、绿眼珠、鹰钩鼻子，个头比一般苗人要高许多，所以不管他们到那儿，隔半里路就能望见。

老威：你的描述令我想起了《山海经》，两种相互隔绝的东西突然遭遇，感觉上是很奇异的。

王子胜：自古以来，无论是贵州，还是云南的苗族，都生活在崇山峻岭。刀耕火种，采桑狩猎，比飞禽走兽好不了多少。《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就是招降边陲苗王的掌故。

老威：对，孟获是大苗王，统领各洞苗王对抗蜀汉大军。我还记得书中的苗地瘴气弥漫，汉军水土不服，成天昏昏沉沉，而裹着兽皮、扛着籐甲盾牌的苗兵就乘机来袭。

王子胜：苗族拜鬼神，鬼神却从来没有帮助苗族摆脱被征服、宰割的命运。在旧社会，由于传统的陈规陋习，苗民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烧香祭鬼，遇红白事，更要请端公、师娘来家里，摆道场，吹吹打打地跳神作法。本来家家户户都穷得刨地坑，可还要铺张浪费，死 1 个人，要杀猪宰羊，请全村人大吃大喝 7 天；尸体要停放 10 到 20 天，臭了，水都从棺材板里往外淌了，还在顾及忠孝的名节，还在顾及鬼神的报应，不愿抬出去埋掉。总之，请神送鬼，端公开口才算数。外国牧师来的那一年，恶性循环到了极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富户。房子歪歪倒倒，一场大雨过后，就塌掉。塌掉就塌掉，将就着住，也没那力气重修。人与牲口同宿，吃喝拉撒全在同一个地盘，穷狠了，还讲究个啥？“卫生”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可结果呢，1 号病 2 号病流行，跟刮风一样，一个村接一个寨，人一片片倒。

老威：什么叫 1 号病？

王子胜：1 号病是鼠疫，2 号病是伤寒。染着就死，根本埋不过来，几个人一个坑也不行。腐烂了还污染土地、水源。端公与鬼神同在，可那时端公也死得差不多了，因为传染病不认你是谁。只有骑着小毛驴来的外国牧师，不提钱，不提端公还是普通人，统统抢救。别人逃出来的地方他们偏要进去，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往你嘴里塞药片；实在救不活了，才低下头，划着十字，在旁边做临终祷告。

就这样，他们的事迹传扬开去，许多死里逃生的人都放弃鬼神，信了耶稣。外国牧师还替大家打井起房子，重建家园；教大家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讲究卫生、认清端公的骗人把戏。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后，他们才讲解《圣经》，教大家做祷告。最后，他们选中了洒普山作为传教的据点，并在那儿逐步修建了云南境内最早的教堂。

从此方圆百把里都有了信靠，每逢星期日，苗、彝、傈僳族的群众就自四面八方聚拢洒普山，听上帝的声音，而平时则在家里或村里做祷告。许多家长领着孩子，让外国牧师取名。我已记不得我老爹原来的名字，只记得“王撒世”这个名字是澳大利亚郭秀峰牧师改的，意思是丢开尘世的一切去追随主。

老威：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也只有追随主了。

王子胜：我父亲王志明生于 1907 年，也就是外国牧师进来的第二年，原籍富民县东村乡芭蕉箐村。1921 年上禄丰县大箐小学，1924 年被老爹送到洒普山上教会小学，1926 年毕业，受教会指派，先后在嵩明、禄丰两县乡下教书并传教，直到 1935 年回到武定县洒普山，继续在各山村教书、传教。抗日战争爆发，外国牧师受命去别处，我父亲就被推荐为洒普山总堂的传道人，1944 年出任洒普山总堂会长。

老威：据你描述，这洒普山算云南境内苗族教会的发源地，那总堂的范围有多大呢？

王子胜：下辖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 5 县苗族教会，是最大的教

区。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全靠骡马，传播一次福音要翻山越岭好多天，十分艰辛。可在父亲的亲自操劳下，教会发展得非常好，据有关资料证明，到解放前夕，仅武定县内，就有 5500 多苗、彝、傈僳族群众受洒普山总堂之感召，信了耶稣。1945 年，父亲他还去昆明翻译编纂了苗文的《颂主圣歌》，这恐怕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诗。

老威：可否讲得更详细一点？

王子胜：我出生太迟，旧社会的事情就只晓得这些。到了新社会，所有的活动都被禁止了……

老威：此地的土地改革是哪一年？

王子胜：1951 年，我 11 岁，记得那年我父亲在昆明受储怀安牧师按立，升任牧师。

老威：储怀安？外国人？

王子胜：中国人，长期住上海。当时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撵跑了，共产党说，洋教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老威：你父亲也算受命于危难之际。

王子胜：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这是自然而然；父亲既然做了多年 5 县教会总堂的会长，神职升迁也是自然而然，不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

老威：我在禄劝那边采访过 84 岁的张应荣长老，他家因为信仰耶稣而被划为地主。

王子胜：我们村子太穷，没有地主、富农，成分最高的是中农，有 3 户，剩下的统统贫农和雇农。按土地政策，我家划贫农，因为信基督，就区别对待，不能分包括田地、房屋、财产之内的任何胜利果实，不准入小社（初级合作社）。

老威：没有地富分子，阶级斗争如何搞？

王子胜：本村没地主，就从外村借来斗，诉苦呀，游田坎呀，打打杀杀呀，除了不准我们基督徒聚会，运动方面的花样一次也没少。当时父亲曾私下叹气：咋个搞的嘛，人家外村好心好意将田地租给我们种，租子也不多，算施恩了，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

老威：没料到你父亲身为苗族教区总堂会长，家里这么贫寒。

王子胜：可精神并不贫寒。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勒令父亲回家种地，于是他就回村里，在群众的监督下踏踏实实地种地，还兼任小队会计。因为《圣经》

里讲，身体要顺从掌权者。

老威：作为上帝的牧者，他中止了放羊吗？

王子胜：每日的祷告从未间断，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摸上门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互的祷告紧紧张张，完全是地下活动。接着，上面派了民兵，专门看守，逼着父亲交代与外国牧师的关系，是不是帝国主义留在本地的定时炸弹，等等。没办法，基督徒之间的往来只能中断。1954 年，公安局还以“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的罪名逮捕了父亲，在禄劝县监狱扣押了好几个月。

老威：据我所知，有相当一批基督徒在所谓的解放初期惨遭迫害。

王子胜：父亲在苗族教众里威信极高，加之身体能够顺从掌权者，所以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在严厉镇压的同时，要树一个正面的可以对外宣传的典型。于是父亲莫名其妙被扣押，又莫名其妙被释放，还进入楚雄州政协筹委会。1956 年，他竟以牧师身份，任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老威：你父亲有幸成了共产党“三自爱国”的统战工具。

王子胜：这在当时的确比较轰动，《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消息。后来父亲从农村调到武定县文化馆，还当上第一届州政协委员。

老威：帝国主义走狗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了？

王子胜：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始终不放心父亲，父亲也觉得心不在那儿，他一直祷告，求主宽恕。他的人生就这样起起伏伏，虽然是见过毛主席的名人，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叫揪出来，写交代，挨批斗；到了 1964 年的“小四清”和“大四清”运动，他就被解除一切职位，彻底清除出阶级队伍，重回村子接受监督劳动，好比兜了一个政治荣辱的大圈子。其实他晓得，置身这样的无神论社会，自己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在十字架和共产党，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最终必须要有个了断。他在等待，在逆来顺受，可从不随波逐流。

老威：基督教最著名的箴言是：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

王子胜：是，无论是耳光还是亲吻，都一样。父亲他晓得自己一出生就被选中，将以人子的血肉之躯去重蹈神子之路，上十字架！在荣耀主的同时复活！

老威：后来呢？

王子胜：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涌入家门，抄家打人，我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串游乡。父亲戴着“帝国主义间谍走狗”的高帽子，揪去开万人大会，简直就叫拳头和口水给淹没了。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这样熬

了两三年，风浪看上去平静些，造反派忙着打内仗，也顾不上天天上门。父亲借此空隙，又和村里的一些老基督徒串联，半夜跑到附近山洞秘密聚会，手里没《圣经》不打紧，只要心里有《圣经》，就能领受福音。苗族虽然穷，还是比汉族纯朴，毛泽东这种“万寿无疆”的人间邪灵，尽管热闹一时，最终却蛊惑不了本族的心。福音又慢慢在村子里传开，也没人去告密。

可最后的考验到底来了，1969 年 5 月 11 日凌晨，我父亲被正式逮捕。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王子胜：我一家住在这边，我父母、我小弟一家住在公路那边。你顺着我的手指望出去，教堂的屋顶往上，过那片包谷地再往上，对，就是那座崖子下的草坡。现在草坡间的几个房子已经属于别人，可我们一大家在那儿住了好几十年。后来茅草屋失火，烧得精光，我就搬这边来建房子。我父亲是半夜鸡叫时被抓的，我正在梦中，听见嘭的一声枪响，比打雷还凶，比山崩地裂还凶，我全家大小 6 口都惊醒了。我急忙拱出门，望见公路边的汽车灯，有两三盏，刺亮刺亮的；草坡周围的电筒光密密麻麻，真的，比阴历七月七的星星还密。又嘭的一声，不是枪声，是门被撞开了。人的叫喊比刀子还尖，可隔得远，这边不太清楚，只能辨出大兵的吼和老小的哭。

我将 4 个娃娃安顿在屋里，一再叮嘱不要出门。我和老婆往对面没命地跑，公路上码满了解放军，不敢过，我们就远远地绕。可能是圈子兜得太大，还没拢那边，汽车就轰轰地发动了；等拢了那边，车灯已经移到半坡，在山嘴壳晃两晃，就消失了。

跟着我才晓得，是两个大兵守在外面，另两个大兵踢门进屋。刺刀上架，子弹上膛，鸣枪为号朝里冲，谁有异常就弄死谁。大兵挺枪直扑父亲床前，刺刀一下挑起被子，甩开，大吼道：不准动！起来！跟我们走！

父亲似乎早有预感，就和平时一样，一言不发地起身。他的内衣内裤都没脱，外衣外裤整齐地叠压在枕头下，所以很顺当就穿好了。脚落地时，当兵的一左一右来扭胳膊，他却轻声说：不用吧，我会跟你们去。接着抬起手腕，让当兵的给自己戴手铐。临出门，他一再回头，用目光暗示母亲，不要有任何举动。可毕竟是生离死别啊，母亲还是忍不住跟出去，叫了一声，当即被当兵的迎胸一脚，踢飞起来，顿时昏厥。

我赶到时，母亲已抬回屋内，全家大小数口正围绕着。她老人家大小便失禁，衣裤全湿。我们忙乱了好久，才听得一声哎哟，算还过魂了。我们替她擦身子，重新穿戴，她却直嚷口渴，喝了好几大碗水——这一来，落下一个心口疼，终身未愈。

而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武定县看守所，长达 4 年多，直至 1973 年 12 月惨遭杀害。

老威：什么莫须有的罪名？

王子胜：正式宣布的是“5 顶帽子”。其一，帝国主义走狗，死不悔改的间谍，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其二，现行反革命；其三，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其四，地主党；其五，红军长征经过禄丰县境时，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真刀真枪地干，亲手打死了 7 个红军战士。

老威：基督徒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了。

王子胜：全是诬陷！几十年前，禄丰那边的确发生过当地民团与红军交火，双方各有死伤的事，可距离武定这边很远，跟父亲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老威：唉，覆巢之下有完卵乎？

事故及后果

行文至此，老基督徒王子胜的声音突然湮没在一片城市嘈杂之中。我拿起录音机反复检查，又将磁带掏出来重装重放，终于明白，这个访谈的后半截已被永远抹掉了！

廖亦武！你个狗鸡巴！我抬脸冲窗外，好像在骂另一个人，一个盗窃记忆的贼。双耳直鸣，冷汗直冒，猛砸自己的秃脑门，跟戏子一样折腾来折腾去，均无济于事。此前一段，为打出国护照官司，我先后去了成都、重庆、涪陵、北京，辗转 20 多天，才折回云南。好不容易收拢心猿意马，要咬牙切齿干活了，却出意外！十几年，我访谈了 200 多次，这是第一次出这种低级可笑的意外！

稍微冷静，就从桌边败退至床上，平躺着琢磨补救法子。是否如过去搞《底层》那样，凭记忆往下整？我这方面的能力超常，估计读者也很难窥破机关。可是，可是，心里总有一道陡坎，翻不过去。

唉，追寻了 6 年各类冤案，不知不觉，就养成较劲的陋习，自己对自己有“善始善终”的要求了。可却时常贪恋《底层》里那种民间文学状态，无耻、率性、疯癫、麻木，脓血溅得比天高，脸皮厚得比城墙，无可救药如明代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

废话打住，我立即与孙医生取得联系，敲定重访圣徒后裔的时间。2007 年 8 月 5 日，我从丽江赶往昆明，正好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影老骥和四川平武县作家阿贝尔也在孙医生家里，于是相约第二天清早同行。

6 日 8 点半，我们打的斜穿春城西北角，抵达乱得不可开交的黄土坡车站。由于在行进中交谈激烈，竟将背包忘在了车子后备箱里。那可是我跑江湖的全部行头啊，计有：随身多年的洞箫、紫铜转经钵、算盘、口琴、铃铛、拇指琴以及好友岳建一不久前才送我的特制的埙。此外还包括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本、各

类音乐 CD 若干——时至今日，我仍觉得气紧和肉疼，不愿相信真的丢了。

可当时，跟电影镜头一样，才两三分钟，我就回过神，失声尖叫“糟了”。可出租车转眼已绕过一大堆建筑垃圾，消失在气势汹汹的烟尘里。我和老骥情不自禁地抬脚就追，横穿马路时惹起七零八落的喇叭声，可最终只有望尘兴叹。孙医生更是顿脚自责，为什么没养成要发票的习惯呢？

不得不继续打的，几乎跑遍整座城市。先抵门脸气派的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一位边看报纸边答话的女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然后抵门脸同样气派的客运管理处，在一位边看电脑边答话的男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接着，只能如纸人一般飘荡在街沿，面如黑铁，心如乱麻，可既定的生活目标不会因此改变。

咋这么倒霉？老天爷啊，这不跟抄家差不多？你怎么也学专政机器，动不动就收人家伙？我虽属天然戏子，可也没有玩物丧志，耽误码字的正事嘛。

老骥说：都怪某地的狗屁诗人某某，今天不提起他，你的情绪不会这么波动；你的情绪不波动呢，背包就不会忘。

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与 17 年前纠集一拨人搞《安魂》如出一辙，我的第二部实验电影《苍山下》拍完后，拿到某地大学一哥们负责的电教中心剪辑，由于保密好，当时没出任何纰漏。可时隔两三月了，国保警察却突然上门搜查，缴获存放在教学电脑里的《苍山下》原始盘，还传唤、审讯了所有参与本片后期制作的人员，在当地文化界引发不小的震动——这连锁性灾难的直接祸首就是刚才老骥提过的诗人某某。有一天，几个国保警察请他喝酒，席间称兄道弟，其乐融融。可人家却乘着醉意，突然发问：听说廖亦武前一段来过本地？诗人不假思索地点头。人家接着问：你跟他是一二十年的老朋友，没在一块喝一壶？诗人答：他有事，不想喝。又问：啥子事？又答：做碟子。再问：啥子碟子？哪些人参与？再答：这个嘛，这样的。唉，不晓得是天真还是糊涂，总之绝对不是故意出卖，诗人搜肠刮肚与警察掏了心窝子，他认为管他干啥的，既然能混到一个酒桌上，就是缘分，就该掏心窝子。回到家清醒了些，隐隐觉得不妙，就连夜给《苍山下》的余党们打电话，通知“警察马上要来”。

我气得喷血。祭灵招鬼，《苍山下》和《安魂》的路数相似，这要放在 17 年前，不又酿成一起反革命集团案？可是社会毕竟进步了，17 岁的孩子正当花季，不可能了解六四屠杀或反右劳改。我虽然为一时愤怒付出“丢失行头”的代价，可还能甩手甩脚地摇摆在外省的大街上。

新买了录音机。重整旗鼓已是中午 11 点。我们返回黄土坡车站，竟目睹售票处内外人海茫茫，我懵头懵脑扎入，游泳似地爆挤三二来回，人都成湿漉漉的肉饼，仍靠近不了任何一个售票窗口。孙医生把住一个彝族妇女打听，原来今天正巧是彝族的火把节，所以在天黑之前，四面八方的人流都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禄劝县城，汇入当地通宵达旦的节日狂欢。

他妈的，这世界和我较上劲了。孙医生刚提议改日再去，我就嚷着“不行”。

迂回到站外，正碰上一辆被交警罚过款的气冲斗牛的破面包车，我灵机一动，就妄称“电视台”，对染着满头金毛的司机和售票员进行了短暂采访。老骥端起摄像机，很配合，很唬人。骗局就这样立竿见影，在双方共同谴责交警乱罚款之后，售票女孩答应拉我们一行四人去禄劝的“合理要求”。

在建筑工地和垃圾场之间寻了家烂饭馆，老板自称是四川广安人，紧挨邓小平老家，所以要给我们弄一份老邓爱吃的地道豆瓣鱼。可端上桌的却是老早就砍成块的死鱼，幸好佐料极浓，掩盖了死鱼味，所以我们非但不计较，还乘着旺盛的饥焰，整光了一大盘土豆烧臭牛肉及几盘素菜。在用餐间隙，敬业的老骥顺势体察民情，了解到这家老板曾远行广西搞传销，蚀了 7 万元老本，人还遭扣押，差点没回得来。“凑了几千元接过这家店，开头生意马虎，可是后来就一直修路，日他妈修了两年多，还在修，把周围的服装店、杂货店、旅馆、茶楼、饭馆都修垮了。老子经过传销的破产洗礼，算最后一个钢铁战士”。

我颇为感触地拍他肩膀：对，死扛、死扛、再死扛，只要功夫深，破铜烂铁也能炼成金子。

下午 1 点，我们的破车终于正式上路了！乘客 5 人，加司机和售票员，刚好满载。途中，孙医生继续给客管处打了若干电话，追问失物下落，均无果。在丽江玩耍的京城酒友余世存闻讯发来几个短信，尽力抚慰。想起他不久前在香格里拉古城酒吧里，观摩藏族艺人热西才让与我的即兴音乐现场，还作了诗文：才让的听众只有我们十几个人，但他唱得认真。尤其他跟老威的配合，更是神奇。二人刚柔相济，一个宏亮时，一个低沉；一个人唱得如丝如线，一个人就唱得如钟如鼓。二人的歌喉都有一种悲绝，但在这雨天并不凄凉，反而有一种神圣、超凡的纯粹性。老外们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似乎在听这异国音乐，又似乎放空了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曲歌罢，大家鼓掌。才让就和老威们进入下一个演奏……

接着是古体诗两首，其一：少年哀乐过于人 / 老成即兴即天声 / 言辞穷绝思护法 / 江湖看尽自造身。其二更有味道：玉树倾折飘零若 / 三千寻音回向若 / 万人投宿心怡若 / 香格里拉一般若。

可如今，演出行头全没了，这一切只能如一个余音绕梁却嘎然熄火的美梦，叫我一腔空落落的。

然而文人的酸劲儿可爱却不顶用，车又堵上了。金毛司机伸脖子打望分把钟，嘀咕道：惨啰，少说前面堆了百多辆车。三十六计溜为上，趁屁股还没被封严实，掉头绕道吧。金毛的聪明才智令众乘客交口称赞，于是就得意忘形，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滴溜溜地耍开方向盘，将车摆弄得如一头浑身泥浆的公狮子。还夸口道：这昆明周围么，莫有老子不晓得的路，我出不去，胡锦涛也出不去。

可能是吹牛太满，老天爷不爱听，不过十几分钟，车又在另一条路上被堵。金毛继续发挥聪明才智，立即掉头。如此故伎重演了五六回，不仅不值钱，还耽误了大把时间，于是众乘客的交口称赞变成交口挖苦。在昆明呆了多年的孙医生严正指出，与其在岔路上拐来拐去，不如一开头就直奔大道，尽管大道也堵得凶，

特别是王家桥一段，可能一堵就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火把节，去禄劝的车流量增添数倍，交警必定也大量出动，没准比平时还疏通得快些。而一旦沦陷于小路，死定了就死定了，交警不会来。

金毛灰头土脸，充耳不闻，最后干脆推开车门下去了。窗外是起伏的郊野，谁也弄不明白，车怎么会驶入这绝望的包谷地，并且还首尾相接，好几十辆呢。昨夜才下过雨，泥路坑坑洼洼，迎面过来的一辆小面包，错车时轮子偏了十几公分，立马如慢镜头一般，缓缓朝土坎下倾斜。渐渐，在人民大众的惊呼中，车体打了半个滚，右前轮悬空而起。

接着，司机和乘客如狼狈的庄稼，从朝天车门内接二连三地生长出来。我探出脑袋，望见我车热心的金毛已加入抢险行列，还奔前奔后，指挥对面一辆一辆倒车——仅此一项，就足足折腾了大半个小时，然后才是敌退我进。教训横在眼底，所以每次错车，都有三、四个司机停车出头，充当义务交警。日头偏西了，我不禁叹气道：这大约是老子 2007 年最不顺的一天。

孙医生道：没关系啊，今晚回不来，住禄劝也行。

我学基督徒的样子，低头祷告：主啊，您在考验我老威的信心吗？逗得孙医生哈哈大笑。

下午 3 点 40 左右，路到底打通。久困的车子立即撒开车轮，没命狂奔；我们在车内持续摇晃、蹦跶了 1 个多小时，禄劝县城居然就遥遥在望。老骥道：这哪是开面包车，简直就是开超音速飞机！话音未落，连人带座位就跳将起来，脑壳猛射车篷，回落时还把我的脚背压了。此起彼伏的哎哟惨叫，金毛司机却丝毫没受影响，一转眼，车站就到了。

4 人车费 120 元付罢，接着又花 100 元，雇同样的面包车重返几十里外的楚雄州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由于遭遇太多挫折，我已习惯性地往坏处琢磨：万一王子胜老人不在家咋办？病重咋办？

快 6 点了，火烧云笼罩着天空和大地。我们在教堂对面靠边停车，又落脚在大半年前落过脚的红土上。这边走啊——我轻车熟路地招呼大伙，内心却暗流涌动，感慨万端。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前奏

2007 年 8 月 6 日傍晚，我们一行 4 人，风尘仆仆地再次造访 67 岁的圣徒后裔王子胜，不料迎头撞上铁将军把门。围绕这陡坡间的陋居，屋前屋后寻罢一圈，回头向村民打听，才晓得老人在山腰伺候包谷地，早晨就带饭出门，至今未归。于是在爱好运动的孙医生的提议下，我们沿着村中蛇形坡道，开始新一轮跋涉，

与若干苗族男女及牛马狗擦肩而过。出村尾，在暮色苍茫中大约爬了七、八分钟的红土坡，竟望见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天而降！不，像一块土疙瘩，从群山皱褶里滚将出来。

彼此都笑脸相迎，零距离接触时，孙医生顺势接过老人肩上的锄头，我则迫不及待紧握他的手，感觉捏住了大块磨刀石。边走边交谈，没想到时隔大半年，老人对我们的印象已经淡漠，我一再旧事重提，他才苏醒似的，猛捶一把脑门，大叫一声“你是——”，却没下文了。

老骥一路拍摄，老人瞟见机器冲着自己，就把腰板挺得笔直，步履坚实，说话也中气十足。“天上，地下；过去，将来；中国，外国；所有荣耀都归主”。

我频频点头，如这位矮个子传道者的应声虫。拢家之际，太阳刚好落山，天穹间突然浮现出交叉的彩虹。我虽然神经兮兮，对自然异象兴趣浓厚，可时不我待，只能不管不顾地挖出录音机。

屋内黑咕隆咚，开灯又昏暗不堪，老人就随我和孙医生在外面陡坎边坐下，连擦好几把汗水，谈话就在雨后蚊虫的大肆袭击中开始。

正文

老威：对不起，又来打搅你了。

王子胜：贵客啰。神的旨意啰。

老威：上次的采访出了点问题，录音被抹掉半边，所以这次从断掉的地方开始吧。

王子胜：好的。

老威：上次讲到你父亲王志明被抓，以后呢？他关押在哪儿？

王子胜：武定县看守所。

老威：4 年多都没换地方？

王子胜：是的。

老威：能探监吗？

王子胜：能，但是见不着人。送衣服可以，送吃的不可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时代环境不一样，我们经常忍受革命战士和群众的打骂，什么“你老子信上帝，那么坏，你咋个还不同他划清界线”；什么“上帝不是人民救星，只要毛

主席、共产党才是人民救星，你们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共产党”；还有什么“你老子是上帝的走狗，为啥还要送衣服呢？上帝与狗都是不穿衣服的”，等等。故意让你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他们就有了打你斗你的理由。其实完全不用找理由，作恶是没有理由的。

老威：对，撒旦统治中国也是没有理由的。

王子胜：但是我们有信靠，明灯就在心里。按政府方面的说法，本来像我父亲这样“罪大恶极又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是不允许同亲属见面的，可考虑到我们是少数民族，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特别批准见最后一面。

老威：你们晓得能见最后一面？

王子胜：我们，不仅家里，还包括村里的基督徒，天天祷告。自父亲被抓，就天天祷告，有感应的。对上不上十字架，有感应；对之前和之后会咋样，也有感应。

老威：是么？

王子胜：父亲是 1973 年 12 月 29 号被杀害的，提前一天，民兵就上门通知了。于是全家十几口倾巢出动，紧赶慢赶，走了几个钟头，才拢武定县城。经过几道关卡，终于在高墙内看见了朝思暮想的父亲——头发全部熬白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挪步子，就唏哩哗啦，脚杆打飘。把全家人心痛得哭啊……

老威：你父亲戴着镣子？

王子胜：几年的脚镣手铐，到死才解下来。

老威：跟杀人犯同种待遇。

王子胜：全家人都拉住他哭啊，可候在旁边的公安人员吼了声“不准哭”。我们只好顺从掌权者，忍住了。人家又吼：来了这么多人！咋个说话？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快点，时间有限哦。

母亲就对父亲点头：你能讲，以前都是你讲，我们听你的。

父亲会意地笑了。接着拿出当牧师的威严，开口道：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向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老威：这个“上面”就是上帝了。

王子胜：对啰，信撒旦的不懂，信耶稣的一听就懂。接着是第二句话：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第三句话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

老威：这三句话的语气似乎都出自《圣经》。

王子胜：我们听得很温暖，因为后两句话，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父亲都一直在说；父亲之前的老爹，以及为老爹取名的外国牧师，也一直在说。我激动得又哭了，我说：爸爸呀，我们会好好听上面的安排！可是家里那么多娃娃等你养育，你改造不好，娃娃们就等不着了——这个意思是，爸爸呀，上帝安排你做牧师，做教会的领袖，你可晓得还有多少羊群等待着牧羊人归去？

我妹子接着说：爸爸呀，到了这一步，我只是舍不得你的子拜！

老威：啥子叫“子拜”？

王子胜：就是子弹。意思是子弹明天就要穿过去，我舍不得。她说不下去了，却没料到，就这一句含混话，大家都听懂了。四周顿时鸦雀无声，连人保组、公安局和端枪的大兵都埋起脑壳。也许他们在想：这个无罪的人啊，却不得不死掉。

老威：唉。

王子胜：我母亲拿出 6 个鸡蛋，忍住眼泪说：我是你的女人，没有公话。这些鸡蛋已经煮熟了，你收着吧。我父亲叉开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她，然后接过鸡蛋，留下 3 个，再还给她 3 个。

老威：这是永诀的祈祷，血十字前，分出两个三位一体。不禁令人记起苏格拉底两千多年前的临终箴言：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去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王子胜：我们都明白。这时候大兵过来将我们隔开，公安人员站在父亲和我们之间大声宣布：王志明已经被判处死刑，定于明天公审公决。遗体由政府处理，你们不用过问。

老威：为啥不用过问？

王子胜：我们再三请求，公安人员才继续宣布：王志明死有余辜，革命群众强烈要求，用炸药将尸体彻底销毁。所以你们可以不去大会现场。

我们大吃一惊，就连声求告政府“手下留情”，让我们收尸，并保证不立墓碑，不弄任何显眼的标记，不给社会造成丝毫不良影响。可人家摇头说：哪个晓得你们会利用死人搞啥子名堂？苗族历来是宗教迷信的重灾区。

父亲被押走了，我们还不走，坚持要收尸。公安人员火了，叫大兵把我们赶出监狱。没办法，作为基督徒，要顺从掌权者，我们只能含悲赶回村子。天已黑了，信主的群众，好几十人，还候在公路边。弟兄姐妹们一听要“炸尸”，都流泪。大家约定，当晚全部在家中祷告，求助于神，制止毁尸灭迹的革命行动。

老威：结果如何？

王子胜：我们祷告完就睡了，可能因为太累，连梦都没做。第二天大早，大队突然来民兵通知，叫我们准备马车，赶到武定县第一中学大操场参加万人大会，“拖反革命分子的尸体回家”。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来不及生火做饭，揣点干粮，借辆马车就往县城跑，嘴里一直在悄悄哼《赞美诗》。抵拢会场，那个拥挤哦，那个口号哦，那个红旗招展哦，如开锅稀饭，人脑壳比开花的米还密，感觉是全中国人民都团结到这儿了。当时接受公审公判的有四、五个阶级敌人，除了我父亲，其他都判有期徒刑。

老威：四、五个反革命吗？

王子胜：不，是其他罪名，弄来陪我父亲的杀场。我们的马车一到，几个大兵就围过来，枪筒子指着喊：不准动！双手抱脑壳！蹲下！于是我们就蹲在马车旁边，背对会场，像瘟疫一般，与革命群众隔离开。

老威：你父亲呢？

王子胜：两三百米远以外啰。开会当中，大兵一松懈，我们就起来透过人脑壳缝缝打一下望，认清楚那个戏台，上面坐着两排领导，台前搭一架子，父亲站中间，左右是陪杀场的，全部五花大绑，挂黑牌。宣布“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又有几个大兵一拥而上，将父亲悬空顶起来，向广大人民示众。青天白日啊，整个会场却刮起一阵阵狂风暴雨。想想看啰，武定县多少公社？就算一个公社来几千，聚拢都是好几万。几万个拳头高举，几万个喉咙高喊：打倒！砸烂！万岁！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切反动派垮台之时！

老威：疯了疯了。

王子胜：示过众，他们又朝父亲后颈窝插亡命标，多半个人高，5 个罪名都在上头，“王志明”3 个字打着红叉叉，很醒目。接着，父亲就被弄上卡车，游街示众。前头两辆小车开道，后头满满一车大兵压阵，架着机枪，上着刺刀，绕城个把钟头，才拉到武定郊区原先的小飞机场去打掉。

老威：你们可跟去了？

王子胜：枪指着，根本动不了。等群众差不多散了，大兵才吩咐：乖乖随我们走，要听使唤啰。于是我们牵起一条线，被大兵押到看守所门口，父亲坐牢的铺盖已经扔在那儿，一个公安说：反革命的破烂，领回去吧。

老威：谁为你父亲收尸呢？

王子胜：同村的。等他们赶起马车，跑拢飞机场，父亲已经倒在地下了。好几百群众围观，乌鸦鸦的一片。赶车的站在车头使劲摆手：收尸！收尸！人墙就自动闪出一条夹道。还剩一个大兵在里面守候，问了句：是不是他家里人？回答：是啰。大兵就吆喝道：走开走开！打得稀巴烂的死人，有啥子看头？快让人家早点收拾。

拉起尸体，他们来与我们碰面。我拿毛巾给父亲擦脸，妹子用铺盖掩住他老人家。这是 1973 年 12 月 29 号的下午 1 点，天非常蓝，阳光非常好，几万群众渐渐散去，街道渐渐敞开了。马车载着父亲出了县城，嘀嘀哒哒朝家走，比步行还慢，我家来的 7 个人就干脆左右相随着。一路看见雀子飞，听见雀子叫，竟觉得父亲的呼吸还没有停止。

沿途都有一些苗民拦住马车，向父亲道别。老的，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还有小孩。绕过山梁子时，有个小女娃娃竟然爬上车，掀开铺盖，将我父亲从头摸到脚。嘿嘿，我们不由自主微笑起来，暂时忘却了悲伤。

走走停停，太阳落坡才拢村子。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迎接。感谢主啊，父亲的遗体一直很软和，从倒下去，到抬上马车，到拉回来，到天黑，到半夜三更，一直同活人休息差不多，脸有血色，皮肤有弹性，肚子还热乎乎的。那个关口上，干部和民兵从早到晚严防死守，只有到夜里 12 点以后，确定“那些人”睡着了，信教群众才一家接一家，陆陆续续摸上门来，做道别祷告。

老威：来过多少人？

王子胜：至少七、八十。在沟坎上溜，又不敢打手电，跟夜游神一样。大概过了两点，最后几个弟兄做完祷告走了，我们伸手摸父亲，才感觉身体发凉，手脚变硬了。

老威：的确算黑暗中的神迹。

王子胜：荣耀主，感谢主。

老威：他说该有光，就有了光。

王子胜：天刚蒙蒙亮，我和哥哥、弟弟、妹夫一起上坡，看好岩坎下的一个地方，就吭哧吭哧挖洞。一两个时辰，弄得差不多了，我们才返回家吃早饭。接着把墓盒（你们汉族叫棺材）先抬上坡，放进洞里，再回头接遗体。

老威：墓盒与遗体分开抬？苗族风俗吗？

王子胜：不是。怕苗民动乱，军车大清早就开过来了。大兵端着枪，满坡守起，明令除了死者家庭成员，任何人不准接近。当时本村外村好几十人，都自己跑来，原准备搞个下葬仪式，眼下却只能相隔几百米，傻傻望着这边，干着急，帮不上忙。遗体带墓盒，至少要 8 个劳力才抬得起，可家里只得 4 个劳力。我们

试了几次，还喊了号子，都不行，只有分开运送，人最后钻进墓洞去封棺。

大兵一直守到土盖完，坟包垒起，我们下山拢家门了，才吹一声哨子，跑公路边集合报数，上车回城交差——其实他们巴不得溜快些，因为明天就是新年。

老威：1974 年元旦。我十几岁。毛泽东、周恩来都病入膏肓，文革快搞不下去了。

王子胜：感觉得到。因为过了不久，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村子里又恢复聚会做礼拜。政府发现了，就派人来召集苗民开会，教训道：枪毙反革命分子没几个月，你们不仅不划清界线，反而敢秘密聚会！真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谁带头的？站出来。于是我就站出来。

我是 1976 年初被正式逮捕的，扔进武定县关过我父亲的监狱。他们说我比父亲更坏，更不可救药，因为父亲的犯罪还有历史原因，我却属于明知故犯。开头 4 个月，我都关在禁闭间，两三平方米的黑屋子，水泥地，就一个洋瓷碗一个马桶，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跟狗洞一样。

王子胜：不如狗洞，因为始终不见光。只有等个十来天，马桶屙满了，才允许喊报告。大兵先撬开巴掌宽的监视窗，捂住鼻子瞅一瞅，再开门叫我出来倒屎尿。天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朦朦胧胧挨近茅坑，还得竭力稳住脚跟，提防腿肚子一软就栽下去。回到黑屋，眼珠子酸疼，要流好久的泪水才重新适应。

老威：屎尿味薰的？

王子胜：嗅觉已没有了。这人嘛，在茅坑上关多久也不会薰坏掉，可不能长期不见光。植物不见光一会儿就死，动物嘛，最多熬十几天，就要发疯。

老威：人在黑暗中不发疯，是因为有思想和意志。

王子胜：有上帝啊，他说有光就有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族共计 7 人蒙难。父亲遭杀害。二哥王子华，当时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任院长，也受父亲株连，叫造反派揪出来。因为忍受不了批斗毒打，就投怒江自杀。大哥王子荣，与我同时继承父亲衣钵，为传道人，后来我们同时被捕，同时判刑，同样的 9 年刑期，同时释放——只是判刑后，我送姚安县监狱改造，他送禄劝县里面的草海子农场改造。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姨、四姨和老孃，她们是父亲的亲生姐妹，住在外村。后来二姨和老孃判 5 年，四姨判 3 年。

老威：都因为秘密聚会吗？

王子胜：是。1979 年落实宗教政策，就全部提前释放了，这样一算，我们就只坐了 3 年牢。1980 年开头，不晓得吹的啥子风，上面来指示，硬要把我选成

武定县人大代表，反革命牧师的儿子，帝国主义的走狗，咋个能当人大代表呢？可是跟逮捕一样，你不干不行。记得当时，我拿着姚安县监狱的《减刑判决》，找人大主任，我指着上面写的“该犯坦白交代较好，予以释放”说：我还是“该犯”，不配做人大代表。主任脸红了一阵，生气说：太马虎啰！我找他们去。于是没过两天，“减刑判决”就变成“无罪释放”。

老威：估计此时你父亲的事迹已经传播到海外，大形势变了。

王子胜：释放不久，我们就接到了父亲的《平反通知书》。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确定他为 20 世纪 10 个伟大的殉道者之一，替他在正门上塑像的事，我们晓得很晚。大概是上个世纪末，人家派使者将有关资料送过来，都是英文，而我只有高小文化（政府不准黑五类子弟升中学），读不懂。2002 年 12 月，我家亲戚的孩子去伦敦，亲自在大教堂门口拍了照片回来，村里村外传看，大家都流泪了。荣耀归主啊！父亲他与魔鬼争战，共 65 个年头，终于胜利返回天家。正如经里记载——我听见天上有个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老威：作为传道人，你也算你父亲留在大地上的果效。

王子胜：我今年 67 岁，还跑得动。附近的村子，苗族、彝族，都全部信主了。我就准备跑更远。更更远。如今社会，思想乱，心乱，每个人都比过去更需要福音。

补记

夜里 9 点来钟，谈话结束了。我们在满天繁星之下告别老人，他慈悲的老伴撵出屋子，塞给每人两块有些烫手的荞面粑粑。我三两下就吞并完毕，而孙医生依旧边下坡，边细嚼慢咽，还赞不绝口。我暗笑道：不愧本色的基督徒啊，任何时候都不忘感恩。

面包车晃着射灯在山道间盘桓，我到底松了口气，瘫软在座位上。感觉才迷糊一会儿，禄劝县城就拢了。孙医生说：我已给小张打了电话，他答应连夜送我们回昆明。我不禁叹息道：麻烦小张多少次了！如此有奉献精神的基督徒，在当今社会已属凤毛麟角。孙医生说：你不晓得啰，我一直想把他弄到昆明开车，可那些公司老板嫌他土，有损形象。

快 10 点半，小张在城郊加油站接到我们，二话不说就朝车站赶。七、八分钟后，我们登上已经启动的加班的末班车。

小张和他的车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阴影。幸好是火把节哦！他喊道。

午夜 1 点钟，车抵昆明黄土坡站。接着打野的。1 点半钟，4 个貌似流浪汉的家伙，围坐在街口路边的小吃摊。一人一碗烫粉，吃得脑壳抵脑壳。

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悲凉。仔细盯一遍其他 3 人，我对自己说：廖亦武，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是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

基督徒孙医生

前 奏

2007 年 1 月 9 日下午 5 点，我们结束对圣徒后裔王子胜的寻访，从高桥乡下长冲村回折几公里，就脱离还算平整的主路，拐入通往田心乡发块村的“糖石路”。所谓糖石路，就是泥巴与硬糖一般的碎石块掺和铺成的单行道，面包车一上去，就如伤寒病发作，嘀嘀哒哒哆嗦。我们也随之哆嗦，并且没完没了。孙医生在后座，在旧衣物的包抄之中，没过一会儿就得起身一次，将造反的旧物口袋镇压下去。而司机小张身子前倾，双臂已夹住方向盘，但情不自禁的嘎嘎磕齿声仍不绝于耳。出于诗人天性，我企图将颠簸化作游戏，不料屁股刚随嘀哒的节奏起落两回，脑顶盖就撞出一包。

尿频也一发不可收，车子平均几十分钟要停一次。在一座接一座枯燥乏味且浮尘飞扬的秃山间如此折腾，骨头散架不提，连肉皮也拉扯得不行了。可孙医生说，他一年要进来好几回！为什么？

太阳缓缓坠落，巨大的光轮像一盆盆血，哇哧泼向交错的峰峦。从前窗望出去，视野内全是紫红的潦泡。对面山坳闪出一辆来车，我车就在这面山坳刹住等候，滔滔尘头席卷腾空，太阳之血刹那被冲淡了。

黑夜接踵而至。寒风顿起。远方有扑闪的小灯。孙医生探头指出，注意了，下头是连续 3 个急弯，很容易撞车，一定要慢点。我估计马上就到了。不料孙医生接着指出，前方山窝子有家小店，山羊肉不错，我们吃罢晚饭再走。

深一脚浅一脚穿过泥地，踏上石阶。有点《水浒传》里的黑店味道，随灯影迎出一彝族壮汉，高声问吃几斤？孙医生答先来两斤，多配几种蔬菜。

旋即锅子端上桌，我们就着糙辣椒蘸碟，狼吞虎咽。身旁一大堆彝人在烤火。孙医生客气地招呼：一起过来吃啰。惹动一阵哄笑。

身热胆壮，我们梁山好汉一般继续赶路。好多年没见识过这么黑的夜，跟墨汁似的。我感觉车子嗖嗖插入一个场口，房屋在光柱两边，极鬼魅地闪避。小张说：发块要到了。把坡下到底就是发窝。我不明其意。孙医生解释：彝语。发块的意思为山腰；发窝的意思为山脚。不过我们不必去山脚。而要拐进机耕道，左绕右绕很难走。我笑道：鬼门关都翻过了，还怕进阎王殿么？

夜里 9 点，我们抵达群山肚脐眼里的田心乡发块村，进入孙医生的得意门生孙庆元的院子。又是一堆人在屋里烤火，孙医生一露面，全部扑出门，那个久别

重逢的亲热劲儿！42 岁的孙庆元为本地教会医生，极有威信，他当即按孙医生的吩咐，带人每家每户分发旧衣物，喜气洋洋，同过节一般。

忙碌停当已夜深，人逐渐散去。我和孙医生烫罢脚，围火坑而坐。无言，竟也无睡意。我习惯性地掏出录音机说：随便聊聊，就当催眠吧。

正 文

老威：跟梦游似的，我从来没想到会坐在这儿。

孙医生：主的安排啊。

老威：那眼下这个山村夜话氛围也是主的安排。

孙医生：嘿嘿。

老威：允许我问一句，你是医生，怎么会对土地改革感兴趣？

孙医生：因为我家就是大地主。我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在南京城里开有老字号诊所，很有名望。挣了钱，他们就在郊区购置了不少田地，当不动产存在那儿。可共产党一来，世界翻了个滚儿，我家就成剥削阶级，田地和诊所都遭共产。

老威：他们的命保住了？

孙医生：把我家搬到云南或四川的穷山沟，他们有 10 个脑袋都掉了；可南京周边是富庶之地，地主、富农太多，光我家所在的那条街，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店家在郊区有田地，相比之下，我家远远不算顶尖。当然，历次政治运动，我家都是重灾区，我从小就习惯了父母被突然之间揪出来，游街批斗。幸好还有家传医术，许多政府官员觉得有利用价值，就让你苟延残喘。

我 1974 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我年龄最小。当时刚读初三，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虚报岁数下乡的。说来可笑，1973 年到 1975 年，西双版纳这块还在搞“阶级成分复查”，给许多土改中漏划掉所谓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帽子，大肆批斗。

老威：是么？也太落伍了。

孙医生：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对时代的反应要慢好多拍。我们属于景洪公社，紧靠着橄榄坝公社，再出去是边境线，除了傣汉，还有哈尼、拉牯、布朗、瑶、彝、佤、白等民族，对汉族人灌输过来的土改怎么搞呢？据我所知，拉牯和瑶族既没搞土改，也没有地主。

老威：可能大伙都在坡上半裸着刀耕火种吧。

孙医生：但我们刚去的时候，到处都在斗地富分子。有个傣族小伙子，我们去的头天就认识了，知青要吃水果，他就猴子一样爬树，摘了很多。可没想到，这样老实的人是富农儿子，经常无缘无故被批斗。有一次民兵打得他满地滚，我实在忍不住，就跑过去扶他起来，由于我的身体插在中间，民兵没法继续打，只好罢手。多少年一晃而过，我却清晰地记得那种恐怖躲闪的眼神，与圈起来待宰的狗差不多。可他不是狗，年龄也和我们知青不相上下，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呢？

我对社会、对毛泽东思想产生怀疑就从这身边的一点一滴开始的。什么人民翻身做主，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狗屁。1976 年毛泽东呜呼那天，我正在林子里砍香蕉呢，我边砍边吃，肚子都有点撑了。突然，兵团的高音喇叭放起了哀乐，接着就是低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嘿嘿，不是万寿无疆吗？怎么说死就死？真是个好消息。

后来我当上赤脚医生。再后来恢复高考，我考上北京医科大学。临上京的那天，那个富农儿子还特地跑来送我，很依依不舍。

大学读 5 年，毕业分配到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一直当外科大夫。做了无数急诊，什么肝破裂、肠破裂、脾脏破裂，头颅破裂，开刀缝合，一分一秒抢时间，动作稍慢就大出血，要死人。我的医术就是这么操练出来的。到了 1988 年，为了“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被破格提升教务长，任了一届，又提升常务副校长。

老威：年轻有为啊。

孙医生：　外科的关键是临床判断，该如何马上如何，来不得半点虚的。可这套在官场行不通。我锐意改革，卖掉专用的桑塔纳轿车，自己买辆自行车骑；我取消逢年过节会餐，禁止大吃大喝，限制财务报账。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人家恨死我，在背地整黑材料，我还蒙在鼓里。九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外教和留学生进入我们学院，通过他们，我读到了《圣经》，很受震动。刚巧官场的挫折也促使我反思。《圣经》的本质就是敬畏，就是爱，而中国人既缺乏敬畏，又缺乏爱，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靠党的领导？规章制度？废话。

大约是 1990 年 9 月，我在留学生宿舍第一次参加了祷告聚会，当时除了留学生和外教，还有几个中国学生。此后我一直参加礼拜，也逐渐养成睡前祈祷的习惯。1992 年冬天，我休假去西双版纳，逢圣诞节，在家庭聚会上祷告时，突然意识到某种使命，心灵感动不已，就由德国宣教士大虎主持，正式受洗。

老威：既然如此，你的官还能当吗？

孙医生：我知道那个时刻在临近，我必须作出选择。我参加聚会的事也有人告密，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按理，我在体制内已多年，医术上亦有造诣，如果稍作让步，仍是一派锦绣前程。上帝和魔鬼在我头脑里反复争战。可最后，领导拿出一份《入党申请表》，让我填了它，这就意味着“谣言不攻自破”。

不能填。我说。因为不是谣言，是事实。

什么？领导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信基督。我一字一顿地说。我只能选一样。

领导气得要命：你当共产党的官，拿共产党的工资待遇，却信基督！基督是什么？能吃能喝吗？

我不眨眼地看着他，依然一字一顿地说：我辞职。我得救。

于是我被院方解除了一切职务。

老威：这是哪一年？

孙医生：1993 年。我不得不离开医学院。随后不得不离开苏州。西双版纳的景洪医院聘用了我，直到 1996 年。接着又去深圳两年。再接着出国，从环境相当优美的泰国清迈转道，进入相当糟糕的缅甸佤邦，服务于南佤军区范围内的一家国际丛林医院。

老威：脱离了体制，你的人生马上就动荡不堪。

孙医生：可内心不动荡。我是主动报名去佤邦做人道志愿者，因为那儿充满战乱、瘟疫、贫穷。当红十字会的车子颠簸在土路上，我看见窗外除了漫山遍野的罂粟，就是洋不洋土不土的佤邦军人，身上挎着枪，还挎着炮。附近还不时响起枪炮声。我们抵达的所谓“医院”其实就几间草棚，四周有几棵树。由于酷热，苍蝇相当密。可是技术力量很强，西方各国的医生来过好多批。

老威：你与他们交流没问题？

孙医生：傣话和英语我都会一点。医院虽简陋，气氛却很融洽，应对流行病、疟疾、妇产、吸毒引发的各种病症，以及大批量的大外科都很尽责。连续工作几天是家常便饭，但我在这儿学到不少东西，包括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做野外手术。

不过我反感那个台湾籍院长，他缺乏爱心。比如有一次，医院聘用的一个佤邦护士和军人谈恋爱，头天晚上，男女才钻入一顶蚊帐，第二天女的就被抓起来，那些当地人还闹着要把她推出去毙掉。我听见女孩的哭声，就去找院长，可院长却说这事儿不该他管，还劝我也别管。我气坏了，就直接找抓她的叫“山耿”的军官。山耿解释说：那个军人在家有老婆，是护士勾引他，所以该死。我说：这有啥了不得？还不快把钥匙拿出来。当地人对医生都非常敬重，山耿虽是人民军，也不例外。于是我就亲自打开女孩的脚镣手铐，接她回来了。

老威：真把人命当儿戏啰。

孙医生：是啊，抓人、放人、枪毙人全是一念之差。我的外科助手是个缅甸

人，叫玉瓴，相当聪明。他原来也是正规医生，可吸毒成瘾，曾经进过戒毒所，出来后毒不吸了，却嗜酒如命，等于用酒代替了毒。因此院方将他从医生降为护士。有一次值夜班，玉瓴也喝得迷迷糊糊，被台湾院长的朋友，一个台湾牧师逮着，就大声骂他。玉瓴不服，两人就你来我往对骂。我出面阻止，并批评玉瓴：你这样对自己、对医院不负责任，以后怎么办？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玉瓴一下子清醒了，立马道歉，还发誓改正。可是第二天来了辆警车，当作大家的面将玉瓴抓走，从此再没有回来。

老威：咋回事儿？

孙医生：台湾牧师向军方打了报告啰。这前后两件事搞得我对台湾人很厌烦，也是我最终离开佤邦的动因。我在那儿呆了 1 年半，本来已融入当地，连总司令的太太都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呢。

我是上个世纪末回国的。可以说一无所有，但信心越发坚定。我先由侄儿介绍，去云南大学医学院代课，钱不多，却比较轻松。

老威：你有了异国行医的“通科”经验，不想借机重返体制？

孙医生：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肯定在大医院呆不下去。

老威：信仰障碍吗？

孙医生：普通良心。比如你开什么处方？病员坐对面，直勾勾地盯着你，人家已经叫病魔弄成那样了，你在处方里下什么药？因为同类型的药，价格悬殊很大。一般情况，我捡价格最低、疗效最佳的方子开，如此下去，药房、科室乃至院方都有意见。因为破坏了潜规则，就破坏了形形色色供药商与医院的长期平衡，就直接间接损害了集体利益。

老威：医生坏了良心，跟抢劫犯无异。

孙医生：治病就是抢钱啰。许多病对医生来说，就是对症下药，顺水推舟，不费什么力气。你自己也在治病救人中获得快乐啊。可现实呢，治一点普通病，动不动就几百上千，甚至几千上万。你为什么不习惯开几块钱的抗生素，几块钱的传统药？或许它们的进价才几毛钱，成本才几分钱——照此计算，医院已经赚够了。还嫌不够？

老威：所以你就成了害群之马。

孙医生：对。我是基督徒，我必须告诉病员实情，病员也有权了解实情。所以我进任何医院都容易，可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老威：你是叫逼成“游方郎中”的？

孙医生：没人逼。的确是神的旨意。

老威：嘿嘿，我洗耳恭听。

孙医生：我在教堂做礼拜时碰到我的一个学生，不料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开始我都没认出他，因为云大学生太多了。后来聊得不错，才知道他是禄劝皎西出来的农村孩子。

老威：皎西？撒营盘还往里走，快到红军窜过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了。

孙医生：偏远落后的大山沟，但民风纯朴，村村都信基督教。我的学生说：他的家乡有个等死的病人，问我有没有兴趣跑一趟？我随口答好。没想到这孩子第二天就找上门，领着我搭班车，折腾快一天，抵达了皎西。原来是本地教会长老的太太病了。我进屋一检查，乳腺癌。肿块已有鸡蛋大，得马上动手术。我当时生气地对长老说：病怎么能拖？长老说：禄劝和昆明的医院都跑遍了，动手术至少要花 8000 元，还不敢担保断根。我们回来东借西凑，才有 2000 元。我说：这手术我做。长老急忙问多少钱？我答免费。那一家人全愣住了，那种奇怪的目光盯得我不自在，就解释说：比这更复杂更厉害的手术我都做过，你们放心吧。

歇了一夜，我就匆匆往回赶。本来是约好病人随后来昆明，借医院的手术室做，可待我打电话去催，对方又说在皎西家里等。晚上，我跪下祈祷，求主赐给我力量，帮助更多的穷人。脑子里竟浮现出一个个美国或英国的老电影镜头，那些战地医院，或根本没医院，就一块野地，那些可爱的大夫正为病人开刀。还说笑话，引开病人的注意力。

内心充满感动。接着我花了不到 100 元钱，买刀子、针线、手套等等，其它东西原来就有。我背上药箱赶路，嘴角都挂着笑。我记得手术做了没多久，手术室就是长老太太的卧房，手术台就是她的床，那张黑黝黝的、睡了几十年的床。她以为自己快死在那床上了。

老威：你没有帮手吗？

孙医生：有个老大爹，60 多岁，是当地的牧师。屋里很暗，开窗也光线不够，就把几个手电捆在一块，让老大爹举起来当手术灯。老大爹的身板硬朗，站一两个小时一点事儿没有。我让他照那儿，他就直端端照那儿，毫不含糊。我把病人的右乳房整块挖掉，而后做了仔细地处理。我没感觉累，只感觉同穷人在一起，就是同上帝在一起，很甜美。真的，心甜美，接出的果实也是甜美的。

老威：你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在农民家里做癌症手术的医生。你可想过万一出意外咋办？

孙医生：既然决定做，肯定要有充分的、万无一失的准备。我是正规科班出身，以前也没料到会在这种条件下做手术。消息刮风一般传开，皎西周围的村民

纷纷上门求医。记得那次我呆了一个多星期，几乎不能脱身。

老威：就在一个地方？

孙医生：还从皎西走到武定县的乍基乡。两地间不通公路，起个大早，我跟着热心的带路者，爬坡下河，锻炼了将近 8 个小时，鞋底都差点磨穿了，才好歹到达。虽说我一直是运动爱好者，可这算是平生最长最累的步行啊。

老威：我进去过两三趟，坡太陡了，连骡子都打滑。爬某些山梁子，鼻子稍不留意就触地。

孙医生：但步行下来，感觉浑身透气，吃得香，睡得沉。趁着好心情，我在乍基村民家里又做了一个腮腺癌手术，一个囊肿切除手术。感谢主，没有一点问题。

感谢主，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道路和使命。

插 记

子时将尽。我知道孙医生不习惯熬夜，就提议明日继续。不料孙医生问：这是不是和做手术一样，开了头就不能停下来？我噗嗤一笑，只得承认道：的确，明日的气氛又与今日不同。

我不禁摸了摸自己的右眉，似乎手术刀还在那儿划动。两个月前，孙医生曾经背着一个简单的挎包到云南某地拜访我，谈笑之间，顺便在我的腋下和眉间动了两个小手术，割除两颗黄豆大的肉赘或瘤子。记得当时室内还在放鲍勃·迪伦的早期摇滚，孙医生叫把音量关小。窗外古塔矗立，夕阳正红，鸟儿在啁啾，有几头老牛向苍山草坡款款远去。孙医生叹道：好一个世外桃源啊。接着就挑起音乐话头，让我躺在床上瞎侃，从垮掉一代到黑人灵歌。从“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到“马车自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待我睁开眼睛，手术就结束了。真是从未有过的神奇经历！孙医生边收拾家伙边笑道：我要向你索取一点点报酬。我答好啊。他就试探着问：可不可以把你自己制作的箫碟拷贝一张给我？我又答好啊。

两人对话的余音尚在，可光阴已滑过一大截了。

我再次打开录音机。

只有抓紧往下说啰。孙医生道。

孙医生：昭通的彝良县是云南最穷的地方，那儿的很多山被砍得光秃秃，村庄在秃山腰，泥巴草房很矮，门跟山洞一样，只有埋着腰才能钻进去。而平时吃水靠两口井，一口喂牲畜，一口喂人。若遇天旱，就得跑山脚河里背水。

我曾经到那儿行医，也有过几天不洗脸的记录。有一次，我在村里迎面碰见一个杵棍子的彝人，右裤腿空荡荡的，脸颊一个劲抽搐。出于职业本能，我自然要询问。原来这是车祸的后果。我急忙扶他坐下，掀开裤腿。哎呀，不知是那个缺德鬼做的原始截肢！膝盖以下没了，可大腿骨却刀子一般暴露在那儿，四周的皮肉发黑溃烂，臭味令人恶心。我说：喂，你这样下去不行啰，骨头暴露，骨髓炎会一点点往上走，最后感染血管，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那彝人没话说，就直勾勾地看我，一会儿，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流。我说：没关系，我再给你裁一次肢，齐大腿根全拿掉，就没事儿了。往后有条件，你还可以装个假肢。

村民们都围过来，没人了解我的底细，只知道我是昆明来的。不过大家也算给面子，帮我把病人架进屋，平放在床上。我耐心地做消毒、抗炎、麻醉，然后更耐心地剔除腐肉。太臭了！我就叫把门窗都敞开，让空气对流。

老威：你不怕空气中的细菌感染吗？

孙医生：乡村看起来破破烂烂，其实空气比城市、特别是比医院干净。至少没有各类病菌的交叉感染啰。我把腐肉剔光了，再一根根理出血管，与老大娘纳鞋底相似，要特别细致。待全部血管都缝合完毕，检查没纰漏了，就可以裁肢。

嘿，没啥神秘，与木工活儿差不多，锯、锉、琢、锤、刨都得用上。我还特地买了把小锯子，锯口极锋利，外形却似木工锯。你想，人的大腿骨，特别是成年人的大腿骨，相当硬，没钢铁硬，至少比一般木头硬多了。我比划一下，猛吸口气，就下锯子。呼哧呼哧，才几个回合，手臂就震麻了，脑门的汗珠子牵着线下来。要是在正规医院，不用招呼，护士会主动擦汗，可在这儿，我一再暗示，别人也反应不过来啊。

不过这难不倒我。骨头锯了，又用小锤子敲几下，然后琢，然后将钝口锉平整。待一切都处理妥当，再将正常肉皮拉拢，缝合好。

老威：我听得汗毛直竖。

孙医生：没什么啊。村民也配合，病人也那么放心地把性命交给我，应该感谢才对。

老威：把人当作木工活儿来做，外科大夫本身也算特殊材料造就的。

孙医生：哈哈，作家的想象真丰富啰。那我接着讲。去年在红河州，对，云南著名的红河烟厂就在那儿。我到红河州石屏麻风病院，在那儿给一个麻风病人切除过阑尾。我的当地朋友介绍的，说本来是急性阑尾炎，可医生都不敢治，每次发作起来，送医院，就只打打针，开点药，结果急性拖成慢性了。我说这样一个小手术，算得什么。人家就陪同我去了。抵达隔离区，人们都大吃一惊，叫唤：这个地方你也敢来！我说这儿四处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洁白，比我从前的看病环境还好，我为什么不敢来？见着病员，是个中年男子，手脚、皮肤开始烂了，脚也变形。可人不错，平和，不抱怨，不自私。我为他动手术，还有一个甘肃来的天主教姑娘协助，很顺当。刚一完，病员自个就起身。我按住他，让稍微歇一会儿。他说不用，感觉挺好的，就下床站起来。试着走两步，没问题，就点头致谢，然后走回去了。我立在门口望他，起码走了两百多米，才进那边的房间。

老威：我晓得你“胆大包天”，可掐指一算，你做游方郎中已第 8 个年头，

没出过问题？

孙医生：不能出问题啰。

老威：为什么？你毕竟是人呀。

孙医生：治病救人，判断必须十分准确。不像写文章，错了还能修改，把人治错可没得修改。否则坏名声一传播，损害我个人事小，损害到我信仰的基督教，罪就大了。

其实，比医术更重要的还是爱心，比如你认识的小孙……

老威：就是上次你介绍我去马鹿塘找的那个瘸腿小伙子？

孙医生：是。

老威：他给我引荐了两个老地主、3 个老贫农，贡献很大哦。

孙医生：他原来在广州一家造船厂打工，还结婚生子，不错的。可突然间得了一种脊椎怪病，令双腿瘫痪，连中山大学的名牌教授也无奈。这一来，老婆跑了，同乡们将他千里迢迢送回家，吃喝拉撒都得靠人，惨极了。当时我闻讯从则黑跑到马鹿塘去见他，动不了刀，西医的确没法子。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学习传统针灸。我的老师姓梁，很有名气。记得第 1 天开课有十几个学生，第 2 天剩七、八个，第 3 天四、五个，第 5 天 1 个，就是我。大伙议论道：梁老师啊，你教我们这个经那个经，弄得我们要发神经。我没发神经，我属中医世家，经脉一点就通，还其乐无穷呢。后来我觉得有些把握了，就赶去给小孙扎针。不料扎针后的头天晚上，他的腿就持续麻胀！就这样坚持针灸，加上他自己搞了些中草药偏方，配合治疗，慢慢就能站起来了。

老威：这太耗费时间。

孙医生：时间不是问题，我喜欢在农村逛，爬山、涉水、治病，碰见的都是善良的穷人，什么都愿意奉献。像小孙，非常聪明，现在他丢开棍子也能到处走，还愿意跟我学医，常见病也能处理一下。老威：他在乡场上开了家奇怪的店，美容美发加治病加拔牙。

孙医生：嘿，我引荐他跟美国来的牙医学过，他聪明、刻苦，钻研过口腔结构，真的能拔牙。说不定比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还强些。

老威：你的乡村弟子，我接触过这个小孙，还有则黑大住基村的小孙，都自己开诊所，在当地蛮吃香的。

孙医生：这些年我陆续教了几十个学生，相当于由几十上百个点组成的农村医疗网络。其实，医术精湛固然好，可普及医疗常识显得更迫切，因为乡村里的若干突发病，只要当时处理恰当，得到缓解，就能争取到救治时间。农民苦啊，住山沟山梁，赶一趟街，爬坡下坎，动不动就折腾几个小时。平时没什么，可犯了急病麻烦就大了。几个壮劳力，轮换抬啊背啊，山道几小时，拢公路还得等车，乘车到乡镇一级的医院，医生水平又有限。不少人就这么死的，不少人死得莫名其妙。

老威：抢救不及时，不是绝症也弄成绝症了。

孙医生：唉。

老威：可建立乡村的医疗网络应该是一项国家工程，一个人的力量……

孙医生：共产党烂成这样，我们别指望了。海外有些慈善机构，也关注第三世界，但它们有它们的目的。99 年那阵，我与新加坡的“爱心扶贫”有过联系。发窝就是那次来的。当时我和 1 个美国、1 个香港、1 个新加坡医生来这儿赶街考察，逛了两圈，碰见这家主人孙庆元。一聊，就马上跟他来。

村里还有个痨病，吃了香港医生给的抗痨西药，很管用。这孙庆元学过医，

开了家庭诊所，但欠款很多，面临倒闭。我们给了他坚持的信心。我说：有外援自然好，没外援也别指望，要因地制宜，发展中草药。你看到了，院子里晾的草药非常多，这些年，孙庆元在造福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还清了欠款，活得不错。

老威：我在你家遇见过两个美籍医生，1 个姓吴 1 个姓熊，都不错。

孙医生：他们都下乡考察好几次，愿意投入一些资金。特别是吴医生，快 80 了，人非常善良。要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偏远乡村的状况，避开政府官员，去掉中间环节，农民就能直接得到实惠。

老威：你是深谋远虑。

孙医生：我不是商人，不是政治家，我的榜样是德兰修女。她抛开贵族化的修道院，深入到遍地垃圾的印度底层，深入到穷人当中，把爱当作毕生的事业

老威：你随身带着《德兰修女传》。

孙医生：很多时候，你我对深重的苦难无能为力。在皎西那边的真金万，一个极边远的村子，有个村长。他的脖子原来生了个肿块，开过刀，没割干净，反而越变越大，还四处窜。我见着他的时候，肿块已经蔓延至肩头，蔓延至后脑勺，沉甸甸地坠着，把整个人拉扯得站不稳。我稍微检查一下，就知道是淋巴癌晚期转移，根本无法动刀。我只好在床沿坐下，读了一段《圣经》。我说：生命不是无限的，但在上帝那儿，又是无限而公平的。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点点头，还露出微笑。接着我握住他的手，静静地呆了 1 个多小时。门口的光投进来，许多人影子在那儿晃动着。第二天，他就死了。

老威：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在《哀歌》里写到：清晨、正午、黄昏到来前的每一分钟，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孙医生：但我更喜欢《汤姆叔叔小屋》中的黑人灵歌“马车从天上下来，把你带回你的家乡”。你唱过的。又有一次，刚拢一个村子，就被领到一个 50 多岁的大姐屋里。看她已上气不接下气，就询问旁边人，原来她发烧好长一段时间后，突然间大出血。我把了脉，太晚，没得救。当时她的大女儿还在外头瞎跑，只剩读初中的二女儿在。我就吩咐烧点水，我亲自拿盆子、毛巾为她洗脸。又接过木梳为她梳头。作为医生，我明白人在临终时刻，不能过分邋遢，否则就死得没什么尊严，连收殓群众都害怕接近。

举手之劳做完了，我还是老样子，握住她的手坐在那儿。但是她没有上一个死者安详，呼吸急促，好像胸腔随时会爆炸。我心里十分难过，就说：大姐姐呀，我明白这辈子你吃了太多苦。不要怕，不要怕。快结束了，天堂的门已经敞开，你的苦快结束了。她的眼泪淌下来，叭嗒叭嗒落在我手背上。跟着她猛抖两下，嘎的断气了。还好，时间没拖很长。

老威：夜这么深，听你讲到死，虽然有大爱，仍感觉人生没多大意思。

孙医生：千万别这么想。你在记录苦难，你得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老威： 我们是 2005 年 12 月初认识的，当时你正在丽江古城一个基督徒家里替一个老人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就跟你下乡，从此切入土地改革专题，这么久还收不了手。记得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吧？

孙医生：“麻风病人”张志恩。

老威：对。讲讲他。

孙医生：在他之前，有另外一段掌故。2001 年夏天，我去刚才提到的真金万行医，抵达时已下午 3 点。歇 1 个小时，感到肚子饿了，就在村民家里弄饭吃。可米和豆子下锅不久，有人来告诉我，另一个村子有人快病死了。我一急，马上开饭，半熟的豆子也咽了半碗。然后随带路的起身。路途耽搁两个半小时，泥浆

山道，一不小心就打滑，可想到那头有人要死，也顾不了许多。8 点过赶到，太阳落坡了，昏暗的光影里，茅草屋的周围，全村 100 多人都聚拢了。我浑身湿得水透，可来不及擦汗就跑过去。只见屋檐下，红漆大棺材已摆在那儿，盖子掀开，吓人啰。我进到屋里，见床上床下都是血，而病人还在喀，气都快整断了，还在不停地喀。人们都异口同声称：上昆明照过片子的，是肺癌，活不了。我马上给他打止血针，很平静地问他病史。这人倒比较理性，一五一十地抖落得清楚。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他做详细诊断，确定为肺结核，虽然极严重，仍有一线希望。

抗结核的特效药没带身边，第二天大早，我和病人的两个女儿出村赶路，中午抵昆明买了药，让她俩先带回去。结果非常管用。第三天我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病人已好转，棺材用不着了。

又过十来天，病人村里来人接我去复诊，完了再返回。就是在石门坎上面的公路边等客车时，抬头发现了所谓“麻风病人”张志恩的家。

远远望见红土山坳间绿树葱郁，枝头掩映中，还有一草房。我感叹道：太美啰！那儿有人隐居吗？就要爬上去探个究竟。不料却被送我的人牢牢拽住：去不得！去不得！有麻风病！我是医生啊，有什么问题？就去了。接着是你我都曾经历过的场面，两个老人坐在房前晒太阳。我边观测边与他们聊天，没一点病征，哪是什么鬼麻风！谣言可把他们害惨了。

故事你也写了。张志恩老人原来不住这儿。大约 70 年代，他上山砍柴，遇一窝麻蛇，就拿锄头敲。没想到麻蛇死了一条又窜出一条，他怕了，就逃回家。不知道麻蛇怎么和麻风扯上关系，又使他的前妻被村里人怀疑为麻风，弄去活活烧死掉。而他自己也叫弄进麻风病院，关好几年，才莫名其妙放回家。

老威：后来就迁到荒坡上，与世隔绝，枉背一张麻风的皮。

孙医生：是。没人管，房子漏了塌了也没力气修补。于是我联络附近教会的人，我个人出资近 2000 元，将草房换成瓦房。还给他们买了猪和鸡，好歹像在过日子。

老威：我有一个疑问：你在乡村坚持这么些年，经济上靠什么支撑？诊费怎么收取？

孙医生：开始两年，美国一家有教会背景的机构在支持，我与其中一位姑娘私交很好；后来她的老板变了卦，中止援助，就只能靠主的安排。深入乡村，班车和走路交替，有点路费开销。此外，像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一两月、两三月地走村串乡，吃住都在农家，大致不用花钱。特别是过年前后，挨家挨户有请，还吃不过来。

老威：这不是办法。

孙医生：人心是肉长的，农民看病也主动给点钱，10 元 20 元 30 元不等。病比较麻烦的，也給个一百两百、两百三百。我有进药的渠道，无论如何，成本还是够的。近一两年，国外的一些医生同我有些接触，他们对我做的事很感兴趣，也捐赠部分西药。像你看见过的吴医生和熊医生，还租了房子，在昆明设点。他们不在，我就代管。

老威：我都在里面住过啰。

孙医生：进城来找我看病的农民也住过。最多一晚住 6 个人。嘿嘿，后半辈子就这样了。海外和城里都不缺医生，主如此安排很合理。

老威：主何时给你安排一个心意相通的女助手呢？

孙医生：你比我更需要女助手。多祷告吧。说不定今晚的梦想，明天就成现

实。

土改受害者杨自海

前　奏

2007 年 1 月 10 日清晨，我和孙医生来不及洗脸，就拣了几样旧衣物，跟随一带路的彝族妇女，匆匆赶往位于田心乡发块村西南角的杨自海老人家。太阳刚刚露头，一片片瓦顶还缭绕着薄雾，可村中小道已经热闹起来，不断有猪狗、牛羊、骡马在人类的吆喝下，与我们不期而遇。孙医生的仪态像个超龄老知青，与村民们既熟悉，又保持了适当的矜持。感谢主。感谢主。大家微笑着互致问候。如此伊甸园的暖意笼罩了大约七、八分钟，目标到了。

羚羊一般跳跃几次，过了几滩牲畜粪便，落脚点却是一片荒草。眼前为一横一纵两土屋，横的茅草顶坍塌大半，夯实的土墙已风化得薄，橙色里夹杂灰白的纹路，见证着岁月的斑斑刻痕；纵的为千疮百孔的泥墙瓦房，门楣焦黑。一个满面愁苦的小伙子应声露头，紧跟着露头的是更加愁苦的父辈。孙医生急忙一手握住一个，并歪着脸问：身体可好些了？

回答起码推迟 1 分多钟，中间隔着撕心裂肺的喘息。哦呼——，哦呼——，我直盯着那气锤一般起落的胸脯，感觉世界末日在这一刻真切地来到。极不情愿地跨入门槛，中间是忽明忽暗的火坑，呛鼻的烟雾在洞穴内弥漫，令我们不得不快速下蹲，占据靠门边的有利地形。

适应了约分把钟，我才辨认出在杨自海老人的背后，那神秘的笑。她似乎没有一刻中断过笑意，麻木的，比哭更容易摧毁人。她直挺挺地靠墙而坐，有围巾，有帽子，还有彝族人高眉凹眼的特征，在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大美人。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她的双膝之间，那儿放着她的双手，戴着镯子，一个劲颤动。她叫杨品英，70 岁，杨自海的老伴，3 年前不幸得了帕金森综合症。

我不禁又记起英国短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句子：整个世界的灾难像雪一样落在了她的肩上 / 她无声地呼喊 / 仅仅是为自己的创伤？

正　文

老威：两位老人家好啊。

杨自海：不太好。自从生下来就不太好。邓小平为地富分子摘帽，要好一点了，人与人不搞阶级斗争，不歧视了，又得病。你看啰，我一天到晚喘，她一天到晚抖，没个完……

老威：这是 100 元钱，我的一点点心意。

杨自海：感谢你。感谢主。

老威：惭愧。惭愧。

杨自海：哦呼——，哦呼——，哦呼——。

老威：这个发块村，土改时候多少户人？

杨自海：哦呼。将近 30 户人。划了 3 家地主，5 家富农。

老威：阶级敌人的比例很高啊。

杨自海：我爸爸叫杨茂勋，曾当过这一块的保长，所以一解放，我们家就划为地主。

老威：你爸爸土改时有多大年纪？

杨自海：他 1948 年就去世，只活了 36 岁。他是个急性子，好主持公道，大家就推举他做保长。有一次，邻村有家大户办喜酒，他应邀带些人去祝贺。吃宴席的时候，那家女人们却区别对待。看他是保长，有派头，穿得也体面，马上请入上席，大肉大鱼，十分丰盛；看他带去的几个人，特别是有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无精打采的穷人——可一盯住肉就不眨眼，直吞口水——笑脸转个就拉成哭丧脸。嘀嘀咕咕一阵，就把人往房背后的小桌子引，只给几样小菜，沾点荤腥。我爸爸还在抱拳应酬呢，突然发现这等不平事，当场就拍桌子打板凳，冒起火来。那家主人急忙过来，问清缘由，才将小桌子撤掉，换成正席。人家还当众赔罪，责怪女人家见识短。按理，再大的风浪也平了，可我爸爸就是不依，非要让人改天单独请客。

老威：你爸爸够厉害。

杨自海：他挂在嘴边的话：富人穷人都是人。周围几个村都服他。

老威：后来呢？

杨自海：他得急病，天天拉肚子，止不住，就死掉了。那时我才八、九岁。弟弟才 5 岁。

老威：家境如何？

杨自海：几亩地，种的粮食还不够吃。不过我们舅家会做买卖，周济些过来，日子可以过的。

老威：你爸爸没留下点什么？

杨自海：房子一小点，还有地，还有 1 匹骡子 1 匹马。

老威：土改时候，凭这些财产就能划地主吗？

杨自海：爸爸是保长啰。

老威：死了两三年了。

杨自海：1951 年土改，我才十二、三岁。村里人就这么说的，你爸爸是国民党的保长，虽然他死了，你们家也该划地主。我妈妈叫抓起来，每次开斗争会都逃不掉。五花大绑，绳子勒进肉里，还不准松，不准哭。十几年以后，她死掉，肩膀和手腕上的绳子印还没褪啰。

老威：幸好你爸爸死得早。

杨自海：对啰。等到土改也会遭枪毙啰。当时的田心、发窝，还有周围插甸、高桥几个乡，隔几天就开公审大会，土匪、恶霸、大户、旧社会当过官的，统统拉来枪毙，感觉杀人跟砍洋芋砣砣差不多。田心乡的尼阿勒村，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叫李乐心，非常有钱，但乐善好施。只要有叫花子上门，他都会留住留吃，别人借他的债，数目不太大的，还不还无所谓。去乡场赶街，碰见小娃娃，他就买一碗饭给他吃；碰见老头，他就打一两酒给他喝。有人嫌不够，追着还要，他就回过头说：酒这个东西，少喝活血暖身子，多喝乱性伤身子。适可而止，适可而止。

老威：一个可爱的老夫子。

杨自海：解放了，好人变成恶霸。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挨家挨户动员，叫穷人起来与李乐心作对，可嘴皮子磨破了，也没哪个吭声。连没家没口没人理的滚刀肉，工作组最该依靠的苦大仇深的那种，说别的可以，拿棍子敲别人可以，一提起“李乐心”3 个字，马上就这个啰，这个啰，我的屎胀啰。转脑壳躲得远远的。

咳咳。群众觉悟低，运动没法开展；运动没法开展么，工作组对上面没法交待。咋个办？总不可能让工作组自己拿枪拿绳子上，革命积极性再高，也是外省来的啰。那次，田心乡所有村子的男女老幼聚到利米村坝子开群众大会，解放军和民兵排开阵势，工作队的大官在戏台上指挥，噼哩叭啦枪毙了十几个，把声势造起来，上面最大的官才通过喇叭喊：李乐心来了没？尼阿勒村的恶霸地主李乐心！站起来！唉，头发花白的大善人只好揭下黑帽子，从人堆里拱出来，走向戏台子。还没拢啰，解放军就拿着麻绳扑过去，按个嘴啃泥，再绑个寒鸭凫水，架到戏台前示众。啥子“罪大恶极、假仁假义、收买群众、破坏土改”，等等，罪状吓死人。

站我旁边的真正的坏蛋吕天富叹气说：李乐心落得如此下场！怕踩死蚂蚁的

老好人落得如此下场！世道变了！坏掉，坏掉，全他妈坏掉！

老威：这个吕天富怎么“坏蛋”了？

杨自海：他是个汉族，比彝族还凶几倍。解放前他家穷得叮当响，就搞了一杆枪，去山里当土匪，抢过许多人，听说还欠有人命。清匪时，十几个解放军踢开门抓他，明明探清楚在屋里搂着老婆睡觉呢，却嗖的一声窜没了，比野猫子还快。接着在他家对面的山洞里藏了半个月，直到政府方面做他老婆的工作，保证不杀，才闪出来缴枪投降。

说到底还是穷人。他痛哭流涕，当众坦白：是个匪，是抢人，可没办法，叫地主剥削得揭不开锅，总不能等着饿死啰。况且是旧社会，没遇上共产党，如果遇上，提高了觉悟，肯定打地主，闹革命，闹翻身。

老威：真是个天才演员。

杨自海：咳咳，这一来，政府还不好过分为难他。脑壳是保住了，但也受了几天活罪，弄去和我们一块做苦工。

老威：你也做苦工？

杨自海：是。

老威：那时你还小啊。

杨自海：十二、三岁的地主子女不止我一个，统统被民兵押去挖公路，接着又开荒烧炭，折磨了 3 年多才允许回家住。那真是地狱，白天连着黑夜，干活、干活、干活。吃饭、拉屎都得限定时间，超过了，民兵就打得你在泥浆子里乱滚。我的哮喘病根就这样落下的，开始是风寒病，没钱没工夫治。即使有钱有工夫，人家也不让你治。你算个什么东西啰？地主子女，天生的贱种，被人民政府和贫雇农踩在脚底的牲口。这样拖、拖、拖……

老威：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杨自海：我自己找了很多草药吃，都是缓一阵，又喘得更厉害。有一次，那个抢人的吕天富与我凑一块烧炭，突然对着我耳朵说：我害过人，拉过血债，也大肉大鱼享受过，玩过不少漂亮女人，连大户人家的小老婆都搞过，所以有今天这个牲口不如的下场，也想得通。报应啰。最想不通的是李乐心，一辈子积德行善，亏欠过哪个？可到头来被当作恶霸地主，挨枪崩不提，还曝尸半天示众。而你这种娃娃，又最最可怜，人皮没长熟，零件没长齐，享受更谈不上，连旧社会新社会是啥子东西都没搞懂，就受气挨打，成今生今世翻不过身的坏种，哎哟。他连着哎哟了好几声，把民兵都引过来了。

老威：这强盗还蛮有想法。

杨自海：我们立即低头干活。可没料到，民兵的注意力刚转移到别处，另一个更厉害的强盗也悄悄凑上来。他叫凤一青，也是穷得不行就做贼，却在黑道上混出很大名气。他经常在撒营盘那边抢过路的生意人。据说有一次，他们抢到武装押运的官商头上，双方交火，打了一两个钟头，他们这伙子当场死掉几个，对方却死掉十几个，最后还是把官商给劫了。解放后，共产党出动上千兵马在撒营盘剿匪，凤一青一伙子全落网。公审大会是在高桥乡开的，36 个匪，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标，架到坟地边。一人一个坑，提前就挖好了。见这么大的阵势，民兵端起枪都不敢上。全是清一色的解放军，身上的硝烟味还没退，就直接红着眼珠子来了。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大盖步枪，1 米多长，枪筒酒杯粗，原本已转给民兵用了，又重新拿过来。子弹也是大号，每颗都像中指拇，在鞋帮子边擦、擦，发光发热了，才装枪膛。从左至右，一枪一脑壳，崩的冒一股脑浆浆，轰的栽入坑底，把人都看狂了。就这样六七八、十二三、二十二三、三十二三地毙下去，直到 35，崩！冒脑浆，下坑。36，最后一颗，也就是凤一青的脑壳了——咳咳，不毙了。

解放军将他提起来，他还喊：来呀！老子该死！想死！为啥不打？！嘿，他懵懵懂懂捡条命，也叫押来做苦工。见我和吕天富一块，就过来摸我脑壳：娃娃，我做贼之前也帮地主，长工短工都搞过，没想到世道打个滚，你这个小地主比我做贼之前还苦。

老威：这些土匪后来咋样？判刑没？

杨自海：判啥子刑啰，逃过了鬼门关，按当时的政策，他们也划贫农。

老威：是么？

杨自海：还分了土地、房子和牲口。那个凤一青，解放前接了两个老婆，1个老婆生 6 个，总共有 12 个娃娃，17 张嘴，靠正常劳动实在塞不满，只能做贼。还得做个勤快的贼。开展清匪反霸，他叫抓了，没毙成，就罚做苦工。这一来，老婆娃娃一大窝，挤在草棚里挨饿，眼看吊命粮也吃没了，就豁出去了。十几口破破烂烂的杂种主动找工作组，见面也不讲究说理，就东一砣西一砣倒下打滚，呼天喊地。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强盗的儿子会打洞，工作组拿着没办法。掏枪么，你还没比划，他就朝你的枪眼上撞；喊民兵拿绳子么，他就先把手杆伸过来，连叫“捆啰，捆啰，只要给吃，随便你们捆”。新社会啰，不能饿死人啰。更何况是瓦片都没得的穷光蛋。做贼又咋个？不穷，能做贼么？共产党早在，能做贼么？

老威：这土改，真是越改越荒诞。

杨自海：只有地富分子倒霉到底，从解放土改，次次运动都逃不掉。我妈妈杨玉贤，是 1961 年饿死的，没一颗粮食了，就一把把抓灶灰往嘴里填。我说不下去了，再说，这口气就上不来了。哦呼——，哦呼——，对不起啰，哦呼……

土改受害者杨品英

说明

这对可怜老人的访谈是交替进行的。加之语言含混，伴之惊涛骇浪的气喘，我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回放录音。幸而有孙医生在旁边不断地注释，往事的轮廓方如沉船一般，一点一滴从波涛中闪现。

为了方便阅读，也因为杨品英的回忆本身比较独立，我做了文字技术上的剔分处理，以及语气、语感、节奏方面的压缩和调整。所以在原有场景的真实性上，没做到百分百，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原汁原味。我在此祈求土改冤魂们的理解和谅解，但愿这唯一的个体见证能经得住岁月的磨损。

山洞般的土屋，火坑边的病危老人，气管的哮动，手的战栗——我这个当年土改工作组一样的外省人，兀然闯入。不是要救援，而是为了将他们拖进更加深重的历史灾难中。

上帝啊，用您那无底的杯子，来承接世人的泪吧。

正文

老威：大妈没问题吧？

杨品英：没问题。抖了好几年。没问题。

老威：看样子，你有话说？

杨品英：哦哦。我娘家是发窝乡汤黑村，不太远啰。发块、利米、尼阿勒、汤黑几个村的人，赶街经常凑一块。我和杨自海是亲戚，我的爸爸是他的大舅，我的四爸是他的四舅，我的姨妈是他的妈妈。自小，两家人就亲如一家人。

老威：那你们算近亲结婚了。

杨品英：彝族人都喜欢亲上加亲。解放前，他爸爸虽然当保长，可家境并不富裕，还要经常靠我娘家铺贴。

老威：你娘家有多少土地？

杨品英：一小点。我们彝族地区，在山坡上烧荒种地，家家收的粮食都不太够吃。可我大舅头脑灵活，会做生意，隔三差五赶街时，他就在山里面的田心、发窝等场口，收购些猪羊、鸡鸭，再吆起骡马车，运到山外面的插甸、高桥去卖。

老威：我们昨天就从高桥，经插甸过来，颠簸了好几个钟头呢。

杨品英：以前没公路，骡马车要跑一两天，过坳口时，还要提防土匪。赚点差价不容易，血汗钱啰。

老威：按现在的观点，你爸爸是本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先驱。

杨品英：做生意风险大，可的确比种地划算。我至今还记得，爸爸每次回家，饿得跟老虎似的，卸了骡马，抖抖灰，手脸都不洗，就蹲在门槛上，从妈妈手里接饭吃。他要呼哧呼哧连整 3 斗碗干饭，1 碗肥猪肉，才抬起头，伸个懒腰，出口粗气。然后转脑壳进屋，蒙头睡个一天一夜。

妈妈趁爸爸睡得香，就会把他丢在一边的脏衣裤拣起来，搜出一堆乱七八糟的钱，银元、角子、票子、铜版都有，捧到旮旯里，一遍接一遍地数。她不准儿女去偷看，说娃娃家爱钱不应该。可我们在墙外，却听见她一个人嘁嘁喳喳的，可能是高兴啰。因为爸爸跑一次生意，够全家用好久。

我娘家在本村富了，名声在外，穷人就眼红。我爸爸性子直，总是说：眼红有个屁用，有本事自己出力去挣，荞面粑粑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可是转眼解放了，荞面粑粑就真从天上往下掉，人不必有本事，穷就是本事。上面派土改工作组进村子，还没拢，就在打听那家最穷，那几个人吃不起饭，讨不起老婆，受人挖苦等等，然后对直去寻。见面了，二话不说，就送干粮。如果有空地，还将铺盖卷打开，大家滚一处。

老威：这叫访贫问苦，土改的前奏。

杨品英：除了惹一身虱子，好像没多大效果。因为人饿急了，只对吃听得懂，其它嘛，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人越穷越懒啰，喂饱就想睡觉。而且工作组有 3 个是南下干部，外省人，跟孙医生一样，说的是普通话。没出过大山沟的彝族，可能几辈人都没听过普通话。啥子“翻身做主”“剥削压迫”“三座大山”，哦哟！懵懵懂懂，鬼晓得啥子意思。

老威：工作组也听不懂本地话吧？

杨品英：有本地人翻译啰。不过他们文化高，在村子里蹲一段时间，就啥都弄得明白。晓得彝族喜欢跳舞，也加入进来；对歌也加入进来。我那时十三、四岁，脸盘子漂亮，嗓子又尖又高，可以站在坡坡上，你一段我一段唱大半天。工作组的河北人老唐就三天两头踢破门槛，要请我去唱。还说彝族山歌的调调好听，就是词太老，既然到新社会，就该换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新词。

老威：你是地主家小姐，还让唱新词？

杨品英：搞不清楚啰。我还被老唐请到工作组住的院子去对歌，4 个姑娘 4 个小伙子，都穿民族服装，两人一组轮番对唱。老唐拿着笔和本子在旁边记。全村人都跑拢看热闹，一颗颗脑壳都挤冒烟啰。哦呀，不知不觉，跳舞对歌就变成

运动。先是工作组发展的积极分子挨家挨户通知开会，慢慢就不用通知了，大家主动去开会，还争着发言。大概是 1951 年夏天吧，老唐一变脸，我娘家就出事了。

先是农民协会来通知，我娘家被评为地主了。杨自海爸爸当过保长，也地主；发块、汤黑两边的杨姓，只要和我们沾亲的，都地主。全村 30 多户，有 9 户地主富农。接着开诉苦会，地主家的大人都叫揪去斗争，算解放前的账；再接着命令交粮交钱，按人头，一个罚多少，自己交到田心乡去。哦呀，家里很快就搞空了。骡马、房子也没收，换一间穷人的草棚给我们住；爸爸妈妈也被民兵押去关，一两个月不回家。我们送饭去，看见妈妈正被吊在梁上，逼她交待隐瞒的财产。其实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民兵抄家，就剩一口缺了边的锅给我们。我哀求说：还是留几个碗下来。民兵答应好，就当场摔烂几个碗，喊狗地主拣碗啰。

老威：书中写的，在旧社会，贫下中农就过的你们这种日子。

杨品英：宁愿被土匪抢，也不愿被土改成地主。因为土匪最多抢一次两次，碰上了，算你运气差，总不可能一辈子挨抢吧？当地主是这辈人挨抢，下辈人跟着挨抢，你不服，想抬起脑壳做人，大家就斗争你，把你的脑壳按下去。

乡里的地主斗死了好几个。小华甸（音译）村有个匪，从来不抢穷人，从来不抢附近几个村的人，而是跑得远远的，专抢出名的大户。听说真发了点财。那次到小华甸开群众大会，逼他交出“不义之财”，他犟着脖子不吭声，把大伙惹毛了。民兵下手不够狠，他耸耸肩膀就扛过了；工作组的老唐下台来，笑着拍他背：共产党的政策你可明白？老实一点。他还是犟着脖子不吭声。老唐就笑着一拳，把他打蹲下去，接着蹦了个高，又踢又踩。全场惊呆了，都是第一次看见工作组打人，而且赤手空拳这么厉害，当场就把土匪的肋骨整断两根。眼看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老唐挥挥手，让他大儿子上去，背他爸爸回家。

老威：这个人不就残废了？

杨品英：哦呀，第二天又站起来，去找工作组道歉认罪。

老威：变魔术啰。

杨品英：他家里有一种祖传的药酒，当夜他连灌几次，连敷几次，肋骨就接好了。到处走，没事儿。

可我爸爸吓坏了。他在几个村子转着挨斗，这是头次见身边活生生的人转眼瘫痪。家里人在台下老远，也感觉他浑身哆嗦，有些站不稳了。政府还算人道，那天将所有挨斗的土匪、恶霸、地主都放回家。老唐说：这个人的下场大家都看见了，回去好好反醒两天。我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希望亲属们也配合做做思想转化工作。

老威：转化什么呢？

杨品英：不晓得。娘家的大事小事都我爸爸说了算，可那时候，他完全垮了。回到家，头天不吃不喝，第二天还是不吃不喝。妈妈用破锅煮了些洋芋，和 3 个儿女缩到旮旯里吃，尽量不出声响。天看着看着擦黑了，妈妈就过去和爸爸躺在一块，嘁嘁喳喳咬耳朵，开始听不清他们摆啥子。妈妈哭了，爸爸也哭了，这辈子，我还没听见过爸爸哭呢，闷声闷气的，一个劲地抽。到后来，他们突然吵架。爸爸说：这日子过不成啰！过不成啰！妈妈说：为啥过不成？以前都忍了，以后为啥不能忍？爸爸说：打呀骂呀关呀吊呀，挖苦呀，牲口一样对待呀，都能忍，变了狗还怕吃屎么？可前天大家都看见了，工作组带头把人往死里整！妈妈说：那是匪，我们又不是匪。爸爸说：我们说不好比匪还惨！他们诬我解放前跑生意与匪勾结，抢了哪个哪个。妈妈说：哪过哪个都穷得叮当响，有啥子抢头？你有嘴巴啰，辨得清楚啰。爸爸说：辨得清楚还会当地主？田心、发窝都毙了几批，搞不好下回就轮到我。妈妈说：杨二爷呀，你莫吓人啰！

老威：你爸爸叫杨二爷？

杨品英：是。他 52 岁死的。

老威：你妈妈呢？

杨品英：叫腊月。1960 年饿死，活了 58 岁。

老威：你妈妈姓什么？

杨品英：不晓得。那晚爸爸妈妈互相抱着吵架，哦呀，爸爸两天没吃没喝，还吵得动啰。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妈妈回到我们这儿，使劲搂着，让我们莫朝爸爸那边看。

天更黑了，不一会儿又亮开了，原来是月亮出来了。草棚门哐哐两下，还以为是刮风呢，却是四爸的脑壳拱进来。整个杨家，就四爸的文化高，有见识，他读过初中啰。这时候他来，先蹲下身子，在草铺边安慰我妈妈，还给我和弟弟两颗水果糖。风声这么紧，他还能搞到水果糖，真不简单。妈妈说：兄弟你快劝劝你大哥，他不想活。四爸怪怪地笑了笑。妈妈又催：你有文化，只有你能劝动他不死。四爸说：嫂嫂，我连自己都劝不动，莫提劝大哥啰。妈妈流泪了，我和弟弟虽不懂事，也感觉到不对劲，就放声哭。四爸立即堵住我们的嘴。

我爸爸已从铺上起身，冲四爸点点头说：你来了。四爸也站起来说：我来了。爸爸说：婆娘娃娃一大堆，说话不方便，我们出去。四爸说：好，我们出去。妈妈说：等一下我。爸爸说：你晓得我们出去干啥子。你拦不住的。所以还是留在屋里陪娃娃。妈妈跪在地上，嘭嘭嘭磕了 3 个头，哭喊道：杨二爷呀，好忍心啰！爸爸说：腊月，对不住了。眼前能自己作主，比以后自己作不了主痛快啰。

老威：你们就眼睁睁盯着……

杨品英：是。一家几口眼睁睁盯着他俩走出门。月亮很大，草棚四处都在漏光。岩子后的黑老鸦呱呱叫了一阵，我们冷得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晚我爸爸是上吊死的。他们走出村子，过了河，在那边的岩子顶上找了颗树。我爸爸将就自己的外裤，撕成布条条，挽个套，下巴挂牢就一了百了。四爸站在一边，安安静静等他大哥断完气，干脆后退几步望前冲，呼地跳下百米深的岩子。过后，村里人找尸体都花了一整天。

老威：以后呢？

杨品英：畏罪自杀啰。不光彩啰。在大会上，老唐代表工作组表了态，说我爸爸是恶霸地主，欺压贫雇农，还通匪。自杀算便宜了，为人民政府节约了子弹。接着娘家的大人全部抓起来，斗了无数次。直到 1953 年，土改结束。跟着我嫁到发块这边，相当于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

熬到 1979 年地富分子揭帽，大家平等，日子稍微好过。杨自海这个倒霉鬼，几十年的哮喘，干不得重体力活，是大半个废人。我呢，原来还里外一把手，可上前年得了这发抖的病，就只能一天到晚坐在这火塘边，动不得啰。抹脖子也抬不起手啰。废人望废人，看哪个先去天国。

老威：你们的儿女呢？

杨品英：刚才你看见的那个是我的小儿子，20 几岁，还整不成房子，结不成婚。现在我们就是村子里的穷人啰。幸好全村都信靠主，不搞阶级斗争了，不歧视人了。全部是上帝的儿女啰，记爱不记恨啰。特别是孙庆元的媳妇，对我们特别照顾，个个星期都要给我们送好吃的。

感谢主。感谢主……

退休政府官员苴公

前　奏

这条寻访线索是个四处云游的摄影家朋友提供的。某天狭路相逢，彼此问询近况，我随口说还在“搞土改”。不料彼兴趣极浓，并当场摸出手机，给彼元谋县老家的舅舅打电话，三言两语就敲定了。

稍后在酒桌子上，我还表示疑问：你舅舅是政府官员，咋会干反政府的事儿？彼答：现在的政府官员，私底下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儿，当婊子立牌坊，社会主义墙角大家挖嘛。可我舅舅的情况还有点特别，他跟你一样，多看了几本书，假反动就变成真反动。

2007 年 4 月 8 日凌晨从成都抵达昆明，滞留 1 日，拉上冤案线人孙医生，约也曾在元谋县做过政府官员的蒋老师见面。我刚说：土改这本书的开头就是我们

3 人……蒋老师就接上话茬：那结尾这趟也是我们 3 人。孙医生点头称好。

于是像循环的戏剧，第三日清晨，我们同样在老地方碰头，同样由蒋老师驾同一辆甲壳虫型的小车，乘兴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却有闹有笑。我说：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元谋，北京猿人，元谋猿人、山顶洞人。没料到这次还真投奔祖先去了。孙医生说：时代朝前你朝后，跟考古一个性质嘛。蒋老师说：对对。所以我们愿意陪你。

沿途停了两三次车，我们借小便空隙，参观了云南白药的原料基地。气温极低，令人下车就打寒战。哈气成冰夸张了，但吹气成雾却实实在在。蒋老师说：这儿是马头山制高点，差不多是马眼睛的位置，从眼下起，全是下坡路，从马脖子到马屁股，落脚点就是元谋县城。

下完马脖子，连拐两三个山坳，刚拢一个叫“大梁子”的场口，一团团空心石头般的积雾便迎面砸来，令人晕头转向。蒋老师立即减速，把汽车变成牛车，一寸一寸挪动，可双眼透过镜片，鼓得像两颗核桃。我说：刚才空气比玻璃还透，怎么眨眼就成迷宫了？蒋老师说：元谋是云南最热的地方，每年 5 月，气温就窜高 40 多度。蒸锅原理嘛，热气顺着山体往上翻，在这儿遭遇头顶的冷空气，就形成了迷宫带。我调侃说：我们祖先咋会选口蒸锅定居？孙医生插话：猿人时期，元谋说不定是个四季如春的风景区呢，后来树砍光了，当然变成蒸锅。蒋老师刚说：对啰，四周差不多变为老威的脑壳……车嘎地刹住，路堵了。原来有倒霉鬼连人带车栽岩了。

等候十几分钟。不料我车前面的大卡车突然发作羊癫疯，坦克一般倒退而来。我车措手不及，刹那间竟扎入货箱之下，犹如被怪兽的巨嘴吞入半截。我们 3 张嘴一起呐喊，以蒋老师的女声为最，惊恐，尖利，像被几十把刀子给刺穿。

然而呐喊并没有阻止末日的降临，我们仍在巨轮之下，在轰鸣之上，中邪一般后退。眼看要坠崖，而且是万丈悬崖。四周掀起了人声的骇浪。怪兽嘎嚓一下站住了。

如梦方醒的卡车司机跑了过来；

屁股后跟了一大堆看客。透过车窗玻璃，那些脸如从云雾山洞里飘出。

有一只后轮已悬空。我们 3 人面面相觑，不由自主地哆嗦。后来在县城修车时，蒋老师还心有余悸，指责我是“著名的扫帚星”。我问为什么？她说：你忘了前年的第一趟土改采访？也是这辆车，也是这 3 个人，结果陷进泥坑，差点没起得来。我连忙哦哦，猛拍秃脑门，称“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下午两点过，我们坐在小饭馆里狂吃一顿，算自己给自己压惊。元谋是个没啥特点的小县城，就一些高低不平的房子，一些宽窄不等的街道。因刚下过雨，行人稀稀拉拉，空气也黏乎乎的，像被铺天盖地的油汤给滤过一遍。但是蒋老师却数说了此地的不少优越之处，其中有蔬菜特别新鲜，番茄比外面的苹果还好吃，

等等。

我点头称是。接着让这位昔日父母官带路，去中兴街某某号寻另一位昔日父母官。在当街铁门外大呼小叫一阵，又打了电话，一个头发乱如刺猬、衣着简如乡民的家伙才开门纳客。大家相视一笑，他自我介绍道：苴公，你朋友的舅舅，元谋县政府某某部门原主任。说着绽露一口比头发更乱的牙。

从小院子上到 2 楼和 3 楼，我们参观了苴公的书房和卧室，陈年旧货、老书老杂志极多，可同样乱如刺猬。在客室，宾主各自掸扫臀下灰，落座。交谈开始。

正　文

老威：先生蛮有名士风度的。

苴公：人死就是一堆灰，既然活到这把年纪了，就没讲究的必要了。我侄儿来过电话，说你是专门搞土改专题的大作家？

老威：惭愧，惭愧。

苴公：我在县里负责编纂过《地方志》，晓得解放前元谋县长朱淮的侄姑娘还活着，快 90 岁了。你可有兴趣？

老威：当然。经历过土改的老人我还想多采访几个呢。

苴公：抢救历史，义不容辞，一会儿我亲自带路。

老威：没料到先生你如此爽快！

苴公：共产党衙门呆过的人，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承认我以前也有毛病，可近几年活醒豁啰。每去一趟昆明，都要去逛地摊，买不少海外的盗版书回来啃。《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文革内幕》《往事并不如烟》刚读过不久，还有《炎黄春秋》上的文章，很有分量，很长见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看书想问题啰，可我身边退下来的老同志，一天到晚钓鱼打麻将，最多看点《晚霞报》，抄点老年养生知识，没得意思。

老威：你是那年到元谋的？

苴公：我在昆明读的大学，1963 年毕业，就分来，一直在单位坐办公室。文革中是造反派，被结合进革委会，可因为胸无城府，不整人害人，也没树什么敌。后来提升进县政府，上进心实在缺乏，官当不大，就挪开屁股把座位让给有本事有野心的人。今年 67 啰，来日无多，才觉得平生最大的失误就是加入共产党。把成立了 57 年的新中国砍成两半截，前半截专制独裁，后半截贪污腐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真他妈的一无是处！越想越气愤，越想越觉得自己划不来，于是就在几年前写了份《退党申请》，递交给县委组织部。这下捅了大漏子，官阶

从高到低的领导，都排着队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啊。嘿嘿，年轻时候，觉得入党光荣，入党不容易；可到老来，退党虽不光荣，却比入党更不容易。但是不行，我非退不可，免得我的子孙后代骂我是腐败分子，免得我夸海口标榜清白的时候，他们表面不吭声，转过脑壳就龇牙咧嘴笑。但是啊，组织不吃这一套，元谋这地方，自有猿人以来，就翻不出一个退党的，你苴公想借这个制造新闻效应，办不到。

老威：后来呢？

苴公：组织部长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不服我，就出了个主意：将组织关系从县委提出来，交给我个人，并开了介绍信，指明转入本人目前所在的街道党委。

老威：什么意思？

苴公：县委踢出的球，街道没接着，就装聋作哑嘛。如此，这个狗日的组织关系就永远睡在我的荷包里，甩不脱。我不交党费，也没人来要。组织部长说：卖我个面子，莫闹了，好歹你的铁饭碗还是共产党给的啰。

老威：还蛮有人情味的。

苴公：算了，莫提这流产的退党了。还是书归正传，给你们讲一件我所接触到的土改公案。

老威：洗耳恭听。

苴公：大概是 87 还是 86 年？有些含混了。上级转了 1 封《申诉信》到我手中，并责令我调查。咋个回事儿？原来这信是离县城不远的苴林乡 1 个老倌倌所写，他连续不断地申诉好几年，楚雄州委就将他的材料转发元谋县委。嘿嘿，县委领导一碰头，这个谁都不肯去的“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就落到我这个主任肩上。

苴林乡有个白沙井，从解放前到解放后，村民都在井里舀水吃。可到了土地改革，可能是工作组刚拢不久，有贫雇农发现井水有毒，就指控是村子里几户地主干的，其中就有这个申诉的老倌倌。在当时，这是个比较轰动的反革命集团案子，罪名除了投毒，还有放火、预谋杀人、反革命暴动等等。开群众大会公审，结果枪毙 1 个，无期徒刑 1 个，其他还判了好几个。

我动身到苴林乡，在白沙井蹲点整整 1 个月。每天上午、中午、下午都找不同角色的人问话，案子当事人及家属，贫下中农，民兵，农民协会，一般群众。我还跑了别的几个地方，尽量不漏掉任何关键性的细节。每一份讯问笔录，我都当场念给证人听，如认可，就签字盖手印。不认可就拉倒。

劳改农场也去了，法院的判刑材料也调来对照研究了。我的调查结论是：彻彻底底的假案。所有罪名都是通过刑讯逼供强加的，比如几个民兵轮番用柴块子暴打，不招，很可能当时就出人命。我给县委写了个将近 30 页纸的详细报告，

仍然把老倌倌的《申诉信》，还有大量的询问笔录附在后面。其实老倌倌的要求很简单：感谢政府摘掉他戴了多年的“反动伪军”的帽子；要求政府摘掉他戴了多年却还没摘掉的“现行反革命”帽子。

老威：可怜啊可怜。

苴公：某某部长看了我的报告，点头认可，马上汇报给上级。县委为此召开专门会议，让我到场作详尽的案情介绍，并展开讨论。大家都认为，既然是元谋县境内发生的历史冤案，就应该由我们自己妥善处理，该摘帽就摘帽，该平反就平反，这样也能保个面子；如果以后让州委来清查、纠正、责令解决，就被动了。

老威：这个结局还算可以啰。

苴公：是。某某部长根据会议精神，将所有材料转给县委“历史旧案复查领导小组”。可谁都没想到，那个组长刚巧是土改后期由民办教师提升上来的干部，思想深处压根没觉得土改有错误。听说他翻了翻材料，只有一句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意思是，你平了这一桩案子，其它的跟着就来，到那时收不拢口，就相当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老威：可是 1979 年就给所有地富分子揭了帽。

苴公：左的思潮在党内影响还在，直到现在影响也还在。那个组长就是抵着不办，谁能拿他咋样？

老威：我手中有本《土地改革运动史》，2005 年出版，作者罗平汉。上面还在赞美土改是“中国农民伟大的翻身运动，它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苴公：所以，只要土改整个没翻，哪怕在其中发生过再多的局部冤案，都可以死拖死赖，时间一长，就不了了之。

老威：你写的那些材料呢？

苴公：全部上交了，这是组织原则。可能一直冷藏在公安局的档案里吧？这么多年又过去，当事人死得差不多了，材料销没销毁也不晓得。哎呀，你这个年轻人，还写土改！费力不讨好啰。

老威：我也算地主阶级狗崽子嘛。

苴公：《炎黄春秋》杂志上，也经常登一些揭露真相的文章。去年有一篇《土地改革法的夭折》，就透露了共产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赞成以行政命令或暴力手段去推进土改。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大局，“和平土改”必然破产——明白人一看就晓得，这字里行间掩盖着何等血淋淋的历史！

我身处偏远小县城，也能读到这种与“八荣八耻”的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东西，算幸运了。说明胡锦涛还有点点想法，明里暗里都要显示：我这个胡式共产党，与毛式、邓式和江式不一样。

（鉴于被采访人的真名及职务需要隐私保护，该文使用了“苴公”的化名）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 （一）

前　奏

2007 年 4 月 10 日下午 5 点，我们跟随退休官员苴公出门，走了一段污水四溢却行人稠密的老街沿，来到宽阔笔直却人烟稀少的城边马路。由于蒋老师的小车已躺入修理店，我们就招手要了一辆机动三轮。4 人挤进鸡笼一般的车棚，车身就嘎吱嘎吱摇曳不止。孙医生担心道：这行吗？可否再要一辆车？司机不服气道：咋个不行？水牛也能拉走的。见我们神色异样，又补充道：不过你们昆明下来的，普遍比元谋本地的要肥些。

蒋老师挂不住脸，我却被逗笑了，还回道：有啥子科学依据？苴公不耐烦道：快开快开！肥瘦跟你有狗屁相干？

司机踩几脚油门，车就如挨揍的野狗，呼的窜将出去，屁股拖长长一窜黑烟。蒋老师微笑道：这条路不错吧？它还是我几年前在这儿做官时主持修的。苴公却抬杠道：晓得啰，面子工程啰。孙医生立即附和：政府嘛，要办实事，不可以光做面子。我急忙挂免战牌道：同志们的要求莫太高，有路总比没路好，政府要脸总比不要脸好。

几句话还没落音，大路和城市都一起终结，估计有十来分钟行程。接着是乱七八糟的红土浆子路，泥槽翻起半人高的主路两旁，还分了数条叉。幸而该下车了。

但眼前可谓令人绝望的超级噪音区域！左边为汽车修理铺，停靠好几辆装卸式大货车；右边为汽车修理铺，停靠好几辆装卸式大货车，并且都在肆无忌惮的忙碌中。苴公站在一潭污水之侧，盛情指点一线浮面的砖头，请客人鱼贯而上，而自己牵着裤腿殿后。

过了简单的之字形水泥楼梯，现在我们已经在两层楼的高度，脚下陷阱似的空间填了一堆车和人，而头上还有顶楼、悬崖、望不尽的山峦和乌云。马路对面是田野，老娼妓一般，被人类蹂躏得无声哭泣的田野，灰红、灰黑之间，泛动着灰白泪水似的生活垃圾。

我们要拜访的角色依次呈现。先是患有忧郁症的女儿，在门洞内冲我们笑了笑，没话；接着是在昆明打过工的见过世面的孙女儿，微黄的染发，挺灿烂的笑容。苴公在下面仰头招呼道：红英啊，你奶奶在不？

红英还未作答，本文的主角就在她的背后探出脑袋。有客人来？她小孩一般哈哈笑着。请进来！请进来！

屋里光线极暗，稍微适应了几秒钟，才认清狭窄的空间有 3 张床。我捏住这年近 90 的寿星的枯柴手，一起在靠窗的床沿落座。趁苴公作开场白的间隙，我默默祈祷，感谢上苍，感谢命运，如此眷顾于我，眷顾于我的工作。

正　文

老威：老人家身板还如此硬朗，真叫人高兴！

朱家学：吃得，睡得，走得。就是眼睛有毛病了，看东西麻麻杂杂的，所以姜蒜不能吃，辣椒花椒不能吃，牛肉羊肉不能吃。平时少生气。门出远了呢，要人牵着。是啰，活到这把岁数，啥子风浪没见过，啥子西洋镜没瞅穿过，有气也生不来。

老威：医生的告诫吗？

朱家学：医生？好多年没看过医生了。

老威：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了不起的医生，长期跑乡下，给农民治病。我呢，是个写陈年旧事的文人，眼下最感兴趣的是土改。

朱家学：土改？不敢提，不敢提。

老威：老人家不提，以后就没人提,历史的某一段就从你身上断线了。这位县政府的苴公，你们都熟悉吧？

朱家学：苴主任是我家的恩人啰。这座房子的地皮，就是他以“侨眷”的名义，帮我们申请到的。

老威：我晓得你有个大你 3 岁的二嫂叫黄友瑞，定居美国；我还晓得 2005 年 8 月，你夫家重修过《湘潭石子坑居仁堂黄氏族谱》，里面对你丈夫的评价仍然很不公平，说什么“我黄氏家族，以德立家，友朝未继承，自食其果，后代子孙应引以为戒”。

朱家学：是啰。黄友朝已经平反了，湖南那边不太了解其中的冤屈。

老威：所以嘛，你得说。趁这么多人在场，你得把你经历过的都说出来。

朱家学：外面天黑了？

老威：还没有。

朱家学：我咋个感觉天黑了？孙女儿呢？红英！红英！快把灯拉燃！好，可以了，亮了。这个老威同志光着脑壳，像个和尚。哎呀，我家的事难得扯清楚啰。

老威：慢慢来。莫着急。我提个头：你是哪年出生的？

朱家学：我只记得属羊，今年 88 岁。

老威：据《黄氏族谱》里记载，你生于 1919 年 8 月 22 日。

朱家学：嘿嘿。

老威：你一直在这儿？

朱家学：我是土生土长的元谋人，老屋在离公路不远的大沟村。站在顶楼往下望，有一条贴着公路的机耕道；再朝前，弯弯曲曲的泥巴路，翻两个坎坎，就拢大沟村老屋了。房子塌了，院墙倒了，草已经 1 人多高。美国的二嫂资助钱，政府让我们搬到公路边，建了这座水泥房子，总算有个踏实的窝。

老威：旧社会最后一任元谋县县长叫？

朱家学：朱淮，是我大爹。他在云南讲武堂毕业，20 年代就跟随孙中山，勤务兵出身，参加过北伐，参加过抗日战争，屡立战功，从团长、旅长一直升到 12 师的师长。大爹他结婚，孙中山是证婚人，送了一对银芯，还有对联和条幅，可惜后来都毁于战火。

老威：不简单哦。你祖上是士绅家族吗？

朱家学：不，帮人的，一直帮，到我老爹（祖父）还在帮，是本地大户朱玉华家的长工。

老威：按土改的阶级标准，应该划成贫雇农。

朱家学：对啰。而且是大户很信任的贫雇农。我老爹头脑灵活，手脚麻利，帮工好多年，连婚事都由人家操办。本来我家姓杨，据附近十棵树村编纂的《杨氏族谱》记载，最先的老祖是明朝朱元璋时，从南京过来戍边，后来才在元谋定居下来。同志你想想，传了多少代？为啥我家又改姓朱？

老威：人家朱家对你家有大恩嘛。

朱家学：对啰。朱玉华帮我老爹立了门户，我家从此改姓。我老爹生了 4 儿 4 女，好像男丁都不太安分守己。小时候没办法，在坡上放猪放牛，可到了十几岁，就开始削尖脑壳朝外跑。

老威：跟现在一样吗？

朱家学：现在是跑外面打工，那阵是跑外面玩炮火，时局动荡啰。先是我大爹，一离元谋，就一二十年没音讯，二三十年才回乡。然后是我爹朱海，十几岁娶了个马街（即如今的元马镇）的媳妇，结果处不来。他媳妇家嫌我家穷，搬不出动不动就遭水淹的大沟村。我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昆明还不过瘾，竟下了广州。混几年，学会文化，还当上革命军第七团的团长。

老威：哪个部队的第七团？

朱家学：晓不得。

老威：不得了哦。

朱家学：我大爹的部队在上海驻扎过，打日本鬼子。他的儿子，也是我的堂弟朱家荣，是被复仇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的，当时才 19 岁。我大爹一直将堂弟的照片随身带着，抗战胜利返回云南时，还经常拿出来看，有时候还悄悄抹眼泪。

老威：后来呢？

朱家学：后来都回元谋。

老威：衣锦还乡啰。

朱家学：我爹是开着吉普车回来的，第一件事就忙着重修大沟村的房子，太烂了，没法住人了。我爹把房子迁到高坎上，再大的水也淹不着。可防得了水，却防不了匪。四几年的元谋乱得很啰，大股小股的土匪，十天半月来一次，胆大的抢，心虚的偷，与我家有仇的就点火烧房子。记得我家房子被烧了三四次，毁掉又建，建起又毁，搞得手忙脚乱。有一次，火燃旺了，我家的帮工上房泼水，埋伏着的土匪就从林子里打冷枪。帮工连中两弹，晃了好几下，才从 3 楼这么高，哗啦栽到院坝里。嘿，不偏不歪，正砸在我爹的脑壳顶，溅了一身血，看起来好像我爹杀了人。

老威：你家出两个大官，据说你大爹还是国大代表，土匪还敢找麻烦？

朱家学：都是为元谋啰。我爹刚回那阵儿，县城就叫攻破过一回，李县长也为国捐躯了。继任县长叫文泰和，把我家的门槛都踢破了，死活要请我爹当县里的自卫大队长，负责防匪守城。我老爹晓得了，还拉住我爹说：海娃呀，千万当不得！我家房子在城墙外，如果土匪攻不下城，惹毛了，就会像疯狗一样转嘴来咬！到时候我家遭殃，大沟村也遭殃。我爹说：我是军人啊，虽然如今退役还乡，可保境安民仍然是不可推卸的职责。

老威：明火执仗，攻城掠地，什么土匪这么厉害？

朱家学：为首的叫丁志平，枪法准得很……

（苴公插话：这个丁志平有些来历。他是丽江华坪人，二几年入党，随后与组织失去联系，所以到 1935 年又入一次。后来他受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的派遣，

回云南组织反蒋武装，十分骁勇善战。拿行话说，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威：不是寻常意义的土匪啰。

苴公：可一解放，他真被当作土匪给抓了起来，逼着写交待，由当时的边纵丽江第 9 支队政委杨某某亲自审阅。哎呀，二几年入党，还受董必武直接派遣！资格比自己老得多啰。如果经过调查，情况属实的话，这个姓丁的阶下囚岂不转眼就变大功臣？要爬到我等脑壳上去！一旦他成上级，硬要追究我等将他打成土匪的罪名，咋个办？搞不好他也来个依样画葫芦，把我等当作土匪抓起来！他妈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推出去枪毙掉，死鬼总比活人好打发。

老威：万一上面追查咋办？

苴公：人死不能复生，事过境迁，多检讨几次总能过关啰。

老威：厉害厉害，这才是真正的匪性未改。）

朱家学：因果报应，逃不脱的。丁志平好威风哦，我爹费了天大的力气，还得到几支回民队伍的及时增援，才把他的人马打退。

老威：你家和回民还有交往？

朱家学：是啰，我老爹那辈有 4 弟兄，跟元谋周围的回民恩恩怨怨扯不清。我 7 岁时，回民就闹过起义，围住元谋老城，要把汉族赶走。那阵的县长姓董，还找我家老爹、二爷、四爷，商量咋个守城呢。我恍惚记得几个城门都着火，民房也燃了好几排，老百姓如炸窝的马蜂，轰轰轰满街窜，一会儿涌到这边，一会儿涌到那边。我爹还站在街中央指挥，又带人爬房子浇水，打墙，断火源。我二爷就是那次被烧死的。后来回民退了，两边经过谈判，和解了。但是我家老爹传话给回民，要他们交出领头的肖长安，抵我二爷的命。肖长安怕死，就连夜逃到保山去，我家也就没继续追究。从此后，回汉两边客客气气，一说打土匪，两边都卖力。

老威：原来如此。请老人家再回头讲你爹守城。

朱家学：那个文泰和，还是第 2 个县长呢，吓破胆了，趁我爹在城墙上顶着，丢开县衙和家属连夜溜了。哎呀，又是我家遭殃！被丁志平一把火烧成白地。我爹又急又气，病倒了，弄到昆明住医院，还在病床上干瞪眼，啥都说不出来。我服侍他，忍不住在一边嘀咕：保城保城，保下来是座空城。人家是来找县长算账的，关你啥子事嘛。

老威：接着呢？

朱家学：接着就是我大爹朱淮被委任为元谋县长，1949 年从昆明下来，当了大半年，就解放了。唉，我老爹还劝阻过他，兵荒马乱，你既然在外面当过师长，就趁着关系多，场子上蹬打得开，瞅个空子跑啰，何必要回来趟浑水！元谋各方面太复杂，本事再大，也要当心阴沟里翻船。可我大爹没听，一幅“受命于为难之际”的样子。最后一次，丁志平带人攻城，眼看守不住，我大爹才连夜突围，上昆明搬兵。搬来了卢汉手下的保安 7 团，可一拢城，见炮火喧天，都怕送死，就退得远远地驻扎。我大爹急了，叫团长带头出击，团长不动；他又去叫营长，结果营长刚和他一块出军营，膀子就挨了一枪。跟在屁股后的兵吓得手脚抽筋，哗啦一声全散了。营长就躺在地下吼：团长呢？团长钻了哪个牛屁眼？老子在前头给他顶炮火，等伤好些了，动得了，老子就找他拼命！

老威：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真该垮台啰。

朱家学：救兵没起着啥作用，元谋城里死了许多人。后来丁志平自己退了。

再后来解放军就进城了，大家都传，是跟地下党里应外合。

老威：你大爹被俘虏了？

朱家学：逃了。在之前，云南省主席卢汉托人带手书给他，意思是大势已去，要自己看兆头。我大爹还没琢磨明白，就来不及了。

老威：你亲眼见着你大爹逃跑？

朱家学：黄友朝在昆明，我们结婚后，生了大姑娘，就住昆明了。家里出事，我妈没人管，我就不顾黄友朝的阻拦，硬要回元谋接我妈。哎呀，哪还有家哦，大沟村烧光了，全家都搬进城内的蒋家巷暂时呆着。我说：妈妈，啥子都不要了，赶快走啰。我妈却糊里糊涂，舍不得家里的坛坛罐罐。当时我大爹刚刚失踪，听说是换了件麻布衣裳，化妆成老百姓跑的。过了几天几夜，家里才晓得他被抓住的消息——饭没吃水没喝，他就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可翻到马头山，大概在白云坡吧，被罗真撞上了……

老威：我们曾路过马头山，地理很险要。你大爹想逃往昆明吗？

朱家学：不晓得是上昆明还是进禄劝，总之就撞上罗真了。这个罗真是民青成员（即民主青年同盟，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老威注），正带着解放军，漫山遍野搜我大爹。尽管我大爹过卡子时，还包着头帕，挑了一担土碗，可还是被罗真一眼认出了。他首先朝天开一炮，百把条枪就上上下下冲过来，“缴枪不杀”吼得比雷响。其实大爹他哪来的枪啊？只能高举双手，让一堆人按在地下，拿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罗真一路都在打我大爹，一会儿拳头一会儿耳光，一会儿又是棍子，连解放军都看不下去，拦住不让继续打。我大爹先被关在武定监狱，后来又叫押回元谋。

（苴公插话：这个罗真也算元谋的老革命，可在八几年的时候，不晓得因为啥子问题，受到审查，一时想不通，就自己上吊自杀。）

朱家学：罗真还是我幺爹朱杨的干儿。可他爹罗久师不晓得跟哪个结了梁子，莫名其妙被杀了。后来他却将这个罪名安在我大爹脑壳上，口口声声要报阶级仇。

老威：你大爹什么时候被杀的？

朱家学：1950 年 1 月 17 号元谋解放，1 月 26 号我大爹被公审，枪毙掉。死前人家问他有啥遗言，他就说了 8 个字：生为元谋，死为元谋。

老威：你大爹算条硬汉。

朱家学：枪毙他那天，元谋老城大街小巷都挤的是人，树上房顶上都爬着人，解放军、地下党，前前后后好几百，押着他朝刑场走。我大爹自从二几年跟随孙中山北伐，身经数百仗，啥子场面没见过，生离死别都看麻木了。所以还边走边笑。拢了土坑坑前，解放军的枪筒子抵住后脑勺，吼“跪下”，他回过头，眼睛都没眨，大声说：你也是军人，我也是军人，军人不可以跪着死。解放军上去四、五个，都没把他压服贴，就只好让他站着挨枪啰。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二）

人不人，鬼不鬼，野兽不野兽，畜生不畜生。我早就有死的心了，可娃娃咋办？

插　记

夜幕渐渐降临，我开窗透气，几颗星星居然出来了。蒋老师一边作笔录一边说，明天千万别晴，因为那不幸的太阳一旦升起，气温跟着就疯狗一般往上窜。我说：有这么严重？那元谋猿人咋几百万年前就到这儿了？朱家的人都笑了，连称“不碍事”，老寿星更是夸口，说整个夏天自己扇子也不用。少吃造火的东西，心静自然凉嘛。孙医生问：你经历了那么多惨剧，能做到心静自然凉？老寿星点头说：因果报应，不用去管它啰，那些整过我家的贫雇农，多数都短命，三四十岁，五六十岁，老天就把他们给收去了。偶尔有两三个熬够七八十岁的，要不就孤寡，要不就多病，要不就儿孙不孝。有时在马街碰上我，头都抬不起。我说：对对，上苍有眼，他们都注定活不过你老人家。连毛泽东这个大魔头，人人吼“万寿无疆”的，也就熬到 80 出头，不仅死得难看，儿孙也难看。老寿星听得心花怒放，连夸“红英乖孙女，又漂亮又懂事，与我最合得来”。

红英有些羞涩地站起来，对大家说：饭已经摆好了，请随便用一点。我们稍微推辞，就跟红英出这门进那门，来到居中的逼仄的堂屋里。我始终扶着老寿星，使她觉得又“遇上一个忘年之交”。接着落座，客主十来个人围住一张黑乎乎的矮桌，面上有荤二素四。灯光昏暗，迎门的墙中央，照旧是福禄寿三星的拙劣年画，以及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我们承其传统的恩泽，在下面你请我让。红英在给老祖宗夹菜，朱家女婿的主攻对象却是我，不过几秒钟，碗内的肥肉块子就堆满了，吓得蒋老师和孙医生立马将碗筷都搂在怀中。

我的确饿了，就连整肉饭若干。可能是胃口接近，朱家女婿和我侃起四川话，原来他是四川自贡地区的农民，80 年代初流落至此，走投无路，就做了这个破落地主家族的上门女婿。“开始在大沟村，连房子漏了都没钱翻修，成分高，没地位，遭人歧视，后来才慢慢好起来。特别是有了海外亲戚，成为统战对象，就更上一层楼。”我随口问为什么？“元谋小地方，统战对象稀少，所以碰着统战时期，我们还是能得到某些实惠。比如这房子的地皮，政府就没要钱，这年头，啥子不要钱啰？”

不晓得什么原因，红英嘟着嘴，吆喝一声，阻止她爸爸侃下去。她妈妈却没有一句话。本来我们准备暂别的，可老寿星用餐后，余兴未减。我看了看时间，才八点多，就问红英是否继续？或继续后是否影响老人的睡眠？

星星还在天边闪耀。红英笑着说：没关系，我也想多了解一点我家的旧事儿。

正　文

老威：你大爹家还剩什么人？

朱家学：我大妈是大半年以后被枪毙的。她是苏州人，读过女子学校，属大家闺秀，却 20 来岁就跟随我大爹走南闯北。他们家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上海被日本人杀害，剩两个小的，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没长成人。

老威：这个时候土改应该开始了。

朱家学：刚刚清匪反霸。可我大妈既不是匪也不是霸，就一个四十六岁的老婆娘。本来是关在县城，可大沟村的农民协会硬要把她弄回来，天天斗争她，打她。要死的那天，她半夜就醒了，对着我一直流泪。我说：大妈呀，星星还挂在

天上，你再睡一会儿啰。她说：我倒是想睡，想睡过去就再也不醒来，可是睡不着。我说：是不是叫打狠了，身上痛？我给你揉一揉。她说：自从你大爹去到现在，我哪天不挨打？哪天不痛？可心比肉痛多了。我一个外省人，从来不懂政治，从来不问江山社稷，只是在做姑娘时，倾慕英雄，那个军阀混战、翻天覆地的时代，哪个姑娘不倾慕流血不流泪的英雄呢？谁会预料今天客死他乡的下场！

听她的伤心话，我也忍不住流泪了，却不晓得如何劝解她。

老威：你当时也三十多岁吧？

朱家学：是。城里的房子被没收掉，全家老老少少都叫圈在大沟村。破草房住着，三天两头挨饿。我大妈真是来错了地方，她说的话，村里都没几个能懂，更莫提交流了。所以她说，想娘家，想死之前看看苏州。当然这相当于梦话啰。

老威：给她定的什么罪名？

朱家学：国民党县长太太。反革命分子。

老威：这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朱家学：人家说有，就有。大妈最不放心的是两个娃娃，所以她托付给我，东一句西一句，唠叨了好久还放心不下。我说：大妈呀，你不用再说了，有我一口吃，就有他们一口吃，没我一口吃，也不会让他们饿着。大妈点点头，又将外衣里面的三件好衣裳换下来，说是娘家几十年的箱底货，本来要穿着去见大爹的，这次就全送我。因为以后没机会感谢我了。

遭孽呀。我没法推辞，只能收下。天已蒙蒙亮了。我替大妈梳完最后一次头，就坐在草铺上候着。一会儿，民兵将我叫出去挖泥巴……

老威：挖什么泥巴？

朱家学：死人坑坑。大沟村的地主都押去挖。我是汗一把泪一把哦。接着民兵就挨家挨户通知开会，天大亮时，周围几个村都来齐了，人脑壳又是密密麻麻。我们全家，还有好多户地主都被圈在一块，参加大会的群众都朝我们吐口水。那天主持公审的叫朱恒元，是个南下干部，解放后元谋县第一任公安局长。他的老婆叫王婉兰，家里也是大地主，可不晓得施展了啥子手段，傍上大靠山朱恒元，成为革命太太，这一下子就翻身了。嘿，她还耀武扬威地站在台子上宣布：今天人民政府要枪毙老班果，枪毙老苏州。

老威：什么？

朱家学：老班果是我四婶，住在班果村，所以叫老班果；老苏州是我大妈，元谋就她一个苏州人，都叫她老苏州。

老威：她们的真名呢？

朱家学：我四婶叫张桂林，我大妈叫张丽娅。大家都记不得，所以枪毙时没宣布她们的真名。哎呀，啥子世道啰，王婉兰宣布完，我家两个老婆娘就被民兵拖过来，脚软了，走不动路，只有靠民兵拖。才到半路，鞋子就掉了，光脚板磨出血了，裤子垮到半截，人已恍惚，估计啥子都不晓得了。翻了几个土坎坎，来到死人坑前，大家都亲眼见着我大妈跪在那里，挨了七枪。

老威：七枪？都打在哪儿了？

朱家学：民兵手抖，有几枪没打准。中的全在脖子根，差不多要打断了。我大婶中的也在脖子根。脑壳耷起，血泡泡咕嘟咕嘟冒了好久。

老威：然后就栽进坑了？

朱家学：他们临时又变主意，要把死人抬到村子外面的田坝坝去。四个人抬一个，八个人抬两个。脖子拖着，脑壳一点一点朝地下坠，我实在不敢抬，民兵才让我抬大妈的脚，他们抬脑壳。这样折腾到河边，我瞅着不对劲，就叶嗵跪下

磕头：求你们！让她们落土为安！民兵说：反革命婆娘死了，连狗都不如，啥子安不安啰。我跪在地上，整死不起来，他们不耐烦，就将我大妈和四婶扔在那儿，不管不顾地走掉了。

我一个瘦小婆娘，面对两个死人，喊天也无奈。只好回家。捱到第二天大早，摸到班果村，找到四婶的一对儿女。我说：弟弟妹妹哟，你们妈妈的尸体还摆在河滩边，还是大家一起去埋掉了事啰。哎呀，这两个狗日的不孝子，他们不敢去！人都死了，还有啥子阶级界线？可那个年头，都不敢去认！过了几天，我再去，尸体已经叫野狗啃残了，脸皮肉都没了。我只好一个人慢慢掏，慢慢掏，弄一个浅浅的坑，勉强埋了。想一想啊，我大妈挺仁慈的一个外省婆娘，当年从昆明下来，人生地不熟，可见哪个都点头笑。她还随身带了两大箱子西药，村里村外，只要有人病了，她都赶过去。提起老苏州，哪个不念她的好！咋个一下子就变了呢？就算我大爹反革命，她也不一定就反革命啰。这个因果报应可有点不准。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三）

十几个大人打一个娃娃，当场就脸青面黑，咽气了。我将他抱回屋，还以为死啰，可他命大，后半夜又缓过来了。

插　记

2007 年 4 月 10 日夜 10 点 11 分，访谈双方都困倦了，因此暂停。我们随即告辞，在鬼影晃动的空街奔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寻着一辆元谋特色的机动三轮。苴公拱手作别不久，三轮开始爬坡，并且又持续半个多小时。遇一急弯，三轮发出怒吼，却停滞不前，我们只好跟在车后，摸黑步行一段。

由于蒋老师的关系，我们免费住进相当于 3 星级的政府招待所，这是土改专题发展至今，享受的最高待遇。我照旧和孙医生同一房间，照旧让他先上厕所，几秒钟后他心情激动地探头报告：还有热水！我这个陋习成性的脏鬼却心不在焉地应道：好啊，洗个够。

洗完澡，孙医生累得不行，很快就入梦了。我本想躺在床上钻研一番自朱家带回的《黄氏族谱》，不料刚看完首页上写的“黄氏为黄帝的直系后裔，黄帝第 10 代孙陆终之长子樊人跟随大禹治水立了大功，夏禹治水成功，论功行赏……受封黄国……规定凡黄国地方子民都享受黄姓，黄姓从此繁衍发展，相传已至 160 多代，4800 多年矣！”瞌睡竟如洪水滔滔，将我卷入遗忘海底。

重出海面之际，感觉孙医生在湿漉漉的睫毛之上，占据了整个天空。他唤一声老威，四面八方就回荡好几声老威。我终于坐起身，一问时间，快 9 点了。

匆匆忙忙地出街吃东西。匆匆忙忙地重蹈覆辙。老寿星和她的小孙女早已梳洗打扮毕，坐在昨日的床沿静静等候。我们在雷声隐隐的闷热中赶到，东拉西扯地客套几句，我便翻开笔记本，如处理电影老胶片那样，熟练地拼接上断开的话头。

按下录音键的刹那，我猛然惊悚，多少年又多少年，我是否已符合“旧闻行规”，如一个标准的访谈工人？

正　文

朱家学：好多次我都对自己说：熬不得啰，熬不得啰，油都快干啰。

老威：你家里其他人呢？

朱家学：我丈夫黄友朝，土改刚开始就当作反革命关起来，一两年，连面都见不着。

老威：《黄氏族谱》里记载，你丈夫“1947 年因参加所谓援胡志明组织越境，在马关被捕，后潜逃回元谋。解放前夕，又卷入一些不明的社会组织，解放初期又参加了反共救国军集团，判劳改 5 年……”

朱家学：政府早就平反了，还这么说，对死人也太不公平。

老威：你妈妈呢？

朱家学：土改才开头，她就被又绑又吊，一会儿正起吊，一会儿反起吊。场场开会都少不了。我妈妈也算大户人家出来的，年纪也大，脸皮也没我厚。有一天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家学，我活不成了。我一下子哭了，我说：妈妈，你病了？我想法给你抓药。她说：没得药啰，没得盼头啰。我说：熬啰，我陪你一起熬啰。我们是人，过了这土改，总要给一条活路。她说：你还年轻，你熬啰，我就不拖累你了。我说：妈妈，看在娃娃的面子，你不能这么想不开。她说：家学啊，顾自己，顾娃娃，不要顾我。接着泪水哗啦哗啦下来，任由我咋个劝，她再也不吭气了。我在外面找来吃的，喂她，她死活不张嘴。过去三四天，她滴水未进，可出气进气都紧了。我着急呀，在亲戚那儿弄了块红糖，兑水给她喝，她还是不张嘴。硬要喂，糖水就从下巴一直淌进脖子。我急得放声哭起来，我捶着胸，我叫：妈妈呀，妈妈呀，你不要这样为难我！妈妈还是不吭气，眼睛却一动不动盯住我，好像在笑，又好像没笑。我心里发毛，就伸手摸她的额头，全是汗水！我又顺着摸了摸身上，全是汗水，衣裳裤子都贴肉了。天哪，几天不吃不喝，哪来这么多汗水？急忙去求医生。医生怕老地主，不敢来；我就抱起妈妈跑医院。

医生号了脉，开了中药。我还没来得及去捡，陶院长拢了，他弯腰看看，觉得不对劲，又号了脉，还翻来眼皮检查。然后说：你妈妈已经死了，你还抱着干啥？

老威：她死在你怀里，还好。

朱家学：还好？我已经哭不出来，没眼泪了。我妈妈是和我老爹一起抬出元谋城东门的……

老威：你老爹？跟着也死了？

朱家学：刚土改，农民协会放风，说要斗争他，几天就骇死了。我家将老爹入殓，用石灰封棺材里，停在蒋家巷老屋后面。

老威：没及时入土？

朱家学：群众不答应。说埋了也要挖起来斗。

老威：你老爹停了多久？

朱家学：两年多。直等到我妈妈过去，两代人就一块出丧啰。老爹好歹有棺材，我妈妈就几块薄板子框起。雇人抬到东门外埋的，一片乱坟地，解放前的叫花子都葬那儿。

老威：真是旷古奇闻。

朱家学：死干净了，除一个坐牢的黄有朝，家里就剩我一个大人。可是三天两头，锣敲得哐哐哐，心惊肉跳、心惊肉跳啊。娃娃们都条件反射了，只要一听锣响，就哇哇哭。挤，挤，一遍遍挤，非把肉，把血，把骨髓都挤干。黄友朝受不了，害怕被整死，就交待了：你们不要再打我，不要再吊我，肠肠肚肚我都吐出来，好不好？我在元谋县邮局，还藏有两口箱子，那是我全部的家底。我本来

打算熬过土改，再取出来，偷偷地吃，偷偷地穿，不惊动别人，只偷偷地把日子过下去。可现在，我怕死。我是耗子，我挖洞，我藏粮食。我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土改，对不起群众。我祖宗 18 代都剥削，我祖宗 18 代都不是好东西。我祖宗 18 代都贱种。毛主席说的，反动派，你不打，我就不会倒。莫打我了，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打自己。拿根绳子，我自己吊自己。

老威：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朱家学：没胡言乱语，邮局的确藏有解放前从昆明带回的两口皮箱。里面有大妈的金项链、金戒指、镯子，有我的嫁妆，还有呢子大衣。当新媳妇时，我都舍不得穿戴，这一下完了，民兵押着怕死鬼黄友朝，去邮局。还连累邮局的亲戚，被打得死去活来。黄友朝在一边眼睁睁看着，嘴里唠叨“作孽呀作孽呀，我也是没办法呀”。

老威：这应该是土改的“赔罚”阶段了。我猜测，你丈夫也是为了保你的命，才交出最后的家底。

朱家学：是啰，收了箱子他们还开“庆功会”，有 4 家地富分子，十几口人弄来陪斗。我在刺藜笆上跪了几个钟头，膝盖烂了十几天。

老威：经过土改，你们家族上一辈几乎没活下来，你这一辈呢？

朱家学：大爹家 1 儿 1 女，现在还住大沟村。老二朱家全，14 岁就叫弄到东山大沟修水库，饿得头昏眼花，还天天抬石头，实在受不了，就趁民兵不注意，偷跑回家。我把他锁在房子里，几天几夜没露面。可一露面，就被到处搜查的民兵给逮住，十几个大人打一个娃娃，当场就脸青面黑，咽气了。我将他抱回屋，还以为死啰，可他命大，后半夜又缓过来了。

老威：按年龄，你算他的长辈了。

朱家学：我今年 88，他 65，与我的大姑娘同岁。我四爹还有 1 儿 1 女，如今都 70 多岁，在昆明搞文化工作。

老威：他们退休后没回元谋吗？

朱家学：我那个堂弟朱家万，自从跑出去参加工作，一次都没回来过。

老威：他没有中国人普遍都有的“叶落归根”的观念吗？

朱家学：已经伤透心了，元谋这边的人他都不想见。

老威：你们去找过他？

朱家学：找过，他对家里人还很照顾。我孙女红英在昆明打工，经常进出他家。平时好好的，和和气气，你就别跟他提元谋，否则肯定翻脸。他曾赌咒：死了连骨灰也不要拿回来。

老威：永不还乡？真是个充满诗意的老人。

朱家学：唉，这又何必呢？

老威：你丈夫黄友朝也是永不还乡嘛。

朱家学：不，黄有朝是有乡还不了。我夫家在湖南湘潭，世代中医。黄有朝早年思想活跃，追求进步，跑过好多滩的。后来接触到地下党，一时激动，觉得找着了中国的希望。就加入了，还被国民党抓过一回，差点就没命，幸好逃脱了。由于在昆明被通缉，没法呆，所以地下党才安排他到元谋回民中学教书。我们是抗战期间认识的，那时我刚从昆华女中毕业。

老威：土改时他也在元谋教书吗？

朱家学：开始我们都上昆明了，家里出事，又回来，一下子就没走得脱，还遭冤枉判了 5 年刑。劳改期满继续留场，到 1962 年才回家，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次次运动都有份，文革就更惨。他是 1975 年死的，起因是大沟村的民兵连长怀

疑他搞破坏，挖了连长家门口的石头。

老威：你丈夫想不通？

朱家学：经历了这么多变故，黄有朝早就胆小如鼠，连一般的贫下中农都不敢得罪，更莫提村上干部！为了息事宁人，他马上去将连长家门口的石头垫好，还种了几颗龙舌兰。但是人家成心找茬，晚上召集社员大会，斗争黄有朝。连长控诉完，队长又跟到控诉，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黄有朝辩解说：我没搞破坏，调子莫提那么高。我也说：你们借他 100 个胆子，他也不敢破坏到你民兵连长的头上！大家还不了解黄有朝？走路怕踩死蚂蚁，落树叶怕砸烂脑壳。队长一听就跳起来骂：两个狗地主不老实，就斗争个三天三夜！接着民兵连长又领呼口号。黄有朝气急攻心，指着连长连叫"你，你，你"，突然就翻倒地下。我弯腰抱起他的脑壳，直呼队长和连长的名字，"今天要你们拿个说法出来"。

大家怕出人命，抬起黄有朝跑大沟村卫生院，不行，又跑马街。由于天黑，外加折腾了两个多钟头才吊上水，黄有朝浑身已经冰凉了。我记得这天是阴历 10 月 15 号，他只活了 53 岁。

老威：病因是什么？

朱家学：不晓得。我只晓得是气死的。我从队里弄辆马车拉回尸体，又找队长借钱埋人。队长说钱归会计管，会计说钱要队长批准。两边踢皮球。

老威：这完全是蓄意谋杀。

朱家学：为葬黄有朝，我卖了一对猪。

老威：他什么时候平的反？

朱家学：死以后。1979 年地富分子揭帽，夫家那边和我联系上了。我 70 几岁才第 1 次去湖南湘潭探亲，人家问起黄有朝，我都只敢说病死的。

他在美国的二姐比我还大 3 岁，现在 91 了，还健在。她连连叹息"弟弟命苦"，还说早知如此，为啥不回湖南治病？她不晓得当时的政策已经允许黄有朝走，可大沟村一直卡着不开证明，走不了。

老威：难怪《黄氏族谱》的撰修者对他有较深的偏见，称之为"我黄氏家族最惨者，特别是祸及子孙"。

朱家学：是啰。我女儿维群自小受歧视，得了忧郁症，还没念着书，作为妈妈，我有责任啰。

土改受害者朱家全

前 奏

整理这篇文字时，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脑内的图片文档，本想对照一番，尽可能多地搜索记忆残片，却猛然惊醒。随即内心起一阵抽搐。原来在一个多月前，我的相机已同所有乐器一道，永远丢失了——我一时懒惰，没将元谋之行的图片倒出来！

晃眼就往事已矣，悔过无济于事。只得翻开笔记本，让思维的虫子一点点爬回 2007 年 4 月 11 日上午。孙医生和蒋老师外出办事，剩我和苴公一道，坚持做完朱家学老人的访谈。接着又由老寿星及其孙女红英带路，去拜访本文的主角，国

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的幺儿。

老寿星眼力不济，沿途是我和红英轮番牵引；可脚力极健，对泥沼狭路、坡梁沟坎全然不怵，且谈笑风生。过了公路，又过了相当长的机耕道，我们拐入掺杂着农田的起起伏伏的村庄。老寿星杵着拐杖，站在一条深沟的边缘指点对面说：大沟村，我的老家。

一行人缓缓而下，耳畔溪水潺潺，泥土的腥味十分浓郁。我们过了沟，再缓缓而上，在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底，我为寿星拍了照。路绕着树盘桓两圈，就抵达枝桠掩蔽的大沟村头。土墙、砖墙、水泥墙、爬满了葛藤的废墙，横七竖八。我和红英在老寿星的鼓励下，用棍子辟哩啪啦抽打蓬勃发展的杂草，拨出一条沿土坎上墙的路。我终于俯瞰了占地大约一亩的朱家老宅，不过只剩残垣断壁。红英像个现代导游，在身旁指指点点，地基从哪儿到哪儿，堂屋、厢房从哪儿到哪儿，灶房在哪儿，解放前如何如何，解放后如何如何。我不禁嘀咕道：你 1982 年出生，咋晓得这么清楚？她笑道：90 年代搬家，我也有 10 几岁，后来又听老人一遍一遍讲，自然记住了。寻根啰，我懂得。

我以老墙为背景，为祖孙两代留影。老寿星准确指出土改时，工作组进村住哪儿，民兵连长住哪儿，农民协会的某某某住哪儿；还有最终害死自己男人的那块垫脚石的具体位置，几十年前龙舌兰的位置，等等。我瞅着那双快瞎掉的怒目，哦哦称是，暗里却唏嘘不已。红英挽牢婆婆的胳膊，直叫快走。如此拉拉扯扯出了村头，老寿星才心潮平息；大家沉默寡言了十几分钟，来到能禹镇轧花厂的大门前，不料老寿星又心潮澎湃起来，转头对孙女一再叮嘱：上面那户人家的地基下，埋着你老祖朱海的骨头，不要忘掉自己的出处啰，不要烧香都找不准方向啰。红英一脸沉重地点头答应“晓得了”。我却蓦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几十年来，也一再唠叨：二毛，我们的老家在成都小南街，有公馆哦，住了几辈人哦，解放后都遭没收了。

穿过不少稀稀拉拉、不伦不类的房屋，牛马来来去去，畜粪蜿蜿蜒蜒。我们到底在一扇铁门前站住了。红英叫门，应声而出的是个粗壮汉子，方脸浓眉，经介绍，他就是我的寻访对象，所谓恶霸地主的后人朱家全。

寒暄着进屋，我却习惯性地探头探脑。肮脏的院子，马圈、猪圈、鸡圈和人圈，异味相投，朝夕相闻。我刚掏出录音机，朱家全却顺手拿起来，反复端详，反复讯问，我不得不耐心讲解后，才切入正题。

正 文

老威：今年你多大岁数？

朱家全：65 了。

老威：那土改开始时，你才七、八岁。

朱家全：对啰。

老威：有记忆吗？

朱家全：很模糊。

老威：你父亲长什么样子，有记忆吗？

朱家全：一点点。高大，不爱笑，当然，娃娃眼中的大人都高大。

老威：你父母没有照片留下来？

朱家全：我还有个姐姐，以前她那儿有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关心。总之都烧掉了，你想想，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多少次政治运动啊？我们是国民党、反革命、恶霸地主的后代，家里被抄过多少次？被整过多少次？活出来都不容易了，还保存啥子照片啰。如果叫贫下中农晓得了，就是"反攻倒算，铁证如山"。好了好了，跟你说没得用，你年轻了点。就像跟我的儿女说，也没得用，陈谷子烂芝麻，没人过问。你就是说你差点叫打死，他们也瘪嘴：你既然叫打死了，咋个还会生下我们？

老威：你父亲跟随过孙中山，参加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伐战争，做过国军师长，元谋县长，应该算这方圆百里的大人物啊。

朱家全：又不是共产党的大人物。

老威：你可知道你父母怎样被杀？

朱家全：记不得。

老威：总会有印象吧？

朱家全：真的记不得。

老威：没听旁边人提起过？

朱家全：过去不敢问不敢听，现在不愿问不愿听。农民嘛，就是种地打粮食，盖房子养牲口，娶媳妇生娃娃，把日子过下去。

老威：然后呢？

朱家全：还是种地打粮食，盖房子养牲口，娶媳妇生娃娃，把日子过下去。

老威：你就这么教育你的后代，也是你爹朱淮的后代？

朱家全：是啰。但是他们不好好劳动，一门心思要朝昆明跑，要朝外省跑。荷包跑空了，在大城市饿着肚皮了，又灰溜溜地回来。20 几岁，连媳妇都说不上。哎哟，不好办不好办。

老威：当年你爹不就往外跑吗？

朱家全：那是兵荒马乱的时代。投军扛炮火，就能捞着吃。我爹还在江苏娶了我妈，喝过洋墨水的大家闺秀，漂亮得很。

老威：还记得你妈妈的名字？

朱家全：张丽娅。

老威：还行啊，没把你妈妈的名字忘掉。

朱家全：也差一点点。我没念过书，加上我妈的名字不太顺口，时间一久，要想好半天才记得起。前一段，县里统战部还派人来找，我一看，父母的名字都写在书上的。朱淮，淮海的淮；张丽娅，一个女一个亚洲的亚。

我还晓得大哥朱家荣被日本鬼子杀了，为我爹抵的命。上海叫日本人占领，我二姐又在逃荒中丢了。我还有个姐姐叫朱家敏，大我两三岁。我是老幺。

老威：还有呢？

朱家全：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来了一个外省知青，自称是我妈的侄姑娘，叫我哥，寻亲的啰。

老威：你寻过亲吗？

朱家全：当地主子女的时候，想都没想过。后来揭帽了，我爹要上县志了，我才托人写信到江苏无锡广播电台，寻我妈那边的亲戚。如今也一二十年了，找不着了。估计那边的成分也高，土改中也叫赶尽杀绝了。

老威：虽然你土改时年龄小，可后来还是长大了。

朱家全：长大了？也没啥说的。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 九种人的后代，贫下中农不会让你好过。

老威：可否讲具体点？

朱家全：挨斗啰。挨打啰。比如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

老威：怎么啦？

朱家全：唉，没意思，算了。

老威：听你堂姐朱家学讲，你 14 岁被弄去修水库，熬不住，就逃跑回家，结果被民兵搜查出来，差点打死？

朱家全：命大啰。现在我都六十几了，还提十几岁的事干啥？

老威：你堂姐救过你的命，也不提了？

朱家全：地富子女的命贱，就如蚂蚁被踩了，没死，还活过来，算运气可以。但是无产阶级的江山，贫下中农就是人上人，就凑合着，不吭一声地往下活啰。没搞破坏，敲锣通知你开会，你就去，不能不满，更不能一肚子火。因为你不搞破坏，总有其他地富分子搞破坏，陪斗算便宜了，不就弯个腰，挨几巴掌？大不了捆几绳子。你又不是主角，又不会把你朝死里整。我爹是国民党师长，元谋县县长，太威风啰，太显眼啰。这么大的地方，几十万农村家庭，出过几个师长、几个县长？所以共产党要枪打出头鸟。

老威：你还觉得杀自己父亲有几分道理？

朱家全：绝不是。我爹也绝对是英雄好汉。就是太威风啰，所以要累及子孙，让我们受气挨整，替父背过。听说毛主席的儿孙也不好，一样的啰。

老威：你这个宿命观很彻底啊。

朱家全：虱子顶不翻铺盖。省政协的人来过的，我也这么讲，不晓得。他们说：实事求是嘛。我说：实事求是也不晓得。嘿嘿，来诓我？讲好了给不了钱出不了名，讲坏了让我来担责任，万一那天政策又变，我又成阶级敌人……

老威：社会还是进步了，不至于的。

朱家全：你见过好多事情哟，因为一句话、半句话把人弄死，你相不相信？我堂姐夫黄有朝，有文化有礼节，大气都不敢出的老好人，就因为民兵连长怀疑自己屋前的垫脚石被掏了，与他有关，就又打又骂，死在批斗会上。哎呀，说你年轻还不服气，到我这个岁数，错误要把你给犯死。

老威：谢谢大叔的提醒了。

朱家全：土改是贫下中农翻身，有了土地，得了实惠；改革开放后，阶级成分取消，大家平等，贫下中农和我们坐一条板凳上。原来都是乌龟对王八蛋，把脑壳伸得再直，哪个也比哪个高不到哪儿去。

我们家族呢，有我这种，至今还在泥里土里打转，与大家长短一般齐的；也有又翻一次身，和我爹当年差不多风光的。把中间几十年拿走，嘿嘿，吃国民党和共产党皇粮的都有啰。

老威：谁吃共产党皇粮？

朱家全：我四爹的一儿一女啰，都在昆明市的国家单位。

老威：我晓得，都七十好几，比你大得多。

朱家全：我的堂哥哥朱家万，在军区歌舞团搞创作，还会拉小提琴，得过好多国家奖，不得了。

老威：听说他永不还乡？

朱家全：家里被杀掉那么多人，开始是害怕回来，以后可以回来，地方上欢迎回来，却伤心又灰心，不回来了。我这辈的都去过昆明他家，下辈的也经常去，嘴皮都劝破了，他就是不松口。话说急了，他还火，还摔东西。政府里的人去，他见都不见，他说：即使我孤老一人，也不想凑那个热闹，也不想上啥子县志。我死也不回元谋，连骨灰也不回元谋！就算我生错地点，做了一场噩梦吧。

苴公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故事。有一个叫张娅琴的女人，生于辽宁沈阳的一个书香门第。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以后，国破家亡，举家逃难。这个张娅琴在南下途中和家人失散，只身一人流落到贵州，经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大难不死，又流落到云南。昆明太乱，她呆不下去，不知如何又到了元谋。栖身元谋县中学，教书糊口。接下来呢，与元谋中学的校长好上了。我估计，她从小受的教育太良好，所以在这个偏远的县份找不到说话的人，实在寂寞得发慌。校长好歹也算见过世面吧，不得已，红颜薄命也就认了。她做了校长的小老婆，没两年呢，就解放了。跟着土改，校长成了地主，她连带成了地主婆，双双从学校被撵出来，在农村搭个草棚安家落户。天天挨打，夜夜挨斗，不晓得哪个干的缺德事，她的相也叫破了，额头上一个疤拉下来，经过脸颊，抵拢脖子根；一只手也吊起了。校长有大老婆，新社会新风尚，没地方可容下小老婆，所以她只有搬出校长家，虽然只是一个草棚，跟狗窝差不多的家。这是命啊，没户口没亲人没粮食，也没哪个村子肯承认这个读过书教过书的大活人……

老威：黑人黑户，贱民里的贱民。

苴公：对，那个年月，没文化光荣，有文化犯罪。我至今都不理解，这个毛泽东是个啥鸡巴怪胎？自己把书读得摇头晃脑，却喜欢大老粗，糟蹋文化人。所以这个弱不禁风的《红楼梦》里的小姐张娅琴，注定在普天之下皆文盲的社会里生不了根。她沦为叫花子，沦为疯婆娘，露宿街头，捡着任何东西都往嘴里塞。据说后来她又嫁了一个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过了一段，连老光棍都嫌弃她，赶她出门。我不晓得她的下落如何，总之 60 年代我刚分到元谋时，还经常碰见她，才 40 多岁吧，就满头白发。捣蛋娃娃朝她甩石头，打在身上头上，没一点反应，

连出血了也不擦。哎呀，啥子世道啰，分辨不出人与鬼，正与邪，疯癫与清醒。哎呀，浪费了，浪费了，这辈子我就这么浪费了。

土改民兵何秀元（上）

前奏

刚打出这篇文字的标题，电话响了，是吴闯，称本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要前来拜访。我立即关闭电脑，正襟危坐于屋檐下，恭候 20 多分钟，无果。心神波动，遂找出《易经》，占了一卦，为“大过”，上下两个阴爻，中间四个阳爻，犹如两端脆弱的房梁。

既然栖身摇摇欲坠的房梁下，当然要格外小心；可如果整个国家犹如一座危房，小心也就没什么用。那么值此乱世，只能坚守正道，做自己眼下该做的，将成败得失交给老天去安排，这就叫“以大过之才，行大过之事”。

这么一琢磨，也就释然。因为土地改革这个系列已做了将近两年，风餐露宿，行踪飘忽，鞋底磨穿了几双，却没出过大的纰漏——恐怕上苍也眷顾于我，觉得应该为这一桩桩“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苦难留下最后的记录。

第三天，也就是 2007 年 9 月 28 日下午，下过雨，又出过太阳，正在不阴不阳之间，警察登门了。先是两男一女，极为客气地上阶沿寒暄，然后自我介绍，是本地国保部门，想请我去他们单位谈谈心。我笑道：是传讯吗？那么请诸位出示证件，还有写明正式理由的正式的《传唤证》。警察们立即声称不不，只因为你是著名作家，我们领导请你去做客。顺便嘛，谈些公事。我说：既然你们都找到这儿了，那就在这儿谈，院子里也没别的人，很方便。

彼此都微笑着，僵持了十来分钟。警察们就开始打电话。接着第二波高级警察登门，领头的是本地国保支队的杨政委及两个大队长。院里一下子进了 7 个不速之客，顿时闹热异常。

跟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一样，他们与我聊了一会儿家常，才由满头冒汗的大块头的杨政委切入正题。开场白是“共建和谐古城”，我这样在国际上都知名的作家，本地人民更是欢迎，所以我来了那么久，他们从没有打搅过。我连忙致谢，并称自己愿意继续埋名隐姓。可杨政委话锋一转，说他们作为保守本地安全的职能部门，最不愿意看到有人破坏和谐，给古城抹黑。我沉默了，听他继续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为地主维权”的文章，社会影响很不好，他们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与我交流看法，能否停止写这类不和谐的东西？我点点头，却有些懵懂地问：什么时候我为地主维过权啦？况且土地改革已经过去 57 年，写写这段历史与今日的和谐有关系吗？杨政委答不上来，接着我又拿出一本 2005 年国内出版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给他看，申明连共产党中央在当时，都存在“暴力土改与和平土改两种倾向”，我作为一个有起码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为什么不能抢救和记录在暴风骤雨中的个人经历，为国为党填补这项历史空白？

杨政委与我争辩了几句，由于隔行如隔山，只得悻悻然地撤退。不过我敏感到，他们此行之目的，不仅仅是为舞文弄墨的事，他们很好奇，我居然住在这么一个院子里，居然与这么一个院子的主人是朋友。虽然他们竭力掩饰，甚至一再询问院主名字及背景。

刚刚看过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搞了 20 多年文学，何曾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比《窃听风暴》更复杂的环境中？在强权之下，没有隐私可言；我已经和女友金琴分手许久，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了。我记起干我这行的榜样，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对自己最有力量的保护，就是公开所有的真相。

说吧，记忆；说吧，垂死的地主和贫农。也许再过四、五年或五、六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那代人就缓缓失踪，一切都将从风平浪静过渡到死寂。

现在回到 2007 年 4 月 11 日下午的元谋县城。天气阴着。我们依旧由苴公领路，步行 20 多分钟，来到富强街中段。一个中年人拉开大铁门，将客人迎入僻静的院落，并站在院坝中央仰头叫了两声“爹”。随即上二楼。本文主角何秀元正扶着门框，颤巍巍地恭候呢。我们紧赶两步，与老人家依次握手，还不约而同地赞扬他身板硬朗。

主客双方都哈哈笑着，气氛很融洽，戴着一顶褪色军帽的老人家越发慈祥，深锁在皱纹内的小眼如星光闪烁。经过苴公的撮合，话题自然而然就展开了。

客厅相当大，交谈回旋着进入了录音机。窗外是一座比较高的楼，三二只麻雀划着弧线，从此端到彼端。而楼下是狭窄的马路，市声隐隐，我突然想，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

正文

老威：我是苴公的朋友，是搞土地改革这个专题的。

何秀元：好远的的事情啰。几十年都没人过问啰。

老威：所以我特地登门拜访，一见老人家的样子，身体不错，脑袋也还灵光，就放心了。

何秀元：吃饭还可以，走路不太稳当了。同志你坐。

老威：你老先坐。

何秀元：不晓得从何说起呢？

老威：无所谓，只要你记得起的，就随便说。比如，你是哪年生的？

何秀元：1927，今年整 80.老威：一直在元谋城里住吗？

何秀元：旧社会在城东边的一个村，叫官能，如今叫官能镇了。我家啥都没得，毛主席咋个说的呢？脑壳顶的是别人，脚下踩的是别人……

老威：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何秀元：对啰。我父母起早贪黑，打草鞋、割马草卖，还给大户人家做长短工，腰都累弯了，才将儿女 5 个拉扯大。接着呢，我们又跟在父母屁股后面帮工，经常是几个人同时帮几家。收花生了，运到油坊榨油；收甘蔗了，运到糖坊榨糖；大户人家盖院子，又去嘿咗嘿咗夯土墙。还挑水卖过，一挑水两分钱。

老威：按书上的说法，你们家算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

何秀元：老实说，我们家虽然下力，可没跟哪个结仇啰。

老威：受压迫、受剥削嘛。

何秀元：都是解放后，阶级觉悟提高了，才有这样的认识水平。

老威：地主打骂过你们吗？拖欠过工钱吗？

何秀元：没有，都是活路一干完，脚跟脚结账。有时天天结，有时几天结。大户人家顾及名声，不会在乎几个小钱，否则起了争执，下次就没人给你干。

老威：不干行吗？

何秀元：有啥不行？临解放我才 20 多岁，手脚麻利，还忙不赢。这家太小气，转头就去帮那家啰。

老威：听口气，你帮工还帮得抢手哦。

何秀元：也辛苦，几天不帮就没得吃。那时候经常用包谷抵工，算下来，1 人帮工 1 年，大概挣 1 升多包谷。

老威：你们家都这样？

何秀元：不完全，三几年时，我大哥被国民党抓过壮丁……

老威：哪儿的国民党？

何秀元：滇军。打过几年仗，他就在外头混了。我爷爷考过科举的，落了榜，就在家乡教私学。

老威：当地士绅的私学吗？

何秀元：不是 1 家人，而是好多家凑钱，请我爷爷教。私学地点嘛，先将一个废庙修修补补，过渡一阵，后来就设在大户人家的院子里。还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呢。农闲时，娃娃们在屋里叽里哇啦读，大人们还在外面边抽水烟边看。娃娃多了，书教得复杂了，我爷爷忙得没工夫弄饭，二哥就被叫去打杂，日子久了，居然就会了些文化。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后来就解放，爷爷教的封建主义那一套自然就停了。我们家有了一丁点底子，搬到元马镇街上住。工作组也来了，从苴林乡派下一个镇长，姓王，对穷人很信任。组织民兵队伍，我当时 20 多岁，就被吸收进去。

老威：你对工作组的印象如何？

何秀元：多数是南下干部，当地情况不太了解，所以要依靠穷人，组织了农民协会以后，就依靠农民协会。鼓励大胆工作，即使有偏差，也很少横加指责，而是找你单独谈心，一遍遍将政策交待清楚。总之，他们很少公开说啥子，第二天要开重要的群众大会了，头天晚上，工作组就要召集农会的头头，特别是贫雇农主席团的，一个也不准缺席。一条一款布置妥当，包括定调子、开头、收尾、唱什么歌喊什么口号、主要斗争对象由哪几个人带入会场、陪斗的站哪个位置、哪个范围的秩序该重点维持、如何应对骚动甚至突然间的失控，等等。

老威：很细致哦。

何秀元：我们家和工作组个个都熟，访贫问苦，还在我们家住，不怕虱子、蚊虫，不怕铺盖破烂。外出工作，回来吃饭提前通知，我们吃啥他们吃啥，往锅里多添两瓢水就行了，不让单独准备。每顿饭都要交钱交临时粮票，你不好意思收下，他们会非常严肃地说：这是共产党的纪律，任何人都得遵守。

老威：不简单。

何秀元：睡觉前也聊天，吃饭也聊天，随时揣个小本子，动不动就拿出来记。生产咋样，哪年哪年的收成咋样，够不够吃，盐巴咋个解决，哪家哪家姓啥子，当家的叫啥子，几口人，靠佃田地种呢还是靠帮人，佃谁家的田地帮谁家的人，工钱咋个分，拖欠了咋个办……哎呀，问题多得不得了。后来才明白，人家水平高，任何时候都在干革命工作。

老威：作为贫农民兵，你们主要干什么？

何秀元：组织起来，巡逻、查夜、监视地主、开会维持秩序。最先的贫雇农主席团主席是周志勇，跟我父母一样，也是帮人的，苦大仇深，但人太老实，说

话没水平，服不了众，很快就下台。接着大家选王正平当主席，才算固定下来。

老威：王正平有文化？

何秀元：没文化，帮人的，但能说会道，执行上面的政策来得快。当时的元谋城很小，就半坡上一点点，城墙以外差不多是荒坝坝。可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上面通知土改，划阶级，具体执行起来就不太好弄。后来整明白了，这个元马镇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有大地主、小地主、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

老威：有啥区别？

何秀元：大家评议，看你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出租土地呢，还是靠工商业？大头占前面，小头兼后面。其他还有破落地主，比如你家在解放前 3 年还有 20 多亩地，后来不争气，吃光喝完，把家产败了，却刚巧遇着变天。难道你也要浑水摸鱼，跟着一大伙穷人闹翻身？这可不行，就划破落地主。

老威：比唱戏还热闹啊。

何秀元：还有小摊贩、小土地出租、游民、富农、雇农、贫农、中农、下中农，复杂得很。

老威：由谁定呢？

何秀元：镇里开大会，传达土改精神，亮明 3 把尺子，土地财产、长短工、是否收租子；村里群众就接着一家一家评议，先将地主刨出来，然后才是工商业、富农、游民，挨着往下划。嘿嘿，一群乌合之众，屁都不懂。开头你照顾他，提议给他划雇农，他不干，直惊叫唤：我是没房子老婆，但从来也没帮过工嘛。接着又划贫农，他还是不干，说整死不种地。于是大家觉得难办，就问他：你不帮工，靠啥子吃饭？他说：我有本事啰，城里乡下到处晃荡就能吃饭。于是大家说：是这样哦，我们想不起该给你划啥子，你就自己给自己划吧。他抠了半天脑壳才说：游民咋个样？游民比贫农要高明些。

老威：游民相当于现在的社会闲杂吧？

何秀元：对啰。贫农是依靠对象，游民是改造对象，几乎就是偷鸡摸狗的坏人。这个蠢驴，不做依靠对象，偏偏要挤进坏人堆里！后来政府要净化城乡风气，收容游民，集中起来改造，他才慌了：莫关我！我原来是贫农！可是后悔药没得吃啰。

老威：类似情况多吗？

何秀元：多的。到了评审阶段，大半都推倒重来，最后工作组主持开会，一条一款反复交待，大家才慢慢搞清楚。

老威：政策严格吗？

何秀元：弹性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大地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多少土地多少帮工才算恶霸一级？上面没明确的说法，或者暂时不拿出明确的说法，就交给群众来评。你在社会上处人处事过得去，民愤不大，大家多少能抬抬手，让你过关。否则就麻烦。我们这儿最大的地主是吴耀先，整庄子有好几个，外乡还有土地……

老威：什么叫整庄子？

何秀元：就是整个村的土地全是他的，村中几十户佃农全在他的门下，每村都有一个他委派的伙头，专门负责收租子。其他还有雷树膏，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还有朱淮，元谋县县长，过去威风得很的人物，统统定为恶霸。

老威：他们有土地吗？

何秀元：他们有权有势，要啥子不容易？只要看中了哪块地，说一声，就是他的了。跟现在当官的差不多嘛。

老威：他们的下场如何？

何秀元：都杀了。

老威：有多少个？

何秀元：太久远了，记不得了。

老威：拣记得的说一说。

何秀元：吴耀先是从昆明抓回来的，还没等到枪毙，就关死在元谋县监狱里。

老威：其他呢？

何秀元：杀了好多批，但执行的都是解放军和公安局，我们是外围民兵，主要维持秩序、看守、巡查，防止意外发生。

老威：请讲讲开公审大会的情况。

何秀元：清匪反霸的时候，有一次就枪毙了 13 个。头天就通知，监狱里加了几道岗，我们民兵通宵都挎枪在街上逛，只要遇到可疑的家伙，二话不说就关起来，没得问题，也要等大会开完再放。第二天上午，临到宣判结束，警卫连就开过来，将五花大绑的罪犯架拢事先挖好的坑坑前，齐刷刷跪一排，子弹在鞋帮子喳喳磨亮，上膛，步枪筒抵准后脑壳，只听得哨子呼地一吹，嘭嘭嘭一起搂火。硝烟味好浓啊，周围群众又是鼓掌又是喊，简直都兴奋得发狂了。

老威：清一色杀恶霸？

何秀元：有个叫张诰，恶霸的帮凶，主子遭抓了，气不过，就放火烧甘蔗地；还有杨永怀，划成大地主，他估计农民协会要去抄家，就在院子门楣顶栓了一颗手榴弹，哪个一推门就炸。幸好大家是翻墙进去抓的他。

老威：还记得审判长是谁？

何秀元：张兴德，一个南下干部。

老威：工作组的？

何秀元：法院的。还有公安局局长，叫朱恒堂。

老威：当时法院系统还没建立起来吧？

何秀元：哦，那就是临时法庭，工作组、贫雇农主席团都有。

老威：如此毙人的大会，相隔多久开一次？

何秀元：说不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十天半月都不一定。县城集中枪毙比较热闹，几千万把人，甚至几万人的时候都有。乡上开会规模自然小些，枪毙两三个，就不用提人到县里，由贫雇农主席团根据群众的呼声，商量商量哪个哪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再报给工作组，划了勾，最后让点长批准。

老威：点长拥有生杀大权？

何秀元：点长相当于后来的区长。

老威：工作团团长？

何秀元：小一点。

老威：管一个乡的工作队队长？

何秀元：有的又大一点，管两三个乡。

老威：点长亲临毙人现场吗？

何秀元：不一定。下面只要将名字报去，他批准就可以了。

老威：有没有先斩后奏的情况？

何秀元：开始有，后来被制止了。

老威：点长都由南下干部担任吗？

何秀元：多数是本地提拔起来的干部担任。

老威：有没有点长公报私仇呢？

何秀元：晓不得。我当时才 20 多岁，小小民兵，上面的事情晓不得。

土改民兵何秀元（下）

插记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 2007 年 9 月 29 日中午，这家院子的主人远游归来。我从桌边起身相迎，寒暄之间，自然提起昨天国保警察登门拜访。主人微笑着说没事，主要是中共 17 大正在筹备，内忧外患加剧。我说这与本人有何关系？我连 17 大什么时候召开都不晓得。主人说：你可以不晓得，但是公安部要让下面落实你具体在何处。

我骇了一跳。心想有这么严重吗？可表面却不动声色。待坐回桌子边，我扳着指头算，从大理搬进这家有特殊背景的院子已有大半个月，风平浪静，甚至躲过了两三波户口盘查。皆因为房主是解放军中将之子，为人率性，有《水浒传》里江湖庄主之风，这大约是遗传——乃父当年进军川西平原，就不顾党组织的数次告诫，甚至不顾开除党籍的警告，非要娶当时与刘文彩齐名的崇庆县恶霸地主某某某之女为妻。

真是世事难料，经多次酒酣耳热，我这个反革命居然与革命者成为朋友。甚至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佛道儒之学，我们都非常喜欢达赖喇嘛，认同“你的敌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他说，等到一定的时候，说不准他会将自己父母的土改故事讲给我听听。

那就等着吧，可眼下还是继续弄完手里的活路再说。

正文

老威：讲讲你最熟悉的地主。

何秀元：我们家住南门，村里有两家地主，肖晓明、梅洪乾。印象中不是讨嫌的那种。认罪交浮财都积极。土改后上面规定了地富分子的“三要八不准”，每次开会，肖晓明、肖晓成两弟兄都背得滚瓜烂熟……

老威：啥子“三要八不准”？

何秀元：出门要请假，进门要销假，来客要报告；不准乱说乱动，不准搞破坏活动，不准搞迷信活动……

老威：还有呢？

何秀元：记不得啰。总之，地富分子年年、月月、天天要牢记。不牢记就要出差错，出差错就要挨打。来了客，出身贫雇农的，就批准住一晚黑，还得对客人进行阶级教育；出身不好的，马上撵起走。

老威：那阶级划清以后，减租退押又如何？

何秀元：政府主持公道，将解放前的老租约废除，换成新租约。比如从前佃农租地期限 1 年或者几年不等，如今就换成两三个月，老租约里写明的该交的租子统统砍掉，拖欠的也一概不算。退押嘛，就是在减租的基础上，命令地主把最初租地的押头退给佃农，并且根据物价的逐年涨幅，逐年增加。

老威：押头就是押金吧？那我交不起咋办？比如我把地租给你已经好几年，甚至 10 来年，最初的押金每亩地 1 块大洋，而现在你将 1 块大洋翻几倍，甚至十几倍，要我还你，我咋个还？

何秀元：家里的东西，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坛坛罐罐，能卖就卖，能抵押就抵押。总之，你在解放前越富，佃农越多，就越倒霉；越穷，越叫人看不起，就越扬眉吐气。这才是翻身嘛，昨天你踩我，今天我反过来踩你，你不服，有共产党做主，就斗争你，要你的老命。

老威：卖了，抵押了，掘地三尺了，我还是还不起，咋办？

何秀元：必要时候，该斗该关，该伤筋动骨，革命群众不会客气的。班果村的地主张建杨，就被弄来坐软轿……

老威：啥子叫坐软轿？

何秀元：让你坐一个独凳，把你的双脚捆拢，独凳两边放桌子，再把你的双手拉平，捆牢在桌面上；然后往你怀里揣石头，一块一块，揣个几十斤；最后将独凳抽走，你的屁股就悬空了。

老威：啥子感觉？

何秀元：我没坐过，晓不得啥子感觉。只是那种叫法，将周围的人耳朵快震聋了，不怕你笑话，连看家狗都受不了，汪汪两声，就从院子中央箭一样射出门去。

老威：还有啥子花样？

何秀元：吴耀先有个狗腿子，叫李强贵，被弄来背石头。

老威：做苦工？

何秀元：让他站在太阳坝，背一箩筐，一块一块朝里面加石头，撑不住重量了，一屁股摔地上，又从头开始。如此折腾几小时，不见效，又将他的手指头用浸过油的麻线密密地绕，然后点火烧，整得他满地跳脚，不求饶也不行。

老威：隐瞒的浮财都交待了？

何秀元：他是狗腿子，没啥浮财，主要逼他说出吴耀先的财宝去处。因为本地最大的地主，财产到底有多少？哪个搞得清楚啰？

老威：所以只能根据想象，拼命地挤。

何秀元：但是没挤出来，手指头烧掉几根，也没效果。

老威：那狗腿子的确不晓得狗脑子想的什么。

何秀元：但是的确有恶霸地主转移财产，逃避土改的现象。比如有个叫昌培林的中农，解放前同伪县长朱淮家关系不明不白，土改刚开始，朱家就悄悄将好些财产送昌家隐藏。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农民协会得到线报，就找昌培林谈话，要他自觉交待，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否则就死路一条。昌培林吓坏了，立马将朱家的浮财彻彻底底暴露，还低头认罪，痛哭流涕。后来大家研究了，他为恶霸当“防空洞”的事实清楚，但是向人民举手投降的事实也清楚，就从轻将他的中农成分升为小土地出租。

老威：他出没出租小土地呢？

何秀元：有剥削行为嘛。替剥削阶级隐瞒财物，就是变相的剥削。当然，浮财都由贫雇农、下中农分掉，中农以上粘不了边。

老威：你们家也分了？

何秀元：朱家属于大沟村那边，我们分不着，到底有个啥子也不晓得。我们家在土改中也分了土地、房子。班果村的一个地主，名字忘了，以前在乡下，后来搬到城里买了院子。土改了，包括我们的 3 家贫雇农就搬进去住。那时还没发正式的土地和房产证，打张条子，写上位于哪里哪里的土地，哪里哪里的房子，从某年某月某日，属于某某某，签个字划个押，就作数。公布了《土地法》以后，才把原来打的条子翻出来，换正规的《土地证》。

老威：减租退押的时间有多长？

何秀元：不到 1 年，地富的油水就算挤干了。

老威：之后的赔罚呢？

何秀元：其实赔也赔不出多少，罚也罚不出多少。也有城镇的游民，趁着土改，跑到农村去，住地主的院子，还不讲理，与贫雇农争了起来。

老威：游民属于哪个阶级？

何秀元：游民不务正业，讨口叫化、偷鸡摸狗、鼓吃霸赊，啥子都干得出来。按财产划分呢，本来是劳动人民，可也归入政府的改造对象。地、富、反、坏、游，五类分子。斗地主时，也弄来陪斗，说是受教育。嘿嘿，那个贫雇农成分不要，偏要当游民的人，每次挨斗都喊冤枉，声明自家 3 代帮人。大家都忍不住笑，还扯着他的耳朵说：自己争取来的，怪得了哪个？他就在地下又打滚又敲脚：鬼晓得哦，鬼晓得哦。不过呢，差一点的房子、土地还是要分给游民的，不能让他们在社会上吃混食啰。

老威：元谋县境有多少游民？

何秀元：几十百把个？记不得了。

老威：达不到枪毙级别，送劳改的地主多不多？

何秀元：不清楚了，总有好几十吧。最高有判无期的。元谋附近有个黎明农场，关地主、反革命，后来也关右派。说老实话，南下干部拢地方，脾气也见涨，经常独断专行，不把本地干部放眼里，所以容易摔跟头。有个南下的，老家有原配夫人，到元谋后又染了个年轻的。后来他回去探亲，可能是商量离婚啰，不料原配夫人不久就莫名其妙死了。这可不得了，他洗刷不清，被抓起来，以谋杀罪判死缓。事隔多年平反，人们还私下说，这是他乱搞的报应。

老威：你当了几年民兵？

何秀元：五、六年，从开始土改，到小社成立。接着我被选为社长。

老威：小社？初级合作社？

何秀元：对啰，叫南城社。

老威：老人家挺进步的。

何秀元：自己水平差，全靠党的培养。1954 年我光荣入党，1958 年元谋老城合并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元马镇划为大管理区，我又被调到管理区当领导。

老威：管理区？管城镇居民吗？

何秀元：居民归镇长管，我是元马大队大队长，管农民。

老威：城乡一体，两套班子？那地主归哪边管？

何秀元：土改一过，都放回自己家里，住哪边就归哪边管。该干活干活，该学习学习。有专门的民兵监督他们，定期汇报思想，定期开会，不准乱说乱动。

老威：在土改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何秀元：嘿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恶霸雷树高遭镇压，他的婆娘被群众弄来干农活。哎呀，快 40 岁了还细皮嫩肉的，啥都不会做，可见平时有多懒！田不敢下，秧不会栽，大家气坏了，就在田坎边批斗她。弯了半天的腰，还是不见效，于是就叫她跪在田坎上，盯着大家栽秧。我们栽好久，她就跪好久，我们歇气，还是不准起来，磕头也没用。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她求大家让她干活啰。栽秧慢，跟不上，就加班加点。月亮出来明晃晃的，就剩她一个婆娘在田里梦游，有点诗情画意不是？

老威：不觉得。

何秀元：嘿嘿。

老威：土改收尾是咋样的？

何秀元：土地、房子、财产正式落到每户门下，就还有土改复查。一个查成分，划得实在高了，没有实事求是，就要纠正，给人家降下来；划得低了，还要升上去。还有一个是查隐瞒的财产，不像运动高潮，充分发动群众，狂风暴雨似的检举、揭发、斗争、枪毙，而是一点一滴、一项一款、不动声色地将某个地主、某个富农被清算过的东西再滤一遍。一个人拿着单子念，群众围着边听边琢磨，边回忆。看有没有漏网的。

老威：这个阶段动不动粗呢？

何秀元：避免不了啰。捆绳子、坐软轿，看你熬不熬得过。

老威：实在没得呢？

何秀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复查也有针对性，有重点。比如戴玉林，解放前的大烟贩，土改还没搞到头上，他就主动交财产，烟土、金条子都拿出来，争取了态度，政府就没要他的命。可能他自己也暗中得意，以为避过了风头啰，

哪料到共产党的运动一波接一波。他被揪出来炒回锅肉，先一把鼻涕一把泪，死活不吐，于是民兵将他拖到野外搞假枪毙，屎尿骇出满裤裆，当场就招供了。我们在他的院墙地基下挖出来很多金条子。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戴玉林被关押几天，大家发表意见，觉得太恶劣，民愤太大。只能将他枪毙掉。

老威：哪本地有没有交不出财产被毙掉的？

何秀元：先都是喊爹叫娘，恨不得把心啊肝啊交给群众，后来挤啊挤啊，遭不住，交待一点点，再遭不住，再交一点点。但是与大伙估摸的总差一大截。最后呢，挤出来的财物实在与大伙公认的数目合不上，就只有报请上面批准枪毙。

老威：你参加过镇压地主吗？

何秀元：我没毙过人，只跟着毙人的去维持秩序，也抬过几次尸体。老城外河坝，坑先挖好，让人跪在坑边，再听哨子，轰隆一炮火。开始打脑壳，血浆子乱飞，很不雅观，特别是娃娃们看了不好，所以后来就一律打背心。围观群众太多，每次毙人，围观群众都多，比逢年过节闹热。

老威：你估计，整个土改期间枪毙了多少恶霸、地主？

何秀元：元谋是个小县，当时只有五、六万人口，所以毙掉的不多。

老威：多少？

何秀元：记不得。哎呀，解放初期的地主，跟现在的家庭比不得啰。按目前的财产标准，元谋城里大半人口都是地主。当时周围的十几个村子，有的穷得那个凄惨样，评不出个地主，可土改形势在那儿明摆着，评不出也要评，地主没有，富农也弄一两家，过关嘛。其实呢，有的地主就比一般农民多几间房、半个院子。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包谷杂粮塞一肚皮，细粮留到逢年过节才整几顿。大家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有的地主，节约得吓死你，连娃娃不小心把屎拉在院墙外，都心疼，破口大骂哟，追着把屎铲回自己肥堆哟。不怕你笑话，那阵元谋连电灯都没得，地主家有只手电筒，都值得显摆，相当于现在的大型家用电器。

还告诉你，元谋人第一次见着汽车是四几年，当师长的朱淮从昆明开过来一辆吉普车，开天辟地哦，不得了哦。还没拢城门洞，还没停下来，方圆几十里就轰动了，都想去看一看，摸一摸。现在呢，汽车遍街跑，还有拖拉机，连农民都不稀罕机械化，更莫提地主。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只可惜我们这种人，黄土已淹齐下巴，享受不了几天人人做地主的日子。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上）

前奏

2007 年 4 月 11 日下午 3 点半，我们结束了对八旬老翁何秀元的拜访，即马不停蹄地穿插了几条街巷，直趋元谋县委的某处宿舍，欲乘胜拜访另一个八旬老翁陈文高。

略微颓败的铁栅门前，满嘴酒气的中年门卫刚拦住我们吆喝“登记”，就被同样不拘形迹的苴公一把推开了。我们顺势深入，几颗年轮久远的大树巨伞一般支撑天空，将两三幢爬满藤蔓的 7 层高楼笼罩得垂头丧气。我们上了某一个单元的 4 楼，紧闭的铁皮门两边贴着极其庸俗的对联和门神，门框顶好像还描着避邪的桃符。苴公敲门，不应；又敲，还不应；就干脆直起喉咙叫喊。

上面的老妪被惊动，自楼梯口倒悬白头，与苴公对答，方知主人已外出。我们撤退到门卫亭右侧，坐等约 1 小时，依旧渺茫。于是继续撤退到大街上，透一口闷气，顿觉饥肠漉漉。我提议请朱家学老人吃晚饭，得到 3 位同行者响应，于是找了个像模像样的饭馆，点了大锅土鸡。我亲自搭机动三轮去接来寿星全家，将尊者让入上位后，十几个食客即围成一桌，席间几起几伏，欢声雷动。

夜幕降临时，我跟随苴公再次登门，终于逮住刚看完所有电视新闻，正闭目养神的前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戴老花镜的表情非常严厉的干巴老头。昏黄的光晕下，我们几番要切入正题，都被挡回。老式钟摆嘀嗒嘀嗒，还夹杂着哮喘一般的噗嗤噗嗤。约 6 张门神大的毛泽东风俗画占据了半壁墙，我直视那鲜红的嘴唇，转了几秒钟的脑筋，无果。

只得如黑旋风李逵，赤膊上阵。

正文

老威：我是从四川来的一个文人，可以访问你吗？

陈文高：有没有《介绍信》？

老威：哦？《介绍信》？这是哪个年代的事儿？

陈文高：不管哪个年代，坏人、不明身份、不怀好意的人总是有的，组织原则总是要讲的。

老威：我做土改工作，试图还原那段历史，一两年来，我跑了禄劝、武定、石鼓、剑川，采访过不少老人。我还在成都采访过工作队长洪钟，解放初期，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部上下集的记录片，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洪钟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陈文高：你到底属于哪个单位？把证件给我看看。

老威：我没有单位。按目前流行的说法，我是自由撰稿人。

陈文高：自由撰稿人？没听说过。

老威：可见你老人家落伍了，某些观念该改变了。

陈文高：这不关你的事。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干什么的？来元谋找我有何意图？

老威：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你不是警察，即使你就是警察，也没有权力以这种口气冲我说话。我到元谋也不是专门找你的，与你同时代的经历过土地改革的老人还有，你不愿意谈，总会有人愿意谈。

陈文高：你这么年轻，有资格调查土改吗？这应该由政府出面的。

老威：这位苴公你认识吧？还有元谋的前任官员蒋某某，她现居昆明，昨天亲自驾车带我们来。

（苴公插话：陈老，和你这样的老革命相比，我们算晚辈了，资历浅，水平差。我之所以引见老威同志来采访你，正是出于对你老的尊重。历史就是历史，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乱开黄腔的。你心里也清楚，有些事政府出面行，比如开个大会，救个灾，维持个治安，动员群众抓个逃犯，平反个冤假错案等等；有些事嘛，政府出面就费力不讨好，比如写历史，我在县委多年，多次组织班子写历史，歌功颂德的废纸一筐又一筐，自己都不想看，更莫提拿出来见人。所以，同一桩土改，如果报纸、电视台、政府部门来找你，调子就是定了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叫你说好，叫你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必须得一丝不苟照办，这才是组织原则，哪还容得你对待老威这样，盘问来盘问去。你想想，阶级斗争的观念 20 多年前就没了，连反革命的罪名也取消了，你还一口一个坏人坏人。现在的坏人是贪污腐败、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对待卖淫嫖娼也就罚款，人家交了钱，出了公安局，依照法律，你就不能随便叫坏人。

陈文高：哎呀，我没这个意思。

苴公：警惕性高没错。可凭你几十年的革命工作经验，哪个坏人会对几十年前的土改感兴趣？陈谷子烂芝麻，好人也不感兴趣，除非吃错药了。《炎黄春秋》看过没？老革命纷纷做回忆文章，我改天带几本来，你看了就晓得如老威这样想澄清历史真相，又舍得跑路的文化人难得找！陈老，打消顾虑，与时俱进啰，而今自由撰稿人自费写历史的大有人在，秉笔直书，学司马迁嘛，这才是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

陈文高：既然苴公是政府部门的同志，你带着人来，我就破格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接受一次谈话。请老威同志提个头。

老威：请老人家尽可能放松，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想必你心里有个底吧？

陈文高：是的。

老威：你是土生土长的元谋人？

陈文高：是的。

老威：城里？

陈文高：苴林乡小村。当时整个村子有 40 多户，多数烤酒卖。而我们家老少 8 口，都靠帮人吃饭。

老威：一直帮人吗？

陈文高：是的，从老祖到我爹，至少 3 代以上都帮人。

老威：长工？短工？

陈文高：主要打短工。夯墙盖房、薅秧打谷、种菜、种西瓜、种包谷，还有上山割草，卖给烤土酒的人家。

老威：烤酒比打短工挣钱？你们家为什么没烤酒？

陈文高：家穷没本钱。

老威：我们这代人的土改知识都是从书本来的，刘文彩、黄世仁等等，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就是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你在旧社会的实际感受是这样吗？

陈文高：当时嘛，共产党没来，没觉悟到，后来觉悟到了。

老威：没觉悟到？你是文盲？

陈文高：读过两年小学。

老威：私塾？

陈文高：苴林乡的新寺小学。初识些字，家里认为够了，就不让继续读了。

老威：你打短工时，与地主发生过纠纷吗？

陈文高：没有。

老威：地主拖欠过工钱吗？

陈文高：干完活就付，或者以粮食抵，要不了赖的。

老威：你什么时候参加的革命工作？

陈文高：1949 年 7 月，地下党从昆明派张炳今、张绍虞两位同志来元谋，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全称为民主青年同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

老威：两位同志的背景是？

陈文高：都是本地人。张炳今是国民党县参议会参议长张鉴良的儿子，在昆明读书就加入了地下党。他们此次潜回元谋，一是搞组织，二是策反张鉴良，并通过张鉴良去策反城里的主要武装力量长臂大队，大队长叫张柞纪，与张鉴良私交深厚。

老威：你当时的角色？

陈文高：我算不了啥子角色。整个元谋发展了 60 多个民青成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以解放划线，我如今就享受老革命的离休待遇。

老威：然后呢？

陈文高：我年轻腿快，充当张炳今的秘密通信员，经常从班果走路到元谋东门，长臂大队的 3 个中队，300 多号人都驻扎在那儿。我找到张柞纪，呈上信，等一会儿，取了书面回执，或口头吩咐，又往回跑。有时也去找张鉴良。

当然，策反工作具体咋个进行的，我也不太明了。可解放大军还没拢元谋，张柞纪就将长臂大队火力配备最强的一个中队拉跑了。县城周边的几个伪乡长也倒戈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伪政权，欢迎解放。地下党和民青拥有 30 多条枪，分派在几个城门。做过少将师长的伪县长朱淮见大势已去，就抛下家小，化装成老百姓逃跑，当时他的老爹还想将他藏起来呢，可地下党眼线太多，变根针也藏不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追捕朱淮？

陈文高：1950 年 1 月 18 号的晚上，已经入老城的地下党负责人张炳今获知朱淮潜逃，立即打电话向滇西北地工委第 8 支队的领导王元昌汇报，请求指示。随即派罗真、杨杰真等率领民青武装及策反过来的武装，分成几路人马，抄小道追捕。直到三天三夜后，才在武定县境的马鞍山将朱淮抓获。这个罗真，还是朱淮的干儿子，又是边纵独立 2 团保卫中队的付中队长。

老威：国共两边都沾？

陈文高：特殊历史环境，许多人都有公开与秘密的双重身份。但是到 1950

年 1 月 19 号早晨，我们就分别通知学校等单位和群众，从城里到城外，排队迎接解放军进元谋。至此，每个人的身份都公开了。

老威：才几个月地下工作经历，就享受老干部待遇，真划得来。

陈文高：关于元谋解放，李某某那个家伙还自我吹捧说，他带领人马去白西头梁子，放了两枪，朱淮就投降了。放他妈的狗屁！

老威：李某某也是个老干部吗？

陈文高：也算吧。

老威：你们真厉害，居然将县、乡两级的政权都提前瓦解了。

陈文高：不能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吧。

老威：策反时，都许了啥子愿？比如解放以后，不关，不杀，不追究之类？

陈文高：你咋个晓得？

老威：我做土改专题这么久，当然晓得解放前后的政策变化啦。

陈文高：这的确是沉痛的教训囉！地下党和民青花了大力气，嘴皮子都磨破了。才将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的口径全部统一：只要背叛了反动政权，对解放元谋县有贡献，不管你从前任过什么职务，干过什么对人民不利的事，不仅不关，不杀，既往不咎，而且当作投诚或起义人员看待，在新生政府里安排工作，不愿意工作的，就发放一定资金，安置回家。

老威：对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内有影响的官员，共产党的确也这么做过。比如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率部起义，解放后就当了水利部长，虽然他的弟弟刘文彩后来被树为恶霸地主的最高典型。

陈文高：元谋毕竟是小地方。当年我们的策反口径，是上级定的调子，不是哪一个人随便说的。后来清匪反霸，风向变了，也是上级定的调子。南下干部都是经过炮火，几千里，一路打到这儿，人家有革命资历，革命经验，阶级性、政策性都强，说得起话。我们本地干部呢，只有当学生。

老威：啥子意思？当年的策反许愿一律不算数？

陈文高：说不得，说不得。连地下党负责人张炳今的父亲，为和平解放元谋贡献最大的参议长张鉴良也枪毙了。通过张鉴良做工作，策反过来的长臂大队长张柞纪也毙掉。中队长也毙掉，下面的几百号人，毙的毙，劳改的劳改，遣散的遣散。起义的乡长也差不多杀了。

老威：罪名呢？

陈文高：恶霸地主、土匪武装。

老威：有点过分哦。

陈文高：地方干部的话顶个屁，你说多了，自己就叫牵连进去了。

老威：以后呢？

陈文高：等着几十年后平反嘛。唉，韭菜割掉还会发，人脑壳割掉就割掉囉。

（苴公插话：这个情况我略知一二。土改刚开始，长臂大队及乡里民团一类都统统成了土匪；边纵也打成土匪、地霸武装，下面的民青也顺着成了反革命组织。历次政治运动都没逃得脱，惨得很囉，改革开放后才平反。）

老威：如此看来，这儿的土改也算轰轰烈烈了。

陈文高：毛主席说，要给地主阶级吃 3 付泻药，第 1 付是累计征收几年的农业税，并补征 1949 年全年公粮，土地越多交得越多；第 2 付是减租退押；第 3 付才是土地改革。

老威：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陈文高：传达的政策，肯定不是传说囉。从 1950 年 3 月起，第 1 付泻药就开吃。解放军和地方结合，组成多股征粮队，下乡用枪杆子逼着大小地主补交 1949 年的公粮。当然，在边远地方，还一时不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懵头懵脑地组织抗粮队，几支破枪，结果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接下来是合理负担，你土地越多，财产越多，就负担得越多；反过来，没土地没财产就没负担。

老威：可以讲得详细些吗？举个例子最好。

陈文高：我亲自参加过征粮征税，可是年代太远，记不得了。镇压反革命是 1951 年初，为土地改革扫清障碍囉。

老威：哪些东西是障碍？

陈文高：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伪官员，与官府勾结，吃香喝辣的大户，伪乡长伪保长，甚至伪甲长。欺压老百姓，民愤大的也算。有劳苦大众的检举嘛。

老威：有硬指标吗？

陈文高：有名单。根据群众意愿，排名单抓人，抓齐了集中关押，再开公审大会，毙掉一批罪大恶极的。

老威：据你所知，当时毙掉多少敌人？

陈文高：记不得嚾。那时我当苴林乡乡长，对整个元谋的镇反情况并不掌握。

老威：20 多岁就当新政权乡长？不简单哦。你所管辖的范围毙掉多少？

陈文高：有一次集中毙掉了 10 个。

老威：不算少。

陈文高：也不算多。大地主两个，组织抗粮的两个，还有伪乡长杨炳林，其他嘛，其他嘛，哎呀，实在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非杀不可。

老威：作为乡长，你主持过公审吗？

陈文高：主持过的。但上面的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也到场，下面的贫雇农代表也在，但最终的生杀大权还在区委书记以上，他们都是南下干部。解放不久，整个元谋暂时按区划分，区下面才是乡。苴林第一区，东城第二区，班果第三区。苴林辖 4 个乡，相当于现在的 4 个大村吧。

老威：这是区一级的公审了。以现在的观念看，你认为这当中有没有错杀的？

陈文高：绝没有。不杀不足以威慑敌人，不杀不足以鼓舞群众。

老威：其中有没有对元谋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

陈文高：这 10 人中没有。

老威：那都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了。

陈文高：不见得当权，可的确该杀。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下）

插　记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 2007 年 10 月 15 日下午，乌云翻卷，雷声隐隐。我的心情突然烦乱不堪，出室立于檐下，良久，突然听见楼上电视里传来军乐齐奏的《国歌》，原来中共 17 大正式召开了。

短短几天，本地国保和国安两大部门的最高领导先后会见了我，不得不令人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我还跟随这个院子的主人去赴宴，与国安局局长喝酒，碰

了两三杯，彼此称“久仰”。席间得知，我差点就被国保大队请进公安局，在囚室内同步开完党的 17 大，是国安担保协调，才放了我一马。

通过频繁接触，我悲哀而荣幸地获知，这十几年来，从重庆、四川、北京到云南，警察始终是我忠实的读者和追踪者。包括我的文字来源、风格、险恶用心及近期走势，他们全都了然于胸。我辩解说自己的祖师爷是司马迁，模仿的范文叫《史记》，国安局长就马上笑道：《底层》我看过，这个话是你的右派师父流沙河说的，啥子两千年前的暴政造就了司马迁，今日又用同样的手段培养出作家来。

话音未落，我脸色顿时煞白，记起《三国演义》里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细节，急忙称“不敢”。局长继续发挥道：你的巧妙之处，就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转个弯，经第三者的嘴巴说出。《底层》如此，《冤案》如此，地主系列也如此，哎呀，真是洗我等的脑壳！

我无言以对。人家将“反面教材”研读到这个深度，真不错了。记得席终之际，局长的告别辞大致是：任何哲学都强调存在就是合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了近 60 年，还在发展、进步，肯定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就表明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人民的心声。

我本想问什么是广大人民的心声，金钱？女人？醉死梦生？还是好死不如赖活？可忍住了。我天生口舌笨，不是能在酒桌上决高下的勇士，我承认自己懦弱、孤单，而黑白混杂的江湖却有太多太多凶险。

眼下雷声隆隆，乒乓球大的雨点三三两两飞降。我反身回室内坐下，稳定情绪，重新打开录音机，聆听老革命谈土改。

正　文

老威：革命声势就这样造起来。接着呢？

陈文高：就减租退押。减租又叫二五减租，解放前，元谋周围的佃农租地主的田地，一般是按春播时借一斗谷子，秋收时还二点五斗计算，可现在却反过来，按地主收过的二五比例，将原定租子砍掉。

老威：这叫砍租，不叫减租。

陈文高：所谓退押，就是命令地主将当年出租田地的押金，也就是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佃农。

老威：押金的伸缩性比较大的，特别是改朝换代，通货膨胀都相当厉害。比如一九四几的物价与一九五几年的物价，或许短短三四年，翻若干个跟斗。那么我向你老人家证实一下，这个押金是按土改当年的物价退还呢，还是照原始契约逐年累加后再退还？

陈文高：肯定是按土改当年物价，逐年累加，让地主过去吃了多少，今天一块吐个干净。

老威：如此滚动退押，不是和驴打滚的高利贷差不多？

陈文高：话难听啰。不过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强调经济基础，土改的最终目的，就是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吃泻药嘛。

老威：不择手段？

陈文高：你太年轻，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懂啥子？革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毛主席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不过嘛，老地主还是狡猾的，还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想方设法抵赖，谷子、花生、西瓜子都是实物，他们也翻转给贫雇农一五一十地算帐，哪年哪年，物价又垮了，纸票子又值多少了，实物实际才值多少钱，或者根本不太值钱。泥腿子没文化，如果不是工作组撑腰，还算不过他们。

老威：大形势摆在那儿，动小脑筋有啥用？

陈文高：对啰，下场只有更惨。

老威：接着就是赔罚阶段。

陈文高：赔罚？没有过。

老威：是吗？我在其它地方了解到，减租退押之后就是赔罚。有个叫洪钟的工作队队长还称它为“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

陈文高：挖浮财是有的，赔罚没有过。我乡长当了 1 年多，又调到区里做公安助理，除开镇反、抓恶霸地主，还管净化社会空气，比如抓赌、抓抽大烟、抓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然后才正式土改，县委书记孟家珍做报告，布置任务，接着在大沟村，那阵叫大沟乡，搞试点。我们的组长叫王世光，组员有 20 多个，都是几个区抽调来的干部，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头是发动群众，造声势，宣传《土地改革法》，个把月以后，以 1951 年 12 月 25 号的公审大会为标志，宣布土改在元谋县境全面铺开。

老威：这是哪一级的公审？

陈文高：全县大会，几万群众参加，地点就在如今的县政府背后。公安局长，也是南下干部的朱恒元主持，枪毙了 5 个恶霸地主，其中有伪保安团长赵登第。

老威：还有谁？

陈文高：记不得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大会？

陈文高：当然。

老威：那怎么会记不得？

陈文高：时间久，忘了。

（苴公插话：这个赵登第是冤枉的。他原来在国民党 93 军任团长，退役还乡，应当地士绅请求，做保安团团长，在地方武装中有些威信。后来受地下党说服，率部弃暗投明，和平解放元谋，他功不可没。80 年代我在县委，晓得政府特地给他平反，推倒不实之词，重新定为投诚起义人员。）

陈文高：赵登第是跟着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的，退役回家，还领了 3000 斤大米。

老威：可能 3000 斤大米还没吃完，脑袋就丢了。

陈文高：试点一结束，我们马上就重新分配，我被任命为元谋县第一区金雷乡土改工作组组长。

老威：不简单。

陈文高：试点经验已有了。具体政策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所以我们一下村子，就着手访贫问苦，落实毛主席教导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老威：先把最穷最苦的找出来？

陈文高：不一定。还得追究你为啥子穷，为啥子苦？解放前你是干啥的，以何为生？贫农就是有一小点土地，但多数时候不够吃，还要靠打长短工维持生计；有一小点房子，但破破烂烂。雇农就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只靠打长短工，饱一顿饿一顿的。

老威：毛主席也教导过的，叫乡村无产者，跟城市无产阶级一个阶层。

陈文高：对嚯。先寻着几个，再个挨个串连，就像布蜘蛛网，逐渐将我们要依靠的对象组织起来。这是土改第一步，叫发动群众，宣传政策。

老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挑起最穷的去整垮最富的。

陈文高：同志，你这口气不对，立场有问题。

老威：道歉道歉。

陈文高：此时的斗争目标还没确定，咋个能够想当然？

老威：再次道歉。我们换个话题，怎样团结中农？

陈文高：中农相当于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我们不团结他，争取他对土改的理解，他就消极悲观，滑到同情敌人那边去了。

老威：土改几十年后，小辈我还能隔着时空听见如此有水准的报告，真是受益非浅啊。

陈文高：中农又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要作严格区分：上中农稍微有点剥削行为，但没有富农那么严重；而下中农经常受剥削，程度又没有贫农那么严重。我们不会动中农的土地、财产，可他们基本分不到土改的果实。

老威：为什么中立富农呢？

陈文高：我们不让他"中立"，他就滑向地主一边，地富合流，土改的艰巨性就增加。所以对富农的政策不是没收土地、财产，而是征收多余的部分，剥削所得的部分。特别是对反动富农，决不能手软，决不能叫假象所蒙蔽，要坚决征收他的个人所得。

老威：反动富农和一般富农的界限在哪儿？

陈文高：反动富农跟旧政权、半殖民半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就在其中担任过职务，如保长、甲长等等。即使当保长，还要分清 1946 年之前还是之后，抗日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连长，也要分清解放战争前后，确定戴不戴反革命帽子。

老威：1946 年是条杠杠。

陈文高：对啰。之后就是反革命，在土改中和地主一样，是打击目标。要特别申明，我们是最终消灭剥削，消灭地主阶级，消灭私有土地制度，而不是消灭作为个人的地主。我们要通过改造，让地主和他们的后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老威：据有关资料证实，作为个人的地主也被镇压了几百万。不少地方的土改，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斗争高潮，自杀、冤杀、逼死、私刑致死、不明不白而死的此起彼伏。

陈文高：我也听到、看到一些不愿意听到、看到的事情，这是土改工作中的失误，是极左路线的教训，却绝不是土改的主流。我敢担保，我当工作组长期间，金雷乡没发生任何一起冤屈。的确，也杀了一两个地主，一个是国民党县党部书

记的手下，上了那个级别，只能杀；一个隐瞒浮财，将金银财宝深埋，无论咋个挤，都不松口，后来终于暴露，挖出来的大烟、金银、首饰，用一匹骡子才驮得起。判刑的地主有 10 个，一个乡的范围，这个比例算平常嘬。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组长水平不错。

陈文高：还可以吧。金雷乡的土改搞出名堂后，我又被上调为点长，管几个工作组。

老威：升官了。

陈文高：点长的上级是片长，相当于区长。

老威：你有生杀大权吗？

陈文高：我有建议生杀大权，报给片长批，再报给武定专区最后核准。

老威：你的确算尊重程序的干部，在那个年代，不容易。

陈文高：是啰，正式的刑法还没出台，依据只是暂时的政策，比如《惩治反革命条例》，可杀可不杀，其中的空间很大。

老威：唉，地主和农民多少年生活在同一个村子，虽然改朝换代，可彼此真是你死我活吗？你们用什么法子点燃群众？

陈文高：解放了，大势所趋，群众都拥护共产党。运动一搞起来，瞎子都摸着来开会，聋子都立起耳朵，害怕漏掉啥子内容。我们不怕群众点不燃，只怕热情燃过头，违反了政策，收不拢口。

老威：跟现在不一样。

陈文高：是啰，现在人心涣散，开任何会，通知半天，也是锣齐鼓不齐。除非要分钱、分房子、分利益指标。

老威：如今回顾土改，你老人家觉得对还是错？

陈文高：土改是我们党建国初期的第一件奠基大事，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村最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此之前，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有力气无处使，或者使了力气得不到收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为了平均财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向新民主主义的近期和远期目标迈进，必须土改。

老威：是吗？一定要通过暴力掠夺吗？政治运动真能够发展生产力吗？那邓小平为什么要拚着老命收拾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1979 年为什么又要给地富分

子揭帽？既然是对的……

陈文高：邓小平改革正确，毛泽东土改也正确。没有毛泽东的摸索和实践，经验和教训，就没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历史不能分割，要回到当时的背景。

老威：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千秋功业，渺小的普通人就注定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比如元谋县城解放之前，地下党做工作，千辛万苦许愿封赏，争取和瓦解了旧的社会基础，可等到不费一枪一弹进了城，就翻脸不认人，将已经投诚，堪称和平解放功臣的地方贤达统统公审，定为恶霸地主，然后枪杀，这正常吗？如果史书敢于如实记载，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怎样看这因为阶级斗争而扭曲人性、出尔反尔的一页？光荣还是耻辱？

陈文高：我有时候也没想通，虽然后来平了反。但是，我们不能拿现在已经进步了几十年的水平、政策、法律去衡量过去，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刚得江山，硝烟未散，百废待举，莫提法律了，啥子都不健全。比如判处死刑，都是草草宣布“依据某某条例的相关条款或有关规定”，远没有法律健全之后这么细，手续这么周到。加上群众对经历过炮火的南下干部崇拜，甚至盲目崇拜，本地干部说不起话，也不敢说错话。年轻人，脑壳不要发热哟，啥子事要多转几个弯弯，才能做到客观、全面。比如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不可能直戳戳开过去就到达，总是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再右一下……

老威：每左一下每右一下，都有数不清的人头落地，家破人亡。

陈文高：事后诸葛亮。

老威：老人家，你算个秉性率真的干部，也当过元谋地下党负责人的通信员，了解多人的投诚内幕，那你当时或事后就没为冤死的“恶霸”们说说话？

陈文高：1953 年，我就调到武定专区土改队了。

老威：土改复查吗？

陈文高：参加少数民族山区的土改，要慢一步。所以元谋那摊子事，没功夫问，也问不着。

老威：有人问吗？

陈文高：多得很。后来调到县委统战部的老杨还亲自写了材料，好些证明人都签了字，毕竟人命关天嘛。可人家南下干部掌权，根本不尿这一壶。长臂大队长张柞纪在监狱里闹，骂元谋地下党和民青都是一帮骗子，许愿当放屁，早知如此下场，还不如扛枪进山打游击。哎呀，任凭咋个整，都封不住嘴。张家的人也四处找当事者，追得本地干部躲着不敢见。张柞纪的关押地点也转移了好几回。

老威：唉，世事难料啊，老人家你有何体会？

陈文高：在土改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元谋县地下组织，百多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却始终安然无恙。这不是人有多聪明，而是吸取了教训，尽量少说话，即使说，也是按照政策的条条框框，求个四平八稳。不怀好意的人太多，都想“引蛇出洞”，随便你咋个引，蛇就是不出洞。

老威：那今天咋出洞了？

陈文高：苴公同志亲自登门，就给个面子；况且我 1928 年生的，快 80 岁了，皮子已蜕掉几层，出出洞也无妨。款款陈年旧事，咬不着哪个。

寻访未遂

拜访完老革命陈文高，已是 2007 年 4 月 11 日深夜，元谋之行接近尾声，紧绷的神经猛然松弛，站在黑漆漆的街头，我不禁伸了个分把钟的畅快懒腰。接着梦游似的截住一辆机动三轮，屁股卜卜冒烟地回旅舍睡觉。

次日依旧搭蒋老师的车，满面春风地返程，两个小时后即窜至马头山脖子间的一个坳口，我笑道：这大概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落网处吧。孙医生点头道：地势的确险要，插翅难飞啰。蒋老师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路边的农家乐用午餐，说不定还能吃上插翅难飞的土鸡。

于是停车。果然点杀了正宗的土鸡。在狼吞虎咽的间隙，我接到朱家孙女红英的电话，互道珍重之余，她提到家住昆明的堂爷爷朱家万，并答应为我们牵线搭桥，以便选择恰当的时机登门拜访，解开彼“永不还乡”的谜团。

大喜过望。孙医生又乘机锦上添花，称家住昆明的另一位老人“也值得拜访”。我习惯性地问：与土改有关系吗？孙医生答：大概有，老人的父亲做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厨师，这就注定了他一辈子的霉运。我仰天叹息两声，却吞了一大口从冷太阳那儿吹过的冷风，不禁咳起嗽来。

继续赶路，拢昆明北郊王家桥一带，依旧塞车近 1 小时。大约 5 点，孙医生在黄土坡车站附近下车，去联系我的下一个寻访对象。“真是过意不去啊，”我刚摇下窗玻璃冲外面客套，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扬起阵阵烟尘，紧接着，孙医生又如纸人一般在肺穿孔的夕照里支离破碎。

我跟随蒋老师，吃了喝了。天黑尽时，在一茶楼接孙医生电话，说已和基督教内之某某弟兄碰上头，正一起赶往老人的住宅；夜渐深时，再次接孙医生电话，说已从老人住宅出来，有好消息。我那个高兴劲儿啊，当即抽出洞箫，为蒋老师等人连吹两曲，感动得众茶客都称赞“老威的确多才多艺”。

至此，蒋老师也抖落了连日倦意，主动侃起家事。由于我采访过她远在重庆

的农业教授父亲，知道她是蒋介石的远亲，所以兴致极浓。蒋老师道：多年没回过浙江萧山的老家，不晓得祖坟成啥样子，那边还有啥子亲戚。我道：嗯，你爸爸讲过，你们家是特大恶霸地主，在旧社会，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平分一个县的地界。蒋老师道：不是我们家，而是我们蒋姓家族。土改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划了好几十户，光算爷爷那辈的堂弟兄，就被枪毙了 18 个。还有几个为逃避打击，星夜窜到上海滩，不料城里风声同样紧张，连过去走动密切的亲戚也不敢收留。没办法，躲进胡同底不见光的旅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乡下逮逃亡地主的几路人马，早就与城市革命群众一道，在大街小巷布下天罗地网。我明知故问下场如何？蒋老师道：还能如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除了上吊死，跳楼死，就是服砒霜死，反正都比抓回去枪毙舒服。我打了个寒战，眼前闪过一幅幅呲牙咧嘴的鬼脸。记得一本书里记载过，当时有经验的上海市民走路，都不敢靠街边，以免被突然跳楼的家伙给砸个正着。

蒋老师继续道：不知老威你有没有兴趣陪我回老家探亲？也许我爷爷那辈人还有剩下的呢。我道：是吗？那得多老？蒋老师道：起码八九十岁以上啰。如果地主没剩，或许还剩有参加过土改的贫雇农；如果啥子都没剩，还有他们的儿女，还有《地方志》和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那边的省、市、县三级图书馆都有熟人。我道：好好，你先联系着，等我把这本书弄完，就学当年的土改工作组，去你老家的村子蹲点。蒋老师笑了，果然摸出手机，拨通了好几个电话。我想，真是个急性子！可这落花流水般的苦差使何时到头呵？

4 月 13 日上午 9 点，我到昆明火车站附近与孙医生碰面，三言两语后，方明白还得等候。“因为老人身体太差,而要回忆的东西又太苦，”孙医生谦卑地笑着。我点点头，觉得应该把这次寻访的序曲记录下来，就掏出了录音机。

老威：你们怎么认识的？

孙医生：有个妇女找我看病，诊断过程中我问她过去吃的药，于是她就摸出一个方子，我看了觉得不错，进而产生了拜访学习的兴趣。

老威：跟着就登门了？

孙医生：没有。老人的创伤太深，对陌生人很警惕。所以我们共同的病人从中斡旋几次，他都找借口拒绝。这次跟你去元谋采访，受到触动，就记起要了却的这桩心愿。

老威：也就是说，昨天你才首次见着老人？

孙医生：是啊。先打电话给远在西郊的中间人，1 个多钟头后碰面，又商量好半天，我把你鼓吹得天花乱坠，硬说行，人家硬说不行。吃罢晚饭，再打电话给老人，磕磕绊绊的，嘴皮子都磨破了，总算松口。8 点至 9 点，我们才接着坐公交车，从西郊折回市中心，找到五华区中医院宿舍，爬黑灯瞎火的筒子楼，大约 7 层。一个 8 旬老翁孤零零地住那么高，真叫人担忧。

老威：你们在路上耗掉了大把时间。

孙医生：你我 5 点分手的，见着老人已 9 点过。他姓施，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同姓。他家里很简陋，我们在那儿呆了 1 个多钟头。

老威：摸清来龙去脉了？

孙医生：恍恍惚惚的。因为老人有头痛病、心脏病，间歇性发作，影响到情绪，时好时歹。腿脚也褪化了，步子在地上拖，所以下楼的次数很少。

老威：如此说来，他相当于在自己家里坐牢。

孙医生：人生的悲剧，上帝也无能为力啊。

老威：老人是基督徒？

孙医生：不是，但经常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对我们的主内弟兄很亲切。我和他在一块，虽然才 1 个多钟头，但几乎膝盖碰膝盖，彼此的呼吸交流着。我不是作家，尽管行医数年，与老人称得上同行，但面对埋在他内心，无人知晓，无人理解的伤痛，也只有祈祷。那是岁月造成的，毛泽东那批下地狱的恶魔造成的，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我只有祈祷，愿老人好好的，稍微平静地渡过余下的时光；愿老人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至少在临终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美的，善的，上帝的慈悲属于每一个人。

老威：你也算没长翅膀的天使嘛。

孙医生：他的思维倒活跃，跟长了翅膀似的；可胆子小，跟惊弓之鸟似的。我呀，见着悲观者就特别难过。

老威：比我们找过的那些老地主更悲观？

孙医生：已经积累成病态了。他还反过来告诫我，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室儿女。在解放初，他就是因为私下对一个最好的朋友开了两句玩笑，而被告密，险些连命都丢了。

老威：什么玩笑？

孙医生：他说在共产党手里当干部，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工资高。

老威：这话的确反动。

孙医生：所以就打成特务，坐了多年牢，释放后还被革命群众管制。由于医术高明，五华区中医院将他弄进去，完全是命令式，病必须要看，厕所也必须要打扫，阴沟必须要掏，父亲为帝国主义弄菜的剥削经历也必须要交待。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哦，刚解放他还参军，是从部队将他揪出来的。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零零碎碎，记不住。我重点介绍了你。大概是孤单久了，加上当时气氛也融洽，老人就说自己考虑一下，看身体状况允不允许接受拜访。

老威：难为你了。

孙医生：总体讲，我还是比较乐观。老人平时 9 点半就熄灯睡觉，可昨晚我们告别之际，已 10 点半钟，他还依依不舍，拉着我们的手，颤巍巍地送到楼梯口，并一再叮嘱：市面不太平，走在路上当心强盗。

老威：除了年轻女孩子，你很容易跟人沟通嘛。

孙医生：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给老人打电话。

我点点头。接下来近 1 个小时，两人都隔着桌子，相对无话。

我弯腰从背包里挖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复印本来看——这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学术专著，作者韩丁，与史沫特莱同辈的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解放区的大学里教英文。1948 年作为中共高层特许的“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试点，其间广泛采集资料和群众口述，写出了当地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砸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这本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由北京出版社在 1980 年翻译出版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 50 余万字的大书，是我的好友芦苇主动为我复印的。他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尽管立场、观点、结论都不对，但人家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西方人，资料来源可靠，方法更无可挑剔。

芦苇是《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也是电影界屈指可数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他推荐的记录中共解放区早期试点的《翻身》，正好成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翻身”的范本。幸许这即是我今天写《最后的地主》所要回溯的源头？

我将在书中的档案部分引述这个源头。尽管共产主义把戏已被拆穿，历史车轮出乎意料地转回来，碾碎了韩丁先生激情万丈的终结预言：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

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分，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弟兄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电话铃响了。在贫困山区奔波数年，对“翻身的康庄大道”体会深刻的孙医生站起来，抓起话筒喂喂两声，然后接连 3 个“是吗”。我已猜出结局，却默不作声地等待。孙医生磨蹭了几分钟，才故作轻松地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

老人身体不好。昨晚就身体不好，今天仍旧身体不好，头晕，心跳加速，从 7 楼朝下看一眼，就害怕得呕吐。他说可能是回忆过去造成的。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不一定。没说死。就不一定。等你下次来吧。

生死无常。下次来？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而孙医生为了掩饰尴尬，从我手中抽去《翻身》，心不在焉地翻动着。我自觉失言，也随即强笑着改变话题：哦，《翻身》是最早的土改英文专著，作者韩丁，美国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们的朋友。据说他的女儿韩倞与新中国同生同长，17 岁碰上文革，还组织过洋红卫兵呢。后来被撵出中国，再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反思八九学潮的《天安门》和反思文革的《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是她拍的……

孙医生还在心不在焉地翻书。

我继续道：这也是两代人，始终关注中国，险些把命搭上的两代人。尽管从父到女，从《翻身》到《天安门》，共产王朝，还有他们自身的神话已灰飞烟灭……

孙医生抬起头来，轻声道：我们吃饭去好吗?

下午两点，我登上昆明至大理古城的长途客车。在此前和此后，我们闲聊着，告别着，却再也没提起本次未遂的疲惫的采访，以及任何采访的话题。

两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苍山脚下心血来潮，就给朱家孙女红英去电话，欲打探其“永不还乡”的堂爷爷朱家万的近况，不料手机里的回音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愣住了。真是世事难料。我感觉苍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在嘎嘎哑笑。

魂儿在深渊飘零。

再次寻访未遂

阴历 7 月半，传统的鬼节，阵阵铅灰的雨雾，从苍山顶齐斩斩地切下来。而我，如游魂，还在暂居地背后的草坡走动。三三两两的农舍，闪闪烁烁的长明灯，左一滩右一滩的纸灰。我持棍子，拨打着比人高的野生大麻，还在沟坎下，骤然遭遇一只腐烂的死猪。

不觉抵拢了公墓门口，我迟疑片刻，还是进去兜了两圈。白惨惨的墓碑顺草坡蜿蜒，我在其间停顿，合十念祝着姐姐和爸爸，他们在天上已有些年月了。

没见鬼，不过迷路了，归途颇费周折，似乎条条都是绝路。走进去，退回来；再走进去，再退回来。眼看着苍山如冥府之门，吱吱呀呀地敞开，天色被颤抖的大麻叶子掩蔽得晦暗，裤腿及袜子都湿透了——铃声却适时响起。我惊醒似地掏出手机，对方竟是断掉联系多日的朱家孙女红英！我换了电话卡——她说，回音波纹一般扩散着——对不起，老威，我那个永不还乡的堂爷爷还等着你去呢。

我大叫好好。接着还魂一般调整方位，到底在天黑前绕回自己灯光大作的窝。

进入 2007 年 10 月下旬，本书接近收尾。于是我提前与红英联系，稳妥之后，我即于 24 日乘长途客车，颠簸 8 个小时，从丽江赶赴昆明。照老习惯，先跟孙医生碰头，放稳行包，然后约会红英。此时夜幕降临，原打算次日再从从容容办正事，不料红英在电话那端催促立即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寻访日期又得推迟。

偷不了懒，这是命。端起刚沏的茶咂一口，又烫了嘴。倒抽着冷气出门，自火车站打的去北郊，在一黑灯瞎火的所在等候 10 来分钟，红英极其男友终于浮现。互相打过招呼，4 人就次第穿越两个建筑工地，花了 1 刻钟，又撤回到货车屁股密密匝匝的马路边打的。记得当晚月亮比较圆，天空比较深邃，飞扬的尘头如烟如雾。我们在出租车里热切地交谈。红英说，她考虑了半天，怕遭拒绝，没敢给堂爷爷挑明。我说，那这么风风火火上门，是不是太冒失？红英说，当然冒失。可为了你老威，也顾不了许多。我说，这次没挑明，上次总提过吧？红英说：我提过一个作家朋友要来拜访，堂爷爷没表示反对嘛。孙医生说：万一老人家认为你开玩笑呢？红英说，隔了一两代，有啥玩笑好开！

光阴随轮胎飞驰，出租车在某个巷子口嘎然而止。我们摸入云南省歌舞团宿舍，红英在前领路，抵拢最里面的单元，上 2 楼，敲门。一个鸟窝发型的老太太隔着铁栅，定睛辨别了分把钟，才开锁放人。我到底见着了有些神秘的主角朱家万，胖得像尊不倒翁，正坐在客厅沙发里看电视。我厚起脸皮蹭过去，挨着坐下，使眼色让左右张罗的红英快快切入正题，红英却视而不见，还一个劲地与老太太拉家常。孙医生更是如坐针毡。没办法，我只好开门见山了。

老威：老人家，我们摆谈一下，不要紧吧？

朱家万：老了。经不起折腾了。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炎，左心室亏空，也就是冠心病。我坐在这儿都累啊，还摆谈？

老威：对不起。对不起。

朱家万：轻松的话题还可以。你是哪里人？

老威：成都。我专程来看你。

朱家万：不敢当。不敢当。

老威：我是专门写土地改革的，曾到元谋县城采访过你的堂姐朱家学老人。

朱家万：她的记性好，经历过好多事，你采访她就足够了。

老威：你呢？

朱家万：我这辈子，几乎就没在元谋生活过。

老威：为啥子?

朱家万：我 1929 年生，解放前就来到昆明，上昆师附中。1950 年 11 月，由昆明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考取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工团歌舞队。1953 年上调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在乐队，也兼搞创作。1956 年转业，返回昆明，在云南省歌舞团工作至现在。

老威：哦，原来是个老艺术家！可听你的履历，好像跟家乡没丝毫瓜葛。

朱家万：我为啥要有瓜葛？

老威：水有源，树有根，人有父母嘛。

朱家万：革命就是我的源，我的根，共产党就是我的父母。

老威：老人家，我又不是政审干部，你对我说这个干啥。

朱家万：不是政审干部？那是干啥的？你的录音机开着，以为我不晓得？

老威：我要真实地记录此时此刻，我需要录音机。

朱家万：你记录？为了啥？

老威：为了写书方便。

朱家万：过去就过去了，忘就忘了，为啥要写进书里？

老威：老人家别紧张，现在不是毛时代，社会还是进步了。右派、大饥荒、文革都可以写，只有这个土改嘛，缺材料，写不了……

朱家万：有啥用？

老威：嘿嘿，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嘛。否则，一提到地主，人们还以为是我的成都老乡发明的扑克游戏“斗地主”，岁数稍大的，也只晓得恶霸地主刘文彩、黄世仁……

朱家万：历不历史跟我没关系。

老威：元谋赫赫有名的朱氏家族也跟你没关系吗？

朱家万：我读中学就出来了。

老威：读中学之前呢？

朱家万：记不得。

老威：是吗？

朱家万：是!！再次请你关掉录音机！这是我的老伴杨老师，她刚才不眨眼地盯住你，她很紧张！

老威：内心有阴影？什么造成的阴影？

朱家万：请你关掉录音机！你刚才说关，直到现在都没关，出于啥子目的？

老威：没目的。机器早关了。

朱家万：为啥有红点？

老威：通着电，就有红点。好好，我把它揣进衣兜，这样，可轻松些了？

朱家万：我嘛，破罐子破摔。我老伴轻松些了……她是彝良县人，中农成分，家里没受过冲击。我们 1956 年结的婚，她在军区教幼儿园。

老威：难怪她把我盯得死死，像监视一个两三岁的捣蛋鬼。哦，她可回过自己的老家？

朱家万：年年都回。

老威：她都回，你为啥不回？

朱家万：你明知故问嘛。

老威：土改时期，你们家族被杀害多人，你怕受株连，不敢回去，你是地主子弟，却苟且偷生，将革命队伍当避风港。你肯定要与剥削阶级划清界线，大势所趋，是我，选择也和你差不多。可是后来，时代不同了，不搞阶级斗争了，你为啥还不回老家看看？

朱家万：我病了，懒得动。

老威：病之前呢？

朱家万：断肠人永不还乡。

老威：啥子？

朱家万：断……没啥子，啥子也没说。

老威：你父亲排行老几？

朱家万：老四。叫朱洪。我还有个妹妹，叫朱家茹。

老威：我晓得你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你妹妹呢？

朱家万：还活着。

老威：我可以拜访她吗？

朱家万：不可以。

老威：你真的连回元谋的念头也没转过？

朱家万：隔开 57 年，还有感情吗？你想想，人和人隔开 57 年，还有没有感情？所以，不听，不看，不联系，好得很。中国人被捉弄得还不够吗？我既改变不了历史，也改变不了现状，甚至改变不了身上多种要命的病。哪天腿一蹬，完了，烧成一把灰，也不要埋回元谋。不瞒你说，因为在昆明混出点名堂，元谋政府方面亲自来人，数次邀请，我都推辞掉。

老威：这么决绝？可中国人都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嘛。

朱家万：没有必要。

老威：祭祖也没必要？

朱家万：解放了，划地主了，早就无祖可祭了。

老威：哦。

朱家万：不行不行。对不起。心里有点慌……

守候一旁的老太太急忙扑过来，又是喂药又是抹胸口。我等随即仓皇收兵。瞟一眼壁间挂钟，进门还不到个把小时。万般沮丧地下楼时，红英还在埋怨我莽撞，称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大家都负不起责任。我随口问有多大责任？红英闪着哭腔强调，堂爷爷是著名艺术家，命可比我这种小小打工妹值钱。孙医生急忙连声道歉，我也回过神来，顿时冒一头冷汗，土改专题快完工，如果附带牵出这么一桩命案，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容易啊红英！我站在黑黝黝的街口，冲着楼群之间明晃晃的月亮大声说，出门在外多留神，愿老天爷保佑你，保佑你的家人。

心事重重地返程，在街边胡乱享用"鬼饮食"，孙医生不饿，就按科学配方替我安排，几乎全是素菜。他解释说：过一会儿睡觉，身体放平，内脏全处于休眠状态。就不要自己给自己增添负担了。

但是我今天只在旅途中吃过一顿。

好啊，你今天很健康啊，孙医生嘿嘿笑，况且你不正吃着吗？

没沾粮食，越吃越饿。

这就对了。节奏放慢，再放慢，细嚼慢咽，饿的感觉就消失了。

自己骗自己？难怪你瘦得像麻杆。

瘦好啊，过去的人都瘦，耶稣也瘦，可特别能走路，传播一种有意义的宗教或者思想都需要走路。

我不能走路吗？可吃饱喝足才能走，饿肚子走不了。

你说得对。可现在不需要走路，需要休息。所以，嘿嘿。

所以，嘿嘿，我还需要一碗肉面。

让胃部再度兴奋，再度充血？这违反生息规律。

我违反了几十年。我是夜行动物。

那么，这样吧，我们回家削梨，你一个我一个。

我承认是 3 岁小孩，可我的胃不是 3 岁小孩。老板，来一碗肉面！

别咧着嘴叫，不太雅观。好吧，我去要面，肉就免了。

两个岁数偏大的光棍汉拐入一个十分落伍的大杂院，穿过高低不平的两个天井，再爬某一单元煤窑似的楼道，5 层，上顶，便是孙医生的窝。我在临窗的办公桌前坐下，而孙医生坚持站立，似乎时刻都在操练动手术的基本功。我摸出手提电脑，打开视频，准备看律师滕彪为我下载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叙述魔头毛泽东怎样利用文革，打倒政敌，掀起个人崇拜，最终彻底葬送自己，葬送革命的记录片，正是《翻身》作者韩丁女儿韩倞的力作。“东方红，太阳升”的序曲刚响起，习惯早睡早起的孙医生竟探过头来，与我一道兴致勃勃地欣赏，直至午夜 1 点多。

革命是死了，但暴力的根子还埋着。他紧接电影的结尾台词，边发感慨，边进卫生间洗漱。我明白这要花去一二十分钟，直到从头到脚，一尘不染，他才缩回黯淡的卧室，去独自祈祷，独自做梦。

我则不洗不漱，即刻闭门入室。我靠床呆坐一会儿，不禁抽出洞箫来吹了两段，幽幽游游，飘飘忽忽，父亲和姐姐的亡灵围绕身体，秃头发麻，似乎有掌心在嚓嚓抚摸。唉，这次未遂的寻访太悬乎，幸好没出事。我这样无依无靠的流浪汉也不能出事啊。我自语道——如此轻微的语调，既像是自己的祈求，又像是来自身外的亲人的叮嘱。

第三次寻访未遂

阳光明媚的 10 月 25 日，孙医生一早外出，我则睡了懒觉，用罢午餐，与一个朋友约好在翠湖边喝茶。下午突然接孙医生电话，称晚上领我去寻访半年前寻访未遂的老人。我问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厨师吗？他答否，是厨师的儿子，今年 80 了。

心情愉快的黄昏，几个人由基督教医生主导，吃了一顿朴素的晚饭，然后打的 10 来分钟，直抵昆明五华区中医院宿舍。进门没几步，又遭遇矿井一般深邃的筒子楼，一行人摸黑鱼贯而上，在每个拐角处挤成一团。我层层默记，转着转着又迷糊了，7 楼还是 8 楼？总之，老人家住最高，而且是单家独户。

依旧是铁栅栏，这楼里四处都是铁栅栏，跟二战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似的。孙医生的女教友敲门，里面有个面色苍白的时尚女孩开门，哐当一声，那颗落下的铁锁起码有拳头大。我们扁着身子，自黑暗的瓶颈涌入灯光昏黄的内室，老人家正要从靠墙的老式沙发里起身迎客呢。

不必了。不必了。我和孙医生连忙欠身扶定，生怕有丝毫闪失。接着，除了我和老人家之外的 4 个男女互相交换着眼色，似乎早有预谋。然后，由圆脸盘的女教友笑盈盈地道出开场白：施爷爷，我们给你带来个客人。

施爷爷眼花气紧，还偏着耳朵：你说啥子？

女徒弟凑过嘴，正冲着他耳门叫：带来个客人，是作家，早就给你提过的嘛。

哦，作家。失敬失敬。可是我没得啥子写头。

孙医生插嘴：施老先生，我们大家以人格担保，这个老威不是歌功颂德的狗屁文人，而是严肃的，有良心的，他在记录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司马迁做的同样的事情，所以……

民族的历史？跟我有何相干？脑壳昏，站不稳当，在家像坐牢，真不晓得今晚睡下去，明早爬不爬得起来。唉，个人都没活明白，还“民族的历史”!

女徒弟急忙打圆场：施爷爷！脾气好大哟！你平时都爱摆老话，那沟那坎，有条有理的，今晚咋个啰？大家瞎聊嘛，上天入地吹嘛。

女娃子，没吃过亏哦。施爷爷我除了中医之外，再教你 8 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女徒弟哈哈直笑：你都 80 岁了，祸还从口出？这屋里除开 3 个基督徒，就是 3 个无党派，哪个去告密嘛？况且告准密，哪个警察吃了豹子胆，还敢来抓你嘛？风一吹，嘿嘿，不吹都要倒。

我接上话茬：施爷爷，警察倘若上门，那就太人道了，等于带你到外面的世界兜风，免得你一天到晚在这高高在上的铁笼子内闷得慌。我比较熟悉监狱的情况，你这岁数，你这快散架的身板，想进去增添国家的财政负担？没门儿。监狱又不是养老院，你有个三长两短，还要当事故处理呢。

这道理我明白。可是我不愿意老提以前的伤心事。

孙医生说：你不是已答应和老威聊一聊吗？

我是答应过。可是我也提醒“在生理和心理允许的条件下”。我要避免激动，否则会彻夜难眠。

孙医生说：既然如此，我们明天上午再来拜访。

上午也要避免激动，否则整天的情绪低落。

我问：下午呢？

下午更要避免激动，否则诱发各种病灶，人随时都可能报销。

我差点说，你都到这步田地，还觉得人耍人好玩？可到底忍住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但也没有谁提议告辞。挂钟嘀嘀嗒嗒响，我扭头望着窗外，竭力分辨夜空中的灯光和星星。一阵军号突兀而起，女教友笑道：好多年没听过军号了，真稀罕。

我可是天天听。施爷爷说。后来有只耳朵背，军号声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打摆子似的，很凄凉。你们莫笑，因为这种笑比较反动，晓不晓得？我是老兵哦，昆明刚解放就参加解放军哦，不出事的话，军龄比老地主的裤腰带还长。

我随口应个是吗？你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吗？

是的，我的老家在昆明郊区的小板桥，我家几辈人做云南菜，我父亲给省主席龙云做菜。还是有些名气啰。

你生于哪一年？

1927。整 80。

按红色教科书里的说法，是北伐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年。

不清楚了。我父亲不识字的。

那墙上挂的是你父亲的老照片？胸牌上还写着“云南省军区司令部”。

昆明刚刚和平解放照的。以后他继续给部队首长做菜。接着就做不成了，再接着就死了。

咋个死的？哪一年？

这个嘛，这个嘛，嘿嘿，就不要说了，事情过去那么多年，过去就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是吗。听孙医生讲，你的文化很高。

不算啥。1948 年考入云南师大外文系，1949 年碰上解放，没毕业就犯错误。

啥子错误？

就一句话。不提了，不提了。

你给孙医生提过嘛：在共产党手里拿工资，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

私下胡扯，被人告密了。那时候才 20 多岁，又刚从旧社会过渡，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体会还不深刻。如今奄奄一息，就体会比较深刻了。

听起来像在说反话。

你说反话，我没说。你的录音机开起的，你在搜集材料，我晓得。

我把录音机关掉。

关不关无所谓。干啥子也无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

那我们随便聊聊。你父亲是大厨子，你母亲呢？

保姆。在法国领事馆，给帝国主义带娃娃。

待遇如何？

不敢说。总之你都晓得了，我能上大学，念英文，很费钱囉。

你父母的收入都可观。那家庭成分是啥子？

划成分？那又是土改了。我家在城市，不在农村。

城里也划成分嘛。

我家能有啥子好成分？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具体是啥子？地主？资本家？

唉，不要问了。这辈子，父母把我害苦了，我也把他们害苦了。怨不了谁，怨不了时代，更怨不了党和政府，只恨自己中旧社会的毒，没有认真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没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你在写《悔过书》吗？

我也是作家，我写过几百份《悔过书》，还不算口头悔过。成没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呢？要组织说了算，群众说了算。不悔过不行，我曾经跪了几天几夜，魂都整出窍了，倒在地上，再咋个泼水都醒不来。好歹还魂了，嘴里念念不忘的不是爹妈，不是老婆，而是共产党、毛主席。只有共产党、毛主席不会整人害人，而下面的、身边的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一眼望不透的墙，都要防着。你不防着，哪天突然又被揪出来，你还蒙在鼓里。

你讲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作家写过了。

反动。太反动了。他叫啥子名字？是不是昆明的？我要去告他。

他叫乔治.奥威尔,英国人,写了一本政治寓言小说叫《1984》。

嘿嘿，没法告了。

老人家吃过不少苦头，有点神经质了。

你才神经质呢。我活满 80，你能不能活满 80，都很难说。前一阵，我还下得了楼，过马路时，被小汽车挂倒了，本来没受啥子伤，可是开车的慌了，怕被老人赖上，就永无出头之日。他匆匆忙忙把我弄到街沿，浑身都哆嗦，还谎称回家拿钱。其实呢，溜之前我就晓得他肯定要脚板擦油，哎呀。

正常嘛，如今乱世，人人都没安全感嘛。

你这个文人，够冷酷，放在土改时期，是当民兵的料。

民兵的料？

就是捆人、打人、煽人耳光的料。

你挨过耳光了？

有一回，我跪在毛主席像前，一口气煽了两三百个耳光，自己把自己打得昏倒在地，牙床都搞松了，流好大一滩血。

疯了疯了。

自己冲自己发疯总比别人冲你发疯来得实惠，虽然也痛也累也猪狗不如，可不会残废，更不会死，而且悔罪效果特别好，容易过关。

你的尊严呢？

说梦话哟。命都差点保不住，还有尊严？官僚地主的狗崽子加现行反革命，还有尊严？

那你的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了。厨师家庭咋会划官僚地主？你家在郊区有土地、房产？

没有嘛。

是受龙云的连累？不可能吧？龙云虽然在国民党手里是云南王，但也是起义将领，为和平解放昆明做出了贡献的。好像，好像，还在共产党手里弄了个什么官当。

说来话长，干脆就不说。

你的老伴呢？儿女呢？

说来话长，也不说了。

唉，不少老人都是你这种心理，被整怕了，运动怕了，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惯性。其实活到你这份儿上，说点真话，谁还能上门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影响身体嘛。那些惨事，多说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脑壳昏沉沉，却整夜睡不着。

现代医学证明，倾诉自己内心的隐痛是一种精神排毒治疗。

瞎扯。我就是医生。我不愿意回忆，为啥子要强迫回忆？更莫提倾诉了，20多岁只倾诉过一句话，就倒霉终身。

你就不愿意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你父亲不识字，你有文化呀。

人死如灯灭，没意思。

你这样说，身边这 3 个基督徒可不同意。

基督徒？他们同不同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此糟糕的新中国。

年轻人，作为医生，我再次送你 8 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谢谢。我无话可说了。

我也该休息了。作家同志，让你失望，很对不住。

保重吧，施爷爷，虽然你连名字都不愿透露。

名字对名人有意义，对普通人没啥意义。我撑不住了，再见。

我们只得告辞，重新将老人孤零零地丢在囚笼一般的室内。沿黑漆漆的楼道往下，再往下，我不禁想起但丁的《神曲》，从第一层坠落到第九层，从地狱坠落到炼狱就是天堂。那么现在，世界是否真如诗中说描绘的那样，在一瞬间倒了过来，地狱反而在顶楼，在接近星空的极高处？

夜深沉。稀稀落落的过往车辆和行人，令眼前的都市显得空寂。我和孙医生都无精打采，直到返回自己的窝，在关门之际，孙医生才突然开口：哦，忘记告诉你，张应荣长老死了。

我触电般哆嗦一下：死了？什么时候？

今年中秋节。我们在丽江还碰面，一起吃月饼呢。

我细细地咀嚼着孙医生的叹息，的确，中秋节那晚，丽江有乌云，有冷风，就是没有一丝月亮。孙医生陪同两对美籍华裔医生夫妇，并约了班忠义和我，本想在仿古客栈的草亭子下，吟诗作对，尽兴风雅一番，可惜天公不作美，烛光于风中飘忽不定，最后雨也跟来了，搞得大家立即掐断进行不久的侍奉神的话头，各持月饼一块，匆匆祝别。

然而在千里之外，在我们相聚过节的同时，我最初寻访的、因为信仰基督而被划成地主的张长老，却正终结其尘世生命，奔赴天堂——他曾受尽折磨，一次次在天堂门口打转，却奇迹般活拢 85 岁。

约两年前，我写了《土改受害者张应荣》，以下是此文的结尾：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 3 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在《最后的地主》快落幕之际，在一连 3 次寻访未遂之际，读者们请原谅我，以一个证人，一个落魄文人特有的“自我抄袭”的方式，表达对所有过去的、正在过去的、将要过去的老人的悼念。我们曾经接触，曾经交谈，曾经交谈得很不成功（如本文所述），可一旦相互离开，无论死、将死、还是活着，他们都悄然退出了我的视野，远远的远远的，在永恒之河的那边，招不回，叫不应，却一直在人类的记忆星空里闪烁。

眼眶湿润了，但我不会为内心的这份酷烈哭泣，总有一天，我将步他们的后尘。谁不想甩开病痛、无助和孤独，然而病痛、无助和孤独却是注定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能够帮你吗？它们有死那么持久吗？有历史那么持久吗？甚至，有历史里所包含的主宰我们的专制，有专制里所包含的谎言、监控、威胁、利诱、背叛、血泪及喊叫不出的危机那么持久吗？

你可以自己掐住喉管，试试什么滋味。

我记述或正在记述被社会主流遗弃、被汹涌群众遗忘的旧日真相，个人被时代的巨手掐住喉管，有的粉碎了，有的残疾了。我在纸上经历了这一切，依然健康。所以不能不感谢上天的眷顾，感谢天上的父亲和姐姐的眷顾，更要感谢我这个行当的先行者司马迁，他为“叛国贼”喊冤，而后被盛世君王割掉卵蛋，而后孤愤作《史记》——这令我数度惊骇，并在乱世危邦的呼号不绝于耳之际，下意识地抠紧裤裆。

我没有被阉或自阉，我还是个拿得出手的男人，我幸福无比。

然而，司马迁，他的确比我有更高的去势的尊严。

红色档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
1927 年 3 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1〕，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⑵，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

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出、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

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儿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⑶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竹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⑷。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十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

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拢）。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⑸，坐飞机回广东⑹了。吴佩孚⑺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⑻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感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⑼，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伯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橙，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

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升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⑾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行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眼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⑿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中，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

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咸，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⒀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14〕，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15〕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轫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

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腭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16〕，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⒄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宫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示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

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

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⒅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县，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否，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19〕，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

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阮来。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暇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激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20〕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

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统，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2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 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22〕加入了农会，

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23〕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信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线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s〕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28〕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27〕有什么两样！

注 释

（1〕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2〕赵恒惕（一八八 0 ——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 0 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 〔3〕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4〕“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打”，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8〕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7〕吴佩孚（一八七四——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一九二 0 年七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棋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8〕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十节。〔9〕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一九二七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10〕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11〕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12〕袁祖铭，贵州军阀，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间曾经盘据湘西一带。〔13〕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斌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14〕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池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15〕都总、团总是都、团政权机关的头领。〔16〕“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17〕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18〕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19〕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20〕孙传芳（一八八五——九三五），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21〕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22〕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7〕。〔23〕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2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25〕张静江（一八七七——九五 0），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26〕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27〕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

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第二章 土地的没收和征收

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三条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但对依靠上述土地收入以为维持费用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事业，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另筹解决经费的妥善办法。

清真寺所有的土地，在当地回民同意下，得酌予保留。

第四条

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

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

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第五条

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

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主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百分之二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第六条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第七条

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第八条

本法规定所有应加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在当地解放以后，如以出卖、出典、赠送或其他方式转移分散者，一律无效。此项土地，应计入分配土地的数目之内。但农民如因买地典地而蒙受较大损失时，应设法给以适当补偿。

第九条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农村社会阶级成分的合法定义，另定之。

第三章 土地的分配

第十条

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斜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第十一条

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但区或县农民协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为便于耕种，亦得以乡

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乡与乡之间的交错土地，原属何乡农民耕种者，即划归该乡分配。

第十二条

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农民租入的土地抽出分配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应使原耕农民分得的土地（自有土地者连同其自有土地在内），适当地稍多于当地无地少地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农民保持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土地为原则。

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原耕者保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土地。

第十三条

在分配土地时，对于无地少地人口中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如下：

一、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而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在本乡土地条件允许时，得分给多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

二、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应酌情分给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庭生活者，得不分给。

三、家居农村的烈士家属（烈士本人得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荣誉军人、复员军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均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得视其薪资所得及其他收入的多少与其对于家庭生活所能维持的程度，而酌情少分或不分。

四、本人在外从事其他职业而家属居住农村者，其家属应酌情分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属生活者，得不分给。

五、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六、经城市人民政府或工会证明其失业的工人及其家属，回乡后要求分地而又能从事农业生产者，在当地土地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七、还乡的逃亡地主及曾经在敌方工作现已还乡的人员及其家属，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八、家居乡村业经人民政府确定的汉奸、卖国贼、战争罪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坚决破坏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不得分给土地。其家属未参加犯罪行为，无其

他职业维持生活，有劳动力并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第十四条

分配土地时，得以乡为单位，根据本乡的土地情况，酌量留出小量土地，以备本乡情况不明的外出户和逃亡户回乡耕种，或作本乡土地调剂之用。此项土地，暂由乡人民政府管理，租给农民耕种。但所留土地最多不得超过全乡土地的百分之一。

第十五条

分配土地时，县以上人民政府得根据当地土地情况，酌量划出一部分土地收归国有，作为一县或数县范围内的农事试验场或国营示范农场之用。此项土地，在未举办农场以前，可租给农民耕种。

第四章 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

第十六条

没收和征收的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应按适当比例，折合普通土地统一分配之。为利于生产，应尽先分给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农民。分得此项土地者，可少分或不分普通耕地。其分配不利于经营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并合理经营之。

第十七条

没收和征收之堰、塘等水利，可分配者应随田分配。其不宜于分配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

第十八条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河、港等，均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其原由私人投资经营者，仍由原经营者按照人民政府颁布之法令继续经营之。

第十九条

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苗圃、农事试验场及有技术性的大竹园、大果园、大茶山、大桐山、大桑田、大牧场等，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但土地所有权原属于地主者，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收归国有。

第二十条

没收和征收土地时，坟墓及坟场上的树木，一律不动。

第二十一条

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应妥为保护。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地主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不合农民使用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充作公用。

第二十二条

解放后开垦的荒地，在分配土地时不得没收，仍归原垦者耕种，不计入应分土地数目之内。

第二十三条

为维持农村中的修桥、补路、茶亭、义渡等公益事业所必需的小量土地，得按原有习惯予以保留，不加分配。

第二十四条

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的一般原则，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五条

沙田、湖田之属于地主所有或为公共团体所有者，均收归国家所有，由省以上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六条

铁路、公路、河道两旁的护路、护堤土地及飞机场、海港、要塞等占用的土地，不得分配。已划定线路并指定日期开辟的铁路、公路、河道及飞机场等应保留土地者，须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七条

国家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经营者，经营人不得以之出租、出卖或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项土地时，必须交还国家。

第五章 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

第二十八条

为加强人民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地改革委员会，负

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

第二十九条

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三十条

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第三十一条

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村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第三十二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人民法庭的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三十三条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为保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严禁一切非法的宰杀耕畜、斫伐树木，并严禁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三十四条

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法适用于一般农村，不适用于大城市的郊区。大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办法，另定之。

本条所称的大城市，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按城市情况决定之。

第三十六条

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汉人占多数地区零散居住的少数民族住户，在当地土地改革时，应依本法与汉人同等待遇。

第三十七条

本法不适用于土地改革业已基本上完成的地区。

第三十八条

凡在本法公布后开始施行土地改革的地区，除本法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及第三十七条所规定之地区外，均须按照本法施行。各地何时施行土地改革，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省人民政府以命令规定并公布之。

第三十九条

本法公布后，各省人民政府应依本法所定原则及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当地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提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施行，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

第四十条

本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公布施行。

“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鲁顺民

一、乡关

我是兴县人，我们那个村叫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是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

业，这一点也不夸张。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牛友兰先生。一高在县城里。这两所高小学校是开明绅士刘少白和牛友兰出资兴办起来的。二高经常保持有二百多学生，学生大部分是本县子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陕西神木和府谷，都住校学习。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刘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 38 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 5 名，国民师范有 3 名，其他就读于进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 20 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牛友兰先生代为交纳学费，日常开支也由他一手包下来。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很多。

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 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向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 160 多名在外干部，集了 1 万多元，那时候的 1 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 4 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 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 13 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住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 1400 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刘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 年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刘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刘两家还是姻亲，刘家老大刘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 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刘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刘亚雄，二女儿刘竞雄，侄女刘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 9 人，有 7 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刘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

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刘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他对母亲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筵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刘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 1940 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 2000 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二、 刘象坤之死

1947 年 4、5 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 17 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后来听说跟“四人帮”跑了，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宏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 7、8 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 8 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刘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刘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刘少白很疼爱刘象坤这个弟弟，刘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刘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刘象坤到边区政府找刘少白，趁刘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真的就闹不清了，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就怎么来。

刘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被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刘武雄就回来了。

刘武雄 1932 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刘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刘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刘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 1980 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三、 向刘少白说理斗争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

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刘少白的儿子刘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

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刘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

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

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

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刘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

算什么。但是，刘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

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家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个跳上台来和刘少白说理。

他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

刘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

任奴儿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还敢狡辩！

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派给刘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

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蹴。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

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刘少白再也没受制。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刘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刘义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井泉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刘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刘少白交上十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十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1940 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刘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给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四、 “村盖子”刘玉明

土改运动和整风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1952 年我到县委办工作的时候，发现县里科局以上的干部们土改时候没有挨过打的很少。

村支书叫刘玉明，36 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1938 年）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 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碹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 36 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 70 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刘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刘象坤那样在尸首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刘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刘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刘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花油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把心脏掏了出来，用布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刘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刘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花油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花油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刘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刘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刘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的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刘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刘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 年我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

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刘玉明的老婆分给他时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 90 多岁了。

老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本来是 1949 年就可以入的，他说咱们拣个好日子吧，结果就推到 1950 年，我一直把入党的时间当作参加工作时间，档案上也这么填，结果到最后弄了个退休，其实我 1948 年就在村里当教员了，许多学生现在都按离休待遇，可我还不是，所以，我不是老干部。

刘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我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五、 果实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作相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学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惶，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惶，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

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公纯的闺女。

任公纯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 300 大洋。300 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公纯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 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宪军，刘宪军 1948 年的时候就是兴县专区的专员，做过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局的局长，回到山西后担任过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统战部副部长。

三女儿名叫任有莲，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

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

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分老实，念书笨一点。任有莲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这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任有莲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有莲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 8 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那位同学也年轻气盛，也别住了一股子劲，就是不同意离，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有莲，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有莲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非离不行。

我就劝她说：你们俩都是通情理的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你们是不是见个面好好把这一层说开，人家也是个开通人，只要说开了不会不同意的。

结果她还真的去了一趟东北，两个人一说，人家那男人也非常理解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同意离婚了。他们是 1955 年离的婚，从分配到离婚，整整用了 8 年时间。后来，任有莲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邯郸市。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那位同学也成家立业，在东北过得挺好。

附一：

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
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略)
（《晋绥日报》1947 年 9 月 2 日头版）
附二：
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宏森

工作团六月间来到黑峪口，中间经过两个月的抢种工作，八月初才开始了土地改革。一开始，在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工作路线和一些同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均走了弯路，存在着问题。

不了解市镇群众的特点

当时工作团同志，费了很大劲，作每户调查，考察成份，从三代算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土地改革工作未正面进行，只一般的提了提。而情况的了解反而越来越复杂，说是真正正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认为占一大半的小摊贩（此处摊贩，多无抵垫，当日刨闹当日吃）、水手、脚行、吹鼓手（该村有三家鼓坊）和一些皮木铁匠等手艺工人，他们中有的也捎种一点土地，这些人不好发动。一些同志特别对其中某些比较油腔滑调，人面前要强些，或是到处倒贩跑打的人怀疑。结果造成群众心理上的疑团：咱有剥削啊，“一个钱买的，不肯一个钱卖”，这怎么办呢？工作圈子狭小得只在几个比较纯正的贫苦农民身上打圈圈，他们自然感到没有力量。要他们诉地主的苦时，他们向黄河诉苦，说河路不通，水推走了地，靠“河桶子”吃饭吃不成；诉苦今春调剂土地不公道；诉一些坏干部欺人；这些，确也是些苦，但真正的苦是以大地主恶霸刘象坤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全村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则没人诉或者诉得很少。

在“太复杂”、“正派农民不多”的概念下，就自上而下的组织了那少数群众，对后湾（该村分三个地段：前街、后湾、后崖，各有六七十户不等）的贫雇农小组，起先由四个人组成，再由他们吸收扩大，但是，在讨论中很难通得过，一个月左右，仅仅增加了三个人。这个贫雇农小组实在是脱离群众的。

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

工作团重新检查和研究了情况：黑峪口是市镇地方，黄河渡口，有它的许多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但不是那么“太复杂”，“基本群众少”，“不好发动”。遂确定暂时不提贫雇农小组，放手发动群众，从无地缺地户着手，团结多数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形成骨干，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进行组织。

从最底层算起，水手、脚夫、吹鼓手、铁匠、小摊贩等，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他们有土地要求，有斗争恶霸地主的要求；其中一些作风上有毛病，油腔滑调些，或好为强的人，是长期的教育改造问题。这时，向群众宣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解释了什么是剥削的问题，使一些没有直接剥削关系的群众，了解了自己是受着地主的剥削，打破他们的疑虑。大会小会个别教育，宣传土改政策，工作开始跳出了小圈子，群众情绪振奋起来。

接着，以地段发动无地缺地的贫苦群众，选出土地改革代表，条件是由大家提出

大家通过的。

一共选出廿四个代表（内女的六个），除两个是旧日的干部外，其余多是从来没有在村政上出过面的人。他们为全村群众拥护。以他们为首，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向地主斗争。

集中火力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的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所以人们□□说："快不要鬼拾翻了，凭咱黑峪口这些人能搬倒人家？""那还不是蚂蚁搬大树，费死劲也不行。"有的竟说："官官相为，马头相连，谁还不让人家几分？"经再三的说明解释，群众才扭转来相信工作团这一次是真正来为大家办事，是一定听群众的意见的。

接着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分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高墕头村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在斗刘的会场上，因为事情的牵连，其他一些地主又被群众扣起）。

斗争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群众觉悟提高，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表现积极主动。

一条重要经验诉苦教育

从土地改革开始到斗倒刘逆这一时期工作，重要的经验之一，即是充分发动诉苦，通过每个人的苦事，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这一点，在本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说，有的是做的较差的，群众急于扣起地主，因而未经过充分的诉苦教育。黑峪口是注意了诉苦教育，但开始只着重一般的内容，如世界是谁创造的，地主的土地财产哪里来的等等。没有放手引导每个人诉说自己的事情。因而好几天中诉来诉去就是那几句话，群众认识还不深，情绪不是激愤的。后来发展到接触了具体人的具体苦事：陷害人命，霸占财产，杀人放火，吃租放债，打人骂人……每个人诉说自己亲身经历的苦事，群众情绪大大提高，这样大家不仅认识了某个地主的罪恶，而且逐渐提高到认识了整个地主阶级的罪恶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何之光

1950 年 7 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 12 月，完成了包

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胡乔木在序言中大加赞扬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4页，关于土改有这样一句话:“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这一句话掩盖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刘少奇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政务院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当时，全国除台湾西藏外都已解放，各级新政权均已建立，党的威信空前高涨，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全国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情志高昂的大好局面。农村中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征粮等一系列斗争，“杀、关、管”了一大批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反革命分子等。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尽管成分不纯，也已普遍建立，11月开始的大规模镇反也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应该说，地主阶级已遭受沉重打击，狼狈不堪了。

前段土改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完成的。其基本做法如下：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即展开政治攻势，首先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说明来意，宣传土改，稳定民心。然后分别召集农会会员、民兵、妇女、青年和暂不冠名的贫雇农、中农及富农、地主先后开会，有针对性地宣讲土改政策、约法几章。有的村还将《土改法》写成了大字报张贴。与此同时，工作队员个个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纪律)。经过扎根、诉苦、串连、诉苦会等，将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选出觉悟较高、办事公道、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改造原农会，然后在农会和工作队领导下，有计划地对有劣迹有民愤或隐瞒土地、转移粮食等的不法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说理斗争，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确有必要时，由人民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斗争会上会下都禁止打人。在斗争间隙，继续深入发动，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农和妇女人农会。对一般守法地主，只要交出应交的地契房契等，承认过去剥削农民的罪错，便不开他们的斗争会，以利于分化瓦解地主阶级和土改工作的进展。

由于贯彻执行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地主分子陷入农民的汪洋大海，极其孤立和惶恐。在这种有声有势、合理合法的斗争形势下，即使是顽固地主也不能不看到，只有下决心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

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从而也可看到，土地是回农民老家，而不是哪一个“恩赐”的。(可是后来却大肆宣传“饮水思源”，说成是党和毛主席的恩赐，农民要感恩戴德云云，个人崇拜便在农村迅速泛滥起来。)

这样的土地改革，对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可以说，这是党领导土地革命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当然，四个区各乡各村的工作参差不齐，或多或少存在缺点和错误。但总体来看，成绩是主要的，是不应该否定的。

下面是“反对和平土改”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首先，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 60 个重点乡减少为 46 个。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 1952 年 4 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人生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 13 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这表明，《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

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 年 9 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

上述这些暴行，哪有一点像 20 世纪后半叶一个文明国家执政党所领导的作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恐怖、草菅人命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场人为的灾难!而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暴行也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文革中发生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等地对地富反坏右逐家逐户地疯狂大屠杀，也是实例。

当年被抛弃的《土改法》，现在可能无人记得，无人知晓了。为了使人们了解其基本精神，特抄举主要几条如下：

《土改法》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这里的“其他财产”，就是指浮财和底财。《刘少奇报告》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收和分配地主这些财产，就要引起地主对这些财产的隐藏分散和农民对于这些财产的追索。这就容易引起混乱现象，并引起很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这样就不如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73 页）

当年我曾听到汇报说，确实有个别地主拿着《土改法》来找干部争辩讲理，说这

是毛主席正式公布施行的国家法律呀!但立即遭到拒绝，并被扣上“以《土改法》顽抗土改”的罪名。令人啼笑皆非，心情沉重!但谁也不敢依法纠正。

《土改法》第三十一条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就是指地主、富农及其他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国民嘛，划定阶级成分这样一件关系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大事，当事人理应亲自参加，并经一定的法律程序决定。但是，即使在四个区土改中，也只有贫雇农和中农是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三榜定案”方法，地主富农参加评定和申辩、申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人家讲的有理有据，不是可以避免错划成分吗?

《土改法》第三十三条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的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这里规定，即使是恶霸分子和罪犯都要由县人民法庭依法审判和处分。《刘少奇报告》说：“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地主在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改造之后，是可以成为新人的。”(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34 页)这在前段土改中基本上做到了，并且公开宣传了地主改变成分的条件。

但是，毛泽东于 1951 年 2 月 18 日起草的党内通报关于土改的第七点说：“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见《毛选》五卷 35 页)一个“严禁”，一个“劝告”，两者相距多远!而且此时正是乱捕乱打乱杀的高潮，能“劝告”得了吗?又有谁敢于去“劝告”而不怕落个“包庇地主”或“立场不稳”的罪名?

关于地主成分的改变，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务院决定》丙部分 11 条规定：

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成分或其他成分。>>不合于上述条件，则不得改变。

这里规范了地主的改造，使其有人生的奔头，对国家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对其家属与子孙后代，都是有好处的;《刘少奇报告》第三部分专讲“保存富农经济”，但后来都不予实行，反而把富农与地主同样看待，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固定为永久敌人，永不改变成分。1957 年反右后加上右派，成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作为不断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也低人一等，备受歧视。而后又整出“右倾分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层出不穷，都被打人另册，实行专政。他们的人格

和尊严都被剥夺，便都不是人了!是什么呢?“牛鬼蛇神”!而且特别讲究“出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升学就业等处处都受限制，以致血统遗传，祸延子孙。

《土改法》第三十四条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土改法》是由党政“二把手”刘少奇主持起草，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后经执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查讨论和修改，然后交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再由毛泽东于 1950 年 6 月 30 日下令颁布施行。这是经过许多人深思熟虑后制定的，是严肃的、郑重其事的。

但是，“反对和平土改”部署了相反的一套，下面做检讨都来不及，谁敢自由批评及弹劾呢?农民及其代表能批评谁?弹劾谁?应受法律制裁的又是谁?

一部庄严的具有进步意义，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法律，连同其民主法治思想和将阶级斗争纳入法治轨道的尝试，在摇篮里就被扼杀了。这是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意毁法的严重事件，也是获取“无法无天”权力的一个突破。“和尚打伞”的角色在 1950 年就登上舞台了。

当年参加土改的大体上是三类人，有一定文化的年轻新干部包括地下党员；农民积极分子包括农村贫苦知识分子；区委委员以上的南下干部。他们接受了暴力土改的阶级斗争“教育”与“锻炼”，其中参加过 1946—1947 年北方土改的南下干部更是第二次了。尽管接受程度不同，但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那些出身、成分好，“根子正”，文化低却适合干部政策的人，刻意受到提拔，逐步成为基层、中层乃至高级领导干部，暴力土改为极左路线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左”倾干部队伍。在后来的“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等运动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包括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来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极左路线畅行无阻。

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暴力土改的结果适得其反，抑制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耽误了生产季节，死了那么多人(其中不乏有用的人才)，糟蹋了那么多东西，是其一。其二，由于它的野蛮残暴，在普通农民心中埋下深深的恐惧，土改后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嘀咕:“富了没有好下场!”有些报刊当时曾开展农民积极分子“消极退坡”思想的讨论，湖南的李四喜思想和北方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当时讨论的典型。

暴力斗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不得人心。

1953 年全国土改刚完成，同年冬开始，便相继实行粮棉油猪等农副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从此发端，不几年就固定为中国社会独特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至今仍在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到 1956 年，农民手里的土地所有权被他们极不情愿的“合作化”彻底化掉了。接着而来的是“大跃进”和“公社化”，无一不是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倒退性灾难，而且愈到后来破坏愈大，灾难愈重。

回首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到，1950 年反对和平土改，自毁国家法律，是在反民主法治、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了严重的一步。这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

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

野夫

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涸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 1994 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 500 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 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 100 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四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 1000 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 8 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 60 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 200 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 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 1946 年将我 18 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磐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

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 1948 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 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 1951 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镇压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 年和 50 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 15 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垦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 1930 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

不诬.

十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 1949 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 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 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

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 1951 年的 4 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 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 15 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 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 80 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 20 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镇压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 12。9 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 1947 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 1050 人，自杀 863 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 63 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

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他穷国传播，衍生出 20 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

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 1921 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 1937 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 1946 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 50 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 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 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 年 9 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

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

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